

毛泽东大典

沈阳出版社

毛泽东大典

(一)

生平·业绩·风范卷

沈阳出版社

(辽)新登字 12 号

毛泽东大典

生平·业绩·风范卷

廖盖隆 名誉主编 李峰华 主编

责任编辑:马宏伦 曹福志 葛 君

封面设计:王 岐
守 哲

责任校对:张 燕 李东训

版式设计:杜延祥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 13 纬路 19 号)

全国各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1.125 插页:4
字数:100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41-0001-4/A·1

定价:240.00 元(全套)

毛泽东大典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廖盖隆 贾春峰

名誉主编 廖盖隆

主 编 李峰华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宏伦 王红续 柳 郑
秋 实 葛 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世发 马宏伦 王红续
王充闾 李峰华 张毓茂
柳 郑 秋 实 高柏金
贾春峰 董万德 葛 君
廖盖隆

T-15 / 11

毛泽东大典各卷编辑委员会

生平·业绩·风范卷

主 编 王红续
副主编 张 纵 孙慧荣 郁广宁 李志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红续 孙慧荣 龙润霞 李志铭
张 纵 邵其扬 郁广宁
编著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军 王红续 龙润霞 白洪文
孙慧荣 帅巧芳 刘月生 许 震
张有奎 张 劲 邵其扬 杨令军
郭 品 黄汇章 梁安柱 梁国昌
程福生 谭一青 谭湘兰 薄日安

思想·智慧·方法卷

主 编 柳 郑
副主编 徐胜洪 彭恒军 陈 舟 季国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玉芳 李聚山 陈 舟 季国平
柳 郑 徐胜洪 鲁世瑶 彭恒军
储士家

编著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辅恒	冯俊杰	刘杰	刘玉芳
李玉钢	李聚山	李修忠	陈舟
张斌	张晖	季国平	宋毅军
郁广宁	柳郑	郑雅茹	高学栋
金庆军	徐胜洪	曹风月	鲁世瑶
彭恒军	储士家	戴茂林	

传播·研究·影响卷

主 编 李峰华

副主编 诗韵 方舟 仲雄 王志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成 王志业 牛之杰 吕芳评
施凯鸣

编著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宁	于雷	王文成	王志业
王刚玉	田培坤	刘殿军	李峰华
杨一帆	杨鹤鸣	吴雪松	张雪浪
严励	陈之明	金英	金晓白
施依	胡凯	曹莉娅	彭涛
谢东升			

《毛泽东大典》序

廖盖隆

读者看到《毛泽东大典》这书名，也许会觉得面生。觉得面生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样的书还没有出过。但它的含义是明白的，“大典”就是一部大书（典册是古代对书籍的称呼，因为古代的书是写在削好的竹片上，然后再用绳子串起来，捆成“典册”的）。明朝永乐年间就编纂过一部几千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叫《永乐大典》。正在着手编纂的《中华大典》估计将收入古书两万种，共有7亿字。宋朝编纂的《册府元龟》（也有几千万字），也是书库中一部领头的书。《毛泽东大典》就是关于毛泽东的一部资料总汇性质的大书。这部书由《生平·业绩·风范》、《思想·智慧·方法》和《传播·研究·影响》三卷组成，共有400万字，字数比上述几部大书少得多。这个颇具特色的构架是由主编提出，经编委会讨论通过的。

这部书的主题很大、很重要，因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曾经指引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随即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用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因而使中国开始进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此后，毛泽东还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犯了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对党、对国家和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但是从他的一生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这些过失从反面给了人们以深刻的教训，促使党和人民走上纠正“左”倾错误，并对从别国搬来的、弊端重重的社会主义旧模式进行根本的全面的改革的正确道路。因此，对于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说，再也没有比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伟大的但是也有错误的一生；学习和研究他的科学著作中得到集中体现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他晚年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为鉴戒的更大、更重要的任务了。《毛泽东大典》的贡献，就在于它汇集了关于毛泽东的生平、业绩、风范，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智慧、方法，以及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传播、研究、影响的最丰富和翔实的资料，以供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用。

从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怎样分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我在1982年5月和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施拉姆教授的一次交谈中，曾经说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我的看法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大体上可以分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三个时期来研究。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前期，是从1920年下半年到1934年年底的15年。这15年毛泽东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个期间，1927年7月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前，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这时，毛泽东已有了关于中国革命要经过以“实现人民统治”为目的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从1927年8月到1931年期间，即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建党

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关于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社会政策；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开始形成。但当时，这个正确理论和路线还没有被全党所接受，特别是没有被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所接受，相反地先后受到了李立三和王明，特别是受到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和反对，致使中央红军遭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期的惨痛失败。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巨大威望，他仍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在他被排斥而让他“专做政府工作”的1932年到1934年间，毛泽东主要是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革命活动的鼎盛时期即中期，就是从1935年1月到1957年6月的23年。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作出伟大的辉煌的贡献的时期，这些同时也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重大贡献。这个时期的开始是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1月中旬发生的中国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时遭到了重大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12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周恩来和与会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掌握着军事指挥实权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原议。15日，红军占领贵州省的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由周恩来决断，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周恩来后来回顾说：从黎平会议起，我们便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就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于是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前进。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1月15日到17日，党在遵义举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和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决定由张闻天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起草《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由中央常委审定后下发；撤消长征开始时设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红军由军委和红军总部指挥，而周恩来为党内受委任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小组。从遵义会议以后起，正如邓小平所说，尽管毛泽东当时还不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在实际上在中央和中央军委起了领导作用。可见，历史性的转折是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而特别是在遵义会议时完成的。从这时起，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又纠正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随后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全国抗日的伟大革命高潮。从那时以后，一方面，在实践上，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时期，即从1935年1月到1945年8月的十年多的时间内，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的四年间，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全国革命胜利，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七年，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得到新的发展，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式的（即用和平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同时还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一个人在三四十年内（从1920年到1957年）对革命事业和革命理论作出了这么伟大的贡献，领导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

罕见的。

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后期或晚期，是从1957年7月到1976年9月他逝世时的19年。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他又说：“从1957年起，我们的主要错误就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左”倾错误包括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的“两年徘徊”，使我们耽误了20年的时间。他还说：“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多少年来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他又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毛泽东晚期19年的领导，并不是全都错了，但这期间他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错了，而且他的实际领导大部分时间也是错了，包括两次全国性错误。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的错误，有三年时间；1961年到1966年5月爆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五年多，他领导党和人民为纠正错误、克服困难而斗争，他的实际领导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的“左”倾错误思想越来越发展，但是这些“左”的思想没有全部付诸实施，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毛泽东更大的一次全国性错误是发动和领导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但即使是在这10年间，毛泽东也不是全都错了。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仅他犯这个错误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想防止党变质、国改色），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些好的思想，做了许多好事。例如他提出对外关系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正确战略，打开了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关系；他先后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周恩来一起机智地粉碎了林彪

集团，对江青的“四人小宗派”及其野心作了批评和揭露；对于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加以纠正，他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而交给了能联系许多老干部的、为人正直平实的华国锋，等等，这些都为后来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比较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准备了条件，并从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开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平稳过渡。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充分了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并且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正确的东西。”

毛泽东思想是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形成，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前期达到成熟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它从形成到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中，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革命；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统一战线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俗话说，“旁观者清”。美国学者施拉姆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

东》一文中说得好：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可以肯定，毛泽东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因为他在他的思想中大量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如果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重要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是属于历史的，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么，毛泽东应当可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

施拉姆还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个为人类的最终命运而操心 and 战斗的人，而且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说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病以后，毛泽东认识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只要重工业，不要人民”（指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指出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指苏联）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但是在探索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毛泽东和其他已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未能提出和解决实际上是从苏联搬来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关键问题；而正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中共十二大到十三大和十四大，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按照邓小平1982年9月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的解释，他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作出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

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这100年左右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指引我们在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最珍贵的是贯穿于这个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就是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新的工作作风，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保证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保证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从而保证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胜利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他在1957年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也有长远的普遍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遵循的。

这部书的第三卷所介绍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传播、研究和影响，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我所知，本卷所搜集的有关资料的全面和丰富的程度，也是超过前人的。无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视角和立论各异，都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多方面地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深湛内容。

从这一切方面看来，《毛泽东大典》的出版是一件好事，值得我们欢迎。

凡 例

第一卷凡例

一、第一卷为《生平·业绩·风范》卷,主要编撰汇集了毛泽东生平事业、个人生活及家世亲人等方面的资料。

二、以篇、章、节的体例统领本卷的全部内容。

三、本卷引用资料的出处主要以两种方式说明:1. 在文中注明作者及书名或文章题目;2. 在章或节后注明主要参考资料。这两种方式分别考虑了资料的性质及编著者的加工整理情况,也考虑到读者的需要。

第二卷凡例

一、第二卷为《思想·智慧·方法》卷,主要编撰汇集了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评述成果。

二、本卷按篇、章、节统领全部内容。按时间顺序汇集了国内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成果及争鸣观点,目的在于使读者在使用该卷时,既了解了毛泽东思想,又基本上掌握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状况。

三、本卷资料来源及处理方法:本卷资料均来自国内公开出版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论文、报刊及杂志的有关文章。选用时,编者做了以下工作:1. 对原稿进行了疏理,使观点更鲜明、层次更清楚。2. 将原稿的注释一律去掉。3. 为了读者查找原文的方便,选用资料一般均注明原作者及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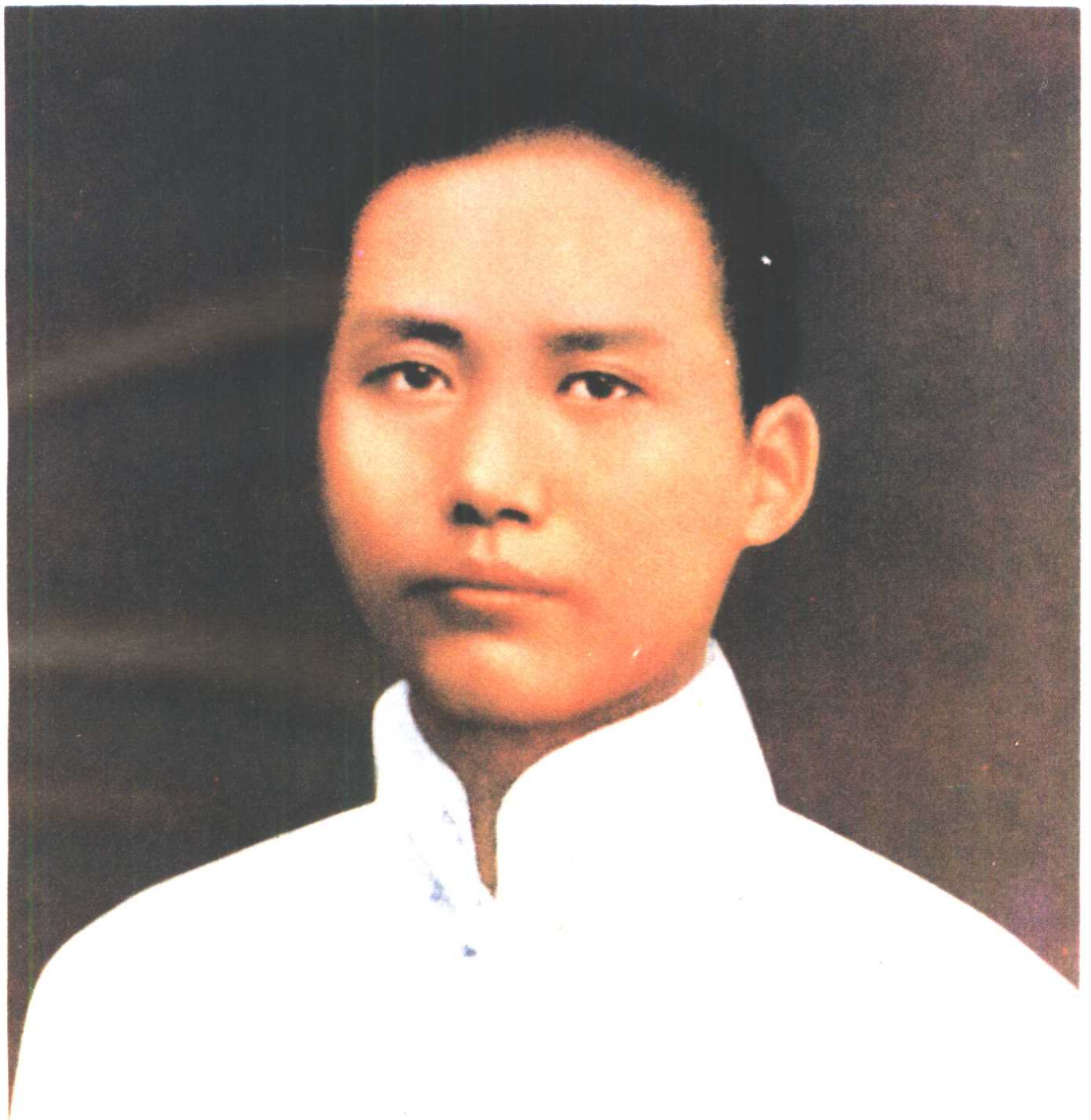
第三卷凡例

一、第三卷为《传播·研究·影响》卷，主要编撰汇集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海外传播、研究和影响的研究评述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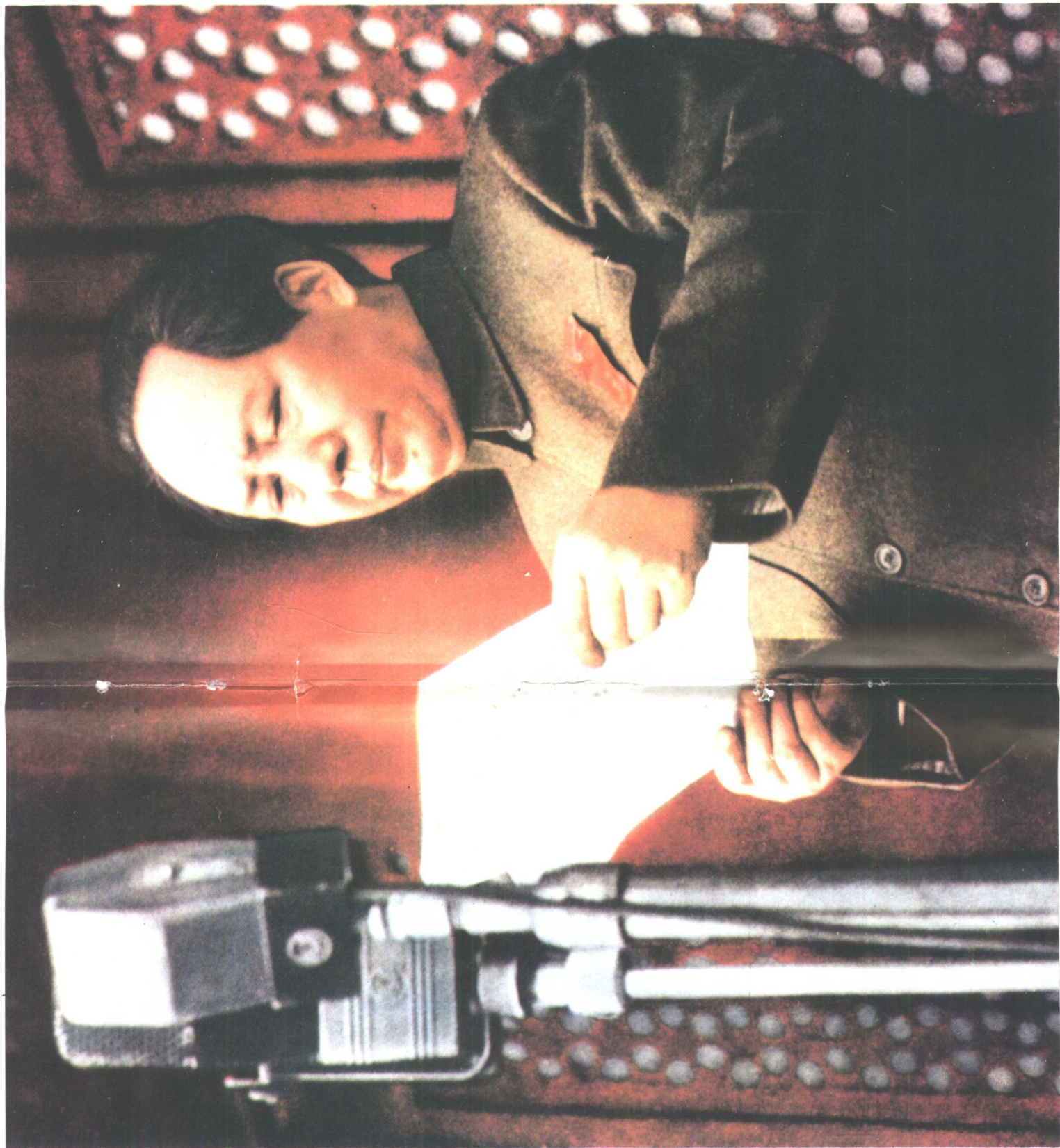
二、按篇、章、节统领本卷的全部内容。其中附录一、二“毛泽东生平大事记”、“毛泽东著作、电文、言论年表”按时间发展编排，这二份附录，编者参考了国内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文集、文稿，参考了国内理论界研究毛泽东生平、传记的现有资料。属研究工具类资料。

三、本卷编著内容的注释一律采用文内注。

四、为研究查找方便，本卷选用资料一般均注明原作者及原出处。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1949年10月1日毛
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



1953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选区参加基层选举。

目 录

《毛泽东大典》序 廖盖隆

第一卷 生平·业绩·风范

第一篇 导论.....	1
第一章 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概况	3
第二章 伟人一生概述	8
第二篇 毛泽东的生平业绩	15
第一章 成长时期	15
第一节 少年时代	15
第二节 初进长沙	21
第三节 湖南第一师范	27
第四节 新民学会时期的活动	42
第五节 驱张与自治运动	58
第六节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66
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	72
第一节 建党活动	72
第二节 领导湖南工人运动	82
第三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	96
第四节 考察农民运动，总结农民理论.....	116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31
第一节 秋收起义.....	131
第二节 井冈山的斗争.....	148
第三节 古田会议.....	161

第四节	农村社会调查·····	176
第五节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193
第六节	反“围剿”的斗争·····	203
第七节	长征·····	241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	250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250
第二节	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273
第三节	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288
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	304
第五节	整风运动·····	319
第六节	中共“七大”前后·····	330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	342
第一节	重庆谈判·····	342
第二节	转战陕北·····	357
第三节	三支大军南下·····	371
第四节	大决战·····	384
第五节	进京·····	396
第六章	恢复与改造时期·····	403
第一节	开国大典·····	403
第二节	出访苏联·····	410
第三节	领导恢复国民经济·····	425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	463
第五节	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	501
第七章	探索中的曲折·····	527
第一节	从整风到反右·····	527
第二节	“大跃进”·····	538
第三节	几个月的纠“左”·····	558
第四节	庐山会议·····	573
第五节	同赫鲁晓夫的斗争·····	591
第六节	读书与总结·····	603
第七节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611
第八节	“以阶级斗争为纲”·····	62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641
第一节	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	641
第二节	号召全面夺权	655
第三节	“九大”前后	667
第四节	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	677
第五节	外交工作	686
第六节	最后的岁月	693
第三篇	毛泽东个人生活专题	719
第一章	读书生活	719
第一节	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719
第二节	活到老 读到老	724
第三节	读马列著作	733
第四节	读哲学书	735
第五节	读史	739
第六节	文学嗜好	750
第七节	学习英语	761
第八节	学习自然科学	764
第九节	读报纸杂志	769
第十节	博览群帖	772
第二章	交往活动	777
第一节	同学之谊	777
第二节	师生情	781
第三节	与知识分子	785
第四节	与民主人士	801
第五节	与国民党将领	813
第六节	与末代君臣	821
第七节	与外国人士	825
第八节	与身边工作人员	830
第三章	文体活动	846
第一节	娱乐方式	846
第二节	体育活动	862
第四篇	家世与亲人	879

第一章	毛泽东的家族	879
第一节	毛泽东家族溯源	879
第二节	毛泽东一家	893
第二章	毛泽东的婚姻	927
第一节	毛泽东的妻子	927
第二节	毛泽东的姻亲	959

第一篇 导 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对毛泽东作出如下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一权威性的评价来之不易！这一结论冲破了“两个凡是”造神论的樊篱，将毛泽东从天上请回人间。毛泽东不是完美无瑕、不可企及的神，而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但一生功绩远远超过失误的伟人。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盖世伟人，还是一位普通人。他的出身再普通不过了。他是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对此，在毛泽东还没有成为领袖、没有被神化之前，是不成问题的。但与他深居中南海，并被别有用心野心家吹捧成“最最伟大的天才”时，在亿万人心目中，仿佛老人家不食人间烟火，俨然一尊神了。

当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无这种感觉。70年代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后来写道：“1971年。那个时候，人们和以往几乎一样的，经常能从报纸、文件和电影、电视上听到、看到毛主席的讲话和多种政治活动情况。但往往只是有限的一点点或几个镜头，或几句话，或一段话，或几十年前的某句话，即毛主席语录或称‘最高指示’。报刊、书籍及各种形式的宣传报导，几乎有文字处必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被人为的宣传‘神化’了。但经常见到他的人以及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神化’的形象一般很难感觉到的。因

为现实生活中的他，毕竟是人，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生前曾对跟随他 15 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

确实，我们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十几年里，有幸读到了大量的“如实写”他老人家的作品（毛泽东生前已有一些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活动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学术性颇强的传记，也有可读性很强的实录、轶事等文学佳作，还有大量的回忆、纪念性著作、文章。这一切，加上《毛泽东选集》之后不断出版的毛泽东专集、书信录、文稿，为我们编写本卷——生平业绩卷，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料。

生平业绩卷的编写宗旨是，不仅要完整地系统地展示毛泽东的生平大事，他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晚年犯的严重错误，而且要全面反映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的各个主要侧面，即作为儿子的毛泽东、作为丈夫的毛泽东、作为父亲的毛泽东、作为朋友的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毛泽东、作为游泳爱好者的毛泽东……

本卷第二篇，系统地汇集整理了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资料，从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一直编到 1976 年，共分八章。

第三篇，系统选编了毛泽东个人生活主要侧面的资料，分读书生活、交往活动、文体活动等章。

第四篇，系统汇编了毛泽东家世亲人方面的大量资料，分毛泽东的家族、毛泽东的妻子等章。

总之，《毛泽东大典》第一卷，将为一般读者展示毛泽东作为伟人和普通人形象的全景，为学者提供系统周详的毛泽东生平和生活各方面的宝贵可靠资料，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深入思考的选题和线索。

第一章 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概况

现有资料表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采访毛泽东，是毛泽东生平研究及回忆的开端。

斯诺从1936年7—10月冒险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窑洞里同毛泽东频繁夜谈。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对他（包括中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斯诺从陕北回到北平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1937年春，美国《亚洲》杂志发表了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名著《红星照耀中国》。10月，此书英文本首先由伦敦一家出版公司出版，1月又在美国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中国复社翻译出版了此书的中文本，易名为《西行漫记》。斯诺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作品，轰动了世界。他对毛泽东作了第一次并且是成功的描写。从此，斯诺与毛泽东成为终生挚友。

根据斯诺写的英文本《毛泽东自传》，在中国国内从1936年11月至40年代，又将其译成中文，出了许多版本，流传很广。

继斯诺以后，又有一些外国友人访问毛泽东，写出若干作品。如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了《毛泽东会见记》，斯特朗写了《毛泽东访问记》、《毛泽东印象记》。美国友人爱泼斯坦发表了《毛泽东印象》等书。这些作品也都有许多中文版本，流传很广。

40年代，抗日根据地的小学课本中开始编入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但往往有些失真。比如，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毛泽东在10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对这种不真实的描写非常不满意。毛泽东说恰恰相反，他从小就信神，而且信得很厉害。

1943年秋天，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向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萧三郑重交付了一项任务，要求萧三写一部《毛泽东传》。萧三欣然领命。萧三为此访问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何长工、郭沫若等人，“或作长谈，或作短叙，或连谈多次，或

仅片言只语”。1947年，萧三完成了截至“七大”为止的《毛泽东传》初稿。但是，《毛泽东传》终于没有完成。这是因为萧三长时间在国外，不熟悉1920年以后毛泽东革命活动的事迹，靠战争时期的简单访问记录，是很难写好《毛泽东传》的。

但萧三凭借自己与毛泽东曾为多年同学的宝贵经历，还是写出了毛泽东的断代生平著作。1946—1947年，华北解放区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和《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两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1949年春，萧三把这两篇文章合写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1949年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书，真实、生动，是传记文学的佳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此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有英、德、日、法等文字的译本。1954年，萧三把这本书和1944年7月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及其他文章，改写合编为《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但因故未普遍发行”。因为，他写得太真实了，有人不高兴。

40年代，除了萧三的作品外，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书文还有不少。如1943年华岩出版社出版了谢灵肖著的《毛泽东的故事》。许多根据地、军区、出版社都大量编辑印行了《毛泽东的故事》一类的书籍。党的七大以后，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成为全党宣传工作上的一件大事，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毛泽东生平方面的书籍文章不断问世，或者不断再版、重印和编印。

50年代，关于毛泽东早期生涯的传记作品继续出版。较有影响的有，李季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8月出版）、袁昂所著《毛泽东的童年故事》（商务印书馆，1952年6月出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的《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工人出版社，1954年1月出版）等。而份量最重的要算李锐所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8月重印）。此书初稿写于1952年，195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过。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从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还出版了大量回忆毛泽东1949年以前革命活动和记述毛泽东当时视察等活动的书籍文章。如萍乡煤矿老工人的集体回忆：《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傅连璋所著《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陈昌奉的回忆录：

《跟随毛主席长征》(作家出版社, 1958年9月出版), 翟作军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6月出版), 吴玉章等:《毛主席在重庆(革命斗争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61年4月出版)等。1958年,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报道记述毛泽东当年视察活动的书《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二)。当时, 不少省市都出版了反映毛泽东视察其省市的书籍。甚至徐水县办的人民出版社, 也出版了《毛主席到了徐水》等书籍。这些书籍尽管歌颂之辞显得过多, 但仍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文化大革命”使国外的毛泽东研究热更加升温, 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但在国内, 却出现了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的萧条现象。有价值的传记著作不多。

毛泽东逝世以后, 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 毛泽东传记著作文章不断问世, 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呈现出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 回忆性等史料书籍文章空前增加。从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到1983年底, 通过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二周年及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90周年等大型活动, 出版发表了大量回忆、怀念毛泽东的材料。1984年以来, 回忆毛泽东各个时期活动的书籍文章虽不再如潮涌流而来, 但也时有新作问世。特别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提供或撰写了不少生动可靠的传记史料。如张玉凤写的《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李银桥写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师哲写的《在历史巨人身边》, 逢先知发表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等等,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第二, 真正摆脱了长期以来神化毛泽东的倾向, 进入了实事求是地反映和研究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境界。神化毛泽东的风气在十年“文革”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毛泽东逝世后的两年之中, 由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阻碍, 不加分析地颂扬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晚年活动的倾向仍然严重存在。空洞的溢美之词充斥于大量的怀念文章之中。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对毛泽东作出科学评价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 毛泽东研究进入了写实写真的时代。一批研究和反映毛泽东生平的学术著作和传记文学开始问世。一些过去曾是人们不敢问津的禁区被冲破了。例如, 1953年9月梁漱溟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是一桩公案。当事人梁漱溟一直不愿谈及此事, 别人更是不敢涉足。但在1986年, 梁先生欣然向探问者细谈这一公案始末。他说:“现在具备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 第一, 毛主席已故去十年, 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

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经过梁漱溟的细谈，人们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认识到这是一场历史误会。毛泽东对梁的批判确有不妥之处，应负一定责任。

毛泽东在建国后错误处理的若干其他历史公案，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错误处置，等等，人们都根据历史事实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第三，对毛泽东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传教育人民，用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来教育人民尤其是教育青少年一代；另一方面是学术目的，即弄清历史事实、过程和找出隐藏在历史过程、事实背后的深刻原因。对毛泽东生平研究深化的主要表现，正在于不断揭示产生“毛泽东现象”的深刻原因。

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努力采用各种方法、运用各门学科的原理，分析史实，得出独到的结论，就会促使毛泽东生平研究逐步深入下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是提出重大问题并予以科学地分析和回答的典范。比如，决议提出和回答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当然，历史决议不可能提出和分析回答毛泽东生平方面的所有重要问题。

近年来，毛泽东生平研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关系，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等。

第四，毛泽东生平研究呈现向多方位、多层次拓展的好势头。其一，在毛泽东传记方面，在出版了多种青少年毛泽东专著之后，又继续向后推进，又写出了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黎永泰等）、井冈山和江西时期的毛泽东（马王卿等）等断代传记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加紧编写《毛泽东年谱》（建国前）和《毛泽东传》（建国前）。其二，描述毛泽东个人生活及家世的书籍文章大量涌现。80年代后半期以来，研究叙述毛泽东感情生活、家庭生活、读书生活、文体活动、交往活动的书籍不断问世。较有影响的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读史》、《毛泽东和诗》、《毛泽东交往录》、《毛泽东家世》、《领袖泪》、《走近毛泽东》等等。其三，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工具书，如《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索引》等。

总之，多年来，国内毛泽东热再次兴起。这是十分理性的“热”，不再是“文革”中那种肤浅的、盲目的“红太阳”崇拜。即将到来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把毛泽东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综观50多年来毛泽东生平事业的研究状况，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尽管对毛泽东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从整体来看成绩还不理想，只能说尚处于学术研究的低级阶段。之所以这么看，第一，因为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版一部毛泽东全传，更不要说像国外那样已经有多少种毛泽东全传了。目前，毛泽东生平传记方面的著作，只研究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只有个别著作开始较为系统地叙述毛泽东30年代前半期的活动。国外虽然出版了不少毛泽东全传类的书籍，但受所掌握资料的限制，写出的只能算概述式的传记，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毛泽东全传。第二，关于毛泽东生平和个人生活各个侧面的史料，远远没有完备化。至少，目前连毛泽东言论全集都没有整理出版。甚至连建党和大革命时期较为完全的毛泽东著作集也还没有问世。这种史料匮乏的状况，不仅严重地限制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西方研究者反而能在毛泽东生平叙述探讨上取得更大的自由度，可以领先一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动乱，向国外披露了关于毛泽东的许多生平细节，流传出去不少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从而大大推动了当时西方毛泽东学的勃兴。在那个年代里，中国将毛泽东神化，西方学者反而通过所获得的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看到了一位非常实在、生动的毛泽东，或者说生活中、本来意义上的毛泽东形象。令人不解的是，西方早已熟知的毛泽东言论，在国内至今还在严格保着密。这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毛泽东学的发展。第三，全国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外，目前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毛泽东的机构。尽管已有不少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类的研究会、研究所（室），但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机构。第四，有关毛泽东生平研究的学术活动、国际交流，进行得很少。这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的地位、作用之不相称，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相信，现在积极筹备的毛泽东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内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的进展，将会在传记生活类著作和史料等方面，大大弥补以往的不足。但是，百周年诞辰纪念之后，毛泽东研究会会不会持续下去？这是人们自然会忧虑的问题。为了保持对毛泽东研究持续繁荣发展，就必须给予毛泽东研究以各方面条件的满足，使中国真正成为毛泽东研究的中心。

第二章 伟人一生概述

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立下了宏图大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并为之作了充分的准备。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平生最喜爱这一名言，并在青少年时期就为将来担当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任”而进行了艰苦的身体锻炼和品学修养。他还组织了新民学会，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战斗团体。在苦苦的思考求索中，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锐利理论武器，从此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立下的最辉煌的功绩之一，就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新中国。为了这一事业，毛泽东耗费了其生命的三分之一（约28年）。

毛泽东为新中国而奋斗的28年（1921—1949年），又分为界线鲜明的两个14年。从1921—1935年的第一个14年中，毛泽东逐步具备了革命领袖的各种经历和才干，尤其是探索出一条足以保证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大战略。但在这14年中，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没有确立，相反，他时常受到排挤和打击。从1935—1949年的第二个14年中，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他以纯熟的革命战略指挥艺术，领导党和人民不断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学生运动、驱逐军阀运动、新文化运动，担任过学生干部，主编过《湘江评论》。这些革命活动大大增长了他的领导才干。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在湖南建立和发展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创办自修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革命干部。建党初期，他集中精力领导和组织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中共三大以后，他努力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

部长等要职。从1925年开始，毛泽东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如何领导农民斗争的具体途径。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陈独秀等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压制，无法得以实施。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当即深刻地总结了失败教训，并在实践上迅速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革命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展开土地革命，使中国革命由失败重新转向胜利。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从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注重军事问题、不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党的领导机关脱离群众四个方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革命战略方针，尤其是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观点。在领导秋收起义的武装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又形成了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尤其山区的战略思想，把起义部队拉上井冈山，将革命军队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创立了第一个典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经过艰苦转战，又在赣南和闽西地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和创建红色政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待到敌强我弱变成我强敌弱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和正确战略并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所真正接受。相反，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的“左”倾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经验，对毛泽东的正确做法和理论横加指责。毛泽东由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曾受到排挤打击。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毛泽东被解除了军权，失去了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职务。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报告中，生动地提到了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和态度。他说：“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

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周恩来感叹道：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

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我们党和红军的惨重失败，深深教育了全党，人们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发生了分化。经过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努力，终于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尽管张闻天在会后几年里在中央负“总责”，但他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虚心接受，使毛泽东的主张畅行无阻。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指示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今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王明等不要再争领袖地位了。自此，毛泽东对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14年间，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战略家的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建树达到了高峰。他利用此时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搜阅马列著作及各种进步书刊，极大地增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多科知识素养。与此同时，他在窑洞里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系列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指导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务等方面工作的科学著作，发出了巨量的电报、指示，指导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延安时期达到了成熟，在党的七大上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展示了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策略领导艺术。为了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以其杰出的军事预见才能，写下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不朽的军事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南。抗战全面展开后，毛泽东全局在胸，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伟大的整风运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导党自身建设的艺术。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世人叹为观止。纵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程，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

伟大战略家的高明之所在：他将这两大战略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民族斗争中为阶级斗争作了最充分的准备，使老奸巨滑、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蒋介石，一步一步地输掉，最后逃到几个海岛上去。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邓小平1980年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曾经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303—304页）总之，领导党和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为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又领导了党和人民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斗争。

建国初，百废待兴，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为了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毛泽东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从建国时起，他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他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结盟缔约，赢得了老大哥的有力援助。他指导新区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发动和领导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当美帝将战火引到祖国大门口时，毛泽东以非凡的胆略和远大的眼光，说服众人，决策出兵援朝，并精心指导，打胜了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经过三年艰苦奋战，国民经济得到了基本恢复。毛泽东马上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为用和平方法进行三大改造运动制定了很好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使运动迅速而顺利地展开。虽然在三大改造运动后期，毛泽东显然有些急于求成，从而大大缩短了原来设想的时间（15年左右），长期留下了一些问题，但他将中国迅速推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开始领导党和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经济上文化上十分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党的八大前后，他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不朽著作。

但是，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远不像领导军事斗争、政治斗争那样得心应手。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越来越多了。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并由此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从1957年底开始，毛

泽东一度亲自指挥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酝酿和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大跃进”的错误继续下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动和领导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误。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这是他的主流，应当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和怀念。但他在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十一届六中全会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必须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结论。但是，鉴于还不时有人翻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定案，系统地研究探讨这个问题还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应该从毛泽东一生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将1957年以前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同他1957年以后导致犯下严重错误的各种因素相比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同党内错误倾向，尤其同历次“左”倾错误进行长期坚决斗争的典范，他竭力反对“左”倾急性病、幼稚病，特别推崇列宁的反“左”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然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却是以“左”为基本特征。他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变革上急于求纯，他想促使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却忽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没有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贯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我们应当认真思考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同时，我们更应当探讨毛泽东成功的原因和经验。比如，毛泽东从未上过任何军事学堂，但他却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军事家，其中奥秘何在？毛泽东1964年谈到他搞军事的经历时说：他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学会打仗，搞出了十六个字。毛泽东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实事求是”，“知彼知己”，善于吸取和集中群众和战友们的智慧。

毛泽东非凡的一生，他的巨大成功和晚年失误，都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要极端重视国情调查研究，把它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深深地懂得了这一点，并开始了深入考察中国国情的调研活动。当青年学生为留洋而努力时，毛泽东为别人出洋奔波，但他自己却宁愿暂时放弃留学机会，为的是先留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搞清本国国情。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弄清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掌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满足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但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大为减少，特别是没有进行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和文化状况的系统调研。八大前后，毛泽东曾作了很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但不久以后，尤其是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几乎完全放弃了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角度进行的国情调研，重新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对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当永远吸取。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三大改造时期，毛泽东都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可是，他在晚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论断教条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教条化倾向，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力推进改革和开放，开创了一条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三，要作眼光远大的战略家。真正的战略家，首先具有高度的预见能力，把目前所作的一切同未来联系起来，着眼于未来；其次，善于适时地进行战略重点转移，提出适当的新目标、新任务；善于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善于把战略目标分解成许许多多小的战役、战术目标，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最后使全局改观，完成战略任务。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无须讳言，晚年毛泽东恰恰始终没有完成从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但在70年代初，毛泽东抓住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及时完成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又充分显示了这位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第四，要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毛泽东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期里，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吸取群众中和战友们的智慧，为他正确进行决策奠定了基础。

而他晚年失误的根源之一，正是个人专断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听不得以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所代表的党内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反而以“反潮流”的姿态予以压制、批判，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后来曾经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62页）

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留给人们的启示远不止这些。目前国内外对他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还会将对这位千古伟人的研究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我们相信，后人一定会在研究中从毛泽东身上寻找、发掘到无穷无尽的宝贵遗产。

第二篇 毛泽东的生平业绩

第一章 成长时期

第一节 少年时代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首次讲述了他的家庭和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最真实的早期生平活动资料。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帐。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帐。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

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帐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

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恰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也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1400铜板，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50里之远。那时我16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以下凡有与斯诺谈话，均出此书，不再注）

对于这些早年生活的自述，大多数研究者从中分析了毛泽东性格中的一些突出特点，并通过这些特点的分析揭示了毛泽东走向革命道路的内在趋向。

陈晋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中自幼养成的，是因为压抑（由于父亲的严格管束）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譬如他同斯诺讲述自己如何同父亲做斗争，家里如何分成两党，自称“在野党”，“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的父亲。毛泽东还绘声绘色地向斯诺讲述了他 13 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和父亲当着客人的面争吵起来，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也回骂起来，接着离家出走，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父亲说：如果再逼他就要跳进水里。结果是，父亲只得答应他再也不打他了，他也跪一只脚向父亲磕了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的打骂我。……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这样的斗争，给了少年毛泽东以极大的人生启示和深深的自信。这是一种正在走上水的家庭环境最容易熏陶出来的性格特征。他需要和渴望的不是维持和安宁，而是进击和挑战。

16 岁终于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无疑有一种摆脱了空间和心理上的局限的轻松和亢奋，有一种“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追求和信心。青年毛泽东写的家信很少，在假期中他更乐于同朋友去“游学”，去探索新的人生，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更吸引他的是故乡、家庭以外的世界。他是在母亲病故以后才闻耗从长沙回家奔丧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母亲有一种深深的挚爱。

《青年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写道：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是反

抗包办婚姻。他14岁的时候，毛顺生按照封建陋习，为他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1910年2月11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二）。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事，应自己作主，所以坚决拒绝，始终不承认这项“婚姻”，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也从来未与她一起生活过。对此，父亲也莫可奈何。

在毛泽东家里，这一类的斗争不断地发生着。他尤其不满父亲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的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七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举动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及于社会。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与故乡》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早年的故事作了新发掘。书中写道：韶山，是压抑的，这对于向往新生活，渴望获得发展的毛泽东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种向往和渴望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反抗期”。也正是在这种反抗中，塑造了他倔强的性格。至今，韶山还流传着少年毛泽东“巧释‘四姓’”的故事。说的是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去外婆家棠佳阁，行到石砚冲山边，突然有一个人两手叉腰拦住去路。这个人地富家子弟赵某，他经常在穷人面前卖弄文墨，毛泽东早有所闻。

赵某说：“我知道你是文家外甥。今天我要考考你，若能答出题，我让你过去，若答不出你得大方框关小方框。”毛泽东不慌不忙，也来个双手叉腰：“你爱问就问吧！”赵某说：“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听后满脸怒气，但无从发泄，只好让他过去。这是毛泽东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初期反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毛泽东对社会的反抗是从“细胞”上开始的，他那种比面容还坚韧倔强的性格是同守旧、苛刻、自私的父亲斗争中日益发展起来的。

1909年，湖南闹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涌入长沙觅食。而豪绅们囤积居奇，使米价飞涨，由原来的每升26文钱涨到76文。长沙有个靠卖水为生的工人名叫黄贵孙，好不容易积了76文钱，叫妻子去粮店买米，但等他妻子到粮店时，米价已涨到78文一升。他妻子回来向邻居借了两文，再到粮店时，米价又涨到80文一升。这个妇女买不到米，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便含愤跳进了湘江。黄贵孙闻讯后，觉得自己已是走投无路，就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也一齐投江而死。

此事发生后，饥民们推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而巡抚岑春萱却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反而十分傲慢地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吃？我的粮食多得很。你们看，我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并下令枪杀请愿群众。饥民们忍无可忍，便举行了大暴动，将巡抚衙门也捣毁了。可最终暴动者的头颅被清政府挂在旗杆上“悬着示众”。

毛泽东从长沙逃来韶山的难民中，知道了长沙饥民暴动的情形，心里非常激动。觉得不反抗便没有劳苦大众的生路了，他日后回忆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韶山的压抑，使毛泽东的心底深处，一颗反抗的种子开始萌发了；韶山的压抑，也使毛泽东那倔强的性格被磨炼得更加成熟。

第二节 初进长沙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去，老师同意了，于是我就步行到长沙去，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治事态正在急剧变化，我在那里仅仅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

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以对清廷的强烈谴责来表示对演讲人的拥护，并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当那个鼓吹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向激动的学生演说时，会场里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活跃。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正在涌上街头。

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

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三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

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六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当时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企图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耽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初进长沙的两年，毛泽东经历了湘乡驻省（长沙）中学学习、参军、再度

求学和自学的过程，度过了一段动荡、彷徨和求索的生活。

在中学时期，毛泽东的政论写作水平展露锋芒，受到学校教员、校长的高度赞赏与推崇。早在进东山小学的考试时，入学考试作《言志》一文，即深得校长和监考的国文教员的好评，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入学后，他又写了几篇论说文，大都被老师浓圈密点，赞扬这些文章“以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批给同学们“传观”。进入长沙第一中学后，据当时的同学甘融回忆，毛泽东的作文经常批评时政，针砭习俗，侃侃而谈，洋溢着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国文老师柳潜（字钧湄，湘阴人，前清秀才）“极赏识他，誉为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可惜现在遗留下的作文只有1912年的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现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一篇。全文如下：“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尽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尽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噉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这篇600字的文章受到国文教师柳潜的高度评价，给了该文100分，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通篇除多处串圈外，还作了七条眉批和文末总评。批语说：“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离开新军后在第一中学呆了半年就退学了。1912年7月，他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毛泽东对斯诺说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湖南图书馆位于离住处约3华里路远的定王台，故亦称定王台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为全省之冠。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卡片和报刊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不知从何读起。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下定决心，首先了解馆藏概况，然后确定重点阅读的自修计划。他为了执行计划，尽可能多地看书，就充分利用该馆开馆时间，每天馆门一开，他总是第一个进去，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而且还总是依依不舍。中午则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充饥，这也是他一天唯一的休息时间。无论是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他持之以恒，从未间断。

他在这里读了许多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名约》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大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文化是对立的。例如《天演论》阐发“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规律，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对立。虽然作者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译者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呼吁“自强保种”，改革现状，却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年轻的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和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受到了空前的新启示。他后来对老同学说，他每阅读一本书，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叫一样”。此时，他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有康梁君主立宪思想影响逐渐消失。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并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从此，他才知道世界很大，中国还小得很。世界既大，人口就多，问题也就多。人生

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些，但是，“照我自己的经验看，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看的，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不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改革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因此他深感自己和青年人责任重大，前途广阔！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也指出，毛泽东半年的图书馆自学生涯对他有很大影响。他说：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阐发“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与中国人传统的“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所以当时被称为一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这些西洋资产阶级思想家重要著作的传播，正反映了“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主要斗争——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士大夫中间的和资产阶级的革新运动者，都做了许多启蒙的工作，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就是所谓“新学”运动。这种“新学”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意义，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第三节 湖南第一师范

1913年春，毛泽东因父亲反对他自修，断绝了经济供给，不得已停止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涯，与其他两位好友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随着四师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合并，毛泽东来到一师续读，于是开始了他在第一师范求学的精进岁月。

毛泽东在对斯诺的回忆中这样说：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作伴，我们走过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

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

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年）；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暉（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音），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1913年进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介绍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生平活动的研究成果。

一、主要活动

王健宇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主要经历与活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旧中国社会的种种黑暗，曾经想到：中国与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有志的青年，应该担当起这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责任。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立志为此而奋斗不懈。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过，他的政治观念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最初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由此看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以说是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地方。

1. 毛泽东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

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立了基础。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怀有改革社会与国家的伟大抱负。具有炽烈而顽强好学的精神,是毛泽东最突出的特点。上课时,他总是端坐静听,聚精会神地钻研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为了寻求和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毛泽东夜晚常在茶炉房或走廊里看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学习;假日,他常外出访师觅友,问道求学或作社会调查。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起他自己的学问基础。

2.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在学习时的又一特点。毛泽东不论是听课、读报或自学都认真做笔记。仅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他写下的各种读书笔记、日记等就有一大网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仅存的一本1914年的课堂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47页(94面),计一万余言。毛泽东在这本笔记中,前面11页抄写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全文;后面36页冠名《讲堂录》,内容对于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有涉及。此外,还记录了一些对中外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的评论;对一些自然科学常识和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也都分条书写,间或杂以议论。足见毛泽东用功之勤,读书之博;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探索真理的严肃态度和日后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其中写有:“实则不说大语,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是注重实事求是、反对华而不实,注重躬行实践,主张进行广泛地学习,反对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

3. 要自学,靠自己学。这是毛泽东很早就提倡并付诸实践的学习方法。毛泽东进入一师时,就有目的地按自己制定的读书计划学习。对于自学计划,他逐年加以修订,限定每个阶段的主要读物,必须按时完成,绝不因为学校的课程繁杂、考试频繁而变更计划,推迟进度。因此,他在学校每天很早起床,洗漱、浴身后,就来到自修室读书。

4. 第一师范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各种新出版的书籍大都购置,并且订有当时流行的杂志一二十种。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刻苦研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中外书刊。他在读书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非常严,从不以已有的知识为满足。他潜心研究各家学术和各种政治思潮,目的是想寻找一条解决中国问题和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

5. 注重独立思考,坚持用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这是毛泽东在学习又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很重视课外阅读,做到了纵览古今,网

罗各家，有批判地兼收并蓄。他善于独立思考，批判分析。他常对同学们说：古人的话，教师的话和一切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对的，我们才能接受；不对的，我们应该扬弃；囫圇吞枣的办法最要不得。因此凡是读过的书，接触过的思想观点，都能经过消化而有切实的收获。这种正确的学习方法，帮助他继承了历史上属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积累了渊博的知识。约翰·斯·密勒的《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曾经批判地研读过的一部西方资产阶级二元论的哲学著作，全书约10万字。毛泽东在阅读中写了12 100多字的批语。

6. 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国内外大事。他在一师读书时，读报非常仔细，经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到阅报室去读报。报上凡是他不熟悉、不了解的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他都要对照地图、字典及其他书籍，尽一切可能了解清楚，并且记在本上，以便随时翻看。因此，他对于国内外形势，既熟悉又能分析。同学们遇有时事方面的问题，常常请教他，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因此，大家称赞他是“时事通”。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1911年到1927年上井冈山时为止，他对于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种报纸，从未中断阅读。

7.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磨砺意志，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他在同学们中常常讲体格锻炼的重要性，引导大家培养爱体育运动的习惯。关于锻炼的方法，他很强调三点：第一，有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不要间断。第二，要有霸蛮精神，以培养意志和勇敢。正如他当时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所说：“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力。”第三，运动方法宜少，宜简单易行，时间不必过久。运动时要全力贯注，要身到、心到。毛泽东对体育不单单是宣传者，而且是热烈的执行者。

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全面地阐述了体育运动的目的、作用和方法，以及德、智、体三者的辩证关系，提倡“三育并重”，“文而兼武”。文章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欲除民族之积弱”的革命志向。

8. “身无半文，惺忧天下。”这是第一师范进步同学对毛泽东的赞誉。毛泽东生活的俭朴，在全校是出名的。那时师范学生的膳宿费，都由学校供给。毛泽东在长沙读书的几年中，总共才花了160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还买了许多书籍和杂志。他的衣服穿得褪了色，破了洞，经过缝缝补补，还舍不得换掉。他盖的土布套被，棉絮又旧又硬。当时有的同学喜

欢谈论生活琐事，毛泽东总是引导他们讨论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少考虑个人事情；还提倡“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在校学习期间不谈男女恋爱问题，以便把全部精力用到努力学习、探求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道路中去。

9. 毛泽东在青年学生时期就具有很高的领导组织才能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自1915年起到1918年毕业止，毛泽东每学期都担任学校学友会的重要工作。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他担任了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持学友会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必须具有高远的理想、精深的学问和强健的体魄这样的全才，方能强毅有为，任重致远，方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革一切旧的制度。因此，他在同学们中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和体格锻炼。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学校学友会比以前更活跃，更有生气，办的事情也更多；不仅举办成绩展览会，自由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学术研究以及聘请名人讲演等，还购置、分发各种进步杂志，开办工人夜学，举办全校运动会，组织游泳活动。此外，还组织过学生常备队，夜晚巡逻学校内外各处。1917年11月，毛泽东以非凡的胆识和善于应变的才能，率学生自愿军和一些群众，在学校附近猴子石一带，智缴了一部分军阀溃兵的枪枝，保护了学校以及长沙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称道。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毛泽东在一师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当时第一师范当局设立了一种检查学生学业和操行的办法，叫做“人物互选”。选举的内容包括三项：德育（敦品、自治、克己、服务），智育（才具、言语、文学、科学、美学），体育（胆识、卫生、体操、竞技）。据一师校志记载，1917年6月全校11个班，400多学生参加了“人物互选”。结果，有34人当选，其中票数最多，德智体三项都名列前茅的是毛泽东。特别在言语与胆识二细项方面，唯独毛泽东一人当选。

10. 主办工人夜学。当时长沙南门外第一师范的附近，有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和铁路工人聚居的地方。为了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毛泽东于1917年11月，以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教育研究部的名义，在校内主办了一所工人夜学。从保存下来的《夜学日志》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很体贴工人的具体困难，很注意改进教学的研究。例如，11月12日的《夜学日志》中记有：“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雨具自置椅下看管。”“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两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11月14日记有：“其（常识）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11月16日记有：由于物理课教员讲的太多，有些工人听不懂，课后“毛泽东报告，谓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此亦足以引起其追求的兴味，其法大可采也。”毛泽东利用课余时间，亲自在夜学给工人讲授历史课，讲述“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启发工人的思想觉悟。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说“毛先生”是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毛泽东非常关心工人的学习，注意及时总结教学经验，亲自认真填写《夜学日志》。在《夜学日志》首卷中，毛泽东提出：教员要根据工人的实际情况，采用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和少而精的方法进行教学。

11. 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一师时就非常重视向社会学习，到实践中去学习。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跋山涉水，步行1000余里路程，深入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返回学校后，写给友人黎锦熙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农村调查的收获，热情地肯定了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深刻地探讨了当今之世为什么天下纷纷和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改造等问题。同时认为，必须用革命的真理去宣传、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青年学生时期所从事的社会调查，使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而增强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坚定信仰和决心。

12. 推动湖南反帝斗争。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有一本小册子《明耻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毛泽东读了《明耻篇》以后，义愤填膺，挥笔在封面上写下：“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8年4月，毛泽东以第一师范进步同学为基础，创建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毛泽东领导下，新民学会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为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

二、恩师杨昌济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书中详细介绍了湖南一师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突出介绍了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分析了杨昌济在这一时期给予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他说：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任务在培养小学教师。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志在投考大学的都不进这种学校，而进公

立的或私立的普通中学。只有家境贫穷或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才争取进这个学校的机会。这样的青年是很多的。所以要能考进第一师范，还必须具备成绩优良的条件。可是当时国家的局面是动荡不定的，一切都没有计划，师范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并没有保证。这使得学生们在毕业前就必须为自己的前途打算。有些人为了将来的职业而结合起来；也有些人为共同的志向而结合起来，活动是很多的。

在“五四”前后，第一师范确算一个办得认真的学校，这与当时教育界的一点朝气有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曾经颁布过一些较有革新意义的教育规程。因此第一师范的“校章”中关于教育方针一项，“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道德实践。二是身体活动。三是社会生活（包括智识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暂定国文为各科联合中心”。但是，这个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面，却又规定了许多繁琐的封建的规矩，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35条“不得”。如“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些“不得”就直接违背着前面所述的“教育宗旨”；这是由于那时的公立学校，总还是控制在守旧派手里的缘故。但不论怎样，这个学校当时确有许多优点，除图书丰富，校舍宽大等外，特别是有思想开明的好教员；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也受欢迎。因此，毛泽东还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立了基础。一师是一个好学校。”

在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巨大的；凡属切实认真服务于自己事业的教师，他本身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往往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与毛泽东入学的同一年，杨昌济先生来第一师范教书，担任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人，当时在思想、治学、生活和为人处世各方面，受杨先生的影响很大。关于第一师范的教员及其影响，毛泽东曾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

杨昌济先生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欢读程、朱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共9年。他与当时一般争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闿想罗致他做官，当教育司长，他没有应允。那时镀金（留学西洋）、镀银（留学东洋）归来的留学生，一般不是钻营做官，竞选议员，便是当买办，办实业，最“倒霉”的也要担任个大学教授。然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冷清清的位置，作一个师范教员。很显然，这是由于不满现实、有所抱负，他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他在第一师范教书6年，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于1920年去世。

杨昌济先生对于中国的旧文化很有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又吸取了王船山、谭嗣同、康德一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风气，加以抉择、批判、融会，因此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哲学思想上，他虽然是一位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者，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的伦理学见解中的唯心主义成份也很重，但是他的某些观点和主张，特别是他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于当时受教的青年确会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他教诲青年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革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以及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

在那样一个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和文化所控制着的社会中，有这样一位思想进步、学问精深和人格高尚的老师，当然是学生们的无量幸福。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自然而然地都团结在杨昌济先生的周围。大家对于他心悦诚服，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下课后，毛泽东等更常到“板仓杨寓”去聆教，或听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谈论天下大事。杨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

关于他们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张昆弟烈士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曾有一些记载：

“8月22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月8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随着张昆弟同志检讨自己今后应以‘淡泊明志为第一着手处’。）”

“9月13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相爱的情形下，杨昌济先生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虔诚地在许多方面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

李锐在书中列举杨昌济对毛泽东等的影响：其一，思想、立志和抱负。杨先生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其二，提倡“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其三，讲究实践，做事有毅力、有深谋远虑，生活要严谨与刻苦。杨先生确是一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能够“以身作则”、“以身教”的良师。

三、立志

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可以说，学师范的五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相当的提高；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他还认为“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必须刻苦攻读。为此，他与朋友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论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说：“西方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而“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并认为，如果做到了“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1917年9月16日、22日张昆弟日记）

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要作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奇杰”何在？“奇杰”就在那些满怀救国抱负，而又潜心学习的

“有志之士”中。但“奇杰”也终非圣贤，单凭个人的奋斗，并“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为此，毛泽东毅然“亲师而外，取友为急”（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以便作共同、长期之努力。

1915年9月27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要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固然重要，但创造一个良好的求学环境，也至关重要。他对一师的学习环境是不满意的。1915年11月9日他在给黎锦熙（当时在北京师大任教）的信中就流露了这种不满情绪：“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

1917年8月23日又给黎锦熙写信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以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他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并从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得出了救国必须有本领的结论。本领从何而来？只有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救国从何下手？学习主要学什么？他说：“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种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种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者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这就是说，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人心，要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那么“本源”是什么呢？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

乎？”

人们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救国和学习、掌握真理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高度地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为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而斗争。所以，什么是志，何谓真正“立志”？他认为“志者，吾有见乎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佳，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因此，他学习方向更为明确，学习意志更为坚定，决心“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誓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精神，持续勤学苦练。

毛泽东求知欲极盛，他在一师读书，并不拘泥于几本教科书，而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他经济拮据，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买折价书。旧书残缺就将其抄写修裱。但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和同学借阅，借抄。有关他的借书还书便条、信函，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些。1916年2月29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又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萧曾提出拟将祖遗经史惠赠于他，毛泽东却认为“大不敢当”，此书购之“非二百金莫办”，还是继续借读为好。我们再看毛泽东抄书的事实吧。罗学瓚1917年9月26日日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7本，自旧历6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我们从这点滴的原始记载，亦可窥见一斑，并可想象当年毛泽东学习之刻苦与艰难。

四、社会实践

《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史略》一书的作者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注重参与社会实践、接触工农普通群众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

1915年秋，毛泽东在比较全面地检讨和总结过去两年多的学习和探索生活的基础上，提出：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我们在前一章里谈到，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的头两年，埋头研读中国古

籍。这时，他提出要在研究学问和人生观的同时，“辅之政事时务”。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实行这种转变的呢？从当时的情况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 亡国危险的刺激。1913年，北洋军阀打败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对外实行卖国投降的政策。袁世凯政府屈服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同帝俄成立中俄声明文件五款，后来又签订《外蒙古自治协定》，承认外蒙古自治权，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一切权利；同英国签订了《西姆拉条约》，损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日本占领了胶州湾和山东其他一些地方，袁世凯政府不提任何异议；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使国家处于灭亡的危险境地；同时，国内连续发生了洪宪帝制、宣统复辟以及南北战争长期不停的混乱局面，使广大人民陷于饥饿死亡的惨境。湖南人民更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痛苦。南北军阀在那里反复进行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横遭劫难。毛泽东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对国内的这种情况曾作过深刻的揭露：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湖南人民的自决》，载1920年6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所以追求进步的中国人，都在焦急地思虑着国家的前途。早就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的青年毛泽东，更是无日或安，深感青年人必须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

2. 《新青年》的鼓舞。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同封建主义展开了勇猛的斗争。《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君主，反对特权。《新青年》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推动和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它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新青年》出版后，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很快就成了它最热心的读者。据周世钊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新青年》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这种思想完全为毛泽东所接受。几年来，他一直在苦苦探索着救国的道路，但是，不论从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著作中，还是从中国古籍中，当然看不到这

样明确的关于救国的道理，即使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像《新青年》这样明确彻底。因此他对《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制度，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完全赞成并且决心按照《新青年》提出的方向，去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奋斗，为救国救民作一番事业。

3. 从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受到了教育和启示。经过几年的研究与思考，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康有为、孙中山等上层人物是救不了中国的，必须到社会下层去寻找救国的真理和力量。当时，他已认定袁世凯把国家弄到灭亡的边缘，是不足论的；康有为在学理方面，“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在政治方面，虽曾有过一些很好的想法，但现已过时，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孙中山，虽然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但他领导的革命，从历史事实和国内外形势来看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他认为，要把国家从艰难中挽救出来，就需要研究宇宙的“大本大源”，就要到社会下层中寻找救国的“奇杰”。1915年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他肯定地指出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表示要特别“留意”去寻找。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从1917年开始，毛泽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到学校附近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访问工人、农民，了解社会上政治经济情况。同时，他还十分看重游历的作用。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探禹穴，周览名山大川，而襟怀开阔，见闻增广，他很想仿行司马迁的做法，对中国做详细的考察，了解中国社会，为将来改造社会打好基础。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两个学生旅游全国的事迹，更激发了他游历的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正在小学任教的肖瑜（子升）从长沙动身，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他们访问了许多偏僻的农村，也考察了一些热闹的市镇。这不久，毛泽东又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作了调查。第二年春，毛泽东又和好友蔡和森一道，用半个月时间游历了洞庭湖滨几个县。在游历中，他每到一处，都深入到农民家里，与他们一道干活，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困难、疾苦和要求，了解土豪劣绅欺压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真相，获得了不少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

同时，他还广泛接触店员、和尚、衙门当差等社会各方面人士，与他们攀谈，了解社会事态、地理民情、风俗习惯等。通过这些调查，他接触到更多的社会实际，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工农群众的苦难生活，学得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

毛泽东这个时期开始接触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为了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解除他们“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的“苦楚”，1917年11月，毛泽东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时，热情创办了一所“工人夜学”，吸收学校附近的穷苦工人入学。毛泽东亲自主持夜学的教学业务，注意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同时利用课前课后和假日，找工人谈心，进行家访，了解工人生活和工作情况。他还担任一个班的历史课，“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使上夜学的工人们“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工人们尊敬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贴心人；他则由此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在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毛泽东经过这两年多的学习和探索，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打下了学问的初步基础，取得了思想上的巨大进步。这时的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觉悟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都超越了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水平，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第四节 新民学会时期的活动

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一个创举。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的活动都与这一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组织内部的事务，如赴法勤工俭学、会员通信联络、政治讨论等等；或者是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的活动，如创办文化书社、《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等等。毛泽东对斯诺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活动：“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

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三K’党（!!!——斯诺）的康白情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

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身无分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哎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我曾沿着洞庭湖作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的报纸《湘江评论》

的主编,该报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关于新民学会的介绍与研究不仅散见于各种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研究的著作论文,而且出版了宋斐夫的专著《新民学会》和《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等等。这里我们以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参与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介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新民学会的成立

毛泽东还在进入第一师范初期,就在同学中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昌、陈绍休等人。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寒,有的自己从事过劳动,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的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情景,他们都是耳闻目见的。他们经常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等等问题。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感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少了,活动的范围太窄。认为若要求得更多的学问,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必须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结成一个团体,才会有力量。

1915年的秋天,毛泽东写了一个《征友启事》,分寄长沙各学校,邀请耐艰苦、有决心、随时准备为祖国献身的青年做朋友。启事署名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邮寄启事的信封上还写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当年看到了启事,并与毛泽东交上了朋友的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回忆道:

1915年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很象润之后来写诗词的字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嚶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从内容看出,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看完启事,我觉得在当年,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

《征友启事》还寄到了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姓马的老校长以为是找女

学生谈恋爱的，亲自跑去一师附小找陈章甫，又找了一师校长。直至知道“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后，才放下心来。

启事发出一些日子后，陆续收到一些表示愿意联系的来信。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和快慰，虽然来信的人数并不多。他在给旅居北京的原第一师范教员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

慢慢地，在毛泽东周围，聚集着二十来个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是长沙中等学校主要是第一师范肄业的学生，也有少数是毕业不久正在当小学教员的老同学。

这些青年人经常聚会，畅所欲言地讨论一些问题。毛泽东于1920年冬编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追述：“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为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这种讨论，开始于1915年。到了1917年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提出了组织学会的问题。一经提出，便得到一致赞同。

《易经》上有句话：“作始也简”。当时，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大家的意思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再一个原因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起来，时代在前进，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在这班青年的眼中，几乎是一扫而空，顿时感到再过静的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和团体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大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杨先生经常教育他们要做一个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有益于社会的人。他们崇敬杨先生那种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再加上其他条件，便产生了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湘水碧波荡漾，江岸绿草如茵，微风轻拂，春意盎然。十几个兴致勃勃的青年，先后来到了岳麓山下刘家台子的“洙痴寄庐”。房东姓周，宁乡人。宁乡有一条大河，叫洙水，所以主人将这房子取名为“洙痴寄庐”。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蔡和森，同另一个姓周的教员，租赁了这所房子。

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肖子昇、肖子暉、陈绍休、邹彝鼎、张昆弟、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楨、罗章龙等13人。其中除罗章龙外，其余都是第一师范毕业或肄业的学生。

大会从上午11时开始，首先讨论了由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会章条文颇详，经过讨论，颇加删削，并于通过。会章将学会定名为“新民学会”。据肖子暉回忆，这是“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和“不狎妓”五条纪律，同时还规定“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会员如有不正行为和故意违犯会章的，经多数会员决议，令其出会。而入会者须经会员5人介绍及过半数会员承认，始得为会员。会议还选举了肖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大家在蔡和森家聚餐。下午，就会员出省出国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至5时始闭会。

学会成立后，随即有9位青年加入。他们是罗学瓚、周世钊、李维汉、邹半耕、熊瑾玎、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这样，基本会员增至20余人。新民学会的总部一直设在长沙。总干事肖子昇在学会成立后仅几个月即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第二年一月又提前赴法，学会的会务即由毛泽东主持。

从新民学会的成立经过和它的章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和“求友互助”的团体。这些青年热切地想进步、革新。但如何进行并不明确，尚在摸索之中。不过，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新民学会是一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的知识青年组成的，它朝气蓬勃，办事认真，组织也比较严密，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团体。

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杨钊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文中对毛泽东在这一活动中的主要贡献作了详细介绍。文章说：1918年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这时，杨怀中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以及北京许多新的情况，希望他去北京。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一方面，当时我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军阀的统治，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处在这种形势下的先进青年，都要求向省

外国发展，寻找革命真理。“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先进青年所向往的事；另一方面，由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劳工神圣之说也正在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广为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认为，如果让一些先进青年到法国去半工半读，不但可以使他们有远适异国，学习新思想、新技术的机会，而且还可以通过体力劳动的锻炼，经常和工人生活在一起，了解工人，并和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劳苦大众的问题，担当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艰巨任务。这是青年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学习十月革命经验的极好机会，也是培养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的好途径。于是，毛泽东于6月间，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在会上，毛泽东说明了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意义，和“会友向外发展”的计划。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几天之内，决定参加的就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罗学瓚、张昆弟等30多人。

为了使赴法勤工俭学能见诸实行，必须有人承担这个运动的领导。蔡和森等认为，只有大家敬佩而信服的毛泽东最为适宜，所以他接连给毛泽东写信，强调指出：“驻京惟有润兄最宜”，“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并转告杨怀中先生的意见：“至现在情形，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极力敦促毛泽东从速去北京。

毛泽东于1918年8月间亲赴北京。毛泽东在北京一面筹划湖南先进青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面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从事工人运动，同时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到达时，湖南青年抵达北京准备赴法的已有四五十人，比别的任何一省都要多些。由于当时华法教育会出国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还不能马上就赴法，一部分人的情绪不安，有的甚至口出怨言。毛泽东一方面劝他们耐心等待，反复说明赴法勤工俭学是好事，但不是没有困难的事，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不可在没有准备以前就盲目行动；另一方面，他和蔡和森倾注全部精力，四处奔走，夜以继日，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大家办理有关事务，帮助筹备旅费，充分做好出国的一切准备。当时华法教育会要湖南提出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大家一致请毛泽东执笔，写出了一个大体内容

容是说明勤工俭学的意义,继续号召大家参加,以及怎样在国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如初步学会法语等),以减少到国外后的困难,此外还提出如何先派人到法国去预作布置。经过斗争,华法教育会同意了 this 计划,决定先派人出国。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又提议在北京就开始勤工俭学,免得坐吃山空,虚掷光阴。后来就成立了留法预备班,并分别在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开办。湖南 60 多个人,大部分(其中有蔡和森、李富春等)分到保定,一部分分到北京和长辛店。北京预备班成立后,四川、广东、山西等地,也陆续地搞起来了。

1919 年初,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送走了一批去法国的青年,但自己却不出国。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情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动乱之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毛泽东曾经说: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种运动的组织,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益地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

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毛泽东为组织和领导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南北奔走,在革命同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罗学瓚 1918 年 11 月 18 日在北京写给其叔祖父的信说:“毛润芝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同学所佩服。”向警予同志 1920 年 4 月 29 日从法国写给侄儿的信也热情称赞:“毛泽东,……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我望你常在他跟前请教!”

三、北大图书馆

毛泽东第一次晋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务,因经济所迫曾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几个月的助理员,这段经历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李锐在所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说:虽然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用只需要五六块钱,但是毛泽东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于是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他钦佩的人之一,李大钊。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毛泽东被派在图书馆作助理员。看来,这是一种暂时安插性的职务,每个月有八块钱的工资;这就能够勉强维持日用生活了。他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房间(沙滩北京大学旧址红楼一楼的东南角,现辟为纪念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形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工作。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就常常在这间房里围着那张会议桌开会。”这

时湖南青年参加勤工俭学的已达一百多人，都很能吃苦，很用功，思想前进，朝气蓬勃，在北京有很好的声誉。李大钊很看重这个“助理员”，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领袖。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是各种社会思潮会聚之所，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校长蔡元培倡导学术思想自由，以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著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中右三派，不论教授和学生，在校内都有讲坛，都办刊物，各种活动是很多的。学生中学术团体特别发达，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研究会、体育会、数理研究会、图书报社和《新潮》杂志社等，不下十六、七种。毛泽东除经常旁听他所喜爱的课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种创举，每周举行两次研究会，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担任讲师。邵飘萍，号振青，浙江金华人，当时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以他犀利的笔，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4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加以杀害。新闻研究会由邵飘萍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经验，还有人讲新闻理论。毛泽东多年以来就同报纸结了解之缘，阅读报纸如同吃饭一样不能有所间缺，因为这是掌握国内外时局动态、了解社会各方面情况和吸收新事物的最及时的工具。杨昌济原来就打算介绍他参加北京一个报馆的工作。因此，他以很大的热心和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1919年2月20日的《北大日刊》，载有“新闻学研究会之改组启事”，“是日到会者”的名单中，有毛泽东的名字。他同邵飘萍很接近，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等方面，得到邵很多的帮助。毫无疑问，参加新闻学研究会活动这一段经历，同毛泽东以后办《湘江评论》、平民通信社等，以及在革命运动中利用舆论工具，一贯重视报纸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莫志斌在《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史实考》一文中对毛泽东如何进北大当助理员的历史作了详细考证。文章说：

长期以来，介绍和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与活动的著作、教材中，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新湘评论》编辑部编辑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还有张佶、杨柯、钟舟合写的《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史略》，马玉卿、张万禄合写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等书中，都谈到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由于要寻找一个暂时能维持生活的职业，经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

钊。于是，“毛泽东被李大钊分派在图书馆作助理员。”看起来，毛泽东是李大钊直接分派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近查史书，觉上述一事有考正之必要。

毛泽东是否由李大钊直接派到图书馆当助理员？史实是：李大钊在杨昌济将毛泽东引荐相识后，为了帮助毛泽东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他答应帮毛泽东找工作。当时，他并没有应允可以在北大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一职位。李大钊是在得到北大校长批条后，才决定聘用毛泽东的。

现在的问题是：李大钊请示的这位北大校长究竟是谁？目前，有二说：一说是蒋梦麟。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谈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17元。’”（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59页）二说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史》一书中有这段记载：“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时，他和蔡和森等又给蔡元培校长写了封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积极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此二说孰对孰错？

要弄清上述问题，首先应弄清楚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准确时间；其次，要弄清楚毛泽东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究竟谁任北大校长。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约在九、十月间，到李大钊当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工作。至今能见到的著作，教材都持此说。

那么，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时，谁是北大校长呢？

1916年9月，北京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蔡元培，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同月底，蔡元培同吴玉章一起回国。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到校视事。至五四运动发生，蔡一直任北大校长。显然，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正值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但蒋梦麟为何说是他代理校长期间，批条子让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当书记呢？事实是：五四运动发生后，由于蔡元培保护爱国学生，受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蔡元培只得于5月8日晚送出辞职呈文，8日晨五点半即悄悄离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后来因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师生的联合斗争，才迫使军阀政府同意蔡继续任北大校长。

9月10日，蔡元培为顾全大局，离杭北上，12日抵京，20日正式到北大视事。在蔡元培离京去杭的四个月中，北大校长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这从以下几则史实中可证实：

其一，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写道：9月20日，我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蔡元培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29—30页）

其二，高平叔在《蔡子民先生传略（下）》中写道：“先生离京数日，学潮方始平息。政府及告北大教职员学生挽留函电叠至，彼时，先生在杭州，与北来友人等商定程序。先请蒋梦麟氏北上，继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9月，返校。”

其三，1919年7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蔡元培启事》，称胃病未痊，暂由蒋梦麟代办校务。

其四，1919年8月9日，蔡元培复马叙伦函，马来信催蔡速即北上。复函谓：“弟既不能与北大脱离关系，本宜如来示所揭，早日北行。惟胃病未痊，尚不堪舟车之劳；而代理蒋君到校以后，内之教职员与学生均表欢迎，外之教育部以正式公牒承认，正可以盘根错节，试其利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1980年）

从以上史实中可以看出，在蔡元培离京去杭的几月中，蒋梦麟的确代理过北大校长。但毛泽东并不是在他代理校长期间到北大图书馆的。而前面所引蒋梦麟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他和李大钊的一段对话，其中有能否让毛“仍旧办合作社”等语，是何意呢？其实，蒋回忆的事实是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时发生的。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至1920年4月11日离京赴沪。其间，毛泽东一面加紧组织湖南代表和学生进行驱张斗争的活动；一面抽出时间密切关心和注视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组织的3个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情况。他还抽空，亲自去北京大学参观和考察工读互助团的活动。然而，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北大工读互助团根本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很快失败了。这就是李大钊与蒋梦麟对话中所谈到的办合作社不行，“都破产了”的意思。

由上可见，蒋梦麟的回忆有误。毛泽东不是在他当代理校长时进北大图书馆的。确切的说法是：毛泽东1918年9、10月间进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是因为李大钊的引荐，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批条许可后才入馆的。那种认为李大

钊直接分派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四、文化书社

长沙市毛泽东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文化书社》一文，介绍了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经过以及文化书社的经营情况。文章首先介绍了文化书社创办的背景，指出主要因为五四运动的席卷和湖南军阀装模作样打出了“民主自由”的旗号，同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也给予鼓励，所以毛泽东及其同伴们决定创办文化书社以尽快地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文化书社于1920年7月31日在长沙的报纸上刊出了一篇《文化书社缘起》。“缘起”说：宣传新文化是我们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文化书社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画出力所能及的一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缘起”又说：湖南“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办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缘起”刊出后，受到社会上进步人士和要求进步的青年们的欢迎，他们渴望文化书社早日成立。

《文化书社缘起》刊出的第三天——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和书社其他十多个发起人，在长沙楚怡学校开书社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书社的《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营业方法，确定了书社的宗旨为“使各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会上推选了毛泽东、彭璜等三人为筹备员，负责筹备文化书社的工作，起草书社议事会（由投资人组成）细则和书社营业细则。

缺乏资金是创办文化书社的另一困难。为了解决资金和社址问题，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与何叔衡，节衣缩食，带头给文化书社捐献资金。他动员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商请长沙教育界一些熟人，支持赞助。这样，很快就有30人参加投资，共筹资金500多元。毛泽东同李大钊、恽代英等以及一些知名人士联系，请他们作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向外埠订购图书时免去押金。经过毛泽东往返联系，文化书社于8月20日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校三间房子为社址（后来由于业务发达，曾搬到长沙贡院西街；两三年后，又搬到水风井）。文化书社在与外埠商定的书报杂志陆续运到以后，于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

文化书社开办以后，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负责制定书社的发展计划，并与全国有关方面交涉订购书报杂志。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不久，

书社投资增加到1 000元，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到1921年3月底，书社与外省近70个单位发生了业务往来，并在湖南的平江、浏阳、衡阳、邵阳、宁乡、溆浦、武冈等7个县设立了分社。在长沙城内许多学校如第一师范、楚怡学校等都设立了贩卖部，还聘请了推销员。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书社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的作用，使书社销售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丛书和进步书刊。文化书社创办后的7个月内，销售量最大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罗斯之研究》和《劳农政府与中国》等；销售量最大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少年中国》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丛书，更是大量地推销。后来，几乎全国各地的新出版物都在书社推销。文化书社促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销售进步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文化书社特别注意面向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书社规定，凡是售给劳动者的书一律照进价转售，不赚分文，有的书价比原经售店还少。为了使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能买到进步书刊，每逢新书、杂志一到，便在报纸上刊登书目和内容介绍。有时，毛泽东还亲自背着新来的进步书刊，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销售。文化书社还通过新民学会会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人夜校的老师，把进步书刊送到工人群众中去。书社在出售的每本书刊里还附上一份“启事”和一份“建议”。“启事”题为《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它说：文化书社至诚恳切地介绍新书报，目的在于使湖南人思想进步，故欢迎读者多来买书，并请读者协助办好这个事业。“建议”叫做《读书会的商榷》，它奉劝读者组织读书会，大家买书大家看，共同研究。它指出：这样既能少花钱、多看书，又能进行讨论，互相启发提高。为了使缺钱买书的工农和市民群众也有机会看书学习，书社还在社内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书报，供大家阅览。文化书社通过种种途径，使进步书刊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大量推销并广为阅读。文化书社编印的《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士兵的生活》等等，还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印的《劳动界》，这些以工农群众为读者对象的通俗进步刊物，成了当时工农群众的良师益友。

《青年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写道：当年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回忆说，毛泽东等创办的文化书社，除在传播新思想、宣传新文化、团结社会各界、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等方面的历史作用外，并是“建党初期党在国内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例如1921年12月中旬，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

去桂林会商孙中山，路过长沙，毛泽东与其见面谈话，就是在文化书社秘密进行的。

据周世钊回忆，为了更好地传播新文化，毛泽东还热情地帮助《湖南通俗报》进行了改革，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对于办报，毛泽东不仅富有实践经验，而且有明确的主张。他在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提出“具体、鲜明、热烈”六字。并说，在人类社会，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便是因袭，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通俗报》是湖南通俗教育馆发行的一份小报，由于没有明确的办报方针和目的，很少生气，发行量极小。1920年9月，何叔衡接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后，决心把《通俗报》办好，即聘请谢觉哉、周世钊、熊瑾玎等人主编，邀请毛泽东指导。9月初，毛泽东应邀出席编辑会议并发言。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后来，他还经常去报馆，及时地进行具体的指导。从此，《通俗报》出现了新的面貌，内容和版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颇受读者欢迎，发行量由原来的500多份上升到2000多份。

五、《湘江评论》

如何利用报刊和创办一个期刊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是毛泽东回湖南后经常思考的问题。

“五四”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高潮。新文化运动起了质的变化：不止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而且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了；不止是主张民主与科学，而且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了。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年之内，全国达到四百种之多。这些刊物多数是由各地的学生组织以及许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学生主办的。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长沙各校学生即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学校的《明德周刊》、岳云中学的《岳云周刊》、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工学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等。除《女界钟》比较有特色外，这些刊物虽然都以宣传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知识为主旨，但多累赘重复，缺少见解。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更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前进，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亲自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

周刊是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的。毛泽东以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的身份担任主编。当时投稿的人不多，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或不适用；因此，他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总计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他执笔的；其他的撰稿人，也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从写稿、审稿、编辑到校样，他都要包打包唱。这时他住在修业学校。他的行李简单极了，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或者作其他的工作。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刊物在形式上同《每周评论》一样，报纸型四开一张；分栏也大体相仿：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很短的杂感）和“新文艺”等。出版的第二天，长沙各报都刊出“湘江评论出版了”的新闻。

关于发刊的宗旨，“本报启事”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由毛泽东署名的《创刊宣言》，开门见山地说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接着说明世界革命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就在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的革命新思潮。“宣言”的结尾发出这样激情的呼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久已热切企望的实际政治斗争，如今终于来临，而且亲身投入这个斗争，开始了沸腾的政治生活。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大无畏品质，同时也显示了他的雄辩的政论家的才能。这些文章热情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洋溢着敢于理想、敢于斗争的磅礴的革命气概；贯彻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精神；特别表现了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信任，并且着重研究以什么样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中国的革命。这些文章除对历史事变作出深刻的概括外，还对形势的

发展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关于国内外大事，有述有评，分析得头头是道，总是击中要害，揭露出本质，指明事物发展可能的趋向；文字又特别生动有力，深入浅出。“杂评”与“放言”，则针对社会上种种守旧现象、奇谈怪论，予以揭发讽刺，文笔辛辣，三言两语，说到读者心坎里去了。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印了2 000份，当天就销尽了，继续来订买的仍很踊跃，随着又加印了2 000份，还不能满足外地的需要。因此，自第二期起，每期印5 000份。这个份数，在当时的期刊中是很大的数目了。长沙和湖南各地的青年学生、许多中小学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成为它的好友，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口袋里总放着一份。每一期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纷纷抢阅，先睹为快。这个刊物在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中，也很快传播开来，外省订户也日益增加。许多学生义务上街卖《湘江评论》，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通观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众多进步期刊，《湘江评论》是思想性、战斗性最强的一种。毛泽东以如此辉煌的成功和巨大的影响，开始了他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活动。

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随后，《每周评论》三十六期予以介绍，并这样兴奋地说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并且指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每周评论》三十六期是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正由胡适主编。他已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许多革命议论都不肯点头，而对这个不久前的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同他有过接触的讲湖南土话的青年所写的大块文章，却不能不震惊佩服，要在刊物上作如此评价。北京《晨报》也予介绍，说它的“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当时全文转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有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北京的《又新日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推荐这篇文章和《湘江评论》的期刊，还有《新青年》、《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等。这篇文章在《星期日》转载后，对四川后来一连串轰轰烈烈的青年爱国运动，起了推进的作用。直到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在上海的刊物《新教育》（二卷五期）上写文，介绍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湘江评论》对于张敬尧的专横统治，不啻是接连投下的炸弹，它的出生宣布了“反叛”的力量在蓬勃成长。这个军阀在钳制舆论上已经有了一套经验。承印这个刊物的湘鄂印刷公司，就常有军队去检查、捣乱。1919年8月上旬，第五期出版后或尚在印刷之中（这一期现在还没有找到），张敬尧于派出军警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且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承印。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寿命非常之短，但对于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于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也说到这一情况：“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刊，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肖劲光曾谈到任弼时和他自己怎样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那时，我们对共产主义知道得还不多，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卖国政府则是充满了不可抑遏的仇恨。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任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一个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革命战士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第五节 驱张与自治运动

驱张和湖南自治运动是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枢纽。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谈到：“在这（指《湘江评论》被查封事——编者）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纲领。”

1920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当时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无聊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们。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了他。我还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上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的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

《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一、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发展。1917—1918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混战，南败北胜。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进入湖南任都督。张敬尧入湘后，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据毛泽东等人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文中揭露：一是战争连年，纵兵殃民；二是操纵银行，民不聊生；三是盗押厂矿，勾结日、美拍卖纱厂，卖断湖田，公私破产；四是贩种鸦片，烟害无穷；五是驻兵各校，迫害师生；六是军队犯罪，嫁祸湘民；七是查封报刊，迫害舆论；八是擅运私盐，加收盐税，破坏盐法；九是勒捐军米、加征田税、坐收厚赃；十是私造议会、伪造民意。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愤恨已极，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19年8月，《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和一些积极分子，开始进行秘密驱张活动。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世钊等在易培基家里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驱张的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湖南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狗咬狗的斗争，都使张完全陷入孤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因此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3000万人的生命。

针对当时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只主张驱张，不主张罢课的情况，毛泽东和湖南健学会一些骨干分子如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他还在学联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上进一步阐明驱张的意义：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爱国行动。毛泽东的这些活动对表决总罢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2月6日，湖南学联“公决男女大小各校全体罢学，解散归家”。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

在酝酿罢课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驱张的具体办法，参加会的有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及教育界部分人士。决定由各校

派学生代表二人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作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

各路代表团在12月上旬分途出发，毛泽东亲率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18日，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21日，出席旅京湖南学生会召开的慰劳大会，“并研究了一些驱张的办法。继又组织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毛泽东是旅京公民驱张请愿团的负责人。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传播驱张的消息，并争取舆论和各界的援助，代表团到北京以后，立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亲任社长。据黎锦熙回忆：社址在当时北长街99号的一个大喇嘛庙（福佑寺）内，由旁门出入。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系以一张长条香案代替。白天他四处奔波；晚上，就在这里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通信社的文稿毛泽东都要过目，“有些文件由他自己撰写，如各界向政府的请愿书等”。不久，驻衡阳、上海等地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信社曾直接向《天问》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还为它撰写了不少重要文章。

与此同时，他和代表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前门外的湖南会馆召开的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请在场议员签字担保驱张，语甚激烈。议员们见群情激愤无辞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

1月18日，毛泽东和罗宗翰、彭璜等，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知名人士和人民团体，全面揭露张敬尧祸湘罪行。电文云：“吾湘不幸，迭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猛虎之政，括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平。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状，令人不忍卒闻。彼此张贼兄弟累贖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意思攫入私囊以甘心。”

1月28日，他又和全体赴京驱张代表及部分北京学生在军阀政府所在地新华门前和“总理”靳云鹏私宅请愿示威。据《天问》第二号刊载：当天上午12时，湖南公民代表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三个团体，分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向国务院进发，手持旗帜甚多，旗上写着他们的请求。

众至新华门外，即要冲进门去，兵士说：“不能进去！”众与兵士相持达三个钟头。一个姓王的秘书被迫出来接待。三个团体各推代表二人，公民代表张百龄、毛泽东，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遇夫，学生代表柳敏、李思安，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总理求个办法不可。王秘书不得已，电话四处找靳，但均没找着。代表以不得要领退出。群众在门外久候，看见代表出来，急问情形。代表回答，没有见到靳云鹏。请愿群众大愤。于是决定赴靳氏私宅。众离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先得电话，知请愿团会到，无辞拒绝，悻悻出来接待毛泽东等代表将张敬尧祸湘罪状数十条，略数一遍。并递交《上靳氏书》。靳氏许诺，一周内答复代表们的请求。

2月4日，毛泽东等六位代表“以一周期满”，“访靳以践前约”，要求答复去张，并再次组织了示威游行。

在请愿期间，武汉学联在武汉鲇鱼套车站查获了为张敬尧偷运的45袋鸦片烟种子，拍成照片，在报纸上公布，并派人赴京揭露这件丑事。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请愿团获悉这一消息后大为愤激，发出急电，要求扣留。毛泽东利用这一事件，又一次向国务院靳云鹏递交了呈文，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院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与由一些反动的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的“旅京湘省维持会”和“湖南旅京各界联合委员会”两个保张团体进行了坚决斗争。他领衔署名的《湖南驱张代表电讨保张团》一事，再次控诉了张敬尧的罪恶，指出“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惟恐不远，去之惟恐不速”。“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所赐。敬尧不去，湘民宁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而后湘事始有整理可言。”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保张团”是卖身投靠反动军阀的“卖乡党”。他们“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电文还重申了湖南人民要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坚决和“保张团”、“卖乡党”斗争到底。经过毛泽东和驱张代表团的斗争，“保张团”终于土崩瓦解。

至1920年4月，驱张斗争已胜利在望。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新民学会怎么继续进行工作，毛泽东拟去上海与彭璜商议，同时，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即将乘轮西渡，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须去上海欢送他们。

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一晌，25天才到上海。”这期间，他“在曲阜下车，看了孔子的

墓”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参观了孔庙和相传是孔子栽种的古树。他还观看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颜回、孟子出生地，攀登了东岳泰山。

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继续作驱张工作，写有《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刊于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

在湖南人民的声讨中，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撤防和逼迫下，在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等的武力威胁下，张敬尧终于1920年6月滚出了湖南。

二、湖南自治运动

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即与彭璜等人研究过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的问題。他与彭璜草拟了一个题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材料，分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明确提出要废督裁兵、银行民办、增加教育经费、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对这一主张作了特别说明。他写道：“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二份，有好些处所当应大加斟酌。弟子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在毛泽东看来，改善湖南的现状，实行废督裁兵，地方自治，虽然是‘次货’，但是从中国目前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实际情况考虑是应做的事情。

正当张敬尧即将被逐之际，湘军头目谭延闿、赵恒惕打着“湘省自治”和“湘人自治”的招牌进入长沙。湖南下一步怎么办？毛泽东及时地撰写了《湖南人再进一步》的文章，提出：湖南人下一步要努力作“废督运动”，即“废去督军，建设民治”。文章从几方面分析了废督的有利形势：一、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任何黑暗势力的牵制，欲废督军，“自己举足踢去就是”。二、湖南省财政困难，民间经济破产，军队供养不起，非散不可，“督军无军可督”。三、谭延闿多次担任过湖南督军，多次遭到人民的厌弃。此次参加驱张，是将功赎罪，这回该抛弃督军“这根光骨”了。文章最后说：湖南人素来有一

点倔强性、反抗性，又有驱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的勇气和实践，何不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并指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20年内完全无望。20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有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省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的去干这一着。”

6月11日张敬尧被赶出长沙，18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文章开头即说：于今张敬尧走了，但那种有妨于湖南人民自决的非张敬尧往后还会不少。这种人可能不是湖南人，也可能是湖南人，但“不论是湖南人，或非湖南人，凡是主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湖南者，现在及将来住在湖南地域营正当职业之人之湖南也’。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

接着，毛泽东又写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全面阐述“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他写道：总结过往的经验，“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据民财归己囊。”今后怎么办？其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即湖南以“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他进一步解释说：“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凡“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应“一律退出于湖南境地以外。”公开信结尾还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对打着“湘事湘人自决”旗号的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公开信发表之后，引起了各方面极大的反响，长沙各家报纸纷纷发表“湖南自治”的文章。谭延闿等也匆匆忙忙抛出“还政于民”的“谕电”，假称“非以湘政分之湘全体人民，不足迅起疮痍，速复元气。”针对这种情况，毛泽

东从9月3日至10月11日一个多月之内,个人或联名连续在长沙、上海等地的报纸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9月3日湖南《大公报》,以下未注明的均为此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9月5日)、《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9月6日)、《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9月6—7日)、《“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9月26日)、《释疑》(9月27日)、《再说“促进的运动”》(9月28日)、《“湘人自治”与“湘人治湘”》(9月30日)、《“全自治”与“半自治”》(10月3日)、《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0月5—6日)、《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0月7日)、《反对统一》(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10月11日)等文章,还有在长沙各界建议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和讲话,就所谓湖南自治问题,即人民究竟需要怎样一种“自治”,怎样做去,才能促其实现,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人民要求自治的呼声中,谭延闿假惺惺地办起“自治”来了。9月13日,谭延闿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省议会11人共同起草省宪法(即自治法)。省议会也忙着讨论起草问题。究竟由谁来起草?社会上议论纷纷。毛泽东等反对政府包办制宪,但认为当前谭延闿还打着自治的招牌,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要趁热打铁、充分利用,通过一个省宪法,造成一个“紧箍咒”,加在“湖南省长”头上。这对人民,对今后的革命运动是有好处的。于是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以新民学会会员、学联干部和各界进步人士为核心,以广大学生为基础,联络各界人士,开始商讨“制宪”的具体步骤。

10月7日,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成会代表身份出席由省学联发起的长沙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并发言。会议讨论了请省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问题和宪法会议组织法及选举法要点,决定发动市民于10月10日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并公推毛泽东、龙兼公为“请愿书”起草员。同日,他发表了《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书。辟头即说:“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生死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最后还说:“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呼唤市民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在省教育会场召开的省城教育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大会,并任大会主席。大会讨论了自治运动进行方法,通过了宪法会议选

举法和组织法要点。

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省城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写着“请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及“湖南自治”的红白旗先导，印发的“百姓是主人”、“农工商是上等人”等传单达数10种，20余万份。他们高呼：“打倒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湖南自治”和“建设新湖南”等口号。虽然大雨如注，但群众情绪很高，工界同胞都是短衣赤足，戴笠游行，充分表明了湖南劳动界的政治觉悟。湖南的劳工们在毛泽东等人鼓动下，开始组织起来了。游行队伍行至督军署，谭延闿接见了请愿代表，接受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请愿书”。“请愿书”说：“湘省连年政变迭兴，祸乱相寻”，市民“相率忍痛茹苦”。现在，湖南“群情望治”又处于“特别地位”，因此，“应采革命精神，打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以后制治精神，宜采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当游行队伍到达省议会时，群众出于对旧省议会的义愤，扯了议会的旗子。

冲击省议会，扯旗的事，引起了湖南统治者的恐慌。当时任督军的谭延闿，特别是不久取谭而代之的赵恒惕，开始撕下“自治”伪装，反对和破坏自治运动。又看到了毛泽东在自治运动中的显著作用，于是，企图借此诬陷毛泽东。便制造一种流言，说旗子是这次闹自治运动的领头人毛泽东扯的，警察厅还将毛泽东召去诘问。于是毛泽东向警察厅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揭露这种阴谋。他郑重声明：“一，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他抗议对他的身体及名誉的侵犯，要求惩办造谣诽谤的人。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斗争，使得军阀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第六节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在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和思想的研究中，许多文人学者把目光集中在毛泽东如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包括转变的时间、标志、主要的思想变化等等。谭一青在《青年毛泽东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载《党史博采》1990年第9期）一文中写道：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迅速由文化领域转入政治领域，人们从对旧势力的扫荡中转而开始了对未来的思考与探求。他们搬来了改革中国的种种方案与主义，如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在短短的一二年间，中国新青年的思想便经历了各种影响的消长与代谢。他们在苦苦思索、推求、分化，最终，有一批人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下。

毛泽东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在从民主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中介。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他对于五四流行的多种无政府主义流派，如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都有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们混杂在一起，作为解放人类社会的理想进行探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了比较，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激烈的，克鲁泡特金的方法是温和的。他欣赏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认为可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至于新村主义，毛泽东则积极想付诸实践。1919年12月，他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他认为，旧教育是与社会相隔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改革教育必须同时兼顾家庭与社会两端，否则，新教育就将被旧的社会和家庭势力所消融。所以，“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学生之工作》，载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这三者相联的实践形式就是“新村”。

在黑暗混乱的中国社会中，这种“新村”的周围充满了敌视与反动，内部也缺少长期维持的经济基础，因此，一般很难存活多久。当时，毛泽东曾列名为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成员。到1920年6月，他写信告诉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后来，曾对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充满热情的恽代英沉痛总结说：“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难而不安定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事业，出尽了穷气力还维持不住。靠人家的力量去改良事业，又是常常因人家兴会与机运而常受变迁的。”（《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38页）所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新村”理想根本就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许多青

年从热烈信仰很快陷入幻灭之中。

当时的毛泽东还受到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1919年7月，胡适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情势，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有意抹杀主义和学说的普遍意义，暗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从而达到抵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目的。但是，胡适的议论中也包含有注重研究中国实际情形的合理因素。在胡适的影响下，毛泽东组织了问题研究会，并于1919年10月间向全国发出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等方面的大小问题100多个，其中包括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女子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和国际联盟问题等。固然，在问题与主义关系的提法上，毛泽东与胡适有一定区别，但是，当时他显然并未认清胡适实验主义的本质。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把实验主义列为思想解放的变革成果。后来，他在湖南搞自治运动又写信给胡适说：“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

应该说，毛泽东从两方面接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与他过去所接受的“实学”传统、严复译介的英国经验论等思想合流，促使他进一步面向中国实际，注重研究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也在他的思想中有所反映。到1919年7月，毛泽东仍主张用“温和的”方法进行社会改革，实行“无血革命”，反对社会的“大扰乱”和“炸弹革命”。（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自然，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亦有联系。

总之，从1918年8月第一次进京到1920年夏，毛泽东受到了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的思想主流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他自己也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然而，毛泽东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他的特点是在实践中检验与比较种种主义和学说。他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深化。

1920年夏到1920年底的湖南自治运动，是毛泽东把他所接受的各种社会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一次试验。这次试验的失败促使他最终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1919年底，毛泽东曾以五四运动期间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联合湖南各界，发动了驱逐湖南军阀头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斗争，终于在1920年6月把张敬尧和其他北洋军阀势力赶出了湖南。当时，南北军阀

争斗，湖南常为战场，人民倍受蹂躏。张敬尧一去，湖南人民遂有自治呼声，希望通过自治使湖南超出南北政争之外，免遭兵祸。而取代张敬尧先后统治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为了维持其尚不稳固的统治，也不得不打着“还政于民”的幌子，于1920年7月发布了“湖南自治”的通电。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自治运动。从1920年6—10月，他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等10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总是没有基础，立脚不住。“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所以，他建议“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各省自立为“国”，十年二十年以后再谋全国性的“总革命。”

毛泽东有关湖南自治的设想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一，受到李大钊、陈独秀有关论述的影响。李大钊曾强调，由于中国社会“复杂、扩大、殊异、驳杂”，“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陈独秀在1919年12月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则强调：“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陈李的论述在当时亦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畴。其二，毛泽东把西方国家的联邦制作为湖南自治的模式。他在文章中多次引美国、德国的联邦制为例。他说：“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全自治”与“半自治”》）他认为，湖南的自治法可以比照美国的州宪法和德国的邦宪法，“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他还十分推崇瑞士的联邦制和直接民选制，提出要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象”，希望将湖南建设如“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曹毅书》）显然，当时毛泽东还未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治运动。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文章还是洋溢着彻底的民主精神，包含着深刻的启蒙教育意义。他反复强调，湖南自治运动应该由“民”来发起，号召人民积极参政、议政，不要“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他号召三千万湖南人民“共负改造之责任”。他的人民制宪、人民自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毛泽东的自治理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成分，并且，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他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其次，他意识到，只有取得政权，才能获得民主。1936年他与斯诺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从此以后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第三，他认为，革命运动必须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他说：“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应该有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19年底到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曾热心搜集了一些当时还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三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本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两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从中认识到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1920年7月，留法勤工俭学中“新民学会”会员开展了“会务进行方针——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热烈辩论。辩论分解为明显对立的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学习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另一派以肖子升为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蔡肖二人分别写信给毛泽东，陈述各自的见解，要求毛泽东等在国内的会员表示意见。如何对待这两种不同观点，就成了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1920年12月，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表示站在蔡和森一边，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的一种“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必定“人满为患”，“难以终其局”。他通过批评罗素的政治主张，对社会改良主义作了深入的否定。他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其一，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家掌握着教育权，并且有“法律”和“军队”的保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教育权？”其二，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不能依靠“小教育之力”来推翻，“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实质,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比较坚定地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时间界限,有两种分期方法。一种是指1925—1927年,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便是着重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还有一种分期,是指1921—1927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便是如此分期。他说:“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我们采纳了毛泽东的分期法作为这一时期的标题。在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极为丰富,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却远不及青年时代。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永泰的《毛泽东与大革命》一书弥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系统再现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发展,我们将在这一章中多方面介绍这部著作的研究成果。

第一节 建党活动

毛泽东向斯诺着重介绍了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形: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

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

一、巴黎——长沙通信

在毛泽东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巴黎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中首先提出了建党问题。

黎永泰在《毛泽东与大革命》一书中写道：当毛泽东经历着在理论上“脱毛”和在实践上转变立场的时候，他开始和在法国的蔡和森进行“巴黎——长沙”通信。通讯的内容集中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和建党的问题上。

1920年2月2日，蔡和森抵达巴黎。随后住到近郊的蒙达尔尼公学。因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决定恢复体操游息，略如麓山故事。每日生活，全在公园空旷中，不上课，不看书，惟饱食面包，而如此一月余，体气大健。”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决定不上课，“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每天看《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等，共产主义知识大增猛进。5月28日，他从巴黎给长沙的毛泽东发出第一封信，开始了“巴黎——长沙”的共产主义思想讨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对毛泽东和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坚定对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起到了推动作用。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被毛泽东标以“研究社会主义”的小标题，

收入《新民学会通讯集》第三集，作为首封刊出。毛泽东在本集提要中注明：“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在信中，蔡和森告诉毛泽东他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打算：“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格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纵〔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其时，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情况，还缺乏明晰的了解，他把弄清这一问题作为第一要务。这与毛泽东当时对于种种主义，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的情况和想法大致相同。

不过，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条件毕竟大不相同。法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潮云涌的地方，蔡和森以勇猛精进的精神，短时间便收集了上百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和小册子，并且择其急需者“猛看猛译”。他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以及若干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很快便建立起来。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再次与毛泽东通信，交换他对共产主义和建党的认识。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详细地谈了对一系列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指导思想。

他强调，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蔡和森敏锐地指出，在中国南方，诸如陈炯明等一班军阀官僚政客，他们也挂起革命的招牌，陈炯明甚至宣称要做“中国的列宁”，他们假革命的口号干招摇的行为，必然欺骗一些青年。他要毛泽东警惕陈炯明等的阴谋，不要理睬他们。“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蔡和森指出，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最“对症”的方法，中国也不能例外。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的

“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蔡和森具体地谈了在国内建党和准备十月革命的办法，建议物色彭璜（殷柏）等人为党员。蔡和森这封极重要的信，没有及时到达毛泽东手中，大约在11月份时毛泽东才看到这封信。这时已经是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对改良一途已经绝望，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看到蔡和森这封信时，便没有一字不赞成了。

12月1日，毛泽东在与蔡和森、肖子昇及在法诸会友的信中，对蔡和森八月来信作了回答。他表示完全赞成蒙达尔尼会议决定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肯定这个方针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一致的。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虽然社会改造必须从局部做起，例如，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应当首先从中国着手改造，“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毛泽东这个主张，与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大声疾呼要实行“湖南门罗主义”，“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的主张比较起来简直是大相径庭。他认识到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不仅行不通而且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的改造，这就从理论上清算了自己在自治运动中的指导思想。

在信中，毛泽东把夺取政权提到突出的地位。他完全赞成蔡和森关于没有政权便不能改造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保护革命、完成革命的主张。他痛切地感到，不摧毁旧政权，一切都谈不上。“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字下”，因此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它具有“十分必要的理由”，“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决心从此不再搞什么改良运动，要把全付精力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至于夺取政权的方法，毛泽东肯定蔡和森的看法，只能走“俄式道路”。

至此，新民学会长沙本部，在学会宗旨、实现宗旨的根本办法和具体办法等方面发生了根本转变。学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从组织上着手建党建团，以注重发动和组织劳农为工作重点。这些重大决策，使学会由

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团体，转变成为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宗旨和目标的革命团体。在五四时期的社团中，没有其他任何社团，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转变，许多社团或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原地踏步，最终为革命发展的形势所抛弃；或是因主义、宗旨无法统一而最终陷于分裂。像新民学会这样的团体，经过内部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统一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这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是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自己的坚定信仰和大量细致的工作分不开的。毛泽东从组织一个学会的工作中，学到了组织和领导一个党的经验。

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曾清醒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关于建党问题，1920年6月他在上海时便已知道，“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自治运动失败后，他立即开始在湖南组织共产党，首先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后来的客观环境逼得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

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其时间应当从1920年10月开始。10月10日人民制宪请愿游行大会失败，湖南自治运动也宣告失败。毛泽东对自治运动不再寄予希望，便把组织共产党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1920年6月，魏京斯基在上海帮助成立了上海地方的共产党筹备组织之后，陈独秀和魏京斯基便决定在全国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预备于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长沙是成立筹备组织的计划地点之一，那时，毛泽东也正在上海，他和陈独秀关于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有过很热烈的谈话。虽然没有材料证明陈独

秀当时便把在长沙建党的事委托给了毛泽东,但是,据当时参加上海党组织七人之一的李达回忆:“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也就是说,即使当时没有委托毛泽东回湖南建党,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后,陈独秀也很快写信委托毛泽东从事这项工作,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书信联系。因而毛泽东在10月自治运动失败之后立即从事建党工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据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的。”“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武汉筹备小组成员包惠僧也回忆,长沙小组成立的时间与武汉小组大致相同,也就是在九十月间。毛泽东为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与当时湖北小组的包惠僧有书信联系。据彭述之回忆:1920年9月,他到达长沙时,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正式形成,“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肖子昇1921年3月回到长沙后,发现“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根据这些回忆,可以推断,9月份毛泽东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自治运动,集中精力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大可能。到了10月下旬,自治运动失败了,他的精力完全可能集中到建党工作中,这样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工作便开始进行了。这个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

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20年入团者有16人,1921年7月前入团者达36人。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从1920年秋到1921年秋,毛泽东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青年团员的工作上。与他来往的大都是些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青年。毛泽东组织星期同乐会,让10多个团员依次负责召集到长沙近郊名胜地方聚会,如天心阁、水陆洲、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朱家花园等,通过娱乐活动,互相谈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大家的信仰。在毛泽东的培育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大革命的征途,在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中,为革命输送了大批的优秀儿女。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描述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批优秀干部的艰苦工作。他说: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毛泽东已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

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他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来教育团员，有时还采用青年们所爱好的文娱活动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前述建团初期，曾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组织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籍。

当年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多生活艰苦，又过于劳累，有些人患病后，因而早逝。如陈绍休，1921年在法国去世；彭璜、陈子博，1922年、1923年先后去世。毛泽东早有鉴于此，同他共事的一批主要干部，日夜奔忙，工作繁重，于身体很有影响，平时也难聚会；为了调剂生活，他便倡议一种星期同乐会的活动。从1920—1921年秋，曾举行过许多次。10多人排好次序，轮流负责召集，到长沙近郊风景、名胜之处聚会。或远游麓山，或泛舟湘江。紧张工作之后，能得到这样的休息，实在是身心两益之举。大家敞开胸怀，抨弹今古，纵横天下，尽情欢乐。爱好诗词的，还随口吟咏，步韵相和。1921年秋，罗学瓚作的“与诸人雇舟畅游水陆洲一周后”咏怀诗：“安得异人起，拔剑斩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以及“随感诗”中的“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确切地描述了这一群团结在毛泽东这个“异人”周围的民族精英当时的情怀与抱负。

这种星期同乐会还常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进步分子参加，这些人就逐渐被争取过来了。

到1921年时，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五四运动前后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在干部方面，湖南已经有了良好的建党基础。新民学会的活动已为党培养了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和作风朴实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职业革命家对建立一个真正工人阶级政党有着决定的意义。那时有些觉悟较低的会员，坚持继续升大学，以为“要干革命还是多去求得些学问好”，实质上还是怕耽误了个人的前途。他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说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工作，才能求得真正的革命学问，革命也才有可能发展；在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中，是决求不出革命的学问的。

新民学会通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实践，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逐步聚集在毛泽东周围的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何叔衡极其谨慎地秘密地进行这项庄严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决定开展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这时，新民学会实际上已成了党的前身。

《青年毛泽东》的作者在书中写道：

长沙小组的活动成果，得到中共“一大”代表的公认。据李达回忆：“一大”期间，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重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从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看，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诞生，就能坚持原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常会上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问题时，熊瑾玎说：我觉得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早就有发财的念头，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殖传”等书看；常常觉得在中国这种社会底下发财有两条路：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并且说：“苟可发财，不必择术”。毛泽东则“不赞成熊瑾玎之消费主张”，针锋相对地说：我现在愿做的社会工作，“一教书，二新闻记者。”至于个人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侈。”并指出：因为“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彭璜信，更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范例。他认为“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他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联系起来，认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因此，他中肯地指出彭璜有十个方面的弱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但更多的是严格地检查自己，说自己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各条“一概都有”。说自己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他深刻地解剖自己，说自己“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毛泽东这种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他与新民学会其他会员的通信中亦随处可见。如1920年11月26日，他在给罗学瓚的信中就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

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伦理道德、远大抱负和革命热忱，深得同志、朋友的

赞赏。1921年4月29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向警予给在长沙的侄女写信称颂毛泽东是“改革社会的健将”，并嘱咐她要时常到毛泽东跟前“请教”。

毛泽东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于是他立即从新民学会会员中，从在校的学生中，物色对象，积极筹建湖南团组织。对此当时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学校的学生张文亮1920年底的几则日记，曾简略地作了记载：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四）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1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窥知，第一，毛泽东对建团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从10月到12月，短短的3个月就在湖南发展了20来名团员，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第二，毛泽东建团的指导思想是积极慎重，“注重找真同志”，所以湖南团组织比较纯洁、巩固。相反，北京、上海等地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不注重质量，成员复杂，信仰各异，以至不得不于1921年5月宣布解散。而湖南的团组织，则避免了这段弯路。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团员，提高团员的思想理论素质。他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了星期同乐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到湘江游泳，到天心阁、开佛寺、碧江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政治时事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还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争取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当时，毛泽东在社会上的威望很高，他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吸引了

不少青年，许多青年人如黄爱、庞人铨、萧石月等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出席“一大”

《毛泽东与大革命》一书介绍了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形：

经过秘密筹备，在中国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1年6月中旬，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到上海，建议中共筹备组织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成立。随后，由上海党组织书记李达发信给各地党组织，各派二人到上海开会。长沙方面通知了毛泽东和何叔衡。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动身赴沪参加中共“一大”，同行的有肖子昇。肖子昇顺路去武汉，他并不知道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干什么。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0之招。”谢觉哉1952年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31周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回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毛泽东、何叔衡、肖子昇乘船经洞庭湖去武汉。在船上毛泽东沉默不语，有时翻阅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的一本《资本主义大纲》。到了武汉，毛泽东、何叔衡与肖子昇分手，毛、何二人换乘江轮到上海。因距开会时间尚早，毛泽东曾去杭州、南京等地。《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记载说：“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7月23日以前，毛泽东到达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当时正值女校放假，校内十分安静。上海党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把这几间房子租下来供外地代表住宿。代表们都住在楼上。靠东一间住着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张国焘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有房子。靠西后面一间住着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住在靠西一间，房子光线很暗，他用两条长凳放上一块铺板作床。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寓所中召开。代表13人全部出席，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

可洛夫出席了会议。会场布置简单，只有一张大餐桌，代表围桌而坐，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文件。毛泽东被选为大会秘书，担任会议记录，并代表湖南作了一次较为简短的发言。此外，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泽东在“一大”会上发言虽少，却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惠僧回忆说：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诚实和热情”、“常识相当丰富”。

24年后，毛泽东对中共“一大”作了如下回忆。他说：“1921年，我们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七大”工作方针》）

第二节 领导湖南工人运动

毛泽东对斯诺说：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1922年冬天，（应是1922年1月——编者）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

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7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

一、在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党组织

据易礼容回忆：毛泽东从上海开完“一大”回来，有一天他到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把我叫出来，在文化书社对面的竹篱边，跟我谈了组党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赞成组党的话，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毛泽东还说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瓜熟蒂落”这样的话。这次谈话后，大概是八月的一个夜晚，地点在长沙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附近，毛泽东召集何叔衡和我，我们三人在坟坪里踱来踱去，又谈了组党的事情，从此有了核心，有了党的组织。但这次还不像正式成立支部，又过了1—2个月，可能是10月才正式成立支部。易礼容这段回忆基本准确，毛泽东自己对斯诺也是说在10月成立的湖南第一个党支部。肖三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双十节（10月10日）那天，湖南省的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把建党和传播马列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10月1日，毛泽东代谢觉哉在师范甲组二班授课。22日，师范同学会开会欢送夏曦等赴俄留学。何叔衡、毛泽东、陈章甫等发表了欢送演说。毛泽东指出：“从前学校是没有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毛泽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说给大家印象很深。谢觉哉在日记中记道：“润之是带红色彩的。”

湖南衡阳和长沙一样，也是进步思潮激荡的地方。毛泽东亲自到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1921年10月，毛泽东来到衡阳省立三师，向学

生们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他向学生介绍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这些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因为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所以都失败了。他以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在传播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还积极发现觉悟分子，在三师进步学生组织中发展了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四人入党，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衡阳三师小组，由黄静源任组长。同时，从三师进步学生组织“心社”中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师支部。

1922年4月29日，毛泽东再次到衡阳。他在衡阳三师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讲演，就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怎样实行社会主义等问题，向听众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5月1日，毛泽东在衡阳学联会议厅召集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师生，作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艰苦奋斗简史的报告，使大家对马克思的伟大业绩有了清楚的了解。在毛泽东的宣传、组织和发动下，衡阳三师学生中的进步青年，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1922年5月，中共衡阳三师支部成立。5月1日，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成立。

5月3日，党中央要求全国在5月5日召开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大会。毛泽东从衡阳赶回长沙。5月5日，一师召开马克思诞生104周年讲演大会，到会千余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重要演说。

从1921年冬到1922年夏，毛泽东在长沙、衡阳、安源、醴陵等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建党和青年团的发展工作。先后在长沙、安源、衡阳等地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1922年5月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郭亮等为委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处。中共湘区委员会掀起了湘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并派党员到省内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到1923年，全省有平江、铜官、衡阳、常德、安源、水口山、新河、长沙泥木工会、耒阳等九处成立了党的支部或党的小组。

6月17日，遵照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一号通告，改组长沙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会，通过了委员会工作细则，毛泽东任书记，李隆郅（立三）为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毛泽东向团中央建议：“对于章程第六条3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10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3个月，认为过促难于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3个月为6个月。”又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建议：“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临时区执行委员会至正式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页）到了1923年上半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在全省有较大发展，据次年三月统计：长沙、衡阳、衡山、耒阳、水口山、常德、岳州、新河、铜官、安源、平江、新宁等地都建立了团的地方组织，团员共计790人，毛泽东离开湘区后，团的书记由戴晓云担任。

二、深入工区调查

孙克信等编写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对毛泽东这一时期深入工矿、了解工人疾苦、发动与组织工人活动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

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从上海回到湖南，负责组织建立中共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并担任书记。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湖南成立了分部，毛泽东任分部主任。根据“一大”决议，毛泽东把组织和领导湘区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为了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首先对长沙工人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经常是工人打扮，身穿粗布短衣，到长沙车站等地方的茶馆，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起喝茶，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状况和思想要求。在调查中，毛泽东初步了解到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的一些情况，他们人数众多，跨的行业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如果不把他们教育争取过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就会影响长沙工人运动的开展。为了教育争取他们，毛泽东亲自深入到劳工会中去，同他们交朋友，给他们出主意，帮助和支持他们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具体地了解了劳工会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劳工会的会员，最初都是长沙的几个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在长沙的第一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和泥木、缝纫、理发等行业的工人中发展了会员，到1921年底，会员增加到4000多人。劳工会的领袖人物是黄

爱和庞人铨，他们是正直的有爱国心的青年。黄爱“五四”运动时，在天津读书，因参加学生运动两次坐牢。庞人铨在长沙曾参加过驱张运动。他们在工厂工作，目睹工人的劳动条件差，生活极为贫困的情景，决心把工人组织起来，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为工人谋利益。但是，这个组织也混进了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投机分子，并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只注意单纯的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有的热心于用个人的恐怖手段进行斗争。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经过研究分析，将劳工会中的一般群众和他们的上层分子分开，在上层人物中，又将黄爱、庞人铨这样的爱国革命青年和投机分子区别开来，对一般会员也作了具体分析，弄清了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落后的。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一方面鼓励他们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的糊涂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工作，黄爱和庞人铨等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空想，决心放弃无政府主义。不久，他们俩人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工会有些会员在毛泽东的教育培养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春节前夕，有的工厂工人要求发放奖金，被资本家拒绝，在劳工会支持下，工人们举行了罢工。华实公司资本家为了扑灭罢工风潮，用大批金钱贿赂湖南军阀赵恒惕，要他加害黄爱、庞人铨。于是，他们就选择了迫害时机，当黄爱、庞人铨同华实公司代表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时，赵恒惕立即派军队将黄、庞俩人逮捕。由于黄爱和庞人铨在工人中威信比较高，赵恒惕害怕工人起来抗议，不经审问，就急急忙忙将他们杀害。他们两人牺牲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先驱》第15期公布黄爱、庞人铨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全国学生的先觉”。毛泽东在船山学社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发行了纪念特刊。经过毛泽东的帮助教育，劳工会的许多群众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有人还成了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的历史，了解工人同资本家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

安源煤矿，是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于1898年开办的，是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初，安源煤矿有3000多工人，年产煤60万吨。名为“官督商办”，但实权掌握在大官僚大买办者的手中。由于资金不足，经营腐败，先后向德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借款，因而又被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在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帝国

主义者的共同压迫和剥削下，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1917年8月，矿上发生瓦斯大爆炸，造成大火灾，而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竟下令封闭井口，使92名工人活活烧死在矿井里。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要做14个小时以上的工，吃的是霉米烂菜，住的是破草棚，没有人身自由，上下班都有工头严密监视。因此，在工人中流传着“少年进炭棚，老年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的歌谣，具体地反映了安源煤矿工人的血泪历史。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1905年4月，工人要求发清欠饷，资本家拒绝工人的要求，殴打工人，激起了工人的反抗。1906年春，工人们又参加了为推翻清王朝而爆发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13年6月，工人举行了向工头清算工资的斗争。1915年10月，德国矿师和工头勾结，殴打工人，遭到了工人们的奋力反抗。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锻炼了工人们的斗志。但是，由于没有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工人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1年9月，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公开身分，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考察工人状况。他首先跟工人下矿井，一起劳动，亲身体会到工人们背着煤筐，趴在地上挖煤的牛马般的劳动条件。矿井内没有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天天都有工人伤亡。他深入到工人住区，目睹一间屋子住着50多人，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工人的衣服和被子都是补丁加补丁，吃的是霉米烂菜，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坏到了极点。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下，有些工人认为自己受苦是“命里注定”的。毛泽东根据工人的这种心理，给他们讲述了受苦的原因，不是什么“命苦”，是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的结果。工人要解除这种痛苦，不靠天不靠地，只有自己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像五个指头攥成拳头，就有了力量，就能打倒剥削者和压迫者，创造一个新世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人敢欺负工人了。工人们深深感到毛泽东是自己的贴心人，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他谈。有了这样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又进一步向工人们介绍了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的事迹，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为了开拓这块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工人运动圣地，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蔡增准、蒋先云等到安源具体领导工人斗争。他们到安源后，办起了工人夜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俱乐部，团结和教育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工人的部分条件，五天的大罢

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这次罢工的胜利，大大推动了江西和湖南、湖北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2年，湖南长沙有6000多泥木（包括泥瓦工和木工）工人，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分散在长沙的各个角落，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毛泽东不辞劳苦，常常是冒着风雨串街走巷，深入到长沙大大小小的许多建筑和修缮工地，深入到许多工人的家庭，详细地调查泥木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和思想要求等，得知工人的工价低，官府经常拉他们的“义务公差”，干活不给钱，工人只好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拉板车，即使是这样拼命地干，仍不够养家糊口，他们的生活是极不稳定的。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的具体方法。首先是把分散的工人组织起来，这是发动工人进行斗争的基础。为了把工人组织起来，毛泽东培养了许多工人积极分子，通过他们把分散的广大工人串连起来，结成团体，1922年9月5日，成立了长沙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为工会起草了章程，宣告：“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我们要解放自己，不可假手他人，非自己团结起来不可。我们若要组织真正的工会，非是拿斧子拿砌刀的工人不能加入。必须如此，会员方有相同的利益，一致奋斗下去，不致使资本家再吮我们的血了。”分散的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就有了力量向资本家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就不会被各个击破。工人组织起来以后，毛泽东就领导他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斗争。官府“义务公差”多，工价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于是，他代表工人同官府交涉，要求提高工价。官府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污蔑工人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成立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在罢工过程中，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走上街头，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安源煤矿、粤汉铁路、北京长辛店等全国许多地方的工人组织发电声援，这些支持和同情，大大鼓舞了泥木工人的革命斗志。在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正确领导下，工人们经过22天的艰苦斗争，终于使官府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泥木工人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长沙其他行业工人的斗争。

毛泽东在调查和指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同时，又对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进行了调查和指导。

湖南湘江上游东崖的水口山铅锌矿，是中国铅锌的重要产地，曾有“铅

都”之称。该矿开办于十九世纪末，1896年清王朝收归“官办”。从此，英、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这个矿区，同清王朝签订了“矿砂专卖”，“合办炼厂”等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铅锌资源进行廉价掠夺。1922年，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了用金钱拉拢议员搞“联省自治”，就同英国安利洋行勾结，以最低的价格出卖水口山大批矿砂。资本家为了补偿亏损，强迫工人每天工作12—14小时，高者达18小时，可是工资很低，资本家还常常拖欠不发。

为了发动组织水口山工人运动，1921年冬，毛泽东曾指示衡阳党组织应以水口山为重点，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夏明翰等先后到了水口山铅锌矿做工运工作。1922年夏，毛泽东亲自到水口山，跟着工人下隧道、穿砂湖，同工人一起劳动，了解工人的劳动条件。他又深入到工人住的草棚里，了解工人的生活条件。经过亲自调查，毛泽东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他号召衡阳的青年学生到水口山去和工人结合，为工人开办夜校，帮助工人学文化、学革命道理。并指示湘南学联在水口山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书报贩卖部”，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毛泽东先后派毛泽覃、朱舜华，蒋先云、谢怀德等到水口山工作。他们也都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作风，深入工人中，同工人一起干活，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宣传工人，组织工人。

毛泽东由于亲临水口山调查，了解铅锌矿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工人的状况，所以经他修改的罢工宣言，语言通俗有力，写出了工人的心里话，明白地表达了工人的愿望和要求。宣言中写道：

“罢工了，罢工了，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从前一样，怎能养活自身呢？怎能养活父母妻子呢？我们屡次请求当局增加工资，均分红奖，他们竟置之不理，陷我们于死地。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我们组织俱乐部，……当局不但不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而一面施矫柔和缓的阴谋，一面要杀我们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代表。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有良心的人啊！快来救我们的命！快快来救我们的命！”

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经过激烈搏斗，取得了胜利。罢工胜利后，毛泽东立即派人到水口山详细调查工人俱乐部、罢工情况、工人的情绪等，写出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报告党中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于1923年11月汇印成册。

从毛泽东对湖南劳工会、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的调查

活动中，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

第一，对工人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还调查了工人反抗斗争的历史、工矿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史。经过这样的调查，毛泽东从经济上、政治上历史地全面系统地把握了一个企业的基本状况，因而知道怎样针对工人的实际，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并且知道应该如何组织发动工人向资本家、官府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第二，把调查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工人在资本家和反动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屡遭失败，生活更加贫困。工人们对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解释不清楚，于是有些工人认为自己受苦是“命苦”，是“命运注定”的。毛泽东根据工人的这种心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说明工人的贫困根源，不是命运决定的，而是由于资本家和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同时，向工人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启发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结成团体，成立自己的组织，向资本家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才能得到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解除贫困。

第三，在调查中组织工人斗争。毛泽东到工人中作调查研究，其指导思想和目的很明确，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革命，向资本家、官府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大罢工，经过曲折的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在斗争的过程中，为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在对工人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和工人们一起生活、劳动，从工人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增长了才干，进一步改造了世界观，同工人的思想感情亲近了，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更加坚定地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三、领导罢工斗争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遵照“一大”、“二大”规定的工运路线，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斗争的号召，领导工人为争取合法的权利而斗争。

早在1921年4月，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中，毛泽东就强调，真正代表民意的省宪法，必须注重保护劳工利益，对劳动法作出明确规定。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强烈要求政府必须给予劳工合法权利。什么是劳工？毛泽东指出：“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就是说，劳工是以自己的体力或脑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以此谋生的人，与那些依靠剥削为生的人根本相区别。劳工这个概念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它把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劳动者都包括了进去。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因此，劳动者必须享有正当的劳动权利。

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揭露赵恒惕的省宪法打着“全民政治”的招牌，却丝毫没有劳工政治的影子，劳工的权利在宪法中得不到肯定，这样的全民政治岂不是笑话！毛泽东要求劳工的三种合法权利必须得到肯定：第一，劳工的生存权。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子都应获得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第二，劳工的劳动权。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18岁以上60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应该把工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第三，劳动全收权，即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旧以外，应该全部归工人。虽然这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现在也不能完全忽略这一点。毛泽东在黄、庞牺牲之后，特别突出强调劳工的这三种权利，代表了广大劳工的正义呼声，同时也是对赵恒惕等反动军阀肆意践踏劳工权利的正面回击。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揭露他们说：“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毛泽东警告这些劳工群众的死对头：“‘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一个榜样，他们现在已经悔之不及了！”

在安源斗争形势一触即发的情况下，1922年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他深入到群众中了解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当晚便到工人夜校听工人讲课。然后到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听取蒋先云汇报。毛泽东对安源工人“五一”冒雨举行游行十分高兴，但批评游行口号不讲斗争策略。他告诫大家：我们暂时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毛泽东向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国内各处工人斗争的形势，详细分析了安源阶级力量的对比，认为安源罢工条件已经成熟，要使敌人屈服，非罢工不可。他又详细地分析了罢工的策略，指出罢工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同资本家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前列，处处为群众利益作想，只要大多数

人团结起来，联合一切支持我们的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一封信，告诉他安源斗争形势如箭在弦上，应立即赶回安源领导俱乐部工作。信中强调：罢工斗争一定要取得社会同情，并以“哀兵必胜”作比喻，提出的罢工口号一定要“哀而动人”。李立三立即赶到长沙，听取毛泽东的指示后，于9月9日赶回安源。“俱乐部正主任李能郅由长沙到安源，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9月11日，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领导。

李立三、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们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在工人中广为流传，不仅为工人所拥护，而且深得社会的同情。同时，注意做红帮的工作，使红帮在工人罢工期间做到了鸦片烟馆关门，街上赌摊停业，无抢劫案发生。在罢工工作正加紧准备时，粤汉铁路罢工风潮传来，路矿当局惊恐万分，不敢再采取高压手段，连忙承认愿意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趁机向路矿当局提出以下条件：（1）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3）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以上三项要求，限2日内答复。俱乐部在2日内，也大力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要求全体工人服从俱乐部统一指挥，这时工人群情激昂，准备作进一步斗争。

路矿资方于12日作出第一次答复，对一二项要求表示做到，但对存饷一项答复不令人满意。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条件，要求答复。这时，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要求俱乐部坚持斗争到底：“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这时，罢工行动已勃不可遏。

9月13日夜12时，路矿两局拒不答复工人要求，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收到，俱乐部便断然发出罢工命令。当时参加俱乐部的工人仅700余人，占工人的少数，但各处工人表示，有把握发动全体工人一致行动。在俱乐部工人的积极组织下，14日晨，整个路矿两局，除了电机厂、抽水房、打风机房三处为保证生活和安全需要，没有停止工作，其余各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安源山下汽笛怒吼，工人们戴着红袖标、高举斧头、岩尖（手镐），像潮水般涌出井口，涌出工房，“罢工！罢工！”的口号震天撼地。整个矿区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同时《罢工宣告》和十七条要求也

到处贴在墙上，人人知晓。安源 17 000 工人举行大罢工，为保证罢工顺利进行，总指挥李能鄧转入地下开展工作，刘少奇任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负责日常工作。同时派遣俱乐部工人纠察队巡逻于街市和工厂以维持秩序，防止破坏，宣布：“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

宣告提出的十七项要求，主要是：承认俱乐部的合法权利，增加工资，改善福利，保证工人正当权益等。罢工工人在俱乐部统一号令下，纪律严明，斗争英勇、坚决，不怕威胁利诱，不怕军警包围镇压，誓死团结在俱乐部周围，打击资本家的气焰，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全部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安源工人罢工取得彻底胜利。9月18日，工友万余人召开庆祝大会，李立三等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众欢呼。李立三发表演说，然后带队游行，沿途旗帜蔽天、爆竹震地，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大长了工人志气。

这年冬天，毛泽东再次到安源。他深入工人中，了解工人罢工后的思想情况，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作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要求工人继续加强团结，努力奋斗。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应将罢工斗争中的骨干分子吸收到党里来，壮大党的队伍。安源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建立了 13 个党支部和 26 个团支部。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时安源路矿局也扬言要取缔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毛泽东召集各地工运干部，包括李立三到长沙开会。他要求工人运动暂时采取稳妥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为反击当局的挑衅，要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要以“弯弓待发”的姿态等待，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是否罢工的决定。安源党组织遵照毛泽东指示，一方面找路矿局谈判，严辞揭露其解散俱乐部的阴谋，警告其不要自食其果；另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准备罢工的紧急动员，并举行示威游行，使路矿局终于不敢采取行动。

4 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在俱乐部为工人作了全国工运形势的报告，要求大家认清工运的低潮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尝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过后，毛泽东又指示中共安源地委：安源工人经过罢工斗争的锻炼，觉悟很高，有革命朝气，应注意继续发扬。要把优秀的工人、干部派到全国各地去工作，要派优秀工人去开展农民运动。

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有所发展。毛泽东十分注意工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和斗争的策略问题，保证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在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毛泽东也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泥木工人的罢工，因工资问题而起。张敬尧统治湖南时，经过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政府明文将泥木工人每天工钱定为铜元42枚（420文），约合银元3角，牌示“永不再有增加。”到了1922年，银元上涨，42枚铜元只合银元2角，工人的实际日工钱减少1/3以上，而且工人的工钱发的是湖南官钱局的铜元票，在市场上更不值钱，实际上只合铜元20多枚，折银一角多钱，工人的生活更难维持。

泥木工会成立后，泥木工人有了主心骨，纷纷向工会反映，要求调整工价。毛泽东根据工人的迫切要求，指示泥木工会组织工人开展斗争。工会在全城散发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同情，坚决要求县知事接受工人调整工价3角4分的条件。长沙县署贴出告示，不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且污蔑工人的要求是“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勒令从即日起，恢复原来工价。泥木工人怒不可遏，一个晚上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工人的传单，并和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军警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时，泥木工人个个怒火万丈，形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9月下旬，长沙县公署不得不贴出告示，规定泥木工人甲工2角6分7厘，乙工1角1分6厘。泥木工人对长沙县署的告示仍表不满。毛泽东召开泥木工会评议部紧急会议，周密分析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宣布罢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0月5日成立了泥木工人罢工委员会，议决了六项具体措施：（1）宣布于10月6日全体罢工；（2）推定罢工的纠察员，负维持秩序之责；（3）通电全国，求伸公道；（4）散发传单于城内外，说明真相；（5）向省议会请愿；（6）非到圆满结果决不中止。

10月6日，泥木工人宣布大罢工，全城张贴泥木工人罢工宣言。

10月23日，4000多泥木工人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任树德报告示威请愿目的。大家推选了16个代表，然后开始游行。毛泽东身着工人装，带着口哨，站在示威请愿的工人行列中。当时大雨滂沱，大家周身被淋得透湿，但队伍整齐地向长沙县署进发。毛泽东带领工人高呼口号，要长沙县署知事周瀛千出来答话。之后，任树德等八位工人代表进县署与周谈判，周借口“各工团商绅不同意调整工价，本知事也不便参加”为借口，搪塞代表。工人见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午后，代表们还没有出来。毛泽东跳到坪中一个花坛上向工人大声说：我们泥木工人因为工钱少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很久，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

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千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千讲理。说完后，带领大家喊口号：“硬要三角四分钱！”“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10月24日，毛泽东作为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其他工人代表进入政务厅。在谈判中，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摆出一副官架子，指责工人不听从县署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命令是受了坏人怂恿。毛泽东立即质问他：商家涨价，是否也受了官家的怂恿？吴景鸿恼羞成怒，指责毛泽东：“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毛泽东翻开事先带来的赵恒惕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其之盾说：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七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一家老小，6000多泥木工人和两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调整工资，犯什么法呢？毛泽东的话驳得吴景鸿哑口无言，觉得毛泽东非同一般，便阴险地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朗声回道：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价问题。吴景鸿又被呛得哑口无言。

毛泽东又亲拟“呈省长文”，其全文如下：

“窃工等要求将工价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8月14日之布告，迫而罢工已20日。昨日工等全体齐赴长沙县署，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请其取消前发布告，以全生活。正争持间，适接省长电令，允在今日完满解决。窃思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等工价之争，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宜双方自行协定。非有强迫行为，官署不必过问。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函承认3角4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府吴厅长於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降情盛意，至为感激。现工等全体集合省教育会前坪，群情一致，恳求省长即赐解决，以安人心。所有工等工价增加，属于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官署不必过问缘由。理由呈请省长，即时明白批示，交由代表携回。并请令飭长沙县周知事废弃阴历8月14日之布告。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实为公便。谨呈湖南省长赵。湖南省城泥木工人任树德、仇寿松、杜仲堃、黄少梅、李海珊、毛润之、朱有富、罗子佩等6400余人全体谨呈。”（《泥木罢工风潮可望解决矣》，1922年10月25日湖南《大公报》）

为了不使赵恒惕政府钻空子诬蔑工人，在“呈省长文”中，特别写进这次

罢工请愿要求调整工价和争取营业自由的根据，即赵氏“省宪法”第十七条，并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3角4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毛泽东巧妙地利用赵恒惕的法律，陷长沙县署于万分狼狈之中。

“呈省长文”交由吴景鸿过目的，老奸巨滑的吴景鸿在批词上写上了“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能由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的话。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花招，当即指出：“此句万不能存”，坚决要求删掉。吴景鸿只好删掉这一句，接着以“批文需交省长过目签字生效”为由，借故拖延。毛泽东组织工人骨干连夜通知长沙各行各业工人，第二天到省署坪开会。25日，缝纫工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人工余俱乐部、工友励进社、笔业工会、漆业工会、印刷工会等15 000多人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向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至此，长沙泥木工人要求调整工价和实现营业自由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除上述两起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罢工外，毛泽东还策动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长沙铅版印刷工人大罢工等斗争。这些罢工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毛泽东后来组织与领导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第三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说：“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的委员，国民党执行局的其他委员有汪精卫（以后在南京当行政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性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运组织者，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后不久，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蒋介石图谋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主持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这个时候，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战争在1926年秋天开始了。”

一、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蔡钊珍的《毛泽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

年纪念论文集》)一文,对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与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文章说:

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实行国共合作决议之前,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已明确地认识到国共联合是必要的。1923年4月,他在《新时代》月刊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分析了国内的三派势力是: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明确指出:“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认为,外力和军阀的势力很强大,国内各派势力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外力和军阀。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制订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会议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成为几个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毛泽东同李大钊等坚持了共产国际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的特殊的旗帜”这一正确主张。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党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之前是中共湘区委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在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等方面,成绩卓著。中共三大的报告中称赞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成员,任党中央秘书。

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根据中共“三大”关于“我们必须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的精神,大力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中央工作不久,受中共中央派遣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赴湖南秘密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1923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写信给当时任国民党总务部长的彭素民和副部长林伯渠,汇报湖南发展国民党的情况。信中说:“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又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毛泽东等在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冒着生命危险,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地方组织。各地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时,都做了很多工作。11月,在中共《中央局报告》中,关于与

国民党关系方面曾说到：“原拟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各重要支部之计划遂未能实现。此时，惟北京已有组织；天津、哈尔滨、湖南也在进行”。毛泽东在军阀统治的湖南秘密筹建了国民党地方组织，扩大了国民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影响。

1924年1月2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推选毛泽东为代表，出席大会。这次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孙中山指定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等参加章程审查委员会。会议讨论章程审查委员会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审查报告时，当国民党右派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跨党案时，毛泽东赞同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所表明态度：我们愿来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决不是为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在讨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毛泽东发言指出：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主动、认真的精神，在讨论各种提案的过程中，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为大会所吸收。大会选举结果，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圆满成功而载入史册。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在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国民党的纲领——三民主义。毛泽东说过：“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并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道：“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毛泽东、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努力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实际上成了革命高涨的新起点。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积极贯彻大会精神，大力开展组织、宣传工作。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帮助国民党整顿组织和发展组织，加强合作，反对分裂，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

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派，于1924年2月，从粤赴沪。在

上海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担负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工作任务，协调双方的行动以及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有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等，他们刚到上海执行部，几乎一切从头做起。毛泽东工作很繁忙：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促进平民教育的开展；并审理各部门提出的工作计划草案等。为了培养军事干部，使国民革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协同中共中央选派了一些优秀干部去黄埔军校从事政治工作和教学工作；同时帮助黄埔学校招生，把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一些考生送往广州，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7月，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内有少数右派破坏孙中山倡导并且已取得巨大成果的国共合作，参与签署了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通告对做好国民党工作的方针、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发展国民党要严格要求，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加入；发展国民党外围组织，不必急于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希望共产党努力保持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中的领导权，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之中坚。在孙中山准备北上，谋求和平统一时，毛泽东参与签署的中共中央第二十一号通告中，及时提醒孙中山，要他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精神，去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牵制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期间的繁忙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年底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回湖南休养。

1925年秋，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中旬，应邀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指导大会工作。他为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阐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号召大家为贯彻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而奋斗。他说：“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闭幕会上他发表讲话，强调革命派联合起来。11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提出《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经会议讨论通过，并于公布。为了推动国民革命的开展，维护国共合作，打破“西山会议派”的宣传进攻，主编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宣传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的报告。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

他发言指出，共产党员并不惧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为了国民革命的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大会选举结果，毛泽东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办党报党刊，接办国民通讯社等，在宣传上为北伐战争作了舆论准备。同年7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讨论决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有关问题。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二、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4期刊登了张素华的文章《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任内的史迹》。这篇文章详细考证与介绍了毛泽东自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期间的革命活动：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出现不同意见，会议并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主持一切。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

毛泽东上任不久，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就此事攻击汪精卫“赤化”，说毛泽东长期请假不工作，却被任命为宣传部长。实质上是借此来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工作。早在国共合作伊始，这场斗争已见端倪。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就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在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那时，上海执行部的右翼国民党人叶楚伦、戴季陶等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为异己。叶楚伦等人“最恨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极力反对他们的右派活动，“遇事力争，不肯稍为迁就”，成为他们推行反动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叶楚伦等“用尽方法，把毛赶走”。再加当时毛泽东既在国民党内任职，又是中共中央局的委员和秘书，公务繁重，终因体力不支，于12月请假回湘养病。毛泽东走后，叶楚伦十分高兴，特宴请上海执行部成员，“以志庆祝”。

毛泽东虽然身体染恙，但从不要忘记所负的任务。他一回到家乡，就开始调查当地农村的社会现状，农民的生活情况等。他认识到中国的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穷有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从而开始重视农民问

题。在家乡组织农协，建立夜校，成立共产党支部和国民党区分部，在韶山地区实际上发动了一次农民运动。为此，军阀赵恒惕下了逮捕毛泽东的通缉令。毛泽东被迫于1925年8月离开家乡，9月到达广州。毛泽东在湖南的这些革命举动，国民党右派们是不无所闻的。还有，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宣传才能和组织才能。所有这些，都可说明，那时推选毛泽东当宣传部长，是事属必然，而国民党右派反对毛泽东当宣传部长，也是国民党内部左右派斗争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后，果不负众望，很快就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对此曾有过高度的评价。他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的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可以说比较地统一”了，在深入于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毛泽东到宣传部后，经过全面考察和了解，发现宣传部党报不健全；对各种重要事件的宣传不敏捷，也未尽量去做；宣传指挥系统完全缺乏；检查纠正的职能完全旷废；宣传材料的搜集和供给完全未办；几乎没有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宣传范围不普遍，尤其缺乏对农民的宣传。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宣传工作的进行和发展。为迅速改进宣传部的工作，毛泽东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

首先，建立健全宣传工作体系。毛泽东接任宣传部工作时，宣传部所管辖的范围，仅有广东一省，与其他省市党部的宣传部间均无联系，许多宣传部负责人各行其是，放弃职责，为扩大宣传范围，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实现对各省市党部宣传部的领导，加强上下级宣传部之间的联系，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纸刊物、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工作；二是坚决要求他们定期向宣传部报告工作，并接受领导。到1926年5月，全国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达到12个，中宣部收发文件千余份。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指出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积极起草宣传问题的议案。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从这次大会作出的各项工作决议来看，一项议案一般都是一个决议案，唯宣传工作通过了三个决议案。这三个决议案都是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没有的，被当时的人们看成是国民党二次大会的成就之一。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并要求各地凡能纂述书籍、小册子、编辑论说、拟就宣言和口号的党

员，都要参与宣传工作，要将宣传普遍于全国各地。

其次，从调查研究入手，重新制定宣传计划。他主持制定的宣传计划，有总计划，还有分门别类的专门计划，如图书宣传计划，民众宣传计划，党内发书计划，编纂计划等。这些计划制定的非常实在具体，方针也很明确。其中指出：反对笼统地无针对性的宣传，注意党内宣传与党外宣传有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有别；民众文化的高低层次有别；广东根据地与军阀统治的区域有别。总之，宣传计划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并作为平时的宣传标准。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毛泽东领导宣传部人员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如：为改变宣传部不供给下级党部宣传品的缺点，要求将所有各种宣传物品及时发到每一位党员手中，以提高党员政治的学识、提供行动的方策。他们事先详细调查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团体数目，海外、国内、省内、市内、各地党员人数，各地的学校、工团、军队、图书馆、阅报社及其他公私团体。在这个基础上，拟定切实可行的发放宣传品的计划。又如，在制定对民众的宣传计划时，要求调查各界和各阶层人员的情况，如商人、农民、学生、工人等；同时还要分清广东省内和省外的情况。为了宣传部对全国的宣传做到心中有数，要求调查国内外的中文日报及各种定期刊物，调查外文的定期刊物，既调查这些报刊的内容，又调查它们的发行量和读者对象。总之，调查的十分仔细，就连儿童歌曲也属调查的范围。当时，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种作法不太理解，毛泽东作了很耐心的解释。他说：“无论哪一种报纸或书籍，只要他有销路，我们就应该注意。为什么这一种书有人看？看这一种书的是些什么人？这种书在社会上将发生一些什么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全国的宣传动向了如指掌，才能了解读者的心理，宣传部也才能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掌握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十分注意看报。据周谷城先生回忆，毛泽东很有本事，不用几个星期，就可把全，中国的报纸摸的烂熟，哪一张报纸是革命的，哪一张报纸是中间派，哪一张报纸是反动的清清楚楚。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的一个职员也说，他睡前醒后看报，吃饭的时候看报，上厕所看报，坐在黄包车上看报。总之，常常是报纸不离手，一有机会就是看报，“每天，我看他总要看几十种报”。毛泽东爱看报，通过报纸了解信息和各种情况，也是他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再次，建立图书室。一般地说，一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应该有一个图书馆，而在这之前，偌大一个宣传部竟连一个材料的储存机关都没有。这说明除了革命处在初期阶段，一切都在从头做起外，主要是前几任宣传部长（从1924年

到1926年宣传部已成立两年)没有把搜集资料储藏图书,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毛泽东很注意基本建设,广泛地搜集材料,这也是他的一个好作风。他说,宣传部两年来,由于不建立宣传材料的储藏机关,以致“许多材料当时未曾收集,事后便收集不到,极为可惜”。在他的领导下,宣传部广泛搜集报纸书刊,书店买不到,就到旧书摊上去买。仅从旧书摊上就买回书籍一大批。到1926年5月图书室初具规模,有国内日报124种,国外中文报21种,外文报5种,周报及小刊物122种,中文书289种,英文书3种,此外还搜集了画报、壁报、中文杂志和外文杂志等。这在当时军阀割据,交通不便,文化不发达,而环境又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短短的时间内,能搜集这样多报刊书籍,可以想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最后,设立上海交通局。这是为扩大宣传品的发放范围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所管辖的范围,只有广东一省,其他省份均在各大小军阀手中。国民党的宣传品也只能在广东一省散发。全国国民不能及时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真相。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反革命宣传则十分猖獗,千方百计地对广东进行造谣、污蔑和中伤,说广东共产共妻,是赤色帝国主义等。毛泽东为改变这一情况,于1925年11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在上海设立交通局的设想。他认为,上海交通方便,如果搞得好的话,国民党的宣传品就可通过上海发往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军阀孙传芳虽然派人把持了上海邮政总局,专门扣压广州寄出的书报杂志,但可以通过往来于广州与上海或香港的轮船,由海员工会的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上海交通局。然后由交通局加工翻印转发各地。国民党中央认为这个意见可行,批准了毛泽东建立上海交通局的计划。随后,毛泽东便积极活动,在上海很快办起了交通局,交通局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由共产党人恽代英管理(后为沈雁冰),办事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党人。宣传工作的局面立刻得到改善,大批宣传品源源不断地被送达长江及北方各省。仅1926年2月到5月,三个半月就发送宣传品41种,22万多件,为扩大革命宣传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期间,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理论宣传。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亲自动笔写文章,在任职的7个月内,写文章近30篇。从今天来看,一位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写这么多的文章也是很少见的。他全局在胸,时刻以一个革命家的恢宏气度,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这期间,他除主编《政治周报》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治评论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

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右派的最大本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的影响》等。这些文章对指导当时中国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这期间，他还以很大的精力考察研究农民问题，并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如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地主阶级是中国一切反动的源泉等重要思想，这在当时都是很少有人论及的。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运用报刊这个强有力的工具进行宣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挥中央一级的积极性，争取中央多办报纸和刊物。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有两份机关报，一是《广州民国日报》，一是《上海民国日报》。毛泽东在提出建立上海交通局的同时，就决定创办一份周报，在广州、上海两地印刷，争取在全国发行。随后便向国民党中央建议，由政治委员会拨给经费，由宣传部负责主办，暂取名《广东周报》。1925年1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最后决议。定名《政治周报》。12月5日《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毛泽东亲任主编，提出《政治周报》的办报原则是用事实说话。这一原则体现了他历来坚持的实事求是办报方针。《政治周报》积极宣传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反帝反军阀，报道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重要消息，批判反动言论。毛泽东指出，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政治周报》每期印三万份，北方、中部、南方各一万份，“为一种特别之宣传刊物”。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改变报纸性质的事件，《上海民国日报》突然反目，做了国民党右派的喉舌，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攻击共产党，挑拨国共关系。毛泽东面对这种情况，积极采取措施，一面发表文章，声讨《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行为并宣布其为右派的报纸，一面委托沈雁冰到上海筹办新报。经毛泽东、沈雁冰的积极奔走，决定在上海开办《国民日报》，并就办报经费和人员征得了国民党中央的同意。巧在这时，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职务被免，已被蒋介石、张静江等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竟取消了这项办报经费，报纸没有办成。

第二、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力争在地方多办报。毛泽东的想法是，多一份国民党的报纸，就多一块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多一份中立的报纸就少一个攻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他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凡有国民党组织的省份，就应有自己的言论机关。有条件的省份，如党员人数多，又有人力和财力，可争取

办一份报纸，作为党的喉舌。没有条件的省份，可采用津贴当地原有报纸的方法。他说，这种方法，所费不多，收效甚大。“全国重要地点，一以 20 处计，平均每处津贴报纸一家，每家津贴 200 元，计每月共费津贴洋 4 000 元，仅抵一家党报之经费，然收效已遍全国。”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国民党中央认为切实可行，予以批准。于是他促使有条件的湖北党部办起了《楚光日报》，湖南创办了《湖南民报》，上海方面接管了国民通讯社。无条件的地区采取津贴的办法，九江的《江声日报》领取了津贴，杭州《晨报》也提出了申请。

第三，编纂国民运动丛书。编书是毛泽东十分重视的工作之一。对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进行的国民革命，究竟为什么要革命，怎么革？一些中下层的党员干部都是或明或暗。即使上层一些人物也急需一些书刊资料进行参考。然而过去的宣传部虽然编纂了一些刊物，但涉及的面很窄，数量也少，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建议，由宣传部领导编纂一套国民运动丛书，先编印民众最需要最急迫的书，然后再编印其他。这套丛书共五辑 60 册，计划每月出版 12 册，5 个月出齐。主要向人们介绍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民众运动的情况。如：关于中国方面的，有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二七惨案、五卅运动、中国农民问题等。关于国际方面的，有巴黎公社、德国大革命的意义、世界的农民运动等。还有苏俄研究，如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苏维埃制度、红军、苏俄的外交等。也有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马克思论东方革命等理论著作，还有论及妇女、犹太人、黑人等问题的。丛书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丰富。为实现这一规模宏大的宣传计划，毛泽东提出了一套改革过去宣传部编纂事业的办法，他说：“本部两年来编纂宣传刊物成绩不甚多，原因在于设置固定人员编纂”。提出由宣传部审定题目，实行征稿法。同时，根据上海为知识界聚集之地的特点，在上海设立征稿处，委任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负责征集稿件。关于所印的图书如何发行的问题，他提出在党内无价发行，党外以最低廉的价格推销于全国，以达到宣传民众的目的。还说，这套丛书，待五辑 60 册所拟题目有人撰写后，再接着编辑第六至第十辑。遗憾的是，毛泽东因为被迫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期间，特别重视对重大事件的宣传。一个重要事件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关系到革命的进退。革命政党如果抓住时机进行有效的宣传，会引导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国民革命运动。

1925 年直奉战争一起，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毛泽东抓住这一

重大事件领导并组织各个宣传部门广为宣传。他首先代表宣传部拟写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阐述直奉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目的，以及反奉的意义，斗争的策略等。同时将宣传大纲在《政治周报》公开发表，并刊印单行本二万册，还以宣传部名义发出通告，要各省市和特别区党部宣传部，迅速发交各县市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召集同志大会，详加讨论，务使人人明了其中意义，然后向人民群众作猛力的宣传。果然这次反奉宣传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说：“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与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明白认识中国军阀崩坏之迅速。在此战争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1926年9月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二次大会上的宣传报告）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等七人，候补执行委员邵之冲、沈定一等四人，还有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擅自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反对左派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反对联俄联共政策，议决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国民党党籍，国共合作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时，帝国主义拍手称快，人民群众却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严重危害国民革命前途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广州民国日报》、《中国青年》等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右派反对联俄联共的行径，指出国民党右派的这些举动，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背叛了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同帝国主义取了一致的态度。为彻底打击右派，毛泽东还将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党部及个人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汇总起来，在《政治周报》连续发表，冠以标题，加写按语，表明全国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的政治态度，从而将反对右派的空气推向了高潮，增强了民众革命的信心。

利用宣传机关捍卫国共合作的事业，同破坏国共合作的理论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自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以后，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自己的军队，统一了广东，扩大了党的组织，并开始准备北伐，以夺取全国的胜利。但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却惧怕工农参加革命，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不断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1925年夏，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诬蔑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进而用阶级仁爱说，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戴季陶小册子一出笼，右派分子如获至宝，一时间成为右派反共的理论根据，直接危害着国共合作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对此，

毛泽东认为,宣传部应负起责任,不能任违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言论到处泛滥。他于10月5日就任宣传部长,10月7日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凡违背党义的言论,必须经宣传部审查”。为了从理论上清算戴季陶主义,他先后撰文和发表演说,解释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民主主义就是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指出戴季陶等人反对阶级斗争和反对农民减租的理论,不符合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精神,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和打击危害国共合作,危害国民革命的反动言论,宣传部建立了“检阅会议”,订定办事细则,规定检阅干事各备小册记录,将每日检阅所得,于检阅会议时提出讨论,“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谬误之言论记载应拟具纠正或驳难之大纲,交由本部秘书分别处理”。

在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期内,以戴季陶小册子为旗子的孙文主义学会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以“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为标榜,反对三大政策。毛泽东于1926年3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2次会议上,以宣传部名义提出打击京、沪、等处孙文主义学会数案。说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完全为少数西山会议派反动分子所把持,中央应通告各级党部,声明该会为反动派之团体;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创办的《革命导报》,十分反动,中央应禁止流行;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章程应修改,“若为研究的团体应受宣传部指导”。这些提案,均得到会议通过。4月2日,毛泽东又根据崎岭书社假冒孙中山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子,歪曲民主主义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对冒名刊物应严加取缔”,一切刊物凡涉及总理生平言行者,必须先经中央宣传部审查,然后许可发行等建议。(1926年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2、17次会议记录)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由于他通过斗争实践锻炼,又有相当的思想文化素养,对宣传工作有一套整体的办法。他站在斗争的前列,为捍卫国共合作事业,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反动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为坚持和扩大国民革命的宣传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活动家。

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先后担任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所长、主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上述两届讲习所中,毛泽东不仅作了大量关于农

民问题的演讲,而且带领学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运干部,对北伐时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黎永泰在《毛泽东与大革命》一书中介绍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国民党注重农工运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以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其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疑者。国民党对此,一方面当对于农民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进国民运动之进行。“一大”之后,孙中山开始重视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4年初成立,部长最初为共产党员林祖涵。以后由国民党员彭素民担任。9月彭素民去世后,由国民党员李章达继任。未几辞职,后由黄居素担任代部长,不久辞职。11月,又由廖仲恺接任农民部长,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由陈公博继任。1926年1月23日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林祖涵担任七任农民部长。中共著名农民领袖彭湃及中共党员罗绮园一直担任农民部秘书,部务工作主要由彭湃、罗绮园负责。中共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与国民党在农运方面进行密切合作。首先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方面取得了出色成绩。

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26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以辅助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起初委员会由农民部全体成员以及戴季陶、谭平山、法郎光组成。1926年2月5日,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名单,国民党中常委第三次会议照准,决定改由林祖涵、甘乃光、毛泽东、谭植棠、陈公博、宋子文、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组成。农民部长林祖涵为主席。

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制定了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自耕农协会、佃农协会、雇农协会、农民自卫军、农民夜校、农民冬季学校、农民讲演团等,并决定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是中共方面促成的结果。广东区团委代秘书刘尔崧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同志首先“提出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所”。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报告也指出:“我们因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工作,开办农民运动讲

习所。”农讲所虽然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实际责任是我们同志担负”，“农运便放在党的指挥之下”。“彭湃同志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去做秘书，林伯渠当部长”。“此时党里边便组织农委，指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在农讲所中，“中共组织一个小组，每星期开会讨论一次”。张国焘在回忆中也说：“国民党中央曾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1924年7月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孙中山亲自到会发表演讲。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农民运动的目的，一方面应当使农民了解本党的主义，使之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之奋斗；另一方面也要使农民明白自己阶级的利益，起而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要求学员要做联络农民、发动农民的骨干。“要农民将来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诸君赶快去宣传联络。农民都联络了之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成功”。农民运动讲习所规定，其办所的方针是：“第一注重本党主义之解释；第二注重国民革命基础知识之灌输；第三注重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而尤注重军事训练，盖学生熟悉军事训练，一方可以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也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五届的工作分别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负责主持。黎永泰在书中说：

前五届农讲所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办好第六届农讲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农讲所办理过程中，国民党“二大”肯定农讲所的工作，对前五届农讲所的成绩给予认真总结，《农民运动报告》指出：“农民讲习所，即是农民运动的干部，领导革命的前锋。（民国）13年7月开办至今，已办了五届，毕业人数为554人。1/3为本部特派员，2/3分派各地为实际工作。”国民党“二大”决定继续农讲所工作，根据“二大”要求，国民党农民部对农讲所的工作十分重视。为了进一步办好农讲所，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林祖涵、甘乃光、毛泽东、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彭公达等出席。会议详细研究了举办第六届农讲所的问题，决定请毛泽东担任所长，聘请国共两党要员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

绮园担任各科课程教授。

毛泽东以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担任农讲所所长，给予了农讲所的工作以具体的指导。实际上，国民党“二大”刚闭幕，毛泽东便投入了农讲所的筹备工作。那时宣传部的事情也很多，他同时又在开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便把宣传部的部务工作委托沈雁冰办理。又向国民党中常委请假两周。2月22日，国民党中常委会第5次会议决议：“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是“因病”，实际是秘密往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并为农讲所的开学作准备。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13次常务会议，毛泽东出席。林伯渠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7980元，请中央设法拨给案”；决议：“交政治委员会核发。”又提出：“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决议：通过。

3月30日，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林祖涵、谭植棠、罗绮园、彭公达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提出三项议案：(1)任命高语罕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2)变更在广西招生的办法。因前次会议确定在广西招收学员40名，其中30名由梧州党部所主办之宣传员养成所选派，旅费均自给。昨天接到李血泪、杨文韶的报告，据称：宣传员养成所学生系广西各县平均派送，而广西农民运动宜从梧州附近数县着手，请将前次议决略为变更。(3)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毛泽东上述三个提案均得到通过。

第六届农讲所拟定了学员入学的严格条件：“学生须经过严格考试，具备下列四项资格：(1)决心于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以上，28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勇敢奋斗精神。”中共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地方组织，按照招生要求选入优秀分子入学，保证了学员政治质量。3月末，各省学生陆续到广州。4月，举行入学考试，确定所址于番禺学宫，依照预算从事办学。番禺学宫原为第二军官学校校址（今中山四路42号）。在2月8日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第3次常务会议上，决定拨番禺宫供农讲所使用，第二军官学校迁出。5月3日，农讲所正式开学，收录学生327人，分布全国20个省市，是历届规模中最大的。5月3日虽然开学，但因课堂为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为会场，因此至5月15日才开始上课。全部授课为13个星期

252 个小时，中间另有两星期为赴海丰实习的时间。

农讲所共开课程 25 门，集中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尤以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为重点。这些课程是：《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状况》、《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苏俄状况》、《中国史概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法律常识》、《统计学》、《农业常识》、《农村合作概要》、《各国革命史》、《革命画》、《革命歌》等。毛泽东负责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程。毛泽东聘请共产党人周恩来、肖楚女、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于树德、罗绮园等分别担任有关课程的教员，使各门课程的讲授水平得以大大提高。此外，毛泽东还邀请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到农讲所讲演，扩大学员对革命知识和革命形势的了解。

为了加强学员对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和农讲所专职教员肖楚女等多方采买和编印各种重要书刊，如《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苏俄之农业政策》、《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宣言》等 30 种，每个学员发一套，作为课外研究之用。为了使课外研究卓有成效，毛泽东和肖楚女亲自进行指导。他们列出阅读书目中的重点，提出问题，然后由学员认真阅读，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教师审阅。毛泽东和肖楚女从答案中选出数份加以改正，然后将答案缮写成大字报张贴在课堂的墙壁上，将学员所有答卷发还，由学员照墙壁上的答案自行改正。这种办法，使学员的理论研究得益不少。毛泽东对肖楚女的教学工作高度称赞。几十年后，他还说，肖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讲习所教育，主要教员靠他。他是武汉茶馆里跑堂的，能写漂亮的文章。农民讲习所，我们就是拿小册子给人家看。

农讲所除了讲授上述各种课程外，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培养学员调查研究的本领，让学员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农村状况，提高阶级分析的能力。《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一书的作者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在农讲所，除了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以外，更主要的是指导和组织学员进行农村调查，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训练学员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认识农村阶级关系，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为此，农讲所成立了“农民问题研究会”，根据学员所在地区，分别组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两广（广东和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浙（江苏和浙江）、安徽、四川、云贵（云南和贵州）、奉直（辽宁和河北）、山东、豫陕（河南和陕西）、3个特区（热河、察哈尔、绥远）。每个研究会推选干事一人，书记一至八人主持会务。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二次，由教务主任陆沉负责指导。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农村实际材料，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为研究会拟出了36个调查项目：1. 租率。2. 主佃的关系。3. 抗租减租平糶等风潮。4. 利率。5. 拖欠逼帐及烂帐等情形。6. 田赋。7. 抗粮情形。8. 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9.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 地主的来源。11. 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12. 工价。13. 失业情形。14. 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 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 地方政治组织。17. 地方政治情形。18. 会党及土匪。19. 团防情形。20. 教育状况。21. 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 兵祸及其影响。23. 天灾及其影响。24. 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 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 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 妇女的地位。28. 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 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 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 农村组织状况。32. 地质之肥磽。33. 宗教之信仰状况。34. 度量衡。35. 民歌。36. 成语。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研究会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搜集农村各方面的材料，集体讨论分析，从而使学员们加深了对农村中各阶级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认识，学到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广西梧州地区的学员，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研究如何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把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梧州地区的反动民团和地主采取各种手段欺骗农民群众，成立伪县农会，破坏农民运动的情况摆出来，在研究会内进行讨论分析研究，拟出了一个斗争方案，即：首先是揭露反动民团和地主的欺骗阴谋，唤醒群众的觉悟，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乡农民协会，逐步扩大，成立区农民协会，成立县农民协会。这样就有力量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这个方案经过研究会集体讨论，又补充了一些更加符合梧州地区实际情况的意见。通过这些活动，学员们毕业后回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心中就有了数，有了思想准备。

毛泽东对学员们调查研究的成果极为重视，亲自给学员们修改调查报告，并把一部分调查报告和调查材料，编进《农民问题丛刊》中出版，作为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材料。当时，农讲所的经费很紧张，毛泽东为了出版这些

调查资料，千方百计地节约不必要的开支，以保证这些资料的出版。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中介绍了关于农民问题的材料来源，强调了调查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说到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趋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复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的炮火声中，毛泽东又主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与大革命》一书中写道：

2月13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结束，带着湖南农民运动的宝贵经验回到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投入筹办和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活动。

1926年11月，在毛泽东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中，便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首先是准备在武昌成立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因为湘鄂赣三省是北伐战争中新开辟的省份，三省的反动军阀虽然打倒，但是军阀的基础封建势力尚没有铲除，革命的民众基础急待培植。扩大民众的组织，尤其是扩大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成为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了满足革命的需要，必须培养一批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人员；而且，为了有力地指导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必须有专门人员切实地搜集农民问题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提出如何具体实施农工政府的办法，如何领导农民起来，向敌人进攻。凡此种种，要求着重于农民运动人员的培养。这便是毛泽东要在武昌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因。

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1927年3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记载：“创办农所，各方面已感需要，而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毛泽东亲赴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湖南省党部建议，在武昌成立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设筹备员八人。湖南省党部推荐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为

筹备员，湖北推荐张眉宣、陈荫林、李汉俊为筹备员，江西推荐龚式农、王礼锡为筹备员。1月16日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里。

农讲所筹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蒋介石在江西摧残工农运动，取消农讲所计划，江西学生不能来武昌入学，但筹备处仍加紧工作，不稍松懈。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由广州迁到武汉，并开始办公。中央党部第76次会议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通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章，决定农讲所第一期学习期限为四个月；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农讲所常务委员。第一期学员由原定的400人增加为600名；农讲所费用，每月5100元，从2月份起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加的200名学员经费俟预算后，仍请中央拨给。由于新增豫、直、陕、鲁等地学生不能如期入学，确定学生先开课，后举行开学典礼。

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上课。4月4日，学员陆续到齐，计有来自17个省的学员739人，以湘鄂赣三省最多，河南、安徽次之。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百余人到会祝贺。同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开学宣言。宣言指出：“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第二次北伐誓师。”“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要继续二次北伐，扩大农村革命”。“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和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农讲所适应北伐的军事要求，特别注重学员的军事训练，注意把学员培养成农民武装的骨干。《规约》规定：“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每个学员都“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为此，农讲所在教务处和事务处之外，设立训练处，并成立训练委员会，与教务委员会并立。又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负责学员军事训练，将全体学员分为四队和一个特别训练队，聘请军事教官进行严格军事操演。学员过军队式的正规军事生活，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应付突然事件发生，军事训练时间每天增至四小时。

中央农民讲习所的课程，以强化学员“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为目的，向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毛泽东亲自兼任《农民问题》、《农民教育》等课程，以聘请李达主讲《社会发展史》和《辩证法》等课程。农讲所专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会，由教职员与学员合组而成，主要将农民问题中的重大问题，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民教育问题等提出来，实行分组讨论，力求在政治经济各种理论的讲授之外，使学员在教员的带领下，对实际问题的内容与解决方法有充分的研究。此外，还编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学习使用。毛泽东的《中国佃农举例》，便刊印在丛书之中。

农讲所的学员经过三个多月的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实际战斗，锻炼成了农运工作的骨干和军事人才。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向全体学员颁发刻有“农民革命”的铜质五星证章。之后学员陆续离所回到本省。这些学员在大革命后期和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革命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进行的。他以极大的毅力推进农讲所的工作，在反革命空气一日浓似一日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民运动。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在武汉对农运的反感日益严重时，毛泽东“却在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他是一心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第四节 考察农民运动，总结农民理论

毛泽东回忆说：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第二年春初我到达武汉时，一个省际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1927年4、5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有500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到了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一、考察农民运动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写作组撰写了《毛泽东同志考察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载《韶山红日照千秋》)一文,对毛泽东考察湖南五县农民运动、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过作了介绍:

1926年上半年,湖南省虽然仍旧处于反动军阀的统治下,但是由于韶山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湘南、湘中沿铁路各县的农民运动都秘密开展起来。农会组织发展到28个县,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达20万人。7月,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大举入湘。从此,湖南农民运动由秘密活动的组织时期进入公开活动的革命时期。农民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就击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10万主力军,攻占了湖南全省。北伐战争的胜利是革命武装与工农群众力量相结合的胜利。北伐战争的胜利,也为湖南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扫清了道路。9月,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40万;1927年1月,剧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湖南农民全数的一半。农会组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湖南农民在农村中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他们用马克思所说的“平民的手段”,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秩序彻底打乱。

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一切反动派迅速猬集起来,对农民运动进行疯狂反扑。地主豪绅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狂叫要“取缔农民运动”。一小撮国民党右派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则采取狡猾的手法,打着关心革命的幌子,攻击搞农民运动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责难农运“妨碍农业生产”,“妨碍税收”,“影响北伐”,叫嚷“农会虽然要办,但必须加以限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适应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右派的需要,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炮制了一个束缚农民手脚和压制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他规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能“干涉行政”,“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只能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妄图取消农民政权。他还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许“收缴民团枪械”,妄图取消农民武装。他跟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无耻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点名攻击湖南农民运动“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

的行动”。陈独秀的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凶焰，严重地破坏了关系革命全局的农民运动的胜利发展。

为了击退党内外攻击、责难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逆流，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担任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决定于1926年底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同时，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于12月1日同时在长沙开幕。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后即发出专电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电称：“敝会已于东日（即1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于12月17日由武汉回到长沙。代表们闻讯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两个代表大会决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大会除参加两个大会的300多代表外，旁听的人极多，连楼上都挤得水泄不通。据这天的《大会日刊》报道，毛泽东在畅谈了工农革命的大好形势后，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8日，两个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又做了革命联合战线的演讲。据第二天的《湖南民报》记载，毛泽东在演讲中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严厉指出：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毛泽东还提醒大家注意：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毛泽东的指示，使代表们进一步认识到同军阀、地主阶级作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通过了40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革命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解决土地问题。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全省农民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以击退反革命逆流，推翻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将代表们留下，办了个短期训练班，亲自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由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

1月4日黎明，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开始了他的

伟大的考察行程。毛泽东考察五县农运，是分两段进行的：第一段是从长沙出发到湘潭、湘乡、衡山。4日当天，毛泽东到达湘潭县城，他在湘潭县境考察的重点是韶山。他由县城经银田寺、清溪寺进入韶山冲。从5日到9日在韶山考察。9日离开韶山，下午到达湘乡县棠佳阁，10日抵湘乡县城。14日，毛泽东从湘乡出发，经肖家冲，到了衡山县的白果、福田铺、世上冲，历时好几天，最后到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回长沙，将考察三县的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详细报告，并在党校、团校作了报告。第二段是考察醴陵、长沙两县。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到醴陵。2月1日，步行25里到南乡东富寺。2日，离开东富寺，经县城、龙凤庵到渌口；2月4日，到长沙县考察。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考察醴陵、长沙的情况又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报告。

毛泽东到各地考察，受到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民们奔走相告，集合起来，举着犁头红旗，列队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毛泽东。各地召开的欢迎会，场面十分热烈。

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对于农民运动给予高度评价，热情支持。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痛斥了党内外一些人对于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在韶山、衡山等地，毛泽东历数了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中的丰功伟绩，指出“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在衡山，他特别赞扬白果农民敢于在埋赵恒惕胞衣的地方闹革命。在长沙，他向党校作报告时痛斥了“糟得很”的谬论，指出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革命的反革命理论。毛泽东对于妇女的翻身解放倍加赞扬。在韶山毛震公祠，毛泽东请革命妇女吃饭坐头席；在白果，毛泽东称赞革命妇女灭了族尊老爷的威风的革命行动。在衡山，在醴陵，毛泽东还热情地赞扬农民自己动手打掉菩萨的革命行动。毛泽东在各地一再告诫革命的同志，一定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拥护农民革命。醴陵县有个农会负责人，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限制农民的革命行动，私自放走被农民关进监狱的土豪劣绅。毛泽东批评他是“好好先生”，不懂得革命，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进行了教育。毛泽东还严肃批评了有些县政府、县农会徇地主之情拘捕下级农会干部的错误。他发现衡山、湘乡两县的监狱里关了许多农会委员长和委员，指出：“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并且多次阐明“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真理。同时还指出农协委员中要有中农的代表，要团结这部分劳动农民，打倒共同的敌人。

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衡山等地

干部汇报了农会在乡村独裁一切,实现了革命农民专政的情况。毛泽东同表扬他们做得好,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并强调农会一定要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毛泽东了解到衡山贫农在农会中占绝对优势时高兴地指出:“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号召农民“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他指示湘乡的同志,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并迅速发展梭镖队,使每个青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名叫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会势盛时,他伪装开明,巴结农会。乡农会挂牌那天,他假惺惺地又送猪又送谷,还送了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字大匾。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立即教育到会的同志,要提防土豪劣绅表面上投降,实际上暗中同农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劲同他们作政治斗争;要大力发展梭镖队,以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反抗。

毛泽东每到一处,总是教育农运干部要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在韶山,在醴陵,他以当地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农民和农民受苦受难的实例,教育贫苦农民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他还以几个月内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的事实,教育农民所谓“八字走运”、“坟山贯气”是没有什么的事,只是依靠共产党和农会的领导,坚持斗争,才能解放自己。在醴陵东富寺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把农会办好,向土豪劣绅、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为了启发大家,毛泽东讲了两个生动的比喻。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说: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可是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固以后,用羊角耙也挖不进。单纱很容易断,可是纱多了,合成一股,系上一块大石头也断不了。这两个比喻告诉农民一个伟大的真理:团结起来力量大。

在考察期间,毛泽东还对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培训骨干、改进干部作风、建立特别法庭、农民诸禁、革命的长期性等问题都作了指示,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两次向中共湖南区委作报告当中,都指出了并帮助纠正了区委在农运政策上和作法上的一些错误,中共湖南区委在《1927年1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对于过去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作了自我批评,认识到这些做法“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以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2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胜利结束。毛泽东考察五县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胜利前进。毛泽东亲自考察过的五县农民运动，更进入了新的高潮。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带着考察农民运动的资料，离开长沙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16日，毛泽东在这里给党中央写了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大纲，说明三、四日内将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给党中央，并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响导》上刊载。接着，毛泽东便满怀激情地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这篇文献中，毛泽东热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奇勋伟绩，彻底批判了党内外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制定了我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并着重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是我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

《考察报告》写出后，受到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3月5日起，在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期合刊和三十九期上全文刊载了这一光辉著作。而原定全文登载《考察报告》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响导》，却只是在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上刊登了一部分，然后就被当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的陈独秀分子彭述之勒令停止继续刊登。但是真理是锁不住的。毛泽东在他主办的设在武昌黄巷（今红巷）13号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亲自向来自全国各省的800名学员系统地、详尽地讲授了《考察报告》的内容，使学员们受到一次生动而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3月18日，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召开。毛泽东又在这个大会上做了“湖南农民状况”的报告，给到会代表巨大鼓舞。4月，我党领导的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考察报告》的单行本，发行全国。接着，汉口的《中央日报》副刊和《湖南民报》也都发表了这篇伟大著作。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冲破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百般阻挠和压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武装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抵制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行径，推动着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更加猛烈地向前发展。

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毛泽东指示和《考察报告》的精神，发出了《省字第六四二号训令》，驳斥了地主豪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攻击，指出有些地方要开展什么“洗会运动”，“打击失业农民”，“这真是想要革命，却开倒车，并且不知不觉地中了反动派的圈套。”《训令》规定不得“打击失业农民”，“区乡协会，失业农民可当执委”；“罚款游团等事，如豪劣罪有应得，不得强抑”；

“各地土豪劣绅如向农民进攻，须坚决地对他们施以打击”。这个《训令》的下达，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考察后，谢觉哉、罗学瓚分别在长沙、醴陵开办了农运讲习所，何叔衡、徐特立主持的湘江中学也开设了农运训练班。湘潭、湘乡、衡山、宁乡都建立了农讲所或训练班。这些培训农运干部的场所，都用毛泽东的《考察报告》作教材，为农运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二、总结农民理论

毛泽东在考察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以及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民问题理论。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6期刊登的文章《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研究》说：

从1925年冬到1926年秋，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讲演。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批理论成果，对当时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其基本观点如下：

（一）分析了农村各阶级及其革命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曾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中共“三大”和“四大”的决议也都提到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点仍在城市，对于农民的革命性仍然缺少系统的分析与研究。陈独秀甚至武断地说：“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之间无明显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从孙中山开始就否认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认为中国农村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阶级之分。戴季陶等国民党新右派，则竭力鼓吹阶级调和，抹煞农村阶级斗争。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却是从阶级分析入手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中，毛泽东根据土地、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情况，把农村人口分为八种，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大地主阶级从重租、高利贷、重捐、剥削剩余劳动和包缴预征田赋等方式严重剥削半自耕农以下五种农民，“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所

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堡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他分析了小地主一面剥削穷苦农民,一面又受大地主军阀压迫的情况,指出,他们对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文章以生动的语言分析了自耕农指望发财而又每况愈下的不满心态以及对革命所持的怀疑、中立、观望的态度,强调,一旦革命潮流高涨看见胜利曙光时,他们“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最后,毛泽东指出,半自耕农、半益农和贫农“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具有相当的革命性,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在这种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农民中的正确方针,这就是团结真正的朋友——自耕农以下的五种人;打击真正的敌人——大地主阶级;而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其右翼可能是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朋友。

到了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进一步简化了农村阶级分类,把半自耕农、半益农和贫农都划为贫农,把农村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种,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农村阶级的划分为党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 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毛泽东1926年5月的《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和同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

他认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农民的实际地位决定的:首先,从人数上看,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80%以上,有三万万二千万;而在英国,农民只占人口总数的22%,日本占70%,所以产业发展国与不发展国的农民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能否认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其次,从农民的革命力量来说,工人仅有二百万人,现在组织起来的也只有几十万人,而农民则满山遍野。义和团、洪秀全起义以及广东的平英团都曾显赫一时,就因人数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而他们的失败,主要是“没有主义和组织”。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若无“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成功的”。毛泽东通过中外对比和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之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由此可知,不做实际民众的运动,则不能得到人民之同意和拥护,这样是一定要失败,我们宜注意。”第三,从社会关系上看,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其他阶级利益

相关。若是农民问题不解决，极端穷困，无力生产，则工厂得不到好原料，产品也无好市场，“工场亦将倒闭，工人尚有加资减时之望？”所以，工人的政治经济问题与农民关系极大。同样，农民若无力生产，商人购买难，销售也难。再者，农民问题不解决，学生和士兵都有失业之忧，没有出路。于是，毛泽东说：“故国民革命的大部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的重要，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第四，从革命目标上看，中国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基础就在农村。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剥削与压迫十之八九压在中国农民的头上。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销售洋货，收购原材料、借款、勒索赔款等方式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农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之八九是代表农民叫出来的。”中国的军阀则以田赋、附加税、捐派等直接剥削和厘金、盐税等间接剥削来压榨农民。他们是乡村封建地主的首领，而地主阶级则是军阀统治的阶级基础。因而，农民的唯一出路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最后，毛泽东又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农民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三）提出了领导农民革命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首先，“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毛泽东认为，应该十分重视农村工作，“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他十分细致而精采地描绘了接近农民、引导农民的方法：“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需要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贫苦农民群众的无限深情，也正是这种情绪使他的思想始终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使他能够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成为中国历史上领导农民斗争的最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批评了那种认为农民散漫，无知识，无力量的论调，指出农民是受剥削阶级，他们无余钱，也无余时，故而目不识丁，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党要满腔热情的进行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工作。而教育农民的前提是组织农民，“没有

农民协会，便没有农民教育”。到1927年春，毛泽东总结说：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是“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

其次，必须建立农民的政权。毛泽东以政权问题为核心，深刻阐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与特征。他说：“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他认为，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性质不同。工人阶级目前争所取的集合结社自由，减时加工资斗争，“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毛泽东又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强调了农民运动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大革命时期，建立农民政权的形式就是农民协会。毛泽东对当时湖南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以及农会所产生的作用兴奋不已，说：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大力支持农民的革命专政，主张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打倒一切绅权。他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他热情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农民群众所掀起的革命热潮。

第三，毛泽东认为，要取得农民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必须建立农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武装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枝建立农民武装常备队；二是大力发展梭镖队。“须使农民有足以保卫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保障”。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实际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政党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以贫农为主体的革命民众，拿起武器，采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一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初步认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成果。这一思想还

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包含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思想胚胎。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石。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是后来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他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起点。

夏战军在《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政权思想》一文中提出：

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蓬勃兴起。地主豪绅利用手中政权疯狂反扑。农民与地主展开了生死搏斗。11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农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及时提出了发动农民夺取乡村政权的任务。可是，陈独秀主持汉口特别会议，制定了压制农运，以换取蒋介石向左的错误方针。毛泽东亲自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写下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报告》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坚决支持了广大农民夺取乡村政权的革命行动，初步解决了关于农民革命政权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这一思想，在他不久后主持中央农委作出的《农民政权之决议案》和促使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农民宣言》中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在上述文献和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初步形成的关于农民革命政权的理论，主要内容是：

（一）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直接夺取乡村政权

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应经过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是组织时期。无产阶级应将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组织在农会里”，造成打倒地主阶级的强大革命阵营。农民有了强大的组织，援助北伐军打倒上层军阀政权之后，应即转入第二时期（农村大革命时期），向乡村土豪劣绅发动猛烈进攻，直接夺取乡村政权。并指出，农民夺取乡村政权的途径，是采用暴力手段，打倒土豪劣绅。他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权力”。所以，农民必须用革命“暴动”的方式，采取“暴烈的行动”，“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权力”，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团（缺一字）、团防局等）完全消灭，”代之以新生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

（二）一切权力归农会

毛泽东总结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解决了关于农村大革命时期新生的乡村临时革命政权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关于乡村临时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提出，在“农民革命阶段，政权集中于农民协会。”又说：“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这就明确肯定“农民协会”就是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就是农村大革命时期乡村临时政权机关。农民协会转变成乡村临时革命政权，实现了列宁关于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中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的设想。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革命农民的伟大创举，比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关于将农民协会转变为苏维埃的指示早了近半年。

关于农民协会的性质、职能和阶级路线问题。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农民协会是国民政府的临时基层政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贫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和其他革命分子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革命专政。其职能是，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一切反革命；保护和争取农民的阶级利益；改造旧乡村，建设新乡村。毛泽东总结农民革命专政的经验，肯定了农民协会在农村大革命时期所实行的实际阶级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和中小地主，打倒土豪劣绅、不法地主。

关于农民武装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认为农民武装是农民协会临时革命政权的支柱。他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两条途径，即：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枝建立农民武装常备队；同时大力发展梭镖队（非常备队）。

关于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夺取乡村政权的大革命时期，必须坚决打击、严厉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将农民协会的权威树起来。不这样，就不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他总结农民革命专政的经验，提出了革命群众运动与专门机构相结合的方法和对地主分子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的土豪劣绅，实行革命群众专政。对民愤大，罪行重的土豪劣绅，由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治罪。毛泽东提出，对地主应采取“一般不杀”的政策。但对于那些罪恶昭彰、血债累累的大土豪、大劣绅，必须坚决镇压。

毛泽东在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对农民革命政权的秘密领导；大量吸收农运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以扩大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势力；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整顿农会纪律等政策和策略。

（三）实现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

毛泽东认为，经过农村大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之后，应即转入第三时期，

“建立在国民政府系统下的乡村政府”。他认为，农民夺取乡村政权之后，只有结束革命恐怖，建立革命秩序，才能“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农村中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也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召开“省民会议、县民会议”。按毛泽东的主张，建立农民乡村自治机关的途径是：在临时革命政权——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召集乡村中一切反封建阶级的乡民大会，民选乡村自治机关。农民乡村自治机关是“在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的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是以贫农为领导，由“贫农与中农掌握”，联合“一般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对“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的专政。农民乡村自治机关的组织形式，是乡民代表大会制。其职能是：“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镇压“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

（四）自下而上，建设全国民主政治

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区乡农民革命政权是全国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因此，建立乡村农民自治机关只是建设全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进而“参加县政府、省政府、全国政治”，自下而上对各级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建设全国民主政治。农民参加县政治的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使县政问题皆由县长与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民众团体开会议解决”；第二步“促县政府改民选委员制”，即召开县民会议，选举产生县政府委员会，进而促成省民会议、国民会议，实现全国政治民主化。

（五）解决土地问题，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基础

毛泽东主张，农村夺取乡村政权以后，应“立即”着手解决土地问题，以巩固农民革命政权的基础。他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①废除地主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农民获得解放；②增加生产；③保护革命”。他认为，“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如不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农民将不会拥护革命至于最后的成功”，革命必然失败。毛泽东又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步骤和办法：第一步“是政治的没收，即先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的土地”；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没收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具体来说，“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要没收”。他认为，当时一般省区应先实行第一步，但“就湖南的状况，用政治没收的办法是不够的”，必须实行第二步，即没收一切出租土地。他主张国民政府应制定出适于一般情况的土地法，又须颁订适应湖南的单行法规。到

有四五省如同湖南那样，则发布全部解决土地问题的法令。在党的“五大”，毛泽东又提出了“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的提案。可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压制，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这些正确思想主张未能实现。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节 秋收起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行分配土地的政策，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

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俄国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政策，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3年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

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7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

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师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一、在“八七”会议上

杨超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史》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揭示了毛泽东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尖锐对立，发掘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原因。现摘录如下：

“八七”会议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序幕。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要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自动放弃领导权的错误；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实行土地革命来获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压制农民运动的错误；要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错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提出，既是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理论起点。

1. 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痛定思痛，在“八七”会议上，代表们纷纷发言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会上就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枪杆子问

题、党的建设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发言的第一点就是批判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领导权的错误。毛泽东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毛泽东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要害。陈独秀奉行“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应当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民主革命胜利后，“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在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既不是去领导革命，也不是去夺取政权，仅仅是去“帮助民主革命”。既然如此，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就用不着去争夺领导权，去作房子的“主人”了。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这个统一战线的“房子”已经倒塌，中国民主革命的“房子”正在等着它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当仁不让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去作房子的“主人”。这就是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也是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经验教训。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决定了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从此，便以领导者的崭新姿态去谱写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2. 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必须有农民这支革命的同盟军参加革命，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把他们从封建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农民投身革命的重要条件。所以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封建所有制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但长期占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职务的陈独秀，对农民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先是不重视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兴起后，又压制农民运动。在“八七”会议上，在就农民问题的发言中，毛泽东首先批判了陈独秀压制农民运动的错误。1926年2月在陈独秀主持下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这个决议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限制农民运动。如规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口号”、“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等。毛泽东认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要革命，而上层的党却不革命，这是不应有的反常情况。接着，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压制党内正确意见的错误行为。1927年1月，为了抵制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了反驳党内外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经过湖南的实地考察，提出了对待农民运动的正确主张，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虽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却

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结果，“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最后，毛泽东在发言中气愤地揭露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他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事实正是如此。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特别中央会议，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占了统治地位，由限制群众革命到反对群众革命。早在1926年10月，陈独秀就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要他暂时不要加强土地运动。共产国际认为，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农民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而如果一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然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因为当时参加北伐的革命军主要是由军阀队伍演变而来的，蒋介石、唐生智队伍中的大多数军官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必然反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由于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因而非常看重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就转变了态度，在北伐战争中由支持农民运动到限制农民运动；最后到反对农民运动。1927年5月长沙许克祥叛变后，斯大林还指示说，为了拉着国民党及其军队，目前宁可“反对没收和平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也不能失去同盟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汉口的特别中央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反左的要求。他认为，凡是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的行为都是左，都必须坚决反掉。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实际上和买办地主、军阀站在一起，肆意诬蔑、压制农民运动，从而给许克祥在长沙制造反革命事件提供了机会。这样的指导，这样的行动，难怪毛泽东要批判说，“实在是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了。

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革命阵营中的投降主义路线压制农民运动，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强大的同盟军，在反革命进攻面前败下阵来。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要想掌握革命领导权，要想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以夺取最后胜利，必须坚决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特别是土地要求；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使农民成为强大的革命同盟军，这是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表明中国革命将以土地革命为重要内容进入一个新阶段。

3. 牢牢掌握枪杆子。实行暴力革命但自己却没有军事力量，最后在反革命暴力面前惨败，这是大革命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最惨痛教训。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不抓枪杆子的错误，毛泽东批判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这里，毛泽东发言中的“做军事运动”就是指抓枪

杆子,建立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建立自己的军队有很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行动。蒋介石等新军阀更是明了枪杆子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作用,不择手段地扩充军队、夺取军队领导权。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正是由于成功地夺取了军队领导权,并凭借他所掌握的反动武装才敢于背叛革命,最后击败共产党。可见,在掌握军队的问题上,陈独秀既不如孙中山,也不如蒋介石。陈独秀认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是参与“帮助”革命,有什么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呢?同时,陈独秀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认识不清,也就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认识不清,因而对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背叛革命,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蒋介石曾经表现出非常革命的样子,但是陈独秀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背叛革命,成了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因此,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在与国民党的联合过程中,白白放弃了几次武装工农的机会。“在黄埔时有训练800名共产党人的机会,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决心,只接受了短期训练而没有得到武装;广宁事件失去了扩充工农武装的机会;再次东征,蒋介石尚未反动,提出一个组织农军出东江的计划,共产党人也没有决心做;在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各部都迅猛扩大,而共产党员直接指挥的军队却因陈独秀的限制而发展很慢;北方在冯玉祥之下,共产党人可以得到武装工农可是他们不要;直到夏斗寅叛变时,工人可以得到枪支并且是得到一些,可是没有再扩大,结果反而自动地缴了械”。直到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陈独秀对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身上。后来汪精卫反动面目日益暴露,才想到武装工农问题,但已来不及了。

在武装工农问题上,共产国际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他们过高估计国民党的作用,过低估计共产党的作用,认为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是不必要的。在大革命中,他们先是谋求联合吴佩孚、陈炯明,后来是孙中山。在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他们着重谋求与蒋介石的军事联合,根本没有想过帮助共产党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同时,他们认为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将有损于与国民党军队的联合。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应该仅限于去做一些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一切手段使国共合作军队革命化,而不必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发表演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

一。”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是一致的，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斯大林当时讲的“武装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而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绝大部分掌握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中，并且很快变质成为反革命武装力量。直到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斯大林还坚持认为，用建立工农红军的办法代替旧军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改造旧军队。后来汪精卫反动面目逐渐明朗，旧军队完全失去了改造的可能，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才清醒过来，指示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建立绝对可靠的军队。但为时已晚，已没有实现的条件了。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还针对那种对武装斗争不坚决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共产党虽已注意到工农武装的重要性，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毛泽东要求“八七”紧急会议注意工农武装的问题，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武装工农，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到底有多重要呢？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它的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凡是要夺取政权，都必须凭借武力；统治阶级要维持政权，同样少不了武装力量。有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可以夺得政权；没有武装力量，有了政权也保持不住。毛泽东的名言，也是对大革命教训的总结。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上犯了错误，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武装工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即手中没有一支由共产党直接创立和掌握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大革命必败无疑。因此，今后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凭借这支力量去开展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此之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已打响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革命军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是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起点。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这就是：在中国，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创立和指挥的工农武装力量来进行武装斗争，最后才能夺取全国政权。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工农武装斗争，中国民主革命就不会胜利。

二、发动起义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载《红日照万代》)一文介绍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的具体过程:

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肩负着党中央托付的重任,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开始领导和组织秋收起义的工作。沈家大屋是长沙北门外喜鹊桥边的一座院落,宽敞僻静。湖南省委机关就设在这里。当天,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了省委常委,讨论并制订了秋收起义计划。

在省委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讨论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使大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关于土地问题,大家认为:既不能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使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需要得不到满足,也不能没收包括自耕农在内的所有的土地,实行土地国有,而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关于暴动要不要军队帮助的问题,大家认为:必须有军队的帮助,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当前应以主要的精力注意军事行动,否则终归要失败。关于以谁的名义号召秋收暴动问题,大家认为:既不能继续打出国民党的招牌,也不能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暴动。关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问题,大家认为:暂时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能建立过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军阀装璜门面的什么“民选革命政府”,只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关于暴动的规模和地区问题,大家认为:为了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敌人,不能发动全省规模的暴动,只宜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和岳州的湘中地区组织暴动。

会上确定建立秋收暴动领导机关,一个是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另一个是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会议对于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也作了讨论,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暴动,16日长沙起义。

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离开长沙,经株洲、醴陵去安源组织武装力量。

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张家湾,在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第七分校(也是安源路矿工人夜校),主持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安源会议。

安源会议上,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和决定

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的初步计划。毛泽东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挽救革命，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动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鼓舞。接着他又讲述了抓枪杆子、坚持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还告诉大家，中央原计划从叶挺军队调两个团的人作秋收起义的主力军，现在他们已经绕道闽西，不可能来了。起义只能用湘赣边界的几支武装力量。

在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方面武装的负责人王新亚汇报了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安福、莲花等几支地方武装的情况以后，会议对暴动计划和工农革命军的组建问题作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亲自把我党领导下的分散在湘赣边界的几支武装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此，党就有了自己独立领导的以“工农革命”命名的军队，抛弃了过去的“国民革命军”的名义。

这支工农革命军下辖三个团，当时分处在修水、铜鼓、安源三地。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三个团的情况：

第一团由驻扎在修水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组成。全团1 000多人。第一团装备较完整，武器除步枪、手榴弹外，还有机枪，迫击炮。

武昌警卫团原是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领导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团长是卢德铭同志。1927年8月初，警卫团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开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追赶不及，便进驻修水城待命。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农民自卫军，也是由于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进驻修水的。

第二团由在我党领导下的安源工人纠察队和安源矿警队以及萍乡、醴陵、衡山、安福、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全团约1 000多人。

第三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武昌警卫团拨出的一个营合编而成，全团1 000多人。他们也是由于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进驻铜鼓的。

三个团的全部兵力合计5 000多人。

起义部队总指挥为卢德铭，师长为余洒渡（后叛变），副师长为余贲民。师部设在修水，直接指挥第一团。

秋收暴动的进军路线定为：第一团从修水出发直取长寿街，进攻平江；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取萍乡、醴陵后，向浏阳集中；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取道东门，与第二团合攻浏阳。各路取胜后，以长沙工人为内应，相机夺取长沙。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从安源出发到铜鼓前线去领导起义。9月上旬的一

天，毛委员手拿雨伞，脚穿草鞋，和潘心源行走在去铜鼓的小路上。在经过张家坊时，团防局的岗哨扣留了他们。在押送浏阳途中，毛泽东巧妙地甩开了敌人。9月10日，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县城肖家祠——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所在地。肖家祠是一座古老的祠堂，座落在浞水河南岸。这天，院子里正在召开士兵大会，毛委员来到院子门口，递了一个纸条给守卫战士。团部的人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着“毛泽东”三个字，大家顿时欢腾起来，顾不上开会，蜂拥而出，迎接毛委员。毛委员一到肖家祠，就下连队看望战士。他亲切地告诉他们就要举行秋收起义；他检查战士们的枪支，拉开枪栓，看看有没有擦油；又关心地询问战士们身体好不好。他热情地向大家讲革命道理，讲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9月10日，正值中秋节，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会餐，欢渡佳节。会餐后，同部队领导人进一步讨论了秋收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

在修水城里，也召开了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成立。中国第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军旗在初秋的晴空高高飘扬。战士们戴着红臂章，一面加紧战斗准备，一面欢快地歌唱：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暴动。

我们牺牲，我们向前进……

1927年9月9日，伟大的秋收起义开始了。湘赣边界各地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暴动！暴动！暴动！”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土豪劣绅！”

起义军举起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9月9日这天，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按计划破坏了岳阳至长沙、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

这天，驻在修水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第二天，攻占了平江龙门厂。11日，继续进军。师长余洒渡将仓促收编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的队伍作为前锋。邱国轩与敌人勾结，突然叛变，掉转枪口，袭击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这个营被打散了。正在龙门厂的师部和一、三营得知消息后，立即折回平浏边界，沿山行进。

9月11日凌晨，第二团兵分两路直扑萍乡，将萍乡城团团围住，强攻不克后，决定改攻老关。当天，攻占了老关。12日，沿株萍铁路乘胜向醴陵进军。下午，兵分三路英勇地攻入醴陵城内，俘敌100多名，缴枪七八十支，并从监狱里救出革命同志和群众几百人。第二天，成立了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商会都恢复了。全城红旗招展，人心欢腾。第三天，得知敌人从四面包围过来，二团立即撤出醴陵，折回老关，向北攻打浏阳。15日清晨，二团攻占浏阳。战士们从监狱里救出潘心源等革命同志和群众约300人。在胜利的形势下，团长王新亚等领导干部产生了轻敌思想，放松了对敌人的防范。17日下午，敌人以重兵包围了浏阳，二团仓促突围，干部战士大部英勇牺牲。团长王新亚也失踪了。

9月11日，毛泽东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检阅了三团的部队，然后亲自率领三团指战员向白沙挺进，下午攻占白沙镇。毛泽东高兴地说：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二天，部队在白沙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铜鼓的大恶霸帅尚奎和白沙的反革命分子李和国、李宗兴，然后直扑浏阳县的东门市，又一举攻克。在东门市，砸开了团防局监狱，放出几十名革命同志和贫苦农民。工农革命军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意义，并处决了大恶霸、反动团总赖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赖晏初。

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自己的子弟兵，纷纷为战士烧茶煮粥，有的还送猪送菜，和工农革命战士同庆胜利。

第三团在连战皆捷的情况下，团长苏先骏（后叛变）也产生了骄傲情绪。他不听毛委员的正确指示，也不派岗哨监视敌人。14日晨，敌人突然逼近，分两路包围驻东门市的三团。战士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当时大部分战士正患疟疾和痢疾，加上敌人的数量和装备又大大超过我军，致使我军遭到很大挫折。经过6小时的激战，三团分三路往上坪方向撤退。

湘赣边界的工农革命军和各地群众起义遭受挫折后，是继续坚持攻打长沙呢？还是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在这紧急关头，9月14日，毛泽东在上坪主持召开了三团连以上干部会，当机立断地决定改变攻打长

沙的计划，命令起义军各路部队限期赶到浏阳文家市集合。

15日晨，三团由上坪出发。19日，一团、三团经过艰苦战斗一起来到文家市。二团在浏阳突围后余下的一部分人和安源工人爆破队60多人也随后赶到。师部驻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毛泽东住在学校东房新斋第二间房子里。

部队一到文家市，就打开监狱，放出区农协委员等十多个革命同志。接着斗争了大地主彭伯堂，打开地主的谷仓，把粮食、油、盐分给贫苦农民。战士们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在彭伯堂院子的大门两边墙上，在里仁学校里，在街上，写下了“努力共产”、“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工农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这些革命标语，一直保存到现在，成为极宝贵的革命传统教材。

到达文家市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不顾疲劳，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对部队进军的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提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英明决策。他具体分析了湘赣边界一带农村山区的形势，并指着地图，用生动形象的譬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

与会代表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提议，但是师长余洒渡表示反对。他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这在实质上是军事冒险主义。毛泽东批驳了余洒渡的错误主张，提出余洒渡这种冒险主义在战斗失利时必然会转为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后来，余洒渡果然经不起失败的考验，成为叛徒。

会议开到深夜，否决了余洒渡的错误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文家市会议是关系到我党我军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战略性的决策会议，在我党我军革命斗争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三湾改编

这里摘录谭政的《三湾改编》和罗荣桓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均载《红日照万代》）两篇文章。

谭政的文章说：

远在1927年的秋天，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部队从战场上收拾下来。每天总是从天未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着手改编部队。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

自从长寿街战斗失败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种子一下弄个精光。没有经过锻炼的“小娃娃”，哪容易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弄得病的病，死的死，累的累，怕的怕，情绪非常不好，真像打了几十个败仗一样。

到了三湾的第二天，师长集合部队讲话：“……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不下去了，只看到全场的人都瞪着眼睛，痴呆似的望着他，非常难过。

忽然，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登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大家不住地点头微笑，特别兴奋。队伍解散以后，只看到一群一群的在那里谈论着：

“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罗荣桓写道：

毛泽东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 000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

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

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10月初，毛泽东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四、立足井冈山

《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前后后》（载《韶山红日照千秋》）一文的作者写道：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的古城。从古城向东南眺望，巍巍井冈，横跨湘赣，山险岭峻，威武雄壮，真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部队到达古城后，前委在文昌宫小学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营以上干部，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地方党的负责人，军队与地方的党员活动分子等。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着重讨论和决定了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在这次进军途中，毛泽东为选择根据地，曾作过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思考，并将罗霄山脉的各部分作了比较，认为北部靠近大的政治都会，地势不如中段可攻可守；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

政治上对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一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下游;而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是最适宜于工农革命军武装割据的。因为中段的井冈山座落在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周围 550 多里,地势非常险要;周围各县农民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受过锻炼,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仍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据此,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他们二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分别担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正副总指挥;“马日事变”后,凭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各保持了 60 枝枪,坚持和豪绅地主作斗争。毛泽东在三湾时曾派人与袁文才部进行联系,袁文才也表示愿意合作。对这两支武装,会上有人认为他们名义上是农民自卫军,实质上是土匪部队,主张武力消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意见,强调对袁、王的部队要作阶级分析,两支部队成员大多数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虽然有“绿林”习气、地方主义等缺点,但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可以改造的,应该主动地和他们搞好关系,团结他们一道革命。会上大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了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于 10 月 6 日亲自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和他进行了亲切诚挚的谈话,给他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并送给他 100 多枝枪,鼓励他扩大队伍闹革命。袁文才十分高兴,答应马上送 500 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并激动地说:“我袁文才没有话说,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我身上。”袁文才和王佐曾歃血为盟,关系密切,因此,毛泽东通过袁文才去做王佐的工作。后来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

10 月 7 日,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情欢迎。他们为工农革命军腾房子,送粮食,送干柴、蔬菜,工农革命军帮助群众扫地、治病,进行政治宣传。工农革命军在攀龙书院设立了后方医院,安置好了伤病员,在象山庵设立了留守处。毛泽东还在攀龙院接见了宁冈、酃县在茅坪避难的部分党员,介绍了秋收起义的情况,指示他们回去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不从茅坪直接上井冈山,而继续沿湘赣边界向南开展游击活动。部队自江西的宁冈进入湖南的酃县。沿途用郭亮的名义发出布告,书写革命标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0 月中旬部队在水口驻扎了一个多星期。三湾改编时确定“支部建在连上”,但有的连党员人数不多,尤

其是战士中党员更少。在这里，毛泽东抓紧进行部队党的建设工作。他亲自找战士谈话，考察和培养入党对象，挑选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吸收他们加入党的组织。毛泽东还在叶家祠亲自主持新党员入党仪式，叮嘱各连前来参加入党仪式的党代表，回去以后要抓紧发展党员，还没有建立党支部的连，要迅速建立支部。

当毛泽东派人侦知敌人两个团从茶陵来到酃县、分两路向水口进犯的消息后，当即立断，派宛希先率两个连经安仁去打茶陵，扰乱敌人的后方，宛希先乘敌不备，先后攻下了安仁和茶陵两座县城。敌人十分惊慌，不敢再向水口进犯，急急忙忙从酃县退回茶陵。这时毛泽东率主力部队离开水口，经下村向遂川县前进。10月23日到达大汾，第二天早上，遇到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壁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担任前卫的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营长张子清将部队带到桂东县的鹅形一带活动，一直到12月才回到团部。部队被敌人冲散后，退到黄坳，毛泽东下令集合部队，叫连长整理队伍，自己带头站第一名。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沉着乐观的神态，给全体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当毛泽东率领特务连和第一营一连到达井冈山下的荆竹山时，宛希先率领的两个连也随着赶到。王佐闻讯，派代表前来迎接毛泽东的部队上井冈山。

10月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集合部队讲话。他说，部队就要上山了，要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的茨坪。至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千里，历尽艰辛，胜利地把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插到了井冈山上，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走向胜利的崭新道路。

第二节 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一段的经历时说：“1928年4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汇合了。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退却逃跑主

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当时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买卖（同白区），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说是温和的民主改革。

1928年5月，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充分地发表出来。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制，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政策抱有信心，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六大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行建立了党的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地区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张国焘等人都到那里去了。1927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近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境，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率领一部分忠诚的部队到海陆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了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了。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离开那个地区，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军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庄稼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500里，纵横约80里。井冈山在当地又称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大、小、上、下、中

井，山上的五个村子就是以这五口井命名的。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1928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1931年在江西牺牲）和滕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来了那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让彭德怀留守井冈山；1929年1月，我们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山上的第一次驻扎结束了。

第四军这时开始了打通赣南的战斗，而且很快就取得顺利的进展。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就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都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使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分田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好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完全掌权。”

一、朱毛会师

何长工在《伟大的会师》（载《回忆毛泽东》）一文中以其亲身经历叙述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会师的经过：

1. 毛泽东派人与朱德联系。1927年9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10月5日我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

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10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帐，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1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40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不由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说：“王尔琢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

我把毛泽东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

笑笑，后来就叫陈毅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2. 支援湘南暴动。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1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的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但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暴动失败了。

3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1000人，在毛泽东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健的部队，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100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向南撤退。我们跟踪追击，向

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主力，朝我们压迫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逼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祐涛等，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祐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祐涛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分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回来的时候，陈毅和我并马缓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幸的预感、无能为力的自疚，在我们心头起伏。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就这样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队伍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3. 朱毛会面。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都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

德带领的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邓允庭，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拼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在哪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我们陪朱德吃了饭。饭后，我告辞说：“我先回宁冈，准备一下房子和给养，还要动员群众热烈欢迎你们呢！你还有什么指示？”

朱德和蔼地说：“你们是主人，你们咋个料理都行。”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也留在朱德身边。4月24日，我们第二团回到蓉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蓉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蓉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立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在宁冈蓉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到来时，朱德赶忙偕同陈毅等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边是陈毅。”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前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朱德；朱德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叫我负责准备一下大会，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和朱德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

4. 会师大会。山明水秀的蓉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青，秧田更绿。在蓉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10点钟，20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10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

朱德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和朱德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4—7月4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1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兵群众的希望。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滕代远、邓萍等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二、艰苦转战

杨至成在《艰苦转战》一文中描述了井冈山初期斗争的艰苦场景：我们在井冈山的斗争有几个月了，敌人不断向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侵犯。记得在1928年的秋天，湘赣敌人各一部向我发动进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二十八、二十九团于7月中离开赣边，到湘南去了；8月间，毛党代表带领三十一团一部，去桂东方向迎还大队。三十一团团部带一部分部队，及袁文才、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另一部分部队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阻止敌人进犯。这时，湘赣两省的敌人见我内部空虚，井冈山上有许多伤病人员，留守机关很多，防守兵力仅1个营，于是乘我军毛党代表和大部队没有归还之际，向井冈山发动了进攻。

我们得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山上一时轰动起来，同志们议论纷纷，也有一部分同志表现得情绪不安。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召集了在山上的机关、医院的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讨论应付敌人进攻的对策。我那时没有随大队南下，留在井冈山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守，一是撤。有的同志认为，山上兵少粮缺不能守，主张把伤病员分散在深山和老百姓家里，队伍撤退山下去打游击。有的同志认为，山上虽然兵少粮缺，守住井冈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在湘赣边区进行了革命斗争，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和我们打成一片，有的地方农民分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组织了赤卫队和少先队。井冈山下市镇、乡村的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敌人如果向山上进攻，他们必然会扰乱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的物资接济，阻止敌人，这一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加上我们守山的地形有利。我们守山，不是为山守山，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井冈山，它是我们在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起源，如果把它丢了，影响很大，更何况红军的伤病员没有地方隐蔽和安置，部队士气必然会受影响。总之，大多数同志举出种种理由，想出各种办法，主张守，不同意撤。最后，何挺颖同志作结论说，我们要坚守井冈山，这个方针是不能动摇的。毛党代表在下山以前，就决定要我们保存井冈山这块根据地，要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团结、批评一切不稳定的、对革命根据地认识不足的同志。到会的大多数同志也主张要坚守井冈山，这是合乎前委和毛党代表指示精神的，我们应该执行这个指示。同志们在会上一致通过：坚守井冈山。

几天以后，湘赣敌人于8月30日向黄洋界发起了进攻。黄洋界在井冈山

的北面，高15里，除了一条重重迭迭的道路，四周都是悬崖陡壁，无法攀登。我军在山上、哨口筑有坚固的工事，这种工事虽然没有钢骨水泥，但它有粗大的木枕，和几尺深的厚土坯，结结实实，是能够抵御一般火器的。当时我们缺少地雷，就想了个土办法：把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子，埋在山坡上、溪沟里。头一天，敌人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到黄洋界的工事外围地区，我们凭险据守，用机关枪扫射，用手榴弹打击，杀伤敌人很多。敌人在外围中，被我们埋的那些竹钉子刺伤的不少，使他们的进攻不能得逞，战斗到晚上7点多钟就停止了。第二天清早，敌人继续向我们进攻，气势比头一天更厉害，上午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下午，敌人密集冲锋越来越紧，共有好几个团的兵力，比我们多十几倍。我们的工事渐渐难以支持了。我军原有一门迫击炮，因为炮弹少，一直没有使用。这时，我们便把它架起来，出其不意向敌人密集的队伍猛击。敌人遭到突然轰击，损失很大，往后败退。我军乘机奋起追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狼狈逃窜。这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

我军以少胜多，使敌人大为震动。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给湘赣边界的群众和红军战士以很大鼓舞和深刻的革命斗争教育。同志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有的同志说：“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留守的人这样少，还有些伤病员，敌人可就上不了山；这倒有点像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哩。”另一个同志接口说：“我们这不是空城计，是毛委员给敌人摆的‘空山计’。我们也编段戏唱唱倒不错。”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几个人就仿照京剧“空城计”，你一言我一语凑起唱词来。最后凑成了一段戏文，还给它起个名字，叫“毛泽东的空山计”。

这段唱词是：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以后，我们山上文娱活动又多了一个项目。一到休息的时候，就找些破洋铁皮子敲敲打打，弄床毯子一披，就唱起这段戏来。

在井冈山的岁月中，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

盐都吃不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记得在1928年的冬天，我们还是穿着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从军长、党代表起，都是一样苦，因此士兵们没有什么怨言。

井冈山的物质生活是这样艰苦，战斗是这样的繁重，我们还能坚持下来，主要的是依靠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党外依靠士兵委员会，依靠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长官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开会说话有自由，长官不对，他可以在会上提意见；一切不必要的礼节都把它取消了，使官兵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士兵中有经济委员会管理伙食，一切经济帐目公开；有时打土豪还能打打牙祭，吃得好些；在活动较好的地区，有时每天能从油盐菜金中节余一点零用钱（名叫伙食尾子），每天每人匀得六、七十文钱。这样的办法在我们连队是有效果的，特别是那些新来的俘虏兵非常满意。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是不勇敢的；到了我们军队就勇敢了，和我们一样能吃苦，原因在那里呢？就是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毛泽东说过：红军是一个大火炉，俘虏过来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就是军队也需要民主，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将是破坏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军队内民主性越大越好办事。回忆我们从南昌起义的时候，在潮汕失败后，回到粤闽赣地区，士兵中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不管怎样严格约束，甚至于要枪毙，他们都不在乎。到达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建军方针，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以来，队伍的精神面貌与过去截然不同了。

这时候，山上很缺粮食，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多伤病员和群众，没有粮食怎样过日子？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前委和毛泽东决定动员部队到山下运粮上山，供给伤病员及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员。这一指示下达后，同志们立即响应号召，军首长和各级干部亲自带头挑谷上坳。黄洋界山高15里，从山脚挑粮食到山上的五冈，大约有30多里山路，一天挑两次。同志们不辞辛苦，累得汗流浹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着粮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担子休息，接着，来到半山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同志在唱歌，有的同志在互相搬手劲；也有些同志把汗湿的衣服脱下来凉一凉，他们的背上有着磨起来的红块、小泡大泡，而他们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起点泡算什么？我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还怕这点泡泡？”这是多么英勇顽强的气概呵！有的同志还编起了顺口溜：挑谷上坳，粮食有靠，为着伤员，不怕起泡。……休息过后，挑粮的队伍继续爬山了，有的担着箩筐，有的背着口袋；

也有的把粮食装在裤腿里，夹在脖子上……真是各色各样。同志们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好像一个长蛇阵。歌声嘹亮，震荡山谷。有人说：“我们打仗能跋山，挑谷也能跋山；不管山多高，还是要赛跑。”胡少海说：“我们今天挑粮食，等于打仗，我们又胜利了。”

在井冈山上，不仅粮食困难，医药同样是困难的，中药都用不上，那些伤病员的困苦是难以言喻的。毛泽东率领大队南下时，要我留在井冈山上，管理伤病员的工作，这个任务比打仗还难。我看到伤病员在床褥呻吟，辗转不安，十分痛苦。这些情况，我是有责任的，必须尽力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万般无奈，同志们提出要我到永新去找毛泽东请示。

前委住在永新城外一个村庄里，7月下旬，我到那里时，毛党代表到农村去了。两天以后，他才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就走进他住的一间小平房里。毛党代表正在油灯下看文件，见我进来，他站起身说：“你来了，听说你等了两天。”我当即向他汇报了伤病员的情况。毛泽东非常关心伤病员的情况，静静地听我谈完以后，他说：“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对伤病员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这不单是个伤病员问题，而要看作是一个战斗问题；如果不医治好伤病员，传到部队去，就会在战士中起不好影响，大家就会有顾虑，这就影响战斗了。所以说，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回答说，要解决钱和药的困难。他说：“好，你们到团卫生处去商量一下，分他一点药。钱，现在是困难，部队的菜金还没有；管他怎样，也要由团经理处想办法，给一些让伤病员用。”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200块大洋。他便写了个条子，命三十一团团长去办。随后，他还谈了谈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我回去转告伤病员，嘱咐他们安心疗养。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井冈山这一段时间，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很艰苦，在工作和学习上也是很刻苦的，真是我们的榜样。他非常关心时事，记得还在井冈山会师时，我们刚到大砦，一见面，他就问我们带报纸来没有，我们从参谋处找来几种报纸，他如获至宝，把这些报纸都拿去了。有一天我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看《资本论》，研究马列主义学说。他时时刻刻不忘记学习，经常看书到深更半夜，工作稍有空隙，他就学习，即使在行军中，骑在马上也要看书，马袋里满满的都是装的书。他看书很仔细，重要的地方点圈划线加批语，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所以，他作文章也好，都是引古证今，渊博得很，深刻、透彻、明确。凡是重要报告和文件，都是他亲自撰写，如《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在1928年

11月25日写的。同时，他还写了一些诗词。毛泽东在战斗环境中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是我们应该深刻体会和学习的。

第三节 古田会议

毛泽东谈到：“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爱。

1929年12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部队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用来削弱运动的力量。于是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批判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的指挥职务。部队指挥员刘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们发现他们企图在对敌作战时用使红军陷入困境的办法来消灭红军。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暴露得相当明显。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表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福建会议以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赣南都落到红军手里。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行分配，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

党军队围剿的斗争。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第二次茅坪会议）以后，为了大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 一、上门板；
- 二、捆铺草；
- 三、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 四、借东西要还；
- 五、损坏东西要赔；
- 六、买卖公平；
- 七、买东西要付钱；
-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添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至今仍是战士的准则，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它的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拚死斗争；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支持斗争。

赖传珠在《古田会议前后》一文中讲述了古田会议召开的具体经过及其以后的影响：

1929年11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

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士兵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士兵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着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泽东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泽东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泽东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一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经过10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

开了10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并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泽东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12月底，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泽东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泽东却要我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要我也参加。

毛泽东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泽东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泽东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应该怎样

行动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

毛泽东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泽东完全采用说明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习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理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了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泽东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泽东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泽东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泽东强调指出，

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泽东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泽东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泽东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迅速地完全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短短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1930年6月，四军在闽西长汀进行整编，正式组成了红一军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同年10月，四军攻克吉安，再返赣南的时候，四支队在古田会议前的许多不良倾向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时候，每

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反“围剿”战争中，四支队又成了“模范红五团”的一部分。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像一支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

姜思毅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一卷关于古田会议一节中从理论上深刻分析了古田会议决议产生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书中写道：

1929年1月，为着粉碎湘赣敌人的新“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前委决定红五军主力和由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对井冈山地势熟悉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坚持井冈山斗争，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红四军在当地红军的配合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转战，相继开辟了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后来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一部分）。在形势胜利发展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滋长起来，从而引起了一系列建军原则问题的争论。经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等前委负责同志的耐心说服，最后经过古田会议决议的总结和贯彻，终于统一了思想，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为我军成为人民的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在建军原则上的一场争论

红四军虽然有着坚强的党的领导，但由于它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仍然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份。据1929年5月统计，全军8000人中，党员1329人。其中工人出身的311人，农民出身的624人，学生和小商，出身的各为100余人，其他成分为95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合计占70%。部队中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比例更大。这就使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保守、散漫和极端民主化等等思想倾向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同时由于部队不断扩大，战斗中伤亡较重，又补充了大批俘虏，其中有些人仅仅经过短期训练即被提拔担任了连、排长以至营长等领导职务，这就把旧军队中一些的思想作风带到了红军中。他们中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怀疑，不赞成。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现在“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情况，加上进军赣南、闽西以后，战斗频

繁，部队流动性大，缺乏马列主义学习，经常看不到报纸，有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有所放松，干部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因而使错误倾向有了一定市场。

党中央在红军建设上指导思想的错误，也助长了红军部队错误倾向的滋长。当时，党中央虽然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观念，并在革命斗争形势的估量上，存在消极悲观认识。1928年底，共产国际给上海党中央发来指示，认为中国农村落后穷困，革命形势特别严重，红军应分散为小股，潜伏活动。据此，党中央先后于1929年2月9日和4月初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调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隐匿大目标，到上海党中央工作，并要他们积极准备代替自己的干部。毛泽东于4月5日，代表前委致信中央，认为他和朱德不能离开部队。如果中央非要他们去上海不可，则请调恽代英和刘伯承来代替工作。后来，毛泽东、朱德虽然没有被调离红军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但在红军内部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党中央相继向红四军派出了一批干部。这些新派来的干部中，一些人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践经验，都主张一味地照搬苏联红军那一套。如刘安恭、张恨秋、谭玺等人。他们提拔过快，一下子就被安排到军委等领导机关担负领导工作。这也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1929年5月，鉴于赣南、闽西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忙不过来，决定组织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书记。他在自己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就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部队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从而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造成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各方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未能达到统一认识，使建军原则问题的争论达到激烈化和公开化。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 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有些同志怀疑甚至不赞成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根本制度。有的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欣赏和照搬苏联红军当时实行的一长制；有的喜欢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式的带兵方法。因而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感到是受了约束。有的公开提出要限制党代表的权力，认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要求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

2. 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问题。对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三大任务也有分歧。一是认为红军应该只管打仗，将敌人赶走；建党、建政、发动群众、实行土地

革命，那是地方党和工农兵政府的事。二是有的干部战士在红军打胜仗、根据地扩大的情况下，热衷于攻打大中城市，对艰苦的农村工作不感兴趣，忽视和轻视武装工农群众，不相信农民群众的力量。三是有的对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提出所谓“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口号，主张以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愿踏踏实实地去做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四是主张用“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方式去扩大红军，轻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

3. 关于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有的把政治与军事对立起来，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由司令员发布告。”一些同志则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干部，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政治工作干部是“吃闲饭”的“闲杂人”，甚至认为政治工作是“卖假膏药”，宣传兵是“吃闲饭的”的，“妨碍行军”等等。

4. 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问题。一方面，有的干部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随意拳脚交加，打骂士兵，轻视思想政治工作。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取消士兵委员会。另一方面，一部分干部滋长了极端民主化思想，要求实行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事无大小都要交群众讨论，把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当作“无产阶级的办法”，只要民主，反对必要的集中。有的人则向上级要民主，对士兵实行专制。

5. 关于党和红军的纪律问题。有的同志对党内应有的严格纪律感到“受拘束”，“不自由”；有的领导同志对破坏军纪战士的处理，反对从严、主张从宽，认为只要打仗胜利了，军纪坏一点，城市政策坏一点，没有什么要紧。

6月8日，毛泽东又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虽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一致，毛泽东认为前委工作不好做，便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书面内容有四：1. 前委、军委存在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 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3. 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根本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4. 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

实际的争论，决议后又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最后，毛泽东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1929年6月中旬，红四军三克龙岩后，部队取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部队在龙岩整训20余日。在当时敌强我弱、不断被敌“围剿”、战斗十分频繁的情况下，红四军领导人间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红军的建设和武装斗争都是不利的。为了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重点是党内争论的问题，红四军于6月22日，在龙岩召开了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中，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陈毅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发了言。陈毅在报告中，强调要解决党内争论，加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提出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会议召开了一天，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红四军一年来的工作，认为毛泽东和前委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中党的工作是好的，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认为红四军一系列决策大部分是正确的，红四军在斗争实践中创造的军事政治制度也是好的。关于党内争论问题，《决议案》认为这不仅是意见分歧，也不仅是对军委这一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更重要是红军历史上各种不同主张和各种不同方式，长期没有统一的结果，是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表现。对这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指导才能改变，同时，指出了红四军的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过多”、“党的批评精神缺乏”等，认为这也是党内分歧和引起争论的原因。大会最后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这次大会由于时间紧，准备不充分，对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复杂等认识不足，加之解决分歧和争论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陈毅于同年9月1日在上海向中央的报告中曾说：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两方面的争论“是折衷的”，“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白砂前委会议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但是，在前委之下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一组织，军内及主要领导人之间仍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刘安恭更是到处游说，坚持要成立军委的意见，事实上是主张‘分权主义’，并说什么红四军党内分成派别等等，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

的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他的这种‘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就‘偏于一面’的‘轻率发言’，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了军内官兵思想混乱，助长了党内领导者认识上的分歧，而且使争论复杂化了。”

红四军七大后，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前委决定派他带江华等去闽西上杭县蛟洋村，指导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下旬，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8月，红四军主力冒进闽中，转攻上杭，作战失利。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目的是稳定干部战士情绪，整顿部队，加强红军建设，以利于工作和作战。但由于毛泽东在蛟洋患病未能出席会议，陈毅赴上海未归，前委领导不健全；同时由于准备不足，事先没有拿出意见，而是放手让代表讨论，结果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此后，红四军因执行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要求出击东江而失败，前委领导又只朱德一人，应付不开，部队思想更加混乱，士气不振，逃跑现象日益严重，红四军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二）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29年8月下旬，陈毅由闽西绕道香港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行前，陈毅曾专程赴蛟洋村会见毛泽东，听取他的意见。抵上海后，陈毅多次向党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等如实地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还多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专门会议，讨论了红四军的问题。这期间，陈毅起草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红四军的光辉战斗历程，阐述了红四军在编制、训练、政治教育、军队纪律、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党的领导、民主建军、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表明了自己在原则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为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了解红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制定解决红四军存在问题的方针原则，提供了重要条件。陈毅的报告，曾在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编印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全文刊载，并加按语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红四军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陈毅在上海期间，还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作为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参加了关于红四军问题的讨论和文件的起草

工作。9月28日，陈毅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党中央起草了一封近万言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书面指示信。此信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定名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毛泽东后来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说的“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的要点是：

1. 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军的三大基本任务。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还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并认为红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

2. 肯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指出：“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同时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并规定：“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还规定：“军与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

3. 肯定了军队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和坚持自觉纪律的正确

性。指示信认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对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指示信指出：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过去有成绩，“其职权规定为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做群众工作，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用报告建议而不能直接管涉。发生特别事件，政治委员有解散兵委之权；兵委开会政治委员列席为顾问等。这些规定虽然较之俄国红军兵委权力扩大得很多，但在目前红军游击时期是可以适用的；不过要注意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它还认为红军应有“纪律与处罚”，“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制裁违犯纪律的人，坚决地废除肉刑。”

4. 强调红军必须加强军政教育。指示信主张用加强政治教育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认为：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同时，它指出：“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

5. 肯定了用动员农民主动参军来扩大红军的必要性。指示信认为：“红军扩大与红军生存问题有莫大关系。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红军所到的区域。应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同时，如能有机会收缴敌人枪械时，不要轻易错过。”它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6. 强调红军必须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开展群众工作，并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指示信指出：“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如所经过地区无党的组织，“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红军到一地区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

席会，发生密切关系”，“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强调要切实进行“调查工作”，“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应“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指示信批评了红四军有些同志在武装群众工作中“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好倾向，要求一定要纠正过来，并派人去担负对农军的训练。同时指出，在没收豪绅财产、收集给养、筹款等项工作中，都要“经过群众路线”，做好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

7. 要求红四军前委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并确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要“使红军全体同志们了解而接受”。

这样，中央九月来信，就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自胡雷会议以来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为克服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消除分歧，统一认识，确立无产阶级建军思想，以及后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创造了条件。九月来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文件，对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古田会议的召开

1929年10月底，陈毅携带中央指示经香港回到红四军。11月18日，在上杭县官庄，朱德主持红四军前委会议，由陈毅传达了中央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23日，红四军再占长江后，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广大指战员热切希望毛泽东回到前委负责岗位，领导全军总结经验教训，重振军威的愿望，决定立即派陈毅赴上杭苏家坡（闽西特委所在地）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到红四军。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前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长汀，前委分头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了工人群众对红军开展群众工作及部队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意见。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进抵闽西连成、新泉地区后，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了军政整训。整训期间，毛泽东和前委多次召开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干部战士座谈会，调查、讨论红四军党内外存在的问题，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反映，并研究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还召开了有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和负责组织工作宣

传工作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以及各级党代表联席会，收集情况，集中群众意见，为会议准备材料。前委还专门召开农会会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的发展和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

12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主力部队移驻上杭县古田村后，前委在这里，召开了有各纵队，支部和部分大队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开了10余日，集中学习了党中央九月来信和其他指示精神，检查、讨论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联席会议上列举许多事例，严肃指出了红四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军阀主义残余等不良倾向，要求与会同志发表意见，揭露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的根源、危害，找出解决问题、克服不良倾向的办法。在此基础上，会议分组进行专题讨论，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小组会议，和代表们一起座谈讨论，总结经验。经过学习中央九月来信，深入讨论，统一了认识，弄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随后，毛泽东在陈毅协助下，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从而完成了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村廖家祠堂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12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并就国内外形势，红军和苏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多次讲话。朱德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当前存在的问题。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专门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禁止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书记。会议开了两天，除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外，还讨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等。现在，除古田会议决议之外，其他决议案均已散失。

古田会议决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科学地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的实践经验，也吸收了其他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是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共有九个部分，其中的核心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第四节 农村社会调查

1937年10月，毛泽东为《农村调查》所写的序言说明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农村调查的情况。序言说：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只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最后两部分，曾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报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经过长征，尚未损失。此外的东西，就都损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一书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在农村的调查活动及其重要作用。

一、调查研究制定土地政策

为了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冬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经过一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得到了一些经验，在这个基础上，1928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给农民个别耕种，禁止买卖，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以人口平均分配为主体，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主要以乡为单位。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有了这个土地法，就使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各地区工农政府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征收土地税等，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政策界限，统一的行动。但是，同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这个土地法并不是完备无缺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补充修正，逐步完善起来的。在实行这个土地法的过程中，毛泽东经过调查，发现“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等，有原则错误，这样的规定，

实际上是包括没收中农的土地，这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是不利于联合中农的。因此，1929年9月，毛泽东主持颁布兴国“土地法”时，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错误，把“没收一切土地”的提法，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就可以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关系。这两个土地法重要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斗争的认识过程。

1930年2月上旬，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在吉安陂头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肯定了兴国“土地法”中规定的按男女老幼平分土地的原则。会上，毛泽东根据调查，提出对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应酌量分给田地，并且把这一条写进“土地法”中。这是对土地法的又一重要补充，是土地斗争中的一项重要土地政策。这样就把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区别开来了，并且也给地主本人一份土地，让他们自力更生，劳动改造。实行这一政策，可以减少革命的阻力。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即6月份，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汀州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他根据寻乌调查得到的实际材料，分析了土地分配中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讨论的结果写到决议中。决议明确指出：分配土地不按人口平分，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是有利于富农的。因为中国的富农是以自己的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除有劳力外，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和资本，而贫农虽有劳力，但牛力、农具和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由此可见，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当着斗争激烈的时候，只有按男女老幼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否则，就要丧失大多数群众。决议还指出，在按人口平分土地中，只是“抽多补少”还不行，有许多富农把瘦田让出来，自己把持肥田，对此贫农大不满意。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所以，应该在“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在决议中，还批评了富农们提出的口号：他们的口号是调查未清研究未好。以致有的调查了三年还没有分配土地，有的调查了一年还没有分配土地。这个口号阻碍土地斗争，延宕分配土地时间。应该反对这种清谈主义的调查研究。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在原来土地法的基础上，于1930年6月又制订了“苏维埃土地法”，补充规定分田必须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地主和富农瞒田，把持肥田。

1930年10月30日，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于11月初，从峡江到吉安布置部队撤退，途经东塘村、大桥村、李家坊、西逸亭等地，利用吃饭、休息和夜宿的时间，对这些村、乡政府干部的组成、人

口、生产、土地分配等情况，进行了简略的调查。尽管是这样简略调查，他认为其收获也是很大的。在李家坊的调查中，他发现了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提出要迅速改变这一现象。他说：“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调查研究，了解当地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他立即和古柏等从吉安到永丰县的藤田，会合红军主力，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他利用这个机会调查了木口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该村七个村政府办事人员中，小地主1人，中农3人，贫农3人。该村杀了7个反动派，其中小地主3人，富农3人，流氓1人。调查证明，小地主和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有许多人要走到反革命方面去。在调查中，他还了解到许多事实，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还有所得，如该村政府办事人中有3人是中农，这是在政治上得到的地位；在经济上，这三户中农，都分进了田。这又表明土地革命没有损害中农的利益。而且团结了中农。

当土地革命取得了一些成绩，并逐步深入的时候，有些人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产生了一些过“左”的政策，企图一下子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不给地主生活出路。烧毁商人的帐目，取消税收，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搞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等等。在政治上，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为了纠正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把调查中积累起来的材料，经过分析概括，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经当时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

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根据各地土地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的和右的作法，领导制定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实践证明，这

是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它首先满足了农村中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把贫雇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中农,采取了团结的政策,使他们在土地斗争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对富农,则采取了限制的政策,纠正了那种帮助富农或过早地消灭富农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作法。对地主阶级实行消灭政策,但是,对地主本人则给予生活出路。城镇的小工商业者,由于他们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对人民生活用品的供应有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了坚决保护的政策。这条土地路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革命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在这条正确的土地路线下所制订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保证了红色政权联合农村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消灭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同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们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大力支援红军,支持红军政权,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然而,这条正确的土地路线,当时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骂为“富农路线”。

对此,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绝不是什么“富农路线”,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二、寻乌调查

在土地革命初期,由于红军工作的中心主要是在井冈山地区,调查工作也偏于农村,没有注意城市,以致使许多人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策略模糊不清。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主力,从井冈山茨坪出发,进入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平原地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之先后解放了一些城镇,因而迫切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的状况,以便及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管理城镇,发展城镇的生产和商业,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为了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任务,毛泽东一直想调查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但总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

1930年春,红军部队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就为寻乌调查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对此,毛泽东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

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寻乌县城，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相差不远，都可以有一个大略的了解。于是，毛泽东就以寻乌为调查点，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对寻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于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比较广泛，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从职业上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岁，最年轻的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做过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委员），为这次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调查会的方式。其中主要是找了11个人，在寻乌县的马蹄冈，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开会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亲手记录，亲自提问题。除了开调查会外，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这样广泛的调查对象，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方法，就使得调查到的材料真实、具体、丰富、生动，得出的结论切合实际。

《寻乌调查》，八万余字，除“前言”外，分为9章39节。从调查的内容看，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毛泽东称这是他当时作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他不仅调查了农村，还第一次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

第一，寻乌城及其商业今昔状况和特点。寻乌城有2700人，其中农民1620人，手工业者297人，两者合计占全城人口的71%，可见这是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城镇。游民和娼妓共占全城人口的16%，相当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总和，这个数字表示寻乌城有一批广大的失业群众。这个城市有一段盛衰变化的历史。20世纪初，是寻乌城的最旺盛时期，那时的生意比30年代要大一倍，不但是北半县和南半县的一些地方要到寻乌城办货，就是广东平远县的一些地方也要到寻乌城办货。当时，赣州的货物要经过寻乌城销往东江，由于前清实行“功名顶戴”，绸缎的需要量很大，而县城的生意大宗是赣

州的绸缎，于是处在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自然也就发达了。后来，由于广东梅县“洋货”生意和兴宁布匹生意的发展，便把赣州土制货色的生意夺走了，到寻乌办货的人大大减少。尤其是民国元年，实行新政，废除“功名顶戴”，绸缎需要量减少，因而，寻乌城的生意大大衰败下来。可见，“寻乌城是这样一个人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但由于寻乌城的商业是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集市）交易并行，所以每逢圩期，整个寻乌城还要热闹几个小时，发展店铺和圩场这两种交易形式，对繁荣革命根据地城乡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寻乌的商业，是这次调查的重点。这一章有3 300字，占整个调查报告字数的40%。其中特别详细地调查了寻乌城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状况，介绍了杂货店、水货店、裁缝店、修钟表店、屠坊等20个行业所经营的货物品种、生产数量、销量价格等。就以杂货店来说，17户店家，经营牙刷、皮鞋、练习本、肥皂、洋火、洋钉等生活日用品131种，其中118种是从广东梅县和兴宁进到寻乌的，商人把这些商品称为“洋货”。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对有些商品的制作过程介绍得极为详细，如“水货”类中的酱油，从原料到加工生产、到制出成品、到销售的数量和价格等都逐一作了介绍。除了介绍店铺的生产 and 生意外，还具体考察分析了其盛衰兴替的历史，如郭友梅经营的“郭怡和”杂货店，有100年的历史，是寻乌城的第一家大商店，曾有本钱3 000元，可以作到两万元的生意。但从1928年起，农村灾荒，农民受到重租重利剥削，购买力低，买了东西还不起商家的帐，商家又无本钱到梅县、兴宁办货，又遭到官军进城抢劫，所以使“郭怡和”变成只剩下100多元本钱的小店。

娼妓，是社会的最低层，历来不被人们所重视。毛泽东这次对寻乌城的娼妓作了历史的考察，分析了其产生变化的社会原因。在仅有2 700人口的寻乌城里，有娼妓30余家，162人，占全城人口的6%，这是一个可惊的数字，表明了失业人数之多。娼妓的增减，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关系。在寻乌城，科举盛行时，娼妓多起来，科举废除，娼妓减少，在光绪30年左右（即1904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商业兴盛时，娼妓多起来，商业衰落，娼妓减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影响，各类学校办起来，富人家的子弟离开温暖家庭走到城里读书，生活上觉得寂寞，于是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多起来了，娼妓也就随之多起来了。革命后，娼妓在城里没有“生意”了，许多人回到乡下，有耕种能力的，大多数分了田。

毛泽东这次着重调查城镇和商业，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他说：“对于商业

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革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毛泽东主张工农政府对他们应当采取保护政策。1929年1月，经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的《红军第四军布告》中指出：小资产者，税捐极重。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并规定：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1930年，红军第一军团总政治部又发布了《告商人书》，指出红军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用累进法（资本多的多捐，资本少的少捐），请大商人捐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资本在2000元以下的小商人身上。红军的这些政策，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在革命根据地也发生过“左”的政策，对中小工商业者捐款太重，使他们负担不起而倒闭，这种结果，就把中小资产阶级赶到豪绅一边反对革命，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破坏的作用。毛泽东批判了这些过“左”的政策，通过寻乌调查，为制定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

第二，对地主阶级各个层次的调查分析。在调查中，毛泽东剖析了地主阶级中各个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状况。他根据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的多寡，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地主20户，人数很少，在全县中显出特别的作用。中地主113户，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伪县政权中的许多部门掌握在他们手中。小地主在全县地主中占80%，是绝大多数，有一个特点，就是做小生意的多，表明了小地主的商业化，他们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迅速普遍，派其子弟进学堂的多；但是，他们承受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派款多，所以破产的也厉害。毛泽东指出，“守旧是地主的本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下，地主阶级也在不断地发生分化。他们的生活，从寻乌的情况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希望走向资本主义化，这种人占少数，多半是地主兼商人；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赞成一点“新”，但又随即批评“新”的坏处，这表明他们是为了同所谓“新学派”争夺领导权；第三种，是“全旧的”，“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是“帝制派”，他们始终希望恢复帝制和科举。

第三，封建剥削的各种形式。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各种类型的地主，还调查分析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各种封建经济剥削形式，指出这些剥削形式有：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其剥削的程度极为残酷，债主逼债，使得那些贫苦

农民无法度日，被迫“卖奶子”，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寻乌县的许多村庄都有这种现象，有的一家四个儿女，卖出三个，有的一家七个儿女，卖出五个。卖来的钱，还债、治病、吃饭。毛泽东以此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本质，指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对于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关系，毛泽东非常感慨地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毛泽东对此还特别敬告读者，他说：“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调查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向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

第四，对农民各阶层经济状况的调查分析。对于中国富农问题，毛泽东说在“陂头会议”（即1930年2月上旬，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江西吉安县陂头召开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即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之前，还没有全盘了解，经过寻乌调查，弄清了这个问题，所谓富农，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有一种看法，把“半地主性的富农”当成富农，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不是富农，而是一种“新发户子”的小地主。有一种富裕的自耕农，他们有多余的土地，有钱余剩，除了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也是高利盘剥者，这种富裕自耕农，实际上是富农。在土地斗争中，许多人不主张打击这种富裕自耕农（即富农），认为他们没有半地主性，其全部出产都是自己劳动得来的。毛泽东认为广大贫农要求平其田，废其债，分其谷，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做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什么是贫农？其中有几个阶层？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毛泽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指出，总的来说，贫农是“不够食欠债的”。但是，“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齐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1. 自耕农；2. 佃农中较好的；3. 佃农中更穷的；4. 佃农中最穷的。这种分析，就为制定在农村中依靠谁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五，土改中土地分配的标准。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究竟以乡为单位好，还是以村为单位好。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好，还是按劳动力分配好。这些问题，是在土改中不断引起争论的问题。为此，毛泽东详细调查了寻乌的土地斗争状况，以检验工农政府的土地政策。他指出，寻乌在土地分配中，县政府提出了四种办法：按人口平分、按劳动力分、按生活财源多寡分、按土地肥瘦分。施行结果，按人口平均分配，已占全县分配区域的80%，

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拥护。对于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寻乌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欢迎以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他们怕自己区域的土地被分出去。他们既反对以区为单位分配，也不完全赞成以乡为单位分配。但是，事实上已有85%是以乡为单位分配的，多数农民对这一办法，不热烈拥护，也不积极反对。这是因为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甚为厉害的地方，或是村的区域很大的地方，农民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那里的工农政府，就根据实际情况以村为单位分配。毛泽东经过调查，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证明以乡为单位分配适合于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在调查中，毛泽东还了解到土地分配的速度同调查研究方法有关。寻乌北半县分配得快，原因是调查得快，清算得快，宣布得快。而南半县分配得慢，其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的内容太复杂，不必要的调查项目也列入其中，使调查手续很麻烦。后来，他们改变了这种繁琐的调查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简便，从调查到公布，只要四天，剩下的就是实际分配。

《寻乌调查》，虽然是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但毛泽东认为仍有不足之处，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对于旧有土地关系的分析，“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对于流氓这个阶层，一般说来并不引起社会改革家们所注意。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只是提到这个阶层，说他们是一批“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而没有作详细论证分析。1930年6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他根据调查得到的许多材料，具体分析了流氓这个阶层，因此，会议专门作了《流氓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对流氓的政策。决议指出，许多同志对于流氓问题十分模糊，认识不清楚，这就不能确定对流氓的正确策略。弄清流氓问题，是决定对流氓策略的先决条件。决议从经济原因详细分析了流氓的社会来源，指出：由于许多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破产，又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工业吸收他们，使得这个失业群众无出路，就造成了大批流氓，其职业特点是有30多种脱离生产的不正当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积极的革命性。因此，共产党对流氓的策略应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争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成为一个劳动者。流氓分子在革命队伍中，严重地破坏纪律，所以在党内和红军队伍中要洗刷流氓成分，克服流氓意识，以保障红军是真正的工农

队伍。

在这次调查之后,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圩;对调查到的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写了《寻乌调查》,并于1931年2月2日,写了后来被称之为“前言”或“序言”的整理后记。《寻乌调查》材料,1937年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不慎遗失。后来,找到了这个材料。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曾准备把《寻乌调查》第五章编入,为此,毛泽东对这一章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毛泽东的这次调查,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近代经济、政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

三、兴国调查

1930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上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等的日常工作。10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从湖南回到江西,打开了吉安等一些县城,进入袁水流域的新余县之罗场。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委联席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耐心说服了有些同志主张继续攻打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冒险主张。10月底,毛泽东从兴国县送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8个人,在罗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1931年1月26日,在宁都县小布圩,毛泽东把调查得到的材料,经过分析整理,写成了《兴国调查》,并附有“整理后记”,介绍了这次调查的经过,调查的主要问题,调查的目的等。

《兴国调查》,在调查点的选择上,毛泽东是经过一番仔细考虑的,选择了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因为这个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个县的交界处,三个县的土地斗争情况都相差不远,明了这一区的情况,就可以基本上明了这三个县,甚至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因此,毛泽东就抓住了永丰区这个典型。

《兴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八户农民。毛泽东第一次深入调查了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这八户农民,在土地斗争中分到了土地,欠的债也不要还了。

他们感谢“红军的恩典”，反映“百物都便宜了”。但是，他们也反映盐和布匹的价格太贵，甚至比土地斗争前贵出很多，这是工农政府要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妇女得到了解放，有的还离家出来做革命工作，这是土地斗争前从来没有过的事。由于土地政策的正确，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的人非常踊跃，如陈侦山全家七口人，有四人参加革命工作。有的人不愿当红军，并不是不拥护红军，如傅济庭，因家中缺少劳动力，离不开生产。还有的家庭，在土地斗争后，生活仍然很苦，这并不是土地政策中的问题，而是由于没有安排好生活造成的，如雷汉香，家有五口人吃饭，收支相抵，可以有余。但由于兄弟三个都好赌钱，老大嫂又是好吃懒做，弄得三兄弟都懒得做活，一年里又死了猪仔和两头牛，由此使得生活很困难。对八户普通农民家庭进行这么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不是为了记一笔流水帐，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毛泽东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解剖单个的农民家庭，获得对农村的基本知识，是真正认识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风土民情的基础。这些知识，不到农村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会，坐在屋子里，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没有这些知识，就不知道农村，不知道农民，更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

为了研究土地斗争后农村的变化，毛泽东首先调查分析了永丰区旧有的土地关系。在永丰区，地主和富农占全区人口的6%，而占有的土地则是全区的80%。他们占有的都是好田，许多富农把贫农手中仅有的一点好田，采取各种方法，逐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在土地斗争中，对富农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防止他们霸占肥田。从一个区的小范围来看，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都是这么高，这就表明农村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农手中，他们是农村中的剥削阶级，是土地革命的对象。贫农、雇农、中农、手工业工人、游民和商人等占全区人口的80%，占有的土地却只有全区的20%。广大的贫苦农民，不仅占有的土地很少，而且还要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在永丰区就有三种剥削形式：1. 地租剥削，一般为50%，有些高达60%，贫苦农民辛勤劳动一年，要把一半以上的谷子交给地主；2. 高利剥削，包括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当利、盐利等七种；3. 税捐剥削，主要是钱粮税捐。

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与旧有的土地关系有直接联系。明了旧有的土地关系，对于了解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就有了基础。在旧有土地关系

中是剥削者，就是土地革命的对象，被剥削者则是土地革命的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这种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就是土地革命的结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各阶级发生的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地主占全区人口的1%，其中有一些参加或组织地主武装靖卫团，成了反革命，他们是土地革命的对象。在土地斗争中，工农政府对地主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除了反对革命的被杀和逃跑的外，其本人和家属服从工农政府的，按照正确的土地政策，也分给他们田地，给生活出路。

富农占全区人口的5%，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当革命初起时，他们参加革命的颇多，但有不少人是投机革命，在乡、区工农政府中，占去了30%的位置。后来把有问题的富农分子清洗出去了，剩下的只有个别表现比较好的留在区里办事。

在土地斗争中，团结好中农，对于革命极为重要。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在土地斗争中，平分土地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中农究竟是得利还是失利？毛泽东根据调查，肯定了中农在土地斗争中是得利的。并且用土地斗争后和土地斗争前相比较的方法，例举具体事实分析证明中农所得到的六大政治和经济的利益：1. 中农人口占全区人口20%，土地占15%，过去，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后，不但无所失，而且是平进的多，平出去的少。2. 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自己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3. 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人家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不搞迷信，再也不用那么多破费了。4. 过去跌死一头牛，要添上许多钱才能买回一头；土地斗争后，牛价便宜了，跌死一头牛，只要添三四元，就可以买回一头。5. 地主和富农的权利被打倒，中农不再向他们送情送礼了，又可节省一项费用。6. 过去，中农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斗争后，他们得到了一项重大政治利益，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说话权”，在区、乡政府中担负工作的有40%。

由于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利益，他们积极地参加了革命的各项工工作，因此，共产党是能够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其他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贫农在土地革命后，得到了田、山、谷子等十二项利益，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取得了政权，是农村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毛泽东还依照贫农牛力的多少，把贫农分为五个阶层。

雇农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层，整年以做长工和短工度日，没有房子住，

没有衣服穿，吃不饱饭，有99%的人娶不上妻子，足见受苦之深。革命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利益，但是，区、乡政府不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发给他们。没有牛和农具，他们很难耕种。在政治上，他们仍然没有当权，区、乡政府委员中没有一个雇农。这说明区、乡政府对待雇农的作法是存在着问题的。

根据“上头的命令”，永丰区手工工人分半田。他们究竟应该分半田还是分全田，要从手工工人的实际出发，从手工工人同贫雇农的关系的实际出发。这种实际就是：全区手工工人的工种有木匠、铁匠、石匠、泥水匠、篾匠等18种。他们虽然各有一门手艺，但其生活是很苦的，有80%的人是欠债的。他们绝大部分是以工兼耕田，很少以工为专业，完全不耕田的。他们要求分全田，这样生活才能靠得稳。如果他们分了半田，生活没了依靠，工价就要上涨，就会直接影响贫雇农的生产和生活，所以贫雇农也希望手工工人分全田，不要涨工价。赣县对手工工人分田问题解决得好，分了全田，既种地，又做工，生活有了保障，木匠、泥水匠、篾匠都减了工价，这对于手工工人和贫雇农都有利。可见，根据实际制定土地政策，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具体调查了城镇的商业，知道了一个大的范围商业的情况。这次又调查了一个区的商业，其种类有：油盐杂货店、茶店、酒饭店、屠坊等46家店。这个区的商业，有不同于寻乌县城商业的特点，乡村中以农为主、商为辅的（八成靠农，二成靠商）很多，约占全部人家的40%，这种人多数是贫农，少数是中农，因为生活费用不够，做点肩挑生意补足生活。本区不兼耕田专门开小商店的占全人口的3%。本钱在10—20元的小商，在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分了田，应酬消耗减少，政治上出了头，同贫农差不多。但是，本钱在50元以上的商店，其实还是小商店，在土地斗争中，由于过“左”的政策而受到了打击。

这次调查，毛泽东注意到了游民这个阶层，在永丰区有打卦、道士、算命等9种游民，90余人。在土地斗争中，他们都得到了利益，是欢迎革命的，有些参加了区、乡政府的工作，有的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发现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具体表现在：
1. 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2. 没收了反动派的财产不发给贫农，出卖时，有情面，有钱的人才能买到，贫雇农则无份；3. 专调长得漂亮的妇女到乡、区政府办事，不漂亮的即使是会说话会办事，也不要，乡政府的人员下乡，很愿意和漂亮的妇女讲话；4. 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指定，代

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甚至会议的主持者横加指责不举手的人。毛泽东向参加调查会的人指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不改变,就会使新生的工农政府脱离群众,影响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通过土地斗争,广大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真正感到工农政府是自己的政权,必须保护它。所以,在土地斗争后的农村,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纠察队、红军预备队等组织。这表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对维持地方治安,除奸反霸,支援红军,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本来计划还要调查儿童和妇女的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状况,但由于敌人向罗坊进攻,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移师赣江东崖,准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军事“围剿”,他没有时间继续调查下去,因而结束了这次调查。

在《兴国调查》报告中,毛泽东介绍了所使用的调查方法,这就是首先提出若干个问题的调查纲目,向参加调查会的人逐一发问。同时,和到会人一起讨论,把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提出某一问题的结论,或解决办法,再征得到会人的意见,大家同意了,就把结论定下来。如某一问题会上作不出结论,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就把意见记下来,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调查会,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由于开得生动、活泼、有趣,到会人毫无拘束的感觉,有时会开到深夜,大家也不觉疲倦。

毛泽东根据这次调查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就表明错误的东西,是同不调查、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决定错误政策的根本原因。“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可以减少主观主义,正确地解决主客观的矛盾。

毛泽东把兴国调查同过去几次调查作了比较,认为这次调查虽然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但同过去历次调查相比要深入些,纠正了寻乌调查中的缺点。兴国调查中,对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游民等都分别作了深入调查和专门分析,这就使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有了具体的了解。这些成果都补充了寻乌调查的不足,同时也反映了兴国调

查的新收获、新特点。

四、长冈乡、才溪乡调查

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两次围攻，同时又加紧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苏维埃政府提出“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任务已经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完全地实际地去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上级机关有些同志只知发出的命令和决议，却不知道乡、市政府工作的实际内容是什么。还有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中，存在着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阻碍了政府任务与计划的执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冬，对江西省兴国县的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长冈乡，调查了村、乡委员会，以及地方部队、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合作社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工人、贫农团、宣传队、革命竞赛等十九个项目。在才溪乡调查了乡的代表会议、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八个项目。明了乡和村政权所做的各项具体工作。

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这两个乡的先进经验，其共同特点是：宣传教育工作好，生产组织得好，群众生活安排得好，公债推销得好，参加红军踊跃。他们的工作成绩具体表现在，成立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使劳动力有组织地调剂，这种生产形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参加红军多的村子。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在革命前，他们的粮食不够吃，只有3个月米饭吃。革命后，可以吃到6个月米饭，还有余。碰到夏荒，乡政府又组织人到外县办米救济群众。有人没有房子住，乡政府发动群众帮助修建。过去，每人两年做一套衫裤，现今每人每年做一套半。乡和村政权的各个委员会，都是经过群众选举产生，不称职的代表，经过讨论可以随时撤换。他们推销公债，不是强迫摊派，而是宣传鼓动，提高群众对购买公债作用的认识。经济建设的成绩，兴奋了群众，经济建设配合政治动员，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纷纷参加红军。才溪乡16—55岁有4 928人，男子出来当红军、做工作的有1 018人，女子29人。长冈乡分为四村，有1 78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

这两个乡在经济建设与支援革命战争的关系上,解决得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因此,毛泽东指出: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毛泽东还用唯物论的认识论阐述了先进经验的产生和如何对待先进经验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毛泽东用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先进经验的具体事实,驳斥了几种不切合实际的瞎说。这些瞎说是:1. 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2. 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3. 说群众不愿当红军;4. 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上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基层工作的实际内容,有些人甚至坐在机关里头瞎说,“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总结和宣传这两个乡的先进经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供给一切落后单位以具体的活生生的榜样,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的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表彰了长冈乡和才溪乡,把这两个乡的调查报告印成了材料,发给了到会代表。他称赞这两个乡,是“两个模范乡”,是“真正的模范乡政府”。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如果全苏区几千个乡都学习他们,和他们一样做出成绩,那么就一定能战胜敌人的围攻和经济封锁,就一定能保卫住苏区,发展苏区。

毛泽东以长冈乡和才溪乡的模范事迹,同汀州市政府的工作作了比较,指出汀州市政府的工作作风是官僚主义的。他们只知下命令,只知往下摊派各项工作任务,不做宣传发动工作,不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群众缺米、缺盐、少柴,十分盼望汀州市政府及早帮助解决。但是,他们不研究,不解决,置之不理。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结果,就使得他们召开的会议,群众不愿参加,他们组织运输队,动员参军,推销公债,成绩也都极少。对此,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要“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他们脱离群众,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是不可能把工

作做好的。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群众自觉自愿地全力以赴地支援前线，就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从土地、劳动、房子、妇女生孩子、小孩上学，到柴米油盐等群众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要提到各级政府的工作议事日程上来，想办法研究解决。毛泽东之所以非常重视群众，反复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就是因为他在革命实践中，在不断地调查研究中，认识了群众，得到了一条真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困难也不怕，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就能壮大自己，战胜敌人。

毛泽东把长冈乡、才溪乡的工作方法同汀州市政府的工作方法作了比较，概括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指出了什么是工作方法、工作方法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关系等。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他非常形象地把工作任务比喻是“过河”，把工作方法比喻是“船”或“桥”，“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赞扬长冈乡和才溪乡的模范工作者，指出他们的工作之所以做得好，就是因为“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

毛泽东从基层的工作经验中总结和概括的这一工作方法，其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使先进的地方更加先进，使落后的地方赶上先进，造成更多的长冈乡和才溪乡，这样工农政权就有了巩固的阵地，有了铜墙铁壁，就有了强大的力量战胜敌人。

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把调查同总结工作经验结合起来。这两个调查，不仅反映了基层工作的真实情况，而且又总结了两个乡的工作经验，并从中找到了先进的工作经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第二，把调查同宣传、推广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先进经验，毛泽东不是把它总结出来就停止了。他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些先进的经验，带动所有的基层工作。通过推广先进经验，使整个基层工作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第三，把调查同批评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毛泽

东在调查中不仅发现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先进工作经验，而且也发现了像汀州市一些单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作风，就是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高高在上。他把先进经验同官僚主义作风作了比较，有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机关没有号召力，群众不愿意响应他们的号召，因而他们布置的任务总是完成不了。对此，毛泽东提出用先进经验的材料，供给那些官僚主义者，作为实际的榜样，使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迅速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第四，把调查同推动革命任务的完成结合起来。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工作经验，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积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支援革命战争。宣传这两个乡的先进经验，使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他们，并同他们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前进的阵地。

第五节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总结。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研究，学术界众说纷纭，我们在这里摘录黄少群、张培林的新著《毛泽东的独特创造》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其中包括了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种讨论。

一、“六大”前后党内关于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

从大革命失败到党的“六大”前后，关于中国革命应该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党内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是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走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的道路呢，还是反过来“以乡村为中心”，走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无可否认，在那个时候，“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是占了上风的。尽管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在城市中已无工作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八七”会议以后，各地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党的工作重心实际上已移向农村，即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和发展红色武装。毛泽东就曾实事求是地指出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都不肯承认这一点，仍然拚命强调城市中心论，拚命要将农村起义纳入城市斗争的轨道，强调农村起义必须配合城市武装暴动，夺取城市中心政权，求得

革命速胜。所以毛泽东后来又正确地指出：“1927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首先是共产国际坚持中国革命必须走城市中心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是集中在城市里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城市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不能改变的，何况又有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榜样。好心的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一直是不放心的，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举。直到1940年他们还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当周恩来到共产国际去向他们说明：“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盛行的潮流下，中国党内是没有人敢违抗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其次，从我们党内来说，多数人还不相信走农村道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的同志也曾经“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情况”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过研究。从历史经验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党在乡村的工作一时也不能给人们展示出光辉的前景，各地爆发的农民武装起义如广东海陆丰，海南岛，湖北黄安、麻城、湘南等地都相继遭到失败，“各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而蒋桂战争还未爆发，统治阶级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这种研究的结果，是认为“在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是认为“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是认为只有“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周恩来如实地指出说：即使在党的“六大”上，“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党的“六大”及其以前党内在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思想状况。这是历史条件局限的结果，“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以上所引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178页）

但是，从党的“六大”以后，特别到1929年和1930年的时候，国内的实际情况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军阀混战此伏彼起，连年不断，大大削弱了反动统治的力量；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则乘时而起，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就

是说，历史的发展，已经提供了条件，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提出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党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却仍然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仍然奉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迷信于苏联的经验，极力鼓吹城市中心论，并把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而加以压制。这就不能归之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完全是犯了“左”倾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了。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理论，正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在党内的激烈争论中，顶着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左”倾思想的错误潮流产生出来的。

二、毛泽东能够提出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经把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归之于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功劳，他说：这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发现”。这是实事求是的。当然恩格斯也说了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对马克思的鼓舞和影响。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创立，也应该说主要是毛泽东的功劳，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一个大发现。当然不否认党的其他领导人对这一理论所作的贡献，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这一理论，并在实践中顽强地坚持，那么我们党和人民可能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鉴于这个立论，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考察就不是从其他方面来搜寻例证，而主要是从毛泽东为什么能首先提出和创立这个理论的原因说起，即首先探讨一下毛泽东能够提出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他主要做城市工人工作，1922年他在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即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用全力领导长沙、粤汉路、安源煤矿及水口山矿的工人斗争。有一次恽代英看到陶行知先生他们搞乡村教育工作，就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那时候即大革命前，全党对农民问题都还是无认识的。1925年毛泽东回湖南家乡养病，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他不但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并从事组织农民的工作，在这一年上半年就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在“五卅”运动反帝大浪潮中，湖南、广东，河南等省的部分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了斗争。毛泽东这时即已充分地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

并领导农民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及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伟大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论文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揭示了由雇农、贫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从而为我党奠定了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来进行民主革命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思想基础。

在此时前后，党对农民运动已逐步有所重视。1924年7月在广州由共产党人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了一批农运骨干。1926年5月3日，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党从全国20个省区调来了300余名学员接受训练，这就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926年10月23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迎着党内党外对农民运动的一片责难声和咒骂声，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他耳闻目睹了湖南农民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猛烈进攻。2月16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农民斗争的伟大意义，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运的丰富经验，从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和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进攻而失败了。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

要的任务。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组织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部队在进攻平江受挫后，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于9月20日带领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不久，即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间，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趋于巩固。

要在农村或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就产生了。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主张要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在7月4日举行的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曾主张：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国民革命军。毛泽东不同意，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提出了“上山”的主张，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曾强调指出：今后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工农红军的创造，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第一次伟大实践。正是为此，所以他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能够首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理论。

三、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形成过程

毛泽东在实践中成功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理论本身，也正是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正式萌芽的。

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形势的年代，许多地方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相继失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虽然在四围白色恐怖中巍然屹立，但也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曾遭受过“3月失败”和“8月失败”的两次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同志，首先是井冈山的一部分同志

中就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怀疑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这一疑问实质上是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争论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泽东首先勇敢地站出来，根据中国革命与欧洲各国不同的“特殊情况”，“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来回答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也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历史新问题。

1928年5月在宁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第一次回答；接着在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1月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这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总结了一年多来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这就是我们通常称謂的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首先肯定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无疑的”，他具体指出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条原因（略，见原文），分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肯定了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党和红军的重要作用等。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又补充指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总结出了一套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均略，见原文）。这两篇文章，是在党内第一次具体而又系统地论证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深刻而又精确地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

这样，毛泽东提出的红色政权理论就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理论确立了一个根本的前提：既然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首先就必须“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就是先要建立相当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而更重要的是革命有了赖以前进的根本阵地。

当然，这时候包括毛泽东和党的“六大”都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中心的问题，如前所述，历史条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毛泽东在红色政权理论的基础上，思想认识又不断向前发展着。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从山头来到了平地，即

从井冈山进到了赣南、闽西更广大的地区。他们利用军阀混战的空隙，集中红军主力行动，打垮了闽西和赣南的地方土著军阀势力，从3月到6月，在赣南先后建立了兴国、宁都、于都红色政权，初步开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在闽西先后建立了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红色政权，初步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两大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进一步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了《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报告提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时又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的夺取群众”，“工农外，兵士群众的争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闽粤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又说：“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又写了《前委致中央的信》，进一步强调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建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重申“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相联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之根基。”并再次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

这两个文件，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思想的继续发展，这比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时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不仅红军的活动要扩大到赣南、闽西20余县，而且建议中央在全国到处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处都创建红军和小块红色政权，并在条件好的闽、浙及赣东、赣南两边区“首先创造公开割据”。当然这时毛泽东也还未能得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论，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两大核心问题：一是要解决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二是要解决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

乡村。毛泽东在实践中卓越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即已“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但那时采取的办法只是在政权机关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份”，还无法从思想理论的高度来解决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是企图从根本上来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还不够成熟，结果事与愿违，在这次大会上非无产阶级思想未能克服，在选举时毛泽东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遭到削弱，红军也一度遭受了损失。后来在党中央（主要是周恩来主持下）发出的“九月来信”的支持下，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并于是年底顺利举行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案，着重批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列为八种，逐条加以批判，并提出纠正的方法；决议详细规定了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办法，努力把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的思想水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程度。所以古田会议的重大成就，是在于它进一步解决了党和红军长期在农村发展并且其成份主要是农民的状况下的建设问题，亦即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用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古田会议刚刚开完，1930年的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明确地指出：“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这种理论产生的原因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这实际上是批判了“城市中心论”，指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心政权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建立农村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的极大必要性。他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

最重要因素。”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正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从上述过程看来，红色政权理论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必要前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则是红色政权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正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光辉指引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英勇转战在赣南、闽西 20 余县的一大范围内，到这年的 6 月，即在实际上开辟了以赣南、闽西为基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即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是全无失误，但是就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理论来说，完全应该说是毛泽东所作出的一个伟大发现，“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毛泽东“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的。这一理论的发现是毛泽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幸福。

四、对这一理论形成时间及标志问题的讨论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及标志，近年来党史学界提出来的看法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看法即作者的上述认识，简言之即认为这一理论基本形成的时间是 1930 年 1 月，其标志是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具体理由如上，不再赘述了。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这一理论基本形成的时间是 1930 年上半年，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这与第一种看法基本相近。但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标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两大中心问题，即党对农民的领导问题和以乡村为中心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已经解决，这一理论已经脱胎而出。《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强调一切问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绝不能仅从“本本”出发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所以这部著作是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着重强调研究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照抄书本、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倡“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当然，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提出，是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有助于多数同志进一步承认这一理论，但是它毕竟与这一理论本身没有更直接的联系。

第三种看法是认为这一理论形成的时间是1936年12月,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标志。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是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没有明确提出乡村工作为主的思想;并认为这篇文章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所以不能作为这一理论形成的标志,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才算基本形成。

这种看法是把一种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的发展阶段弄混淆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已经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把这一理论向前发展一步,使其更臻于完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从理论上对中央苏区时期的两种政治战略主张和两种军事战略主张相斗争的总结。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自从回答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基础是通过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间经过“六大”,到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已经筑就了,不是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提出来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种看法是把这一理论形成的时间推迟到1939年12月,标志是《战争和战略问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种看法认为,以前的文章都没有“明确作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结论,只有《战争和战略问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最终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这种看法不仅把一种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的发展、成熟阶段相混淆了,而且很显然这是从字面上做文章,不是从思想实质上来论证问题的。我们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作者是把《战争和战略问题》作为其立论的标志来引证的,但是他却未去注意毛泽东在文中说的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说:“1927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1931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我们现在这样想。”我认为这段话说明了三个意思:一、以乡村为中心的问题,毛泽东至少是在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我认为是在1930年1月)就解决了;二、正是有这个前提,所以才有“一些同志”的“在1931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的“根本的转变”;三、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则到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完成。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把第四种观点、同

时也把第三种观点都给予否定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曾这样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开展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决议》指出：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如果这一理论是到1936年12月、甚至到1939年12月才基本形成，那么《决议》所说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就值得重新考虑。1936年12月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1939年12月则是抗日战争时期了，这个期间里毛泽东思想“通过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开展而达到成熟”的阶段，如果到这个时候才刚刚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核心理论，那么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也就无从谈起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也正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里根据全党认识上的逐渐趋于一致，对它作了一个完整的总结，从而使这一理论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也就是说它在各方面都进一步完善了。如果从字面上做文章，“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到党的“七大”前后才正式提出来的，那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岂不要从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推迟到党的“七大”即40年代中期么？！须知这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赞成的，同时这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第六节 反“围剿”的斗争

毛泽东对斯诺谈起了苏区的战斗经历，他说：“1930年春，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朱德，我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

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10倍到20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扎实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保卫后方；只要耸人听闻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它的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1929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军团在挺进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急转向西，向长沙进击。在这次进军中，第一军团同彭德怀的部队汇合了。彭曾一度占领长沙，但是为了避免被强大得多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在1929年4月被迫撤离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1930年4月，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的第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向福建进军。1930年8月，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再次会师，并

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并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样一个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家在湘潭的田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他人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望甚至扩展到了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的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9月间，新的部队又纷纷开进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的两个旅。但是，它未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如果把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错误。”

毛接着谈下去：“李立三既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

内丧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核心吉安附近，这个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10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乱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仅仅经过4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15天内，红军打了5个仗，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

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三十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三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10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召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在12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多人起义，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1933年2月，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打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000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高级指挥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

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們以前的机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陈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1934年1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4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一、从古田会议到第一次反“围剿”

郭化若在《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一文中回忆与叙述了毛泽东领导这一时期战斗的主要经历。

(一) 由汀州会议到牛行示威

经过1929年底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受到了彻底的批判,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得到了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总结,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建军纲领树立起来了,革命战争中的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红四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四军的一、二、三纵队由闽西出发(四纵队留闽西活动),经过“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的行军,避免了汀州敌军的尾追和纠缠,顺利地“直指武夷山下”,翻过武夷山,进入江西省境。红军在赣南活动了大约4个多月,主要是执行红军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打开了广昌、永丰(1月)、南康(3月)、信丰等城,消灭了许多地主反动武装和反动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使赣南红区打成一片。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对待农民武装的策略等,都作了专门的详细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召开了有名的“二七”会议,把赣南党对于土地革命的工作,引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大大发展和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尔后的反“围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场。毛泽东在亲手缔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这种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制定和实行正确路线的保障,在根据地开创初期,是非常切实而重要的大事。在这一段时间里,红军曾于2月24日,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地区干净地消灭了敌唐云山的一个旅,约3000人左右。战斗的胜利和几个城市的打开,大大地鼓舞了江西、福建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许多人踊跃参军。6月,红四军重新开回闽西,在汀州休整。

毛泽东在汀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当时前委是领导军队党和地

方党的，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负责人外，还有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在会上传达并讨论了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扩编的指示。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这就决定了红军在战略转变中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汀州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第一次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时全国红军都奉党中央的命令整编、扩编，“立三路线”又下令各路红军分别向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进攻，国民党新军阀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则开始了反“围剿”作战。从此开始了反“围剿”的运动战时期，所以这次会议可以看作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这次会议决定了红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路线、方针和方法，对红军进行了整编。与此同时，对闽西地方工作也作了讨论和决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红四军在整编前指挥四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第一纵队，原系南昌起义保存下的部队，“保存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也保存有叶挺独立团勇猛的战斗作风，在井冈山时叫二十八团（此时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二纵队原系由毕占云率领起义的一个营和军部特务营编成，只有两个支队，实即两个营，部队建立较晚，基础稍弱。第三纵队即前武汉警备团加上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它就是毛泽东亲自率领上井冈山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干部也有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蒋介石叛变后，我们利用了武汉警备团这一合法的番号，收容了从各地被赶出和自己逃出的共产党员。开始时缺乏战斗经验，被称为“学生军”，后来逐渐锻炼成为能攻善守能打硬仗的部队。在井冈山时期叫三十一团，此时也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四纵队是由闽西地方部队升级的，成立不久，战斗力较弱。军部特务营只有3个步兵连和一个侦通队。汀州会议对于政治、军事路线问题没有什么争论。整编是以原红四军一、二两纵队仍编为红四军第一、二两纵队。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红四军的第三纵队。以原红四军的第三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十二军。从三纵队抽出一个支队后编成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由三纵队抽出的一个支队，加上江西的地方武装一个支队，编成红十二军的第二纵队。红十二军的第三纵队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原红四军第四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西红十二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二、四团为基础扩编为红三军，黄公略为军长。从三纵队、支队政委中选调出罗荣桓为四军政委，蔡会文为三军政委。

原红四军军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3个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

1930年的革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中所预见到的，革命高潮“很快会要到来”。就在这个革命高潮正要到来时，立三路线窃据了中央领导，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下令要一、三军团和湘鄂西、鄂豫皖红军分别打南昌、九江、长沙，然后“会师武汉”。打大城市，这是当时党中央的决定，这里有个组织服从的问题；但在敌军强大、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就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却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里摆着严重的矛盾：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同志，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各个歼灭敌军，发展胜利，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我们且看毛泽东是如何正确领导这一战略阶段转变中的路线斗争的。

红军在汀州整编后，于1930年6月22日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内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把党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四军、红十二军到江西后拟同红三军会合（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所说的“偏师借重黄公略”即指此），正式成立红军第一路军（不久就改称红军第一军团）。

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三军则就地整编，并未开来集中。7月11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时，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只发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的）。在向北推进中，红军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授意下由朱参谋长主持，在参谋处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人。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抚州地区一个旅（旅

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一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一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地形不利的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转去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只是因为要在樟树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就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二）从永和会师到二打长沙

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上海7月底8月初的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回来。据报，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战后清查，电台已被破坏。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很关心这件事，在打文家市的作战命令中，专门写了注意事项，要求保管好缴获的无线电台。然而没有引起各级干部注意，甚至缴获的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好几箱，也被焚烧了。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经验证明，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自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来集中。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此外，还组织了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

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坚持在红军还幼小的时候进攻中心城市，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击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于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 31 个团，我们的兵力实际上只有 13 个团。敌人兵力多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设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彭德怀和他影响下的少数干部，也坚持要打，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推进”（红一方面军司令部 1930 年 8 月 24 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于 8 月 28 日进到长沙东南郊距城约 20 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毛泽东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 9 月 1 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分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 10 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们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 3 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有的领导人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采取妥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方面军的总预备队（这是彭等无法反对的），仍控制着猴子石侧面；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3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一、二旅及补充第六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两个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四军、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下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两个团基本上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其他方面敌军的出击部队亦被我完全击退。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军虽失了一件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有人又吵着要打长沙，并亲自指挥三军团主力猛攻，企图用“火牛阵”冲破敌人电网，可惜火牛一出动，冲不到电网跟前，就被敌机枪扫倒，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第二天，只好大家吃牛肉。

（三）从撤离长沙到回师攻吉

怎么办？怎么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来呢？

“毛委员有办法！”这是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毛委员就是有办法，而且有的是最好最妙的办法。

这时，毛泽东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这是第一步。红一方面军从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个月之久。这时偶然得到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泽东当即提出先消灭桂军和何键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桂军和何键部队，就得将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中各个歼灭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毛泽东就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见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12日命令）。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又以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四十万元，所以必须在三县（均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二十万，才能支持半个月军费。同时，在三县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也颇紧急。这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第三步。9月13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说：“……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金”。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

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回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诱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在东移中，路过安源，为了团结彭德怀，毛泽东亲自到安源三军团驻地，专门做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在这期间内，毛泽东还到安源工人中做了工作。总司令部随后经过安源东进。总司令部在安源短短两天内动员了安源矿工100个人挑了100担炸药参军，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于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就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去打长沙。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栗到总部来。当晚他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栗一到宜春，毛泽东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亲切地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本来是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的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成为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勇敢地拥护毛泽东，捍卫毛泽东的马列主义路线，“横眉冷对”王明路线的干将们的围攻。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说服了周以栗并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吉安这个孤城，曾被江西地方武装长期围困，并进行过八次佯攻，即有名的“八次攻吉”。吉安守敌是邓英部三个团（不足），在我江西赤卫军独立团等的政治攻势与不断袭扰下，士气低落，军无斗志，真可说是惊弓之鸟、瓮中之鳖。吉安又是江西省一个较大的城市，周围都是红区，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各个县城内也只有极少数的靖卫团。打下吉安，可以使广大红区连成一片，更好地发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更进一步“经营江西”。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比较容易说服干部和群众。

10月初，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沿大路前进，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江西省委（当时叫江西省行动委

员会)书记李文林。毛泽东一见到就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中央来的。毛泽东又问他: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中央还是要我们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说着又用手指着前面正在走着的部队说: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面对这实际情况,只说了一句话:那也只好这样。毛泽东就在路边坐下,向李文林说明打长沙的经过和回师打吉安的意义和作用,又问了中央还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没有?

红军开向吉安,打吉安时,还没有等到兵力完全集中,有人就急着要打。10月3日午夜,即阴历8月13日凌晨,攻城部队进入吉安城内,双英部敌军全部坐船由赣江北航,向南昌逃跑了。

打开吉安后,周围的太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了,我们占领了许多县城,周围红区连成一片。各地赤卫军、赤卫队纷纷赶来,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和二十二军(军长陈毅,古田会议后不久就调到江西来了)也奉命调到吉安附近,于是吉安周围数十里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好不热闹。大批红区武装和群众拥进城来,抓逃到吉安的土豪劣绅。在城外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据打下吉安后的粗略统计,这时一、三军团加二十军、二十二军和总直属队合计已超过五万人。

(四) 从罗坊会议到黄陂集中

三军团少数领导人肯跟毛泽东和一军团一同回到江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打下吉安后,一、三军团配合打九江、南昌,要“最火速、最勇猛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争取武汉”所以吉安解放后,有人又吵着要火速北上,攻打九江、南昌。这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由于交通梗阻,文件一件也没有及时送到江西。

在吉安会议上,经过争论、说服,毛泽东提出了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在袁水与瑞洲河之间布置工作……发动这一带群众筹措给养……暂以7天为期”。部队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泽东沿途在峡江、太平圩都召集会议,找干部谈话,继续研究行动问题。方面军进入袁水流域以后,总部先住在黄土街,以后移到罗坊。三军团工作地区分配在清江沿赣江一带比较富饶的地方,这是为了照顾三军团的情绪,特地安排让他们走最少的路,到较好的地方。毛泽东因为沿途开会、谈话,稍晚些时间才到罗坊。毛泽东到达罗坊后,又天天找各军高级干部谈话、开会,询问地方社会情况,了解群众情绪,了解群众工作和

筹款情形，着重商议在红军已扩大、兵力已集中的条件下，如何打运动战的问题，当蒋、冯、阎混战结束，敌军即将对我军开始进攻时，我军如何作好充分准备迎击敌军即将前来“围剿”的战略问题，商议如何说服军队和地方部分干部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意见。毛泽东聚精会神昼夜不倦地考虑着战略问题。在罗坊期间，毛泽东还抽空找到参加红军的兴国同志，调查了兴国、永丰区的社会情况，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这不但树立了调查研究这一马列主义的工作作风的典范，而且也为尔后的反“围剿”战略行动作了准备。（后来，第三次反“围剿”高兴圩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就曾经于夜间从战斗中撤出，在匆忙中，依靠这一调查很快地就分配了部队宿营地，顺利地转到永丰圩地区整顿。）

在袁水流域工作到10月29日，红一方面军发出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延长工作3天，至11月2日止。”3天很快又过去了，遵照毛泽东指示，总部再下通知：准备再延长3天。通知才写好，还没有发出去，就发现敌人进攻的情况。据报，敌军十万，已开始向我前进。这就是蒋介石发动对中央红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开始。总前委立即在罗坊召开了紧急会议。当夜三军团来参加会议的只有滕代远、何长工两同志。彭德怀和袁国平因为路远没有叫他们来，派周以栗同志去传达说服，周以栗以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代表总前委传达紧急会议的精神较为妥当，周以栗完成了说服任务。

罗坊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行动问题。这时，客观形势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打不打南昌和九江的问题，而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有人主张前进到白区去打（包括前进到南昌、九江去打），也就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一）退却丧失了土地；（二）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三）对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他们不了解：“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退却，退到红军根据地内，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援助，可以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之敌不得不就我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可以察明敌军的行动，看出其行动规律，可使敌人分散、疲惫，可以发现敌人弱点和造成敌人的过失，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毛泽东用许多道理反复说明了退一步以取得主动权的道理。对于惧怕丧失土地的问题，毛泽东用“将欲取之必先与

之”的道理，说明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丧失土地才能换得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关于危害人民的问题，也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毛泽东要求干部不忘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实行战略退却。然而，“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极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虽然困难很大。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干部，使大家同意了向根据地退却。接着的问题是战场选在赣江西岸好，还是东岸好？毛泽东考虑到往后的发展，认为赣江东岸比西岸好。这是井冈山斗争中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结论的延伸和发展；即主要的发展方向不是向湖南，而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闽浙赣边界。从江西一省说，赣江西岸同东岸地区大小虽差不多，但东岸连接福建、浙江边界广大地区，比起西岸回旋余地却大得多。于是首先肯定了方面军立即收拢部队，渡过赣江，开向樟树、抚州、永丰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东渡赣江的命令是11月1日下达的，当时还写上“相机略取樟树、……相机略取抚州”字句）。另一个问题是，退到边沿区还是退到中心区？当时因为有立三路线和AB团两个问题，所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退到中心区更有把握战胜敌人，提出的口号是“诱敌深入”。罗坊会议后，我军即按毛泽东意见移到赣江东岸首先到达樟树、抚州、永丰地区，使向袁水流域进攻的敌军扑了一次空。不久，再经过一次会议讨论后，总部再下令向南（偏西一点）移动，移到红区边沿，又使渡赣追来的敌军第二次扑空。接着红军第三次下命令到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待机，使敌军第三次扑空。至此，我军完成了集中主力作好战略反攻的准备。

全方面军经吉安及其以北地区东渡赣江时，总部是在峡江渡江的。毛泽东亲自从峡江绕道到吉安城去布置江西地方反“围剿”斗争的工作。对赣江以西地区坚持斗争的工作（包括吉安等城市的撤退工作）在路线、方针、方法、政策、策略等方面，都作了极为详尽周密的指示和部署。

1930年冬，我军经过近4个月和立三路线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后，退到小布、黄陂一带集结。在小布开了个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

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是毛泽东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在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富有说服力和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详细说明了我军反“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反复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

从永和会师，经过二打长沙，近郊“散开”，移到萍、攸、醴待机，在该三县工作12天，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到吉安、峡江以至罗坊会议，决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再经东渡赣江，向红区边沿区退却，直到小布、黄陂集中，这就是毛泽东团结、争取和诱导三军团回到江西，在战略上集中兵力，准备好粉碎敌军“围剿”的曲折过程，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区同立三路线作激烈的曲折的胜利的斗争过程。这一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五）从小布设伏到龙冈全胜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当时敌军情况是：蒋冯阎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拼凑了杂牌军八个师约十万人，任命伪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指挥，向我江西红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处于外线作战地位，进行战略进攻，其指导方针不外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也叫“并进长追”。

战役前夕敌军的分布情况是：最西头是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隔在赣江之西。最东头是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在福建之建宁，不一定入赣。两头相距800里。这800里的中间，敌军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是张辉瓒的十八师、谭道源的五十师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二十四师两个师。在我军集结地北面的敌军，实际上只有三个师分占三处：右边张师进占我东固、南垅，公师在它后面的富田（后来又调回吉安）；中间谭师进到源头，先头团进到头陂；左边许师进至洛口，毛师进到广昌，其先头进到头陂。敌军分散、疲惫，士气低落。

我军的情况是：我军主力一、三两上军团加总部直属队，此时只有33000余人，把由二十二军缩编的六十四师（师长粟裕、政委高自立）计算在内，共约40000人左右，集结在黄陂地区。武器虽差，但士气很高。内部的意见分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一系列斗争，至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后，已统一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下。

战区的地形基本上是山地，交通不发达，敌军左右联络不便，后方补给困

难。我军集结在根据地的中心区，有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援，又有地方武装的配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在战略防御中，采取战役进攻。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逐步壮大自己。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理想。红军一、三军团主力，已经集中整训，政治动员工作做得比较普遍深入，财粮已有相当的征集准备。总之，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既没有轻敌放松，也没有惊慌失措的现象。

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考虑到：正面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打掉了张、谭，就把敌军“800里连营”切断，使之成为远距离之两群，敌人的“围剿”就打破了。从兵力上讲，张、谭两师各约14000人，我军则有三万多人，13个团的兵力，一次打它一个师，兵力数量上占优势，有把握。如先打毛、许，则因：第一，地区居民条件不够好；第二，打了后再向西，则张、谭、公三师，势必靠拢集中，不易取胜，全战役不易解决。因此决定先打张辉瓒或谭道源。

为了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最好是歼灭敌人于运动中。这里有一个慎重对待初战的问题。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毛泽东改造和发展了旧的军事学，主张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把握不打。要什么样才算有把握呢？主要是等待敌人发生错觉，等待敌人兵力分散、离开工事，等待和调动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地形上来，也就是说等待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2月24日，我们在黄陂得到情报，谭道源大肆拉夫，准备出发，向小布前进，这是个好机会。小布地形有利于设伏。方面军当即于26日拂晓前轻装向北前进，在小布埋伏。严格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都不许带马，以求隐蔽和肃静。可是我军从早晨等到黄昏，等了一整天，敌人没有来，当晚撤回黄陂。第二天半夜又去，从拂晓一直等到天黑，仍未见到敌人，只好再次忍耐撤回。这时候，有些怪话出来了。有的人不懂得在反攻中必须慎重初战，尤其是第一次反“围剿”更为重要。初战“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毛泽东就是这样坚持慎重的态度，忍耐着，等待着。“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后来在歼灭了谭道源一部后，在清查敌军作战文件中，查明谭师确曾下令向小布前进。经询问俘虏，才弄清谭道源全师原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小布前进，其先头部队并已出发，但因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逃跑出去告密，说小布埋伏了许多红军，谭怕得要死，立即下令停止出发，并把已经出发走了相当远的尖兵，叫了回去。事实

证明；在小布设伏，是正确的。

小布设伏未能打到敌人，便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我军遂于12月29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

移到君埠地区后，当天黄昏得到情报，东固敌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同日已进到龙冈（另一个旅尚在东固）。预料该敌次日可能向君埠前进（东固东20里为南垄，南垄东20里是龙冈，龙冈东20里即君埠）。龙冈、君埠之间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该山。这时谭道源师仍在源头。毛炳文师则移到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认为敌人已被调动。立即下定决心，抓住战机，就在敌人前进中消灭它。当时我们没有详细的军用地图，就马上调查，制成略图，下达命令，围攻张师于龙冈。因为我军刚向君埠及其以北地区移动，当晚我们尚未接到三军团和四军的宿营报告，还不了解他们驻扎的具体地点。因此，立即派遣参谋长朱云卿，到君埠以北上固以东去寻找四军和三军团传达命令。并区分三军团和四军攻击前进的道路。作战的部署是：第三军任正面攻击。该军以七师任正面，拂晓前进占黄竹岭前面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东进之张师先头。三军的其余两个师，紧接七师向龙冈东和东北攻击前进。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包括六十四师）任左路，提前于30日4时前出发，经表湖向龙冈西南方攻击前进。要求该军以一部兵力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主力则截断龙冈西面通南垄的大道，从兰石、茅坪向东打，即从张敌后面打龙冈（龙冈正南是大山密林，无路可通）。又令四军和三军团由现驻地选路前进，如上固无敌，则向龙冈之西北端还铺、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到达时须即向三军取联络，向总部报告。并令他们以小部兵力向下固源头警戒，如龙冈之敌未前进，我军即向龙冈攻击。总攻时间，定在上午10时。作战时总司令部指挥所设在黄竹岭后面之小别山上，毛泽东就在这里指挥战斗。

第二天拂晓，我提任正面迎击敌军之红三军七师，进到了预定的阵地。毛泽东率领总部极少数人员，到了指挥所。天色还早，满山是雾，只见群峰雾锁，枫叶霜红，曙光初照，落叶满山，“雾满龙冈千嶂暗”写的就是此时的景色。不久，旭日东升，群山雾散。前线部队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敌军张辉瓒部早饭后即从龙冈出发，向东前进。正在他们的先头艰步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这时我军正面只有一个师（实即一个团的兵力），是由江西地方武装才升级整编的红三军主力师，装备差，火力也弱。敌军轻视我们，不断向我猛冲，战斗大约在9、10时左右打起，到中午前后，敌军逐步展开了两个团兵力，向

我猛攻。战斗激烈起来了，战况一时吃紧，这时总部指挥所附近只有1个连的警卫兵力，并已分散担任警戒和掩护大小行李，没有兵可以派出增援，于是派了一个参谋处长去看。朱总司令解释说：凡是部下请求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没有兵就派将。参谋处长到了第一线师指挥所位置，据师长说：有个新俘虏不久的班长，企图率领一班人投敌，当即被班里战士打死，前线已经稳定。战斗到下午3时许，敌张辉瓒率领的4个团完全展开，多路向我猛攻，我十二军则向敌侧后攻击，战斗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也正在这时候，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的部队，已从龙冈北面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一片混乱。参谋处长跑回总部指挥所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随即从黄竹岭下山，沿大路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许多通信人员和后送人员高兴地喊着：“捉到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此时此景的写真。

正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毛泽东健步走到了龙冈大坪上，只见已经放下武装的一堆俘虏，集合在大坪的一边，站成正方形队。这时有人把张辉瓒捆绑着带过来，他换穿着士兵穿的灰布棉军衣军裤，帽子不见了。送他来的人说，他才被俘虏时，隐瞒身分，说是个书记官，当场就被一起的俘虏揭发。他一路走，一路有人发出叫打声。他走过来时，俘虏队中立刻有两个人走了出来，猛打了他两个耳光，嘴里还说：“你压迫我们够了！现在我不怕你了！”我们劝阻了，并给他松了绑。张辉瓒一见毛泽东就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他过去怎么见过面，说了些别后钦慕景仰的话，毛泽东叫他一起就地坐下，简单地对他谈了些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还表示，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交代要好好看管他，不要杀。但后来有人不报告毛泽东同意，把他交给地方杀了。

这次战斗中，红三军猛冲到龙冈张辉瓒师部所在地时，张的警卫营营长原是黄公略的部下。他早把全营集合好，等黄军长来到时，号兵吹敬礼号，全营举枪敬礼。他还毕恭毕敬地向黄军长报告，然后将缴出的枪整整齐齐地摆好。连他随身佩挂的蒋介石授予的“自杀刀”也一并缴了。

在这次战斗中，有一部分敌人往西向南垄逃命，等到他们跑到龙冈、南垄之间的大山时，正好遇到我早已等在那里的独立行动的一个师，结果一个人也没有逃脱。

龙冈战斗全胜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举全歼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次

全胜。全军振奋，附近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这一次战前，我们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破坏了缴获的无线电台的教训，在命令中规定了注意事项，参谋处又专门发了通报。结果敌人的无线电队人员全部被我俘虏了，可是缴获的无线电仍然没有保存好，发报机受到破坏，只剩下一台收报机，我们就用它作为我军建立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的基础。

（六）从东韶再捷到战役结束

龙冈战斗结束后，我军立即在龙冈附近抓紧时间休整，并继续侦察敌情。休息了一天，第三天部队即移向小布一带，准备再打谭道源。第四天晚上得悉，谭道源师因张师惨败，惊慌失措，已向东逃窜，一部经源头、中村向南北坑败去，其后头部队被我“二路军”（我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截击，缴获甚多。该敌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逃去。他们希望逃到东韶，向毛炳文、许克祥靠拢。那知许师于龙冈战斗后即由洛口逃往头陂，只毛师靠拢。当时毛泽东判断敌军有全线退去的模样，总部即于当夜10时下令，于翌晨追击东韶之敌，计划歼灭谭师于东韶附近，然后，次第消灭朱绍良所属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之声威。令十二军任正面，经南团、林池向东韶逃敌攻击前进。令三军团任左路，经陂头向东韶攻击前进。令三军任右路，限于明天12时进至田营，以主力钳制洛口敌许师，阻其增援，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之敌攻击。红四军为总预备队。命令下达后，各军多提早出发乘胜进军。上午，十二军先头部队即与敌接战。我主力军陆续赶到，相继合围，各部向敌猛攻。这是龙冈战斗的第5天。谭师才到东韶，虽曾依山布防，但未及完成工事，次日我军即赶到。敌军闻张师惨败，已如惊弓之鸟，再经我猛攻，伤亡惨重，全线不支，谭道源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逃窜，逃回抚州。东韶一战，谭师溃不成军，我军歼敌数千，缴枪千余。5天打两仗，俘获一万余。毛、许两敌则在我进攻东韶时由头陂经广昌向南丰北逃。这样，就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是我军由游击战争发展到正规战争这一伟大战略转变中，首次胜利的战役，特别是初战取得完全歼灭敌人的胜利，创造了歼灭战的典型。战后毛泽东在谈到龙冈全胜时说过：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歼灭，不走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毛泽东还谈到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

一支兵为预备队。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

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大灭了敌人威风，大长了我军志气，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政治声威和全军官兵的斗志，大大鼓舞了赣南、闽西的广大工农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红军支援的积极性，牢固地树立了毛泽东领导的权威，就是过去反对过毛泽东正确领导的人，也不得不表示拥护和服从指挥了。而这一领导权威的确立，是尔后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特点是：一、创造性地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敌人诱到我革命根据地内打，以便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二、坚持慎重初战，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把握不打；三、坚持打运动战，坚持打运动中之敌；四、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和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永放光芒。

二、第二次反“围剿”

徐松林的《横扫七百里》一文以其亲身经历生动记叙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情景：

1931年初，在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以后，红军一方面军总部驻扎在宁都县黄陂背后的三堂村。那时我在一方面军总部当传令排排长。我们传令排的任务除传递命令外，还给总部首长站内卫哨。

4月，蒋介石又调集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二十多万人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消息一下就传开了。

“好哇！反动派硬是活的不耐烦了，又送死来了。”

“何应钦大概是嫌张辉瓒给我们送来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太少，又急着来补充一些吧！”

大家纷纷地议论着。

这时叶剑英回来了，他接替朱云卿担任总参谋长。我们经常看见他站在一幅比报纸大不多少的作战地图前，凝神思索。地图上，用白旗标着敌人的兵力部署，从赣江向东延伸，一直到福建省的建宁县，这就是敌人这次吹嘘的一条

800里战线。

听首长们说：这一次，敌人以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以第八路军，第十九路军，第二十六路军等部为主力。另外蒋介石又从北方调来一支所谓“新生”力量的第五路军，驻东固西北的富田。它的右翼是四十七师和五十四师，也是北方部队。

总部召开过一连串的紧张的会议，毛政委决定打蛇先打头，消灭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4月27日，一方面军总部从宁都以西的青塘墟出发，经兴国古龙岗，到达泰和县东固的黄沙凹村。这下可就到了王金钰的眼皮底下了。红军主力也同时向总部周围集结。在总部的作战图上，密密麻麻的小红旗插在东固这一小块地区，远远望去就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在根据地外围，牵制敌人的游击队也出动了。

可是，王金钰一直缩在富田那个龟壳里，不肯出来。

目前形势，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和困难，上级都给讲清了。小组会、支部大会、士兵委员会都开过了。可就是老没有战斗命令。战士们成天呆在那深山丛林里，虽然有时上上政治课，有时去帮助山中的老乡打打柴，种种地，可是敌人在面前不叫打，大家都急坏了。附近的菜快吃光了，大家就到处去挖野菜，捉河沟里的螺蛳和泥鳅吃。

就这样一天天地等待着机会，而敌人却还是没有出动。

东固山里的日子好像特别长，好容易挨过了一二十天。突然，总部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交通队、外围游击队接二连三地送来了情报，根据地的老乡们也不断来送信。毛政委、朱总司令、黄公略军长和叶总参谋长一连开了几次会。

王金钰到底从富田出动了。

5月15日下午，三军团往泰和县固陂方向迂回，从左侧插到敌人的后方去了。

16日，总部从黄沙凹往东方出发，凉爽的早晨，微风阵阵地吹着，使人感到格外的舒坦。

毛政委在前边走着，斜背着一把油纸伞。他的蓝布中山装已经破旧了，脚上的布鞋显然是在出发前才经过修补的。晨风吹开了他的长发，使他那丰满的前额显得更宽了一些。

朱总司令背着一顶棕叶斗笠，腰下垂挂着一尺多长的望远镜。在通常的行军中老是我们背着它，只有这次是例外。他跟在毛政委的后边。再后边是二十

二军军长陈毅，他没有赶上开会，一到来，我们就出发了。他们一直沉默地走着。

不多会，队伍走出了东固街，前边有一条小河，陈军长就要过河了。这时，他请示朱总司令：

“这次是怎样打法？”

“从左打到右！”总司令说得那么果断、那么充满自信。

从黄沙凹出发，一气走了10多里。这是一条蜿蜒的峡谷，两边耸立着入云的高山。路旁有一条小溪，溪水静静地流着。

队伍到了桥头岗，靠右前方有两三间民房。毛政委和朱总司令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跟着他们走进了房子。房子里空洞洞的，只有几只山雀见人进来，刷的一下挤着飞了出去。房主人听说白匪离这儿很近，早就搬到山上去了。

我们到屋里没有5分钟，就有三个老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对我们说：

“白匪来了，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

我觉得奇怪，怎么在这里钻出敌人来呢？前边已有我们过去的部队，怎么没有碰上呢？于是我在首长们准许下，带了四个人跑步到前面看看。

毛政委和老乡在屋里仍然谈着话。

走了一里来路，刚转过山脚，就发现了敌人，正坐在路旁休息。刹那间敌人的尖兵也发现了我们。这一突然的遭遇可把敌人吓坏了。他们尖叫了一声，就乱成一团。顿时五六挺重机枪，从左山坡像暴风雨似的，盲目地朝我们这边打来。我们立刻组织还击，边打边退。我一回头，看见朱总司令不知什么时候赶了上来，镇定地站在我的背后。我着急得连连恳求：

“请总司令快走。”

但他像没有事一样，还轻蔑地说：

“这些敌人，走我不赢！”

他已认出了那是敌人公秉藩的二十八师。

不一会，工兵连也跑上来掩护，总司令便安全转移了。

我们一共十条枪，就和敌人蘑菇了半个多钟头。我们退到先前休息的房子旁边，毛政委和朱总司令已经出发了。我们抢上房后的山坡，敌人也跟着追了上来。突然右边山头上向敌人开了火。这一下敌人乱了套，舍开我们，转头就跑。我当时又觉得奇怪了，高山上哪来的部队呢？以后才明白，原来王金钰所指挥的公秉藩部队从富田出动后，就遭到我三军团的伏击，一下就给打垮了。

他们慌乱地向桥头岗附近跑，想摆脱我三军团的追击，哪知又和我们总部遇着了。我们把他们顶住半小时，三军团就从周围的山上包抄而来。等我们把敌人引进口袋以后，他们才向敌人开火。

我们上了山，翻过山梁，才完全明白，不光是这里打得热闹，富田和东固之间的九荣岭、观音岩一带也打得十分激烈。到处是步枪、机枪、手榴弹声，像放鞭炮似的响彻山谷。

晚上，我们赶上了总部，向毛政委和朱总司令报告了情况。

过了一会，杨立三副官长来告诉我们说：

“今天打了个大胜仗，三军团把敌二十八师打得屁滚尿流。一军团的第四军在九荣岭和观音岩把王金钰的四十七师打垮了。”

“我们真是旗开得胜，一下就打垮了敌人两个师！”不知是谁这样说了一句。

大家一夜也没有睡好。17日，天蒙蒙亮，总部就出发了。走了两个钟头，到了昨天作战的地方——九荣岭，还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狼狈奔命的景像：山坡上被滚出一道道的小沟，小树被压倒了，石头被炸碎了，遗下的枪支弹药到处都是，受伤的敌兵躺在地上呻吟着，哭叫着，有的伸手向我们要吃的。毛政委对我们说，这些当兵的本来也是穷人，被敌人逼着来当炮灰的，要我们给他们一些东西吃。我们把身上留下的炒米分给了他们一些。他们接着炒米，哭得更痛心了。

这天下午，下着小雨，路上又湿又滑，红军乘胜追击。沿途敌人的死尸、伤兵、枪支、弹药到处可见。尤其是过了富田，在圳头和直夏的街上，房子里敌人的弹药、大米、洋面一堆堆的原封放着，红军连收条也不打就接收了过来。北方同志好久没有看到白面了，这一次他们好像又过了一个年。

当晚，总部在直夏宿营。

18日上午，雨下的更大了，红军冒雨东进，一直追到吉水县的水南。

这一夜总部驻在离水南10多里的一个小村里。

19日，红军矛头指向白沙守敌郭华宗。郭华宗听到公秉藩被歼的消息，正想拔腿逃窜，没想到红军已到了眼前。

上午10点钟左右，攻击命令下达了。红军战士像出山的猛虎一样，一下就把敌人打得七零八散。敌人连大炮也来不及拖就跑掉了。我们一下就缴获了两门七五山炮和160多发炮弹。这可把大家乐坏了。老乡们听说我们把白匪打跑了，又缴获了大炮，都欢天喜地的从山里纷纷跑回来，围着我们争着看大炮。

这一天又俘虏了好多敌人。按红军的俘虏政策，凡是不愿留下当红军的，可以领三块银洋的路费回家，愿意把毯子卖给红军的可多得一块银洋。（当时红军的布匹很缺，好多同志连条被子都没有，所以总部下命令收买俘虏的毯子。）可是俘虏太多了，我们的银洋不够，后来只得每人发两块。所以后来的俘虏都埋怨自己说：“真倒霉，要是早当俘虏，也能多得一块银洋。”

红军打垮郭华宗以后，继续向东赶。22日，我们赶到永丰县的藤田，在中村遇到了敌人的二十七师。他们在高山上修了工事，准备固守。

这一天太阳一出，三军团的一个师就发动了攻击，一连进行了9次冲锋，都没有攻上山去，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总部也赶到了，离阵地只有二、三里路远。一直到下午1点钟，毛政委和朱总司令见还没有攻下，就命令部队从中村的右翼包抄过去，并亲囑主攻的十二师师长肖克同志要迅速些。在部队出征时，毛政委号召战士们说：

“快点抄过去，消灭敌人！”

战士们听了毛政委的话，个个精神百倍，都像飞的一样冲上去了。

敌人的阵地被打下来了，守敌连夜逃跑，红军紧紧追击。腿短的缴了械，当了俘虏。这一仗我们又消灭了敌人一个整旅。

晚上，总部回到了宁都县境，驻扎在团庄。

红军三战三捷，继续穷追敌人。

5月27日，我们抵广昌城附近。敌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二十四师企图凭“坚固”的工事堵击我们。我们和他们打了一整天，一个冲锋连着一个冲锋，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直到傍黑才攻下了广昌城。这一次虽然消灭了许克祥的1个团，但我们也伤亡了一些同志。

这几天，连续追赶敌人，连饭也吃不上；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今天，是在出发前早上两点钟左右吃的饭，直到下午1点多钟了，总部炊事员还没有把饭送来。路上有连队里往前线上送饭的，传令兵和勤务兵一看里边是热腾腾的大米饭和猪肉，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留下点给毛政委和朱总司令吃。这事叫朱总司令知道了，把这些同志责备了一顿，并和气地对连里的伙夫说：

“把饭担去，叫前方的战士们吃。”

这天的天气很热，战士们吃不多，大筐的饭又剩着担回来了。朱总司令这才叫他的勤务兵给他盛了一碗剩饭来吃。毛政委也吃了一碗这样的剩饭。

晚上，进了广昌城。接着总部就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毛政委、朱总司令、

叶剑英总参谋长。会上决定一军团北上南丰，追击许克祥和毛炳文的残部；三军团继续向东打福建的建宁。总部随三军团行动，第二天下午出发。

5月29日，红军抵达福建省的建宁。建宁城里是刘和鼎部的第一师把守。这个师的装备一律是德国造的双套七八式长枪，枪上有二尺来长的刺刀，还有一个水机关枪营和一个手枪营，有的还配有驳壳枪和冲锋枪，不论官或兵都背有一把大马刀，看来倒是挺神气的。

红军从建宁城背后发起攻击。下午三、四点钟时，三军团抽了一个师从建宁河下游渡河，迂回到建宁城前面进行包抄，战斗到下午六时左右结束。这一仗消灭了刘和鼎部一个团，缴获了山炮两门，敌人的手枪营也全部被缴了械。

建宁城东面的河上，横有一座大石桥。敌人狼狈逃窜时，不少人被挤到桥下摔死了。晚上，杨立三副官长带我们打着火把去打扫战场，在河边的草丛中还捡了好多驳壳枪和子弹。

黄昏，总部进城，毛政委和朱总司令住在城外二里许的天主堂的大楼上。

从5月16日到30日，在这短短的10多天中，红军从西到东横扫700里，共消灭敌人三万多，缴获了两万多支枪，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二次“围剿”。

三、第三次反“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以福建建宁为中心，分布在泰宁、黎川、南丰、宜黄一带，开展根据地工作。总司令部驻在建宁城西门外的天主堂内，毛政委住楼上，朱总司令住楼下。

住下来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像一个输了的赌徒，一心想扳本，赌注一次比一次下得多了。这次是三十万，并且亮出了王牌——嫡系部队，还亲自出马当总司令，屁股后面跟着一串英、日、德各国的军事顾问。敌人兵分三路，蒋介石带着中路和何应钦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又把全部队伍分成挺进纵队（陈诚和罗卓英；赵观涛和卫立煌、蒋光鼐、蔡廷锴和韩德勤。共分三路向革命根据地挺进。）和绥靖军（以其余约半数兵力分区设防，维持后方秩序），又以蒋鼎文师和一个旅组成总预备队，浩浩荡荡，杀奔中央根据地来，妄想把红军压迫到赣江一带消灭掉。

为了在有利于我的根据地战场上打击敌人，红军冒着6月盛暑天气，绕道千里，在6月27日的上午，回到赣南的兴国集中。这时候，敌人已经直迫红

军面前，敌人的飞机也不断地在各处侦察红军的行动。

总司令部里，连日来紧张地开着军事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作战方针。那时，敌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和郝梦麟的五十四师，驻在富田。这两个师是北方部队，不善于打山地战，战斗力比较弱。经大家反复讨论，毛政委最后决定：首先突破富田这薄弱的一环，然后由西向东，朝敌人的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使处于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下的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经常掌握主动，使深入根据地的敌人起不到作用。等到敌人回头北来，必定十分疲劳，红军就可以乘机打击其中的一部分，粉碎敌人的围攻。

作战方针一决定，总司令部就在29日中午，由寅田圩向富田出发。晚上只休息了几个钟头，又继续行军。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就到了雩都河长沙渡口。当时，敌赵观涛的第六师和卫立煌的第十师驻在宁都青塘村，先头部队离长沙渡口只有20里地。

这天太阳很好，雩都河上粼粼闪光。几万红军停在长沙渡口，靠十几只船摆渡。毛政委对朱总司令说，他留下来指挥部队渡河。我就留下六个传令兵给毛政委传达命令。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红军全部渡河完毕，毛政委才离开渡口。

当夜经过兴国的江背洞，直抵高兴圩。高兴圩这块小小的地方，还没有被敌人占领，它东南有驻兴国的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和独立旅；北面有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红军秘密地从敌人这个间隙中穿插过去，经过老营盘北上，到达泰和县的沙村。当晚，一、三军团也都集中到沙村来了。

夜里，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紧张地进行着。我在会议室外面担任警戒，看着窗口的微弱的烛光，毛政委和朱总司令的身影，我想：又是一个大胜仗将要在这所房子里决定了！

大约12点钟，忽然大门外的传令兵跑来告诉我：十二军派一排人送来了两个敌人的侦探。我进会议室一报告，朱总司令立刻命令把俘虏带进会议室。

据敌探说：在红军向富田开进的时候，敌人的飞机侦察到红军迂回敌人侧后的计划，蒋介石马上派了陈诚和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增援富田。

审讯完毕，毛政委叫我把俘虏带走，会议又继续进行。隔了一个多钟头，我进屋去检查蜡烛时，会议正要结束，毛政委和朱总司令正在地图上指划着，重复讲述改变了的作战计划：部队连夜折返老营盘走高兴圩，穿过敌人之间40里的间隙，向莲塘、良村、黄陂一线进行突击。

这是7月6日的事。上午10点钟，总司令部到达莲塘村不久，三军团一

师李师长带着一连人到莲塘北面的山上看地形。刚到达山顶，就看见一队敌军正从北麓向上爬，已经快接近山顶了。李师长立刻命令部队抢占制高点。敌人发现山上有红军，便发起了冲锋。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枪声一响，屯集在山下的三军团部队呼地向山上拥去。下午，一军团也赶来投入了战斗。这样一直打到第二天，才把北麓的敌人全部歼灭。一问之后，才知道正是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他们是准备到莲塘来宿营的，真是冤家路窄，没有去打它，它倒自己送上门来。不幸的是李世成师长却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后来在医院里逝世了。

8日早上3点多钟，总司令部的人员就吃了早饭，从莲塘沿山沟向东移动。出发不久，就听到枪声。据报告，我军在良村又同郝梦麟的五十四师打上了。天色时阴时晴，非常闷热。总司令部赶到前线时，敌人已经溃退了。良村山上到处是敌人，像一群野鸭乱钻乱窜，向闹坑去的大路两侧丈把宽的田地里，被败兵践踏得一根禾苗也没有剩下。我们也和部队一同追击敌人，捉了不少俘虏。大家一边追一边说：“倒霉的究竟还是要倒霉，上官云相、郝梦麟的部队到底没有漏掉。”

这一次我们缴到了不少骆驼。红军中不少同志还是初次看到这种怪物，感到很稀奇。北方的同志说：“这骆驼是搞运输的。”同志们哄笑起来：“哦，是运输队长蒋介石送来搞运输的！”

闹坑北面的龙岗圩，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的地方。这时驻着周浑元的第五师。红军连打两个胜仗，敌四十七、五十四师的残兵败卒逃到龙岗圩，把周浑元吓得神魂不定，连夜在龙岗周围大小山头上添修工事。可是，红军却放下了这个已有准备的敌人，集中主力去打宁都黄陂的毛炳文的第八师去了，只派了红三军佯攻龙岗。

总攻击是在11日的下午1时半。这时，空中陡然涌起一片乌云，顷刻之间，就下起瓢泼似的大雨来。红军冒雨攻进了黄陂圩，敌人立刻垮了。有个骑兵连，马匹都备好了马鞍，也没有来得及逃走，就全部当了俘虏。两个来钟头，战斗结束了。雨也停了。我们乘胜向宁都方向追击残敌，追了10多里，又歼灭了毛炳文的两个团。这时，黄陂四周的敌人，纷纷赶来找红军主力作战。总部首长立刻下令停止追击，由原路撤回。

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红军三战三捷，缴获枪三万支，敌军死、伤、被俘三万多人。

这天，部队连夜走了20多里路，到大山里休息了两三天。这时，形势非

常紧张，所有向西向南的敌人，都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地区，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

包围圈愈缩愈小了。总部决定跳出圈外，连夜从杨寨村出发，向南翻了几个山，走了一二十里路，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

在永丰县境的一个河滩上，朱政委、毛总司令和黄公略军长，又继续开出发前没有开完的会。地图铺在地上，一盏马灯压着纸角，首长们围坐在地图四周。峡谷很黑，风扫着山上的树木，发出萧萧的声音。我站在这野外的“会场”旁警戒着，听见毛政委指着地图小声说：

“这边的敌人离此地只有15里，那边的离此地也只有15里，只有兴国方向有个5里路的缺口，没有敌人。”

会议开了约莫有一个钟头，决定当夜就从这5里宽的缺口突围出去。叶参谋长当即就在膝头上草写了一道命令。命令的字数不多，规定行军时不准发出声响，也不准点火、打手电筒。

这一夜，万里无云，满天星斗。露水很大，毛政委穿着一双烂布鞋，没有穿袜子，裤子完全被露水打湿了。几万人马，一点声息没有，由东向西，翻过高峻的尘岭隘，悄悄来到兴国境内的枫边、向石、良村一线，隐蔽集结。同时，毛政委又命令罗炳辉率领的红十二军向东北前进，一路上到处书写各军路标、各单位打前站的、号房子的以及收容掉队人员的各种留言和番号，好像红军主力是由这条路线前进的。这样一来，果然把国民党主力吸引过去了。他们在包围圈中扑空以后，就立刻紧紧随着红十二军后面追赶，一直追了半个多月，才侦察明白红军主力还在良村一带，又回头向西赶来。毛政委又下令从兴国城南20多里的地方摸过去，进入万安、泰和、兴国交界的大山里休整。敌人第二次又扑空，士气沮丧，疲劳已极，只好偃旗息鼓，乖乖地退却。

这时，我们在大山中又休息好几天了。忽然，侦察员、地方游击队和政府接连送来情报，说兴国城内的蒋鼎文的第九师和独立旅，准备逃往吉安府。五十二师也将跟着蒋鼎文一同撤退。

总部首长决定打敌人后尾的一个师。

9月6日，红三军埋伏在老营盘、高兴圩一带，等敌人经过。敌人刚过去两个营，谁知道有个战士不沉着，枪弄走了火。敌人立刻发觉了我们的企图，主力又缩进了兴国城，不敢出来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没有完成，只是消灭了敌人一个旅。

这时候，又有情报说：敌人第十九路军准备往赣州城里撤。于是，我们又

在高兴圩一带埋伏下重兵。7日上午，战斗就打响了，三军团在高兴圩，一军团在高兴圩北7里路的地方，红七军在兴国城边牵制敌人。

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非常闷热。仗打得十分激烈，红四军把3个师的冲锋枪集中起来，向敌人冲击。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到后来，红四军有两个师子弹全部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敌人。敌人被打死好几百，没办法，把军官集中起来，吆吆喝喝地向我军阵地猛冲，可是一连冲了10多次，还是没有冲上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四军十一师师长尊士俄就在这一仗中牺牲了。三军团方面，打得同样激烈，军团政委滕代远在作战中挂了彩。

这样，整整打了一昼夜，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了。我们冲上敌人阵地后，敌人都挺着身子，袒开胸脯，向我们招呼：“来吧，来杀吧！”可是，我们和敌人中间隔着一道外壕，又没有其他武器，战士们气得一个个干瞪眼。

当时，总部指挥所设在高兴圩西面的高山上，指挥所附近的山顶上插着一面大红旗，被风刮得哗哗地响。红军每进行一次冲锋，毛政委、朱总司令就带着同志们喊口号：“同志们，冲呀！活捉敌人！”总部的号兵，也一齐吹冲锋号。这天，我们每个人的喉咙都喊哑了。下午两点钟左右，敌人向指挥所所在的高山上，打来了20多发炮弹，但是都没有打中，落到山后边去了。

直到天傍黑，双方只打成了一个对峙的局面，没分胜负。当晚，十九路军就撤退到赣州去了，我们也转移到泰和、万安、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休整。据俘虏说，这一仗，敌人被吓坏了。

那天晚上刚宿营，毛政委就把副官长杨立三找来，叫他派人连夜到二次反“围剿”时作战的地方——东固、富田以及最近作战的老营盘等地，去搜集子弹。同时，毛政委又亲自写信，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知各地，注意搜集子弹。总司令部的人员也去附近地区搜集子弹。仅是9月9日晚上，我们就搜集了五万多发子弹，补充给一、三军团。

也就在这天晚上，总司令部得到情报说，兴国城的敌人又要撤退了，他们不敢再走高兴圩、老营盘这条路，改走崇贤、东固下富田。

可是，不管它走哪一条路，我们还是饶不过它！总司令部当即下了追歼敌人的命令。

11日天蒙蒙亮，我军追到东固山的白石一带，赶上了敌人。在方石岭，一下就把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和独立旅的一个营消灭了。师长韩德勤也被我们俘虏了；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竟被他化装成伙夫逃跑了。敌人一个运输团二千

多匹牲口，驮的尽是枪炮弹药，全部被我们缴获来。这一仗打得很顺利，上午9点钟就结束了战斗。

敌人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围剿”就这样被我们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和他的常败将军们，夹紧尾巴窜回了南京。

四、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之时，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排挤与打击，但是，毛泽东仍对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指挥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下面我们摘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有关这一阶段的叙述如下：

国民党政府在同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后，积极部署力量，准备对根据地的红军进行新的军事“围剿”。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中逐步得到贯彻，使红军在进行反“围剿”时遇到了莫大的困难。

1931年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中共中央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份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红军应攻城略地，争取实现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等。在这之前，中央根据地领导人从几年实践经验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些正确的政策是同上述主观主义的政策不一致的。因此，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改革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了“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总之，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尽管未点名，然而这些指责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的。

11月7—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27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此前还组成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部被

撤销,其所属部队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也随之撤销。

当时各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和各部分红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枢指挥的作用。然而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并提交大会的。在这些文件中,肯定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

中央红军在这个错误的战略方针的指挥下,于1932年2—3月间,首先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对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坚持这样做。根据中央军委1月10日的军事训令,红军从2月4日开始围攻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国民党军继续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围。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圩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这是“曲解了赣州战争的教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随即把中央红军分为两路,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第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稍后,临时中央决定中路军改称

东路军到福建去，其任务是打击福建国民党军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准备以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东路军入闽后，毛泽东根据闽西敌我形势，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东路军攻取漳州，得到苏区中央局、周恩来的支持。东路军于4月间先后攻占龙岩、漳州。这一胜利，对于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的游击战争、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的斗争，都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红军此后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7月14日，蒋介石调动26个师另5个旅，约30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6个师另4个独立师、1个独立团，共45000余人。

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以前，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都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空前扩大。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他积极地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作反“围剿”的准备，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的信阳——广水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和红军已经转战7个多月之久，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到适当地区进行休整，认真作反“围剿”的准备。张国焘拒绝这个意见，继续坚持“不停顿的进攻”的方针，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8月初，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黄安危急，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向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红军广大指战员奋勇冲杀，虽给国民党军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和消耗。随后，国民党军开始围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红军虽经5天激战，毙伤敌军二千余人，但国民党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军不得不退出新集，东转皖西。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

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13日、24日，张国焘连电中共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敢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10月10日，他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支持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负责人的主张。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为此，会议讨论了在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必要”的；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为会议接受。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就撤销了他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了建黎泰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又进行了金溪、资溪战役。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而以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12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七万人。

1933年1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所定的军事方针，连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2月4日，中央局再电前方，要求红军“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并称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这时国民党军作了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朱德、周恩来乃决定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提出，如果强攻南丰不能奏效，就要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300多人。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13日即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把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军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予以击破，经过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国民党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0000余人，缴枪一万余支。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上被打破了。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五、第五次反“围剿”

吴正裕、蒋建农编著的《毛泽东》一书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主

要经历与活动：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1931—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1931年11月上旬，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评，把他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正确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无视周恩来、朱德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人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3年，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中央政府的工作。8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这《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和第二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0月，为了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纠正在查田运动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他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1月，他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

1934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4—7月，他在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他亲临南线前沿进行军事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刘伯承的《回顾长征》一文简要叙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过：

因为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1933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的，即仓促转移。

第七节 长 征

一、遵义会议

方雅刚等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一文中介绍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期间的主要活动：

长征出发前，“左”倾冒险主义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既不做长征的准备工作，又不在指战员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仓促转移；出发后，又不根据客观情况，掌握转移的主动权，而是指挥红军掩护机关单位，使战斗队成了掩护队，行动缓慢，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广大红军浴血苦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

这时蒋介石又调动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准备一举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人的阴谋，仍然坚持向湘西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的圈套。中央红军处于覆灭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向党中央提出放弃这一计划，改向敌军统治较弱的贵州进军，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刘伯承指出：“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回顾长征》）

毛泽东扭转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肖华同志也有记载，他说：“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毛主席力挽狂澜，提出了停止去湘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战略方向。这个建议，得到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12月，红军攻克黎平，进入贵州。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确定向遵义地区前进。1935年1月，红军出敌不意，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从而避免了落入敌人陷阱的危险。”

由于实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扭转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使敌人在湘西围追堵截红军的阴谋遭到破产，从危急中挽救了红军，并为遵义会议

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耐心帮助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毛泽东不仅把过去曾经拥护过“左”倾错误的同志和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严格分别开来，增强了团结，而对“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与王明路线的头头，严格分别开来，按个人的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加以区别对待，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如王稼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同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对他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了他的认识。周恩来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取得了稼祥（王稼祥）、洛甫（张闻天）的支持。那时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

王稼祥回忆这段历史时，恳切地说：在长征中，“一路上，毛泽东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的决心。”

在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正因为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等同志做了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在遵义会议上的正确路线，得到绝大多数参加会议同志的支持，从而在危急中挽救了党和红军。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里，为了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由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的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参加遵义会议的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力挽狂澜，揭发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亲自参加遵义会议的同志写下了这一史实。陈云指出：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伍

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他（毛泽东同志）讲了大约有1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是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陈云、伍修权写下了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国情，对王明“左”倾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指出他们只知道“纸上谈兵”、在地图上指挥作战。毛泽东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后，“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凯丰等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除个别同志外，绝大多数同志都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为党的正确领导实现了组织上的保证。

关于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杰出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身的感受最有说服力。伍修权说：“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远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人的经验，甚至倚仗外国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的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根据我党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一伟大真理。”伍修权这一席话，深切地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情；同时，歌颂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杰出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

和红军，这是我党经历了14年曲折斗争的实践，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朱德有一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诗中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二、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直接领导中央军委的工作，亲自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当时，由于长征初期王明逃跑主义路线的危害，中央红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又无根据地作依托，而且敌情极为严重。蒋介石纠集各路军阀，拼凑了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我合围。其中，蒋介石派嫡系薛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的兵力，从江西、湖南追来；湘军3个师迫近乌江东岸沿河、思南一线；川军12多个旅在川黔边境四处游弋；滇军3个旅向黔西北推进；桂军3个师进至黔南都匀；贵州军阀王家烈令其所属3个师向遵义急进。他们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为摆脱这种被动、危险的局面，毛泽东全局在胸，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指挥红军由遵义地区向川南前进，准备在宜宾、泸州间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新的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一渡赤水，扎西集结，抓紧休整部队，寻求新的机动。赤水河蜿蜒700里，是川、黔两省边界的重要水道，也是红军向长江进军途中的一道障碍。渡过赤水河就迫近长江南岸了。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由遵义出发，经桐梓、松坎进至贵州、四川交界的土城、元厚场一带。在这里，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打败了川敌郭勋祺师和黔敌侯之担师的追击和堵击，并于29日胜利地渡过赤水河。2月上旬，红军到达川南叙永、古蔺地区，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见我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北上，惊恐万状，急调川、黔、滇军阀部队和他的中央军堵截红军北渡长江。四川军阀刘湘派重兵沿长江两岸布防，并集中12个旅的兵力对我进行追击和堵截。薛岳兵团和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向川南追击。云南军阀也派其主力3个旅向毕节、镇雄地区急进，企图截击我军渡江并聚而歼之。面临各路敌军蜂拥而至的新情况，中央红军已经没有从宜宾下游或上游北渡长江的可能。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遂命令红军由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集结。2月9日，中央红军进至扎西地区，利用短

暂时间，完成了部队的整编、精简，并开展了扩军、筹款和群众工作，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灵活性，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进行遵义战役，大量歼灭敌人。红军于扎西集结后，敌人仍判断我军将北渡长江。敌一面向宜宾西南的长江、横江各重要渡口增派防守兵力，一面调主力向扎西地区分进合击。当敌军接近扎西时，毛泽东根据黔北敌人较虚弱的情况，出敌不意地指挥红军挥戈东向，重入贵州。当我先头部队东进到赤水河附近时，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忙调兵向赤水河急进，企图堵击我军东渡。我先头部队先敌赶到赤水河东岸，背水迎战，将行进中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后面的大部队于2月18—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把四川的敌人甩开，使其堵击、合围我军的企图落空。渡过赤水河后，我军兼程疾进，乘桐梓、遵义地区守敌兵力薄弱之际，进行了遵义战役。24日，我军击溃黔军一部后，占领桐梓，揭开遵义战役的序幕。25日，我军于娄山关下与增援桐梓之敌遭遇，歼其过半。残敌逃往娄山关，会合关口守敌，妄图凭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过”的险要关口进行顽抗。我军勇猛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以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迂回的战术实行猛攻，打得敌人土崩瓦解，狼狈溃退。当晚，一举攻占娄山关。26日我军乘胜击破板桥、黑神庙地区之敌，28日再次攻占遵义城。与此同时，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的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为了痛歼援敌，军委即命令一、三军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在老鸦山、忠庄铺一线，我军与援敌展开了激烈战斗。黄昏前，我军全线展开反击，仅激战1个多小时，敌人就全面崩溃，其主力被我军歼于遵义城外，只剩吴奇伟带少数残卒狼狈逃过乌江。整个遵义战役，历时6天，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打掉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我军士气大振。这充分显示了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引下工农红军的强大威力。

三渡、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天险，调动、摆脱敌人。我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督剿”，调兵遣将向我逼进，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采取南守北攻的方针，压迫我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围而歼之。毛泽东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遂以一部兵力利用桐梓、娄山关、遵义之线的有利地形，节节阻击北面进攻之敌，而以主力在鸭溪、白腊坎、鲁班场地区寻求敌军周浑元纵队作战。当敌重新逼进时，为了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毛泽东率红军突然北进，于3月16日晨至17日12

时，经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向我逼进，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包围圈，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正当敌人调兵遣将之际，毛泽东审时度势，立即指挥红军回师东进，突然折回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拂晓，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南下，于数十万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3月31日，我军除留九军团在乌江北岸迷惑牵制敌人外，胜利突破乌江天险，把敌人全部甩在乌江以北。

威胁贵阳，进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重围，挥师北上。红军南渡乌江，开辟了进军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毛泽东再次把我军意图隐蔽起来，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于是，分兵一部向瓮安、黄平方向佯动，作东进湖南的姿态，主力直趋息峰、扎佐，威逼贵阳。这时，从重庆赶到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眼看贵阳守备空虚，急得丧魂落魄。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便急调湖南军阀何键部和广西军阀部队在东线堵截，令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昼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曾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在敌军被我调动的慌乱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南下，然后向西疾进，直插云南，连克惠水、长顺、紫云等县城。蒋介石发觉我军西进，慌忙调兵追击。我军则继续西进，直逼昆明，使云南全境震动。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慌忙搜罗各地民团驰援昆明。其余各路敌军均远距我军3日以上的行程。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边挺进。5月3—9日，我军乘金沙江敌防空虚这隙，在绞车渡胜利渡江，完全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毛泽东渡江北上的伟大战略部署。红九军团也于5月4日和5日在会泽西北地区渡过金沙江。

三、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徐向前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中回忆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所作的尖锐斗争：1935年1月初，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继续长征，艰苦奋斗，胜利地进入四川西部。6月中旬，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地区。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第四方面军指挥员。当时，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向我们详尽地分析了形势，

明确地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告诉我们，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毛主席的话，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红军继续前进的道路。

懋功会师时，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昂。敌人方面，却是另一种情况：尾追我一方面军的敌军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堵截我的敌军尚未在北面全部集结，四川军阀屡遭重创，川陕甘地区敌方派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就为我们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是英明的战略决策。

但是，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

张国焘对敌斗争消极，向党争兵权却十分猖狂。他认为，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而他自己却枪多势众。他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向党闹独立性，妄图统帅全军，用枪杆子来指挥党。早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张国焘就擅自成立所谓“西北特委”，内设政治局，俨如中央组织。接着，他又宣布成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划归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并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文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狂妄地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同志当即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必要的批评。会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一返回营地，又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他在军内散布谣言，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张国焘还策动他的积极支持者要挟中央，提出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为重的精神，继续耐心地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北上。

由于张国焘从中作梗，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时，敌情已发生重大变化，各路敌军步步向

我进逼。中央不得不把原定的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这就给北上进军增加了严重的困难。

党中央决定，北上的部队分作左、右两路。右路军由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刘伯承和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胜利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也到达阿坝地区。但是，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了。他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重弹“西进”的老调，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又提出一个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中央再三指出：目前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难。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周副主席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这种危害中央的罪恶行为，受到四方面军中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和严正斥责：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北上到巴西附近的俄界地区以后，于9月12日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作出正式决定，并将决定发给中央委员。决定指出，张国焘向我国西南边陲地区退却的主张，是一种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不注意红军中的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决定还指出，中央对张国焘进行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张国焘不但完全拒绝，而且组织反党小团体，公开反抗中央。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张国焘利令智昏，竟然召开同党中央直接对抗的“阿坝会议”，诬蔑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什么“右倾逃跑”，并欺骗和强迫四方面军掉头南下。10月15日，张国焘公开打出了反党旗帜，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政府和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广大革命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朱德、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党中央。但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对朱德、刘伯承进行残酷斗争，对四方面军内拥护毛主席、坚持北上的革命同志，

实行“纪律制裁”，无情打击。

党中央、毛主席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展开了严肃的斗争。一方面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反党的非法组织，一方面向全党公布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让广大党员了解真相，明辨是非，积极参加这场斗争。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目睹张国焘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心急如焚，义愤填膺。部队南下后，处处碰壁，兵员损失过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大家越来越信服党中央、毛主席的预见：南下是绝路。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由鄂豫皖根据地北上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军威大振，陕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些事实，进一步教育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他们要求回师北上，同中央会合的呼声与日俱增。张国焘迫于形势，摘下他的伪中央牌子，但他的反党活动并未就此停止。

1936年7月，第二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妄图拉拢二方面军反对中央，遭到坚决拒绝。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再三督促下，在朱德、刘伯承和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持下，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省的会宁地区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击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制止了国民党的对日投降活动、克服了党内先后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八千人、八路军、新四军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经过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认真总结经验、全面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党空前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为争取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

如此巨大胜利的获得，当然是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人物毛泽东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主持制定并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策略性文件，标志着作为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鼎盛时期。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的统战活动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十余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在革命新时期的策略路线。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博古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对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

会议于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有:(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时局的三大特点。(二)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此,党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抗日力量。(三)为了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对待富农和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四)强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要防止1927年陈独秀主义在新的革命时期的复活。要求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分裂和利用这些分裂的意义,作了精辟地分析。报告还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作了生动、形象的分析 and 概括,并把当时党内统一战线策略与关门主义策略的分歧,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应当说,瓦窑堡会议及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会议纠正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曾长期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真正蓬勃发展。

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其他同志一道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毛泽东的活动可从以下几个层次予以表述:

(一) 依靠人民大众、发展革命武装

为了敦促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道路,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以

人民的力量为后盾。党中央指出：“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因此，必须“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奋起要求抗日，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7月15日，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的沈、邹、陶、章四人联合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9月18日给他们的信中予以热情的赞扬与支持，指出，“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军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鼓励他们为“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同年11月2日，毛泽东又致书许德珩。当时，许德珩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马叙伦、张申府、杨秀峰、程希孟等教授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在给许德珩的信中也希望他们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更主要的是要发展革命的武装与根据地。只有人民有了强大的武装和根据地，才有可能在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军事镇压斗争中取得胜利，促使蒋介石当权派不得不改弦更辙。因此，党中央指出，必须“极大的巩固苏维埃和红军”，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1936年10月5日，当蒋介石发动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前夕，毛泽东特地致书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重申“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并要他转达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但蒋介石孤行己意，22日由京飞陕，声称“政府决贯彻剿乱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以极大的诚意与耐心于26日给蒋介石及国民党西北各军将领的信中呼吁他们“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为此决定红军“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只是由于蒋介石执迷不悟，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于11月21日在定边山城堡一战中一举歼灭了号称劲旅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而这仍然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

局的觉悟”。因此在战斗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2月1日给蒋介石的信中“立马陈词”，告诫他胡宗南部之所以难逃惨败的命运，“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指出“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希望他“过则勿惮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样，在党中央领导下，通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为推动蒋介石国民党走上团结御侮的道路奠定了群众基础和实力基础。

（二）团结国民党左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派

为了敦促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道路，还必须联合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各种政治力量。因此，党中央指出一定要“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派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

首先要发展和依靠国民党左派。他们在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仍然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精神，是国民党内部推动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力量。宋庆龄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高度赞扬她的革命精神，指出“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

其次要争取国民党内部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蔡元培就是他们的代表。1927年清党时，蔡元培是列名于弹劾共产党文件的监察委员之一，但清党后国民党的变质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表示不满，1935年毅然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希望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也曾经是拥蒋的忠实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有了转变，主张枪口一致对外，并于1933年组织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毛泽东在1936年9月23日给他们的信中指出：“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

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为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

（三）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在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作为工作重点，作为逼蒋抗日最中心的环节。以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委派汪锋同志（该同志长期负责西北军的地下工作）到西安与杨虎城将军接触。行前，毛泽东和汪锋进行了几次谈话。毛泽东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一国的殖民地，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的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样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毛泽东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都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对谈判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他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

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最后，毛泽东将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信交给汪锋，带至西安。毛泽东这次派汪锋去西安，是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毛泽东的亲笔信，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政策，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6年的上半年，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具体内容包括：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红军集中、通商、联苏、互派常驻代表等等。毛泽东还于1936年8月13日再度致书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

在华北则注意争取宋哲元、阎锡山和傅作义。宋哲元虽然担任了日本的代理机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但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也有了抗日的要求。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给他的信中肯定了这种进步，希望他“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并表示我们“誓竭尽全力以为后援”，并请他促成同阎锡山、傅作义的合作。同日，在《致傅作义》的信中又指出，“今日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另外，对于山西的阎锡山以及两广实力派，毛泽东也都采取了推动他们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态度，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希望他们能对南京当局的内外政策“督促批判，贵其更新”。

（四）促蒋抗日，逼蒋抗日

1936年春，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欲望面前，蒋介石已感到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便设法得到苏联的援助并打通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后来解释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兹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1936年2月27日，由以牧师身份进行活动的共产党人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具体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

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为了表明诚意,5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严正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并且,“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才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道路。”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诚恳地告诫蒋介石,“寇深祸亟”,必须“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如果“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这就明确指出,只有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和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才是维护国民党自身生存的唯一出路,才是争取蒋介石个人前途的唯一出路。

二、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的重大历史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

这一事变的背景是,“一二·九”运动以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但蒋介石对全国人民的要求充耳不闻,继续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所部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张学良、杨虎城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在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停止了敌对行动,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大好局面。同时,又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广大官兵联共抗日的决心。

对此,蒋介石不肯善罢干休,多次拒绝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联共抗日的主张,并且调遣嫡系部队30个师至豫陕边境,“围剿”红军,防范东北军和西北军。还两度坐镇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发兵“剿共”。1936年12月9日,西安15000名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举行爱国请愿活动,蒋介石下令开枪镇压。蒋介石在西安期间,张学良、杨虎城数次至华清池面见蒋介石,

痛切陈述只有对外，才能安内，遭到蒋介石严拒。

鉴于蒋介石的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张学良、杨虎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心联合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以迅捷的行动包围了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西北军同时行动，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随蒋介石来西安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扣押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怕国民党破译电文，不敢事先将此事通报中共中央。但他们坚信，事变一旦发动必然会得到中共和红军的坚决支持。在张学良的部队骊山搜索获蒋后，张学良便发出“文寅电”给毛泽东，说明已扣留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旨在抗日救亡。12月6时，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电毛泽东，报告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在甘、宁前线的王以哲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说：“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至此，中共中央确认蒋介石已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

面对这一重大突发事件，在张闻天住处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负责对国民党统战工作的毛泽东提出报告，然后展开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1. 西安事变的意义。毛泽东说：“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2. 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就两个方面作出估计：一是日本有可能拉南京政府使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是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浦、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不叫政府的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七省就范，因此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3. 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审蒋和除蒋，这是能否和平解决事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就提出了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民族战争中是无产阶级的间接同盟军的理论，也是中共中央最早主张联蒋抗日的人之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中间派不同于亲日投降派，是争取对象，何以又要“公审”他，乃至

“除掉”？其中一个想法是以此支持张、杨的义举。当时全国出现拥蒋浪潮，纷纷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各地方实力派在扣蒋后大都在观望，“除蒋”促使各地方实力派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此外，可能还有感情因素。十年内战和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因而广大共产党员、群众乃至东北军、西北军要求杀蒋的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反映到共产党个别领导人身上也不足为怪。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与会者的意见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但大家都认为，保安偏颇闭塞，情况又非常复杂，许多事情难以预料，对重大策略问题也有不同的方案。因此，仓促作出决策不够妥当，一切可由全权代表周恩来去西安后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处理。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前，中央暂不发表宣言。最后，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一）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部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并向张、杨复电：“元凶被逮，薄海同快”，“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请杨虎城兄电告延安驻军密为保护”，“请令电台时刻联络”。

在这以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从各个方面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表示支持，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例如：扣蒋以后，西安随时都可能遭到中央军进攻。毛泽东、周恩来即电张学良，建议将东北军集中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即西北军，引者注）集中潼关、西安一线，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锺等部中央军，免使西安背腹受敌。红军侦知樊崧甫军向潼关急进，毛、周又电张要他速占潼关。南京方面明令讨伐西安后，毛、周提醒张学良要把精力集中在团结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方面，因中央军有围城救蒋介石的企图。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目的是“壮其胆而振其气”，“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张、杨欢迎红军去，红军规定接受友军防地，不改变政治组织，不与民团冲突，不打土豪等新政策，符合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由于中央军涌入潼关，张学良要求红军以主力对胡宗南等部，并接防肤施、甘泉地区，使汤恩伯部不得向西与胡部联络，此外要求陕南陈先瑞部出商雒地区侧击卢氏、灵宝，威胁东路中央军后方。红军同意陈

部先去商雒，后加派了徐海东部。同时又提醒张学良，应确保兰州、汉中两战略要地以孤立甘肃中央军，兰州有于学忠部，汉中是否请刘湘出兵占领。总之，在周恩来来到西安前，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密切合作。

在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复电中，除言及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外，还提醒张学良，要看好蒋介石，必须由张学良的卫队营直接看管，防止蒋收买看守人员。14日，又建议张学良组织绥军，高举抗日旗帜。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位红军将领，通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乃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对此“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内战”。否则“日本乘机入寇”，“全国丧亡”。并提出：“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央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12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阎锡山，呼请他来作调解人。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西安，随即与张学良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连夜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的一封电报中，完整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条方针。即：1. 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 将讨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3.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 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 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还指出，若能使上述条款实行；不但国家民族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主要是消灭内战和不使内战延长”，“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更站在第三者立场说公道话”，力争“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下达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同时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名通电全国；调解事变，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

12月20日，宋子文飞抵西安，21日返回南京。22日，宋子文、宋美龄、

端纳、蒋鼎文、戴笠所组成的南京正式代表团到达西安，23日开始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即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南京方面救蒋心切，故虽不免讨价还价，但基本上表示接受。

12月24日晚，周恩来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再一次表示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见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感到十分意外。他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又说：“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他表示同意谈判达成的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飞离西安，经洛阳回南京。能够左右中国局势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因我党的巨大努力，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以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结局而圆满解决。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党内、军内的许多同志对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尚有许多不够理解之处，一时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还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作报告，统一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如毛泽东在给红军大学师生做报告时说，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上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毛驴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叫又联合又斗争。

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确实，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将永彪史册。

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意义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他还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事实正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西安事变以后，迎来了中国革命的飞跃

期——延安时代。

三、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西安事变的处理及以后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2月10日，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希望国民党执行下列五项国策：1.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 改善人民生活。电文中还说，如果国民党能执行上述国策，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御侮的诚意，愿作以下保证：1.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 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现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作出的重大让步。但是，这个让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会有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国的广泛发展。而且让步也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放弃内战，承认抗日；共产党则停止两个政权的对立。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所说：“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四人，在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宋庆龄还作了《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完全正确，痛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荒谬主张。她说：“我们先要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的决议，决议中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了诬蔑，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停止武装暴动之阶级斗争。此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实际上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三中全会的建议。总之，以国民党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形成。但尽管如此，国民党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一贯的溶共、反

共、灭共的方针。它狂妄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第一，“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并从根本上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他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其顽固性与反动性由此可见一斑，而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必须“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之英明亦从此得到旁证。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共双方从1937年1—9月，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议题包括红军如何改编？苏维埃政权如何改制？国共采取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合作宣言等等。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时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故而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讲话。在蒋介石的讲话中，虽然歪曲历史，大谈国民党怎样一贯坚持三民主义，不指名地批评我党对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又以自大的语气号召各种力量“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但讲话终于被迫承认停止内战，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要之，以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以及蒋介石9月23日发表的讲话为标志，由我党所创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数年的奋斗努力，终于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它不仅使党获得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武器，而且使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获得重新发展的最

好条件，标志着中国革命必将飞跃发展和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在全面抗战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际，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定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纲领和政策，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方面负责人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李富春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以及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配合友军作战，钳制消灭敌人，保存与扩大红军；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根据地，以挫败日本亡华方针，红军在抗日初期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晋察冀三省边界山区。此外，毛泽东在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时刻不能忘记蒋介石想要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红军的调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作战，必须根据战局的发展，选择有利时机，分批进行，并需留一定兵力，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会上，大家围绕毛泽东的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

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十大纲领的具体内容是：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 改革政治机构；5. 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 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 改善人民生活；8. 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 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

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共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在抗战过程中必将会出现种种挫折、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情况。阐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决定》还特别强

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责任问题。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

会议根据军事斗争的需要，调整了中央军委。新的军委成员为11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四、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的言论与活动

独立自主原则，本质上是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当时如果我们党公开提出共产党要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不策略的。不但国民党会反对，其他同盟者也会不以为然。在国共谈判中，我们有约在先，即承认国民党的指导作用。掌握领导权，不在于口号，重要的是实际争取。强加于人，不讲策略，只会事与愿违。但是，我党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无可非议，同时，我们也不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其他同盟者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

当时要尖锐地提出独立自主，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第一，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处处限制我们，否认我们的独立性。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过去他们对共产党采取杀头政策，现在改为限共、溶共、反共，大搞怀柔政策，用金钱、美女、升官发财来腐蚀我们的干部。在政治上，他们高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叫嚷要“取消阶级斗争”，中国只许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总之，国民党当时处处限制我们，要我们服从其“政令、军令的统一”。

第二，当时我们革命队伍中，产生了较严重的右倾思想，不懂得保持无产

阶级的独立性。我们不少干部不愿再继续过艰苦的生活，有的想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有的以获得国民党的委任状为荣，有的对国民党的蚕食政策、对他们在边区的捣乱不敢斗争，有人主张延安也成为统战区，极少数人甚至叛逃（如周昆，他携带三万大洋叛逃）。在党的领导成员中，也存在过分信任国民党的问题。

第三，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依靠蒋介石抗日、轻视人民力量的右倾路线。共产国际要我党服从他们指令。后来王明回国，其使命就是推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原理，本来就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要严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上述情况，使独立自主问题的提出，更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成为一个关系我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完善和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是一个过程。

独立自主，首先是作为军事方面的作战方针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见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电报说，国共合作抗战，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进行配合；但在具体的战役、战术上，我们则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的打击。”

在1937年8月底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规定为我军的作战方针，并对这一方针的精神实质作了具体解释。他指出，所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第一，是指指挥关系，即八路军只能由我党来指挥；第二，是指我军作战要尽可能的依傍山地，以分散游击为主，不以集中打运动战为主，要着眼于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创建根据地。毛泽东强调，要一刻也不能忘记发动群众。

9月12日和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两个电报中，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强调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我军作战，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比如，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的自由，有组织义勇军的自由，有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自由等等。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著名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把独立自主规定为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指导原则。他说：“在一切统一

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对坚持这一原则的根本目的作了精辟阐述，指出独立自主原则，决不是一个消极防御原则，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阵地，保持我们的战略出发地；其“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从这时开始，独立自主，从单纯的军事指导方针，发展成为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抗日战争中的根本指导方针。

独立自主原则，体现在抗战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斗争策略中：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要坚持我们党的革命旗帜，坚持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决不能因为国共合作抗日，而掩盖我党的旗帜，放弃我们的理想、信仰；对国民党的“取消阶级斗争”、“收起共产主义”等反动宣传，必须坚持驳斥。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坚持我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如坚持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坚持争取民主、改善民生的斗争等等。我们只能把国民党提高到我们党所主张的纲领、路线、政策的水准，而不可降低我们的水准去迎合国民党。国共合作抗日，为了协调关系，让步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但不可丧失原则。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在军事上，就是要坚持分割指挥、战略配合的原则，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坚持以最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来进行持久战、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军事路线。我们反对国民党命令我军打大仗、打硬仗，反对国民党向我军派人，反对他们要求“朱、毛出洋”、到国民党去“作官”等等。国共合作之后，党中央告诫全党同志，既要警惕国民党借刀杀人，也要提防国民党拿刀杀人。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在经济上，就是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抗战时期，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其根本问题是依靠和发动农民。因此，减租减息成为党的基本政策。进入抗战最困难时期以后，全党全军全民的大生产运动，又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没有经济上独立性、自主性，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是难以坚持的。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在组织上，就是要保持党的独立性、纯洁性，巩固党的组织，反对国民党取消合并共产党的企图；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政权的包办原则，不允许国民党向我军、向边区政府派人，坚决抵制他们的干涉；对

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也要防止国民党的破坏和捣乱。1937年10月，由于贾拓夫等同志思想右倾，党领导的有重大影响的西安抗日救国会组织，被国民党合并到“抗敌后援会”，受到党中央的严厉批评。

第六，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在与同盟者的关系上，保持有批评、斗争的自由，以便教育和提高同盟者，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党的政策，是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团和气、大家恭喜发财的错误思想。我们党不仅毫不犹豫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共、妥协政策；同时，也对其他同盟者的错误，如章乃器的“少号召、多建议”、不许“标新立异”，陈铭枢等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所写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表示了我党的原则性态度。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具体表现。

第七，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因此在处理我党同这些不同政治力量的阶级关系方面，独立自主原则又具体体现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党中央强调大胆、放手、猛烈发展；强调只有发展了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因此，发展进步势力是三者中的最中心环节。争取中间势力，党中央强调要注意三个条件，即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对孤立顽固势力，党中央规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抗战时期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在阶级关系上，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展进步势力，独立自主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

第八，独立自主原则，体现在对待战争前途的问题上，表现为我们要力争人民胜利的结局。我们不再学陈独秀，他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不过是帮忙的，他号召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抗战时期，党把争取民族解放放在首位，但也决不忘记争取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党中央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在争取民族斗争胜利的同时，为自己阶级的解放作好准备，我们要力争尽可能多的抗战胜利果实落在人民手中，争取人民胜利的前途。在八年抗战中，我党努力学会治党、治国、治军、治政、治民的管理艺术，积累治国安民的经验。我们搞整风，实行三三制，开办银行，发行货币、公债，搞工业建设。我们的根据地，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那时，斯大林要我们不要害怕淹没在民族革命的大海洋之中；我们说，淹没在民族革命中是不行的，我们已有过血的教训了。我们一定要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考虑以后阶级的解放。

以上,是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国内政策、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种种具体表现及实践。

抗战时期,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时也是我党处理同共产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当时我党对共产国际是尊重的,重要的事情,如重要会议、重大方针决策、战争的进展、重要人事变化等等,我们都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我们对学习国际的斗争经验,也是十分认真的。但是,我党坚持独立自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抵制了指挥棒。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决策,该顶的就顶,该反的就反,决不含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不顾我们当时的严重困难处境,要求我们出兵切断北平至张家口、包头的日寇交通线,我们也未遵命。共产国际歪曲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性质,进行种种责难,我党坚持原则,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斯大林指责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忘旧怨,争权夺利”,我们也没有因此而放松斗争,放松发展人民抗日力量。

我们对共产国际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当时我们在国内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对共产国际坚持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内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也就没有我们党在统战内部的胜利斗争,没有人民革命力量的猛烈发展。这样,对共产国际的独立自主,成为我党在国内政策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前提。遵义会议,标志着我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的开始,而这一原则的充分实践和取得卓越成效,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坚持把独立自主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兄弟党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这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今天,这一原则已为各国党所确认、接受。

从以上对抗战时期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内容、实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原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远见卓识的战略原则,它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抗战时期已形成为完整的政策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伟大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建立,在要不要保持独立自主的问题上,党内即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和争论。

最初的分歧,是表现在国共谈判中,我们部分领导同志对国民党的警惕不够,如有的同志倾向于早出兵、多出兵、边区少留兵,而毛泽东则主张边区要多留些兵。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估计蒋介石在陕甘有10个师,而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后方,多留些兵“方有饭吃”。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

以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否认独立性的右倾倾向，发展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相当严重的问题。

1937年9月八路军相继开赴前线抗日，在党的高级将领和军事负责人中，由于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对以分散的游击战来发动群众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立即实行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留恋过去的运动战，因而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打了平型关一仗，接着形成了10月的华北军分会的错误。毛泽东当时立即指出，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性错误，望停止传达。

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前后，项英和傅秋涛由于对独立自主问题认识不够，因而在南昌、武汉的国共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的某些无理要求，受到中央的批评。而南方的个别游击队领导人，听从国民党指令集中，1000多人被解除武装。

但是，所有上述问题，到1937年11月毛泽东作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时，都已基本解决、纠正。全党在独立自主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发展的趋势是好的。

然而，在王明1937年11月底回国后，党内关于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的剧烈争论便拉开了帷幕。

当时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钦差大臣”。他“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乱叫。对当时党的各项工作很不满意。尤其是对毛泽东在11月所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一报告特别反感。因为这和他的指导思想以及共产国际给他的任务格格不入。应王明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盘托出了他的新投降主义路线。而且在会议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几乎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对王明的错误路线予以了坚决的抵制。正由于如此，会上未能就王明的政治报告形成会议决议，使得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未能在全党占统治地位。

自此，王明就为他的新投降主义路线到处奔走。尤其是在担任长江局书记之后，格外如此。他到处应邀演讲、参加会议、宴会，会见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官员，并谈得十分“投机”。他还擅自以党中央名义发表文件，未经许可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甚至在武汉大学讲演时，竟公开批评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观点。此外，他还系统的提出了新投降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的实质，集中地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两个“一切”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四个“共同”,(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显而易见,王明的这一新投降主义路线,与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路线并未得到蒋介石的同情与怜悯。相反却失去了我党、我军在华中地区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机。总之,王明路线的错误及危害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给党、也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因此,曾为王明的美妙辞令所迷惑的同志,也渐渐地觉悟起来,反对王明的错误做法,要求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

1938年4月,党中央派任弼时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时,共产国际对我党的状况和抗战以来的成绩,比以前要清楚得多了。1938年6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的决议。决议承认我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统一战线不能限制党的独立性,强调党应该勇敢地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农村工作,发展农民游击队,加紧扩大人民的军队。尽管该决议中还对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进行了谈话。这次谈话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与贯彻执行,乃至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意义。那就是,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表示认同。这也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领袖。应当说,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的这一番表示,对毛泽东为我党领袖这一地位的确立,是具有一定推动作用的。当然,共产国际的这一转变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客观条件越来越有利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中央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不利于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其次,抗战初期,毛泽东在领导实际斗争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并且成就卓著。由他所写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和策略问题。《论持久战》一书,更是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总之,这一时期,毛泽东在

国内外的影响与日俱增，他不仅以杰出的军事家，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最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中央，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正确而有效的斗争，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支持。

1938年7月初，王稼祥回国。中央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的桥兜沟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彭德怀、康生、博古、王明、项英、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0余人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即该报告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说：“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六届六中全会还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关于批判王明的错误，会上许多同志发了言。如刘少奇批了王明的两个“一切”，指出这是从法国抄来的；彭德怀讲了城乡的特殊关系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颂扬了毛泽东是我党领袖，并指出领袖是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既不能靠委任，更不是抢来的。张闻天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结合，批了教条主义。林伯渠讲了党员组织纪律性，批了宗派主义、自主主义等等。当然，会上批判王明的主要任务，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毛泽东从理论上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指出，统一不能否认独立，独立也不能破坏统一；统一不是混一，独立又非绝对的独立。

王明只要统一，一切统一，放弃独立，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抗战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阐明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这就是，民族斗争不能否认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不许破坏和不利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抗战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的。王明只搞民族斗争，否认阶级斗争是错误的。

第三，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这就是：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有斗争，团结则存，无斗争，团结则亡。王明只讲团结，否认斗争，是完全错误的。

第四，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积极让步与消极让步的区别，阐述了让步同革命的关系。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之间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是现在“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但是，我们的让步必须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是互让、而不是相反。毛泽东说，我们的让步，“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着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着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只有这种让步才是积极的让步，是有利于革命的让步。而王明的让步，则是消极的让步，其结果会像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和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一样，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

第五，毛泽东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征，科学地阐述了对国民党的斩和奏问题。指出，我们既不可一切先斩后奏，也不是一切先奏后斩；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或者先奏后斩，或者先斩后奏，或者斩而不奏，或者不斩不奏，灵活处理。王明主张事事先请示报告，则是完全错误的。

第六，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的关系，强调了武装斗争的特殊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则是次要的、配合的。因此，王明轻视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提出“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埋头在国统区搞群众运动，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七，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爱国主义的不同阶级性质，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因此，那种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或者把爱国主义等同为民族主义，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我党在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没有爱国主义，也就没有国际主义。毛泽东阐述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这种关系，实际就是国际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没有独立自主，就无法充分发挥我们党的国际主义作用，尽我们的国际主义职责。因此，独立自主乃是国际主义的基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对立的，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与独立自主则是统一的。毛泽东在六中全会阐述此问题，当时倒不一定是针对王明的，但王明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此问题上是有过错误的。

毛泽东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从理论上，从辩证法的高度，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错误，阐述了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论基础。即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在独立与统一的辩证统一、团结与斗争的辩证统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辩证统一、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辩证统一、以及革命与让步的辩证统一等等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全面地阐明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二节 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与推动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的、全国各民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共同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华民族在近百余年以来，进行了多次抵御外侮的战争，但只有这一次抗日战争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和帮助下，在苏、美等同盟国军队的配合下，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独立与解放，而且也为世界进步人类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八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

放区战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下，与敌共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军 52.7 万人，歼灭伪军 118.6 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69 万余支（挺）、各种炮 1 800 余门，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 亿，解放区遍布 19 个省区。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亦有一个空前的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拯救了中华民族，并通过抗日战争进一步唤醒了广大民众，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此辉煌胜利的获得，当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和规律的科学预见和论述，他为我们党制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持久战——中国抗日战争的独特形态

（一）毛泽东提出持久抗战思想的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在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速胜论”，另一种是“亡国论”。速胜论者是存在一种盲目的侥幸乐观心理，认为日本侵略者根本不值一打。在国民党里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在抗战初期就企图在国际援助下，依靠国民党的力量取得抗战的胜利。他们以为，“只要打 3 个月，国际形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解决。”特别是在中国军队取得某些胜利，战局稍有转机之时，他们便弹冠相庆，视日本侵略者如草芥。台儿庄一战后，国民党内的一些政治派别甚至断言徐州会战是中日之间的“准决战”，中国必定速胜。他们主张“持久作战的方针应该改变”，批评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观点是“机械的”、“错误的”。总之，他们幻想在一个早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种“速胜论”的轻敌倾向，一度甚为流行，为一部分群众所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内亦有所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

另一种观点是“亡国论”的思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部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七七事变”以后，他们更是坚信“和则存、战则亡”。亲日派的代表、大汉奸汪精卫在徐州失陷后，就实际上在准备着公开的投降。以后，由于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特别是上海、南京失陷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幻想取得速胜一下子又转而成为

极度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者，倾向于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这种亡国论的妥协投降倾向，在下层也有反映，这就构成了亡国论的社会基础。

（二）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思想的提出

应当看到，“亡国论”或“速胜论”不仅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而且它还将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会使抗日战争变得更加艰巨、并招致种种不必要的曲折。为使抗日战争取得圆满而彻底的胜利，为使中国人民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为使“亡国论”、“速胜论”不至流行而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的科学预见，早在抗战爆发一年前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已初露端倪。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一《决定》中就曾明确指出，根据中日民族矛盾的客观情况和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应当确立持久作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中说：“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此后，毛泽东在他的指示、演讲和著述中，多次强调和日益丰富了他的持久抗战的思想。

抗日战争 10 个月的经验与教训、胜利与挫折证实了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无比正确性。为了总结经验、充实和发展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以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同时也是为了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彻底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速胜论”和“亡国论”，毛泽东于 1938 年 5 月 26—6 月 3 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在这篇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分析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发展的必然过程，提出抗日战争三阶段的著名论断完整地制定了用人民战争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战术方针，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指明了经过持久战最后终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正确道路。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抗日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战争最后胜利的事实，雄辩地证实了《论持久战》基本思想的正确性，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分析抗日战争实际过程的科学预见的卓越才能。

在毛泽东持久抗战理论的指引下，全国抗日军民的思想认识趋于统一。它使得坚持抗战的军民们，从中涉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看清了必胜的前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从而懂得了怎样去战胜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已日臻成熟。

二、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述与活动

（一）抗日游击战思想与方针的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我党、我军即面临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战争形式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战争才能最有效的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是阵地战？运动战？还是游击战？抑或三者兼而有之，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形式？这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时的局势是，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全国抗战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仅靠几十万国民军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不可能阻止日军的进攻。蒋介石、阎锡山虽一再提出“决战”，实际上仍缺乏决战的决心、部署和行动。因此，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刘少奇曾预见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因此，八路军在华北对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也不会是长久的，国民党军队退逃以后，华北将失去正规战的条件。

另一方面，从八路军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也没有实力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正面决战。因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从总司令到伙伕一共只有三万二千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

在这么样一个局面之下，我们的仗应该怎样打呢？为此，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

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成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这里，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正规战争与游击战争的辩证关系，点明了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并为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实，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的思想与方针，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就已经提了出来。他和张闻天8月1日致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中就曾指出：“目前红军作战方针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的打击。”在洛川会议上，在毛泽东的力主下，又具体规定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随着形势的发展，八路军挺进华北，毛泽东根据我军在华北作战的客观形势，又把以上方针具体表述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在八路军出师抗日并取得一些胜利之后，有些同志的骄傲轻敌情绪滋长起来，认为要打“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想借日本之手来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企图，也要求八路军打正规战、运动战。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连续致电八路军前方的领导同志，要求他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这一系列的电报中，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于9月12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讲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应包括：

(一) 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 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 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 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第二，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9月17日的电报中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決定作用。”在9月21日的电报中，他进一步阐明：“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方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毛泽东于9月25日，致电北方局，更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第三，关于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电报中以全局在胸、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预见到国民党在华北战场即将溃败，明确指出：“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根据这种设想，毛泽东认为，必须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如果我军按原计划全部进入晋东北恒山山脉地区（即国民党划定的地区），则不久必将陷入敌军包围，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他提出3个师分散配置的部署，一二〇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应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地区活动；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并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这样的部署，是为了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这既能钳制敌之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又使我军不至于损失力量；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我军才能“真正进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于11月13日致前方同志电，指明：“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提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

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并提示各部队发动民众、扩大自己，多打小胜仗，坚持华北抗战。

正是在毛泽东这些电报指示下，八路军自觉地实行了军事战略的转变，纷赴敌后，广泛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与党中央这一决策的英明正确。但是，山区虽然对开展游击战有许多有利条件。然而，山区贫穷落后，人口稀少，给养与兵源都比较困难。因此，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了扩大队伍，坚持抗日战争，把根据地扩展到太行山下的冀南平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向冀南平原几次出兵的胜利，证明了抗日游击战不但适合于山地，也适合于平原。河北和山东的经验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发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指示他们：“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5月4日，毛泽东在给新四军领导同志的指示中指出：“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够发展游击战的”。5月14日又电示新四军：“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自此，抗日游击战争从山区走向平原，在中华大地上全方位的展开了。

当敌后游击战争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之际，毛泽东又陆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著作，对抗日游击战争中面临的有关问题作了更为系统、更为完整的论述。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抗日游击战的理论和方针。虽然当时党内对抗日游击战尚有分歧和争论，但基本上已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成为打败日寇、解放中华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毛泽东与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他说，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经历着四个战略时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

规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在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转变是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第二个转变，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十分强调这一转变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这一转变曾为党内的某些同志所不理解、想不通。但是这种转变又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客观形势和敌、我、友诸因素变化的必然要求，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八路军、新四军面对的是欲置中国人民于亡国灭种死地的日本法西斯。他们的工业比较发达，长期扩军备战，军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有较强的组织力和集团攻击力。相反，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人民的军队装备简陋。因此，人民军队的正义之师，只有选择适当的战略——游击战争，才能扬长避短，克敌制胜。

其二，友军发生了变化。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军队成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友军。这有利于民族革命战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但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怀有敌意，其首领蒋介石一直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溶共”是他一贯的既定方针。如果还停留在正规战争阶段，几个硬仗把八路军、新四军的实力拼得精光，那么，既中了蒋介石的圈套，更不利于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其三，人民的武装力量与内战后期相比，人数大为减少。经过长征，红军的人数仅有4万余人。与日军相比，不仅数量上少得多，而且武器装备则更为逊色。与之进行正规战争实属不明智之举。但是，我们亦有优势所在，即这4万余人都是革命的精华，有着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熟悉游击战争。他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与人民有着鱼水深情。鉴于上述情况，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用人民战争战胜敌人。因此，人民军队就必须“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

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下，党的军事战略必须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有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战略转变的实现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37年8月下旬至10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兵前线，配合友军作战。一一五师进军晋东北，取得平型关大捷。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在神池、宁武一带袭击日军，配合友军的忻口战役。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兵分两路：一路在晋北代县一带，袭击沿同蒲路南犯之敌，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的战绩；一路在晋东娘子关袭击沿正太线西犯之敌。所有这些，实现了出师击敌这一步，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第二阶段是在1937年11月—1938年4月。八路军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在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央的指示实行了分兵，正规军分散为游击兵团，战略转变开始实现。八路军各部分别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和晋西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在这四大地区展开了游击战争，为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1938年4月—1939年。根据地由山区扩大到平原，几个根据地成为几大战略支点。这段时间里，日军主要在徐州、武汉周围作战，华北空虚，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提供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在华北山区的游击根据地建立之后，1938年4月毛泽东提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军委和集总对所属部队进行新的布置，把部队分成更小的支队，派这些支队奔赴平西、冀东、冀鲁边、恒山地区、大青山地区，使游击战在整个华北展开。此时，向山东派出了一大批干部，建立了苏鲁豫皖边区。1938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扩大自己、坚强自己。”此后，新四军各支队，奔赴苏南、皖南、皖中、豫皖苏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

11月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负责华中工作。华中地区的游击战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周密部署和直接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转变通过这三个阶段基本实现。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创建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几大块根据地，面积达二百万平方公里。歼敌五万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人。新四军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于1938年中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陆续建立了华中的几块根据地。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在这次伟大的战略转变中，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探讨的深入，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战略转变的实践表明，新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形成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战略转变的实现，使抗日战争成为人民的战争，这为整个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三）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原则

当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以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具体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此，毛泽东在系统总结了过去党领导战争的经验的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特殊情况的具体的战略战术原则。他指出，为了达到保存、发展自己的目的和消灭敌人的目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或原则主要有以下六项：

1.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争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争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 建立根据地；4. 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 向运动战发展；6. 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它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最中心的问题，是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这六项战略战术的提出，使得游击战争的胜利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保证。

（四）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指导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规定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应该采取的战略与战术原则，指明了怎样通过抗日游击战争去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的道路。同时，他还对抗日游击战争予以了具

体的指导,直接将自己创建的游击战争理论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战后,八路军各部即按照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向敌人侧翼迅速展开。我军主力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一面以伏击、袭击、阻击等作战形式,在敌之侧翼打击和钳制会攻太原的敌军;一面派出少量游击部队和工作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正面作战的同时,相机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三大山区战略要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初步基础。

太原失陷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指示“集总”,分散兵力、向上述三大山区实施战略展开。我军主力3个师,分别以五台山、太行山、管涔山和吕梁山为依托,以一部兵力,打了许多小的胜仗,继续钳制日军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同时,派出了许多小部队组成游击支队,配合地方党组织,大力动员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扩大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区根据地。

当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作出“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的指示。八路军一二〇师当大同敌人南下、雁北敌人较为空虚之际,及时地命令宋时轮支队星夜北上,开赴大同以西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钳制与打击敌人,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1938年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一二〇师领导,应集中两个旅的主要兵力打破日军进犯晋西北根据地部队之一路,切实巩固晋西北根据地。师部立即集中了4个主力团,首先打击进占岢岚、五寨的敌人。同时又以主力一部、地方武装及“动委会”领导的游击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38年春,日军把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转向华中,企图夺取徐州、武汉。随着战线的延长,敌兵力不足的弱点就逐渐暴露出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力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动游击战争的机会。一二〇师根据这一指示,除以主力一部继续巩固与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出动多支部队配合晋察冀区创建了恒山地区根据地,以及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部署,目的在于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大青山、晋察冀和晋东南各根据地相互呼应,相互联结,使敌侵占的平绥、同蒲铁路及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重要城镇,完全处于我各根据地的包围之中。

1938年5月初，根据毛泽东关于抓住大好时机，以太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和“集总”的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等部到达冀南，发动了威县战斗，毙伤日军百余人，收复威县、临清、南和、平乡等城。中旬，又解决了南宫以东及清河一带的反动会道门“大离会”袭击我津浦支队的叛乱事件，巩固了冀南中心区。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前总，命令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两个团全部迅速进军山东，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山东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除将三四三旅补充团与晋西三个游击大队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留晋西坚持斗争外，师部及三四三旅于12月在罗荣恒的率领下，由晋西进军山东，1939年3月到达鲁西平原。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军山东，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巨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当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指出了我军应向敌后深入发展的战略方向：即八路军过黄河南下，新四军渡长江北上，互相支援、互相呼应，在华北、华中建立广大的根据地，实行战略展开。当新四军集中后，毛泽东又强调指出，新四军应抓紧有利时机，东进作战，直逼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积极主动地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是，受王明新投降主义影响的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放弃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至使华中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党我军的力量发展缓慢。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5月14日和5月22日，中央又两度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自己，坚强自己，特别要在苏南、皖中、皖东、豫皖边、皖东北及苏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再敦促下，新四军军部才在1938年4月下旬，抽调少量干部和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开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但主力部队迟迟未能跟进。国民党为实现“借刀杀人”的阴谋，划定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沿江狭长地带。对此，项英亦不敢拒绝。针对上述情况，毛泽

东和党中央明确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创造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同时，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向敌后发展与积极抗战的方针，要求新四军不顾国民党的限制，“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

陈毅等人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对项英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直到5月中旬，项英才同意新四军的第一、二支队向江南敌后挺进，开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敌后根据地。同时，第四支队继续东进，开展皖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新四军活跃于大江南北，开始了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而艰苦的斗争。

（五）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思想对抗日战争的指导意义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关于游击战争的好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它们归结为18个要点。①缩小敌军的占领地；②扩大了我军的根据地；③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着敌人；④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⑤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⑥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⑦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⑧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⑨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⑩最普遍地发展抗日文化教育；⑪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⑫最便于瓦解敌军；⑬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⑭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⑮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⑯适合敌小我大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⑰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⑱最便于解决给养问题。

事实证明，抗日游击战争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例如，以山西为中心的游击战争，猛烈地向全华北展开。这种大好形势，在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第一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指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这地域有坚决反日的1200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堡垒。八路军已在这里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

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经迫近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指以管涔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地带（指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指吕梁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由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转变的战略思想对推动抗日战争向胜利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游击战略，创造了全民参战的战争奇观。在抗战中，我国面对的是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侵略者，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比，力量很弱，人民也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但四万万人民已被侵略者的铁蹄震醒，要求救亡图存。此时“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这种光复民族的精神力量其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它的振兴可能改变物质力量的不平衡状态，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中国共产党选择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做为领导抗战的战略，就是最大限度地组织人民投入抗日战争。把有组织的正规部队，分散到被敌人占领的敌后，这就会产生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作用。这一点从山东人民起义到游击队的组织和根据地的建立的情况，可以得到清楚的了解。广大觉醒的人民群众在少数游击队的活动中，摆脱了那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实现对日作战。人民群众一经组织起来，其能量和智慧就进一步发挥出来，在敌后战场上，人民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形式，组织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雁翎队等多种形式的游击队，使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在人民的实践中大大地丰富起来，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观，这便能无敌于天下。

第二，实行游击战争就置日本侵略者于死地。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现了战略转变，能在敌人的包围中，用弱小的军队构成敌后抗日战场，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在八年抗战中，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战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所担负的，国民党军队负责正面战场。正是因为有这种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配合，中国才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持久抗战，使中国战场出现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梅花形的相持阵容，日军陷入长期

战争的泥淖。两大战场的夹击，使日本只能用部分力量投入太平洋战争，无法彻底实现南进战略，使中国战场的胜利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环节。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的游击活动，破坏了日本的供给线，杀伤了大量日军，到1944年，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6%，伪军的95%。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十二万五千次战斗，歼敌一百七十万人。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大大动摇了日本军队的军心和士气，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首尾难顾，无法巩固其占领地区，无法展开对战略物资的掠夺：相反要用与前线几乎相等的兵力来维系后方基地。这就使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消耗，在人民战争的打击下，最终失败。

第三，实行游击战争战略，极大地发展了人民革命力量，加快了人民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曾为游击战下了一个定义“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实行群众参战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方针既可以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保家卫国，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又可以通过游击战争创造自己的阵地。通过游击战争，肃清大片地区的日军，摧毁伪政权，保持大片占领区在中国人民手中：在这些地区，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游击队的活动，创立抗日民主政府，使这些根据地成为建立新中国的雏型。这种根据地成为游击战争向新的敌占区发展的后方，成为新区域游击战争展开的依托，这两种过程不断循环，人民的力量就不断发展，对日军的打击就越来越大。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直接地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实现人民群众更为普遍的觉醒，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广泛觉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以至后来战胜中国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游击战略的实行对这一胜利的作用是巨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由于实现了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广阔的地区里发展力量，在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4万余人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扩展为100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亿以上。没有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这些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实践证明，游击战略的实行最为成功地服务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第三节 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一、毛泽东与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日本加紧诱降和美英不断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活动和分裂活动日益加剧，成为当时中国时局的主要危险。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强化”国民党，以对付“华北各地共产党之竞起”“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对中共不好像15、16年前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这时，国民党是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到了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时，就发展到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所以，这次反共高潮是从政治、军事两条战线展开的。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军队的武装进攻，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即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晋西地区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太行地区。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侵占八路军驻防的枸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12月初，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晋西发动十二月政变，集中6个军兵力，突然进攻驻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残杀共产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10人。接着，在晋西北的阎军二个军向抗日决死军第四纵队进攻；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军队由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摧残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近2000人。1940年2、3月间，蒋介石又指令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在日军配合下，分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1940年2月，国民党反共投敌将领石友三部，在河北省南部与日军联合进攻八路军。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军事进攻，我党根据当时的形势，依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了坚决的反击。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这场反击，这对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反共高潮出现征兆和摩擦之初，毛泽东在6月30日《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即号召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8月1日，延安举行悼念平江惨案牺牲同志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反动派“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种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9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对蒋介石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严正警告，并且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发表了《对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次反共高潮“带有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准备投降的性质”，党的任务是：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深入群众工作；极力巩固党的组织；极力巩固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在秋林会议之时，中央就连续发出指示，必须有力地开展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以制止阎锡山向右转。毛泽东对决死四纵队的负责同志雷任民说，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准备嘛！这就明确指出，要对可能到来的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要做好充分准备。1939年12月23日，毛泽东、王稼祥电示晋绥区：阎锡山令赵承绶向决死第四纵队进攻，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但是，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当旧军战衅一开，新军应集中全力采取主动的运动战，首先消灭其一路，然后各个击破。

当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前锋、爪牙遭到痛打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着尽可能争取蒋介石集团和阎锡山集团继续抗战的方针，命令八路军、新军适可而止，结束反击作战，并主动向阎锡山、蒋介石表示团结愿望。2月2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肖劲光、王若飞带毛泽东给阎的信，到秋林向阎当面申述共产党八路军关于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这时的阎锡山，不但无力解决新军，更尝到了共产党八路军铁拳的滋味，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他的倒行

逆施，遭到群众的不满与反对，还引起内部矛盾激化，众叛亲离，只得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经过谈判，于4月间正式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

在太行地区，八路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歼灭了朱怀冰、石友三部。此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日，命令八路军主动休战，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并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八路军还作了必要的让步，自动退出陵川、林县、长治、壶关、晋城、阳城、高平及豫北一带大片地区。

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一方面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要“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一方面果断地调回八路军三五九旅，协同留守部队，对国民党的进攻予以坚决地回击。平息了何绍南的叛乱，还剿灭了受顽固派指挥的赵老五匪部。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的上述三个地区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它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解放区，并使有些解放区之间联成一片。同时，又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理解与支持。1940年3月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又致电蒋介石、程潜、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同时，对国民党的俘虏，特别是军官家属，一律宽大释放，并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极力缓和国内局势。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最后议定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八路军立即将进至上述界线以南的部队撤回线北。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乃告一段落。

当时，在军事斗争殊死进行着的同时，政治思想战线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思想统治，国民党又于1939年上半年发起一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宣称“此次抗战意义，不仅在却敌，而尤在确立建国之基础”。“中国建国之最高原则厥为总理孙中山所首创之三民主义”。同年5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他自己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思维披上了三民主义的外衣，并且要用这种假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党。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国民党及其控制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反共小册子，一些反动分子也不断散布反共言论，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其中，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家叶青表现最为突出。

他于1939年初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叫《时代思潮》，并纠集一帮反动文人搞起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打着“三民主义研究”的旗号，发表了大量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叶青文章的核心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歪曲三民主义，反共反马克思主义；二是为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呐喊。

在国民党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广大人民十分忧虑，许多人尖锐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幻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面对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的疯狂挑战，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我党应实行“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三民主义”的政策。他还指出：“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叶青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此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对蒋介石、叶青之流打着三民主义招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重要论点逐一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我们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作了科学的论证。他不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以及它产生的必然性，而且正确比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的区别；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新旧三民主义、真假三民主义的区别等等。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澄清了国民党反共宣传在全国人民思想中制造的种种混乱，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这本身也就更为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挑战。

事实表明，国民党、蒋介石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占到便宜，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是一败涂地。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粉碎以后，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特别是击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我们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全面经验。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首先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接下来，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我们党应当以什么样的策略来对待这三种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的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还要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就无从发展。”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人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①我们有充足的力量；②尊重他们的利益；③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反对顽固势力。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原则。这三条原则既是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锐利武器，也为以后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规定了基本方针。这三条原则是：第一，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双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

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毛泽东的这个总结，为我党我军在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击退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再次掀起的反共高潮，提供了锐利的斗争武器。

二、毛泽东与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军事同盟。日本为配合德国在欧洲作战，决定对重庆政府加紧诱降，以便早日结束中国战争，抽兵南进，进攻英法殖民地。英美政府为使中国牵制日本南进，也极力拉蒋。蒋介石此时“左右逢源”，并将反共、灭共作为主要目标。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对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限我军于一个月内撤至7月《中央提示案》规定的黄河以北地区。皓电宣告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式开始。

皓电发出后，毛泽东及时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正确论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毛泽东指出：英美集团与德、日、意集团，一个月来在中国的相互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英美集团要求蒋介石加入他们的同盟，德意集团要求蒋介石放弃中日战争，加入德意日同盟。他们间的这一斗争，目前已达到白热化。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他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联盟，一方面准备加入德、意、日联盟。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是准备加入德、意、日联盟的严重步骤。因为日本要南进太平洋，就需要一个巩固的后方，而共产党“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的因素”。蒋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起巩固后方的这一职务，以此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所以蒋介石企图用武力把新四军、八路军驱逐到老黄河以北，以置我军于死地，“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

根据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论断，毛泽东提出了党所面临的严重任务：

“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所处的严重局面。”

毛泽东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以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进行政治斗争的部署，动员国统区的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的分裂投降活动。为此，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文大致内容如下：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

的联合与配合，时局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为争取时局好转这一可能性，要利用目前时局严重的这一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介石集团崩溃，指示利害，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周恩来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党内、党外多数人员出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的工作亦请周恩来转告李克农也要如此办。

11月9日，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佳电》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具体阐述了我军的行动、防地、编制、补给以及有关团结抗日的大计。佳电可视为我党、我军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开端。

《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订了对付蒋介石进攻的全面政策和斗争方针。

毛泽东11月15日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我党对蒋介石进攻所采取的全面政策：“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华中取自卫政策，针对汤恩伯大军准备东开的情况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指出汤军之是否移动，“这是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表现。在汤部只作移动准备尚未实行移动以前，应设法使其不动。”毛泽东请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张冲表示，如汤军东进则国共战争难免，皖南我军北移也难免发生波折，我党均不负责任，如汤军向我进逼，则我军即动手“解决”韩德勤。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的利害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张冲作以上适当表示，以延缓蒋介石进攻。

华中取自卫政策，毛泽东又电告项英、叶挺，请叶挺会见顾祝同时，向顾提出要求，要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当时覃连芳的两师已到河南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安徽立煌，计划攻皖东，汤恩伯9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请叶挺质问顾祝同：一面令我皖南部队北移，一面又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叶挺同顾祝同谈判时，指出“这是第一位问题”。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存在五大困难。他的调兵遣将、

停饷封锁、制造内战空气、威胁我党我军办事处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有鉴于此，毛泽东具体提出了我党我军的反击方针。毛泽东说：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团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其他部队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除对付蒋介石的局部进攻外，随时可以调动七万以上精兵，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猛重的打击。因我军愈有准备，彼方愈不敢进攻。这是有备无患道理。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介石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人的，他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与此同时，毛泽东、党中央对新四军的具体方针、行动作了一系列正确、果断的指示。要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执行中央提出的东进北上的方针。但当时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东南局书记项英一再拖延，迟迟不予执行。

1940年2月3日，毛泽东对新四军行动方针指出：目前时局处于转变关头，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其计甚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皖南部队准备移至皖东。”

1940年9月中旬，皖豫交界之李仙洲3个师，准备东进援韩，有渡过淮河向砀山前进的消息。桂军攻皖东者除一三八师及李本一部共7个团外，又增加一七二师。汤恩伯派3个团组成3个侦察支队、准备向豫东、皖西北之太和、阜阳、潢城前进，主力在豫西整训，准备东进。综合各方情况，蒋介石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据此，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等指示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令八路军一部南下到达新四军彭雪枫地区和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速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

1940年10月12日，要求军部应从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项英之所以不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主要是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他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强调同国民党的统一合作等等。为此，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批评了项英的严重右倾观点。

12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询问是否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

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四）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12月26日，毛泽东、朱德指示项英必须销毁一切秘密文件，片纸只字不留，每日将收发稿件随看随毁。此事不仅军部，而且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共约一万人由泾县云岭出发，准备向东经苏南渡江。刚走出一日路程，即遭国民党拦截，8日在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的重围。经七昼夜浴血奋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顽军谈判时被扣，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反动命令后，毛泽东党中央及时制定了斗争策略，指出以在政治上进行反攻为主，并在军事上和其他方面采取必要步骤，为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坚决的斗争。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他严厉驳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命令，向全国人民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勾结日本“联合剿共”的罪恶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注视事态的发展，准备随时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毛泽东指出：“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惩办皖南事变肇事祸首、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根本办法十二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十二条解决办法，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基本要求。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华北各解放区军民，对可能出现的国民党和日军的联合进攻，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八路军

枕戈待命，随时准备援助新四军，并派部分部队向南转移，积极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命令，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整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党采取的这种尖锐对立的斗争策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之中任何一种，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共产党对蒋介石采取尖锐对立的斗争策略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毛泽东说：人家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12条，两党重归妥协，或实行全面破裂。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17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所进行的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由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坚决反对，由于中间派的同情大多数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由于国际上反法西斯国家苏联、美国、英国对蒋介石这一做法的不满，也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战局的变化，事件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在极端孤立、狼狈的处境下，他们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蒋介石不得不公开出面为自己的反共罪行辩护。他在1月27日中央纪念周上发表了关于所谓新四军事件的演说。蒋介石在这次演说中除了重弹新四军不遵命令，袭击友军等谰调以外，他把皖南事变这一抗日战争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空前严重的事变，说成是一件极普通极平常的事。他说：

“新四军事件的处理，本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一件事，问题很单纯，也是我们抗战治军中必要的处置，所有一切夸大的宣传和恶意的推测，乃至企图耸动国际视听的谣言，我敢说完全是出于敌寇军阀之所为。”“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这次处置新四军，纯然为制裁违抗命令危害抗战的军队，对于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联，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

对于蒋介石1月27日的反动演讲，毛泽东指出：“蒋27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蒋从来没有为现在这样受国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为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目前的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防御地位。”

皖南事变的枪声刚刚平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但同时是殊死的政治斗争又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了。这就是，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会前，国民党方面即动员一些小党派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并通过各种方式挽请我方代表到会，企图欺骗舆论，粉饰太平。为了击败国民党这一阴谋，中共七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作为我方出席参政会条件（内容与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所提十二条相同），明确表示在重庆政府未采纳实行以上条件之前，我方参政员碍难出席。”

由于国民党拒绝答复以上十二条临时办法，3月8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参政会，详细说明了不出席参政会的原因。对国民参政会的抵制，打败了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退兵时的最后一战。3月8日，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作所谓“中央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老调重谈，已无任何新鲜内容。实际上，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到这时已被完全打退了。

参政会后，蒋介石对同我党关系表示了一定的缓和。为此，4月26日毛泽东亦致电周恩来向蒋介石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唯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

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

针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

其二,在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政策仍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制止其投降反共,而不是“与之一拼”。这样,既粉碎了它的投降反共逆流,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国际舆论的称赞。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则受到国内外一致的反对和责难。国内许多原来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因受到这次“皖南事变”的实际教育而觉醒过来。有些地方实力派和所谓“杂牌军”,也对蒋介石这种消灭异己的政策表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则纷纷斥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国民党政治地位的进一步降低。

其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充分体现了我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性与高度灵活的斗争艺术的统一。通过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我党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威望和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其四,皖南事变以前,蒋介石历来把共产党问题作为地方、局部问题对待。当然,毋庸置疑,这时任何比较重大的磨擦事件都是国民党反共政策及其最高当局一手策划的结果。但是,从形式上看,皖南事变之前的磨擦,一般都表现为“地方性”的;当时反磨擦斗争的直接对象,也主要是国民党地方统治者。所以,蒋介石还可以以所谓“领袖”身份进行“仲裁”处理。如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蒋介石还能冠冕堂皇地对中共代表说:“国共本无事,地方磨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但是,皖南事变却把蒋介石直接推到被

告席上。此后，中国共产党即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直接的对等谈判，解决有关全国政治和两党关系问题，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及其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影响。

三、毛泽东与制止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自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国际形势已经面临大变化的到来。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战解决，美英就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他们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中国人民力量又发展壮大起来，他们惧怕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为了继续维持以至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反共行动。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全面表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观点和对外政策，恶毒咒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掀起了抗战以来又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其要点是：

（一）借回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制造理论依据。

（二）借回顾中国近百年史，美化国民党，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扬言要消灭共产党。

《中国之命运》一出版，国民党便大肆吹捧为什么“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等等。他们还把它列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供中学教师、大学教师讲授和大学教授研究之用。此时，又恰逢共产国际解散。于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吹呼雀跃，企图借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给中国共产党以致命一击。他们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制造反共舆论，重庆的八家报馆，除了《新华日报》外，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国民党把持的各种出版社，如正论出版社，统一出版社、青白出版社等出版了若干“丛书”、“专论”、“述评”之类的反共文章。国民党特务机关“明令其所属，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会，发动大规模的反共宣传攻势。”大大小小

的特务假冒“文化团体”、“民意机关”，召开座谈会、发表演讲、通电，要求中国共产党尽速解散。长沙特务机关在“通电”中甚至提出：“请毛泽东解散共产党及边区政府，即返湘潭原籍，做一个乡社自治员。”这样，由《中国之命运》发起的反共宣传，骤然升级为一次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反共声浪又一次甚嚣尘上。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文，是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思想舆论准备。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又被蒋介石视为加快反共步伐的绝好时机。

正当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投降内战阴谋，苏联人民胜利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时候，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发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鉴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决定指出：“既然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决议指出，共产国际25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国际这种形式，已经日益不能适应工人运动的增长和每个国家内日益复杂的问题，“而且还证明了这个形式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底障碍”。决定还估计到各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底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深信各国共产党都能够独立自主地妥善处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1919年所建立的共产国际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同时，德国法西斯一向以反对共产国际“干涉”各国内政为借口，疯狂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反苏反共，制造混乱，挑拨离间反法西斯阵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则使德国法西斯的此等谰言和阴谋不攻自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明确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蒋介石反动集团却如获至宝，借机大造反共舆论。他们指使其各地的特务分子以及托派、反动文人等，假冒“民众团体”等名义，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国际解散了，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失掉靠山，内部要分裂了”，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思想、政治进攻的同时，对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亦在积极准备之中。1943年6月初，蒋介石先要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

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然后命令胡宗南于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随后即调动原担任河防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开到邠州、洛川一带，准备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出兵九路，合击延安。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部队，由1942年五十万人猛增到六十万人。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边区鄜县柳林区。7月9日，又炮击关中分区，形势一触即发。

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进攻，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党我军亦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予以有力地回击。

当作为第三次反共高潮思想舆论准备的《中国之命运》一出笼，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次斗争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党中央专门开会分析了《中国之命运》的反动内容，研究部署了对它的批判，并委托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这场斗争。刘少奇根据中央会议的精神，主持召开了延安的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它。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1943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有：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周恩来于同年8月从重庆回延安，发表了《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讲话和报告，兴起了一个回击国民党反共宣传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述文章中对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中，艾思奇的文章深入剖析了蒋介石哲学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陈伯达的文章着重分析了蒋介石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歪曲和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篡改，揭露了《中国之命运》在理论上的种种混乱与荒谬，周恩来的文章则从理论上概括了蒋介石政权的基本特征，批判了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政纲、策略及其组织活动方式。这些文章都从各个方面揭穿了蒋介石借讨论中国命运之名，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分裂抗日抗一线、挑起新内战的罪恶阴谋。

针对《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于共产党的种种诬蔑与攻击,《解放日报》社论说:“污蔑共产党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的无耻妄人,其所持唯一理由为‘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但是问题却在组织什么样的武力,割据什么人的地方。共产党组织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据的是日寇占领的地方”。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公布了两份统计材料:一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二是《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六十万人的50%(三十五万人),国民党反抗击43%(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90%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中国共产党人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国民党从抗战以来,逐步由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退过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步的正确路线,深刻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忠实的卫士”、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同样,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从理论上批判蒋介石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调集军队企图“闪击”延安的军事阴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政治上使蒋介石集团进一步陷于被动与孤立。加之,英、美、苏各同盟国也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迫于形势,蒋介石于1943年7月10日指令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停止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9月18日,国民党政府又召开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准备实行宪政”的议案。至此,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被击退。

但是,国共两党围绕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尖锐地指出,所谓“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从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和人民,警惕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斗争。

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

一、建设和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

随着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此，解放区的政权建设问题就日益突出起来。尤其是在1940年初，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党内又开始出现一种“左”的倾向，一部分同志错误地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或很快就要破裂，因而他们主张在政治上仍然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他们不执行各抗日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尤其忽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它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不利于中国人民尽早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也不利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1940年3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因此，从1940年起，各解放区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就是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

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是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首先正式提出的。1940年3月，毛泽东为党中央写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说明，“三三制”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机构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实行各占1/3的制度。关于“三三制”人数的规定，在最下层政权中可能要灵活些，但其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这种抗日政权的施政方针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这种统一战线政权，既坚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又广泛吸收了进步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参加。因此，它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有根本的区别，也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所不同。毛泽东在1941年5月为党中央写的指示进一步说明，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

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了，其主要标志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并巩固三三制政权形式，与争取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各阶级，以其对待抗日和民主的不同立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主要对象，因而成为抗日最坚决、最积极、最基本的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势力。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被迫抗日，也要其他势力抗日；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抗日，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还有一种中间势力，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倾向抗日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既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又同工农阶级有矛盾，因此往往动摇于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当时，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孤立和削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同上）。为了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除在经济上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以及“减租减息”等政策外，在政治上，是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在贯彻执行三三制政策中，着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也确实团结并教育了中间势力。通过贯彻三三制政策的实践，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都有很大进步，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边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在谈及这一段合作时曾说：“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当开明绅士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后，虽年迈体衰，仍坚持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提出了著名的“精兵简政”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支持

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积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

陕甘宁边区这些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走上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道路，对全国范围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推动作用。李鼎铭和安文钦虽是陕北的开明绅士，但是他们的进步，却可以反映全国中间势力的动向，并对其他中间分子有影响。毛泽东在论述开明绅士问题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

在由1/3共产党员，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1/3中间分子组成的政权中，共产党是否处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这就是说，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不是以党员数量和强制方法，而是以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去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建议，保证党的领导权。

由于三三制政权的实行是我党第一次在政权机关中同党外人士合作，既无经验，而且党内还存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所以，要实现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非易事。但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那么，如何和党内人士尤其是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共事呢？首先要对党外人士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使他们有职有权。陕甘宁边区政府，原先把党内人士当客人看待，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后来，边区政府中的共产党员改变了原先的做法，使之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毛泽东听说后表扬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很好，应该这么做。其次对党内人士要真诚相待，热情照顾。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在和党外人士的接触中，不仅要有外表上的礼貌和谦和，更要有思想感情上的接近，要发扬民主，感人以诚，动人以理，真诚相待。最后，在三三制的政权中，既要有团结和让步，又要有必要的批评以至斗争。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同党外中间派人士，虽然在抗日和民主的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党外人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

同，对待具体复杂的实际政策，不会完全一致，不会完全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处理不同意见时，要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同具体问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施政纲领和总的政策之下，对于个别问题，遇有争论，甚至有时遇有原则性分歧时，我们得有适当让步。毛泽东认为，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合作，有些事情让点步是难免的。农民吃了亏，可由边区政府给农民相应的补偿，使农民不吃亏。这样，地主和农民双方都照顾到了。但是，对于原则问题要作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决不能迁就。如国民党作风的侵入不能不加阻止，对土地问题不能偏听地主士绅们一面之辞，对保安机关应否存在的意见不能让步等等。不过，批评和斗争时，应该区别其是非轻重，照顾不同的人 and 区分不同的事实。批评的方式和场合要审慎。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特别爱惜自己的面子，应该避免当众批评和当场批评，而多用个别谈话方式，婉转说服的方式，并要以诚恳帮助的态度，一面批评错误促其改正，一面顾全面子，使之感激。

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方针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一爆发之时就明确指出：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是抗日武装人力、物力、财力的源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家，有了后方，一切供应就有保障。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果没有给养供应的保障，要想坚持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这样，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当时，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国民党的军队对我解放区长期包围、封锁。国民政府曾一度拨给我军的少量军费不久又断绝了。另一方面，根据地的经济是分散的，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经济落后。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地主豪绅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连年军阀战争的摧残，再加天灾频仍，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困难。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根据地的经济财政一度陷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曾经到达过没衣穿、没油吃的地步。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而且还是经济的竞赛。因此，搞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决定抗战前途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

（一）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经济财政的总方针

正确理解“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关键是要解决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因为，当时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是通过财政来解决的。而“财政政策的好坏虽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达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当时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不顾战争需要，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要把人民的负担大大减少。另一种是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鱼，诛求无已。这两种错误观点都是忽视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多收少方面打主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都不能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这两种错误观点要么是把“仁政”施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要么是承袭国民党的思想作风。按照这两种观点办事都不能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唯一的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发展了，就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或者负担虽然重一些，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群众的生活仍然相对地可以得到改善。

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决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40年代初期斗争实践的产物，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真理。1940—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两次反共磨擦，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的办法企图困死抗日根据地。为了渡过这个困难，党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自己动手，军队、机关与学校工作人员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仅两年时间，到1943年，边区的军队可以说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历史事实表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思想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为解放劳动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开始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又确定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

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他还特别阐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因为当时抗战军民最基本的

生产必需品都是由农业生产来提供的。保障抗战需要的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部门也都是依靠农业发展才得到发展的。

1943年毛泽东又指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这里所说的“以农业为主体”，实质上也就是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意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结合当时的情况作了阐述。

（三）关于“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管理财经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根据地主要是分散在各地农村，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和敌人分散作战，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领导当时各解放区的经济生活和组织农工商业的经营管理，保证作战的供给，是一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在全部公营经济中实行“统一领导”，克服无政府状态；一方面对一些公营经济实行“分散经营”，发挥其积极性。

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盈利，务必免除各自为政”。“为什么要这样地分散经营呢？这主要的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被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经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个原故，我们利用各部门为解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集中与分散的界限，他说：“对于所有的农工商业，都要区别两种形式：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应该集中，小的应该分散。”经过三年的实践检验，他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说：“‘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地进行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既然根据地产生了

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产生并开始发生作用。毛泽东在1941年8月9日致谢觉哉信中谈到财经的计划,把这个计划称为行动纲领,他说:“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当然,根据地当时的经济条件是私人经济占优势,又是处于农村的分散环境,直接的强制性的计划管理方式是不适合的,或者是只能适用范围很小的国营经济。能实行计划管理的只有少数重要产品,方式上也主要是间接计划,即通过经济手段,思想政治动员来保证计划的完成。在战争年代,使用经济手段的物质力量很薄弱,主要是通过共产党领导,开展劳动互助合作,通过思想政治动员农民来完成计划,而且当时大敌当前,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

(五) 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自力更生的方针就是革命和建设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抗战最艰苦阶段,不管敌人的破坏和经济封锁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队人员、机关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现自力更生,不能放弃一切可能的外援。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锁国。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必然会获得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援助,主要的援助来自下列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此外所谓的所谓外援,即使有可能,也只能看作部分的和暂时的。所以这些援助都应该争取。

但是不能一切依赖外援,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立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六) 关于对外经济交往

毛泽东远在1936年初冬,在保安窑洞里向斯诺纵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时,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不仅同友好国家进行互助互利的贸易,而且“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

毛泽东不仅表示了上述愿望,而且曾经在解放区努力付诸实践。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经毛泽东作过多处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年8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导》，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外国在军事、文化和经济诸多方面关系的基本原则。关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文件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和技术合作。”并且鲜明地指出：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

在毛泽东《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经济纲领等一系列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指示和著作的指引下，根据地的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党和军队的给养供应充足，根据地的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这就为党和军队的迅猛扩大发展，以及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建军思想

（一）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从来都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王明，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言人。他要求和国民党建立统一的军队。主张“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认为“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提出所谓“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这是一个极端错误也是极端危险的主张，它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灭亡、中华民族的灭亡。

对于这种错误主张，毛泽东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反复强调：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关系到我党我军的命运与抗战前途。

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把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强调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斗争的同时，又要向以民族斗争来否认阶级斗争的尾巴主义作斗争。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以便引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从两党关于红军改编谈判中,进一步证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参加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因此在合作之始就念念不忘抗战中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蒋介石的主导思想是要收编红军,通过干涉我军内部事务加以控制,使我军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并改变其性质。

事实非常清楚,就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方针的同时,却又通过了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竟把我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向国民党“输诚”,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允许共产党“自新”。该决议案借口统一编制、统一号令,要“彻底取消所谓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这就表明,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只是其策略上的改变,而“根绝赤祸”则是他们的根本方针。对此,毛泽东曾严肃地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决定因素。我们党要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保存和发展革命阵地,壮大人民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切都要求共产党坚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的领导。

(二) 建立党的组织领导系统, 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

为加强党对我军的领导,1937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为了便于指挥抗日前线的我军,8月29日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前方党的军委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1941年4月16日改称华北军委分会)。各师组织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时,党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为分局和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1941年2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军政委员会条令》,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军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这种军政委员会,实际上起到了党委会的作用,成为团以上各级的最高领导机关。此外,在各级政治部内设党务委员会,团政治处内设总支,营设分总支,连队建立党支部,使党的组织工作深入基层。

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部名称,强调我军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原则。因受国民党的干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将各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因而削弱了部队中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

(三) 大力开展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这是对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概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这段话,从政治工作对于发挥战术、技术威力的作用上,深刻阐明了它的生命线的作

(四) 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利益的军队,这在我军创建之初就早已明确。抗战时期,毛泽东又做了明确阐述,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 and 全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为人民服务”就成为我军区别于任何旧式军队的最显著的标志。

在这个宗旨下,适应抗日战争出现的新形势,我军的三大任务也作了部分修改,把筹款改为生产,这是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采取的重大措施。在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中,部队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无敌于天下。”我军发展成为打仗、生产与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这既适应了当时特殊环境,又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五) 提出并领导整军工作

抗战开始,由于我军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放手发展抗日武装的正确方针,使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1940年初,仅八路军就扩大为四十余万人。但是由于部队的迅速扩充,老部队中新成分大量增加,军事、政治素质有所下降,纪律松懈,军阀主义现象有所暴露;发展起来的新部队(抗日义勇军、抗日自卫军、抗日游击队等),虽有抗日的要求,但成分复杂,思想混乱,队伍不够巩固,出现了各树旗号,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混乱的状况;特别是刚刚

收编的各种旧式地方武装，极不稳定，他们打着八路军的旗号，胡乱筹款、派粮，侵犯群众利益，严重损害了我军声誉。客观形势和任务要求我军，必须由数量的发展转为质量的提高。因此，整军、改造部队，就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

1938—1940年，根据军委和总政指示，各根据地分别不同情况，数次进行了政治整军和军事整训。整军的总方针是从政治、组织、思想、装备、技术、纪律等方面巩固部队，提高质量，目的是巩固党的领导，使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真正建设成为政治上坚定，组织上严密，军事上坚强，拖不垮、打不烂的铁的党军；在新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和政治机关，审查干部队伍，抽调得力干部，充实加强新部队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清除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封建迷信观念，把各种地方武装改造成为人民军队。

经过整军，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得到提高，使主力部队更加巩固坚强，使新部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成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1941年开始，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各部队进行精简，使主力部队更加精干，充实了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从而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是我党军事建设上的又一伟大创造。

四、关于外交问题的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多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成奇特的交错，其显著特点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积极配合日本支持侵华战争，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法西斯侵略轴心；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英美帝国主义采取反革命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侵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助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意在欧洲的威胁，又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缓和他们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因此，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一直谋求与日本之间的妥协。

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紧紧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坚持抗战到底的基本国策，为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战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根据“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了对待抗战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抗日外交路线和降日外交路线的尖锐斗争。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在分清敌、我、友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就是：

1. 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
2. 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苏联的力量帮助中国抗战。
3. 争取美英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援助。
4. 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以上四条原则，是真正的抗日外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和平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处理对外关系的最基本的策略思想。

此外，毛泽东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处理国家间关系原则的思想。首先是丰富了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这一原则的内涵。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描述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时提出：这个民主共和国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无论是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论新阶段》）。这段话包含了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平等互惠、和平共存以及中国永远不作帝国主义这样一些原则。它表明，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已初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本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又重申了上述原则。

在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思想上，毛泽东的主张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谓外交事务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坚决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屈服于任何强国或国家集团的压力，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内部事务；希望有外援，但不依赖外援，依靠本国人民的创造力。

值得提出的是，抗战期间国际援华的人力、物力、财力，绝大部分给了国

民党。从1940年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和财政补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锐减。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说：“自1940年以来，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有在抗战初期统帅部的任何接济，弹药也1940年停止。”从此，国民党给解放区“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美国记者斯坦因说：“中苏外交联系和军事联系也似乎只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支撑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国际援助的物资给了资产阶级，红色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是不可置疑的客观事实。

中共中央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路线。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作过全面的精辟地论述。他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起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的时候。”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还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任何轻视中国人民力量和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民族利己主义。1945年2月2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提出了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要求。提出把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要求租用旅顺港为苏联的海军基地；要使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共同经营，等等。这些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抵制，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毛泽东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对外政策，还表现在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翌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解释抗战到底的“底”，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况”。这就是说，东北可以不要了，华北仅维持中国在形式上的统治权，国内妥协空气愈来愈严重。国际上，英美报纸公开鼓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美国驻华大使卡尔，来往于上海、重庆之间，劝蒋介石与日构和。英国一再表示，承认长江以北为日本势力范围。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说：“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远东慕尼黑，就是把中国变成捷克。”他号召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外交策略。这是毛泽东根据抗战实际情况,利用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的方法建立的。

毛泽东外交思想总的策略方针,即毛泽东所强调的“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一切以有利于抗战为原则”。(《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群众周刊》,第3卷第13期,第342页)这就是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毛泽东还阐明区别对待的策略原则,即对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内不同的人们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政策。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党中央曾根据各方对中国抗战及对我党的态度多次作过具体的规定。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曾指出,在分析国际局势及制定对外政策时,“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除了重申应记住上述区别外,又进一步提出应将帝国主义国家及同一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加以区别。指出应将侵略中国的日本与现在没有侵略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将支持日本的德、意与和日本对立的英、美加以区别;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的英美与放弃了这种政策的英美相区别。并要求应“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22—723页)此外,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还提出要将日军的军官与士兵,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加以区别,以建立最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抗战后期在对付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时又提出“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02页)上述这些“区别”在层次上的不断增加,说明毛泽东外交策略水平的不断提高。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提出了系统的外交思想及其策略方针,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外交、国际形势问题的言论和文章,如《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等等。在毛泽东的其他论述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外交问题。毛泽东还多次与多名外国记者以及民间人士谈话,与他们建立友谊,并且通过与他们的谈话,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也让中国共产党了

解世界。

1941年10月，具有世界重大历史意义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有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18个国家，130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标志着东方反法西斯斗争的团结一致，延安成为东方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分析了法西斯一定要灭亡，人民一定要胜利的总趋势。大会选举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成员，朱德任主席。这次大会给了苏联和东方各民族反帝斗争以巨大鼓舞和力量。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亲自会谈并设宴招待，特别是毛泽东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作了多次谈话，有时长达8小时，阐明了我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基本立场，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详细步骤，表达了中共将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同美国合作的意向。毛泽东的谈话，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访问期间，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增加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共的具体了解。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11月8—10日同他进行了四次会谈。赫尔利带来了作为协议基础的五点方案，仍然玩弄“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的把戏。毛泽东严正地指出：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现在不民主的、腐败的政府。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军队。赫尔利无由反对毛泽东关于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的原则意见，经双方协商共同草拟了新的五项协议，同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等，这是有利抗日和民主的，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反对，赫尔利很快撕毁了协议，美国政府企图用曲折的方法，钩出中共的武装，但中国共产党却不易受欺骗，又不怕恐吓，赫尔利的“调处”只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先后给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文章，尖锐地指出：“假如赫尔利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在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第五节 整风运动

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普遍开展的整风。这次整风,从延安开始,又以延安为典型,故又称“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有关这次整风运动的提出、整风具体过程的安排、整风的具体内容、整风的方针原则诸方面,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整风运动无论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史中,都是极其光辉的一页。

一、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如果从一开始的准备阶段算起,到最后完全结束为止,是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但一般是指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的整风学习。毛泽东参与并领导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为整风运动有计划、有组织的顺利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100—200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强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大力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学习和研究。为此,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党的建设的原则上分清了是非,对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团结全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对于党在抗

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党在抗战时期的策略路线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有原则的区别。并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就从党的政策上区分了是非。1941年4月，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他强调党的工作应该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加强对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后来，党中央又分别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要系统地调查敌我友，调查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调查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担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下设政治、经济、敌伪、国际、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等研究室和研究组。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深刻阐明了我党我军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由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向全党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还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为即将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动员，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不久，中共中央即开始组织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

高级干部经过认真学习，座谈讨论，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遵义会议以前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九·一八事变”，党中央有多次原则性错误；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但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次会议揭露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党中央领导干部的一次整风会议。它促进了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向纵深发展，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议还对全党的整风运动作了初步的安排。

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或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领导干部120余人，学习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10

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其他根据地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各地高级学习组统一归中央学习组领导。11月2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组织了学习组，由周恩来任组长，董必武任副组长。

12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为了克服这个倾向，对培养目标、教学方针、方法都作了新的规定。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彭真任教育长。

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批评有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有碍于我们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脱离群众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这就指出，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和肃清，也是这次整党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泽东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主持编印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上、下册，随后又在1942年10月编印了《六大以前》，供党的高级干部阅读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了高级干部要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问题、新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导》，具体规定了整风的文件以及整风的方法和步骤。至此，全党的整风运动便普遍开展起来了。

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总学习委员会规定，学习共分五个阶段，即发动阶段、学风学习阶段、党风学习阶段、文风学习阶段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在总学委领导下，共分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1.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2. 中共中央军事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3.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4. 中共中央文

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不久，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南方局，都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20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整风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除了对延安地区的整风运动直接参与和指导外，还十分关心各地的整风运动情况，并对他们的整风工作予以指导。例如，1942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诉他们：“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1942年7月4日又致电聂荣臻，提醒他着重抓紧对根据地高级干部的整风领导。

从1943年10月10日起，由全党的普遍整风转入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在延安的各根据地领导同志，分别召开了地区或方面军的座谈会，研讨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充分评价了整风和生产的伟大意义。在谈到党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的时候指出：“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取得新的胜利，必须避免骄傲和努力，学会马列主义分析事物的方法，要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延安整风运动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二、毛泽东所提出的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和方针

毛泽东指出，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抓住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到了党内产生分歧的根源。

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也脱离实践，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要是假借共产国际和斯大

林的崇高威信，把他们的言论变成教条，到处乱套，谁不执行他们的“教条”，就严加惩办，乱打乱斗。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也不愿刻苦地学习理论，只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二者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毛泽东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着重批判了对党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王明教条主义者非常无知，又非常狂妄自大，自封为百分之百正确的人物。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

为了彻底批判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针对人们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着重说明了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从而为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指明了方向。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就一方面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失去方向，就要犯错误；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来源于实践，反作用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

那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把这种关系通俗地比作‘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他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说：“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呢？也就是说，我们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搞好革命工作呢？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还要着重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应用它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现实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然后对这些材料加以具体地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从其中引出

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党需要的理论家就是从事这种理论工作的理论家。

延安整风的第二个任务是反对宗派主义。

要实现党的统一,单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以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对那些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进行打击。遵义会议以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对党内外都有所表现。

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有种种表现形式,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首先尖锐地批评了“闹独立性”的问题,因为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又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泽东要求: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包括一部分党员在处于领导地位时对党外人士的不尊重,也包括“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关门主义残余。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共产党应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特别要注意照顾到中间阶级的利益。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他还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延安整风的第三个任务是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认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

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就党八股的历史渊源而言，它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同时也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就当时反对党八股的现实意义而言，毛泽东指出：“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例如，自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便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还历举了党八股的种种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并且，它的危害还不仅表现在讲话、写文章、作决议等文风方面，还在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教育工作、文学艺术工作中表现出来。更为严重的是，它还不便于启发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一言以蔽之，不打倒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用不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鉴于此，毛泽东把反对党八股列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常常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这样做既伤害了同志，又危害了革命，其教训是非常惨重的。在这次延安整风的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反复强调，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待同志，包括是犯错误的同志。这次整风的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在延安整风中，普遍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任何一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都进行了面对面的、指名道姓的相互批评。这种批评是尖锐的、严正的，但态度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在批评的同时，大家还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自我批评。为了使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卓有成效，又不伤害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延安整风中，首先抓了党性修养问题。因为，只有增强了党性，才能更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为此，党中央组织学习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著作和文件，这就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还指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应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主张首先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对其错误，给予客观地评价，既不夸张、又不缩小。绝不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成敌我矛盾；绝不把一般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绝不把非原则性错误混淆为原则错误；绝不把由于客观原因所致的错误归之于主观原因所致的错误。在对其错误作准确定性之后，再分析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强调，在整风中对于错误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错误性质的分析和错误根源的分析，而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他还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搞惩办主义、不搞否定一切、不能另眼看待。要欢迎他们改正错误、相信他们能改好，鼓励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例如：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搞分裂活动擅自组织他自己的所谓中央和地方的非常委员会期间，当过“常委”，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是思想负担很重，感到抬不起头来。她约了一位女同志陪她去见毛泽东，她说：“主席，我在罗章龙路线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重。”这时，毛泽东亲切地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泽东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沉重的思想负担，使她的心境豁然开朗，积极投入工作。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做了许多人的工作，建议大家把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李立三等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同志，有利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1943年4月，党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确定在整风运动后期，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当时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大搞逼供信，利用职权，将审查干部工作扭转了方向，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反特运动，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高峰，形势紧张。1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此，原先的坦白运动便发展成为“抢救运动”。整个边区机关、学校，开始了“全线突击”，“日夜抢救”，一时特务如麻，人人自危。党中央发现了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立即纠正。经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提议，党中央批评了康生。

为了纠正审干工作中的偏差，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九条”方针。当时，毛泽东还反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反对逼供信，重证据，不重口供。他还亲自纠正审干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到群众中做思想工作。1943年底，延安大学合并到行政学院，被审查过的同志意见很大，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会给我们平反。不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了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毛泽东接到信以后，亲自来到行政学院，在一千多教职员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他还说，有些好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叫实事求是。现在要对审查过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定案，错了的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三、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整风期间，党内展开了两场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大辩论。一场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大辩论，另一次是关于文艺问题的大辩论。关于文艺问题的大辩论，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的。而这次会议又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

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经验，端正文艺的方向，使文艺更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当时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由于上述原因，党中央在发动全党整风的同时，开展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马、恩、列、斯关于文艺问题的著作和《整风文献》的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暴露了文艺界的思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集中解决文艺方向和根本道路问题，于1942年5月2—23日，在杨家岭党中央办公楼内的一间大厅里，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会谈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艺界代表约80多人，座谈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主持。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在5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问题分别作了论述。5月8日的第二次会议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讨论。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和大家进行了座谈。5月23日举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结论性的重要讲话，着重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在5月2日讲话中，着重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主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立场与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自己的正确的立场。”他又说：“随着立场，就发生了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

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提出这一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热情，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主观上，他们愿意为工农兵服务，客观上，却又在思想感情、立场观念、生活、语言等方面与工农兵格格不入。超阶级的“人性论”、“艺术至上”的观点，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在歌颂什么、揭露什么的问题上更是存在着模糊认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就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结论部分，毛泽东逐一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是着重提高？还是着重普及？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文艺应当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即工人；农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在目前的条件下，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才能创作出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是：“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其实，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经产生了。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他又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中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

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他还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1938年9月，鲁艺的一个文学团体路社，召开诗歌座谈会，请毛泽东指导。毛泽东因为工作忙而未去，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才能完成诗歌的革命任务。因此，诗歌工作者要参加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诗歌要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写，群众才喜爱。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5月2日和5月23日两次讲话，即《引言》和《结论》），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著作。正如中共中央整风学委会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中指出的那样：《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通知要求各地收到这一《讲话》后，必须当着整风必读的文件，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还要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中宣部也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现阶段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贯彻《讲话》精神，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文艺空前繁荣的局面。文艺创作之繁荣、文艺理论之活跃，文艺队伍之壮大，都是先前的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

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它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整风，所以能够收效巨大、经验丰富，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结果，由于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抓住了党内主要矛盾，制定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和方法，采取了稳妥而又有序的步骤和娴熟而巧妙的领导艺术，才使整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次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以及作风的建设，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 中共“七大”前后

一、“七大”召开时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之时，正值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全世界的人民民主势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地强大起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条件比以往更具备了。国际国内形势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光明的前途。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专政，反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正积聚力量，准备发动反人民内战，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因此，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有两种中国的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七大的任务就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这也是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在整风运动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要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了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通过了《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由14人组成，彭真为主任。

全会体现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迎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一历史文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时间。1941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会议代表总结、讨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中级干部对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初步一致的意见。10月13日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以毛泽东为首组成了由王稼祥、任弼时、彭真等人参加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委托王稼祥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就是后来《决议》形成的初稿文献。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等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负责《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5月19日增加了当时在延安的秦邦宪、陈云等同志。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会参加讨论，提出了不少意见。1945年春，中央还组织了由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在延安的高级干部组成的《决议》草案讨论小组反复征求对《决议》草案的意见。期间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等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个文件比《结论草案》更准确、更翔实、更科学。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每次都进行认真讨论。1945年3—4月间，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李瑞、林枫等负责到各个组连续开会，加深讨论，提出了很多意见，所有重要的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及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认真地研究以后，其中合理的有益的意见被尽量吸收在《决议》中。比如对“六大”的评价，王明“左”倾路线的开始时间及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决议》草案在总结党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以后，加写了“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们党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揭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这就明确的指出了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引导中国胜利的指导思想。这段的加写，无疑为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决议》草案在列数党的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

后指出：党经过了自已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必定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党。

毛泽东对《决议》的起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1年《结论草案》是由毛泽东主持，委托王稼祥起草，事后又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讲话。紧接着，4月12日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先后作了报告。针对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问题，就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6条意见，并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和批准，后来成了政治局的结论。从1941年《结论草案》到1945年《决议》，毛泽东都参加了文件的起草修改。仅《决议》草案，毛泽东就曾作过6次修改。第一次，毛泽东把底稿原题《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就有关问题加了很多内容。第二次，毛泽东对“六大”的评价，对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以及遵义会议的意义等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并批示：“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40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在这个批示后，《决议》草案于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版印刷。此后，毛泽东又作了第三、第四、第五次修改。后经胡乔木汇总，再送任弼时。同年4月8日再次排印，毛泽东对此作了第六次修改。直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7月24日又一次印出稿子，在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部分才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除此以外，在《决议》起草和讨论中，毛泽东还广泛认真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一些其他意见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如有的同志在讨论中要求在《决议》草案中写上“教条主义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要求写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不同意说四中全会和临时中央是合法的等等。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草案上没有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品质问题，也没有说非法问题，也没有说学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都会成为错误。这些话对全党进一步领会中央处理党内历史问题的方针和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统一大家的认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修改后的《决议》在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而构画出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提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说：“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要看着四万万人民，以组织强大的团结的队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共产党员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三、“七大”概况

1945年4月23日—6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0多万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洛甫、彭真、高岗、康生等1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面对这一形势，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致开幕词后，彭真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大会印发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就这一报告作了一长篇发言。4月25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已经简要地提出的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形成和发展，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

5月14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按照毛泽东建党思想起草的提交七大审议的新党章草案。在这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

同志作了大会发言和关于政治、军事报告的讨论。

5月24日，毛泽东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选举的标准，是要选举那些能够保证实行大会的路线的同志来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已认识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还是可以选的，不能搞绝对化，图简便，要善于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须知跌过跤的人往往比较稳一些。历史上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选举要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但也不可能那样周到，否则就变成凑数。对于才能和知识的要求，只能是比较完全一些，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中央委员会是集体领导，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5月31日，大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大会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大会听了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对于抗战八年来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我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伟大成绩，表示满意。大会认为，自六次大会以来，我党在军事工作方面，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在十七年的奋斗中，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国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并且同人民一起，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等这样巨大的武装力量。我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这些伟大成绩，乃是抗战胜利的保证，乃是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保证，乃是对于民族对于人民的宝贵的贡献。决议规定了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任务。

6月9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共选出毛泽东、刘少奇等44人为中央委员。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共选出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6月11日宣布选举结果，此后毛泽东作闭幕词。毛泽东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全军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19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祖涵、张闻天、彭德怀。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七届一中全会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四、毛泽东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首先清醒地指出：“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

但是，八年的抗日战争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毛泽东指出，在八年抗战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即人民战争的路线，国民党政府则实行片面抗战即消极抗日的路线，坚持反共、压迫人民的独裁方针。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中国仍然存在着内战危险，两条不同的路线正在向两个前途发展：“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怎样反对实现第一个前途、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普遍原理，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的标题——《论联合政府》鲜明、集中地所指出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还对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问题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主张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解放中国社会

生产力所需要的，因而也就为中国人民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将近八年的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路线、政策，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必须保持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这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种作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具有这种作风的党，乃是领导中国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为了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指出，我们要实行放手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既要提倡党性，也要发展个性。党性即普遍性，个性即差别性，普遍性建筑在差别性上。同时，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共产党员要说真话，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不装不吹，不懂就好好学习。

此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根据中国的特点、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具体论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联合统一的国家政权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问题等等。

五、毛泽东思想为我党指导思想的确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我党长期建设的经验，对党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新党章的主要特点作了深刻的阐述。

这个报告特别着重地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明确地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报告深刻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主要内容，指出：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我们的毛泽东，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九个方面的“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毛泽东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上也实事求是地表示：“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指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者）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结党和群众的集体经验才产生出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就鲜明地证明了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如上所述，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完整地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体系，它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这是到那时为止的毛泽东思想的集大成，表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出席七大的代表热烈地讨论了这些报告和发言，表示衷心的拥护。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也正式庄严地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这时已经发展、成熟为全党公认的指导思想，全党已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自遵义会议以来，到抗日战争期间，全党的认识从逐步统一到完全统一，最后完全统一于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思想。正是由于全党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也就是按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党的队伍整齐，步伐一致，才能在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八年之久，使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力量获得空前大发展，并且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配合，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革命斗争都先后遭到失败或挫折，那末，抗日战争就不同了，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同国际国内存在着比过去多得多的有利条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正确地运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了不利条件。毛泽东思想引导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为新民主主义在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45年4月意大利法西斯彻底垮台。1945年2月4日—11日，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美、英达成协议，苏联于欧战结束后的2个月或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4月16日，苏军发动强大攻势，摧毁了奥得河和尼斯河防线进入德国本土。4月25日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开始最后的攻坚战。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于柏林陷落前夕自尽。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德军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岛。7月26日，美、英、中

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刻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它仍继续垂死挣扎，并妄图利用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北地区作为战略基地，负隅顽抗。

为了进一步消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从1945年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华中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出击，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八路军和新四军1945年的夏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和扩大了各解放区的联系，迫使日军龟缩到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处于被动挨打的孤立地位。对此，日伪军十分恐慌，投诚反正的伪军迅速增加。到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主力已经发展到120万人，民兵有220万人。日伪军占据的大部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于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而且包围圈愈来愈紧。这时，随着战争形势的有利发展，各解放区积极地进行扩军练兵，人民抗日武装逐步地过渡到大兵团行动，准备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8日夜，苏军越过国境向日本关东军进攻。由于苏军在兵力、装备、火器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以及日军估计不足、缺乏准备，苏军进展顺利，日军全面溃败。

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说：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

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5年8月10日、11日两天，延安总部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第1至第7号作战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波茨坦公告》规定，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之日伪军送出最后通牒，限期向我军投降。同时，为配合苏军作战，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进军，张学诗部向热河、辽宁进军，万毅部向辽宁进军，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军。贺龙、聂荣臻部由现地北进，向内蒙及绥、热、察地区进攻，接受日“蒙”伪军投降。山西我军在贺龙指挥下，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沧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伪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

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已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了。8月11日，中共中央在《日寇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我“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我党的任务，在目前阶段，是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发动与武装基本群众，整编超地方的正规兵团，防御国民党的进攻。在将来阶段，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深刻分析了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很尖锐的斗争，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对于靠得住落到人民手里的中小城市，必须力争，以便迅速发展和巩固革命阵地，为实现党的战略任务创造必要的条件。

敌后抗日军民根据党中央及延安总部的命令，向日伪军发动了强大的反攻。

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取得巨大胜利。在这一阶段中，我军共毙伤俘敌伪军三

十五万多人，收复了张家口、邯郸、邢台、焦作、菏泽、烟台、威海、密县、保安等中小城市 250 余座，并一度攻入保定、石家庄、归绥，逼近和包围了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开封、新乡、徐州、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正太、同蒲、陇海、胶济、广九等铁路交通，收复国土三万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千八百多万，使我各战略区基本上连成一片，打破了被敌包围分割的状态，这就为进一步壮大人民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政府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伟大的抗日战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节 重庆谈判

一、飞抵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成为国内注目的焦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六封来往电报拉开了中国命运之争的帷幕：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1945年8月14日

（原载1945年8月16日重庆《中央日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铤

1945年8月16日

(原载1945年8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寄

1945年8月20日

(原载1945年8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养

1945年8月22日

(原载1945年8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三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1945年8月23日

（原载1945年8月25日重庆《中央日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1945年8月24日

（原载1945年8月26日重庆《大公报》）

毛泽东抵达重庆参加谈判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与欢迎。重庆各家报纸纷纷载文报道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1945年8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抵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8月28日）上午11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在下午3时45分到达。到机场欢迎的有蒋主席代表周至柔将军、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诸先生，和中外记者几十人。毛主席下机后，并应中外记者之请，和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志等摄影和拍制电影，后来就坐车到张部长公馆小憩，晚8时，蒋主席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洗尘，并邀美大使赫尔利，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和张

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周至柔等作陪。

又讯：8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昨天上午本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了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毛先生来了！这一下好哪！”好多公务员、军人、学生热烈的向营业部的同志们握手，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象征着和平团结与光明。

下午1点半，九龙坡机场已经很热闹了。外国记者们欢迎了巴丹之战的温锐特将军之后，就不断地打听延安专机的消息。邵力子和雷震先生来得很早，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和中国记者，张表方、左舜生、章伯钧、谭平山……先生都到了，新从苏联归来的郭沫若先生和夫人也赶来了，沈衡山先生快活得像个青年，听说他昨天听到了消息，就一直兴奋到不能休息。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主席派了警卫组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2个钟头，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场负责人报告专机在11点半由延安起飞，计时3点可到重庆。

一架标名“美国姑娘”的银色飞机下降了，人像潮一般的涌过去，可是美国同业们知道这不是赫尔利大使的专机。3点30分，两架飞机渐渐的接近了，在低空盘旋了两周，机身上的一颗大五角星也可以看到了，休息室里人奔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一片……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下机，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外国记者喊了：“General Chow！”“站近一点，大使先生”！

摄影竞赛继续了20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泽东说：“好莱坞！”的确，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毛泽东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的向欢迎者含笑招呼。人们包围拢来，7月间去过延安的五位参政员是异地重逢，其他各位也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介绍一一交换了热烈的握手。新闻记者开始自我介绍，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谈话。

4点正，一列汽车从机场出发，路上的市民很敏感地感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来了。”有人向汽车挥手，每人都是带着欢喜和仰望的笑容的。

赫尔利大使一直把毛、周、王三位送到曾家岩张部长公馆，小憩之后，就

回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休息。

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向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载 1945 年 8 月 29 日重庆《新华日报》）他说：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1945 年 8 月 28 日

二、谈判经过

1983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谈判纪实》一书详细记载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期间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按时间表记叙如下：

8 月 29 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于 8 月 28 日下午飞抵重庆。29 日，在林园先后同蒋介石和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进行初步商谈。国民党方面除空洞表示愿意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外，提出所谓“中国没有内战”之说。对此，毛主席严正指出，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欺骗，列举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回答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

同日，蒋介石为国民党拟定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8 月 30 日 周恩来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对政治军事问题作一般性商谈。

8 月 31 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长时间商谈。

9 月 1 日 周恩来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继续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9 月 2 日 毛泽东主席于本日上午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在座。毛主席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

1. 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2.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3. 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4. 应予以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5. 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6. 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7. 中共军队须改编为 48 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8. 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接着周恩来同王世杰继续进行商谈。

当晚，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在蒋介石官邸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商谈。

9 月 3 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共 11 项交付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要点如下：

1. 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2. 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3. 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4. 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

5.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 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7. 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 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9. 政治民主化；

10. 军队国家化；

11. 党派平等合作。

至此，两党普遍交换意见告一段落。

9 月 4 日 上午九时，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开会，听取近日以来两党双方商谈情况，商讨对付办法，正式指定张群等 4 人为谈判

代表，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与4人，责成他们据此拟出对中共9月3日提案的复案。

上午，周恩来同张治中在桂园就两党进一步举行谈判问题进行商谈。

下午，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

晚上，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

9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就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首先提出，上次商谈情况，我等已告诉毛泽东。我方所提11项建议，每项之下本已附有说明，但因我党现在之地位、敌后政权与解放区军队，皆未蒙承认，故所提建议，不能获得兄等之信托，而报纸言论甚至说我们为“割据”，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则成为僵局即不能解决问题。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即不必再如今日要就个别问题来商谈。只以此项提案未曾获得政府之同意，所以这次毛泽东来渝，即不再谈成立联合政府，而改提目前之11项建议。此项建议之精神，在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法统与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对于政府的要求，我方已作很大让步。其他军队驻地与省区问题，我方皆提出了切实的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尚无明确答复。究竟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如何想法，我方极愿知道。我等上次所谈皆为具体问题，如军队数目，我方所提出者既不予考虑，蒋主席所指示者——12个师是否固定不变？其实，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而政府尚认为我们要求太多，超过之数量过大。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

张治中说，上次兄等所提之11项建议，其中第9项关于省区问题，中共要求完全占有5个省1个边区，参加6个省与4个直辖市，犹如分割地盘，我等不敢赞同。第10项关于军队问题，中共要求16个军48个师，数字太大，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兄等要求政府答复，政府实在困难，还望兄等重新加以考虑。

对于国民党反对中共要求划分省区及参加部分省市管理及军队缩编的提议，周恩来说，如政府不能同意，我党现有之地区即可实行普选，如不赞成普选，又不同意我方建议，则政府尚有何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兄等固不能要求我

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

9月10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就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中共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事问题。国民党方面原则上赞成召开这样会议；但要求不用党派会议名称，而称政治协商会议为好。中共代表在会议的名称上未作过多坚持。至于政协会议的召集办法、各方参加代表人数、须要商议之事项以及政协会之权限等，虽有争议，但经协商多已接近。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方面基本上同意延期召开，但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仅表示可以在旧代表之基础上增加少数名额。中共代表表示，代表最好重选。若国民党方面认为重选有困难，以增加代表名额来补救，就应增加1/3。国民党代表对此只作很原则的答复，未予明确拒绝。双方无大争执，亦无最后结果。

9月1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及叶楚伦、张厉生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就国民大会的代表及延期问题进行商谈。

9月12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蒋介石官邸同蒋介石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商谈。

午后3时半，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在中四路德安里101号进行商谈。主要议题为：（一）国民大会；（二）政治会议；（三）施政纲领；（四）各党派参加政府；（五）承认解放区。在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上，双方作了一般性的商谈。

9月1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就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的推选、军队缩编和军队驻地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

9月17日 毛泽东同蒋介石、赫尔利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9月19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主要就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首先就上述两个问题提出方案。他说，昨晚与今日上午我和毛泽东讨论结果，有二事奉告：

第一，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共军队之比例为1/5，我方以比例考虑愿让至1/7，即中央现在有263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如中央军

队缩编为 60 个师，中共应为 10 师。中央军队缩编为 120 个师，中共应为 20 个师。

第二，关于军队、军队驻地与解放区三者，岳军先生提出此项议案一并讨论，我等亦表赞同。我等拟将海南岛、山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 8 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 43 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 7 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其专员、县长均由中共委任。

以上为我方之新方案，兄等有何意见？

9 月 21 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 103 号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

9 月 27 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 103 号，继续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的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整编中共军队问题，商定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讨后再议。然后，张群问中共代表对解放区之解决办法有何新的意见？

周恩来答复说，我等对于这一问题先后提出过四种主张：

最先主张重划省区，即将现有之解放区使之变为行省，俾现实情形得以接近中央之法令。但我等来渝以后，蒋先生首先提出中共得推荐地方行政人员，由中央加委。我等为尊重蒋先生之意见，遂改变初衷，按各省实际情形，主张在解放区占地最广之各省，由中共担任该省主席，占地次广者，由中共推荐副主席。至于委员之人选，中央与地方人士均得参加。此一办法亦行不通，故提重行选举，由各县民选县长与县参议会，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

前天与毛泽东谈及，以为宪法尚未颁布，省级选举暂时不能实行，故又改变主张，暂维现状，即现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若此办法仍不得同意，只有交给政治会议解决。

张群表示，关于解放区问题，兄等前后所提之办法，均有难行之处，即如重划省区，中央决不能同意，因就面积而论，解放区在全国究为局部之问题。

其次，兄等主张若干省由中共推荐主席，若干省市由中共推荐副主席与副市长，亦与中央之意见不相符合。中央对于推荐之地方行政人员，虽愿考核加委，然不能由中共指定任用之地区。至于重选加委之办法，则以现在宪法尚未颁布，省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亦未便施行；如必须行之，则法律上之根据殊为薄弱。现在兄等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余等今日之商谈正因为现状可暂维之故也。

9月2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3号进行商谈。

商谈开始，双方互报了派出参加军队整编技术小组人员。中共方面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接着双方就召开政治会议代表人选、协议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政治会议之协议方式。周恩来提出五项原则：（一）平等的；（二）自由的；（三）一致的；（四）公开的；（五）协议之结果有最后拘束力。

张群对第三、第四两点提出异议，认为“公开的”一点不行。说，在问题之讨论未达相当阶段时，须暂缓发表，不能公开，参政会即有此例。至于“一致的”一点，张群认为，规定过于呆板，事实上恐不能成立协议。

周恩来回答：所谓“公开的”，当然系指原则而言。政治会议之协议如因事实之需要，何时公开，会议本身自可斟酌决定。至于“一致的”乃为协议所应遵守之原则。吾人即请各代表参加会议，自当尊重其意见，且全体参加会议之代表，必能明识大体，意见上纵有参差，经过协商终能成立协议。

在政治会议的几个原则上，虽双方意见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最后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参加，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37名。

10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商谈。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

10月9日 毛泽东同蒋介石在蒋介石官邸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对此进行说明，不能同意。

10月10日 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进行简单商谈之后，共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至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同蒋介石进行商谈。毛泽东提出延缓召开政治会议,于明年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回答,如政治会议能在今年11月召开,召开国大问题可以考虑。

次日晨,毛泽东与蒋介石作最后商谈。蒋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为求国共两党问题之政治解决,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以使《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到此,国共两党本阶段的谈判结束。

王炳南的《回忆毛主席在重庆》一文记录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与各界人士广泛的交往。他写道:1945年8月28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

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组织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

下午3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我原揣想,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哪里人,我答是陕西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10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

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导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8月14日到23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传遍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

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请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陶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谋士和“智囊”，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组织。）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10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与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中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夜阑人静的午夜，主席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嘴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我同他们的关系，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机关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从容自若，经常出现在群众中间。记得9月1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参加中苏文协宴会，刚一跨进会场，到会者一齐向毛主席围过来。很多老朋友拉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市民听到毛主席出席了欢迎会，虽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却抑制不住多年久仰的心

情，无数工人、学生拥到街头，等着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门，向群众频频招手，街道两旁顿时欢声雷动，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下险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在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与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通知主人。当这位教授得知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毛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毛泽东在重庆度过了43个日日夜夜。从谈判桌上到谈判桌外，毛主席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时机。面对风紧云沉的时局，毛主席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领导我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反动舆论也叫嚷“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在谈判中被动失利，转而策划军事冒险，指使阎锡山一再大规模进攻上党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击，消灭了全部来犯的敌军13个师。蒋介石玩弄政治骗局破产，发动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得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它的发表，使我党

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非常的被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

10月8日晚,张治中先生举行宴会,欢送毛泽东即将返回延安。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李少石在红岩村附近不幸遇难事件。当时事件真相未明,许多人为毛泽东安全担心,劝毛泽东暂住城内“桂园”,不回红岩村,以防万一。但毛泽东泰然镇定,坚持仍回红岩村住地,周恩来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毛泽东,并要国民党当局坚决保证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带着辉煌的胜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从此,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壮丽的革命进程。

第二节 转战陕北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将全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均占居优势,一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争。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回忆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在他的高级将领会议上狂妄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并要在“三个月消灭共军”。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

7月20日,党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并要求全党认识到“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事实正是如此。从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的8个月时间里,我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共歼敌七十多万人,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北是我党中央所在地。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提出“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但由于准备工作未做好而推迟,直到1947年3月胡宗南才令二十九军等部15个旅共十四万余人,伙同马鸿逵、马步芳及邓宝珊的部队共约34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我党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方面，在延安周围地区加紧部署力量；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和部分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至今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46年10月间，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前来拜访毛主席，兼送代耕粮。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毛主席问：“你们的战备工作是怎样做的？”

杨步浩回答：“首先是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和衣物等，甚至把各种用具等都藏起来了。我们这些强劳力都组织起来，敌人来了就进山打游击战——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总之，要把我们过去的游击战术和经验全都用上，使敌人得不到一日安宁。”

主席听了连连称赞。这件事证明了毛主席常说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条件好”。

但是，当时我在陕北只有二万多人，仅及敌人的1/10，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于是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紧急疏散各个机关及老百姓，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因而命令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以南进行7天的顽强阻击。

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我们在此生活战斗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心情沉痛。当时，我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管着中办的家务。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少奇专门指示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是，向何处转移？有人估计敌人占领延安后，只会走大路，说大姐和孩子们体弱年小，不宜长途跋涉，就地转移离大路二三十里远的地方。事后证明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到了王家坪，已是夜深人静，毛主席还在工作。

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们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待敌人进入边区，到达富县甘泉一线时，予以迎头痛击，消灭他部分力量让敌人知难而退，这样，延安不就保住了吗？

毛主席听到这里，转过身去——我感到他在笑。我想：“你还笑得出，真莫名其妙！”

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

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啊，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转战陕北时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毛主席接着说：“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得更有力！”

他又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似乎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于是我扬鞭策马。马儿也像是知道我的心情脚下生风，急速转回枣园。我加快了布置疏散和撤退的准备工作。为防万一，遵照中央决定，首先派人把米大夫等送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那里是我们的后方。

在疏散之前，任弼时找阿洛夫谈过一次话，向他解释我党中央撤离延安的原因、理由和必要性。任弼时说：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为了更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也不是被人赶出延安。对于我们放弃延安，外国人如何报道，那是他们的事。当然，美国人的报道是不会说我们的好话的。既然主动撤退是一种策略，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我和阿洛夫、任弼时等先行离开延安到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任家山一带。而毛主席一直留在延安，直到胡宗南进来的前一天才安然撤退。

根据我保留的笔记记载，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逼近延安的南郊，枪声也越来越近了。傍晚6时，毛主席等一行人从王家坪出发，乘坐汽车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几里地的小山村刘家渠休息。第二天上午9时许，敌机来袭，主席的汽车——即宋庆龄送的救护车——遭到敌机扫射，挡板被击穿，但人员没有任何损伤。

21日傍晚，毛主席经清涧高家硷，抵达子长任家山——事先准备好的地方。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住在这里。毛主席在这里组织了3月25日的青化砭

战役。在这第一次激战中，彻底消灭了敌人先遣部队 31 旅旅部及一个团。整个战斗只用了两个小时，不仅俘获了全部敌军及旅长李纪云，并将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使进驻延安的敌人在数日之内找不到先遣部队的下落。我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为这次漂亮的胜仗，毛主席发出了嘉奖令。

就在 3 月 25 日，敌人约一个旅的兵力直奔延川县城北的拐岭。这里距清涧县城仅 60 华里，而且是平川，似有奔袭清涧以截断我东去之路的意图。清涧县城是通往绥德到山西的交通要道。当时中央分析，敌人企图占领清涧县城，意欲切断我们去山西的道路，以便把我们围困在山沟里进行围剿。所以，当天夜间通知我，要立即布置和组织各单位迅速东进，在敌人占领清涧之前，绕过它北上，经过九里山，到石嘴峰及以东几里地的小山村枣林沟。接到命令后，我马上组织中央机关分几批撤退，首先用六辆吉普车把中央五位书记及其工作人员送到枣林沟，在路上只走了二个多小时；留下的人骑马，走了一天半，其他单位，如第三局等，走了整整三天。

我们到达枣林沟后，敌人仍驻在拐岭未前进。直到 4 月上旬，毛主席、任弼时转移到了靖边县青阳岔后，敌人依然停留在拐岭，没有东进占领清涧。这时主席分析，敌人不占领清涧的目的是给我们让出一条东去山西的道路，把我们赶到河东山西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吹嘘说他们在陕北获得了全胜。所以，无论战事多么激烈，主席一直留在陕北，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

这是毛主席领导艺术的高超之所在，是神采之举。

中央到枣林沟后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前委、工委、后委。前委，即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继续留陕北代表中央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组成，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领导全国群运、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后委则由叶剑英负责，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

这次的中央会议，总结了这次行军的教训，决定精简中央机关，只留下最必要的人随前委行动，而将大部分人送到后委所在地。留下的同志按军事序列行动，代号为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到青阳岔后，为了保密，中央首长都用化名，毛主席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

4 月 5 日，毛主席到达靖边县青阳岔，等候周恩来从山西回来。9 日，毛主席在青阳岔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即《1946 年 11 月 18 日的指示》、《1947 年 4 月 9 日的通知》）。主席在文件中指出，国民党进攻延安“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

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10日，周恩来到达青阳岔和毛主席、任弼时会合。12日，中央转移到王家湾，在这里驻留了近2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了4月14日的羊马河战役，全歼敌一三五旅，俘虏敌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5月4日，我军在蟠龙大捷，全歼敌整编一六七旅，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共6700余人。两役及其他战斗共计俘敌15000多人。

5月14日，陕甘宁边区军民在真武洞（属安塞县，当时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举行庆祝三战三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体军民致贺，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陕北军民十分振奋。

6月7日，中央从王家湾向西北方向转移。8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这时敌人被我牵着鼻子到达王家湾。敌军长刘戡住进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敌人抓住了一个70来岁的老汉和一个10岁左右的女娃娃，逼问他们毛泽东曾住在哪个窑洞里？到哪里去了？老汉和女娃娃都闭口不言。敌人把老汉吊在树上猛抽，女娃娃吓得又哭又叫，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一句实情。

9日，毛主席一行由小河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天赐湾前进。因遇大雨，向导迷失方向，一夜只走了几里路，直到9日黄昏才抵达天赐湾。这里只有七户人家，而敌人又正在奔袭小河，大家劝毛主席再向前进，而毛主席就是不走。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毛主席却成竹在胸。

他对敌人奔袭小河一线的行动是这样解释的：“这次敌人从延安、安塞出动，奔袭小河一线之役，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而胡宗南、刘戡等仅仅是执行者。所以，只要他们的部队到达小河一线，就算执行了命令、完成了任务。至于结果如何、有什么收获，那他们就不管了。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了。其次，敌人到达小河，也不得不立即后撤，原因是他们只准备了4天的口粮。如果再驻下去，几个师的人马吃什么？”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毛主席的确摸透了蒋委员长的脾气和他部下的特点，敌人就像是在毛主席的调遣下行动似的。

毛主席在天赐湾住了一周，于6月17日又返回小河，在小河住了一个多月。中央于7月21—23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小河会议。晋绥、西北等

解放区负责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还特意要贺龙把米大夫从三交镇带去，为中央同志检查身体。米大夫在小河住了半个月后又返回三交。

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也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毛泽东在这段艰难转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日子生活经历：

1947年8月18日，可以说是转战陕北期间最紧张的一天。屡屡扑空，数次挨打的刘戡，重又率领7旅之众，朝我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紧紧追来。从绥德追到米脂、追到葭县，一直追到黄河边。

那几天，天天下大暴雨，身上衣服难得有干的时候。河水猛涨，汹涌澎湃，十几里外就能听到咆哮声。

毛泽东心情很不好。形势严重还在其次，最使他恼火的是队伍里议论纷纷，说要过黄河了。毛泽东历来看重说话算数这一条，轻易不许人反对或改变。他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当时还没有打败胡宗南，屁股后面有7个旅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下过黄河，毛泽东是决不答应的。何况，“毛主席还在陕北”已成为全国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大凡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一句“毛主席还在陕北”，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便全不在话下。当时就是这样。

周恩来指出，前面是葭芦河，过葭芦河不是过黄河。因为葭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叫它“黄河汉”。

最后还是决定过葭芦河。因为敌人已经占了对面山头，子弹在头上飞朝地底下钻，距离已经很近了，而我们的全部兵力只有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总共900多人。敌人却有好几万。

任弼时负责组织过河。此时，河水暴涨，轰鸣之声震耳欲聋；巨浪一道接一道，铺天盖地而来！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就像片草叶似地被狂浪掀翻卷走了。

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几万之众。当时形势就是这么严峻。我是十多年的老兵了，面对这种险情也不免有些焦急。

“给我拿支烟来！”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要烟抽。声音不大，却像雷声一般传遍整个队伍：

“烟，得胜同志要吸烟！”

“得胜同志要烟抽！”

“烟！”“有烟吗？”“快找烟！”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使用化名李得胜，即一定会得到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你必成”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谐音），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谐音）。听说毛泽东前段时间闹肺炎，已经戒烟。卫士们没有准备烟，且连日大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去哪儿找烟？

“烟呢？给我一支烟！”毛泽东有点焦躁了。

值得庆幸的是，队伍里终于找到了能抽的纸烟。记得是马夫老侯用油布包藏着的。在关键时刻，他立了“大功”！

“举起来，不要举得太高，朝东南斜点，好！”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护在毛泽东头上，并亲自扯起了被子的一角为毛泽东遮避风雨点烟。

毛泽东的卫士钻到被子下，把一支烟插到毛泽东右手的指间。“嚓！”“嚓！”一连划了几根火柴，火光却只一闪便被风熄灭了。毛泽东几次把嘴凑过来都没有点燃，有点火了。

周恩来又叫另一名卫士，才把烟点着了。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紧接着又狠狠地连吸了几口，烟灰向下跌落着……

蓦然，毛泽东把烟头奋力攢在地下，用脚踩灭，嘴里还迸出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毛泽东从这次开了烟戒，一直到80岁才又戒烟。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顺着黄河汊向前走去。卫士们抢上前保护，都被他喝退。他走在前面，身后带着几百人的中央纵队，不要说敌人乱射击，就是一颗流弹，都有可能造成震撼历史的严重后果。

但是，敌人的几万追兵忽然停止了追击和射击，仿佛整个世界都沉默了，变哑了，敌人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率领他的仅几百人队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们实在是让毛泽东打怕了。

毛泽东率队走到一座山下，仰面望望云遮雾绕的山峰，把目光转向任弼时，意思是：怎么样？

任弼时会意地点点头，下令队伍：“上山！”并吩咐身边的刘长明参谋：“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正朝山上走的毛泽东，闻声折回身，将手中的柳木棍在山脚草坡上一戳，说道：“擦什么？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

同志们劝道：“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来。”

毛泽东戳着柳木棍说：“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上山了。周恩来扯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主席的安全关系全党全军。为防万一，部队过后，你们还是照史林同志说的办，把痕迹消除干净。”

走到半山腰，忽听山上传来几声枪响，毛泽东闻声停住脚。当时雨已经停了，他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问道：“是敌人来了吗？”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索性不走了，接着很轻松地说，“好吧，我等着，我倒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了一阵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搞清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说道：“没有事？没有事咱们就走。”

在山坡上一个叫白龙庙的村前，毛泽东坐在一块青石上休息。这时阳光从云脚照射下来，他遥望黄河，忽然唱起了京剧《空城计》中的一段唱词。

白龙庙是个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子，树极少，缺水。老百姓为了求雨求水，便在村里盖了一座白龙庙。村庄因此而得名。

就在毛泽东进村不久，雨又下起来。老百姓纷纷传说毛泽东是“真龙下界”，给他们带来了雨水。刘戡的几万追兵在山下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后来，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一个歼敌计划：钟松自以为“援榆有功”，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他的三十六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一二三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与刘戡部会合，迫使我军背水一战。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似乎很不利。其实不然，我们是有惊无险，他们可是走入绝地。我看，在沙家店给他布个网，三十六师绝没处逃！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两个人研究之后，具体作战方案很快便确定下来。电话尚未架设通，毛泽东命令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和将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手中。

第二天清晨，起了风，乌云散去，山谷里涌出一股浓雾。毛泽东说，沙家店战役对整个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性意义，梁家岔距主战场沙家店10公里，他可以在梁家岔就近指挥战役。

梁家岔只有20来户人家，座落在靠山顶的东坡。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在数万追兵面前显得敌众我寡。但在这小村子里却显得声势浩大，简直挤得无插足之地。勉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

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崖畔下，大树周围，以至老百姓的牲口圈都住满了人。

不久，司令部与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电话接通了。毛泽东立即下令：“要彭总，我要跟他直接通话。”

很快，电话铃响起来了。电话放在石板锅台上。毛泽东几步走到锅台旁，抓起电话听筒：“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我们这些守在窑洞前的工作人员恰似听到一声春雷，都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以来的近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李得胜。今天是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司令员在电话中报告了敌三十六师被围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大声说：“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仍大声说：“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过了片刻，毛泽东大概是对彭德怀的请示，大声说：“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部队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杀马吃！打完仗再说！”

第三天清晨，天又下起雨，其势凶猛，如注如浇；雷声隆隆，大地颤动。人们看到秘书和作战参谋跑进跑出，便有几个人围上去打探消息。

毛泽东忽然走出窑洞，朝大家喊道：“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哈，原来不是雷声而是炮声！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朝山上跑去。

我不能离开主席，守在窑洞里。我军在两小时之内，便将敌三十六师的一个旅歼灭，活捉了敌旅长刘子奇，实现了毛泽东首战必胜的计划。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队阻击在葭县一带。

司令部里最热闹的是电台。从收听到的敌台得知，钟松惊恐万状，急于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地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刘戡遭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又指名道姓大骂刘戡，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沙家店战役序幕一揭，敌人便乱成一团。乱归乱，却是规规矩矩地照着毛泽东为他们摆下的棋子一步一步走的。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没出屋，不上炕，累了就坐在帆布躺椅上养养神。吸掉五包烟，喝掉几十杯茶。没有大便，小便不计其数。歼灭钟松的三十六师，俘敌6000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西北野战军

反攻的开始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写罢，毛泽东把笔一掷，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酒，晃一晃：“拿错酒了。”

我说：“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这天，毛泽东向解放区有关野战军下达命令后，仍然没休息，又与周恩来、任弼时匆匆赶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东原村。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和其他首长远迎了出来。原野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喧笑声。

“你们打得好啊！”毛泽东大声夸赞。将军们都抢上来同毛泽东握手。

“主席，您可是瘦了！”王震说。

“瘦点好么，走起路来方便。”

“给主席牵马！”彭德怀吩咐卫士，便握了毛泽东的手朝司令部走。“主席，你们几次遇危险，我可是真担心哩。”

“我也替你们担心哩。面对十倍以上敌人打歼灭战，又是侧水侧敌，如吃不掉，他援兵一到就麻烦大了！”

“有主席亲自指挥调度，我才不担这份心哩，料他刘戡也没那个胆！就是便宜了钟松那龟儿子。本来是抓住了，他龟儿子装成马夫，趁天黑下雨又逃了。”

“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我看刘戡的日子也不多了。”

“下次一定把刘戡的脑壳拿来献给主席！”

“我不要他的脑壳，我要他的七个旅。”

走进司令部，周恩来和任弼时在锅台旁坐下。毛泽东则朝炕上随随便便一歪，侧躺下来，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老总，讲讲吧。”

彭德怀手里拿了个小口袋，朝锅台上一倾，一袋炒黄豆哗地撒了出来。他给毛泽东抓一把，又捏起几颗往自己嘴里丢；这是他们当时能吃到的最好的零食。

彭总咯嘣咯嘣地嚼着炒黄豆，走到地图前，一边指点，一边讲述地形选择，兵力配备，火力分配以及战斗经过。他讲话快得像机关枪连射，几乎不容人喘气。毛泽东在炕上举起手摆一摆：“慢点慢点，怪不得钟松就很快完蛋了，即使我们几个都吃不消么。”

周恩来风趣地说：“一枪一枪来，别连射。”

彭德怀略显尴尬地笑笑，放慢了速度，一句一句重新讲。可没讲两句便不耐烦了，把手在面前一擦：“嘿，这么讲话我非出汗不可。干脆，我带你们到战场去看看。”

屋里所有人哄一声都笑了。

来到战场，彭德怀将望远镜递给毛泽东，一边指点，一边介绍情况。毛泽东频频点头：“好，那好。”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又看望了伤兵和指战员，并“检阅”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6000余名俘虏兵。

彭德怀请毛泽东回窑洞休息。窑洞里的炕上坐满了人，门里门外也都挤满了，大家都在等着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吸着纸烟，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可惜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把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吃过败仗。”

有人插话说：“他也有本事呢，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毛主席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众笑。

毛泽东继续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坳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握在了我们手里。”说到这里，将大手一擦，笑了笑，又迅速张开手扳起手指头，数道：“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吃掉它六七个旅。我们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将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他们四座‘金缸’被我们搬来三座：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

“叫李日基！”窑洞一角有人喊。

毛泽东用他那湖南口音将“日”念成“二”，打趣地说：“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还许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毛泽东煞有介事的表情引得会场里又哄声大笑起来，兴奋的将军们有几个用力鼓起掌来。

毛泽东笑着继续说：“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个一吉两吉的，但终究是很不吉。不管他逃到哪里，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接着，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的形势，同将军们讨论了转

入外线作战的问题。

回到梁家岔，机关已转移到朱官寨宿营。毛泽东顺河沟徒步 10 公里来到朱官寨，号房子的同志又说主席的住处在一公里外的后沟，那里环境清静。

连日来没有休息好的毛泽东笑着说：“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呢。”

同志们临时腾出一孔窑，让毛泽东先睡一觉。可是毛泽东没有睡，又召集周恩来、任弼时等首长开起了会……

毛泽东庄严地说：“辛苦些是应该的，是值得的。我们将要创造崭新的历史！”

朱官寨是个小村子。同志们为毛泽东腾出的一间破窑洞长年被烟熏火燎，窑壁窑顶乌黑，光线很暗，大白天字迹也看不清楚，毛泽东不得不搬着小凳到窑洞门口借着阳光看地图。

就在这个乌黑的窑洞里，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向我军提出了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的任务。

在朱官寨住了 10 多天，毛泽东又转到神泉堡。此时，国民党已停止向解放区的进攻，往回收缩，形势变得缓和起来。毛泽东便分出一部分精力在黄河边搞农村社会调查。他帮老乡推碾子，打场，唠家常；转了几个村子，用去了十多天的时间。

有一次，毛泽东蹲在粪堆旁，用手捏开粪肥看了看，问老乡：“你们都往地里施什么肥？”

老乡回答：“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草肥。”

毛泽东回身指指窑洞，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

老乡憨笑着说：“都说这个黑土上地壮，可就是用不习惯。”

毛泽东说：“你们试试么，你们是重实际的，亲眼见了才信。你们试试之后，看到黑土能多打粮食就向大家宣传推广，好不好？”

老乡不再憨笑，认真想了想，用力点头说：“行！这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高兴地说：“将来打败了国民党，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生产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肥料。一个窑洞清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既有利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老乡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很善于同群众谈心，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各种道理。他不止一次地

对我们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师哲继续描述了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最后一段时期：

1947年11月14日，中央离开神泉堡经乌龙铺、阎家峁于22日到达米脂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将近4个月。

我随毛主席一同到了杨家沟，并请米大夫从河东过来，再次为中央负责同志检查身体。主席留我列席12月会议，学习会议文件。

这里的居住、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是几家马姓大地主聚居的地方，但他们家族中也出了共产主义战士，例如马玉璋、邻村的马明方等。

毛主席和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息若干天，并召开几个重要会议。先召开准备会议。会议的秘书长是任弼时，会议先分小组讨论，我和贺龙、林伯渠、张宗逊等在一个小组。

一天，我随毛主席散步。他边走边谈，他往往在此时说出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后，形势发展很快，沙家店战役后陕北战局的胜利已成定局。10月，中央不失时机地以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的形式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所以对能不能胜利在党内已没有异议。但是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敢不敢胜利，我不解其意，问：“既然能胜利，怎么还会不敢胜利？”

主席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革命党就是要引导人民前进，争取全面的胜利。”

杨家沟召开的12月会议，重点就是解决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毛主席先将他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大家，让大家分组讨论。我读了文件后才理解了主席的话。

主席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报告从军事原则、土改政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各方面阐述了我党的政策，这就是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报告的最后一段对国际形势做了精辟的分析后，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

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这些论述极大地鼓舞了全党。

为了进一步说明要敢于胜利,主席特地将他在1946年4月写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发给会议各组研究。这篇文章实际是回答了1945年8月斯大林的来电,斯大林在电报中认为: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危险的灭亡。毛主席认为:目前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美、英、法同苏联不会破裂,迟早会妥协,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在会上,毛主席提出加强纪律性,上下团结紧,革命无不胜。

在12月25—28日举行正式会议时,毛主席仍让大家提意见,他当场回答,由于酝酿充分,大家思想一致,顺利地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随后中共将文件发到全党和全国各个地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大大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会议期间,毛主席又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其主要内容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若干基本点相同,其重心是补充说明在神泉堡时发出的那个电报,强调了我国革命战争的进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总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目前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起的根本变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每当历史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时,毛主席都能把握住方向,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战略口号,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他是目光远大的战略家,魄力非凡的决策者,才华出众的政治家,当之无愧、令人信服的领袖。

为了具体地指导革命,毛主席在杨家沟共写了21篇党内指示、通报和指导性政策的文件等,召开了军事会议,着重研究了土地改革问题,并委托任弼时草拟关于土改问题的纲要。这21篇文件除上面已提到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外,还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月18日)、《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月30日)、《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2月3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重点》(2月15日)、《关于工商业政策》(2月27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3月1日)、《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3月7日)、《关于情况的通报》(3月20日)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指导战

争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健康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虽然陕北环境艰苦，但是主席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心情愉快，思路敏捷，指挥若定。转战陕北的这一年，也是毛泽东思想大发展的一年。

第三节 三支大军南下

一、千里跃进大别山

在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进入尾声时，毛泽东及时作出了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定。刘伯承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毛泽东对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的指挥：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在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统治区可供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敌人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集中了31个旅共20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集中了56个旅共40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也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

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早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战争打了3个月之后，毛主席又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到1947年的2月，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指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

重大的变化。”事实正是这样，经过一年来的军事较量，敌人被我军歼灭了正规军 97 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 110 余万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兵力，除了用于守备者外，战略性的机动力量已经大大减少。在后方任守备的只有 21 个旅，且都分布在新疆、甘肃、四川、西康等省。在湘、桂、黔、闽、浙、赣等 6 个省的广大地区，只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维持秩序。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同时，在敌人统治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迅速地遍及 60 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总之，蒋介石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而我军则在战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发展，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极为旺盛，广大指战员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战略战术的本领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解放区在“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口号下胜利地进行着土地改革。我军的后方更加巩固了。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的意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看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因而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应当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主席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的。不难设想，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毛主席既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提出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我们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除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外，还由陈毅、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等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

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企图将南线我军压缩到“乙”字形的弧内，然后聚而歼之。在其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毛主席正是要我们在这里实施中央突破。

我野战军接受任务后，全军为之振奋，立即进行渡河作战的准备。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积极为部队的出征准备了大批的粮食、车辆和担架，支援前线。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的濮县至东阿之间。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40万大军”，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我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地、神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偷渡黄河，以接应主力南渡。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我军虚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东阿至濮县横宽三百里的地段上，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在南岸我预设部队的接应下，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我一、二、三、六等4个纵队

共12万大军，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也在津浦路泰安至临城一线，发动了攻势，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行动。

我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大大震动了敌统帅部。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仓皇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调集三个整编师和一个旅赶来增援，并由山东调来王敬久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敌人的企图是坚守郛城，吸我屯兵于城下，然后以其右路主力拊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把我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重新逼过黄河。我们看穿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趁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将计就计，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坚决围攻郛城，吸引援敌北上；一面派有力部队向西南急进百余里，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又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蒋垌集、汶上集地区，拊击敌人的侧背。7月7—10日，我军攻克郛城，歼敌两个旅及一个师部，同时攻下了定陶、曹县，全歼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的一个旅。于是右路敌军三个整编师，就成了一条孤立的长蛇阵，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这时，我各个纵队都已腾出手来。毛主席指示我们：应该放手歼敌。歼灭敌人愈多，对跃进大别山愈有利。我们遂以远距离奔袭的动作，迅速将敌人的3个师分割包围。独山集的敌人慌忙逃向六营集。14日，我们发起六营集战斗，采用“围三阙一”的打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入夜，我军由西面猛攻，敌阵大乱，果然纷纷夺路东逃，被装进了“口袋”。敌3个半旅及两个师部又彻底被我消灭了。

15、16两日，我军继续攻击困守在羊山集的敌六十六师。由于羊山集三面环水，背依羊山，敌人又抢修了坚固工事，所以几次未能攻下。这时，蒋介石一面命令该敌固守待援，牵制我军，一面急调8个师另两个旅赶来寻我主力作战。但我趁敌援兵主力尚未靠拢的时机，22日首先歼灭了金乡来援之敌一个旅。27日集中兵力对羊山集的敌人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全歼了这股负隅顽抗的敌人。

我军突破黄河天险后，经过28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和4个师部共五万六千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

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不甘心于这一失败，又纠集其原在鲁西南的和新调来的5个集团共30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郛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

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这个被我打开的缺口。蒋介石还准备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赢，就由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堤坝，水淹我军。当时，我军打了胜仗，士气高涨，我华东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结束了在津浦线上的攻势以后，也转出外线，开进到鲁西南，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所以，好些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权衡了整个战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指示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开始行动。为了利于我主力隐蔽地突然地实施跃进，以新编成的十一纵队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并决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出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同时华东野战军的5个纵队也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人，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南进。8月8日夜，正当各路敌人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而由南向北进击的一路已越过菏泽、巨野公路，陇海路两侧完全没有敌人正规军的时刻，我们突然甩开敌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驰：第三纵队在左，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奔皖西；第一纵队在右，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周家口、上蔡之线直奔豫南；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第六两个纵队居中、沿沈丘、项城、息县之线前进。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

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10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立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重建这块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所指示的：“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我军深入到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带，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遵循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正确地解决兵力的集结和分遣的问题。部队既要打胜仗，又要占领地方。要打仗，就不能不保持相当的

机动兵力；而要占领地方，又势必分散一部分兵力，以至削弱主力。打仗和占领地方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又是统一的。因为只有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有利于占领地方；另一方面，只有多占领地方，发动和组织群众，才便于分散敌人，消灭敌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到9月底为止，我们先后解放县城23座，歼灭了敌正规军6000余人，反动地方武装800余人，并且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10月10日，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和重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由每个纵队各抽三个团作军区基干武装；各抽调1000—2000名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参加地方工作。由于区分了野战军和军区部队，野战军主要用于实施机动，歼灭敌人；军区部队则用于扩展地方，发动群众，繁殖游击战争，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兵力的集结与分遣的问题。

蒋介石眼看我军在中原不仅已经立足生根，而且日渐根深叶茂，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上又连吃败仗，大厦将崩，王朝将倾，便决心全力与我争夺中原。争夺的重点，首先是大别山。他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又调回了10个旅，纠合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23个旅，共计33个旅的兵力，由伪国防部长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敌人采用了日寇冈村宁次惯用而美帝国主义所欣赏的“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政策”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我生存条件。

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拚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

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同时，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我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时地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增调来了两个纵队的兵力，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这真是雪里送炭，使我们更增强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

我们根据上述指示，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既要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以利于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我们同样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配合的方针，一方面分遣了3个纵队转到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以新从晋冀鲁豫调来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以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扩大根据地，在外线蔓延与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另一方面则以第二、三、六等3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当敌人集中对我合围时，我外线部队便积极活动，兜击敌人之后路，内线部队则及时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或破坏敌之交通，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被迫分散寻我作战时，我们又灵活地、适当地集中力量，歼灭孤立之敌。广大地方武装则一面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消灭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形势，包围我们的敌人，又被我们层层反包围起来了。

在这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中，我军全体指战员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忍受了千难万苦，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素具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也充分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全力支持我军，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协助我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来势汹汹的敌人在我军民合力打击下，无论是集中合击还是分兵“进剿”，都遭到了失败，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时，我转到外线的3个纵队都已乘虚展开。其中向桐柏、江汉两地区挺进的第十、第十二纵队，依托桐柏山、大洪山，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豫陕鄂连成了一片。向淮西挺进的第一纵队，也开辟了豫皖苏十余县的工作，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连成了一片。该纵队并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及陈、谢兵团在平汉线胜利会师。这期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对平汉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作战，攻克了许昌等20座县城，歼灭了敌整三师及第五兵团部等大量敌人。这些胜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这样，我中原三军便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完成了面的占领，迫使敌人不得不缩到铁路沿线。

敌人本来是想抓住大别山不放的，开始，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在平汉线上几乎打烂了敌人的屁股，敌人还是咬着牙忍着痛不肯回师救援。但是，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不但在大别山碰得焦头烂额，丧师减员，毫无所得，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使他们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面前。平汉、陇海两线又连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的严重破击，蒋介石眼看中原不保，就不得不从大别山的周围先后调走13个旅的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这样，敌人便只得退守据点，从而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为分区防御，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严重斗争，我们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此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时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同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会师，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纵横驰骋，扫荡中原，逐鹿中原的斗争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跃进大别山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非凡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

二、挺进豫西

陈赓在《挺进豫西》（载《星火燎原》第九集）一文中说：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席笑着说：对嘛！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靠群众嘛！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

以后，在我们进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指示中，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阐明了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指针。

当部队突过黄河后，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跃进到大别山，好像一把利剑，直插蒋贼心脏。蒋介石正忙于招架，我们随后又杀进一刀。他一面被迫从尾追我野战军主力的部队中抽调三师、十五师、二〇六师等部西援，和原在洛阳地区的守敌组成第五兵团；一面将分布在陕县以东的新一旅、一三五旅和二〇六师一部及由潼关以西赶来增援的部队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东西夹击我们，堵住这一缺口。

这时，毛主席连续发来几个电报，指示我们要力求运动战，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并具体指出：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向西，乘胡宗南在西面尚未完成部署的机会，抢占陕县、灵宝、阌乡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然后以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

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然敌人的第三师等部还未赶到，但亦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旦靠拢，我们就难于展开，难于大量歼灭敌人。主力向西，乘虚歼灭陕县以西的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便于多路地向陕南、豫西挺进，开辟广大的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认清了这种局势，对于挺进豫西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

当时敌人的陕东兵团，除集中了一万多人据守陕县阻我西进外，陕县以西的敌人还在集结部署，这里一个营、那里一个团地摆成一字长蛇阵。9月2日，我们开始行动，首先以一部监视陕县的敌人，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阌乡。以迅速的行动，这里吃一个营，那里吃一个团、一个旅，把敌人全部消灭了。12日，我军解放灵宝、阌乡、芦氏等城。然后，以一部西叩潼关，另一部回打陕县。这时，陕县之敌已经孤立，我们即以瓮中捉鳖之势，攻克了这个有万余人据守的城市。

在我们西向作战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陇海路，以便切断敌西北战场和中原战场的联系。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彻底破坏了这一段铁路。在破坏当时著名险桥第八号桥的时候，谢富治还亲到现场督促检查。

我们西向作战的结果，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英明。由于执行了这个指示，在半个月中就全歼了敌人的陕东兵团等部三万多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直接威胁西安。蒋介石急忙在20日飞到西安，表面上还吹嘘“3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彻底打通陇海路”，实际上却是提心吊胆地部署防御。他慌忙又从进攻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六十五师，空运西安，并从陕北战场调回了一部分部队，在西安潼关间集中了10个半旅的兵力，防我西进。这样就更多地调动了进攻陕北的敌人回头，迫使敌人在陕中布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

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吸引了敌人三四十个旅的兵力，起了巨大的战略作用。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

皖苏，也吸引和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这都便利了我们在豫西展开。我们在豫西展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配合华东野战军破击平汉路，斩断敌人在中原的南北动脉，吸引大别山的敌人回援，配合我刘、邓野战军主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主力东向平汉路，并以十一旅南向桐柏，接应我十纵由大别山向桐柏展开。

12月13日，我们配合陈、粟大军开始了平汉路的大破击。首先破击了郾城到许昌段的铁路，解放了临颍县城。接着又转向郾城以南，连克漯河、西平、遂平等城。

当我军破击平汉路以前，敌人的第三师正被我十三旅等部牵着向豫陕交界地区的大山中前进，敌人的中央社还说：“已把陈赓主力追入伏牛山地区，共匪士气低落，逃亡严重，粮食困难。”我十一旅进入桐柏地区后，第三师又认为我主力在桐柏，赶忙由宛西跑到桐柏。我们配合陈、粟大军破击平汉路开始以后，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在东。于是，第三师急忙又由桐柏折回平汉路。20日，第三师到达驻马店。这时我们已经控制了遂平、漯河间的广大地区，决定协同陈、粟大军的一部诱敌北进。24日，敌人进至西平、遂平间的祝王砦、金刚寺地区，被我们和华东野战军的一部歼灭了。敌第五兵团参谋长李英才被俘后说：“贵军用兵真是神出鬼没。我们以为你们主力向西，结果是主力在东。我们被你们拉着走了一个大圈子，肥牛拖成瘦牛，最后被杀掉了。”

平汉破击战役，陈、粟大军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我们也归还主力建制。这次战役，斩断了平汉路，使平汉路东西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调动了敌十一师等部从大别山回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从此，中原的战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挺进豫西，是毛主席所安排的挺进中原的右后一路。在我们杀进豫西以后，毛主席指示我们首先西向作战，既造成继续展开的有利形势，又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然后转师向东向南，开辟广大的地区，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在我们作战中，主席又指示我们灵活机动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当有分散之敌易于歼灭的时候就首先歼灭这些分散之敌；当敌人集中兵力的时候就设法分散敌人、消耗疲惫敌人；当敌人被分散、被消耗疲惫了以后，就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们忽东忽西，忽散忽聚，完全主动，敌则疲于奔命，遭受歼灭。敌人陕东兵团的被歼，十五师的被歼，第三师的被歼，和以后洛阳守敌的被歼，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赢得的胜利，都是执行了主席的军事思想的直接结果。

三、挺进豫皖苏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写下了毛泽东指挥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的历史活动：

当刘、邓野战军向大别山跃进，山东敌人开始抽兵回援之际，中央军委于8月间先后指示进到鲁北惠民地区的陈毅、粟裕；刘、邓南下全局大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因此，你们应即率野直及第六纵队等部经聊城、阳谷南渡黄河，与已进至鲁西南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组成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实施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共同经略中原。同时，指示李先念率正在晋冀鲁豫边区休整的第十二纵队到聊城以南黄河北岸，接受陈、粟指挥，准备经豫皖苏边区南下大别山地区。遵照军委指示，陈、粟率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主力于8月31日到达阳谷、寿张地区，与8月上旬由梁山地区北渡黄河到达这里的第十纵队会合，积极准备南渡黄河，预期首先在鲁西南地区打几仗，然后向豫皖苏边地区挺进。

此时，蒋介石正以23个旅与刘、邓野战军争夺大别山，以8个旅在豫西牵制陈谢集团，并拼凑了16个旅准备发动“胶东攻势”。在鲁西南地区除以第四绥靖区整编第六十八师等部担任菏泽、开封等地的防御外，以整编第五、第五十七、第八十四师等部寻求我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纵队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作战。8月底，敌整编第五、第五十七等师分兵冒进，尾我第四、第八、第十一纵队到达单县东西地区。

根据军委指示和鲁西南敌情，陈粟决定利用敌骄狂失慎的弱点，以位于城武、定陶地区待机的第一、第三纵队北上，诱敌跟进，以创造战机，并掩护野直和第六、第十纵队南渡黄河；以第四、第八纵队及第十一纵队尾敌整编第五师等部北上，待机从南北实施夹击，分批歼敌。9月1日，第一、第三纵队开始北移，敌分别尾我北进。2日晚，第六、第十纵队开始渡河，5日，与第一、第三纵队会师于红船口、郟城地区。7日，北进之敌整编第五、第八十四师和第五十七师，在我节节阻击下，分别到达隋官屯和贾敬屯地区，两敌间隔20余公里。陈、粟当机立断，以一部兵力分别阻击隋官屯地区之敌整编第五、第八十四师和由菏泽出犯的整编第六十八师，以第三纵队及第六纵队主力对进至贾敬屯之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实行反击，并趁该敌向南退缩时，在由南北进的第八纵队配合下，将其包围于沙土集地区，战至9日晨，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

9 000余人全部歼灭，俘中将师长段霖茂。这一胜利，鼓舞了我之士气，并迫使敌再次从山东战场和大别山地区抽调整编第十一、第七十五、第十师等部来援。9月11日，党中央致电陈粟指出：“鄂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并指出：“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是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纪律，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9月26日开始，南下各纵队先后于兰封、民权间和砀山以西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一部并东越津浦路向泗县、灵璧等地进击。9月底、10月初，中央军委连续指示陈粟：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队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每师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为不久的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遵照这一指示，陈粟野战军各部在展开过程中，以纵队为单位，一面在豫皖苏军区武装配合下放手消灭敌保安团队，一面派遣大批干部做群众工作。至10月底，各纵队攻克和一度攻克县城24座，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一万余人；除沙河以北原有的3个军分区和专署外，又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建立了拥有1 000多万人口的3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晋冀鲁豫第十二纵队则于11月初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归刘邓野战军建制。

在此期间，敌以整编第五、第十一师为骨干，集中6个整编师的兵力，分别组成机动兵团，利用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机动转用兵力，尾陈粟野战军主力纠缠；另以第四绥区等部，阻绝我黄河南北联系，配合其机动兵团作战。为削弱敌人的机动能力，创造尔后歼敌的条件，陈粟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执行扩建豫皖苏边解放区的任务，集中主力7个纵队分成3个集团，于11月8日向陇海路兰封至郝寨段及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展开破击战。至17日，共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歼敌整编第五师、暂编第二十四师等部1万余人，攻克萧县、砀山、民权、嘉祥、鱼台等县城9座、车站17个，威逼徐州；进一步沟通了豫皖苏边区与鲁西南的联系。迫敌匆忙调动15个旅的兵力应援，其中

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敌原定于11月20日开始围攻大别山的计划被迫推迟执行。

我三路大军内线外线积极作战，密切配合，经过一个月极为紧张、艰苦的斗争，共歼敌6.9万余人，创建了桐柏、江汉解放区，并使豫陕鄂与豫皖苏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在我军有力打击下，敌人为确保其重要点线和战略基地的安全，被迫先后从大别山调出13个旅，其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遭到了惨败。白崇禧不得不哀叹：“大别山军事不容乐观”。我三路大军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围攻的胜利，标志着我军在中原已站稳脚跟，挺进中原的战略企图已胜利达成。

第四节 大决战

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通过对三大战役的全面分析，突出展示了毛泽东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文章既叙事，又论析，较好地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生平活动最辉煌的一页：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9年9月12日开始，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人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8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38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的军事科学。

一、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

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120万人增加到280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减少为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4；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1/3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2/3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5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48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的

敌人共 60 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 60 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邱、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 75 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 30 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 5 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 36 个旅，约 23 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 1948 年 8 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 10 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

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

毛泽东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歼敌47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

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555000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

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 52 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

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李银桥的回忆《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则提供了毛泽东在三大战役期间的工作、生活状况: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机关小食堂里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到会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十几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的党和军队主要负责人。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的大会。

这次大会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实际就是对各战略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下达了动员令,也就是为后来的三大战役及渡江作战下达了动员令。决议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前提。

毛泽东与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都做了个别谈话。与邓小平谈话时,毛泽东注视着他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旁边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点头:“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1. 五大书记通宵办公。9月会议以后，毛泽东把极大精力投向东北战场。因为他心中筹划的几场大战首先在东北大规模地展开了。

本来五大书记分工，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但这一次毛泽东讲了话。他说：“现在到了最后决战的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全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此后，书记处几乎天天都开会。

夜里通宵办公是毛泽东养成的习惯，不好改。毛泽东是为首的领袖，其他书记是围绕他的，要随着他改。转战陕北时，周恩来、任弼时都随他改成夜间办公的习惯。现在毛泽东要求集体办公开会，朱德和刘少奇也只好改变习惯。

战时紧张，每天晚8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首长的卫士们和警卫人员也都跟来。首长们在办公室里开上层办公会，我们这些卫士和警卫人员就在值班室开下层民主会。首长们谈论的是打大仗，打大城市，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我们这些人整天议论的也是包围什么地方了，歼灭多少敌人了，等等。

2. 说服林彪，强攻锦州。辽沈战役开始，毛泽东决定打锦州。这个决心是不好下的。打锦州就是摆出了关门打狗的态势，就是下决心用差不多同样的兵力一举吃掉敌人40余万大军。毛泽东面对的不但是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还必须考虑林彪的意见。

林彪顾虑打锦州会被锦西和沈阳之敌合围攻击，使我军骑虎难下。他更多的是从东北这个战略区考虑问题，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自然是从北往南追着打容易得多。但毛泽东是从全国考虑问题，不能让关外的敌人跑入关内。他需要的不是一般胜仗，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为此，毛泽东前后发电报十几封，说服林彪，严令林彪撤离长春，南下北宁线，强攻锦州，以便全歼东北之敌。

首长们对战争的部署是严格保密的，但对胜利的消息是不保密的，随时告诉全体机关人员，让大家一道分享胜利的喜悦。

一天，毛泽东疲倦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蒋介石飞到沈阳了，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我怔住了，不明白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蒋介石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仗就好打。他历来就是瞎指挥。”

果然，没多久，那天晚上首长们还不曾开始办公，毛泽东便拿出一封电报

大步走出屋。我以为有事，忙迎上去。

“锦州解放了！”毛泽东兴高采烈，站在台阶上对我说：“锦州解放了！要使机关的同志们都知道，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

锦州解放，整个辽沈战役也就势如破竹。

沈阳解放那天，几位首长的老厨师在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毛泽东在大战之后有个习惯，就是吃碗红烧肉，要肥点的，来补补脑子。那天晚上还准备了米粉肉和酸菜炒肉丝，有浑沱河里的鱼，有警卫战士打来的斑鸠。

毛泽东抓起筷子，讲了一句：“东北告捷，蒋介石完蛋的日子就不远了。”

我见毛泽东开始吃饭，就用手指指酒瓶，提醒首长们喝口酒庆祝胜利。可是周恩来摆了摆手，表示不喝。

饭后，首长和作战部的有关同志就又接着开会，研究淮海战役。

怪不得不喝酒呢。

3. “核桃”到底咬碎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徐州以东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围歼了黄维兵团，俘虏了黄维。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水城东北围歼了杜聿明指挥的两个兵团，生俘了杜聿明。共歼敌555000人。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这是因为中央书记处在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开会时，粟裕同志首先提出集中三个纵队兵力歼灭长江以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毛泽东和书记处采纳了粟裕的意见，现在保证了淮海战役在很短时间里取得了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会见刘伯承和邓小平。

上午毛泽东一般不会客。刘、邓首长是下午4点多钟来的。两位首长问我：“主席干什么呢？”

我说：“等你们呢。”说罢便领他们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住室与办公室相通。刘邓首长在沙发上坐稳，我便出去沏茶。端茶水进屋时，刘伯承正在汇报淮海战役经过。他说的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淮海战役，我们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

邓小平政委说：“打得坚决，也很残酷。”

刘伯承接着又说：“最后到底还是咬碎了！”

那次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没留客人吃饭。来过那么多客人，只要是党内同志，他几乎从没留人吃过饭。他待客就是清茶一杯。

4. 西柏坡的警告。1948年8月，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大军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们解放了的石家庄，袭击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

北平以南至石家庄，我军从来没有主力部队，傅作义的骑兵部队又是很有些名声，行动迅猛，形势顿时变得险峻。

周恩来派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干部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赴东北方向行唐一带警戒，遇敌人进攻要坚决抵抗，掩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同时安排中央各机关开始准备疏散。

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对付东北之敌，对傅作义的袭击似乎根本没放在心上。当形势已经非常危急时，他叫我收起东北地图，备好纸笔。

“给他点颜色看看。”毛泽东拿起笔时，说了这么一句。

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述评，命令电台要全文广播，马上广播。

毛泽东在述评里轻松幽默地警告敌方：我们已经有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有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为好。

毛泽东又用尖锐辛辣的语气讥嘲：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述评广播之后，傅作义的兵一枪未放便惊惶地撤回北平。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回了北平。

一纸书吓退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唱京剧很有些意思：“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了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本是卧龙岗……”

5. 会见傅作义。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平津战役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提出一个请求：亲自拜见毛泽东。

中央同意了 this 请求。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招待所，受到周恩来欢迎。傅作义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立功赎罪，

以求得人民宽恕。”

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周恩来把傅作义的态度说了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我去看他。”

招待所在后沟，毛泽东乘吉普车来到后沟。傅作义在周恩来陪同下等候在门口。车刚停，傅作义将军连忙迈着大步迎上去，伸出两只手，一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手。

“我有罪！”傅作义的第一句话这样说。

“你有功！”毛泽东第一句话却这样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你的！”

傅作义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比较能打仗的一个。抗日战争中他与八路军相处很好，在敌后站住了脚。但日本投降后，他受蒋介石的重用提拔，大举进攻解放区，占领了不少地方。据说攻占张家口后，他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

这话传得很广。阎长林便问毛泽东：“主席，傅作义真是这么讲的吗？”

毛泽东笑道：“当个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留在政府里做官。他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个水利部长。”

毛泽东说话算数，傅作义后来真的当了水利部长。

6. “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历时4个多月。首长们一直在毛泽东那间不到20平米的办公室里度过，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喜欢篦头，他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他指挥三大战役时是55岁，身体极健，满头黑头。篦齿从头发间篦过，沙沙作响。

忽然我眼前闪了一下亮。仔细看，是一根白头发。

“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我叫出声。

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没作声。

我小声问：“拔下来吧？”

毛泽东停了停才说：“拔吧。”

我小心翼翼挑出那根头发，捏紧了，猛地一揪。拿眼前看看，连根拔出来了。

“主席，你看。”我将白发拿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没有接，只是用眼睛凝望着。

“噢——”他轻轻呵出一声，用略带沙哑的声音慢慢道：“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回来，我把这件事讲给韩桂馨听。小韩立刻叫起来：“银桥，你好大胆，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我无心和她逗，深深叹口气：“唉，主席太辛苦了……”

第五节 进 京

李银桥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记叙了毛泽东进北京城前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深刻思考：

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开幕的那天，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警告全党，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便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了。

有一天，毛泽东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满有把握地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我像听到警钟一样肃然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的教训，早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鉴。

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1944年3月19—22日的《新华日报》(重庆)上,是一篇史学论文。文中阐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

现在全国胜利在即,中央机关要进城了,而且恰恰也是进北京,所以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要出发了,汽车马达已经轰鸣。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地上了汽车。

这是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

沿途都是土路,尘土很大。我们不得不让毛泽东戴上了眼镜、口罩,还披上了大衣。

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

“现在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所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问我们。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由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最后一句,毛泽东说得特别认真,认真到带有几分稚气的程度,逗得全车人都笑了。

第二天(3月24日)下午,车队来到了河北省涿县。毛泽东等在此休息一些时间后,就改乘火车进京。阎长林在《警卫毛泽东纪事》书中写道:

天黑以后,叶剑英参谋长和滕代远等来到了涿县,向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报告了具体安排。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乘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然后开到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以后,改乘汽车夜宿颐和园。明天3月25日下午,在西苑飞机场举行入城式,检阅部队,接受各界代表的欢迎,与民主人士见面。

毛泽东和各位领导都说，党中央进入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要叶剑英参谋长、聂荣臻司令员、彭真书记计划好，安排好，中央也派周副主席主管这次活动。

凌晨两点钟，中央首长们就来到了。车厢里灯火通明，火车头升火待发。

党中央领导同志从这里乘火车向北平进发。

火车鸣笛后，呼啸着越跑越快。我透过车窗，看着外边迷蒙的夜色，心里涌动着新鲜与好奇。以前，看见铁路心里就紧张。因为那时铁路和敌人的封锁线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坐在火车上顺着铁路行军了。有个同志说：“刚过黄河的时候，毛主席就讲过，我们不但能看到火车，而且将来还可以坐上火车。这才几个月呀，我们真的坐上火车了，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

开车不久，周副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任弼时、叶剑英和滕代远等首长，便先后来到毛主席的车厢里。

叶剑英参谋长先介绍了北平的情况。

他说：“北平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说共产党伟大，解放军英明，如果不是和平解决北平，北平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这是给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平和平解放时，有的人要求见傅作义，向他表示祝贺。傅作义将军到西柏坡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回到北平以后也高兴极了。他搬了家，把不用的卫队、枪支和汽车都交出来了。他好像吃了定心丸，心情非常愉快。”

叶参谋长还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不少民主人士来到了北平。也有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更好地宣传争取更多的爱国进步的人士。说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国都、大城市和重要阵地，不是攻打不下被迫退兵，就是强行攻占。有条件的和平解放，在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说：“战史上不多见，咱们今天就见到了。这也是傅作义将军立了一大功。他带了一个好头。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还可能这样做。凡是要求和平解决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参谋长又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我们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不到。

毛主席说，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我们参加军事管制的人员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还要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周副主席说，我们在延安山沟里的时候，既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大工业生产，许多外国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主人士直到蒋介石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像张治中将军这类人，都称赞我们不仅能打仗，将来胜利了，也完全能管理好大城市，管理好国家经济。因为他们看透了蒋介石集团太腐败，离开外国人他们是活不下去的。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

过了丰台车站，就看到了北平的城墙。天还不亮，只能看见雄伟壮观的城墙的轮廓。

叶剑英参谋长说：“我过去到过北平，那还是在军调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北平，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对面地斗争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次到北平，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啊，心情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完全不一样。”

毛主席也回忆过去，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离现在整整31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教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天色大亮时，火车慢慢地停了下来，清华园火车站到了。

一下火车，就看见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都迎了上来。在火车站没有休息，便改乘汽车到达颐和园的益寿堂。

益寿堂是一个四合院。5间北房的外边3间临时作为会客室和饭厅。屋里放着3张大圆桌，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酒杯，还

有两瓶白葡萄酒。首长们洗完了脸，就坐下来准备吃饭。

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副主席、任弼时、叶剑英、彭真、聂荣臻、陆定一和李克农等，都围坐在大圆桌旁。另外两张大圆桌的周围，坐的是工作人员和首长们的家属。

叶剑英参谋长首先高高举起酒杯说：“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喝一杯。”

毛主席笑着说：“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

这顿饭很丰盛，是叶剑英市长和彭真书记特意安排的。

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问：“这鱼是什么地方养的？很好吃。”

叶剑英市长说：“这是昆明湖里的鱼，味道非常鲜美。”

毛主席说：“过去，想吃昆明湖里的鱼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终于吃上了。”

吃饭的时候，彭真书记和聂荣臻司令员，又谈了关于西苑机场阅兵的事情。

彭真书记说：“下午5点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检阅部队，同北平市各界群众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见面。各界群众代表近万人，都是和各区各部门协商定下来的，有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机关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100多人，到解放区去过的民主人士，今天都参加。他们一接到去西苑机场开会的通知，就猜测是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有的专门打电话问，我们也就告诉了他们。一听到毛主席要来北平，他们都高兴极了。”

聂荣臻司令员说：“经过研究，在西苑机场比较合适。那个地方靠近山区，好防空。地方大，部队和群众都能摆开。下午5点钟开始，也有利于防空。就是离市区远了点，没有公共汽车，交通不方便。部队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都有车坐，有一部分群众可能坐不上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下午4点多钟，首长们乘车前往西苑机场。天气已经不怎么冷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副主席和任弼时都穿着棉裤和布棉鞋，外面穿着在延安的时候穿的皮大衣。

机场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步兵、炮兵、装甲兵和坦克部队。当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乘车缓缓接近部队的时候，指挥官发出了“立正、敬礼”口令。毛主席和其他首长都频频招手致意，并向指战员问好。

检阅部队以后，毛主席和其他首长又开始接见北平市一万多名群众代表。接见群众的场面是很热烈的。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到群众代表跟前时，人群中立即沸腾起来，有的鼓掌，有的跳跃，有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乘坐的汽车，驶到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面前时，他们热烈地鼓掌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和任弼时等同志，都下了汽车，同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亲切握手，热情问候。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在重庆时与毛主席见过面，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和郭沫若等。

有些不太熟悉的人，叶剑英参谋长、彭真和周副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称他们是老先生、老朋友。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有的说，毛主席真了不起；有的说，毛主席真伟大；有的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还有的说，毛主席是打遍全国没有对手的军事家。他们还称朱总司令是朱老将军，称周副主席为老朋友、指路人、患难之交。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与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

周副主席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

“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色已晚，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离开机场前往香山的路上，毛主席欣慰地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啊！从现在起，就可以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还不是完全胜利，今天还不能开大的庆祝会，等全国都解放了，再开大的庆祝会，意义就更大。”

到一个大斜坡前，司机老周打开中吉普车门，请毛主席换车。

毛主席问：“到了嘛，为什么还要上吉普车呢？”

“这段路是新修的，路太陡了，小汽车上不去，要在这里换吉普车才能上去。”

汽车沿着弯路陡坡开了一阵子，就来到一个院子的大门口，看见大门上面有“双清别墅”四个大字。进了大门，有好几位工作人员站在那里，

正等着毛主席呢。

到了院子里，见里面有一个大水池子，还有很多高大的松柏树，一个很别致的凉亭。看到这一切，毛主席便开玩笑地说：“这个院子很好呀，比我们在西柏坡住的院子又大又漂亮呀！”

从此以后，党中央机关就分别驻在香山一带，对外称“劳动大学”。

第六章 恢复与改造时期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终于诞生了。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但他并没有陶醉，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牢记着李自成的教训。他异常清醒地说：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页）前面的路更长，更艰难。国民党蒋介石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毛泽东殚精竭智，带领党和人民渡过了重重难关，恢复了国民经济，并且乘胜前进，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显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毛泽东急躁了一些。但是，他无疑为中国人民又立下了一个丰功伟绩。

第一节 开国大典

一、新中国的蓝图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毛泽东早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作出了回答。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对中国国情和国际时代新特征的科学分析，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既不可能建立由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可能立即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毛泽东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和纲领。在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领导的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

国家制度。国家政权采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到全国胜利前夜，毛泽东对开国的理论和纲领做了更为清晰具体的阐述。

1948年9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恰在这时，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作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并对提纲作了精心修改。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毛泽东在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毛泽东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的规划。这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文章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构成了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政治

基础。

二、共和国的筹建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它的原则为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个《共同

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三、开国盛典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卫士长李银桥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书中，对毛泽东参加这一盛典的情景作了如下回忆：

1949年10月1日清晨6点，周恩来已经是第三次把电话打到我们卫士值班室。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我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屋子里烟味不小。毛泽东仍在伏案办公。

“主席，休息吧。”我小声劝着，把周恩来讲的话报告给他。

毛泽东不作声，继续看着写着。直到写完，才立起身，走到院子里散步。这是睡觉前的活动。10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我服侍他洗澡；上床。那天没有替他按摩。他说：“没事了，你去吧。下

午1点钟叫我起床。”

我退出来，在值班室坐守。毛泽东床头有电铃按钮，直通值班室。值班室有桌椅，有个床铺。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两名。正班负责毛泽东的休息，通宵不能睡觉。副班负责江青的休息，晚上可以睡觉。

那天我是正班，一上午没敢合眼。毛泽东虽然破例早睡，但凭我的经验推测，他不会很早入睡的，辗转反侧，思绪不断很可能到午前才能入睡。所以，我不能等他按铃召唤，须主动去叫醒他。误了开国大典可是“历史性错误”。

下午1点，电铃没响，我就径直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主席。”我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眼，看见了我。“嗯！”他又哼一声，发出声响地作了一个深呼吸。

“1点了。”我将毛毯搭在床栏上，枕头垫在毯子下，扶他依栏而坐。

我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他左手端茶呷一口，右手照例一伸，抓起放在床上的报纸，浏览起来。

毛泽东历来起床后都不会马上下地，总要在床上呆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他也不改这一习惯。

我轻手轻脚地为他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我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从法国留学回来，专门剪裁服装。他工作的那个服装店就是王府井雷蒙服装店的前身。毛泽东和江青的衣服都是由王子清师傅裁剪缝制，我也曾带李敏、李讷去那里做过衣服。

“主席，1点半了。”我卡着时间，打断他读报，将这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帮他穿好，然后照顾他下地。我围绕他转着打量，将衣服抻平理顺，请他去吃饭。

毛泽东吃饭很快，不一会儿便放了筷子。稍事休息，2点钟步行至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

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愉快地交谈起来。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便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那时，没有电梯，我便搀扶毛泽东从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级上了一百个台阶，登上了天安门。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后边年纪比他更大的领导人。3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听到广播员激动的喊声：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20万到30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汇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的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五彩缤纷，像精工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1. 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与城楼上互相呼应。毛泽东这时的表情庄严神圣，按照预定程序，他按动装在城楼上的电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毛泽东望着广场上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一句：“升得好！”

话音才落，礼炮在军乐声中惊天动地地鸣响了。那是由54尊大炮同时发出28响，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据说54尊大炮代表了全国54个民族（现为56个），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那28响则代表28年，即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到1949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礼炮响过，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阅兵式开始了。由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下达阅兵令。他的左右站了四位野战军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受阅部队由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率领，4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从东向西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一阵接一阵由主席台前的金水桥边走过。

由十几架飞机组成的编队飞临上空时，30万人的广场沸腾了。人们挥动

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2. “人民万岁！”阅兵式进行3个小时，直到黄昏。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火齐亮，花炮竞响。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万岁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说让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可是，周恩来又走进来了，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起身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把香烟熄在烟缸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晚上，城楼下遍地点起灯笼，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像人民的希望在广场上跳跃闪烁。群众举着灯笼蜿蜒蜿蜒，交互环绕，就像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歌声口号声海潮一样起伏不停，最响亮的声音始终是“毛主席万岁！”

面对群众的欢呼，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服务员搬来一张椅子，我请毛泽东坐下，他不肯坐。从午后3点到晚上10点（除吃饭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越响越高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探身栏杆外，去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并且通过广播高声和他们讲着亲切的话，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拚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在城楼上激动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跳跃舞蹈，沉浸在狂欢的热烈气氛之中。陈毅同志激动地放开大嗓门：“看了这，总算此生不虚度！”

大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菊香书屋，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第二节 出访苏联

毛泽东毕生只出过两次国，而且去的都是苏联。一次是在建国初，一次是在195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举行后不久，历时近三个月访问苏联，其意义极其重大。这是对“一边倒”外交战略方针的切实贯彻。这次访苏，标志着中苏蜜月的开始，尽管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

一、出访的决定和准备

从1948年初开始，毛泽东曾几次想亲自去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但均未成行。只是在开国大典举行的前几个月，毛泽东派刘少奇等出访了一次苏联，为开国作了重要的外交准备。

举行开国大典的当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致函各国政府。10月2日，苏联政府决定与新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访苏的任务及准备工作，师哲作了如下叙述：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者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

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原因是订货者一而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

中共中央在作出毛泽东访苏的决定后，就请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让后者决定毛去莫斯科的时间等。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王稼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中 央

11月9日

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菲里波夫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二、与斯大林初次会晤

大约12月6日，毛泽东偕陈伯达、师哲（负责翻译工作）等，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专列到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

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 30 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不但有华丽的会客室、饭厅和卧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毛泽东、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师哲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毛泽东吃过中饭稍事休息，王稼祥向他汇报了大使馆建馆以来的情况，请示了这次访苏的计划和安排。

当天下午 6 时，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6 时整，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作了这样的安排。会谈时只有师哲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

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师哲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定一个条约。这次，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师哲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起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

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 5 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三、打破僵局

中苏首脑初次会晤就发生了误解，但紧接而来的祝寿活动，使僵局没有立刻形成。

斯大林 70 寿辰即将到来，毛泽东于 12 月 19 日就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的生日，盛大祝寿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泽东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师哲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毛泽东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毛泽东 12 月 21 日 24 时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本（21）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热闹非凡的祝寿活动过后，毛泽东立即考虑与苏联订立条约之事。他于 22 日凌晨 3 时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中央：

（一）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 3 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二）21 日来电已收到，已与斯大林约好 23 或 24 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现有资料表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 23 或 24 日似乎并没有举行会谈。因此，毛泽东非常焦急，有一次对看他的苏联人发了火。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

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柯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柯瓦廖夫的这封“长信”，并认为此信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已有的误解，可能起了加剧的不良作用：恰在这时（1949 年 12 月 24 日），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柯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苏联后，一段时间内，苏方不够主动，毛主席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毛主席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谈判，并将柯瓦廖夫总顾问的那份报告交给了

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仍有些猜疑尚未完全解开）。

这时，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毛泽东到苏后除参加祝寿大会外，在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什么公开活动，西方新闻界作了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一事件对于促使中苏双方打破僵局，起了某种作用。毛泽东采纳王稼祥的建议，1月1日发表答塔斯社记者问，1月2日见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日电）塔斯社莫斯科2日电：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的访问记。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言不攻自破。斯大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坚持原有的要与毛泽东一道签约的想法，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1月2日（即《答记者问》见报那天）晚上8点，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与毛泽东会谈，询问毛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向他们提出了3个签约方案，苏方同意了让周恩来来签约的方案。毛对这次会谈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很满意，马上于当晚11点发电报给中央，通报会谈成果，并安排周恩来访苏签约事宜。电文如下：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

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同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三）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两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下午十一时

1月3日、5日，毛泽东又向中共中央发去三封电报，交代周恩来赴苏谈判签约的有关问题。

僵局打破，周恩来赴苏事宜安排妥贴后，毛泽东开始了外出游览等活动。

1月11日，毛泽东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

毛泽东得知周总理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

15日，毛泽东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泽东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遵照毛泽东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的界限了。

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驰了一个多小时。

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泽东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大约一米至一米五。”

毛泽东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顿时都活跃起来，欢腾、鼓掌，苏方人员尤其为毛泽东的豪情和开阔的胸怀深深感动。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下榻于斯莫尔尼宫，即以前日丹诺夫的办公大厦。在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书记利亚诺夫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机器震动得地面抖动，隆隆机器声震耳欲聋。这个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工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观后，毛泽东在该厂文化宫接受青少年的献礼、致敬，场面十分热烈欢快。主席兴致勃勃，笑逐颜开，愉快地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莫斯科，除在园内散步外活动极少，使人感到拘束紧张和乏味。

接着，毛泽东参观了艺术馆，即冬宫展览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客厅、藏书室等。

主人告诉客人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

毛泽东侧过脸对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在列宁格勒郊区，毛泽东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泽东介绍当年战地情况。他讲了一段后停

了下来，问是否需要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回答说：“可以了。”他回过头来对师哲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

的确，那位上校把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当年残酷激烈、千变万化的战斗经过，讲得非常枯燥无味，简直是背诵经书。

毛泽东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晚上，毛泽东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在演出后，毛泽东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花篮。台上台下的鼓掌和欢呼声融合在一起。列别杰娃谢幕五六次之多，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掌声如此热烈非凡的原因之所在，于是面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三四次。由此可见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之热爱，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戴。毛泽东也甚为感动，露出真挚的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还礼。

毛泽东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

四、谈判签约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泽东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陞、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同志。

毛泽东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泽东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泽东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

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泽东规模小些。

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周总理住在单独一座别墅里。离毛泽东住处较远。周总理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搬到毛泽东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这样更便于同毛泽东商量问题。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定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进出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

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还要强烈。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争先恐后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

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作法是有意见的。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也参加会谈。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师哲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经过中苏双方的反复协商谈判，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终于完成了。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总理、王稼祥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总理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其中一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战争中未受损伤的美帝国主义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苏两国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中苏两国作出这样的条约保证，不仅对于缔约双方，对于当时的远东及世界形势，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在签字仪式上，周总理兼外长和维辛斯基外长先后讲了话。周总理说缔结中苏条约的根据，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东方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条约的签订使得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挑拨中苏两国的企图，完全失败了。维辛斯基说，中苏条约表明了两国友谊合作和各国人民和平安全的愿望，“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伟大”等等。

与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长铁路和旅大都是沙皇俄国逼迫中国清朝政府“同意”，由俄国修筑、经营和租借的，这原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结果。至新中国成立后，中长铁路还由苏联为主、中国参加管理着，旅大驻有苏联军队，建有军事设施等。按照新的协定，苏联应将中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旅大的苏军根据地及其他设备，

全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鉴于当时远东及世界的形势，双方协议在对日和约缔结后，预计在1952年底以前才实现这一移交。同时签订的第二个协定是《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据此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总数为三亿美元的贷款，每年利息为百分之一。中国利用此款购买建设所需之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等等，并在10年以内，即1963年底以前，用原料、茶、现金及美元等偿还付清上述贷款及利息。除这两项协定外，双方还协议将苏联在东北从日本获得的财产及苏联过去在北京的兵营房产等（也是沙俄留下的）全部无偿移交给中国。这些协定和协议对于维护我国的独立主权及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都由周总理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了字。上述条约及协定签字后，两国又共同声明，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

签约当天晚上，中方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斯大林等。朱仲丽在回忆录《彩霞伴我》一书中描述了当时情景：

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我驻苏大使馆在2月14日这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苏联党政和各界人士。为这个宴会，早在两天前，大使馆就忙得不可开交。在稼祥领导下，要草拟名单、印发请柬、安排菜谱，要布置接待人员，而且还必须做得十分细致。稼祥觉得这次宴会很重要，最好斯大林能参加。但斯大林从来不出席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除了在本国大站台上迎接过一次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从未迎送外国元首。如果斯大林能出席这个宴会，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是为祖国争得荣誉。

稼祥对毛主席说：“这次宴会，斯大林应该参加，我们已送了请柬。”

“当然，就看他来不来了。”毛主席心中也没有把握。

“那么，我设法争取。”稼祥回答。

于是，在这天上午，稼祥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莫洛托夫，又带上了一张请柬，代表毛主席把请柬交给莫洛托夫，然后诚恳地说：“莫洛托夫同志，我代表毛主席，代表五亿中国人民（按：那时号称五亿人口），请您将请柬亲自转交给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今天晚上大使馆举行的盛大宴会，务必请斯大林同志莅临。因为这是我们中苏两国人民的心愿，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所盼望的，我个人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之中赴宴。谢谢莫洛托夫同志，请您一定将请柬亲自转交给斯大林同志。”当然，莫洛托夫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倒是希望斯大林能参加中国同志这次宴会的。

“今晚的宴会很重要。我俩是主人，而且女主人在这种场合更引人注目。你要注意装饰与礼节，一定要中国民族式的。”在宴会前，稼祥又一次嘱咐我。

“放心，我今天穿旗袍，一切都是民族式的。”我说。

参加宴会的将有五百余人，除了苏联党政军机关最高领导人，还有各部门负责人、与我国建交的外交使节和苏联社会各界和文学艺术知名人士，如著名作家和诗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米哈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及歌唱家、舞蹈家、艺术家、科学家、汉学家等。

我和稼祥率领使馆人员在宴会厅的门口迎接来宾。按礼节，得女主人首先向来宾说：“您好”，然后握手，还要庄重、不卑不亢、面带微笑，显示出热情。当时，我对自我情绪控制的良好，没有出现纰漏。

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在8点钟就到了，苏联各方面人已陆续到齐了。离宴会正式开始还有五分钟。这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接踵而来。但不见斯大林。只有两分钟了，突然，宴会厅门前一阵骚动，骤然响起掌声。我和稼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斯大林就站在我面前，我和他在握手。斯大林和稼祥握完手，迅速走进宴会厅。毛主席迎上来，和斯大林握手拥抱。

这时，整个宴会厅响起了鼓掌声和欢呼声。

斯大林向人们招手，毛泽东向人们招手。

一群艺术家向斯大林和毛主席这边涌来。

席间，毛主席首先举杯祝斯大林健康，斯大林也几次举杯祝毛主席和周总理健康。

这次盛大宴会是非常成功的，一直持续到午夜方散。

2月16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又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方客人，为毛主席饯行。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圆满完成访苏签约任务后登程回国。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苏方举行了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告别讲话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

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负责人的热烈迎接和慰劳。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三个月的时间，是毛泽东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三节 领导恢复国民经济

一、七届三中全会

从开国大典到1950年上半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战，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仍然很严峻。同时，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由于忙于追歼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平息投机资本多次掀起的涨价风，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后的形势和任务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尚未来得及予以总结和纠正，因此在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上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在部分干部中还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尤其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和行为。

为了全面分析建国以来，特别是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以后的形势，总结前一段工作，明确今后任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

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毛泽东在深刻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年基本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及条件和措施。他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可以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1946年至1948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

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 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 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450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书面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在分析当前各阶级关系、统一战线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他说：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

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页）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和讲话，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策略路线，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报告和讲话中所指明的方向和步骤前进的。尽管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新中国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投入抗美援朝伟大斗争，但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历史任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仍然在1952年得到了圆满的完成。

二、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

但是，稳定物价，必然要紧缩通货、银根，从而影响工商企业。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这些困难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变革中的必然产物，同时，政府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一是平抑物价的措施有些过猛，对于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二是有些同志滋生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企图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

为了克服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稳定他们的生产情绪，1950年春夏，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毛泽东发表不少重要言论，对决定调整工商业起了很大作用。

1950年三四月份，中央先后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为七届三中全会作准备。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会议明确指出，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纠正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

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1950年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中暴露出某些同志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倾向。有位银行系统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反映对民族资产阶级抱有明显“左”的情绪的发言。周恩来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份“发言”打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等同志。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很重视，随即做了许多批注，送给刘少奇等领导人，也送给发言者本人一份。

在这份发言稿上，毛泽东批注如下：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批：“完全错误的说法。”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政府财经领导机关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调整工商业。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如下报道：

毛泽东主席就陈云主任的报告讲话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应当注意改正。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毛主席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在纠正急于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倾向，谨慎地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毛泽东1950年4月16日给陈毅的复电内，肯定了上海市在处理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时采取征得各方同意后审慎进行的正确做法，并从原则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把合理调整工商业、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项主要政策规定下来。

从1950年4月以后，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工商业，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抗美援朝开始，调整工商业工作未能坚持到底，还遗留下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使后来的工作增加了困难。

三、指导新区土地改革

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目标,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提出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到1949年10月,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但是,在其他广大的新解放区(简称新区),主要是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尚未废除。

指导新区土地改革,是毛泽东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内容之一。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集中精力于新区土改的路线政策制定和调整工作。1950年冬新区土改展开后,他又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具体的指示,以保证土改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1. 土改准备工作。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就开始督促新区领导机关作土改准备工作。接到1950年1月9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报告后,毛泽东于1月13日致电饶漱石,作出关于土改准备工作的指示: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有成。华东军政委员会似宜早成立执行职务。

同日,毛泽东就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等问题致电林彪:

林彪同志:

(一)中南全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则今年春夏秋三季必须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妥为计划督促,才能有成。饶漱石一月九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你们是否已令各省进行此项工作。(二)饶漱石又说,华东全区多数市县已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未开的今年一二三月内可以普遍开一次。中南各省情形如何,是否可以于今年一二三月内普遍开一次市的及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中南局对华南分局的工作指导是否已密切抓紧,如同你们对湘鄂赣豫各省委那样。以上几点请加注意并电告为盼。

毛泽东

访苏归国不久，毛泽东在给南方及西北几个中央局的电报中指出，现在“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

在指导、督促新区各中央局作好土改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毛泽东集中精力考虑土改政策主要是对富农政策的调整问题。

1949年11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新区农村政策时，毛泽东正式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意即要转变党以前的富农政策（打击或消灭富农）。

访苏期间，毛泽东就新解放区土改中对待富农政策问题，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初步考虑。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就送审的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草案作复时，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电报说：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四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再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三部分，而将第四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四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四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二月十七日七时

3月12日，毛主席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并告林彪（中南局）、饶漱石（华东局）、叶剑英（华南分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除同意邓子恢不随林彪来京开会外，重点是请他们就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征询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电告中央。电报说：

“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做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做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3月30日，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就土地法大纲中若干（14个）问题征询各中央局的意见。

各级党委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但是，还存在一个争论：不动富农的土地，是否包括富农的出租地？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回顾了争论的起因及毛泽东对它的处理过程：

各级党委在一致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保存富农经济的基本政策的

前提下，有一个争论：不动富农的土地，是否包括富农的出租地？这个问题，同毛主席提出的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几年之后再去看半封建富农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富农半封建性土地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另一方面又有部分土地出租。因此，如果规定出租土地要动，那么半封建富农的土地关系一下子就消灭了，无须再等几年才去解决。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五个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区党委给中央的复电看，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在省委、区党委中，也是两种意见。在中南、华东两个大区中，主张富农出租地要动的，有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省委，山东分局，苏北、皖北区党委；不赞成动的有广西省委和皖南区党委。西北地区，陕南区党委认为出租地要动，其他省委和大市委、区党委不赞成动。李立三同志也写信给毛主席，认为佃富农的土地和半封建富农的出租地不能不动。关于佃富农问题，他说，佃富农的土地一般是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地主土地要没收，就不能不从佃富农那里抽出土地了。

所有主张动富农出租地的电报和信件，都有一个共同理由：不动富农出租地，光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不赞成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则多是：动了，社会震动大，也解决不了大问题；贫雇农的困难，可从发放贷款、扶持生产、社会救济等方面解决。华北局4月22日复电中央，提出的理由是：“根据过去华北的经验，富农出租土地数量不大，动了得不偿失。土改后，可鼓励其自耕或雇人耕种，逐渐改变其封建剥削，中间亦不抽补变动。直至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再去彻底解决富农问题。”这封电报说明：华北局是既不赞成动富农出租地，又不赞成过几年再“割一次韭菜”的。毛主席将华北局的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研究，新解放区一直发到县委。宁夏省委4月21日致西北局的电报，介绍了宁夏的特殊情况：除国民党将领马鸿逵独占了近10万亩土地外，一般地主很少，富农更少。有些地方还有富农租种贫农土地的。因此，对宁夏来说，富农出租地动不动，对贫雇农分配土地多少影响甚微。

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毛主席特别重视中南局邓子恢和华东局饶漱石的意见（1950年秋后第一批土改的新解放区大部分在中南、华东）。

邓子恢同志于3月16日、3月25日、4月25日三次致电毛主席，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原则，

即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和新式富农、旧式富农的自耕地不动，而由贫雇农和农村手工业者将地主土地、公地和富农的出租地加以平分，地主也分一份。邓子恢同志在这里所以把他的意见叫做“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是因为1949年夏由他主持的华中局曾提出过一个“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那时所讲的“中间”，只指中农包括富裕中农；“两头”，一头是贫雇农，一头是地主富农。此项分配原则，于1949年8月10日中央批复同意。

邓子恢4月25日的电报，对他的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富农出租地也应拿出来分配的主张，详细申述了5条理由：（1）江南各省土地集中情形，已不如大革命前，特别是老苏区及其周围更加分散。在这里，地主富农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自己不劳动、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很少。许多地主在苏维埃革命失败后，对反革命无信心，在反攻倒算中抓到一把钱后，即转到城市作投机买卖。这类地区土地分散是很自然的。（2）因为土地分散，如不动富农出租地，则贫雇农所得，比之按人口平分标准要少20%以上，湖北调查要少30%。同时，由于阶级界限难划，富农出租地不动，许多中小地主可能混到富农、中农中来，使可分配的土地更加减少。（3）由于可分土地太少，不能满足贫雇农要求。其结果会使贫雇农积极性减低，有些地方甚至土改运动都搞不起来。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将来在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4）中立富农及稳定富农的生产情绪，单从经济上很难达到。除经济上适当照顾外，还要加上政治条件，如贫雇农充分发动，中贫农紧密团结，对恶霸地主适当惩办等。如富农出租地不动，一方面贫农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富农也不会相信我们让他长期保持这份非分之财，从而怀着不安情绪，这对中立富农反而不利。（5）现在不动，过一二年再动，会使中农产生“割韭菜”的疑虑，对生产不利；法令规定不动，农民起来要动才动，容易被动，不如法令明确规定动富农出租地为好。

4月30日，毛主席将邓子恢4月25日的电报转发给饶漱石，征求饶的意见。5月1日，毛主席电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5月3日，饶漱石电复毛主席：“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对贫雇农所得土地数量影响不大，但对团结多数、巩固政权、发展生产、避免搅乱，益处很多，因此，我赞成不动富农出租土地。”他还说：富农出租土地在减租与公粮累进条

件下,估计数年内可能大部廉价转到佃农手中,故对内对外似应宣传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为有利。如果宣传暂时不动,一二年后再动,则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对生产亦可能产生若干不良影响(即发生“割韭菜”的顾虑)。根据毛主席批示,中央将饶漱石复电转发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研究。

从邓子恢同志4月25日复电和饶漱石5月3日复电看出,尽管他们对不动富农出租地持不同意见,但都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富农出租地暂时不动、过几年再动的意见。

中南局、华东局各拟一个土地法草案是3月间提出的。中南局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于5月13日报送到中央。草案第八条规定:“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随草案附送了中南局的一份说明。关于第八条,说明文写道:中南有占人口五分之二的地地区土地较为集中,不动富农出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可达全村平均数85—95%,有的还可超过全村水平;另有占总人口五分之二的地地区,土地虽较分散,但富农出租地也不多,即使动了,贫雇农所得土地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两类地区都可以不动富农出租地。但有局部地区情况特殊,一种是富农占地太多,甚至超过地主,不动富农出租地,贫雇农每人每年要差三四个口粮;一种是乡村没有地主,公田也少,不动不能解决贫雇农生活问题。因此,这些特殊地区富农出租地就需要动一动。华东局拟定的《土地改革条例草案》是5月15日经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带回上报中央的。草案第七条关于富农政策,只有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就财经工作和土改的一系列问题,托廖鲁言向毛主席捎来口信。其中关于富农问题,他建议:“可否对富农土地财产明确宣布不动,而说不说暂时不动。”

5月底、6月初,中央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多数同志同意基本采纳中南局的意见,只是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地”中的“征购”改为“征收”,文字也略加变动。华东局参加会议的刘瑞龙、谭启龙二同志表示:富农出租地还是不动为好,但也同意基本按中南局的方案写,因为那样写,并不是一定要动富农出租地。

6月6日到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开会。8日,邓子恢同志发言,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说“过去我个人在这一点

上还没有想得大通”，现在完全理解了。但是，他认为对富农出租的土地还要有条件地动一动，全部不动，在土改进行当中还有困难。同一天，饶漱石发言，仍然不同意在不动富农土地财产后边加一个尾巴。他说，根据华东情况，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60%—70%；如果动，也不过只占70%—75%。他认为发展工业才是解决贫雇农困难的基本方法，不能过多地在土地分配上打主意。刘少奇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问题：如富农大量出租土地，那还算不算富农？他认为，如果大量出租土地，自己也种50亩，那就是半富农半地主。还有这样的情况：假设有一人，40亩地完全出租，这就是小地主，土地要没收；可是，另一个人，他有90亩地，出租40亩，自种50亩，如果后者这40亩地不动，那同前一个人比较，就有些不公平。如果法令规定不动富农土地，而有些尾巴又要调整，这样，富农土地不动的规定就很难站得住了。因此，他认为，不动富农土地，不要说得太死。

经过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讨论，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分三段表述了党和政府对富农采取的新的政策。全文如下：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发言和总结，关于土改问题，中心是讲了对《五四指示》以来，特别是1947年以来各根据地土改的评价。他认为，那时的错误，包括对富农“扫地出门”等“左”的做法，都是由于没有经验，不会划阶级造成的，不要再拿到三中全会上来打屁股了。不要因为今天对富农实行新的政策就否定过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平分富农土地政策的正确性。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从1950年2月至七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经过上下多次讨论，提出了一条新解放区土改的正确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经过大会、小会以及各种形式的会议的协商讨论和辩论，开展批评

自我批评,人们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毛泽东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6月23日在闭幕词中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这次政协会议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2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2. 在土改过程中的具体指导。经过夏秋季土改干部的整训和土改试点等,从1950年冬至1953年春,新区土改分三批完成:第一批是在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大约包括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是在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大约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剩约3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是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做为第三批完成的。各地的土地改革,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毛泽东分析新的形势,针对新出现的问题,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

随着土改的深入发展,有些地区出现了侵犯工商业的倾向。1951年1月罗瑞卿就这个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批转各地注意,同时还推荐了中南地区为合理解决退押纠纷和保护工商业而设立城乡联络委员会的做法。

针对有些地方出现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捉人太多等现象,毛泽东组织编写土改材料,并批转文件,发出指示,以促使及早纠正这些偏颇倾向。

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首当其冲的东南沿海地区要加快土改的步骤,以巩固政权和国防。

针对有些地区的干部片面理解加快步骤而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他又强调不能违背土改运动的一般秩序(即首先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转入分田阶段)。

针对土改运动在全国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毛泽东及时进行了正确的指导。对于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他指示要及时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工农业生产上来,在农村领导农民逐步组织起来,发展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精心审改,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草案的通知,要求一切已完成了土改的地区都要解释并组织实行。

在土改中,北京市组织高等院校教授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实地考察,回来后许多人写文章、作报告,畅谈观感,效果很好。毛泽东很重视这个

经验，一再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并多次致电各地负责人，强调只要民主人士、大学教授等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

毛泽东与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关系密切，并在当时热情鼓励他们参观土改。1951年初，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准备去华东地区考察土改情况。行前，黄去毛泽东处，谈及南行之事时，毛泽东建议：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一二处考察之。随后，黄先生去苏南上海参观考察20天，并写成《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参见《黄炎培年谱》第236—237页）。

到1952年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和某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都已基本完成。

四、抗美援朝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几十年的战争创伤正得到迅速医治。但没想到，1950年6月下旬，爆发了朝鲜战争。不久，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同年10月1日，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举进攻，并向我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图们江边逼近，还以空军侵袭我国东北地区。这样，美国侵略者就把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对于这样一场战争，中国打不打，是否出兵援朝抗击侵略者？作出这个决策非常不易，要冒极大风险。但最后，党中央、毛泽东还是下决心出兵朝鲜，并且取得了五次战役和板门店谈判两年中军事政治斗争的伟大胜利，迫使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从决策出兵朝鲜到精心指导各次战役和开城谈判、毛泽东耗费了极大的心智，也再一次体现了毛泽东的超凡胆略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

1. 决策出兵。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国领土进行武装侵略。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明我国的严正立场：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

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召开了两次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作出了第一步部署。7月7日24时，毛泽东致信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表示同意当日军委会议决议事项。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从数省调兵259000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以保卫我国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刻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总理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可见，毛泽东在8月初就考虑组成志愿军，出兵朝鲜。但在党内当时存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又反复考虑了是否出兵问题。聂荣臻对毛泽东当时的下决心过程回忆如下：

当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中央军委就决定由邓华同志率领的战略预备队和四十二军，由河南北上，开赴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以为防范。在此之前，我们加紧对据守沿海一些岛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进攻，解放了除台澎金马以外的所有岛屿，这为我们放手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8月份，朝鲜人民军的反击战已经进到洛东江边，解放了大部分国土，正向大丘、釜山进军。这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分析研究后认为，美帝国主义决不会甘心失败，它有海空军优势，可能会反扑，朝鲜人民军孤军突出，后方薄弱，朝鲜战局很可能出现曲折和反复。所以8月5日，我根据军委决定，向战略预备队发出电令：“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但是由于准备工作过于繁重和急迫，难以在八月份内就绪。8月18日我再次电告邓华同志：“请加紧督促，务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果然，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接着就大举北进，迅速向我国边境地区逼近。由于我军已有所准备，所以10月份我志愿军部队能及时北上，进入朝鲜，制止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阴谋。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预见到战局会出现曲折，及时组建战略预备队，我们就很可能措手不及，贻误战机。

当然出兵朝鲜，要解决许许多多的思想问题。我们开始公开指责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有些人害怕起来，认为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打仗，中国会吃亏。我们采取各种形式，及时做思想工作，稳定了这部分人的情绪。

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真知灼见，不是对党、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具有坚强的信心是做不出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

9月，朝鲜战局剧变。10月1日美伪军不顾中国的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妄图迅速吞并全朝鲜。

形势危急，毛泽东在10月上旬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最后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薄一波回顾这个决策过程时写道：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当时在莫斯科）的电报中，进一步论证了出兵的理由：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

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下达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说：（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当天，毛泽东就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致电金日成，并请金日成派人去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入朝作战诸项问题。

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邓华等，告志愿军按预先计划入朝作战。电报称：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十九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2. 指挥五次战役。从1950年10月19日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迫使敌人退到三八线以南，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毛泽东精心指导了第一、二次战役，对后三次战役作了战略方针的规定。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彭德怀，建议朝鲜人民军留四五万人在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以呼应和帮助北部作战。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同意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原计划先出动六个师）。10月14日，毛泽东就朝鲜战情和我军入朝作战方针两次致电正在苏联的周恩来。电报说，“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毛泽东认为，“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志愿军进入朝鲜后，毛泽东于10月21日致电彭德怀，具体指示如何打好出国第一战。电报说，“此次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令速定围歼伪六八两师的部署。在10月23日给彭德怀军的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决定朝鲜战局的三个军事要点，并强调，“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10月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指示暂时避开美英军先打伪军。他说：“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毛泽东在大量的作战电报中，对此役兵团乃至军师的作战部署，都作了具体指示。这些具体指导，对保证第一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第二次战役，毛泽东仍然给予了十分具体的关照指导。接到志愿军总部11月8日关于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电报后，毛泽东11月9日复电表示赞同，并指出：“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役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在11月13日写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中，毛泽东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

与规定第一次战役主要歼灭对象为伪军不同，在指导第二次战役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和指导我军大量歼灭美军，以转变战局。在11月12日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毛泽东专门作了关于围歼美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陆战第一师作战部

署的指示，认为“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九兵团的二十六军应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11月2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加强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思想教育的电报，指出“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11月28日晨，毛泽东向彭德怀等发出关于集中四个军歼灭美军三个师的主力的电报。电报说：“目前任务是集中我四十二军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歼灭美骑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毛泽东对各军的歼敌任务作了具体指示：“美骑一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四十二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美九军团指挥之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价川一带，我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应担任攻歼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当天晚上12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等说：

你们十一月廿八日午时给西线各军电及同日十五时给九兵团电均是很正确的。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役准备打廿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次小休整，每次少者一天二天，多者三天四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这样就全体说来，牺牲反会比较少一些，比较更节省些。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开始，到12月24日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也死于此役），给予美军第二师、骑兵第一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师、陆战第一师歼灭性打击或重创，使我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而且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半岛，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为争取战争的最后一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的预见和设想得到了充分实现。

在两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部队中开始滋长速胜思想。针对这种不正确倾向，毛泽东正确分析战争形势，阐述了长期作战方针。

在12月26日致彭德怀及金日成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战争仍然要

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因此，他主张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后撤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但是，毛泽东很快又改变想法，指示彭德怀迅速发起第三次战役。

对毛泽东改变休整计划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原因等，聂荣臻写道：第二次战役以后，为了配合我国代表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占我领土台湾的斗争，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军接着就发起第三次战役。当时彭德怀同志从前线报告，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又据敌情报告，在第一线兵力上，我军不占绝对优势（只比敌人约多两到五个师），因此，我也建议，战役推迟两个月打为好。但毛泽东同志为配合政治斗争，仍决心要打。于是，1950年12月31日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将敌人赶到了“三七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19000多人。

对于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毛泽东没有像前两次战役那样直接进行具体部署和指挥，而主要是对战略方针问题作出决策。

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胜利后继续批评轻敌速胜思想，并且进一步要求志愿军与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建立密切关系。

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我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共歼敌78000余人。此次战役期间，毛泽东作出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正确决策。在1951年2月7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泽东将当时在国内的杨得志兵团、杨成武兵团、董其武兵团等11个军编为第二番作战兵力，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并授予任务；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3个月至4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撤回华东任守备。1951年3月1日，毛泽东就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致电斯大林。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共九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

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毛泽东最后总结说：“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轮番作战方针妥善地解决了我军休整补充问题，是坚持长期作战的有力保证。

195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我军对转入防御之敌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歼敌八万余人，迫使美伪军重新退到了汉城及其以南地区，放弃了侧后登陆计划，并于7月接受停战谈判。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总结这几次战役经验，对我军同美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5月16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毛泽东还对第五次战役的不足之处作了概括，说此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正因为战役指导上的这些不足，使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不圆满，突出地表现在一八〇师突围失利上。

5月下旬，毛泽东接见陈赓、解方和邓华，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并谈了抗美援朝的指导方针。

在毛泽东指挥五次战役期间，他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不幸逝世。李银桥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送子赴朝参战，以及得知爱子死讯时的情景。他写道：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那天，他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除五大书记外，记得还有高岗、彭德怀、林彪、彭真等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最后研究决定派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安眠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我请他坐，他不肯坐，在屋里转着圈走来走去。我见他急得坐不下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然睡不着，不停地翻身。我就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

毛泽东闻声坐起身：“我起来吧。”

我忙帮他穿好衣服。他两脚一落地，就朝东屋走。

聂荣臻见主席来了，上前一步立正敬礼：“报告主席，志愿军已经过江，前线的形势……”

我只听到这么半句就退了出来。

半小时左右，聂荣臻走了。毛泽东没露任何神色，只交待一句：“我睡觉吧。”

我送他上床。毛泽东没有再吃药，躺下工夫不大就睡着了。鼾声均匀，睡得很香。

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这期间聂荣臻几乎天天来。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代总参谋长，联系不能断。

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话：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告别结婚刚一年的妻子，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发来了电报。

机要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忙同周恩来、江青研究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

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

他去拿烟，两次都没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啾啾的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啾啾声。

大概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儿子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湿润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熄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顿时泪溢眼堤。

毛泽东没有哭，又点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大意是敌机轰炸，扔燃烧弹，被烧死了。

毛泽东最后只交待一句：“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

此后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情况时，心情沉重地谈了毛岸英的牺牲。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抽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

是父母所生？”

同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毛岸英的忠骨被安葬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胸怀！

3. “边打边谈”。五次战役以后，敌方迫于军事上和舆论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战略方针。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次会议：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这一方针。

就和谈问题，毛泽东从1951年7月起发了大量电报，予以具体指导。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公开发表关于建议举行停战谈判的声明。中朝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同意和谈。7月2日，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给彭德怀，就和谈会议准备与谈判期间我军部署作出具体指示。

毛泽东在此期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关于双方战俘的遣返问题。这个问题在谈判过程中争论最为激烈，时间也拖得最长，从1951年12月11日这项议程列上谈判桌上开始，一直到最后。美军在战俘问题上花样百出，设置各种障碍，以达到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拖延战争的目的。

1951年12月7日毛泽东看了外交部情报司所编的一份临时通报时，在美国报刊所载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的几条新闻旁批道：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174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1952年5月9日，巨济岛我方被俘人员为反抗美军暴行，扣留了美军战俘营营长杜德少将。事件发生后，美军准备用一切手段镇压。当日晚我方谈判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10日的谈判会上向美方提出抗议，声援我方被俘人员义举。毛泽东接李克农深夜报告后，立即回电同意，并指示发表抗议稿。杜德事件严重打击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1952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谈战俘问题。电报说：

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提出解决俘虏问题的三点建议。（即第一，双方俘虏已表示愿意返国者应予交换；第二，其他俘虏由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暂时避难的权利，这些俘虏

应按照以后确定的办法予以遣返；第三，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后，这些俘虏的母国应该向他们提供一切保证和便利，以便他们能够马上返国，如果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前，有些俘虏要求遣送返国，有关政府也应该同样办理，并应给予他们回国的种种便利。）看来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是英国策动的，墨西哥的这个提议可能也是英国策动的，美国对前者表示愿意讨论，对后者尚未表示态度，我们对此二者应取何种态度，请与苏联同志商定。

但是，美国利用其操纵的联合国大会来压我就范，压其同盟国家不得不在联大支持它的“自愿遣返”、扣留战俘等不合理主张。由于我方拒绝其无理要求，美方于1952年10月8日突然片面宣告无限期休会，中止谈判。直到1953年4月才重开谈判。

1953年4月19日，谈判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同意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时间定于4月26日。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给我方谈判代表团发来指示。杜平《在志愿军总部》书中回忆了指示内容以及我代表团根据毛泽东规定的谈判策略，打赢最后一个回合的过程：

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谈判代表团发来指示：为准备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有如下三个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一、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是送到中立国去，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接收和看管。

二、这批战俘在中立国管理下的时间上有无限制。

三、这批战俘经过有关方面解释后，仍未得到解决的，应如何安排。

对以上三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了下列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几个亚洲的中立国去，在规定的时间内（譬如半年或者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第二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移到经双方协议的地点，交给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四个中立国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半年或者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两个方案最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中立国看管，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看管这一条。

毛主席说：在这两个方案中，我们倾向于第二方案，因为这一方案较第一方案简便易行，且易为中立国所接受。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进退余地，在谈判恢复后，先行提出第一方案，估计对方接受这个方案的可能性较小，在弄清对方全部意图后，可准备以第二方案与之妥协。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谈判策略，在这次会议一开始，我代表团就先打出了第一方案。不出所料，哈里逊对我们的建议采取拒绝协商的态度，反对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此时，李克农从国内回到开城代表团，仍任党委书记。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打出第二方案的时机已成熟。报经毛主席同意后，在5月7日的谈判会议上提了出来。

对我们的第二方案，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国方面没有断然拒绝，而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询问。这说明美国方面有可能接受我第二方案。

但是，美国方面误认为我方谈判立场有所改变，于13日提出了一个冗长的长达二十六个段落的“反建议”，无理要求将35000名朝鲜籍战俘于停战日在南部朝鲜“就地释放”，只将非朝鲜籍战俘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和“解释”。

美国这个方案中的大部分建议都不符合关于由中立国看管未遣返战俘这一基本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才是停战谈判得以恢复的基础。当哈里逊刚读完这份包藏祸心的冗长文件，我方代表马上站起来将其驳回。美国方面顽固地坚持了三天，但他们理屈心虚，只好宣布休会四天。以后要求延长休会五天。5月25日复会后，他们终于被迫撤回他们的建议，并要求谈判转入秘密行政会议。但是5月25日那天的大会，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崔德新却没有出席，这为李承晚后来破坏停战埋下了伏笔。

总的说来，谈判恢复后，进展比前一段顺利些。哈里逊不再像过去那样蛮不讲理，加上国际和战场形势均对我方有利，因而代表团同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情趣。李克农住的院内，栽种着几棵桃树，被乔冠华戏为“桃园”。我见乔冠华院内长满了凌霄花，也送了他个“凌霄斋”的别号。我的院子里因有一棵茂盛的古树，被乔称为“大树庭”。

6月8日，双方就第四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并且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项文件。

根据协议，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

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 60 天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而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 90 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 90 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一政治会议在 30 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 120 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

至此，阻碍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了，停战的曙光在升起。

正当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协议，从 6 月 17 日深夜起，以“就地释放”为名，扣留了我方被俘人员 27000 余人，并且继续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李承晚集团这一公然破坏遣俘协议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各国舆论纷纷予以谴责，说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甚至要求美国换马，撤掉这个傀儡。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都谴责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并抗议他“破坏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美国政府则竭力推卸责任，表明此事与其无关。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于 6 月 19 日非常及时地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当日我方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正指出，“联合国军”方面“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必须负责立即追回被“释放”的全部战俘，“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必须就“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在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被迫于 6 月 25 日派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朝鲜同李承晚会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以更大压力，彭德怀司令员于 6 月 20 日 22 时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以便“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伪军 15000 人”。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并非常肯定地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决定立即组织夏季战役的第三次进攻，以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配合停战谈判。为此，指示各兵团、各军，对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即坚决歼灭之；如新选目标，应即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对美军及外国帮凶军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

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这次金城反击战役大获全胜，毙伤俘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迫使敌人于 7 月 27 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五、镇反运动

为了在政治上给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从 1950 年下半年以后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当时称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为三大革命运动。他把这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搞得有声有色。

镇压反革命运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 年下半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阶段（1951 年上半年）；清理积案阶段（1951 年夏秋）；扫尾阶段（1951 年冬至 1953 年秋）。毛泽东主要领导了前三阶段尤其是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

1950 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集中主要精力考虑和指挥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还用了一定的精力关照国内的剿匪镇反运动。1950 年 7 月 18 日，他在中央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上批道：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1950 年 7 月 23 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地按照这一指示进行了镇反工作，但存在右倾情绪。为纠正镇反工作中的右倾情绪，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于 10 月 10 日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在此之后，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等定期专门报告镇反进展情况及经验和下一步计划。11 月 15 日，毛泽东看了西南局镇反活动报告后，十分欣赏，当即向各中央局转发这个报告，并批道：我们认为西南局 11 月 10 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特发给你们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委党委作参考。毛泽东还复电西南局说：11 月 10 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可即照此执行。此项文件应发给所属省市区委党委及地委阅读，使他们明了全般情况及整体计划。

在镇反运动初期，毛泽东在指导上主要注意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他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不能优柔寡断，姑息养

奸。否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1951年上半年，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由指挥抗美援朝，转移到指导国内镇反运动上面，仅批发镇反方面的文电就有100多件。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当即向全党全国人民号召普遍学习贯彻之，掀起镇反运动高潮。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他号召粉碎关门主义、神秘主义，扩大镇反宣传，大张旗鼓杀反革命。

针对运动发动起来后，有些地方工作粗糙，发生错捕错杀的现象，毛泽东及时作出严格划分具体政策界限，精细审查捕人名单，控制捕人杀人的批准权等决定，以及对多数犯死罪分子实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纠正错捕错杀的具体措施。防止捕人不准的措施之一，是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来，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省级。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民主人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一个批语中他指示：凡关涉重要民主人士及某戚友的案件，只收集材料，不忙处理。同时，他还强调：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

1951年5月16日，中央转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作了精心修改、审定。决议着重规定纠正镇反运动正开始出现“左”的偏向的措施，并要求运动开始收缩，进入清理积案阶段。

1951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其他工作，但同时还对镇反后期工作予以若干关照。比如，他对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决议精心修改。又如，1951年10月他在审阅罗瑞卿的一个报告稿时，加写了两段话，着重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六、“三反”和“五反”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1951年底1952年初，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

1. “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是由增产节约运动引发出来的。薄一波当年受命主持“三反”工作。他在回顾这一运动的发动时写道：关于“三反”的

起因和发动，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3日凌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曾经讲到：“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为了加强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12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成立，薄一波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中节委每周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从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展开了。薄一波还回忆了毛泽东亲自到中节委督导的情形：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

为了推动“三反”运动更加猛烈地开展，毛泽东于1952年1月4日起草了《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表扬了中央财政部党组1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并肯定了中央直属总党委雷厉风行抓三反斗争的经验。

在指导“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很重视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以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专门写了毛泽东如何抓审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过程：

大家都熟悉，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8页）毛主席的这些话不幸而言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

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 1934 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张的犯罪事实主要是：

(1) 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 171 亿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2) 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 49 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 21 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 4 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

(3) 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 31 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

(4) 盘剥民工。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 22 亿元。

(5) 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 3.7 亿元以上，其中刘 1.8 亿，张 1.9 亿。刘吸毒成瘾。张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毁单据 300 多张。

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坚持正义、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总是要站出来揭发和斗争的。

1951 年 10 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11 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11 月 28 日晚，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华北局的决定。29 日上午，

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接着，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这一措施，认为这样做“挽救了天津的党组织”，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12月29日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有关新闻稿时批示：“应于三十日见报”）。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河北党代会情况和逮捕刘、张的经过。刘澜涛指出，刘、张事件说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了我们党，刘、张蜕化变质成了罪犯，将他们逮捕是完全应当的，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但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案进行调查和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省

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他坚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2. “五反”运动。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以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薄一波回忆了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经过。他写道：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旧币，下同）；该药行因此从三年前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材。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

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于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12月31日，我向毛主席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主席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我回来后，即向华北局的同志作了传达。

在指导“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很注意策略，主张要有充分准备、有步骤，要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最反动的资本家。195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详细论及这个问题。他说：

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先组织若干强干的检查小组，向最顽抗而有确据的若干家实行检查。不查则已，查必破案（有些须坚持数天之久才能破案，不破案不许撤回）。第二批再检查若干家，又均破案。这样便取得了经验，训练了干部，教育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及一部分大资本家，促使他们坦白，同时动员工人店员实行检举。然后再组织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和更多的检查破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争取90%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6%）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1%—2%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例如逮捕、枪决（只是少数）、没收、徒刑、罚款等。北京有五万户工商业，1%是五百户，北京市党组织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斗争，经过几个检查步骤，还只逮捕近百名资本家。准备在二月份再经过几个检查步骤，陆续逮捕至三百名左右（不到1%），再看形势。这是一个逐渐了解，逐渐深入，逐渐分化，逐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过程，没有城市党组织的紧张艰苦工作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大中小之间矛盾很大，我们打击1%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

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以打击），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真正怨恨我们的只是极少数（百分之几）。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但同时也对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地区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五反”斗争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中财委和各中央局根据这一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措施。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当时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非常严重。毛泽东十分关注上海的“五反”斗争，并派薄一波去上海，考察和推进那里的“五反”工作。鉴于2月份上海已出现过分紧张、不少资本家自杀的局面，毛泽东指示推迟上海的“五反”运动。经过充分准备，上海的“五反”斗争于3月25日正式开始。由于掌握政策恰当，防止了过火现象，从而稳住了资本家。其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这个问题。陈毅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薄一波同意这个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翘起大拇指，称赞共产党伟大卓识。

毛泽东自始至终直接过问了上海的“五反”运动，薄一波每次呈送中央的报告，他都及时阅批，因而对上海“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毛泽东及时将薄一波及华东局领导上海“五反”运动时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批发给全国，从而有力推进了全国的“五反”运动。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五反”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5月上旬，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这场斗争。5月9日，他起草了《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说：“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他还指出：“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

好结束这场斗争。”毛泽东在另一场合还说过，“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在1952年3月，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时，曾经问过后者，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说，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五反”运动结束后，在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调整工商业工作。

“三反”、“五反”运动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开始造成了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因此，“五反”运动可以说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七、批判《武训传》

1951年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这一系列批判的发轫，又同后来的批判有所不同。

1950年底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在几个大城市上映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在最初几个月里，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虽然程度不同。

5月1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语转载了几篇批评《武训传》的文章，20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他在社论中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篇社论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社论的发表，使刚刚开始自由讨论嘎然而止，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猛烈批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在修改中进一步发挥了他在之前的观点。这篇调查记实际上对这场批判《武训传》运动作了总结。

毛泽东在这场批判中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任务，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一些深刻见解，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的批评，看来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过于尖锐。同时，由于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重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而是采用了一涌而上，无限上纲，不容分辩的做法，结果使当时的批判搞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的谈话），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政治压力，但是并没有划为什么“分子”，也没有停止他工作的权利，一些影片仍然让他执导。这些同以后的批判运动中的极端作法相比，还是较为缓和的，在评价这场批判的时候，这一点也应该提到。

八、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1944年6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出版过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此后几个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些选集有的内部出版，有的公开发行，均未经作者审定。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编一部毛泽东选集，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1950年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决定立即着手编辑，并于1950年5月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和陈伯达、胡乔木（胡对第一——三卷主要是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至第四卷才全面负责。陈未参加第四卷的工作）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

由于建国前各地出版的毛选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也有错讹，有些重要著作也没有收进去，因此建国后出版的这部毛选，尽可能搜集了过去毛选中没有包括的重要著作，并由作者对收入选集的每篇著作进行校阅，作了一些文字修正，有的地方还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1951年9月12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4月出版第二卷，1953年4月出版第三卷，1960年9月出版第四卷。

《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可以说主要是毛泽东亲自做的。他不

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比如,毛选第一卷的16条题解和249条注释中,毛泽东撰写和修改的题解至少有10条,注释在120条以上。

毛泽东在主持编辑出版自己著作选集的中文版的同时,还命人对毛选进行编译,出外文版。在访苏期间,斯大林曾推荐尤金作毛泽东的选集中译俄工作。尤金来华在师哲等的协助合作下,进行了这一工作。毛泽东经常与尤金探讨哲学等问题,交情甚笃。

在华期间,尤金对毛泽东的几篇文章很推崇,要求毛把《实践论》、《矛盾论》等篇著作寄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已定稿的《实践论》提前发表。毛泽东同意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即让《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之(1950年第23期)。从1952年起,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五卷在苏联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因字数多,俄文版分两卷出)。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对1948年至1952年上半年间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的突破。这个突破酝酿于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初,形成和完善于1953年6月至12月。

1. 原来的设想。毛泽东在1952年以前,曾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之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延续多长时间呢?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的询问时甚至表示过: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直至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决定时还说,“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意即在20年内还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了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本人没

有展开论述这一战略思想，但他曾经建议刘少奇向干部讲述这一思想。刘少奇多次讲述这个战略思想。其主要观点：第一，认为这是经济建设方针；第二，十年建设之后，工农业大发展了，到那时才可以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因此，刘少奇把这个建设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并且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三年准备十年建设，都是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作准备。

2. 新的构想。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想法开始改变。也就是开始改变过去关于先用10年、15年建设，待条件成熟，然后一举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转而主张边建设、边过渡（即改造）到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

从1952年9月下旬以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他的新构想。薄一波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那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毛主席的这些话，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这不仅是初次听到他对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更感到这是他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刘受毛泽东委托，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征询他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的意见。斯大林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采取逐步的办法。”斯大林的意见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路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初，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薄一波还记述了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间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论述。他说：1952年11月3日的会上，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1953年1月31日的会上，他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1953年2月1日的会上，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认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1953年2月27日的会上，他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

毛主席的这种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前面已谈到，毛主席那时的设想是可能要在建国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经过三年的奋斗，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时机。

但是，直到1953年6月以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还处在酝酿阶段。据刘少奇说，当时“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1965年，薄一波在写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主席是从1952年9月以后经常讲的，但开始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辞。”而且，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来看，除了农业集体化

的问题按照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作了说明外，如何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的问题，仍然是在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以后，再开始进行的原有设想。

1953年春，中央为了确切掌握建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情况、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的地位和作用，以便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形式，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工作组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工业比较发展的大城市进行调查。

经过周密调查，李维汉于5月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议编印了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新经济政策的材料。

在1953年6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概念及其基本内容。他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6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的任务和过渡时期的时间，但没有讲从何时算起。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李维汉同志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主席上述讲话的精神，并进行了讨论。毛主席在修改周总理为这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时对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主要是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并把过渡的

时限改为“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对这个提纲作了精心修改，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最完备的表述。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解释为什么过渡时期从建国开始算起时，他写道：“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时，毛泽东写道：“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至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最后得以确定。

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领导“一化”（即工业化）和“三改造”（即对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并不是平分精力去抓。他着重领导“三改造”运动。而在“三改造”运动中，他用了最大的精力抓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1953年，毛泽东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采取了推进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若干重要措施。

1953年春，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2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中央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他说：

“中央于1951年12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只将草案第11条内‘并有机器条’六字改为‘和有适当经济条件’八字。”这说明毛泽东对使用机器作为办高级社的先决条件的看法有所变化。

1953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一方面推动了农业的互助合作，一方面推动了对私营粮商的排挤和改造，从而带动了对其他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关键的一步。

毛泽东在1953年底采取了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重大措施，即于10月至11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并于12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邓子恢因公外出，会议由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主持。会前（10月15日）毛泽东同陈和廖谈了话。他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10月开会后，10月、12月、明年1月、2月，北方还有3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

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10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

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时，廖鲁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内容。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1月4日），毛泽东再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了当年春天的反冒进，并明确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主题，要以这个为纲。他说：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那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合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

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80—90%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7%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这次会开得的成绩。现在不开，明年1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了。明年3月26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11月5日会议结束时廖鲁言向大家作了传达。实际上也就是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总结。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由注意互助组转向注意发展合作社的一次转折性会议。因为，1953年2月15日通过的互助合作决议，仍决定主要是办好互助组。而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主要是讨论如何办好合作社的问题，并明确要求订出发展合作社的规划。据此，《第二个互助合作决议》也明确改名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共中央1953年12月16日通过）。

在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精神指导下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12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和28日批准发出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使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掀起了热潮。

但是，1954年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又一次出现了冒进，以至于1955年初中央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反冒进工作。

2. 农业改造的极大加速。1955年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领导了对农业合作化冒进的整顿工作，而毛泽东起初对此支持，但不久就批其“右

倾”了。大批“右倾”的结果，是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由于1954年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猛（从春天的10万个发展到年底的48万多个），工作中出现简单粗暴行为，导致农村出现十分紧张的状态。毛泽东当时称之为“生产力起来暴动”。在这种形势下，邓子恢领导农村工作部着手整顿农业社。毛泽东予以支持，并在1955年3月上旬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意对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

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始对河北、浙江、山东等省的合作社进行整顿，其中重点是浙江。3月25日，邓子恢等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往浙江省委，当时浙江已有合作社55 000多个，电报要求压缩掉一部分，巩固好3万个社。电报发出后，又派杜润生、袁成隆去浙江帮助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砍掉15 607个，余37 507个。到6月底，全国农业合作社65万个，同4月的67万个比较，仅减少2万个。

但是，5月以后，毛泽东认识上起了变化。对邓子恢由支持开始转变为批评了。薄一波回顾了毛泽东“五月的变化”及其原因。他写道：毛主席认识上的变化，是发生在5月。继5月6日警告邓子恢同志不要大量解散合作社之后，5月9日晚，毛主席约见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同志，周总理也在座。他提出：下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原定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两年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邓子恢同志答：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吧！毛主席勉强说道：三分之一也可以。5月17日，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毛主席提出：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虽然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是强调“发”。他说：“对于合作社，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缩，不是停，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就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经过讨论，他在作结论时，提出了新区各省下年度（1955年秋后

到1956年秋前)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控制指标：“河南7万，湖北、湖南、广东各4.5万，广西、江西各3.5万，江苏6.5万。”他说：如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回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这两次谈话，特别5月17日会议，标志着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看法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对邓子恢同志部署的工作，已由支持开始转变为批评了。

1955年6—7月间，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出来。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了1956年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讲：“明春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在6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和邓子恢谈话，对1955年到1956年的发展计划，毛泽东的意见是，在65万个现有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即130万个。邓子恢的意见是翻半番，仍然坚持100万个的计划。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整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其中报告说：1955年到1956年度的发展计划，据现有材料统计，将由现有约65万个社发展到103万余个社（缺山西、浙江、热河三省，内蒙古自治区和京津两市的发展数字），入社户数将由1690余万户，发展到约2920万户（缺内蒙和京津两市计划增加的户数）。毛泽东于29日将这个简报加上批语印发参加当时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同志。毛泽东批示说：

“要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观点：

(1) 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那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2) 在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即端正政策的问题。‘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应当端正各项政策，并以发放贷款的办法去支持贫农，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全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可以就算了。要教育两方面的人顾大局，而不是所谓‘全妥协’，全妥协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又团结、又斗争是我们的方针。

(3)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视，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这段批语清楚地表明，他同邓子恢争论的不只是几十万个合作社，而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他的主张是，应当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的状况而希望变革的心态，从速引导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在邓子恢看来，把合作社办好需要一定的条件，合作化运动应该是在办好现有社的同时，积极准备条件，按部就班，慎重稳进。这就是分歧所在。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有的同志曾对邓子恢竟为几十万个社数去同毛泽东争辩表示吃惊，认为何必去“闯祸”。邓子恢苦笑着解释：“不是几十万社问题了，要紧的是他认为办合作社那些条件都不具备。这怎么能不讲清楚呢。”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邓子恢被批评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断然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报告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的“一种惊惶失措”的表现。报告说：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万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万个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报告认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分歧”。邓子恢的意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报告说：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

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这样,邓子恢的正确意见就被彻底否定了,并从此开始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在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在认定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的前提下,对1955年到1956年全国合作社的发展数字和整个农村社会改革、技术改革的全面规划提出了建议。他说:

1955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65万个社比较,只增加35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20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1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1956年10月秋收以前,还有14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1958年春季,全国将有2.5亿左右的人口——0.55亿左右的农户(以平均4.5人为1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1960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

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1960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4—5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7月底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省相继在8月举行省委扩大会议或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检查“右倾”思想，修订本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

10月4日，以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主要议题之一的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开幕。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248篇发言中，也包括邓子恢的检讨。说他“抱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检讨自己又一次犯的“原则性错误”。说浙江有些地方发生强迫解散合作社的错误，责任完全由他承担。

10月11日，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作会议结论。

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战略指导思想，第一次阐明了要使各方面的工作加快和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战略意图。

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等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

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极大地加速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和1956年经济发展的冒进。

到1955年底，全国已建农业社190.4万多个（其中1.7万多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63.3%。到1956年5月底，入社农户剧增至11013万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1.2%。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

已达 7 472 万余户，占总农户的 61.9%。到 1956 年 11 月底，入社农户已达 11 674 万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96.1%。这样，原计划用 15 年左右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 4 年间就匆匆完成了。

在狠批“小脚女人”，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于 1955 年 9 月至 12 月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部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材料书，共收集各地材料 176 篇，90 多万字，仅汉文版就发行 152 万册。毛泽东亲自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为 104 篇材料写了按语。这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望。它的出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

1.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952 年 9 月下旬至 1953 年春，毛泽东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点，就是不太明了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步骤。当时，毛泽东对如何改造个体农业是胸有成竹的，找到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具体形式、步骤。但是，李维汉等经过周密调查研究，解决了这个难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也有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具体形式。

李维汉于 5 月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个调查报告。6 月中旬，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在 6 月 15 日第一次讨论中，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亦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6 月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

从 1953 年 6 月至 9 月，毛泽东在这几个月间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作了多次讲话。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归纳其基本要点如下：

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有三：一是公私合营；二是加工、订货、收购、包销

等；三是私营商业向国营进货按牌价出售。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

二、占有大约 380 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家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应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三、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不受限制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进攻。在进攻中要有必要的让步，要承认资本家的“三权”（指企业所有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否则，就无从搞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是进攻太猛，天津资本家只分得很少一点利润，这样他们就不会很好地搞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唯利是图，现在要使它从唯利是图变成两利是图和四利是图。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可占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四、三年之内，要把资本主义工业的大部分差不多包括 100 万工人的工业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希望能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公私合营企业，要给资本家提供一个榜样。过去是“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每年都要发展。

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六、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其中一部分人可能要坚决反抗，但大部分人是可能不反抗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前途，不是变成地主、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为工人。要消灭资产阶级，把人改造过来。

七、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

分资本家。每个城市都要有这样一批工商界的核心分子。

八、中国工人阶级有两个联盟、两种合作。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中，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依靠工农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和改造那些剥削分子，那些人才会来。

九、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一种比较巧妙、比较温和、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但可以采取比较文明的办法改造，可以开协商会，用协商的方法来消灭它。

十、不要忘记我们握有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政治方面，国家政权在工人阶级手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又有工会和共产党支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企业公私合营后生产力即不断发展，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公私合营）远远优胜于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榜样。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保障。

十一、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而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手工业者等等。要用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战略思想教育全党。

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6月政治局讨论时，恩来表示他当时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看了我送中央的报告后说“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刘少奇也认为中央统战部的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

1953年1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毛泽东对会议指示说：10年内搞掉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没什么急躁冒进。已过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将天下大变。10人以上的企业改造，可能不要10年，也许七年就可以了。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在后两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在这个重要文件及其他有关文件的指导下，1954年成为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第一年。到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户数累计已达1746户，产值

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 33%。

1955年5月到10月，毛泽东集中精力发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紧接着，他又发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适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

11月16日至2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参加会议并讲话。他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在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社会主义这一错误思想时，毛泽东说：“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变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

毛泽东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在党内没有听到不同意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对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他们做工作，表示很拥护。李烛尘先生10月29日那天当场表示，要积极推动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会员搞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荣毅仁先生讲了荣家的发家史和父辈在旧社会办实业的坎坷经历，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任委员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伟大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21日，执委会通过决议和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之后，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不少城镇申请公私合营的人流，日夜不断，其势甚猛。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决定，只好先批准公私合营，把要做的清产核资、改组企业、安排生产、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工作，放到后面去做。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在郊区农民代表报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喜讯之后，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告首都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继北京之后，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数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

2. 手工业的合作化。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合作化采

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1953年底，全国已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4 806个、社员30万人。到1955年6月，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49 800多个，社（组）员为1 439 000多人。

1955年下半年，在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冲击下，农业合作化一马当先，随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走向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手工业改造的步伐也急剧加快了。

毛泽东在1955年12月27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加快手工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他提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猛发展说明，“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他还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

1956年3月4日，他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即34个部委汇报之一）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

就这样，在紧接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之后，又掀起了手工业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同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为9.91万个，社（组）员达到509.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有一小部分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改造高潮中直接组织的。

五、高、饶事件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谈话时，讲到了高、饶事件。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

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对于高、饶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薄一波在《回顾》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述: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儿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可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高岗向党发难，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这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他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之一。前面已经讲过，高岗利用财经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会上进行时而隐蔽时而半公开的串连、鼓动，首先把攻击矛头对着我，并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实施他的“批薄射刘”的诡计，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少奇。这一点，他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待。他说，他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的意思”。高岗还对人说过：“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高岗对刘少奇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甚至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后来还一度担任过财经方面的总

顾问)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高岗访苏回国以后,又向人散播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他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少奇的许多话加在我头上进行批判。他还把少奇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贯的、系统的,是路线错误。他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高岗还把搜罗到的所谓少奇的“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的资料。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要他找少奇直接谈清问题。他不予理睬。少奇两次主动找他谈话,并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检讨。他却对人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他污蔑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自己迷上了“圈圈”主义、宗派主义,在他的眼里,自然这也成了“圈圈”,那也成了“圈圈”,一切正常的事情都被颠倒了。他这种种飞短流长、故布疑阵、谣言感人的把戏,都是为他的分裂党、篡党夺权的活动服务的。党内出现了这种人,就不得安宁了,许多的鬼事、怪事和歪风邪气都会冒出来;党内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1953年2月,党中央为加强集体领导,拟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委托少奇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少奇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竟以为这是少奇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不予合作。

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安子文同志将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高岗又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向他进行试探的。于是,他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

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高岗还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时而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如此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损害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明显表露高岗反党意图的是他散布的“军党论”（即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队变成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工具。高岗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他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他还制造所谓“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权的谬论，并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妄图蒙骗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追随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

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主持的。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刘少奇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对于高岗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予以紧密配合，进行“讨安伐刘”，以取悦于高岗。薄一波写道：

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的器重。可是，他一当上组织部部长，就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反对少奇同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他到职才几个月，就对组织部原有的领导干部进行打击和排斥，发动了对安子文同志的无理斗争。之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又配合高岗反对少奇，阴谋篡党夺权。正像毛主席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他们互相呼应，配合得十分默契。

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的那份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得知后，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进行传播。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却抓住把柄不放。并散布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果然，他未经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少奇作了汇报。少奇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他向少奇反映问题是“胆大妄为”。

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扭偏会议的方向。在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并进而把矛头指向少奇。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不顾大局，继续诬陷安子文，破坏团结。当他受到批评后，又一反常态地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这就透露了他“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后来他在检讨中承认，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毛泽东1955年3月在全国党代会上指出：虽然高岗、饶漱石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的一致，说明他们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毛主席的话切中要害，完全符合高、饶反党活动的实际。这里再概述几个事实：（1）饶漱石一向被认为是尊重少奇同志的，可是在高岗发动“批薄射刘”斗争时，他却另辟一个“讨安伐刘”的战场予以配合。他后来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2）关于“名单问题”，毛主席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散布者恰恰就是高岗、饶漱石两人。他们会上会下广为传播这份名单，造谣惑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3）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律排斥。饶漱石还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长为核心。（4）饶的问题被揭露后，高两次找毛主席，要求保护饶。高岗问题被揭露后，饶也为高申“冤”。毛主席曾风趣地说：“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当年党中央把他们称为“高饶反党联盟”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高、饶问题的察觉和揭露，经历了几个月时间。毛泽东在1953年夏秋就对高、饶的活动有所警觉。薄一波写道：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主席已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他在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少奇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一波，也不能成立。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再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少奇是大公无私

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主席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但是，高岗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教诲，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又南下“游说”，大搞破坏团结的阴谋活动。这就引起了大家的反感。许多听过高岗反党宣传的同志陆续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问题。

毛泽东获悉了人们揭露出的初步情况后，又做了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他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中央书记处经过调查，掌握情况后，采取了坚决措施制止高、饶的分裂阴谋活动。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党中央向高岗指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他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写信给刘少奇等，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他在信中说，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对它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毛泽东还要刘少奇在全会上作点自我批评。

1月18日，毛泽东致电书记处各同志，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等，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供七届四中全会参考。

1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提及高岗来信，并说明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说：“收到高岗一信。高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

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或再加小平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刘少奇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毛泽东还说过，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

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自绝于党，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六、创建人大起草宪法

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期间,听取了斯大林的三点建议:一是强调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利益,二是建议编毛泽东著作集,三是建议中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对于斯大林的前两条建议,毛泽东回国后就立即实行。然而,对于斯大林的第三条建议,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立即采纳,直到“三年准备”完成后,才付诸实施。

从1952年底到1954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工作,并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1953年,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也开始了新的起步。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颁布,全国基层普选工作的完成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先后召开。

全国政协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1952年,一届政协即已到期。这时,是召开政协二届一次会议,还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经过中共党内的酝酿,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出召开全国人大的建议。

1952年12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举行第43次会议,就中共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交换意见。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

周恩来报告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国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没有立即实行的条件,因此,《共同纲领》又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而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种过渡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为着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的任务,就必须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求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以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今天,在召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依照《共同纲领》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及时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改变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办法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办法。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10款所规定的职权,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同意。兹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5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在讨论中,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陈叔通、马叙伦、彭泽民、乌兰夫、陈嘉庚、李章达、何香凝等相继发言,对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提议表示赞同。在结束讨论时,毛泽东作了结论。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最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现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10款的规定,决议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

政府。

“为了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并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为委员组成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以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奚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延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为委员组成之。以上两个委员会应即制定自己的工作程序。

2. 主持起草共和国宪法。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草案，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加下，经过一年多郑重的起草工作写成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他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由于这个缘故，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他断然拒绝。

毛泽东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必须充分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以来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总结这些变革的主要斗争经验；必须坚持我国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指明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以及采取的方针和步骤。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田家英是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两人是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个小组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工作的，从1954年1月7日开始工作，3月9日结束。在这期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作了很多修改。

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起草好宪法草案初稿，并交中共中央三次讨论定稿后，就于1954年3月下旬，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审议和修改。从3月23日至6月11日，除开过多次收集和交换意见的非正式会议外，宪法起草委员会开过7次正式会议，进行了详细、周密的研究和讨论。在起草工作进行期间，全国政协以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和武装部队的领导机

关，组织了各方面人士8 000多人，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了5 900余条的修改意见，对起草工作给予了重大的帮助。所以，刘少奇说：“应当说，这8 000多人都是宪法起草工作的参加者。”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决议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全国人民的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共有1.5亿多人参加。广大的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据统计，包括8 000人讨论的意见在内，前前后后征集到各方面的意见118万多条。例如，上海全市627万人口中有270万人听到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有156万人参加了讨论，提出了16.5万多条修改、补充的意见。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讨论通过提交全国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的。

在1954年6月1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宪法草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500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区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8 000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接着，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经过充分讨论之后，9月20日，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日，大会主席团发表公告，予以公布。随后，大会相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大会于9月27日对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进行选举，同日，大会主席团发表公告，公告选举结果。其中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

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秘书长：彭真；委员：王昆仑等 65 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的决定；根据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提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的决定。29日，国家主席毛泽东根据决定予以任命。他们是：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秘书长 36 人。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国防委员会委员 81 人。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大会于 28 日还通过了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

至此，大会圆满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各项重大的历史任务，于 9 月 28 日胜利闭幕。这次会议的整个进程，显示了我国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全国人民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一致。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 1949 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七、文艺领域的斗争

1. “红学”之争。1953 年 9 至 10 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应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过渡时期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作者在上述精神指导下，于 1954 年 9、10 月间，先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红学”权威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

两位小人物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9 月中旬，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江青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借此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编辑以“党

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后来《文艺报》同意转载（登在1954年第18期上），主编冯雪峰为文章加了编者按。按语一方面对两位青年加以鼓励，一方面指出他们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个编者按很不满意，当即写下批注。他认为这两个青年的“小人物”的文章是“很成熟的文章”，而冯雪峰则对它“妄加驳斥”，“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针对冯雪峰按语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写的批注）。他还主张：“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应当批判俞平伯的错误思想。

在阅读《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时，毛泽东也作了批注。他对编者按仍然不满意，认为按语对文章评价过低。同时，他也指出了两个青年文章中的若干缺点。他认为其中一个缺点是“替俞平伯开脱”。

10月16日，毛泽东专就李、蓝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叙述了两位“小人物”发表文章时遇到的挫折，对“大人物”的阻拦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是继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又一次把文学艺术领域的不同学术观点提到政治问题的领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斗争，而《文艺报》的编者按则被认为是党内出现的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代表作。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10月31日至12月8日期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联席会

议，传达学习讨论了毛泽东这封信的精神，作出了相应的决议。11月8日《光明日报》登载郭沫若《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12月8日在文联和作协两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郭沫若《三点建议》和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都是对这封信的精神所作的阐述并对如何贯彻作了部署。

于是，批判俞平伯、责难《文艺报》编者等的文章纷纷发表。毛泽东对几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亲自加以修改，加重其批判份量。如，10月27日，他在审阅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修改后，毛泽东即令《人民日报》发表此文。在阅读11月10日《人民日报》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时，毛泽东说，《文艺报》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对俞平伯的学术思想的批判，很快也转入政治批判。如认为俞平伯是胡适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俞平伯的思想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

同时，毛泽东又决定趁势发动一场广泛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10月27日，中宣部副部长陆定一写报告给毛泽东并中央，主张这次讨论不应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而应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

2. 批胡风。195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毛泽东1月24日在这个通知上批示：“可用”。于是，一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揭开序幕，并愈演愈烈，直至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个性、很有创造性并有自己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他提出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着差异。但从1951年11月开始，胡风的文艺思想受到了不正常的对待。1952年7月以后，在文艺干部整风运动中召开了几次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实际上是对胡风思想的批判。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第2期

发表题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长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从1954年3月到7月,胡风写了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呈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胡风的30万言书后,于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从1955年2月1日起,在报纸上全面展开了对胡适文艺思想的批判。

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这个报告之前,就已表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1955年1月15日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但是,毛泽东看了4月间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后,断定胡风等人是一个“反党集团”。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问题的专案组,开始集中在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收集他们的有关信件。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为之写了编者按。他在编者按中说: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

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在编者按语稿中，毛泽东加写了以下两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中加写了一条：

各省市县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毛泽东为这批材料写了17条按语，并在同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稿中加写了以下几段话：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

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6月1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将已发表的三批材料汇集成单行本，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此书写了序言、按语和注文。

在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党内又发生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事件”，于是，党中央、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建议中央作出内部肃反的决定。中央成立了5人小组，并于7月1日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场内部肃反运动从1955年7月开始，至1957年底基本结束。

第五节 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完成，使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作为具有高度独创精神的战略家毛泽东，不能不像开创中国式夺取政权道路、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那样，再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像开创前两条道路一样，也是从农业（农村）着手的。从1955年底至1957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制定了“双百”方针，作了《论十大关系》讲话，指导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八大”，发表了价值极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当然，毛

泽东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也显露了急于求成、不够稳健的端倪。

一、对农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发展,引起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构想。这一战略的中心是加速发展,并开始在农业发展战略规划上首先体现出来。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同14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农业17条》,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确定以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以便为1956年1月中央召集的会议上确定这个规划作准备。1956年1月上旬,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同与会者商量之后,将17条扩充为40条,拟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接着,中共中央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做了一些修改。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正式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5日,中共中央将这个纲要(草案)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办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廖鲁言在会上对纲要草案的内容作了说明。他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就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特别是要求在12年内,把粮食每亩的平

均产量，按照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由1955年的150多斤提高到400斤，208斤提高到500斤，400斤提高到800斤；把棉花每亩的平均产量，由1955年的全国平均35斤皮棉，按照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按照这种亩产量的水平，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3678.8亿斤——引者注）增加1倍半以上，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30.36亿斤——引者注）增加两倍。

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特别是五亿农民发出了新的号召，为使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每年以8%和10%以上的超高速度实现粮食达到一万亿斤、棉花一万万担的目标而奋斗。

由于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带有急躁冒进的倾向，因此在1956年反冒进过程中被搁置一边，直到1957年下半年才被重新提起。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曾说：1956年“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经过讨论和修改，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二、毛泽东与1956年“反冒进”

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进行反冒进工作，使“一五”建设重新纳入正轨。

历史证明，毛泽东1955年下半年逐步形成的经济建设加速发展战略设想，是1956年冒进的直接原因，而他对周恩来等进行的反冒进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心里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当时只有轻微表露，而到了1957年下半年尤其在1958年，却爆发了出来，成为发动“大跃进”的动力之一。

1955年11月商定了《农业17条》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以农业发展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他指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

薄一波回忆了12月初刘少奇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加速发展思想的情形：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少奇同志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据薄一波分析，第一，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第二，他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继续阐述了他关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批判这方面存在的右倾保守错误的观点。他说：

“这件事告诉我们（指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合作社——引者注），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

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说，凡是办得到的，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曾决定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保守。刘少奇在1955年12月一次讲话中说，明年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以使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提前完成，不是15年左右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提前完成；不是基本上完成，而是完全完成。原来总路线规定的总任务是15年左右，现在要提前完成；原来是基本完成，现在要完全完成，要争取时间，要加多加快加好。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根据上述精神，《人民日报》于1956年元旦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多、快、好、省的要求。社论说：“五万万中国农民热烈地欢迎和要求农业合作化……这个事实，把所谓‘农业的发展必然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太多是件坏事’等等悲观论调一扫而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4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4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我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接下来就是2月14日开始的34个部委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泽东的有些插话，讲了一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合实际的话。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一五”（1928—1932年）19.2%，“二五”（1933—1937年）17.1%，“三五”头三年（1938—1940年）13.2%。（我国工业产值“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18%，已经很快了——作者注）。又如，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话，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000万吨，比原汇报的28000万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

周恩来在1955年底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反对“右倾保守”、加速发展经济的思想，接受毛对国务院工作的批评。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从1956年1月开始，周恩来集中精力做反冒进的工作。2月召开的计划和财政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首先压缩了年度基本建设投资（从20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6月份，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会议，又将投资指标等再度压缩（由147亿元减到140亿元等）。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措施。

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进行宣传。随后，中宣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6月10日左右脱稿，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三人修改。陆定一删掉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

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刘少奇作了4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示冒进的危害性。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然而，毛泽东接到此稿后，却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显然表明他对社论强调反冒进不满（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说，这个社论是骂他的，因为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骂他的东西为什么要看？）。经胡乔木修改后，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1956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

三、“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0年，毛泽东开始注意到对待遗传学不同学派的不正常做法，并批评了某位大学负责人。这一事件对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有一定的影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有一些人向中央反映，一所大学由于仿效苏联做法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引起党和自然科学家关系的紧张。这所大学的领导人得知后，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为自己申辩。7月15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送毛、周、朱及中宣部和教育部领导人传阅。7月16日毛泽东批道：“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毛泽东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出必须彻查这个学校的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查处的结果，解除了这位同志在大学的领导职务，先在会议上后来又在报纸上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这是党中央纠正这方面错误的开端，虽然仅仅是范围和程度很有限的开端，但毕竟是有了开端。后来陆定一在阐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时，曾提到这次批评。

据陆定一回忆，1950年关于京剧问题有个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即连糟粕也要继承下来；另一派说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1951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龚育之等著文谈及这一过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毛泽东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1942年毛泽东即曾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过“推陈出新”四个字。1951年的题词，一是对象扩大了，从京剧（平剧）扩大到整个戏曲；一是内容增加了，新添上“百花齐放”四个字。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有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据我们了解，周扬对人说过，“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

“百花齐放”只解决了各种戏曲形式要同时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界的其他问题，更没有涉及科学界、学术界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不同的学派，发生了争论怎么办？等等。

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百家争鸣”方针。当事人刘大年回忆了这一过程。他说：

1953年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在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和其他与加强历史研究有关的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 and 黎澍。郭沫若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讲话。记得他说，最近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一个是语言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胡乔木同志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对于办刊物，经过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我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这时对我和尹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但有两点，陈伯达没有明白地讲：（1）这次开的会是否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集会？（2）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会上谁也没有对这两点提出询问。《历史研究》发刊词是郭老亲自写的。我和尹达在郭老家里就写些什么内容作过讨论，没有提起陈伯达的讲话，发刊词里自然也没有“百家争鸣”的话。知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我记得那是两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1953年10月陈伯达在科学院召开的那次会议，由黎澍同志负责记录，事后并曾整理成文，油印分发与会者。我手里那份记录，在“文革”中才散失。

.....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陈伯达先后3次讲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上讲的，没有正式指出名字，在怀仁堂大会上递条子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都说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事关重大，陈伯达不可能随便讲，而且再三重复。至于这个方针是对办历史刊物讲的，还是对历史研究委员会讲的，它本来是一回事。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措施之一，就是办《历史研究》刊物。第二，头一次提出“百家争鸣”，并且作为一条方针，是在1953年8月5日以后，10月初以前。因为陈伯达讲得很明白，请示方针，是在委员会成立以后；而传达方针，则是10月初第一次委员会上。第三，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看来最初并没有赋予这个口号以后来全面讲双百方针那种重要意义。而且百家争鸣，后来的解释也几经变化。但不管如何追踪，“百家争鸣”作为一个方针的历史，它的起头，是在1953年秋天。

何以首先在历史学问题上，而不在别的问题上提出百家争鸣呢？这有它的背景。郭沫若与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主张不同。他们的书在读者中又都很有影响。以前郭在蒋管区，范在延安，各说各的，到北京以后，讲论著文，近在咫尺，彼此难免要作些答辩。他们的主张又都各有赞成者。1950年，《新建设》等刊物上已经有一些文章讨论和争论这方面的问题。中宣部胡乔木等同志，也主张范老修改《中国通史简编》。1951年春天，开过多次小型座谈会提意见。范著就是这时决定重新写过的。范主持一个研究所，但主要只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中宣部曾提名范为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执意辞谢不就）。古代史争论很大，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领导，有明确的方针。百家争鸣不从其他方面，而从历史学问题上首先提出，就是直接来自这个背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来历就远不止于此了。它是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国内外科学、文化争论的全面、积极的反映。

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和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中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意思，但还没有展开，没有讲到这两个口号。

讨论报告时，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陆定一在这年一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曾说过：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

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又讲了这些意见,并且谈到知识分子会议开过后,在一次各地宣传部长都来参加的会议上,他还讲过不能同意“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魏尔啸、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讨论报告时,还有人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随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发言,其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陆定一讲话,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的最详尽、最透彻的阐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对这个方针的系统阐述,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了。学术文化

的各部门都比过去表现得活跃，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当然，在兴旺、活跃和自由讨论风气浓厚的同时，有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在学术文化领域内表现出来，这也不足为奇。

1959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夸大这个方针提出后出现的消极现象的情况，又一次指出：“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月27日，他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1957年3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宣传会议期间，中宣部汇集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共33个），印发供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划了许多圈圈道道，还作了若干简短的批注。

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不许怀疑吗？”

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这些批注，有重要的思想内容，表现了信心和气魄，对那两篇讲话，是重要的补充。

四、《论十大关系》

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说：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

在《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毛泽东作了几个月“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调查研究。薄一波对这次调查及《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作迄今为止最系统的回忆和评述。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

1956年初，毛主席刚从杭州归来，我去向他汇报工作，偶然谈到，现在少奇同志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没想到，毛主席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对我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我当然乐于承担。没有多久，汇报就开始了。这个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有34个部委的汇报，是毛主席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个年头时的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直接为他提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

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主席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接下来才是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这个汇报按“口”的顺序进行。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才由各部汇报。从我们重工业“口”开始。具体日程是：2月14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

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这个汇报同少奇同志听取的汇报不同的是：只限于政府财经各部委办局，不包括政府文教口各部和中直机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广播事业管理局于3月7日到10日，向中央报送了详细的书面汇报提纲）。听取汇报的，除毛主席外，有时有周总理（参加次数较多）和陈云、小平以及书记处其他同志。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我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我作为汇报者，也作为这个汇报的具体组织者，共参加过二十几次。重工业口各部、轻工业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汇报我都参加了。

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月中旬，正在34个部委紧张汇报期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贾拓夫、王首道和我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准备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我们分别拟出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等各方面的汇报参考提纲。工交方面的汇报提纲是由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这3个单位于5月2日后合并为经委）共同拟定的。各方面的提纲拟好并由计委汇总后，3月30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立即着手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京汇报。这个汇报于4月下旬开始。到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四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毛主席的书面汇报材料。

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同志向毛主席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书面汇报。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也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进行讨论归纳。由于部署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直接涉及对未来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因此政治局会议的讨论，除了概括出十大关系之外，中心是分析国际形势，估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1955年有两大国际会议是很有影响的。一是4月间

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二是4月到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由于两个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动武。到1955年底和1956年年初，我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传达，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军事费用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4%，政治局会议设想第二个五年减到20%以下，15%的样子，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国防工业发展步伐放慢，各类经济比例就比较好安排了。这是安排十大关系，尤其是前五大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于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他讲后，连续讨论了3天。

5月2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上午，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他作了结论。

两次讲十大关系的纪录，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1965年12月27日，根据少奇同志建议，并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收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时，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都没有收进去。

1975年，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主席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重新整理稿于7月13日由小平同志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时再公开。”

这次对讲话的重新整理工作，是在胡乔木同志主持下完成的。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恢

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去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但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还是有些具体内容没有收进去。现在，我根据两次（主要是第一次）讲话的纪录，就以苏为鉴戒和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所讲的内容，作些补述。

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还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3 000公尺上空了”，“不要说3 000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10 000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到时，毛主席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军现状时，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主席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这里，我想作点说明。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披露的资料，苏联从1929年到1940年，工业年均增长16.8%，而同期日、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一国的增长超过10%的。13年内苏联钢产量从430万吨猛增到1 830万吨。正因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得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这方面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明显的。但由于集体化中的强迫命令和农业政策的失误，至少在谷物生产方面集体化和机械化的优越性确实没有明显发挥出来。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8 600万吨，1953年为8 250万吨，确实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8 850万吨，总算是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

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100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思想，对体制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可惜的是，1958年走了一个极端，来了个权力大下放，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将绝大部分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造成了混乱。以后就不再注意扩大地方权力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中才开始真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病，充分调动地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扩大地方的权力当然要适度，应以不影响国家必要的集中统一为前提，而不能走到地区分割半分割的状态去。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毛主席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毛主席吸取苏联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著名观点。

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主席说：“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

谈到是非关系时，毛主席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主席着重讲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做过的错事。他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

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一波注）；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1948年被斯大林开除出情报局，在斯大林看来，铁托不听他的，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

这些未发表的材料说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当时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鲜明地表明了我们的原则立场。这是举世周知的。至于上述对斯大林的种种具体批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那完全是从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着眼，避免给人以口实。这些内部批评，后来我党中央都通报给苏共中央了。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同志1975年7月10日给毛主席的信上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的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都被采纳成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但是，也正如周总理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圆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重要的是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对经济问题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业、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汇报，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但这些计划没有实现或只开了个头。

五、指导召开“八大”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作结论时宣布：“中央决

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八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现保存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各种修改稿达80多份，党章草案修改本有50多份，其中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政治报告稿就有21份。在一份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上，毛泽东批道：“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飭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在这个改本上，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解决了”一句中的“两条道路”改成了“谁战胜谁”。1956年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方针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不管什么人，对事不对人。在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修改文件时说：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毛泽东插话：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由此可见，八大文件是全党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为了突出八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主题，邓小平在8月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时提出，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毛泽东接着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八大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8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提出了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要求大会继续发扬党在思想、作风上的优良传统，彻底清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在谈到选举问题时，他强调要坚持七大的正确方针，为团结和教育全党，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要选有代表性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为中央委员。

9月10日，毛泽东在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作了讲话。他首先回顾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接下来讲搞建设不要像革命中犯那么多错误，并希望中央委员会成为科学中央委员会。他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呢？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谈到设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他说：

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

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办好。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陈云跟邓小平，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

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1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1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

1956年9月15日，八大正式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还说：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

个真理。(热烈鼓掌)

据逢先知回忆，毛泽东这个精彩的开幕词是由他的秘书田家英起草的：说毛泽东更加器重田家英，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要田代他起草“八大”开幕词。

大家知道，毛泽东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八大”开幕词了。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经说过：“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这也是劳动，要亲自动手。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3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人们还记得：毛泽东在1948年1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其中就特别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稿子，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陈起草的稿子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于是又找田家英。毛泽东告诉田家英：“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花了一个通宵赶写出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立即送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其他有关同志，经过多次修改，最后定稿。

毛泽东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的劳动。“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致开幕词以后，来到休息室，许多人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人们可能还记得开幕词里的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它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这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满意的一句话。

毛泽东致开幕词后，选举了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并通过了大会日程和会议规则等。此后至9月17日，刘少奇作八大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9月18—25日，进行小组讨论及大会发言等。9月21日，主席团举行宴会，招待各兄弟党代表团。9月26日下午，大会举行第11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接着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9月27日下午，大会举行第12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大选出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73名。选举结果宣读完毕后，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下午6时43分，在陈云致闭幕词后大会胜利闭幕。

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作为公开揭露和纠正斯大林一系列严重错误的连锁反应，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陆续发生了5月波兰的波兹南事件，10月华沙学生上街游行事件，波党中央改组，10月下旬到11月初的匈牙利暴乱事件。在中国，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由于社会大变动、经济建设有冒进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自下半年9月起至1957年春天，一些城市和农村发生了约一万余名工人罢工，30起共万余名学生罢课请愿，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以及进京上访告状等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56年下半年开始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但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善于处理敌我友关系和革命队伍内部关系的好经验好传统，在新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而且把《论十大关系》中所体现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关系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命题，最早出现于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他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里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他表示：“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

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而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第一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上公开提出了两类矛盾问题，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一次论及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毛泽东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加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当时讲的12个问题是：一、两类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十、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与汉族民族的关系问题；十二、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根本改变面貌。这个讲话曾于同年3、4、5月间向广大干部传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有着广泛的影响。

1957年3、4月间，毛泽东沿东线南下，经天津，过济南，到南京，最后抵达上海，向沿途各地党政军干部和党员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

3月16日晨4时，他在一个批语中注：“我今天乘车去天津，明天去济南。”

3月17日，他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法，别的方法都不要。

3月18日，他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这么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上说：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3月29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大致在同样的时间内，刘少奇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把他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整理，并将在外地讲话中的一些新提法补充进去，使之更系统化、理论化，成为同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

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而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把它当作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他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的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and 政策的提出，是他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具有长远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七章 探索中的曲折

通过急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新型社会制度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八大”前后，这种探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最终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第一节 从整风到反右

一、发动全党整风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即将完结，执政党的中心任务由领导革命转向了领导经济文化建设。为了使我们党很快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全党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提出了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的问题。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现在我们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又说，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联系到延安整风，指出现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临的伟大建设工作做好。

随后，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还说：“整风是我们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谈了整风问题。他说：现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错误也还不少。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上而下，从领导干部到全体党员逐步展开。《指示》并要求以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个指示在5月1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如何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我们党整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作了如下叙述：

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马寅初等都到会了。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于5月初和6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5月15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陈叔通5月16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的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一、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二、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三、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偏差和错误很大很大”，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

反动分子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四、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五、他们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六、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右派分子人数虽然极少，但能量不小。在他们所煽动的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一部分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教育中间派，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二、反右的酝酿和发展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反右的打算。他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党整风是真诚的。

1957年5月4日，他起草了《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他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

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了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亲自作自我批评的情景，以及他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等。李银桥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书中写道：

运动一开始，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开始，毛泽东对此是热烈欢迎的，他自己也真诚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希望我们的党和党员干部永远保持革命热情，保持清正廉洁。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这段时间，他曾多次征求我们对他的意见，做自我批评，使我们深受感动。

有一天我帮毛泽东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我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

“别人呢？别的卫士怕吗？”

“一般说，都不怕。也许个别……就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

“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觉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压力。”毛泽东吁口气，恳切地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讲述自己的父母的为人，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

类似的话，毛泽东曾经和许多卫士及秘书、医护人员讲过。毛泽东对于他

睡不好觉而发过脾气的卫士都曾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

但是，整风运动发展到后来，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工农群众也确实对此不满，甚至义愤填膺。反映情况的简报材料纷纷送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首长那里。

毛泽东多次讲过写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一旦发觉有人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不答应了。党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不能答应，这是一个原则。毛泽东认为这些人不是帮助共产党，而是反对共产党。他常把同高级领导人及专家们研究过的同一问题拿来问问身边的工农兵出身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表示决不答应。

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部署了对右派的反击。从6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斗争。这一斗争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由于当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而且下边许多基层党的领导人已经不是“主义之争”，有不少成了“个人之争”，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我所知，毛泽东亲自出面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但对于全局来讲，这是严重扩大化了。直到1978年才由党中央发指示，对被错划右派分子的人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这是后话。

这场斗争开始之后，毛泽东由过去思考如何避免重犯斯大林“左”的错误，转向思考如何防止右的颠覆和出现修正主义。在1957年9月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显然违反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分析。

关于毛泽东从整风到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过程，李维汉作了清晰的记述。他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要彭真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这年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察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最后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他

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但是，“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6月6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大字报方法加紧整风。这样做，“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李维汉回顾了5月中旬到6月上旬，他组织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进行鸣放的一些情况。他说：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两个座谈会分别在1957年6月3日、6月8日结束，我在会上都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看过。6月3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6月8日工商座谈会结束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我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

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且批驳了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言论，指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两篇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反右派，但实际都是准备反击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从6月8日正式发动。当天，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6月8日指示中，毛泽东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拚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

6月中旬，毛泽东两次派他的秘书林克去高校了解情况。6月11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校长助理陈舜瑶，说明派其秘书林克去清华了解学校目前的动态。6月18日，毛泽东又给北师大党委书记何锡麟去信，让何接洽林克，以了解北师大动态。

6月29日，毛泽东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时说：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

使自己心中有数。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错误地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7月,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不叫反革命,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有可能转变过来”。当时对右派的策略是一打一拉,先打后拉。这篇文章还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说:“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对于正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文章提出“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青岛会议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发生了严重扩大化。

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在反右运动期间,毛泽东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在《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回忆了当年毛泽东对张治中和邵力子的保护:

在整风反右期间,张治中曾遇到一场灾难,险些成为某些人的猎获物。事

情是这样的：反右运动开始后，张对运动曾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关系问题曾作了长篇的直言，同时对民革的反右颇有看法，甚不积极，于是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也不知谁在背后操纵，一夜之间，民革中央大院、屋内、屋外贴满了邵力子的大字报，还夹杂着少数关于张治中的。来势汹汹，来者不善，我一看心里万分着急。显然，有人蓄谋要把邵力子打成右派，然后顺藤摸瓜，把张、邵捆在一起。幸好，有人马上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周恩来、毛泽东都知道了。从中南海传出来的声音：“不要头脑太热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了！”一场来势迅猛的狂风暴雨骤然煞住，张治中、邵力子幸免于难。

过了几天，周恩来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到西花厅谈话，听取张、邵的意见。张、邵谈了些有关运动的话，但没提到民革中央。到8月，毛泽东对张说：“我很关心，听说有人给你写大字报。”没等张答话，毛主席就继续说：“也有人出我的大字报。”张问：“是谁？”毛主席答：“是湖南湘潭东山中学，他们寄来大字报一叠。主要说，韶山中学要求题字你题了，我们要求就不题，这是偏心！”“我只好都题了，承认不对。”这是有意对张治中作宽慰的解释，请他对大字报不必在意。

1958年5月，反右整风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送请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50年所作《六十岁总结》（这是他的《七十回忆录》的蓝图）。到同月22日，毛复张函：“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大的风浪（指反右运动），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些话，体现了毛泽东对张治中的关怀、策勉与评价，是很有意义的。

1957年9月至10月间，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主要讨论整风和反右运动。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他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个全会上还提出“四大”是最革命最民主的形式。他说：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

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第二节 “大跃进”

一、1958年的“劲头”始于八届三中全会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他又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

可见，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大跃进”的起点。毛泽东在会上批评1956年反冒进，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重提多快好省，并决定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中心，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

在10月9日讲话中毛泽东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他还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

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谈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说：“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00斤，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他还说：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劲鼓起来了。我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 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说：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

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提法，认为，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二、提出“超英”口号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的两个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受到启发，提出了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 000万到1 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2 000万到2 500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 500百万到4 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 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 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

可能是4 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

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审定修改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三、从杭州会议到成都会议

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工业、科学、文教也要搞四十条，各行各业要全面规划，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等等。毛泽东还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说：我们革命的步骤是：1. 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就完成了。2. 土地革命，1950年—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 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4. 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5. 还有技术革命。1—4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和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他还说：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

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驳斥了陈和张的批评。他还认为：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又说：5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

1958年1月28日和30日，毛泽东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看来是有希望的，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15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群众热情甚好，完全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15年看5年，5年看3年，3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现在群众热潮好像原子能，发出了热力。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要认真学习，搞试验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他还强调：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15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南宁会议前后，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了许多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任务、理论原则和工作方法。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前20条，指明了党委抓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工业、农业工作的具体项目、规划、时机、检查、评比、反浪费、积累与消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试验田、抓两点带中间、参观先进和举办展览会等原则、任务和方法。其中关于生产计划三本帐，对推动“大跃进”有很大作用。毛泽东说：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是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草案第21条专讲“不断革命”。这一条既带有急躁冒进的“左”的色调，又包含要求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去的正确战略思想。他说：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

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第22条论述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思想工

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第23条论述上层建筑中的规章制度问题。这一重要条文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此条认为,应修改或废除不利于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规章制度。

第24—27条,论述如何调整人与人关系主要是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把整风进行到底,以及要有反潮流精神等。

第28—33条讲党委的领导原则、工作方法、开会方法等。毛泽东继续强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党的领导原则,反对分散主义。他要求改善近年来党委忽略抓军事的状况。他还指出: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第34—35条,论述看大局、分清主流与支流问题,认为: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第36条论述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和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第37条指出文章和文件应当具备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第38条主张不能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

第39—46条,要求党的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学习普通语,甚至学习外国文。

第47条要求部省、专区、县三级培养“秀才”。

第48—50条,论述教育问题,特别主张教育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

第51条,要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第52—53条,谈建设化肥厂、农具厂问题。

第54—59条论述农业上的若干具体问题,如单季高产、种子、薯类、绿化、经济作物等。

最后一条,毛泽东提出在1958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他不作国家主席的问题。

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还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及《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 37 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 6 次讲话。

成都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 对反冒进进行了再次批判。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1956 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派和四十条纲要，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在领导方法问题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他还指出，反冒进者把个别的、特殊的東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東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本质。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还重印了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部分按语，并在说明中把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的事件。这样，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调子又提高了一步。

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二) 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指出，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我们的敌人。这里，毛泽东对国内的阶级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又人为地造出了“两个剥削阶级”。这样一个错误分析，必然会导致错误发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

(三) 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在会上，他还对有人提出的“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到盲从的程

度”的说法表示了欣赏。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和态度，明显违背了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思想。在毛泽东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的情况下，对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提倡，必然会助长对于他个人的崇拜。

（四）提出了5到7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并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任务。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强调了发展地方工业，对于支援农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5年或者7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要求全国普遍开展农具改革运动，“在7年内（争取5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成都会议重视发展地方工业和农具改革，想走出一条通过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5到7年就想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显然是脱离实际、难以完成的。它必然会促使各地盲目地乱上工业建设项目。

（五）制定了过高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关于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会议批准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帐的报告》和财政部党组《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第二本帐的简要报告》，提出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会议确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帐，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所确定的第一本帐的基础上，各项指标又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工农业总产值，第一本帐是1435.7亿元，比1957年的1328.6亿元，增长8.1%；第二本帐是1658.2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国家财政收入，第一本帐是332亿元，比1957年的308亿元，增长7.7%；第二本帐是372亿元，比1957年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第一本帐是145.7亿元，比1957年的128.7亿元，增长17.8%；第二本帐是175亿元，比1957年增长41.5%，钢，第一本帐是624.8万吨，比1957年的524.4万吨，增长19.2%；第二本帐是700万吨，比1957年增长33.5%。煤，第一本帐15072.4万吨，比1957年的12861.8万吨，增长17.2%；第二本帐16737.4万吨，比1957年增长30.1%。粮食，第一本帐392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长5.9%；第二本帐4316亿斤，比1957年增长16.6%。棉花，第一本帐是3500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增长6.7%；

第二本帐是4 093万担，比1957年增长24.8%。以上各项指标，完全超过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用这样的计划方案来安排各项生产建设，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

（六）提出了办大社的意见。

在农业合作社规模问题上，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文件不切实际地分析了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扩大合作社规模的需要，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一乡几社规模的大型合作社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提出，反映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盲目贪大情绪，直接促成了1958年上半年部分农村对于大型农业合作社的大办，并为1958年夏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了先声。

（七）作出了对私有制继续改造的指示。

在生产关系问题上，会议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认为残存的个体经济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要求对其进一步实行严格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从提高社员对于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的认识出发，提出降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上两个文件的制定，明显反映了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片面认识，反映了生产关系上的盲目求纯情绪。文件指导下的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消灭和对社员自留地、副业收入的限制，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禁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八）作出了下放权力的规定。

会议还讨论了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物价、商业和教育等方面的管理问题，决定把大量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例如，在基本建设项目审查管理方面，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中规定，今后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审批外，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省、市、自治区审查批准。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有必要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适当下放中央的一些管理权限，但若把权力下放太多，也必然会使中央失去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成都会议关于下放权限的文件，就作出了一些下放不该下放的权力的规定，给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乱上项目，基本建设战线急剧拉长，就与成都会议不适当地下放基建项目的审批权很有关系。

另外,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河南提出的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至多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他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在工作方法上,要搞群众运动,要轰轰烈烈,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他还提出了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2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这一切,也都在相当程度上鼓励、助长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错误。

4月1日至6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召集了由河南、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山东、江西、湖北、上海、重庆等省市负责人参加的武汉会议。会上,毛泽东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肯定了各省市的“跃进”计划,重申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并对反冒进再次进行了批判。武汉会议,实际上是成都会议的继续,它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成都会议的错误。

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不要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毛泽东认为算。

四、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说: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关于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后《人民日报》社论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社论道破了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实质上是急于求成)。

会议期间,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还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贯彻成都会议精神、赶超英国的报告,提出了在今后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15

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口号，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会上，有关部门还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报告，以7年超英，15年赶美为目标，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得到了八大二次会议的批准。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讲特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证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他指出，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在会上，毛泽东还作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关于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在领导工业问题上，毛泽东说，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大会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

这次大会再次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断言1956年出现的是“跃进”。在这种情况下，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都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会上还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举的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

毛泽东的讲话，批评反冒进，号召“拔白旗、插红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从1 200万吨提高到3 000万吨，粮食从5 000亿斤提高到7 000亿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还增选了三名政治局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

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五、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追求经济建设的多与快，同时喜好所有制上的大与公。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了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变成中央的决定和实践，形成小社并大社热潮。

1958年7月，毛泽东产生了关于一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陈伯达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上发表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构想，并说：中国人民将“在不远的将来，继续胜利地到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并大社转为办公社的热潮。

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对徐水的工作，特别是对军事化很赞赏，并提出搞人民公社。大寺各庄连夜行动。8月5日，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全县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根据毛泽东

的号召，要求全县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几天之内，全县 248 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农村，对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大加赞扬。8月9日，他视察山东。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于8月13日登载毛泽东这一讲话，使“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开始兴办人民公社。

对“人民公社好”的由来，李银桥，有一个生动的回忆：

人民公社也是在这种敢想、敢说、敢作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它既是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产物，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次悲壮的探索，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沉重的经验教训。

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在河北徐水，毛泽东在抗洪现场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汇报中，张国忠谈到民兵以连队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这种军事化的形式很解决问题。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说：“还是军事化好。”

以后，这成了一条经验。遇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等战斗中，民兵连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离开河北徐水以后，到了河南省七里营。地方负责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频频点头说：“好么，那好么。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一直是跟在我们身边。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用大字标题登出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上。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公开发表之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逢先知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对人民公社的勃兴，有如下一段评述：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

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是毛泽东提议创办并在他的再三督促下问世的），也就不胫而走，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

六、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17—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的假象深信不疑，致使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 000—7 000亿斤（1957年为3 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 000—10 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1959年达到2 700—3 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又普遍翻了一番。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8年要达到1 070万吨的指标，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前和会议中直接抓的情况下定下来了。在这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就说：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1980年薄一波曾回忆了这件事：

1958年6、7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1957年提出的赶上英国的最高年产量2 200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考，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很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这个口号不对头，我有责任。

.....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107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1070”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北戴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以1 070万吨钢作为当年目标时，时间已过8个月，而钢只生产出400万吨，因此要在后4个月完成700万吨，极为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会上也发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但他最后还是定下了1958年生产1 070万吨钢的决心，认为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为了保证完成钢的指标，他在提出其他措施之外，还规定了六条纪律：对完不成任务的人，不拼命干、搞分散主义的人，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有重大影响“左”的观点（会议予以肯定）：

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会议提出了取消“资本主义残余”等错误观点。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要逐步取消自留地和私养牲畜等资本主义残余，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他还认为，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种认识，完全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它不但导致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社员自留地等的取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直接导致了“共产风”的泛滥、公共食堂等的大办，使各地纷纷大搞庸俗的、空想的“共产主义”，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分配制度方面，会议错误地把工资制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表示要予以破除。毛泽东说，实行供给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靠供给制取得胜利的。他认为，解放后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一个倒退。它助长了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如争等级，争待遇等等。他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批判和破除。要经过几年准备，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这里，毛泽东明确表现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欣赏，以及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他把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原则时取消的“资产阶级权利”，认为在社会主义阶

段就应取消、破除,企图把在革命战争年代起过积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搬到和平建设的年代来实行。这一思想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它不但导致了我国几十年来在分配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错误做法,而且,也成了毛泽东日后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

在人口问题上,会议提出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它认为,现在我国不是人多,而是人少,人多是一件好事,在我国不存在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由于这一错误认识,1958年对马寅初提出的应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忽视了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制定,直接引起了50年代末、特别是60年代初我国人口的骤增,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沉重压力和负担。

在法制问题上,会议也提出了十分有害的观点。认为,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党的决议和政策就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而不需要民法和刑法一类法律。基于这一认识,1959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撤消了司法部,人大常委会也撤消了法制局。此后,一直强调人治,忽视法治。

北戴河会议以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前八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追加的钢铁产量当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9000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80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这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54.8%,而农业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总产值后来核实只比上年增长2.4%。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87.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猛增2/3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合并为26000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

不要钱。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总之，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七、视察中的几件事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又外出视察。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回忆了视察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与李达的争论：

北戴河会议后，我又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驶入河南省。可以看出，北戴河会议虽然有了决议，毛泽东对形势并不是很放心。毕竟是在探索道路，他总有些担心。

专列停在郑州，毛泽东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怎么也放不下心，反复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过七八遍，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提出召开一个座谈会，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去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的十几名工作队员用火车接到郑州来。这些同志一身煤黑和矿灰，洗也没洗就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专列会客室里同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工作队员们开了座谈会。

大家仍然是一片声地说好。也不是报喜不报忧，多数人当时为革命激情所促使，很少能在高潮中冷静下头脑想问题。

毛泽东扭头发现了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便盯着她认真问：“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又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工作队员们都楞住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的人说，无疑是泼凉水的行为，会挨批，会戴“右倾”帽子的。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吴

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没有谁正面回答这句提问。都有些尴尬。幸亏有人拿了大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品尝，才消除了尴尬气氛。

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起来烤制的，大家都说不错。拿面包来的同志说：“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对于大食堂，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新生事物而加以支持，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放心，走到哪里总要问问，想知道真实情况。我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后，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提出大办食堂的好处，汇报了一些优越性。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叫他们把食堂问题写个材料拿来看看。据说这位负责同志马上叫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执笔写了。材料送来，毛泽东阅后批了，发下去了。

以下是李银桥写的毛泽东与李达争论的经过：

毛泽东的活动安排，接见什么人，一般是由叶子龙及高智和罗光禄两位机要秘书负责安排。李达曾求见主席，毛泽东接见他几次，做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与人谈话，不喜欢听面面俱到没有特色的长篇汇报，不喜欢汇报者罗列材料。他要求汇报者要善于动脑筋想问题。

毛泽东喜欢个别交谈，以便交心谈心。在武汉，他喜欢和王任重同志谈心，认为他有朝气，能深入群众。也愿意和李达谈心，和李达主要是谈哲学。

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他比毛泽东大6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对毛泽东很敬仰，每次见到毛泽东都显出激动，眼里闪着兴奋喜悦的波光，不像一个年近70的老人。毛泽东对李达这样的老同志也是很尊重，谈话时既严肃又亲切。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朱德、陈毅的诗词，郭沫若、李达的文章，他都注意看，并谈出意见。他让王任重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谈文章，谈哲学。

1958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与李达谈话是畅所欲言的，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李达谈文章时，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感谢主席关心他的工作和文章,说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

毛泽东又说了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他特别赞赏“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说他还要重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为青年写一些文章。

在一次谈心中,毛泽东说到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由此谈下去便谈到了哲学上。

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实际生活中,毛泽东是不全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在天津新立村,人家汇报亩产10万斤,他就摇头说靠不住。在湖北,王任重同志也向主席汇报过类似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说:“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他说的是省农村工作部长。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毛泽东是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说、敢想、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的。他不慌不忙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

两位老人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也举了各种发明创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

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争论到后来,有些激烈,和普通人一样,是就问题论问题的争论激烈,并

不是对着人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人在争论中是不好控制情绪的，毛泽东虽然激动，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了。停了停，缓和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里喝茶默想。

后来，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60而耳顺。我今年65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

后来，毛泽东在湖北农村视察中，有人汇报“挑灯夜战”，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了。

毛泽东也是冷静地说了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的话，要求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

第三节 几个月的纠“左”

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在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高潮中，毛泽东视察了南方几省市及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混乱现象，“与秋冬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毛泽东：《十年总结》）。于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上旬召开的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郑州会议举行于11月2日至10日，是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并带领到会人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著），谈了很多观点。

会议认真研讨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

一、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11月10日的讲话中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他明确指出：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他认为，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现在看来，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明确提出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当时存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二、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大发展。由于混淆了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在他们起草的文件中对商品生产避而不谈。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多次批评这种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意见。11月9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36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分析了一些人害怕商品生产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

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32年前讲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富有启迪。

三、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认识。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了解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以澄清当时不少干部的模糊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在会上,毛泽东和与会同志一起,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1月10日,他讲了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他说:这本书我过去也看过一遍,不大感兴趣,现在一看就不同了,现在要来搞清这些问题。我看,这个一、二、三章里头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还逐章逐段谈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常用读书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令人感悟到颇有高屋建瓴之势。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过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一是《郑州会议记要》,后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定稿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然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问题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个头。

二、八届六中全会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着重研讨了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为八届六中全会作了进一步的准备。毛泽东在会上又就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讲话。毛泽东在会上

的讲话，除了重申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论述过的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一、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23日，他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又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结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到2 700到3 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今年搞到1 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 200万吨，有没有把握？你说我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尽管这次会议压缩后的指标仍然是过高的，但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要求。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讲话时提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一定说他没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还讲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经过这一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说是那一种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三、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决议中要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要专把作假搞一条，工作方法写一条。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这个东西人家就不注意。因为现在横直是放卫星，要有名誉，他没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撒谎。我看，没有一项里头没有假，有真必有假。这也许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说没有假，哪有真呢？真是因为有假比较才叫真。问题是我们自己也相信那些东

西。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诙谐地说：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件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有旱往哪里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要懂得作诗同搞经济、办事有区别。因此，毛泽东强调要讲实话。他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讲成绩多，就脸上有光，得到奖励。一定要讲实话，比如讲尾巴在牛屁股后面，这是个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在后面的。

四、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五、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大过高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扫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的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要使它为我们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资产阶级法权有用的这一部分，你给它破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就是了。陷于被动，我们要扶起来，承认错误。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体分析的。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进一步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25日对云南省委关于处理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语。批语说：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

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全会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解决了人民公社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如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等。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讲到“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时，他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要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在讲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说：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讲到“两种可能性”时，他再次强调：我们总是讲两种分析。一个事物中间总是有两种对立的東西。现在我们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从毛泽东的这些话来看，他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巩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中间的某些东西会垮掉，或者说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还讲到他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希望大家赞成。他还说：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会议讨论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在1959年4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上，中共提名经大会选举，由刘少奇担任了下届国家主席。

三、整顿公社56字方针的提出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全国各地农村贯彻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继续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问题，以期进一步解决。1959年1月底2月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2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这是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他还说：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关于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是坦率而真诚的。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他发现，由于公社化，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还有问题。于是，他提议并主持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从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会议结果是，同意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制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个内容的《郑州会议记录》，下发全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中心思想是强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进一步解决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

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对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一个批语，进一步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内部还讲了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接着在3、4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相当原高级社的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后一个文件进一步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有的地方叫生产队，大体相当原来的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并且决定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帐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毛泽东强调：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否则，群众不能解怨气，干部也会被毁掉。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中央督促各地召开省、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包括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以至一部分社员，使中央的精神和政策同最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见面。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触及了一些实质性问题。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对他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他在3月1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思想观点形成的过程。他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毛泽东请胡乔木把这封信在会上宣读一

遍。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尽管当时纠“左”还不彻底，但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全国农村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进行整社过程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对各地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指导。

当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即是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月15日，毛泽东就此问题写了一份党内通信。他在信中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来此，和王任重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

(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为了讨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问题,3月17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党的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四、称赞陈云 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主要生产指标。上海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形成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5日)通过了这个会议纪要、《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

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些批语、党内通信,并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问题。

3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城市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谈了看法。他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

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的。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文件决定“旧帐”要清算、要退赔，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中平调生产队和农民的物资、劳力等，被称为“旧帐”。第二次郑州会议规定“旧帐一般不算”，而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期间，根据各地整社中农民的要求，又决定“旧帐一般要算”。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写了一段批注，说明算帐的必要性。他说：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4月3日，毛泽东又对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麻城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注，说明算帐的好处。他写道：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静；算帐才能教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四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认真（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同日，毛泽东又对谭震林关于省六级干部会议和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来信作了批语，继续阐述算帐的必要性。他在批语中说：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

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帐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帐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指出：“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人民公社应“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又要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向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的办法。规定小队也应有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是第一次。

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了工作方法问题。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共16条：一、多谋善断。二、留有余地。三、波浪式前进。四、实事求是。五、要善于观察形势。六、当机立断。七、与人通气。八、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由他挂帅。十三、要解放思想。十四、关于批评。十五、集体领导。十六、和各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的联系要加强。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反对高指标，提出了正确意见。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的主要生产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万亿斤，棉为1亿担。当时陈云向胡乔木提议不要公布，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还是在公报内公布了。1959年1月，陈云再次提出，四大指标难以完成。但是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公布四大指标的做法，多次讲到陈云提出的正确意见。4月5日，他在会上说：1月25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

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他还说：去年武昌会议的公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是不是不写，被顶回去了。

八届七中全会决定把钢的生产指标降为1 65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指标还不放心。陈云没参加上海会议。毛泽东在会后委托陈云就落实钢铁指标进行研究。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11日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中提出，将当年的钢产指标由1 650万吨落实为1 300万吨。5月15日，陈云就钢铁指标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参加研究钢铁指标问题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的可靠指标，定在900万吨……把将来超过900万吨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 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不仅在北京如此，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就全局看来，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为了使计划不再变动太多，我认为以900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意了陈云的建议。1959年钢生产的结果为1 387万吨。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称赞过陈云。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他说，陈云同志老早就提出，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说那个时候有个同志不赞成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1962年初召开的7 000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同志。第一次整理的讲话稿中还有这些话，后来修改稿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被全部删掉了。

陈云是当时党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主席，衷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但不唯上、不唯书，唯的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客观规律。因此，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日益脱离中央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陈云又曾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有些时候曾被免去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

然而，毛泽东对陈云多次对“大跃进”中高指标提出不同意见是肯定的。陈云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建议，不要公布1958年粮食和钢铁的指标，以免陷入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及此事，赞扬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

在八届七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还号召“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当时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16条》时说：“在

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订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

关于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海瑞精神，当时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有一段生动的回忆。他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文写道：

1959年4月初，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便问我：“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他说：“不是。刚才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他对我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他还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他又说：“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毛泽东又谈到人定胜天的问题，他说：“这一点是我同四川的农民，从成都到武汉沿路的同志，同党内一些同志，同鹤鸣兄的分歧。四川的老百姓一怕老天爷，二怕瞎指挥。我毛泽东管不了老天爷，马克思也管不着。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一方面要‘听天由命’，另一方面要‘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井冈山时只有几个人，可是后来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尊重科学。……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的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

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他说：“1958年12月26日你写信给

我，实际上是否定三面红旗，我打击你没有？你同我唱对台戏，我保护了你。”我笑着说：“我只是奉你的命令及时反映情况，没有下结论，你抓不住我的辫子。”他又问：“你有顾虑？”我说：“有。”他还问我：“你敢当海瑞吗？”我回答说：“我不敢。何必呢？”我同主席直来直往，是因为有历史原因，是他把我当做“小伢子”，是他多次要我对他讲真话，我就讲了，从来未克我，我的胆子就大了些。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继续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倾向，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讲真话等问题，向全国六级干部提出了重要意见。关于讲真话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末尾一段，他不无幽默地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尽管这封信纠“左”还不彻底，信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设想也不可能那么快，但是它对抵制“左”倾错误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了很大支持，对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毛泽东这封信的作用，逢先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书中追述田家英当时在四川农村调查活动时写道：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

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从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归社员所有。6月11日的中央指示说：“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6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要求缩短战线。在6月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

第四节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1959年7月上半月为第一阶段，即8月初毛泽东说的“神仙会”；7月下半月为第二阶段，会议由纠“左”急转为反“右”，气氛格外紧张；8月上半月为第三阶段，即八届八中全会。

一、回故乡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先去了湖南，并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机要秘书高智在《领袖泪》一书中回忆了随毛泽东去湖南的经过。他说：1959年6月17日，毛泽东叫我去。我走进书房，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卫士轻轻叫他一声，他看到了我。说：“高智，我明天要出去。”

“到哪儿去？”

“湖南，江西。”毛泽东说着，作个手势：“以后出门，你们两个秘书轮流去，不用都跟着走。这次就是你跟着去吧。”

回来我就找了罗光禄同志。我说：主席交待，以后他外出，我们一个人跟着去，一个人留家里筛选文件，这次的意思是我先去。

6月18日，我随毛泽东离京。先到了湖南。毛泽东喜欢游泳，游遍了中国的江河湖海。这次到了湖南，又是夏天，身边就是湘江，我就问：“主席，要游泳不游？”

“不游。”毛泽东不知为何没了兴致？

“是不是准备一下？万一要游……”

“不要准备。”毛泽东干脆一句。

我的经验，毛泽东交待了的事情就必须照办，不能自作聪明，自作主张。他说不能准备，你要是准备就肯定要挨批。

第二天，毛泽东坐船游览湘江。罗瑞卿要让当地做游泳准备工作，我忙说：“罗部长，不能准备。我问过主席了，他有交待。”

“那也要准备呀。”罗瑞卿尽心尽责，要对毛泽东的安全有保证。“万一主席要游呢？”

“那也不要准备。因为主席讲了话，你还准备就准挨批。”

罗瑞卿问：“不准备，发生问题谁负责？”

“发生问题我负责，你不要准备。”

毛泽东在长沙同湖南省委领导人谈话中，透露了想回故乡看看的口风。6月25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陪同毛泽东回韶山。卫士长李银桥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对毛泽东的故乡之行作了如下回忆：

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住在韶山宾馆。

他看了看故居。在门口，他站住脚环顾周围，大概是回忆幼时的生活吧，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指着门前的水塘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见过长江。”

我们跟随毛泽东去看望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的，也有比他辈数高的。有个长胡子老头，毛泽东一见面就说：“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他们坐下来聊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

毛泽东访问了几户农民，在街上转一圈，还去小水库里游了泳。岸上围了许多群众。

毛泽东一边在水里自在地游泳，一边向乡亲们招呼道：“都下来游泳啊！”乡亲们有的摇摇头，有的说“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看一看我们，冲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

于是，他一会儿仰游，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舒坦轻松；一会儿“坐凳子”，真像坐在竹凳上，从容自如；又点燃了烟抽……岸上的乡亲们，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上嘴。

毛泽东游完，上岸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座谈会，了解家乡的生产和乡亲们们的生活情况。

……

毛泽东的激动和不平静是显而易见的。夜里他睡不着，靠在床栏上，用报纸垫底，上面放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嘴里念念有词。他作诗时才会这样。

哼来哼去，折腾有两个多小时，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出那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吟罢，又拿笔写了一行字：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小封啊，”毛泽东召唤值班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封耀松叫来了秘书。毛泽东吩咐秘书说：“你把这个拿去眷一眷。”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7点钟起床，围绕村子转。我们以为是散步，跟在后面随行。毛泽东转着转着就转到对面一个山坡上。

山上有个孤零零的坟包。毛泽东走到坟前便低下头去默立。这时我才明白，那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

警卫局沈同副处长忙去旁边搬来一把青翠的松柏枝，递给我。这时，毛泽

东对着坟墓深深地鞠下躬去，前后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

我等毛泽东鞠完躬，便将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松枝，恭恭敬敬放在坟头上。又默立片刻，然后才离开。

整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说话。

离开父母的坟后，毛泽东视察了韶山冲所有的稻田。他发现对面山腰樟树丛冒起一股青烟，一个短发妇女正用耙子把草丛中的枯枝败叶搂出来，放进火里焚烧，便走了过去。

短发妇女闻声猛回头，看见是毛泽东，便抱起孩子一面大声喊着“毛主席来了！”一面把我们带进一栋干净宽敞的堂屋里。

毛泽东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坐在竹凳子上，抽着烟，亲切地同大家拉起家常来。他先问：“这栋房子住几家？”又问他小时候的好朋友土地老倌和四道士有没有后代？

大队党支部书记指指短发妇女介绍说：“她就是四道士的儿媳妇。”

毛泽东高兴地问她：“我怎么没见过你？”

她回答：“你老人家1927年就走了。我是1931年生的，所以没有见过呀！”

毛泽东又问：“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是如意亭的。姓汤。”

毛泽东摇摇头：“如意亭没有姓汤的。”

“我小时候从宁乡逃难来的。”

毛泽东点点头。发现她穿着解放鞋，便问她爱人是不是解放军。当得知当过志愿军时，就说：“你是军属啊！他在外面打美国鬼子，你在家打美国鬼子，你们俩都打美国鬼子。”

那妇女说：“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毛泽东又问：“今年每亩能收多少稻谷？”

这一回，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因为当时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双千斤，甚至上万斤的有的是。他们怎么说呢？

正在为难之时，有人爽爽快快地回答说：“亩产800斤。”

毛泽东摇摇头：“能产800斤？依我看，平均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要实事求是，要计划种田，要科学种田。”说着，看看大家，又风趣地说：“我看见韶山的稻田绿化了。但山上树不多。韶山人多山多地少，要腾出田来种庄

稼。”

大伙点点头：“感谢毛主席……”话没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力量大。”

二、神仙会

所谓“神仙会”，主要指会议气氛轻松，一方面是会上可以畅所欲言，因为纠“左”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愿；另一方面是会场外赋诗谈词，看戏观景等。毛泽东当时轻松自信的心境，是促成“神仙会”的主要因素。

6月28日，毛泽东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在山下，他谈话提出了13个问题。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预备会议在山上开始，传达了他的谈话。7月2日，毛泽东在山上又讲了一次话。两次合计谈了18个问题，周恩来建议加了国际形势问题，共19个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内容。这19个问题是：1. 读书。2. 形势。3. 今明年的任务。4. 4年的任务。5. 体制。6. 食堂。7. 学会过日子。8. 恢复三定。9.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10. 综合平衡。11. 生产小队改半核算单位。12. 农村党团作用。13. 宣传问题。14. 质量问题。15. 对去年的估计。16. 群众路线。17. 全国协作关系。18. 团结问题。19. 国际问题。

关于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给县社干部编3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有缺点、做错了事的。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大体10万字左右，十天读完，还要考试。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关于形势，毛泽东把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3句话，接受和归纳为会议的方针。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是在两者之间。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有一个同志周小

舟所说的，“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关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去年以来，1年半中，许多政策执行的结果，成为一条腿，基本问题是：（1）综合平衡，（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4个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问题。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要两条腿走路后，反而一条腿了。

毛泽东说，今年1300万吨钢，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1000亿斤，1964年搞到1万亿斤。明年钢增加多少？加400万吨，是1700万吨，后年再加400万吨，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去年做了一件蠢事，把好几年指标要在1年达到，像粮食的指标10500亿斤，恐怕要4年才能达到。

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农、轻、重为序的方针说，过去安排计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6亿5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什么叫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关于宣传问题，毛泽东说，去年有些虚夸，4大指标定高了，今年弄得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

关于综合平衡问题，毛泽东强调地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3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关于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关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说，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

不要搞垮了，保持 20% 也好。

关于恢复三定，毛泽东说，定产、定购、定销，看来非恢复不可，3 年不变。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的减，自留地不征税。

关于学会过日子，毛泽东说，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 4 800 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过日子。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河南 120 万基层干部，40 万犯错误，3 000 受处分，是个分裂。统一思想，对去年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 1、2、3 个指头的问题。

从毛泽东提出的这许多问题和讲话精神看，他是继续推动大家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大前提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动员全党完成 1959 年的“大跃进”任务。他不认为有多大的了不得的问题，更毫无服输之意。他又赋诗，一首，充分表现了他的心境：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正式会议于 7 月 2 日开始后，分 6 个大组座谈（按大区分组，如中南组、华东组等）。与会者依照毛泽东规定的会议方针和问题，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各种见解陆续摆了出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作了进一步的批评。彭德怀在西北大组会上连续作了 7 次发言，坦率地讲了不少看法。朱德着重批评了公共食堂作法，认为参加公共食堂要实行自愿的原则。

会外，人们进行着各种漫谈。李锐与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周小舟、周惠几位“老关系”，还进行了私下的大胆议论，尤其对毛泽东有所议论：除谈论毛泽东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他的短处。如，田家英当时说毛泽东有任性

之处，常有出尔反尔之事等。他们还感觉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1958年不到前台指挥就好了。这些“危险的交心”，当时并无“危险”之感，因为他们颇感自己的看法居于上风。

当然，李锐、田家英等在会上发言时，觉得还有压力，讲话时时常被人顶住。

三、由纠“左”转向反“右”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谈话，对会议作了到15日的初步安排。他指定：会议讨论中的10个问题由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李锐起草一个会议纪要，胡乔木任组长。形势、任务、群众路线等7个题目，由李富春起草文件，作为向中央的报告。体制问题由李先念搞个规定，粮食问题，修改后作为正式文件发。

毛泽东在会上又谈了形势问题和团结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是？失的是什么是？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

他提出，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70%的人在总路线下面。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毛泽东又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我们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毛泽东讲到报酬和要按劳付酬时说，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杀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

对党内讲的，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建设中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批评了党内的右倾思想情绪，显然是认为在纠“左”中存在着右的问题。但他这时的思想，主要还是放在工作上纠“左”方面。7月11日晚上，毛泽东找他过去和现在的几位秘书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气氛融洽，还有些自我批评的话。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又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周小舟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此，毛泽东也听得进去。周小舟、李锐、周惠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云出来主管为好。毛泽东表示同意，让陈云当总指挥，说陈云有长处。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

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后，彭德怀感到会议上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够，“左”的思想仍对人们有压力，因而“非常忧虑”。又看到会议不久将结束，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又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产生了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意见看法的想法。周小舟曾劝他不要写信，亲自找毛泽东去谈为好，并说自己同毛泽东交谈，还是能听得进去。

7月13日晨，彭德怀到毛泽东处，要谈一谈，因为毛泽东刚睡下，没谈成。当晚便起草信稿，14日晨要参谋抄清，送给了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分作两大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首先肯定了“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尔后着重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基本精神，希望能更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建设工作。其中所谈的许多具体问题，本来也是大家在会上谈到和毛泽东所讲了的，但在总的观点上，却是超出毛泽东纠“左”所划的框子范围。

彭信写道：1958年的基本建设过急过多了一些，由于对此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等于说，1959年搞继续大跃进是错误的。

彭信认为：“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的估计，与毛泽东所认识和愿意承认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彭信说：“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种批评，显然是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彭信批评说：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他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这种批评，不仅有否定当时“政治挂帅”这个最时髦口号之一的嫌疑，而且似有针对提出这一口号的毛泽东的动机。

彭信中一个更加有份量的观点，是认为1958年犯“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出其表现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而“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几乎等于说1958年是犯了同历史上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类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信后，于7月16日给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同日，又调在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克诚总参谋长上山参加会议。

但是，是否在这时毛泽东便决定了像后来那样对彭德怀展开反击，或那种反击的方法，倒不一定。一位参加会议又了解较多内情的李锐认为，这时“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

7月17日下午至晚上，毛泽东找了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5人去谈话。谈得多而融洽。毛泽东说：关于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

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毛泽东又说，1959年钢产量降下来定为1300万吨来之不易，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了干劲，指标没完成没关系。毛泽东又从彭德怀的信讲到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分区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即说到了彭德怀的“历史帐”。毛泽东的用意，似乎是要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他的，不要站到彭一边。

会议各组从7月17日开始，在讨论会议记录即《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同时，又展开对彭德怀的信的讨论，而且后者很快成为议论的中心。许多人赞成彭信中提出的观点，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7月17日上山的黄克诚，在指出彭信有不少漏洞的同时，很赞成信的基本观点。周小舟在19日的会上明确表示：“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但是，有人又提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更有人提出彭信的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等。还传出了彭德怀在西北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这样不冷静的话。又传出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话。

7月20日，毛泽东找各组组长（大区负责人）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着头皮顶住。他还说，要印发《阿Q正传》，使大家受点启发，不要像阿Q一样，自己的缺点、毛病动不得，一触即跳。

李锐当时还听说，毛泽东同王任重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说“现在我不发言。”

可见，毛泽东这时对彭德怀的信以及许多支持彭信的言论虽然反感，但还没有恼怒，他还准备硬着头皮听下去。但他毕竟是要出来反击的。用他最喜爱的军事术语说，叫“诱敌深入”或“后发制人”，用1957年使用的政治术语说，叫“引蛇出洞”。

终于，毛泽东被张闻天7月21日下午的长篇发言给激怒了。

张闻天同彭德怀一样，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有着深刻的认识，但都感到“神仙会”上问题还没有讲透，缺点还没有摆够。因

而，张闻天对彭德怀的信非常赞赏，甚至张本人也曾经准备给毛泽东上书。对于张闻天准备写信和作长篇发言的动机和过程，他当时的秘书萧扬在《回忆张闻天》书中说。

然而，在领略匡庐风光的同时，闻天同志心中不免有一丝牵挂和忧虑。庐山会议本来的宗旨是继续纠“左”，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毛泽东同志一上山说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闻天同志在山上接触了一些同志，觉得不少同志确实感到“问题不少”，但是又感到要在会上真正把问题讲透，也不容易。毛泽东同志号召读书，会上发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闻天同志确实读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闻天同志本来就很熟悉。他本来就认为问题正在于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这一段时间里，关于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容破坏之类的经济问题，闻天同志确实同我谈过不少。但是他这时所想的，已经远远不仅是个经济规律的问题了。

就在这几天，或稍后几天，闻天同志向我讲过骄傲的问题。他说：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头脑，不过不说罢了。闻天同志还谈过集体领导问题。他说，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我后来得知，闻天同志在上山前和上山后和彭老总的接触中，也涉及这些问题。在山上，彭老总一次来访闻天同志未遇，见我独自在看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便问我看书后对国内形势有何感想。我答，去年的浮夸比较严重。彭老总沉吟了一会，说，有人虚报，也有人愿听，听得进。彭老总和闻天同志的忧虑是共同的。

7月10日左右，闻天同志对我说，我们来合作，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吧。闻天同志就是这样民主的。他不以长者自居，更不摆首长架子，对我这个年龄比他轻三十岁，革命经历更无法相比的小秘书，说话总是这样平等的。他解释说，讲话多一句少一句容易出毛病，还是写成文字好推敲。他交给我一个简单的提纲，又同我谈了谈要写些什么。内容大体上就是后来他在小组会发言中讲的那些，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闻天同志要我写得具体些，才能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遵照他的意见，我写了一个稿子。但是，以我的水平要表达他的深刻思想，显然是力不能胜的。闻天同志觉得，我写的稿子太空

洞，也许还觉得它没有修改的基础，就把它搁下了。后来在下庐山前夕，闻天同志把它撕毁了。

7月16日，彭老总给毛主席的信印发。围绕着这封信，会上隐约存在的两种意见的对立逐渐尖锐而且强烈起来。对彭老总的批评和非难在逐步升级，形势对彭老总是很不利的。闻天同志和一些同志一样，因为会议中这种不愿讲缺点的空气而感到受压抑。彭老总对此大概也是不满意的。有一天，记得是会后饭前，彭老总同闻天同志站在闻天同志的屋外。我在屋里，没有听到他们开头的谈话。但是后来彭老总的声调激昂起来：“……那列宁、斯大林论党就要少一条，毛泽东论党就要少一条！”彭老总大概是在说怎么能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除了和彭老总的接触，闻天同志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同志也有来往。

彭老总的信印发后两三天，闻天同志下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了。这回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一个详细提纲。三十二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还用红铅笔作了好几种醒目的记号。我只帮他 from 会议文件中找了几个数字。

在闻天同志准备提纲的过程中，田家英同志来了一个电话，我请闻天同志接话筒。打完电话后，闻天同志告诉我，田家英要他别讲某个问题，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但是，闻天同志却说：“不去管它！”说完即匆匆离去，继续准备提纲。作为一个小秘书，我也向闻天同志表示了我的心：从会议的气氛来看，闻天同志这个发言是不合潮流的，后果怕很难说。但是闻天同志还是按他原先准备的发了言。他那些话久已郁结在胸，不能不表而出之了。

7月21日上午，闻天同志把发言提纲最后准备完毕，站起身来对我说：“我准备的就是这样了。”当天下午，闻天同志毅然而又自信地走向华东组的小组会场，神态却仍像往常一样安详。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同志，会上已有华东局的两位同志担任记录。但是闻天同志仍要我跟他去，以便会后能迅速地将他的发言整理成文。

那天下午的会，只有闻天同志一人发言，他足足讲了三个钟头。会上的气氛确实相当紧张。闻天同志的话多次被打断。有几位同志在不同的问题上插话，插话或长或短，都是表示不同意闻天同志的意见。闻天同志毫不让步，只是重复自己的观点，或者就像不曾被打断那样，按照原来的思路继续发言。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免为闻天同志捏把汗。但是，闻

天同志还是一口气把话讲完了。会议最后，柯庆施同志说：“洛甫同志把意见都说出来，这是好的。”至于闻天同志所讲意见是否正确，柯庆施同志没有说。但是他在闻天同志发言过程中插过话，其反对闻天同志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对闻天同志说来，这篇发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能够站得住的。会开下来，我不无忧虑地表示耽心他的发言可能会遭人批评。他说：有可能，但也不一定。他表示，他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那天晚饭以后，他让我把他的发言提纲送给彭老总看，后来我知道，彭老总赞扬这篇发言“讲得很全面”。可见彭老总对这篇发言也是有信心的。闻天同志还对我说，他这篇发言也许能够导致会议讨论些问题，也就是说，能使会议认真总结“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这正是他发言的初衷。可惜，闻天同志提到的逻辑的严密，以及他不曾提过的事实的确凿和理论的正确，都是按照常理而言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这篇发言只能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追求。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年5月提出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等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认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黄、张、周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内外国内外议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党校学员、解放军指战员、党外人士和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代表人物）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以及对领导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其中也有否定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意见。毛泽东把这些批评和意见当作对党的攻击，并且把它们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于是得出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这种错误判断下，他决心发起反击。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

毛泽东讲完话后即散会。彭德怀在门口挡住毛泽东，说他的信是给毛个人写的，没让大家来讨论。后来彭德怀回忆说：“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毛泽东的讲话，也使他周围的人产生了极大忧虑。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都感到不能接受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认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然后三人来到了黄克诚住处。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正巧彭德怀有事找黄克诚，也来到黄的住处。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50步了。”我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天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

从7月23日下午开始，6个小组开会讨论毛泽东23日上午的讲话。7月26日之前，发言的人态度都还是比较冷静的，语气也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

还是比较正常的。对彭信的批评也基本上没有脱离信的本身，不过说法轻重不同而已，只有少数人调子比较高。许多人的发言还着重做了自我批评。

7月26日是庐山会议的一个关键日。这天各小组都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还印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毛泽东对它的长篇批示（即《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批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批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批示最后说：“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毛泽东7月26日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使会议进一步升级加温，就不只是信的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了；就不是无组织、无准备的了，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了，而是“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文班子”、“武班子”、“彭为元帅、张为副帅”，以及彭信和张闻天发言是“反党纲领”、“配合帝国主义反动派向党进攻”、“矛头指向党的根本路线”、“要逼毛主席下台”等了。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等大局出发，彭德怀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加之当时两位老战友感人至深的长谈，彭德怀转而承认错误。7月26日，彭德怀、黄克诚检查，27日，周小舟检查。

总之，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和7月26日批示等的号令下，会议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纠“左”工作被完全抛开，反“右倾”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紧张。

四、八届八中全会

毛泽东认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因此，他断然放弃了继续纠“左”的努力，转而发动彻底的反右倾党内斗争。基于这种错误判断，毛泽东7月29日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路

线，彻底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和“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他一面下令派飞机接在各地的中央委员上庐山，一面召开中央常委会，对彭德怀作全面的历史清算。

从7月31日至8月1日，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常委会。毛泽东联系现实回顾历史，提出31年中同彭的关系是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招兵买马，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最后，彭德怀表示：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可以种地。

中央常委会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冤案已全面构成，只待八中全会形成决议。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他们说没有民主，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说要自由，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自由。他们对9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过。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我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共产风等问题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

8月3日起，会议分三个大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进行批判斗争。周小舟讲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揭露后，斗争更加尖锐化。

8月11日，毛泽东再次在大会上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批彭，说彭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变过来，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格参加党的。

8月13—15日，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在全体大会上作检查。批判进一步加码，逼迫彭德怀承认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彭德怀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后来彭在《自述》中写到自己如何作检讨时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

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 30 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8 月 16 日，毛泽东再次在全体大会上讲话，说庐山会议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他还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总帐。同时又提出说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作为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林彪插话说，这次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和建设上的大马鞍形。

同日，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提出：“庐山上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 10 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说：“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 20 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八届八中全会最后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中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然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党、全军、全国开展了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到 1961 年为止，有很多干部和群众受到批判、处分和其他处理。据 1962 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几年中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 36.5 万人之多。

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是，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新的“大跃进”重新兴起，并部署由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导致共产风再度刮起，还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从而直接造成连续 3 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在政治上，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

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第五节 同赫鲁晓夫的斗争

一、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之争

1958年是中苏关系逆转的开始。毛泽东后来说过：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想与苏方把1955年以来同赫鲁晓夫商谈的中苏军事合作的某些主要问题落实下来，以加速国防现代化。其中主要包括建立中国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原子武器运载工具即导弹，建立军事航空工业及舰艇建造等。赫鲁晓夫与彭德怀谈话，基本同意了彭的要求，并商定，由双方有关军事部门协商解决，原则上决定苏联在远东的海、空军将同中国合作。

但是，赫鲁晓夫却将中国希望合作的愿望当作插足中国的机会。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6月，中共中央复电苏方，表示建台可以，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为中国。

7月，苏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问题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同刘少奇谈了又同毛泽东谈。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毛泽东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报告后，急忙于7月31日来到中国，同毛泽东会谈。当时负责翻译工作的李越然，回忆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这次会谈的整个过程。会谈中毛泽东断然拒绝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两人还谈了国际形势

及中国正在展开的“大跃进”等问题。李越然在《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一书中写道：

1958年7月29日，阎明复从居仁堂那边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是中办翻译组长。我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地点在中南海丙区，就是紫光阁那边。

“李兄，有要紧事情。”我比明复年龄大些，他称我李兄，“你赶紧过来。”

“什么事？”我问。

“有重要工作，你赶紧过来，杨主任找你。”

我赶到居仁堂，明复同志向我介绍情况：

苏联方面通过驻华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表达了苏联领导的一个意思：希望与中国搞个联合舰队。尤金第一次来谈，毛泽东便严肃地问他：“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有些恼火，谈话的情绪是激烈的。

尤金把毛泽东的反应即刻报告了莫斯科。接到尤金的报告后，赫鲁晓夫决定自己来北京。

走得如此匆匆，直至到莫斯科机场前，才通知中国大使去送行。

阎明复告诉我说：“尤金两次来，都没有讲清楚，主席很火。赫鲁晓夫马上就要到，杨主任让你参加翻译工作，所以找你来。”

我们一道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杨主任把主席和尤金的谈话过程又介绍一遍。

听了情况介绍，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大的争论。

隔一天，7月31日，赫鲁晓夫便来了。我随毛泽东到南苑机场，参加迎接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在候机室等候时，气氛比较严肃，不像过去那么轻松愉快。大家很少说话，毛泽东也不像过去喜欢和尤金谈论哲学，这次没多少话谈。

赫鲁晓夫乘坐的“图104”客机缓缓落下，我方领导人迎上去。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只是同赫鲁晓夫握手致意，互相寒暄着走进会客室。

在会客室稍坐片刻，毛泽东一般介绍一下国内情况，记得只说了一句：“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

刘少奇同志接过来：“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露出一种异样的笑容，眯细了眼说：“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

好办，可以给我们。”

没多谈，宾主便乘车从南苑直驶入中南海。

毛泽东陪赫鲁晓夫走进颐年堂，邓小平和杨尚昆参加会谈，刘少奇和周恩来没参加。

“路上还好吧？”毛泽东随便问一声。

“还好。”赫鲁晓夫点头：“你健康吧？”

“自我感觉良好。”毛泽东请赫鲁晓夫坐下，自己也坐下，点燃一支烟后，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意思，但说不清你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回忆这次会谈，大致的内容如下：

“尤金没讲清楚。”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的意思。然后说明自己的想法。意思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云云。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有十几分钟，加上我们翻译，就讲了有半个多钟点。毛泽东神色肃穆地静听。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听得仔细，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抬手做个果断而简洁的打住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做笑脸，有些不自然。“尤金告诉我了，您很火。尤金没讲清楚。我们只是有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憋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

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我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主席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

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中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耸耸他的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了两只胖而小的手,带着鼻音嘟囔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赫鲁晓夫一句。去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谈。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提高一些音调:“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误解。”说着,赫鲁晓夫愤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毛泽东去年对哥穆尔卡说过:“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他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拂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

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的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懑，他在不高兴或愤怒时，眼睛便眯细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涉及主权的大事，是不行的！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足够坚强，他忽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经过这场激烈的争论，结果赫鲁晓夫表示：“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

“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是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 and 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这次会谈是一下飞机就开始的。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毕生都格外珍重。

第二天，毛泽东在游泳池等候赫鲁晓夫，准备第二次会谈。

我先到了，见毛泽东已经换了游泳裤，穿了一件浴衣正在做准备活动。我走过去问候，在谈起昨天的现场气氛时，主席说：“对赫鲁晓夫这个人，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当然也不是什么都去碰他。”

这是室外游泳池，白磁砖在阳光下亮得耀眼。旁边摆了藤椅。藤桌上有茶水和香烟，藤椅摆放的格式是准备会谈的样子。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首长来了，他们显然也是来参加会谈的，阵容比昨天大。毛泽东随便穿一件浴衣，光脚踩一双拖鞋，另外三位首长衣着整齐。

毛泽东聊天中照例是讲辩证法，那段时间他经常讲辩证法：“我们都要学点唯物论、辩证法。这里可有学问哩！客观事物复杂着呢，一切都处于运动中，一切都在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聊天一般毛泽东讲的多些，其他人偶尔插几句话。

赫鲁晓夫到了。

毛泽东就那么穿着浴衣，踩着拖鞋同他握手寒暄几句。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问：“你睡了会儿吗？”

毛泽东不加掩饰地说：“心里有事，睡不着。”

他们在藤椅上坐下来，开始第二次会谈。

关于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已经在昨天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今天未再谈这个事，转而谈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双方不是分歧很大，反对帝国主义双方是共同的。赫鲁晓夫既然不再要求建联合舰队，无求于人便主动许多，谈话口气也比昨天大了。

谈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事，赫鲁晓夫对中共就此事所做的反映不满，说：“你们为什么往我们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微笑着，心平气和又十分坚定地说：“我们不是抛石头，我们是抛金子。”

赫鲁晓夫表现出同样的坚定，断然道：“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

毛泽东仍然是面带微笑，平声静气：“不是你要不要别人的金子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没再说什么。

从国际形势又谈到中国国内形势，谈到中国的“大跃进”。

赫鲁晓夫摇头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

从大跃进谈到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

赫鲁晓夫仍然摇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儿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讲到这里，赫鲁晓夫将话锋一转，说，“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考虑亚洲的事情。”

这种近乎“划分势力范围”的谈话，自然又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他做个手势说：“这样分工不行，各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你们比我们熟悉一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赫鲁晓夫无奈地又望着毛泽东，无论如何，他们始终谈不到一起。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毛泽东提议，“我们游游泳，凉快凉快。”

8月3日，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毛泽东到机场送行。

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

1959年9月底10月初，赫鲁晓夫来中国出席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次会谈不但未能解决双方的任何分歧，反而加深了矛盾。

关于1959年这次会谈，毛泽东1963年回顾说，1959年赫鲁晓夫在印度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单独发表了一个声明，名义上是中立，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他从戴维营回来就来教训我们，那一次也是谈得不欢而散。

中苏关系在1959年继续走下坡路。

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怕西方国家知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对1958年毛泽东拒绝苏方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要求的报复，同时也是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进行交易的需要。

9月，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将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年中国发生西藏武装叛乱事件后，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中国边防军平叛作战进驻山南边境要地。印军于8月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为了其自身南亚战略的需要，不顾事实真相与是非，由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从而把中苏分歧公开于世。

接着，赫鲁晓夫赴美国同艾森豪威尔先是在华盛顿后在戴维营会谈。随后

带着美苏交易的需要和要中国党服从其战略的要求，于9月30日赶到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这次会谈，仍由李越然等担任翻译工作。李越然在《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书中回顾会谈过程时写道：

1959年，我参加国庆10周年翻译组的工作。全体工作人员集中于水电部招待所，进行紧张的筹备。9月底，阎明复突然打来电话：“李兄吗？主任让我们赶紧回去，参加中苏谈判。赫鲁晓夫要来。”

我同阎明复去见杨尚昆同志。杨主任介绍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搞了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来北京参加我国国庆10周年的活动，主要目的还是会谈。这次来的规模比较大，苏斯洛夫先到，赫鲁晓夫随后就到，估计会有大的争论，要做好思想准备。

9月27日，苏斯洛夫到达北京，陈云同志去迎接。在汽车上，苏斯洛夫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的。”

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机场迎接了。赫下榻在钓鱼台。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大会堂国宴上发表讲话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和1958年那次一样，赫到中国的当天便在颐年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们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亮晶晶的眼睛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是亲眼看了，他们是真富，确实很富。”毛泽东无笑无怒，表情从容地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么。”

赫鲁晓夫继续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士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接着，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名飞行员。”

“不行。”毛泽东简短果断地回答：“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的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说：“至于俘虏的其他五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的发言最多也最长的，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自来就是声音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个不值得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只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激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你们就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表示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他当时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准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帐。

我坐在毛泽东身边，悄悄报告说：“主席，当时他说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做证吗？”

“可以。”毛泽东点头。

我站起身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翻译就是我。”我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及每人的讲话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我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题又转了，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唔唔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无礼貌……”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的对我可以听，你说的不对，我当然要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平不对等的！”云云。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第二天国庆检阅，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道：“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赫鲁晓夫离京时，毛泽东到机场送行。在贵宾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我们认真地研究过你们集体农庄的章程和制度，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同，要通过实践取得经验，总结经验……”

赫鲁晓夫再次表示：“这一切都是中国式的，我们搞不清，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离开北京后，赫鲁晓夫在海参崴说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后，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还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1960年要成为“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一年。他还说：“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要求他国服从于苏联同美国搞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的谈判。

三、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

进入60年代以后，中苏分歧急剧扩大、激化，终于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以及国家关系的紧张化。

1960年2月上旬，在莫斯科召开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高级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说裁军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十四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中国代表（作为观察员）康生讲了话（讲稿是在国内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2月6日，中国发表了康生的发言。这个发言声明，凡是**中国没有参加的**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对中国都没有任何约束力。这一声明的发表，使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4月，我国发表3篇文章，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公开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并对苏共的一些论点和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判。实际上，毛泽东在1960年1月至3月间已得出苏联主要领导人是“半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的批语：《关于反华问题》（1960年3月22日）

的看法。苏共也发表文章对我党进行批评。

对于这些越来越明显的严重分歧，中苏两党及各兄弟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企图设法解决它。苏共提出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党未同意，主张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开。后经协商，决定利用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的机会，趁各国兄弟党代表团来到布加勒斯特时，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

但是，在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领导对中共搞突然袭击。赫鲁晓夫带头发难和直接指挥，对我党展开了猛烈的围攻，从我党的理论观点到我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4月发表的3篇文章，进行了全面的批驳和指责。赫鲁晓夫等攻击我们党说，在时代问题上重复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观火”、“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说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等等。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绝大多数党跟着苏共跑，只有阿尔巴尼亚党支持我党。中共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但我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能压服得了中共，反而受到中共的严厉批评。出于恼怒和报复心理，苏共领导人把思想理论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退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两国间的几百项协议和合同，接着又赶回我国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挑起边界纠纷，使中苏两国关系面临严重恶化和全面破裂的状态。

9月，中苏举行了内部会谈，苏方同意中共关于经过充分准备开好各国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在81国党代表会议之前，10月，首先在莫斯科举行了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为即将在11月间举行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

11月初，利用十月革命43周年的机会，召开了世界81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我党由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论述了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革命、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

但是，不久之后，随着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中苏两党的矛盾重新加剧，并且日益发展，这一发展又导致了整个国际共运的进一步分

裂。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坚决反对苏共领导人的所谓“修正主义”之路。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随后，苏联所有宣传舆论工具都投入了反华争论。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双方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大论战。两党关系愈益陷入僵局。

第六节 读书与总结

一、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把读苏联编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列为会议的首要内容。但是在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后，他中断了这个安排。到1959年冬天，他才重新强调学习这部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讨论，初步地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这样长的时间集中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然，他的许多认识还受着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次读书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思，对于他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作出了一些新的结论：（1）认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性。（2）他提出，我们在土改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个体经济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3）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创造的定息赎买政策，作了新的阐述，认为其意义不限于我国。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1）进一步阐述了工农业并举的思想。（2）进一步论述了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他说：“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探讨。(1)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构想。(2)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一定会有很多发展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在读这本教科书时也谈了不少哲学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如继续发挥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认识过程论和部分质变论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自然存在许多“左”的观点。在政治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在经济关系方面提出的“左”的观点主要有：(1)认为“穷是动力”，“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以后所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2)把价值规律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3)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对物质鼓励持否定态度。

在毛泽东读书之后，刘少奇、周恩来也组织了读书小组，认真地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二、总结十年工作

1960年1月上海会议和3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安排了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后，需要进一步调整安排“二五”计划后三年（1960—1962）的补充计划，为召开中共八大三次会议作准备，同时研究国际问题。为此，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指出：把质量提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1958、1959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

6月18日，毛泽东把他近期想的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问题，结合历史的回顾，写了一个《十年总结》的文章。

毛泽东回顾说：

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前年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钢。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1650万吨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5、6、7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7、8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工业的同志和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胜利。

1960年（1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

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 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 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 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如此等类。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长时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于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试图作出一个10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对于这篇《十年总结》，毛泽东在6月18日下午讲话时说：你们看怎么样，这是从历史说明问题。使我们认识事物，主动性多一点。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性，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

毛泽东的这番总结，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摆脱他自反右派和“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左”倾思想，但是，却一定程度地认识和指出了在一段时间内，领导上的思想方法上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

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的问题,明确表示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是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并明确地承认和指出,自己和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继续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其固有的规律。他的这种态度,同他发动“大跃进”时信心十足的情形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他这时重新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不久后逐渐转向调整国民经济,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1960年夏季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6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结束后,国民经济上的问题更多地暴露出来,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中苏矛盾也尖锐化起来。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走自力更生道路,苏联人民过去10年给我们的援助,不要忘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又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省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关于国内经济问题,为了集中力量把以钢、铁、煤、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搞上去,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两个文件,并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同意对第三季度基本建设战线的意见和要求。同时,会议还初步讨论了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从而正式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四、要炼“争气钢”

7、8月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和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了,对国

民经济的一般问题也作了一些调整安排，但是，在钢铁生产问题上，却一直没有采取恰当的方针与措施。

4、5月份冶金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制定出钢的第二本帐指标2 040万吨后，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日产量仍停滞在5万吨的水平上。1—8月份，累计只生产出1 137万吨钢，平均日产量4.64万吨。照此下去，连第一本帐1 840万吨也难以达到。这时本应把全年指标加以调低，但是，由于毛泽东把钢铁指标视作为坚持继续“大跃进”路线的基本标志，不能降低。而且，由于夏天中苏关系上矛盾的发展的影响，毛泽东还要炼“争气钢”。

1960年6月，苏联单方面取消了1957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整中国。毛泽东甚为气恼，他同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4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要动员7 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 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 200万吨，如果今年有2 200万吨，后年可能达到3 800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亿吨。”“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6月底到7月中旬，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风波，苏联撤退在华专家、撕毁经济和科技合同的事件，更促使了大家咬着牙也要炼“争气钢”，给毛泽东争气，给国家争光。

中共中央于8月14日曾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但是到了11月份，钢铁生产仍存在可能完不成计划指标的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又发出了12月3日关于保钢的紧急指示。

《紧急指示》强调说：今年能不能完成1 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

经过大力突击，全年生产出了1 866万吨钢，但是国民经济的失调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更严重了。

五、毛泽东表示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

11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甘肃省委在11月25日向中央作的这个报告中，检

查了1959年下半年以来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对发展生产队经济重视不够、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部分少、收回自留地等错误。毛泽东看阅了这份报告后，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一报告的批示。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批示写道：“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3、4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5、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这个批示，虽然对错误的认识有当时的很大局限性，但看起来，他对已认识到的错误，特别是所作的自我批评，并且公之于全党，是很真诚的。表明了他愿意带动全党改正错误的一片真心。这个批示，在全党干部中，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六、忧民律己

“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陷于危机之中，也使人民的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发现这一严重情况后忧心忡忡，决心与人民同甘共苦，降低自己的待遇，甚至几个月不吃肉。卫士长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书中对此作了以下回忆：

（1959年）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

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

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喃喃道：“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他说的人祸，有多少成份是指苏联赫鲁晓夫中断合作，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少成份是对他及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在工作中的失误的反省？不得而知。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靠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

……

回到北京，毛泽东向我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我们回答：“愿意！”

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情就要照办”的。毛泽东不喜欢吃牛羊肉，只喜欢吃猪肉。但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七个月没吃过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宋庆龄曾关切地由上海赶到北京，送毛泽东一兜螃蟹，叫毛泽东吃。周恩来多次劝说毛泽东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老了许多。他的头发在三年中白了许多，像染了一层霜。体质下降，脸上生出许多皱纹。

第七节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此之前，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为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转变的意义。

1月13日和18日，毛泽东在两个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心的思想，是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他说：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18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3、4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他指出，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

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1958年以来“大跃进”遭到惨重失败，归根到底是主观脱离了客观、思想脱离了实际。错误是从思想路线不端正犯起的，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也必须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毛泽东重新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这个时期工作重要转变的开始。

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二、《调查工作》文章失而复得

逢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书中详细叙述了《调查工作》失而复得的过程，及毛泽东的喜悦心情。他写道：

1960年冬，农村中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为14日至18日召开的九中全会作了准备。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制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比较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在中央全会结束的时候，一篇题名《调查工作》的文章，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早已丢失，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这篇文章是田家英亲自送给他的。文章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重要文献，但对于它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它的真正价值，是估计不足的；这篇文章的重新发表，对于后来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引起研究者那么高度的重视，更是想不到的。这个文献被田家英知道，立即送给了毛泽东。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在1961年3月11日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作了说明和解释。从批语和两次讲话中可以使人们了解，这篇文章是为着什么写的，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毛泽东是如何地喜爱它。

1961年3月11日的批语写道：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在1961年3月13日广州会议上说：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上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

毛泽东在3月23日会议上对这篇文章的解释，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在解释第三个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说：这里面包含一个批评、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大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有部分的问题，有若干缺点或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第二点，有解释第六个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时候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不少，将来也用得着。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这还没有料到

后头的王明路线，立三路线还没有出现。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

《调查工作》恰好在刚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被毛泽东重新发现，这是一件大好事。它的重要价值被重新发现，成为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这篇文章尽管如此重要，但毛泽东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持谨慎态度。他在3月23日的会议上说：我不赞成现在发表，只在内部看一看就是了。他说：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文章会有些人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他再三提醒人们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这个文章是为了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这个问题。就讲清楚这一点。

三、主持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为了制定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省市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毛泽东带领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他发现1960年11月3日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的问题（即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产），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月下旬，他在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于3月10日至13日召集了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称“南三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称“北三区会议”），讨论农村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的信。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

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毛泽东建议研究一下他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毛泽东还提出：“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原打算派陶铸到北京送这一封信，并介绍“南三区会议”的情况。当天又决定不去了，而是要参加“北三区会议”的人到广州合并开会，于3月15日至23日举行了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共计10章：一、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二、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五、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六、社员家庭副业；七、社员；八、干部；九、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合计共六十条，故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

《农业六十条》草案是针对和为解决存在的以下主要问题而制定的：一、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或者在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现象。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这个条例草案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条例草案中仍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制度，供给部分三成，工资部分七成；规定除特殊情形如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可以分配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这些规定，仍然反映了人民公社要保持“共产主义因素”和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思想。

3月22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条例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并发出一封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通过讨论，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信中还规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原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这样，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这时因名称改变，成了生产大队为基础；原来是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并向生产队进行“三包”，这时成了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向生产大队进行“三包”。

广州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带工作组到湖南省长沙县和宁乡县，周恩来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到河北省邯郸地区，朱德于3月26日至5月5日到四川省宜宾、自贡、内江，邓小平、彭真于4月和5月上旬，直接领导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分别对农村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或信件。

刘少奇在了解了一些农村食堂的情况后提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周恩来于5月7日向毛泽东通报了人民公社的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评工记分问题、恢复社员体力和恢复畜力的问题，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的问题。并提出：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

朱德于5月9日给毛泽东信，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指出：陕西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邓小平、彭真于5月10日向毛泽东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并反映：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坏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毛泽东对这些调查报告和通信非常重视，仅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批转了10多件。他对一封信批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根据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中的一些规定作重要改变。经过5、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修正草案，将原草案规定的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的办法也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将原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供给与工资三七开的规定取消，改为无论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修正草案增加了关于山林的规定：“生产大队应该把大部分山林，固定包

给生产队经营”，“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和路旁的林木，分别划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

修正草案还规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社员讨论和试行修正草案。在试行中，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大都划小了。据1961年8月统计，公社数由原25 204个，增至55 682个，生产大队由原483 814个，增至708 912个；生产队由原2 988 168个，增至4 549 474个。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修正草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新倡导实事求是传统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使得1958年以来办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许多弊病有了相当的克服，对于稳定农村起了积极的作用。

6月19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决定》。指出自1960年11月3日《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发布以来，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不彻底，要求彻底退赔。文件下达后，退赔工作进一步展开。先后共向农民退赔了250亿元。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农村形势也起到了积极的稳定作用。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退赔、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平反与处分4个问题，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重要修改，讨论通过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还作出了精减城市人口的重要决策。

5、6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作出重要修正后，毛泽东继续关注贯彻的情况和调查了解农村中尚存在的问题。

9月27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邯郸市找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省委管农业的候补书记，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以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5个地委的书记，在邯郸开了谈话会。与会者主要汇报了一些地方实行大包干制的情况，谈了对大包干制的看法。

一些地方不实行生产队向大队的三包一奖，而实行生产队大包干。即生产

队承包了农业生产任务后,除了上缴给生产大队和给国家的部分外,其余都为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对社员进行分配和本队存留。这就把生产经营权和经济核算权一致起来了。赞成大包干制的人认为,“三包一奖制度是‘繁琐哲学’:你看,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帐。光定额就有400多个。”

保定地委书记汇报说,唐县的峒笼公社11个大队,名义上对县对区都实行三包一奖,实际上是大包干,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群众拥护。他们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1957年相当,并且很壮。猪也保持了1957年的水平。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大队统一交。

对大包干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意见是:“1. 退到初级社; 2. 不利于基建; 3. 征购辫子太多; 4. 有些遭灾队不易支援; 5. 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 6. 要变动时困难太多。”但赞成大包干制的人认为“其实,这6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回答。”

谈话会上还谈了实行大包干情况下“大队应管之事”。即只管征购、直属企业、学校、基建、救济、补助、民兵和治安、物资安排(计划管理)、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

毛泽东还看阅了湖北、河北、山东、广东的一些报告材料,对究竟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即原生产小队)为基本单位好的问题,作了反复思考。9月29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一封信,并附去他9月27日召集的邯郸谈话会记录和几个省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由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进行讨论研究。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从许多材料看,“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中央局至县委的各级党组织,仔细研究,进行调查和试点,把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

10月中旬起,各省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11月

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向中央报告了他10月下旬听取河南、江西两省农村工作部汇报和在福建龙岩考察的情况。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一致拥护，生产队的规模一般都划小到二三十户，也有十几户的，群众认为合理。土地一般都照初级社时期的所有状况，也有的作了个别调整。

由于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也就不再存在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进行“大包干”的问题。

在试点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为了克服“大跃进”以来各条战线出现的混乱，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继《农业六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出一批各方面的工作条例和规定。

四、第二次庐山会议

逢先知在回忆田家英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毛泽东在1961年庐山会议上的活动。他写道：

“六十条”在全国范围的宣讲和试行，在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很好的效果，农业很快开始复苏。毛泽东很高兴。这时，中央又着手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学等战线的问题。1961年8月至9月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面的政策问题。

上山之前，毛泽东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不能不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的小。从1960年夏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到1960年11月初，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央“十二条”指示信，首先下决心解决农业问题。

毛泽东说：

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当时有人说：逢单年不利，逢双年有利。今年是双年，要说逢双年有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

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
(1960年12月30日在听取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

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由3月到6月只反了三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正确的，但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反“左”打断了。(1961年3月5日对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谈话)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坦，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境。但是有一点使家英感到不安。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家英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

第二次庐山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和财贸、教育等问题，但毛泽东的兴趣仍然在农村方面。他始终关注着公社“六十条”的命运，关心着“六十条”的执行情况。

我们党在1959年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个教训是深深印在毛泽东的心里。他对于“六十条”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六十条”是否能真正彻底解决问题，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复，是担着心的。1961年8月23日，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他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的会议上，讲了一篇话，大体上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他说：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

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郑州会议犯了错误，分三批开，一批开一天，我打你通，略知梗概，不甚了了，经过六个月，到庐山会议。会议顶住了彭德怀的那股风，是对的，不顶不行。但也犯了错误，不应一直传下去。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挫折，教育了全党，也教育了毛泽东。到1960年冬，他已经开始冷静下来，觉悟到：“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我设想，社会主义建设大概要搞半个世纪。”（1960年12月30日的一次谈话）

五、七千人大会

为了使全党认清形势，坚决全面深入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外政治关系调整，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根据近几年的一些经验认为，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目的，便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说法，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稿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评论和提修改意见，以便更广泛地集思广益，是会议开法的一个特色。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之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共分3个大部分：（一）目前的形势。其中包括：1. 国际；2. 国内；3. 基本经验教训；4. 任务。（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

统一。包括：1. 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2. 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3. 贯彻民主集中，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4. 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三）党的问题。包括：1. 实事求是的作风；2. 群众路线；3. 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其中突出地对若干问题讲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关于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条是天灾，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而突破了一概说是主要是天灾的框框。

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但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从而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三七开”的框子。

关于“三面红旗”，他一方面指出“书面报告稿”讲“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同时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而给“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与否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研究的余地。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清理几年来的一些实际上是“左”的口号，批评了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批为“条件论”，“‘左’比右好”、用指标数字定“左”右、搞各种运动并一哄而起等口号与做法。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但也留下了后来毛泽东认为他“右倾”的根由。1966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时，批评“1962年的右倾”，是包括了并首先是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次讲话的。

原来计划，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

告”，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作讲话，便结束会议。在会议进行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认为反对了当时妨碍全国一盘棋的分散主义，还应该强调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克服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下级对上级有意见但有话不敢讲，上下级关系不融洽的问题。

根据会议进展的情况，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要在这次全国五级干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广大与会者都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会议自1月29日下午起进入第二阶段，至2月7日闭幕止。周恩来说：这是会议的“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讲了6个问题：（一）这次开会的方法。（二）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其他问题。”

毛泽东强调地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他又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并且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提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并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

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还强调地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1月31日至2月6日，会议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就工作指导上出现过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在浓厚的民主空气下，广大与会者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群策群力地把这次七千人大会开成了十分活跃的大会。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也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在这次七千人的大会上没有讲话。据说毛泽东曾请他讲话，他说自己对有些问题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因此没讲。但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他还提出看问题应采取比较正确的方法，即“全面”、“比较”、“反复”。建议“同志们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和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正视困难、分析困难、提出办法、坚决纠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启发、教育、鼓舞了全体与会者。但是，林彪在大会上却作了与整个会议精神不相协调的独特讲话。

1月29日，林彪讲了：（一）关于党的工作；（二）关于军事工作。他说：三年以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

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又说：发生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3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

林彪还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这个非同寻常的讲话，把“大跃进”的错误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不算什么；把造成困难的原因，替毛泽东洗刷得一干二净，不是中央领导人乃至全党执行了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东西，倒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总是不脱离客观实际，因此，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干扰。

由于林彪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日益严重起来的个人专断作风得到掩护。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便很欣赏并加以赞扬。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大意）罗瑞卿回答说：我作不出来。对比之下，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中的一些独到见解和说法，心中不悦甚至有所不满，成为日后逐渐不再信任刘少奇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1966年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重提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的潜在分歧，“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些，都是中央领导核心里在根本指导思

想上没有真正达到统一的表现。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在此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逐步全面展开,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大会也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

第八节 “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八届十中全会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于8月6日在大会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并六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他描绘了一幅阶级分化的景象:“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1962年8月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坚持他那个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形成的思想: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富裕农民与贫农之间的矛盾。他说,富裕农民是两方面都要争取的,无产阶级要争取他,资产阶级也要争取他。这个争夺可能要几十年、一百年,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靠什么争取富裕农民呢?他认为就是搞按劳分配。他说:“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所以要搞按劳分配,平均不能太多。”(8月9日讲话)又说:“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比方说:不要基本口粮,不要照顾,光搞按劳分配,光争取富裕阶层,可是把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军工烈属户这20—30%的人,丢开不管,也是不行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是我们

的依靠。”（8月5日讲话）

在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9月24日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又在一些同志讲话时作了插话。这些讲话和发言，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讲得非常严重。其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经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以下一段话中，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的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这些论断，以及他在十中全会和十中全会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有正确的部分，但它的最核心的思想，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样，就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毛泽东作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断，从他在会上的讲话和发言来看，是同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对党内意见分歧的判断，有直接联系的。

首先，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国经历了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印度的军队也入侵我新疆、西藏地方。在国内，台湾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准备“反攻大陆”。社会上的一些反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乘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之机进行活动，犯罪现象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

东在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注意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一个时期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出现某些激化，并不能据以作出阶级斗争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更不能据以在理论上作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的结论。

第二，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也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

1962年，党内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上，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的。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发现1962年的预算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党内很多同志对“大跃进”、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等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看得更清楚了。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2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又于5月间召开工作会议，分析财政经济状况，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两次会议先后接受了陈云和由他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克服困难的重要意见，确定了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措施，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设想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会很快。这体现了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充分地估计困难和认真地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当然，对具体的估计和措施，可以进行讨论，也可以作某些修正、补充；但是，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这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些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这种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

1962年，在某些地区农村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田单干。刘少奇认为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陈云也曾建议实行包产到户。邓小平也支持过这种主张。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针对农业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在一些单位宣传了实行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主张。他还在5月中央会议上和5月呈报党中央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中，建议在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了这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现在来看，应该认为他们这些认识和设想是今天中国农业改革的先声。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们这些意见，认为是刮“单干风”。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反复指

出，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这样，就错误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立起来，并把它看成发展资本主义了。

另外，在甄别平反问题上党内也有不同看法。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5月中央会议上，主持甄别平反工作的邓小平请大家注意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并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他说：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样快一些。会后，短短几个月内，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有些应该平反但尚未平反的人，要求平反。6月16日，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长篇申诉信（即“八万言书”），说明“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强加于他的罪名。毛泽东认为，上述这些都属于“翻案风”。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在8月5日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在9月24日的十中全会上，他还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被毛泽东当作“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所批判的，本来都是党内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做法。毛泽东和党内一些其他同志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就把它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认为这就是在党内、在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因而很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是武断的。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较之他过去的错误提法和论述是一次很大的升级。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提法，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但是，它毕竟还只是指“当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这种提法，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错误的程度上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错误方向发展。1963年6月，在毛泽东阅改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就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这一点更加明确起来了。1964年7月，在毛泽东阅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又把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归纳为十五条，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强调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又把我国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为建国以后十几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发展成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六个文件，号召全党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毛泽东考虑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采纳了刘少奇等的意见，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指出“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因此，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当时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毛泽东批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继续批判“包产到户”，并将它概括为“三自一包”，而且把“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联系在一起批判。

1963年5月22日和1964年2月9日，毛泽东两次同一个外国党领导人谈话，批评“三和一少”、“单干风”。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可猖狂啦。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同另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又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月到9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党代表团时又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只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

三、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理论观点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上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到许多地方了解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他对湖北、河北等地进行的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很重视。他肯定了河北保定地区进行的“小四清”（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

1963年2月，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提出，要在农村中搞“四清”，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在城市中搞“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把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重大实践活动。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讲了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他还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在对大区书记的谈话中说：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会后他又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中心议题是农村社教问题。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是一个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精神、指导农村社教的纲领性文件。

“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认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前十条”还规定了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前十条”发布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前十条”下发以后，各地即按照文件的精神开展社教试点工作。在试点中，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等“左”的偏向，各地都有材料反映。有鉴于此，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问题。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提交会议讨论的国家计委文件《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文件《第三个五年（1966—1970）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三五”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初步设想》提出了“三五”计划设想的主要指标，1970年，粮食4300亿斤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担至4200万担，钢1600万吨至1800万吨，煤2.85亿吨至2.95亿吨。工农业平均每年增长8.1%至9.5%。

会前，毛泽东于5月11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提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会议期间，毛泽东于6月6日又强调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并提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过去的方法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现在要改成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打仗。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把全国作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会议讨论了社教运动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据此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4、5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

毛泽东还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基于“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规定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五项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

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项条件，在后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又有新的表述。

8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推刘少奇为统帅，邓小平、彭真协助。在这以前，5、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农村有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上下有根子，要追根”等认识开始支配社教运动的发展。在此严重估计下，采取了新的部署。

8月16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的信，提出：“各个县分别搞时，一是缺少办法，一个是县委同下边犯错误干部有牵连。因此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上万人，声势浩大。省地机关派工作队，上下左右同时清理。建议中央机关也抽出人组织工作队，有1万至几万人。”18日，毛泽东批复：“完全赞成”，“迅速实行”。于是，出现集万名工作队员于一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做法。

8月27日，毛泽东又批准刘少奇所报陈伯达的建议，同意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做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中央于9月1日转发这一文件时，认为：“‘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修改后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的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强调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

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

这些指导方针和部署，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12月12日，毛泽东在看了薄一波转报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后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这样，他就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在这以前，在“国际反修”中，从“左”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得出了南斯拉夫有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看法；“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章则说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有个“资产阶级”，并认为“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把国际上的“反修”观点用于国内。

同日，毛泽东又在农机部驻洛阳拖拉机厂社教工作团工作报告上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这样，毛泽东又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

同日，毛泽东在一份外事工作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又使用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用语，批示说：“他们（指外宾）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教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各地负责人介绍了开展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农村的主要矛盾等。在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认为，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说：我们这

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文件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今后城乡社教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提法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规定3年内搞完1/3地区，7年内全国搞完。

毛泽东对前段的讨论和《纪要》不满意，于1965年1月3日在小型会议上批评刘少奇。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等提法，批评了集中1.5万人搞一个县是繁琐哲学。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对原《纪要》作了重要修改，并增加了条数，于1月14日定稿，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

《23条》批评了在运动性质问题上不符合毛泽东论点的观点，也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偏向，如“神秘化”、“大轰大嗡”、“繁琐哲学”等，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并说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刘少奇在会上曾表示不同意，认为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说“派”就太多了。从此，毛泽东把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耽心明确地集中到刘少奇身上。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我警惕，还是23条那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回答“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提问，他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场就反对。”

《23条》下达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到1966年春，全国有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运动。据1965年7月统计，国营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3.9%。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如在经济管理

方面，当时不少农村生产队长期帐目、财物不清，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干部作风方面，较普遍地存在着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等问题，少数干部欺压群众，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少数坏人的破坏活动，也确有发生。这些情况的产生，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自从1955年下半年起，由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在这方面已经潜伏下一些问题。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以后出现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更加助长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按照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方法加以解决，自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由于在指导思想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简单地看成了阶级斗争，不理解问题主要在于合作化后期以来体制方面“左”的偏差，所以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左”的东西又有发展，更主要是政治上的“左”的东西有很大发展，这表现在：

第一，在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运动一开始就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从1963年起，认为在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到1964年，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对许多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失去信任，所以在运动的做法上，“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第二，在理论上，不仅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且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和斗争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这成为他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的损失。

四、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毛泽东在1963年9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10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国内反修正主义”，“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艺术等等都应该抓一下。”因此，从1963年至1965年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政治批判，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又一重大实践。

在1962年8、9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由康生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捕风捉影地硬把这部本来是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说成是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等等，并借此把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曾参加过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对他们立案审查。毛泽东根据会议提出的材料指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决定停演“鬼戏”。5月，《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

1963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2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下旬，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批示，进一步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两次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与批评，是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的。两个批示的下达，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根据这两个批示，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

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一批文艺作品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政治批判。后来，周扬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由于那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个时期先后批判了《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和小说。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个别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的缺点，是应当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克服的。文艺工作（包括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例如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的某些缺陷，如戏剧界上演一些未加整理的、不够健康的传统剧目，一些文艺单位出现过某种不健康的倾向等等，也是应当而且可以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解决的。但是，当时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许多优秀作品被无限上纲，戴上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比如，邵荃麟针对几年来文艺创造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浮夸风的偏向，在1962年前后，提出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这些思想被简单化地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并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严厉的批判。这方面，后来进一步发展成对所谓文艺“黑八论”的批判。

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把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而且把学术上的讨论

和批评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进行了政治围攻。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错误地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如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暴露出来的矛盾，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要重视利润，扩大企业的权限等有创见性的经济思想，被批判成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更是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且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等等。杨献珍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而撤销了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许多持有与他相同学术观点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被视作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这种批判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党的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伤害了知识分子。康生、江青等人在这种错误的发展过程中推波助澜，起了恶劣的作用。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批判主要是在报刊上和有关的文化团体、机关内进行，在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以前，还没有形成社会性的群众运动。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从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采用的理论、政策和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力支持而实际上别有野心的人物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机会。林彪、江青一伙人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内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第一节 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

一、支持批判《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一剧，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之后，受人之托写作，到1960年底完成的。1961年1月北京京剧团首演此剧，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主演海瑞。当时毛泽东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马连良。

1962年，党内在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上，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上，有明显的分歧。在此情况下，江青于7月提出要批判《海》剧，但遭到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们的冷落，毛泽东也没同意。1964年，康生向毛泽东提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毛泽东也没接受和重视。

到1965年初，毛泽东对党内上层第一线的不满意和疑心加剧之后，同意了江青要批判《海》剧的意见。江青因在1964年下半年在北京找过一两个人写批判文章，遭到拒绝，便转而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物色了素有“棍子”绰号的姚文元担当此任。从3月起，在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常委都不知晓的极其秘密状态下写作。数易其稿后，经毛泽东批准，公开发表。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10天内各报没有反响。江青向毛泽东进言：从各地报上的情况看，他们封锁文元同志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的文章。11月20日，毛泽东指令上海立即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同时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中说：《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此后的批判虽在各地进行，但毛泽东仍然甚为不满，他对林彪说：你看到了吧？除了军队的报纸旗帜鲜明地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外，其余的都是应付。在北京，我说话已经不管用喽。林彪说：这是不能容忍的，谁如果敢为彭德怀翻案，我们就像当年整彭德怀那样，把他们坚决搞下去。

批判《海瑞罢官》，是以文艺为突破口，以“三面红旗”和1962年以来党内意见分歧为政治内容，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作为全局性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一批判成为一场大斗争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的评论文章陆续发表。有的是“左”的政治批判，有的则是从学术角度加以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作了努力，试图约束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学术批判工作如何进行，处置出现的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会上印发了中宣部报来的反映、请示重要问题的材料7份。彭真发言指出，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

《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他否定了关锋关于邓拓“包庇右派”的诬陷，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因其他事项也同机前往。

2月8日，毛泽东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除了说“左派整风”3年以后再说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还表示：吴晗经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在此情况下，彭真当即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电传北京，经在京常委同意后，将《提纲》发往全国。

《提纲》分析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和任务，讲了方针、队伍、左派要互相帮助、准备工作、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加强领导等问题。《提纲》中虽然有“左”的提法，但基本的思想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特别是提出了：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提纲》发出后，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阶段。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二月提纲》发出后，张春桥、江青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张春桥语）。他们看出：“这一定与彭真有关”（同上）。3月初，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赴京“摸底”。

杨永直先后同许立群、胡绳谈了话。3月11日晚，许立群向彭真汇报请示。许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答：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又答：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当晚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电话告诉杨永直。

张春桥派杨永直摸了底后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他们通过江青，报告给了毛泽东。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3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明确表示：《二月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并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

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询问了“电话事件”的经过，很生气。他说，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毛泽东审阅修改了江青在林彪支持下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纪要》批发全党。《纪要》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的”。《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被简称为《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指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并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阐发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

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见，“五·七指示”是继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之后，毛泽东提出的又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模式。

三、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为了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4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安排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约80人。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还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的所谓问题联系在一起，打成一个反党集团，进行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理，从而实际上从组织上为“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道路。林彪5月18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讲政变的危险性，同时大肆颂扬毛泽东个人的天才，大搞个人崇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五·一六通知》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陈伯达、康生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的文件。《通知》宣布：“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分为10个部分，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二月提纲》的基本观点，并在同时系统阐述了“左”的观点。《通知》的最后，毛泽东写下了战斗性的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别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标志着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已开始出现大动乱的趋势，但毛泽东仍滞留南方，由杭州而湖南韶山滴水洞，又到了武汉。他一路观察形势，遥控指挥，并构思他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到武汉后，他于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复信。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交代了自己的行程后，首先表达了他对当时形势和“文化大革命”性质、任务的看法。他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因此，每隔七八年就“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由形势而联系到当时正送达他那里待审批的林彪“五·一八讲话”。毛泽东当时虽然已经感到：“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但是他还是“准备同意发下去”。毛泽东在信中承认：“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为什么必须如此呢？从信中看，毛泽东也讲了几点理由：一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林彪的一些讲法，“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二是，林彪是“朋友”，动机是好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就是说，林彪动机好，又符合大方向，所以虽然稍感不妥，但还是违心而又自愿地同意了。

结合对这件事的处理，毛泽东对自己的性质作了剖析。他说，“我是自信而又不自信。”“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为主的是“虎气”，因此，“不是折中主义”。为什么强调“虎气”呢？看来是为了表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决心。“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决心很大，但多少有些悲壮的气息，这大概反映了毛泽东的矛盾的心态。

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这些话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合拍，所以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接着他强调了：“中国自从

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有些地区（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因此，毛泽东说：“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寄出前由秘书抄了一份留存。当时看过这封信的只有周恩来等几个人。1972年为了批林的需要，作为重要文件印发全党，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份重要文件。

7月16日，毛泽东到长江游泳。“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畅游1小时零5分，游程近30华里。”对这次畅游长江，当时的报刊上曾广为宣扬，《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一是强调：“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二是把长江的风浪比喻政治风浪，号召全国人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因而这是一次政治性很强的游泳。这无异宣告，毛泽东虽已是73岁的高龄，但还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够胜任愉快地领导一次亿万人民的大革命。

7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首都北京”。毛泽东按照他一路上深思熟虑的部署，开始扭转所谓50多天里的“白色恐怖”，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再发动。

四、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再发动

《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快于5月28日重新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隶属于中央常委之下。

毛泽东在南方期间，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文化大革命”。但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也不理解、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又不得不实施领导，处于矛盾、惶惑之中，因而除加强集体领导外，凡重大问题都请示毛泽东。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要党的领导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设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干部脱离群众问题和文化领域的若干问题。他们以

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大的风浪或许已经过去，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为彭、罗、陆、杨作解脱。江青、康生等人知“底”，怀着天将降大任于他们的喜悦心情，抱着“舍我其谁”的志向，唯恐天下不乱。基于对现实状况的估计、运动目标的设想、打击对象的确定等等的不同，中央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针：毛泽东的“天下大乱”的方针和中央第一线的坚持党的领导、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这样就形成了“支持革命”和“压制革命”的斗争。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日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

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授意支持下，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当即遭到北大多数师生的反对。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把这张大字报抄送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通知康生，立即广播并在第二天见报。康生马上积极予以执行。6月1日晚广播之后，又于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的广播和见报，不仅使北京大学的形势立即逆转，而且成为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引线。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状态。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工作组一般都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拟定的《八条指示》，即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但在当时已经“停课闹革命”的混乱局势下，这些要求不仅难于做到，而且引起与部分青年学生激昂情绪和过激要求的矛盾和对抗。一些学校开始出现驱赶工作组和工作组组织“反干扰”、抓“游鱼”、把一些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学生”的事件，矛盾日益激化。

毛泽东在7月18日回到北京并听取汇报后，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下令“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

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到会向群众招手致意。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很多工作队员，特别是工作队负责人，都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了揪斗和批判。

当时毛泽东认为，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刚刚兴起的“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于8月12日结束。在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他还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指斥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还针对过去党的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提示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这个文件同

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的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是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

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由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的，但是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就被排斥（后来被迫害致死），李富春不久后也被排斥。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许多与会者对党中央领导层如此突然而重大的人事变动感到极为震惊，思想上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这次中央全会通过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全会结束后，8月13—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毛泽东找一些人谈话，打通思想。林彪则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他提出：“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五、八次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是首先在北京一些中学生中自发建立起来的、拥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激进组织。他们一般都受到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压制，在同学中也引起激烈辩论。6月底7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份大字报。鼓吹：“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越乱越好”，要“大反特反，反到底！”7月底，这两份大字报通过江青转呈给毛泽东。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封信曾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到会同志,并得到迅速的流传。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一些红卫兵的领袖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检阅。林彪在这次接见大会的讲话中,代表中央表示:“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共接见8次,参加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这说明,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被毛泽东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在毛泽东的信和8次接见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行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使“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遍及全国各个角落。

红卫兵运动最狂热的时期是1966年秋冬,以后汇融于全国的夺权风暴之中,不再那样显赫。随着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红卫兵就名存实亡了。

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在会议的头一个阶段中,到会者许多人忧心忡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拥护姿态,也没有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明显的抵制,表现出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

10月14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的领导人、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那里开会,研究会议情形,采取对策。

10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讲话。这个讲话以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纲。它的突出之点是：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它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二，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8月24日在北大讲话，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都说禁止传抄。陈伯达在讲话中全文引用，毛泽东又加以批发，《炮打司令部》迅速传遍全国。在这以前，不赞成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人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毛泽东要周恩来去劝阻。北大在8月20日以后贴出一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于8月24日去北大阻止。在10月16日讲话中，陈伯达却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后，则听任造反派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态度的变化，表明错误的发展。第三，错误地说明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这种解释，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的‘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否定党的领导，正是“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内乱的症结所在。第四，错误地指出“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陈伯达10月16日的讲话，其错误具有十分严重的性质。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这个批示得到了贯彻执行。《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传了陈伯达讲稿的若干要点。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上作检讨。

10月24日晚，毛泽东召开汇报会，在听取汇报后讲了话，部分内容大意是：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刘少奇、邓小平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

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谁会打倒你们？当讲到过去中央分一线、二线时，毛泽东说：这是故意大权旁落，倒闹独立王国。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10月25日，林彪、毛泽东先后在全会上讲话。

林彪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三，“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他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这个主张否定了党的领导。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讲话，使之大量印发。

毛泽东10月25日讲话，讲了“一线、二线”问题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关于前一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毛泽东说：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

冲得不亦乐乎。”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会议于28日闭幕。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各地负责人普遍被揪斗。“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

1966年11月，各地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的同志都主张在工交企业的运动由党委统一领导，要求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係，不能停产闹革命，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一个“左”倾的条例草案。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受到林彪、江青的蛮横指责。在他们的干预下，用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后来农村受到波及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因为农民知道不能“停产闹革命”，但是农村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被批斗的仍然不少。更具破坏性的是大批工厂企业被卷了进去。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也纷纷受到冲击，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生产秩序陷于混乱。

这样，“文化大革命”之火就在全国城市乡村和各种单位无一例外的全面燃烧起来。

第二节 号召全面夺权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一、号召全面展开全国阶级斗争的元旦社论

1967年1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开头宣称：“1966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以“左”的观点概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1966年发展的过程之后，社论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已经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但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因此，“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

社论认为：“几个月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亿万群众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社论规定了1967年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的政治任务。概括起来是四句话：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社论最后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这篇社论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家宴谈话的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它虽然没有写明“夺权”二字，但实际上是全国全面大夺权的号召书和指导纲领。

二、支持上海“一月风暴”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上海市党政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等被抓到会场接受批斗，全市几百名部局以上干部也被迫强令到会陪斗。大会发出3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党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并强令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会后，陆续建立了由造反派组织掌握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全市造反组织联络站等机构，实际上控制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开创了全面夺权的先例。

这次夺权是林彪、“四人帮”蓄谋已久并经过充分准备的。早在1966年秋，江青就利用红卫兵大串连的机会，指使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去上海，煽动青年学生，炮轰上海市委。11月，张春桥又利用解决“安亭事件”（即工总司在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卧轨拦车，造成京沪铁路中断30小时的事件）的机会，把工总司扶植成为反对上海市委、搞乱上海的主要力量，并把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等人收纳入自己的反革命集团。12月中旬，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在徐景贤等人率领下“奉命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传达贯彻张春桥、姚文元命令的办事机构。年底，工总司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制造“康平路事件”，打垮了上海市最大的对立面组织——

工人赤卫队。时隔5天，上海最大的两家报纸《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相继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变成了造反派的喉舌。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就是在上边一系列准备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大会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的开端和真正标志。由此出发，又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2月5日，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来由于毛泽东不赞成用公社之名，于24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

关于“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张春桥、姚文元是及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的，但没有得到批复，不过对上海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毛泽东是表示肯定的。一是肯定上海两份报纸的夺权，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二是肯定：“《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三是肯定上海各造反组织发表的反对所谓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并且总的肯定上海造反派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斗争，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贺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往上海。随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和报道，对上海的夺权加以肯定，并号召各地学习上海经验。因此，上海的一月风暴在全国发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等省纷纷夺权。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三、领导夺权的一系列措施

毛泽东在发出全面夺权的号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夺权斗争的进行。经毛泽东批准，有关文件陆续发出。如：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的通知》，规定某些广播电台实行军管。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停止串连。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这类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抓革命、促生产”。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要求搞好生产。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

串连的通知》。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批准了《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作出了军队“支左”的决定。

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规定》说：“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规定了6条内容。最突出的是它明确规定：

“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规定“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

这一规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全国城乡广泛张贴，产生巨大的影响。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致林彪信：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显然，这是为了保证夺权斗争的进行。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为执行“支左”任务，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了一系列指示。不久，毛泽东又先后赋予人民解放军以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重大任务。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否认这一方面不是实事求是的；另一方面，“三

支两军”都要“支左”，都要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因而带来消极的后果。

1月28日，针对当时军队“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经过军队许多领导同志的力争，林彪也同意中央军委发一个文件。文件起草后，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作了较大修改后，由林彪签送毛泽东。毛泽东又亲自找徐向前、叶剑英等对文件作了仔细推敲修改后，于28日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命令强调人民解放军的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并明确规定，对于军事领导机关，“今后则一律不得冲击”。

命令要求：“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这个命令的发出是军队许多领导人斗争的一个成果，也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都不愿意把军队搞乱，但却遭到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激烈反对。因此，这个命令的许多正确规定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贯彻。

毛泽东还通过一系列重要社论指导夺权。其中有三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过的《红旗》杂志社论最为重要。一篇是1月31日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第3期（2月3日出版）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总结了夺权斗争的五点“基本经验”：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第二，“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三，“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第四，“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第五，“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篇是《红旗》杂志第4期（3月1日出版）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它指出：“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再一篇是3月10日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第5期（3月30日

出版)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它说,“毛主席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结合”的方针,《人民日报》在3月2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里就提出来了。后来,毛泽东又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以上种种,核心是六个大字:“大联合”、“三结合”。毛泽东领导夺权斗争,就抓了这六个大字。

在领导全面夺权的过程中,毛泽东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初衷,下定决心打倒刘少奇。1967年3月初,党外知名人士章士钊给毛泽东上书,希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3月10日毛泽东复信说:“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3月间,毛泽东派人把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章士钊看过后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上,公开发表了打倒刘少奇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戚本禹写的这篇长文是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

在打倒刘少奇之后的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经过毛泽东审定和修改过的文章,是对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总结。第一,文章肯定了对敌我的混淆。它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第二,文章肯定了打倒刘少奇。它说:“毛主席在这个文件(按指《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第三,文章指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第四,文章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它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文章中许多文字,即从“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一段话和文章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较系统地谈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这次谈话是毛泽东本人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

四、毛泽东与1967年的“二月抗争”

2月前后发生的、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首先是从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开始的。1月19日和20日,在京西宾馆进行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江青、陈伯达等人要军队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康生说军队不能搞特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坚决不同意。他们尖锐地提出:“党政机关已经都搞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军队搞乱了,要天下大乱。”经过争论,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联。

当谈到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如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等,接连被揪斗、抄家等情况时,老师们十分愤怒。叶剑英用拳头敲

着桌子，警告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推倒茶几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接着这场争论发展到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达到了面对面斗争的高潮。

在2月11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和徐向前就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继续对陈伯达等人进行谴责。

老师们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叶剑英就上海宣称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并成立人民公社问题，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在2月16日的会议上，矛盾更激烈的爆发了。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了会议。他们是因为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不同意，找来北京谈话的。当时，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人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把20多位党委负责同志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可是，上海却把陈丕显扣住不让来京。所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一见到张春桥就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呵！”谭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却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听了十分气愤：“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再次提出陈丕显等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等对残酷整老干部，搞“百丑图”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第

二天，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倒行逆施已“忍无可忍”，已经“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这些后来被叫做“大闹怀仁堂”。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16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在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信了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事。林彪把谭震林的信转送给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8日晚，毛泽东找这些老同志谈话，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指责。并决定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请假检讨”。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强加以“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对这些老帅们进行批判。江青一伙通过他们的爪牙，在社会上掀起反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潮，到处张贴打倒、炮轰的大字报，宣传车到处发出尖声怪叫，更多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批斗冲击，使已经被破坏的社会生活更加混乱不堪。

对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批判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从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书记处也不再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攫取了更大的权力。这对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发生了严重的影响。

五、视察各地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说过：“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事实上，1967年7月、8月和9月乱到了毛泽东也控制不了局势的地步。这是号召全面夺权和把群众组织分为“左派”和非“左派”的必然结果。此时，全国各地基本都出现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它们之间从“文斗”一直发展到武斗。

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视察各地。

1967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毛泽东用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指示。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据《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说：“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他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在支持“一月风暴”和号召进行夺权斗争以后，在夺权斗争的进行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不断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视察三大区时所作指示的重点，指示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若干问题上纠正“左”的错误。他针对群众之间的分裂情况，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他针对乱捉人的情况指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毛泽东也讲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私自关押人、私设公堂等现象借此为由而盛行。）他针对对干部打倒一大片的情况，号召“正确对待干部”，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他提出了教育干部问题，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他也提出了对红卫兵的教育问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的用意，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坚持全面夺权的前提下，因势利导，纠正错误。又要纠正由全面夺权派生出来的种种错误，又要坚持全面夺权，这是十分矛盾的。所有要求纠正错误的内容，还是只反对现象，不反对真实的原因。因为坚持了“左”倾指导思想，在总体上混淆了是非和混淆了敌我，而这些错误又为江青等人所利用和发展，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有意义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许多地方有所缓和，

各地“解放”了一批干部。在毛泽东发出指示后，对“支左”部队提出了“支左不支派”的要求（原先支左支派）。

六、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为6个方面的要点：即，（1）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治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4）“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七、“全国山河一片红”

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社会动乱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在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抑制的情况下，干部和群众中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有所增长。上海、北京出现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这些动向，使林彪、江青等人深感恐慌。从1968年3月下旬以后，报刊接连发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他们诬

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毛泽东听信了林彪、江青一伙捏造的情况。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部队团以上干部的万人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命令，林彪作了长篇讲话。他列举杨成武的3条罪状是：一搞宗派主义，二搞两面派，三是写了一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的文章。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因为撤销杨成武等三人的命令是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的，故又称“三二四事件”。与此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个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一些地方又连续发生冲击部队和抢劫、破坏国家物资和公共设施、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等恶性事件。一些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造成人员伤亡的惨案。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以外，他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毛泽东在这时同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批评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逐渐发现，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两年前派工作组是被根本否定的，但是这一次对学校 and 某些部门派“工宣队”、“军宣队”、却被说成是实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革命措施。两年来，全国的大学和许多中学，虽然经中央三令五申要复课闹革命，但是始终不能实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

大陆上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此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从 1967 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开始，到这时，经历了二十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第三节 “九大”前后

一、八届十二中全会

在实现所谓“全国一片红”以后，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九大的准备会。

毛泽东主持了全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 87 人（原 97 人，去世 10 人）、候补中央委员 98 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在监狱中或在“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 40 人，补候中央委员 19 人，不足半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召开全会，到会者不足半数，这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10 月 13 日全会开幕会上将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共十人补为正式中央委员（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 59 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 74 人列席了会议。

在 10 月 13 日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接着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如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办学习班解决了很多问题。一定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一百一十一个，叫111，其中确实有妖啊。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搞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10月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他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他鼓吹在国际上“支持造反派”、不要重视“当权派”而要重视“广大群众”等“左”倾论调。

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作出《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前一个决定，规定了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在1967年10月27日写进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的“五十字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五十字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建设上的体现。前一个决定还规定了代表的条件。《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说：“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用伪证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 1925 年在长沙被捕叛变”，“1927 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1929 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议不表示同意。）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完全是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1969 年 10 月 17 日，刘少奇被押往开封。11 月 12 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惨死于囚禁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一家受到残酷迫害。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案件共 22 053 件。

10 月 31 日，全会通过了全会公报。同日，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大意如下：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要说什么，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当欢庆“全国一片红”时，毛泽东未必会有喜悦的心情，他决不会认为打

倒那么多领导干部是合理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为了巩固与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再三再四地指出要缩小打击面。

1968年12月1日，毛泽东致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信：“建议将此件（按即《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了如下重要内容：“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这些意见虽然仍有混淆是非的缺点，但是把原先认为属于敌我矛盾的“走资派”说成多数不是坏人，还是个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意见，全国各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大多定为“犯过走资派错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9年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明显地降低了阶级斗争的温度。

为了全面夺权，不得不打倒一切。毛泽东坚持全面夺权，但是不同意打倒一切。“全国一片红”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开过了，他就纠正打倒一切的错误。当然，只要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能从“落实政策”、“给出路”的角度提出问题。就是这样，后来也发生了许多波折。

二、“九大”

在一片虚假的胜利声中，在浓烈的“左”倾气氛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开幕。在这以前，3月9日至27日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了九大预备会议，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方负责人128人参加。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党员选举而是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毛主席

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批判“迷信选举”，简直是莫名其妙，显然是实用主义。）江青等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人塞进九大，甚至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所以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本身组织严重不纯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报到后从3月27日至31日酝酿了主席团成员名单。4月1日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的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大会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4月1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且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宣读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分八个部分。它不仅全盘肯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还赋予它以更加系统、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把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大肆宣扬。它以“左”倾观点重新塑造党的历史，歪曲党的领袖和党的关系，把党的历史说成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并且不顾历史事实地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它在提出“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同时，提出了“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求“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大会自4月2日起，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大组召集人，着重就纠“左”作了指示，大意是：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右时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时就可能出右，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三次是右——“左”——右，最危险的三个人物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毛泽东在系统地叙述了党史，说明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党史上的严重教

训后说：当前清队工作中要注意扩大化倾向问题。北京有个大学 9 000 人，抓了 900 人。抓起来容易，放出来就难。总得告诉人家为什么抓，为什么又放。有些人关人时没想要放。这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又说：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部分领导权还在资产阶级手里。机关也是如此，部分领导权在资产阶级手里。落实政策，还要一年左右。军宣队、工宣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反对军宣队，不能说人家反对解放军。反对工宣队，也不能说反工人阶级。几个学生讲几句怪话，有什么要紧！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拥护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上海的周谷城怎样？（有人答：扫地。）扫扫也有好处。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杨勇要放。有的犯错误的，是跟着错误倾向走的，例如谭启龙。朱德、陈云不是年年反我，也有不反的时候。

4 月 14 日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说：3 月 2 日、3 月 5 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 9 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在全体会议上，林彪也讲了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发了言。发言者一致表示同意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同意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接着，一致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有严重错误。它完全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党员的权利。它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写进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同无产阶级党的性质根本不相容，同党章本身“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规定也相抵触，诚为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自 4 月 15 日起，大会进入了第三项议程。代表们酝酿协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并且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4 月 24 日举行了全体会议，选出了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有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在这 279 人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 53

人，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29%。中央委员会不正常地大换班。造反派头头大量加入，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引起另一个更大的错误。在三年当中，几乎一切是非都搞混淆了。毛泽东在历史上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最大，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比拟。当毛泽东实事求是、尊重中央集体的时候，他叱咤风云，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当他主观主义、离开中央集体的时候，他走向为人民谋幸福的意愿的反面。召开了九大，毛泽东以为大局已定，他打算以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又是欲罢不能，一场新的争斗在孕育中。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于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了话，主要内容是：“现在苏修攻击我们……‘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团结起来，

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准备打仗。”“多团结一点人好。”“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4月28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名单如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钧、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肖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毛泽东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传达下去以后，全国各地释放和“解放”了一大批人。

三、以“斗、批、改”为主要任务

中共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十六条》中规定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后具体内容又有变化。但由于强调“破”字当头，进行全面夺权，内战不休，一直无法全面进行。

1968年9月，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建立，“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斗、批、改列为主要任务。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

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只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用到其他各个领域。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通过“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工作很难有多大的好转。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的任务。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个批示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当时称为“吐故纳新”。其结果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这次整党建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发展的个人崇拜、争权夺利、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毕竟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2—3年。以后，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改革”带来的恶果是：

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克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1971年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曾经指出: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张春桥等人无视这些意见,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写进《会议纪要》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重重的精神枷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尤其荒谬的是,一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因为生产任务不足,或者因为派别纠纷,也被派往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又人为地加剧了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斗、批、改”便很少再被提及。

第四节 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

一、不设国家主席之争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转而把考虑的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这个宗派集团本来就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结合而成的。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但是1970年4月11日，林彪一反常态，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上，叶群1970年7月在他们一伙人中私下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而叶群于8月初私下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13日下午，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说什么“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打电话告诉了黄永胜，黄即报告了林彪，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的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语录。8月11日，叶群在庐山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江青一伙是拥护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不设国家主席

对他们有利。“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之类的说法，明显是针对江青一伙的。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会的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这不是一般化的方针，而是针对两个集团说的。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里已经把“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强加给毛泽东，而且写下了在“指导思想”上做文章的伏笔。他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观点颂扬毛泽东，并且影射攻击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胜利以后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文化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康生在开幕会上报告了毛泽东历次对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修改宪法的过程。

到会同志大都以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致的开幕词，没有强烈反应。叶群到处散布林彪讲话是毛泽东事先同意的。她又在背地里要吴法宪告诉李作鹏、邱会作：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没有点名，你们发言也不要指名；串连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会上发言。这样，对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来，林彪的讲话不啻是个动员令。吴法宪在当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得到政治局的同意。（散会后，林立果对吴说：林彪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陈伯达于8月23日自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又与叶群连夜选

编称天才的语录。吴法宪于23日、24日、25日先后同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说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还于23日打电话给还在北京的黄永胜，传达林彪的讲话。黄永胜按照林彪讲话的口径，讲了起草讲话草稿的要点：拥护林彪的讲话；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十一中全会公报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

8月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根据林彪23日的讲话，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强的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听说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都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从而造成一种紧张局势。

毛泽东这时察觉到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他于8月2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印发前给林彪看过。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

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吴法宪等也受到批判。

全会于9月6日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毛泽东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按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按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的话)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那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毛泽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

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恩来、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二、“批陈整风”

毛泽东 1971 年在外地进行巡视期间说过：“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按即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是“挖墙角”。“批陈整风”运动最具实际性的内容，是这三项。

1970 年 10 月，毛泽东对贵州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11 月 6 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阅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11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见》（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阴谋活动，有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在指示中号召全党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全党全军立即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学习与批判。

1970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红旗》杂志 1970 年第 12 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学习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1971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 1970 年 12 月 29 日对姚文元的一个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

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3月15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写了批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全党全军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结合批判陈伯达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报刊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即陈伯达）的浪潮，着重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说：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权力很大，它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决定说：“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这个决定大大加强了江青等人的力量，也就在实际上削弱了林彪一伙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遏制了林彪一伙，却在客观上为江青一伙弄权窃国提供了条件。康生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即称病不出，李德生并非江青一伙，后来调去沈阳，被解除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所以中央组织宣传大权不久就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讲话，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说，中央认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事实证明，“山头主义的窝子”云云，并无根据。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党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

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看来批判是严厉的、频繁的。毛泽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路线问题”，因而“抓住不放”。黄、吴、叶、李、邱揭陈没有多少事情可揭，又不愿、不敢揭出叶群，恐怕也未必弄清楚了“路线问题”，因而总是过不了关。尽管毛泽东注意稳住林彪，但是林彪定然心中有数。林彪会知道：批陈实质上是批林。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1969年10月，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收集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

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这个《纪要》共分九个部分，包括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它用反动的观点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认为形势对林彪集团夺取政权十分有利。妄图利用“打着B52（一种当时最大的轰炸机，暗指毛泽东）的旗帜，打击B52的力量”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采取“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等措施发动武装政变，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至少是制造“割据局面”的反革命目的。《纪要》还提出要学习日本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要党羽们为林彪效忠卖命。

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林彪一伙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

也担心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林彪将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论断。毛泽东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一次的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毛泽东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的谈话，起了防止党内高级干部因不明底细而盲目地跟着林彪走的作用。这些谈话显然有不正确之处，如认为党五十年来经历了“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等等。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巡视南方极为疑忌。8月下旬吴法宪把毛泽东到长沙、南昌，先后派飞机接一些负责人去谈话的情况，密报叶群。8月26日，毛泽东刚刚结束对南巡的第一站——武汉的视察，“联合舰队”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分析形势，得出了“由明争转入暗斗”、“酝酿新‘战争’”、“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的反革命结论。毛泽东严禁将他的谈话外传，而顾同舟（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9月5日深夜在广州把毛泽东接见一些负责人时谈话的内容密报在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作了十五页记录。次日，于驾驶直升飞机

到北戴河，把电话记录稿送给林彪、叶群、林立果。9月6日凌晨，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密告陪外宾去武汉的李作鹏。李作鹏很快形成三点认识，一是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二是上纲比以前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林彪。李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密报叶群。林彪惊恐。

林彪、叶群、林立果在9月6日、7日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某种罪恶决定，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从9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在“联合舰队”中进行了谋害毛泽东的反革命计议，并策划攻打钓鱼台（江青等人住在钓鱼台）。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估计毛泽东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决定在上海动手，初步确定用火焰喷射器和四〇火箭筒打火车等办法谋害毛泽东。9月10日，他们又密谋用炸毁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的办法谋害毛泽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他在年轻的服务人员中了解到林立果一伙活动的一些情况，提高了警惕性，机警地改变了活动规律。南昌报告的是一般情况，毛泽东真正有所觉察是在杭州。他在杭州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问了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狼狈不堪，答非所问。9月8日深夜，毛泽东突然密令立即把他乘坐的专列从笕桥机场的专线上转移到绍兴，以迷惑敌人。9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突然立即离开杭州，并且不要陈励耘送行。9月10日下午6时，毛泽东到达上海。他不下专列，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当夜在专列上休息。9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许世友、王洪文时要他们两人团结起来，要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宴罢，许世友才知道毛泽东专列已驶离上海。专列在南京稍停，便风驰电掣地直奔北京，一站不停。车抵丰台，毛泽东在车上召见李德生、吴德、吴忠，询问了北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毛泽东在北京站下车。他因对反革命阴谋有所觉察（当时不了解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而机智地采取行动，打乱了反革命部署。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慌乱而又沮丧。林立果于当天下午私乘256号专机去北戴河。为隐瞒真相，256号专机改用252的呼号。

9月12日，林彪一伙作出了9月13日南逃广州的决定，企图造成割据局

面。

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异常活动的迹象。周恩来立即警觉地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命令将飞机马上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全党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第五节 外交工作

一、“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动乱。在这场动乱中，外交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凭借权力，控制舆论，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甚至图谋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他们诬蔑中国建国十七年来执行的外交路线是所谓“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他们煽动一些人揪斗陈毅外交部长，使他无法工作；把中国驻外的大使几乎全部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与此同时，他们极力推行极左的外交路线，四面出击，打倒一切。某些外交工作人员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不顾政策、自作主张的事也屡有发生。这就使中国外交工作在一段时期内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由于中方处理不当而引起。这就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了损害。

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是平等待人。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外宣传中却出现了强加于人的情况。当时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国一些驻

外使馆和涉外人员就滥发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并在使馆新闻公报、新闻橱窗和其他宣传材料中转载或展出国内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图片等,引起了驻在国的疑虑和不安。对这些做法,周恩来总理一直不同意并设法制止。后来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5月也批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提法是“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还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这才使情况有了好转。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强加于人的歪风,不仅表现在对外宣传中,而且表现在外交来往上,有的驻外使馆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稿中,不顾驻在国政府的反对,硬要点名指责另一个国家。毛泽东主席对此类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同周围的国家搞好睦邻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一些友好的邻国也出现了“斗字当头”的错误做法。1967年7月,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少数暴徒到中国图片展览馆捣乱。中国驻尼大使向尼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后,尼方申明它珍视两国友谊,不允许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在尼土地上发生,为图片展览馆事件向中国道歉,对受伤受侮辱的中国人表示慰问。这样,中国驻尼使馆认为可不再提书面抗议了。但康生却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向尼方提了“强烈抗议”,这就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后来陈毅副总理两次接见尼驻华大使,重申中国愿意和尼泊尔王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才使中尼关系逐步稳定下来。

实事求是是中国外交的鲜明风格。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某些外交人员并没有这样做。1967年6月,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一辆公务汽车同德方的一辆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死伤的事故。中国大使馆没有弄清情况,就向民主德国外交部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还怀疑是德方搞政治谋害,后来证实了那次事故是一次车祸。

更严重的是,在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1967年5月,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军警镇压,殴打和逮捕了该厂的许多工人以及不少前往慰问被镇压工人的香港各界人士。在现场采访的中国新华社记者也被打伤。对此,中国作出反应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外面却举行了100万人示威游行,10万人集会声讨。上海红卫兵还闯进了英国驻沪办理侨务的工作人员的住处,砸了玻璃窗和家具,甚至打了人。后来香港当地的斗争步步升级,港英当局连续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

社、文汇报、大公报等新闻机构的十几名记者，还责令三家报纸停刊。到22日，北京又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事。中国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的工作人员在事前曾反复向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劝他们不要冲英国代办处，但他们不听。后来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指挥群众搞的。

中国外交毕竟是由毛主席领导、周总理亲自主管和谨慎把关的，从1968年起就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因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比之对国内工作的破坏，程度要轻些，时间要短些。

1968年1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就开始陆续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驻外使节。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也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例如，针对1967年间中朝关系曾受到中国极左思潮干扰的情况，从1968年起，中国就大力加强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团结与合作。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朝关系中曾经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毛主席指出：那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

正是由于中国能及时地、严肃地纠正自己外交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偏差，才使中国外交得以较快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二、中美关系解冻

进入七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事务出现良好的转机，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局势转变的带关键性的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长达二十年之久。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方面看来，美苏对立是它所面对的严重问题，但是世界上已出现几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要尽

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北方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周恩来委托陈毅（当时任外交部长）主持，对目前国际斗争问题，发表见解。就在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上，陈毅最先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

毛泽东很重视陈毅等老帅的这个建议，批准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改善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1969年初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等因素后，也调整了对华政策，一再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珍宝岛事件过去不久，美国就在1969年7月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接着尼克松总统利用出访亚、欧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想跟中国对话。1969年10月，美国又通知中国说，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初，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经协商，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在1970年1月20日宣告恢复。

美方在1月20日的会谈中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本改变两国的关系。中方还表示，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在2月20日的会谈中，中方告诉美方：“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

由于美国在1970年3月入侵柬埔寨，中国决定中断大使级会谈。6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此后，美国又恢复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努力。10月初，尼克松向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

去。”这就公开表示了他要来中国的愿望。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会见访问美国的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宴会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被认为是“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叶海亚·汗11月中旬访问中国时，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一两名高级人士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同中国对话的口信。周总理答复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

11月下旬，通过罗马尼亚也传来了美国的类似信息。中国在答复时曾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尼克松对欢迎他来中国访问的信息感到鼓舞。1971年2月他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第二个外交报告中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

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与美国乒乓球队有所接触。美国队访华的愿望被反映到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由毛泽东作出了邀请的决定。这是一个科学地估量了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发展潮流之后，作出的大胆的正确决定。美国乒乓球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他们在北京进行了比赛和参观游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日利亚乒乓球队代表团。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来，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不仅打开了隔绝二十二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而且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惊，为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因而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4月21日，中国政府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

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尼克松总统于5月中答复说,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这就导致基辛格7月间的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同他会谈时坦率地说: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周总理强调中美关系首先要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他还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是友好的。

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一事件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来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问我国。毛泽东于21日会见了尼克松,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

三、同西方关系的大发展

中美关系的解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推动下,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等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等日本客人。周恩来总理同田中首相举行会谈。中日双方于9月

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1973年初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并陆续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使这些方面的交往得到很快的发展。两国政府还于1975年开始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打开两国睦邻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对两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建交高潮。西欧国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加强，它们希望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也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南欧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四个小国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70年代初，在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同加拿大、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

四、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这种划分中，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强调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打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控制和压迫，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这些分析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是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

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

第六节 最后的岁月

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它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他的身体状况日益下降。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政策，为诸如“二月逆流”之类的错案平反，为陈毅等同志恢复名誉，尤为重要的是重新重用邓小平，并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等。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否定这一灾难性运动。相反，他处处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许批极左思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发出理论问题指示，评《水浒》，直到支持“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中国继续陷于政治动乱之中。

一、对某些“左”倾错误的纠正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党中央责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又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党中央将林彪事件自上而下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这一系列措施，都取得相当的成效。这时，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后政治局势又出现大的反复。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按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

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

“《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这就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当场为陈毅恢复名誉。张玉凤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回忆。她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毛主席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泽东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毛泽东说要去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毛泽东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毛泽东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毛泽东乘坐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尽管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毛泽

东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

毛泽东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我说：“去问问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她们来。”

经一位警卫人员指点，我在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张茜。当我推门进去时，只见张茜同志和几个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一种凄怆之感涌上我的心头。我过去在电影、电视和照片上常常看到她。她的风采，她的风度可以说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可眼前的张茜已判若两人，她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了。这天她身穿一套新军装，显得很庄重，朴素。我走上前去问候张茜，并告知毛泽东派我来请她和孩子们到大厅。

当我把张茜同志引到大厅时，毛泽东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总理、邓大姐、朱老总、康大姐、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张茜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到张茜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同志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泽东能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毛泽东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毛泽东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泽东又一一问及4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总理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毛泽东借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机会向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他的“亲密战友”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还谈到“二月逆流”，是陈老总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我们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主席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总理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泽东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

同志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还有很多的老同志一直把毛主席送到汽车前。

送毛泽东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毛泽东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我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毛泽东身体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1972年4月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作了批示。根据这些批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很不好，但是许多人都尽其所能，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在艰难中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是1967年2月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的顾虑，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提出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提示，提出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三点意见，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进行宣传。

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十分恐慌，

予以坚决反对。而毛泽东支持了江青一伙的主张。

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出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人民日报》拒绝刊登；《光明日报》10月6日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却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且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八、九月间，周恩来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召开工人座谈会，假借工人群众的名义，整理了一个材料上报，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又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于11月30日批示“拟同意”。张春桥于12月1日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于12月2日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12月17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意见的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国全党。此后，除外事工作外就只准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纠“左”深入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毛泽东赞成江青、张春桥的意见而反对周恩来的意见，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

二、重用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按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批语对邓小平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尽管这种肯定是以邓所谓“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前提，而且实在说还远远算不上是充分的肯定，但它毕竟“解放”了这位69岁的党的前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这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做出的一项重要决断。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在恢复组织生活五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从“第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重病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早在这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接着，毛泽东又换了一个军事问题，要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是政治局要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尽管在毛泽东面前一齐唱唱歌，仅仅是歌声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泽东又谈。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认为一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一二十年，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但在他们的内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三、“批林批孔”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在理论上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之中，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努力消除他已认识到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某些消极后果，但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在他看来，如何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和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首要问题。由于下面要说到的某种机

缘，他提出了“批林批孔”问题。江青一伙就大做反革命文章。

“九·一三”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材料（为数不多），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此想到了“批林批孔”。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这首当时流传很广的诗是：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5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到：

“郭老在《十批判》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这次谈话，毛泽东批评了外交部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并且提出：“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外交部一个内部材料提到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毛泽东认为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大为不满，曲折地指责主管外交部的周恩来。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8月，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8月7日，《人民日报》发

表示了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报刊上发表了不止“批孔”文章，如：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9月27日，中央党校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0月16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康立”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第2期发表《读〈封建论〉》；11月1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的笔名，在《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1973年11月，毛泽东依据不可靠的信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在会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12月9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中，一方面肯定这次会，认为“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了江青的提法，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按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12月中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还提出要在北京把八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讲话中告诫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过去两年多以后，又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针对着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的。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中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

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尊孔反法”，批判“修正主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这里都作为1974年的任务提出来了。提出这些相互关联的任务，是有针对性的。这里有一个错误批评周恩来的背景。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下发。此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但是，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走得过远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上海帮”、“四人帮”。

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势。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致江青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指出：“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

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1974年3月，江青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毛泽东3月27日致江青信：“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又于4月4日批准了邓小平在大会的发言稿。4月10日，邓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毛泽东一方面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积怨甚多”。他发觉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篡权活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地批评。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告诫江青：“江青，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的问题。

四、“组阁”风波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在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等人加紧了活动。江青妄图由她来“组阁”，她主演了一出闹剧。

“四人帮”以为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棋。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这一点，江青等人很清楚。这一局不能输。要进攻，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决不能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所谓“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晚在北京钓鱼台紧急策划，进行阴谋活动。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王洪文完全按江青等人的意图，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偏袒江青，目的是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王洪文汇报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他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妄图由他们“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他：“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同日，江青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嘱她们报告毛泽东：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她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又把唐闻生、王海容找去，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他还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抵制比作“二月逆流”。10月19日，唐闻生、王海容到医院将谈话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邓小平，邓小平已忍了他们很久。10月20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指示唐闻生、王海容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江青在这里野心毕露，要由她“组阁”。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1月19日，江青又向毛泽东写信，说：“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是一封伸手要

官的信。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批评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不听劝诫，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带病主持国家人事安排工作。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23日、24日、25日和27日，毛泽东同他们作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又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再次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对邓小平高度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还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还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说张春桥有才干。1974年12月末至1975年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要点。在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的支持，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召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江青的“组阁”未成，把政治局的许多委员都骂了。毛泽东批示：“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还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0日深夜，江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一个连队“看望”指战员。在谈话中，她歌颂吕后，吟哦唐人李商

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以发泄她对中央人事安排的不满。

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864人。大会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朱德主持了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了1965年初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方针。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的召开，是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八年动乱之后，为了稳定政治局势，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转上正常轨道所作的一次努力。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身患重病，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与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一道，尽可能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文化大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致力于对各个方面的工作的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是支持的，并继续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1975年春，“四人帮”提出“反经验主义”，目的是攻击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

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他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的“反经验主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4月23日在对新华社的上述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

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要求将“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再次作了批评。他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坚持“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按反经验主义问题是在姚文元文章中出现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又一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然而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又于5月27日、6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主要就江青等人说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三件事，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质问，还批驳了他们提出的会议是“突然袭击”、“围攻”的说法。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也作了批评发言。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唯一的一次。王洪文、江青不得不做一点检讨，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此结束。会后，毛泽东在同邓小平一次谈话中，肯定了会议“有成绩”。

在支持邓小平、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还作出了调整文艺的指示。

7月14日，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时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同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恢复出版，批准举行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纪念演出会，对一批被江青等污蔑为“毒草”的影片解禁，还出版了鲁迅著作和其他少数文艺作品。文艺界的形势略有缓解。

五、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三个运动

1975年至1976年初，毛泽东发动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三个运动，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努力维护。

1.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兴起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是他长期以来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他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误解，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了违反实际的分析。我国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社会主义制度和原

则，本来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根本不同，而他竟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并且认为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条件，因此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谈话，是《五·七指示》的理论化。他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从维护“文化大革命”出发的，再次反映了他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忧虑。他认为这些“左”倾理论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央通知说：“毛泽东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泽东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通知又说：“根据毛泽东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通知发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张春桥、姚文元奉毛泽东之命，主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写了文章。他们对“左”倾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在阐述中夹杂私货。

2. “评《水浒》”运动

1973年12月，毛泽东就评过《水浒》，上文已经说过。1975年8月，毛泽东采纳姚文元的提议，批准发动了“评《水浒》”运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狄谈了对《水浒》的一些看法。芦是有关部门挑选来为毛泽东陪读的。芦狄向毛泽东请教了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芦狄把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记录并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会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71回本，3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写在前面。

毛泽东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天便到了姚文元那里。

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注视着毛泽东这几段不足三百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如何把这些本来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个人的评论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姚文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已经开始秃顶，身体也已经发胖。其实，1975年他才不过44岁，比王洪文仅大4岁。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笔熟练，颇有制造文字狱的功夫。1966年，他只有35岁，便写了闻名天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年，他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九大”以后，他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北京，主管宣传。

姚文元考虑成熟，立即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31日，当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

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地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

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泽东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答复：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2月间，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3. 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正当全面整顿方兴未艾之时，1975年冬，形势突然发生逆转。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转向发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他认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改变，是同听取一些别有用心心的汇报有关的。当然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不能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9月底11月初，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1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开头是不点名，后来是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摘录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

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重要指示》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了是非。“阶级斗争是纲”是不正确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是不正确的。“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种现象总的说并不存在。对“大官们”要作分析，决不能一概否定。有了“好房子”等等得不出“比资本家还厉害”的结论。“打倒一切”和“全国内战”就不只是“三分错误”的问题。最为严重的错误，是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作了这样的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了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邓”不只是错误地批判一个人，而且是错误地否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会上，根据毛泽东上述谈话精神，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解决“转弯子”的问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

回去以后把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讲话提出了政策界限，说：“毛泽东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要求“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六、巨星殒落

从1971年春天起，毛泽东患了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1972年1月，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犯了严重的肺心病，并导致休克。经及时抢救，毛泽东很快醒了过来。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4位领导人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差。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后来，毛泽东的行动已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因病未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机要秘书张玉凤心情沉重地回忆了1975年10月以后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她写道：

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都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

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

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泽东，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我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主席不无歉意的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我理解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他让我送给他用惯了的那只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主席对总理深切的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总理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十里长街的悲恸，代表了十亿人民的感情，众多的人民是多么希望毛泽东能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呀！然而，如果人民知道主席当时的境况一定会嘱咐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要保护好主席。

我将主席圈阅的有关周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文件办完之后，对张耀祠说：“我们是不是也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张耀祠嘱咐我说：“你们就不要去了，由我代表了。现在，你们照顾好主席更重要。”

周总理逝世以后，毛泽东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从书本和文件上摆脱病魔缠身的痛苦。

为了保护主席刚刚治愈的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过多的看书，不要使眼睛太疲劳。对于这些劝告他一点也听不进去，而我也只好按着老人家的意愿，或是文件或是书籍让他无休止地阅读着……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

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炮竹是他为我们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我们去旧迎新。

毛泽东在临终前几个月，最后确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卧病不起的毛泽东在听了毛远新的歪曲汇报后，拚尽全力，分析了政治形势，做出了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重大决断。事隔不久，一次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向他汇报了国内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含混地吐出了几个字：慢慢来，不要急。他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再也发不出声音来，只好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从而确立了华国锋接班人的地位。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个重要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少，他深为未来忧虑。他对华国锋等人诉说衷肠，希望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很清醒的。他悲观了。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沉浸在悲痛之中。同时，人们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切担忧。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各族人民书》。这个文献宣告毛泽东逝世，又说：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

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第三篇 毛泽东个人生活专题

第一章 读书生活

第一节 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描述他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学习情形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书，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7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毛泽东8岁在家乡韶山发蒙时，最先读的是《三字经》。以后6年，他在私塾里又读了《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史记》、《纲鉴类纂》、《日知录》等。总之，他确实以儒家经“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虽然不懂其“微言大义”，但他却对古代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终其一生而不衰。同时，他崇拜孔孟，在青少年时期的许多文章、信札和读书笔记中，动辄引用孔孟的言论。

在诵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少年毛泽东还以极大的兴趣，偷偷地阅读了当时被视为“杂书”的中国古典小说和稗官野史，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说岳》、《隋唐演义》等等。因此他在后来的哲学和军事著作中，能够以其中

的某些故事，作为典型例证，信手拈来，生动形象地说明哲学原理和军事策略。

除此之外，少年毛泽东还开始接触到一些传播新思想的书籍，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这两位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使毛泽东感到十分新鲜，受到一定的启发。

1910年，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小学堂求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除了读“经书”外，还设有自然、历史、地理等课程。学校有一座初具规模的藏书楼，毛泽东在这里开始接触了所谓“新学”，除了正式上课外，他还经常到藏书楼去借阅文史知识方面的书籍。国文老师见他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还特地买了一部明人袁黄编写的通史《了凡纲鉴》送给他阅读。他从同学肖子昇（肖三）处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为书中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所深深吸引，以致忘记了这是借来的书而浓圈密点，并十分感慨地谈了自己的“读后感”，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复辙”。他还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就有了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在这一期间，他的表兄文运昌送给他一套梁启超主编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新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主张改良主义的书。他读后深受维新派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大为赞赏。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钦佩梁的学问、文章，便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名号，写文章也刻意摹仿康梁笔法。他写的《言志》、《救亡图存论》、《宋襄公论》等论文非常出色，曾受到校长的当众表扬。更重要的是，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深受康梁主“变”哲学、大同世界、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等理论的影响，无论在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给毛泽东早期思想都打下深刻的烙印。

1911年，毛泽东从偏僻的山乡韶山来到省城长沙，并在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新军当上一名列兵。列兵的薪饷微薄，每月仅发7元钱，他除用2元交伙食费外，其余大部分均用来订阅报刊，以从中学习有用的知识。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就是从当时的《湘汉新闻》上见到的。也是在这一期间，他还读了当时任《北洋官报》总纂、所谓“中国社会党”的发起人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本小册子。尽管江亢虎所贩卖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杂烩，但社会主义问题却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浓厚的兴趣，还与一些同学和朋友进行过讨论。由于当时这个问题并不引人注目，因而响应者寥寥，讨论未能展开。

1912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继续求学深造，考入了省立一中。但入学不久感到学校课程繁杂、方法刻板，不利于发挥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便毅然退学，走自学的道路。1912年秋到1913年春，他寄居湘乡试馆，经常到省立图书馆看书。每天往返五六华里，风雨无阻，从早到晚，坚持不懈。在这半年自学期间，他以极大的兴趣广泛地阅读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以及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潜心钻研了严复翻译的世界名著多种，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都一一认真研读，尤其对《天演论》作了深入的钻研。此外，还以极大的兴趣研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翻译这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重点介绍英国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的《天演论》（现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主要目的是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武器。严复自号“天演哲学家”，在其《天演论·自序》中就强调指出：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并一再宣传其中“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这一基本观点。这种在进化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严复翻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逻辑学（即名学）著作，介绍了近代逻辑思想，特别是培根的逻辑归纳、实验印证的科学方法，对毛泽东后来对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3年春，年届20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后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1918年夏从一师毕业。这5年半的学习期间，正是国际国内处于风雷激荡的伟大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日本等帝国主义侵华的加紧，袁世凯称帝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混战，特别是面临五·四运动前夕，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和准备……，这一切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识上的成长，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一师学习期间，青年毛泽东在各门功课中，仍然对文、史、哲等学科感到浓厚的兴趣，下的功夫最大而用力最勤。在文学方面，当时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很重视古文教学，他很赞赏毛泽东的文章，劝其多读古文。为此，毛泽东曾下功夫熟读《诗经》、《楚辞》等名作，以及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编选的诗文词赋集——《昭明文选》。广泛阅读韩愈、柳宗元、苏轼父子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此，还购买了1套20多册的《韩昌黎全集》，细心研读。因而他的古

文大有进益，从当年写的《祭母文》、《为肖子昇笔记本题词》等篇，可以看出他的古文水平。在历史方面，还在省立一中读书时，一位教师就曾借给他一部清乾隆敕撰的《御批通鉴辑览》。这部史书起自黄帝，迄于明末，把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重要史实，按编年纪事，以纲目相从，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历史之概略，使他获益非浅。他到一师就学后，对历史课仍然感到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探求不已。除上正课外，还在课外系统地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等大部头史籍。在哲学方面，青年毛泽东由于受到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更有着强烈的爱好。杨昌济不仅对中国传统哲学很有根基，又因长期留学日本和英国，对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也深有造诣。他在给学生讲课中，不仅讲西方的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等人的哲学，更喜讲中国的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的理学。杨昌济曾以蔡元培译的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为教材，结合中国的理学传统进行讲授，使青年毛泽东深受影响。他不仅上课时认真听讲，课下还深入研读原书，在书上写下了11000多字的批语，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毛泽东还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朱子语类》、《小学》（朱熹、刘子澄编）以及《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编）等书。他当时对朱熹和王阳明都十分钦佩，在同黎锦熙、肖子昇的通信中。就曾多次征引朱熹语录，据罗章龙在《亢斋汗话》中的回忆，毛泽东在怀着崇敬的心情游览朱熹讲学遗址时，还发出过“千载德犹馨”的赞叹。对于明末清初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的著作，他也认真钻研过，因而深受这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关于“经世致用”、“践履笃行”等主张，在其课堂笔记《讲堂录》及论文《体育之研究》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在我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中，毛泽东不仅曾服膺康梁，研读过他们的著作和主编的报刊；还钦佩谭嗣同，钻研了他的《仁学》；甚至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也曾一度是青年毛泽东崇拜的对象，认为只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在中国哲学史中，伦理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哲学的强烈爱好，当然也反映在对伦理学的爱好中。如上所述，他不仅认真研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出了上万字的批语，而且还把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的译稿工整地誊抄了7大本，由此可见其治学态度之认真和对伦理学思想的重视。

1918年夏，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不久，首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因而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团体如雨后

春笋。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利用这一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也深受影响。从1918年8月到1919年4月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曾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与北大学生中的活跃人物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学术团体的活动。其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京报》总编辑、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信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北大学生朱谦之，对他的影响较大。毛泽东于1919年4月初回到湖南后不久，以北京为起点进而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他立即投身到这一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于同年7月担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并先后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30多篇文章，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这一伟大的实践斗争中，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由思辩的领域转向社会实际；由求教于少数圣贤转向寄厚望于广大群众。他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通过对“驱张（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而摆脱了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影响。1920年冬，毛泽东第2次来到北京，读了不少关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的书籍，还极力搜寻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已译成中文的、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书籍。当时有3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很深，这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这3本书对毛泽东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20年底到1921年初，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实践上，实现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的根本转变：由一个唯心主义者、心物二元论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了。

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可以清楚看出，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因而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这对于他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能够注意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贡献，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节 活到老 读到老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全国解放后，他的读书条件好了，就逐步建立了一个拥有几万册门类齐全、适合他的需要的书房。他把读书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活到老，读到老，学到老。

一、“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

几十年来，毛泽东日夜操劳党和国家的大事，工作一直是很忙的，可是他还是挤出时间来看书学习。他很善于利用点滴的时间。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一下身体的几分钟里，他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5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精力极其充沛，当时他充分利用时间抓紧看书学习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就拿大便的几分钟来说，他都非常珍惜，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也都用来看书学习。一部重刻宋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它的一些书刊，他就是利用大便的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因为他常在大便时看书，所以工作人员就把一些书放在厕所里，这种看完了再换另一种。现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厕所里那种摆放的式样，就是当时毛泽东看书时的样子。说起毛泽东在大便时看书的事，有一件事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同志们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又和往常一样地上厕所了，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出来。工作人员以为出了什么事，就急忙进厕所看看，原来他还坐在马桶上看书呢！他见工作人员进来，才放下手中的书。

毛泽东到了晚年，因年高、体弱、多病，常常躺在床上看书学习。他的床上除了躺下一个人的位置外，其余地方全是放的书。他把看书当成一种休息，所以在工作之后的时间里，他几乎全用来看书学习。每天晚上，他看书都看到很晚。由于一天工作的辛劳，有时他常常抱着书本就进入了梦乡。醒来后，就又孜孜不倦地看了起来。“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这是警卫战士对毛泽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的颂歌，也是毛泽东深夜工作和读书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外出开会和进行视察工作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想办法读书学习。外出前，他常常亲自选好要带的书，有时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就口头告诉工作人员或亲手开个书单，一带就是几箱子书。到了外地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饭桌上也都摆放着各种要看的书籍，一有时间，他就手不释卷地看起来。有一年夏天，出差到武汉。武汉的夏天，气温很高，可是毛泽东还是与往日一样，每天晚上坚持看书。有一个晚上，天气异常闷热，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工作和放松学习。书上的字很小，看不太清楚，就加大照明亮度。这样，他坐在灯下看书就更热了，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拿出毛巾，请他把汗擦一擦。毛泽东接过毛巾，非常风趣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

有一次在外出的列车上，毛泽东和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又捧起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全神贯注地读起来。这本书是解放社1943年8月印的，毛泽东1946年4月在延安读过，后来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因为本子旧，纸张粗糙发黄，字又小，在列车飞速行驶颠簸震荡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一般的同志看起来也是很费眼力的。这些他全然不顾，仍然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按着书，一页一页地往下看。列车上的服务员见到这种情形，非常心疼地劝他：“毛主席，这样看书会损坏眼睛的。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您也该休息了。”毛泽东非常和蔼而又十分诚恳地对服务员同志说：“这没关系，我不累，为了革命和工作，应该抓紧时间多读点书。”

毛泽东看起书来，常常忘记了吃饭。多少年来，毛泽东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是不安。每天总是及时把饭做好送到他的饭桌上，衷心地希望他能按时用餐，吃得近些。可是每次催他吃饭时，他总是笑着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有时一顿饭常常是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热上几次，他才能吃上一点。有一年的除夕，同志们都想，过年了，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喜庆新春佳节，我们也把饭菜做得丰盛些，让毛主席过个好年。当工作人员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毛泽东跟前时，看到他老人家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重读从延安带来的那部平装本《资本论》。他在书上时而圈圈画画、时而挥笔疾书。看到这种情形，工作人员很是为难，欲叫又怕打扰他看书；不叫吧，他老人家中午就没有吃饭。想来想去，为了主席的健康，鼓起勇气对主席说：“主席，请您吃点饭再看吧。”主席一看，饭菜就摆在他旁边的茶几上，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他端起饭碗，大口大口地吃了一点。可是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又那样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几十年来，毛泽东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饭可以少吃，觉也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

毛泽东晚年体弱多病。但他在病痛中，还是一直坚持看书学习。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及其他各种书刊。当时，毛泽东近八十高龄，又重病在身，饭吃得很少，还是那样废寝忘食地看书学习。这样，毛泽东日渐消瘦，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心中非常难过，都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可是他一读起书来，就不把身体、健康放在心上。

有一次，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发烧到39°多。对此，他毫不在意，还是要看书。工作人员遵照医生的吩咐，不让他看书。他满怀深情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只好将他要读的书又放在他的身边。他高兴地笑着拿起书，凝神静气地读着，早已又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

后来，病情发生变化，毛泽东的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要坚持读书学习。怎么办呢？就叫别的同志读给他听。他想看（需看）什么书刊，就读什么书刊。1975年，毛泽东的眼病愈来愈严重。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和直接组织下，医务人员给他做了手术。当眼病稍有好转时，毛泽东就要求和往常一样地工作和看书学习。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使手术早日痊愈，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和书。对此他当着医生的面满口答应照办，可是医生一走，他就情不自禁地看起文件或书来。医务人员一来，他就立刻把书和文件塞在枕头底下。有一次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书，医生进来时脚步声很轻，当医生走到跟前时，他才急忙把书往被子里藏。他怕医生责备他，忙笑着解释说：“今天刚看了一会儿。”医生用完药一走开，他又贪婪地读起来。

二、“书为夫人”

毛泽东的医生王鹤滨在《紫云轩主人》一书中对这位伟人睡的双人床上的独特布局，作了生动的描述：

当你走进紫云轩毛主席的起居室时，你会惊讶地看到，在他老人家睡的硬木板双人床上，从头到脚竟放满了整整半床的书籍。主席就好像是睡在或躺在书堆里，这些书都是毛主席平时常要看的书。这些书都一叠叠地有秩序地排在床铺的东半侧，等候着主席去阅读。每本书看过的部分都夹有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记录上的铅笔字。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好像

是书的胡须或头发，或像妇女头饰耳坠一样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查寻。刚看过的书籍如未看完，还要继续看时，则卷着摆放在那里。这些书籍几乎都是线装的古书，毛主席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京图书馆作过馆员有关。这些书我们从来没有动过，更没有翻看过。毛主席爱读书，爱护书，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一看到这些情况便使我肃然起敬。中国古人有“羲之爱鹅”，也想起宋朝人林逋的雅号“梅妻鹤子”来，这些古代文人，虽然以此视为清高、文雅、超逸，但比起毛主席爱书的情操来，不能不说这些古人则低得多了。毛主席爱读书的程度堪称“书为夫人”了。于是我推断，主席睡硬板床可能是便于放书。因为睡软床时，由于床面的变动，那些书是无法有秩序地叠在那里的，那便会滚落满床，有的会被身体揉坏；同时毛主席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软床是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没有认真地考证过。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时，只要“书夫人”随行，住宿时都得需要硬板床。

每当毛主席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我们这些在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

“主席要休息啦！”

但是，时间一长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而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息，这告诉我们，他又转入了另外的一种工作的形式——正在看书学习哩！

毛主席起居室内的灯光成了我们观察他读书或睡眠的一个讯号。所以每当毛主席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老人家正在顽强地学习着。这时，我们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此时，我常常听到值班卫士的叹息：

“啊！这么久啦，毛主席还没休息呀！”

我们平常以主席寝室里的灯光熄灭到他醒后按电铃的声音计算他的睡眠时间，这常常是不准确的，但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有时常把他看书的时间记入在睡眠的时间之内，如果是在晚上或夜间，灯光可以告诉我们他醒了，在读书哩，不按电铃，也知道毛主席醒了。如果是在白天，我们还认为他老人家睡得很好哩！内心里都很高兴，值班的卫士兴高采烈的转告着：

“嘿，今天我值班，毛主席睡得多美呀！”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

或幸运。

毛主席右侧的床头桌上，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台灯总是亮着的，伴着主席读书。在灯光下的书面被照得很醒目，主席半卧着，或叫作半坐着，或侧卧着，或用右肘支持着上身的重量，眼睛在灯罩上的阴影里，也有时下放到灯光的领域里读着，读着……毛主席睡前，多数的时间是在他醒后，当你走进他的寝室时，常会看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一点儿也不觉察有人走进来，当他读到有趣之处，常常会使你听到从他那抖动着的喉部迸发出的“格、格、格”的笑声。

三、认真地学 反复地读

认真地学，反复地读，这也是毛泽东长期坚持的一条学习方法。几十年来，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毛泽东看书学习都是非常认真的。许多书籍，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研读，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有的甚至到了晚年，他还翻来覆去地读。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主张，不管读什么书，要么就不读，要读就认认真真地读。他非常反对那种读书只图快，不讲效果的做法。他读文学作品总是反复诵读、吟咏，用心领会它的意义，仔细琢磨书里的内容及写作的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无意义的作品以外，他都一篇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都努力了解、领会，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经过这样持久的学习，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读得烂熟，背诵得很流利。这种读书方法看起来是慢，花费了一定的时间，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毛泽东看书学习非常认真，还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纠正原书中的错别字，二是改正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打开他阅批过的书籍，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一个的错别字改正过来，漏字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这点，从延安时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一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该书第91页第11行中的“现象”的“象”字是“象”字之误，毛主席就将“象”字改成了“象”字；将该书下篇第95页第1行中“四分五烈”的“烈”字，改为“裂”字。原书第25页第4行“这样看来，麦里是用……”毛泽东读到这里的时候，在“麦里”后面添加了一个漏掉的“亚”字。该书下篇第61页倒数第二行中“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们”一句中，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应该是“十七世纪的经济学者们”，他即在“经济学”三字后添加了一个“者”字。类

似的情形，在他所读过的书籍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毛泽东对书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也很注意。发现明显点错的，他就随手改正过来。这在他读过的书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经济学大纲》一书，毛泽东生前读过多遍，不但写下了许多的批注文字，而且把书中错的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该书第42页第15—16行中的“一个特定的商品，要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出来。必定不能不和别的商品发生关系，……”。这句话中的“表现出来”后面的句号是不当的，毛泽东把它改成逗号。该书第53页第16行“但是当他表现A商品的价值的时候”一句中，“但是”和“当他表现”之间空了一个字，毛泽东就在此处加了一个逗号。还有在他读过多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毛泽东也是批画圈点满书。其中第7页第12—13行中“这个力量主要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特殊的武装队伍，……”其中逗号也是不妥当的，他就将这个逗号改成了句号。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读书生活中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读书是多么地细心认真！

现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他反复读过多次的。这点从他阅批过的书籍中看得特别清楚。《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他从小上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60年代他又重新读过。晚年，他还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他看过的《红楼梦》的各种不同版本差不多就有十种以上，他究竟反复看了多少遍，就可想而知了。还有许多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他都反复地读，一次又一次地批画、圈点。一部《昭明文选》，他读的遍数也是很多的，上学时候，50年代读，60年代读，到70年代，他还读过好几次。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每种上都写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唐、宋、元、明、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等古典文学书籍，他都看了好多遍。一部《唐宋名家词选》读过的本子就有四种，1974年8月25日他已经重病在身，还亲手写了《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工作人员他还要看这种书。还有《唐诗三百首详析》、《李贺诗集》、《稼轩词》等等，他也看了许多遍。还有许多古今名人传记的书籍，他在湖南上学的时候就爱读，以后几十年里他还多次阅读这些书籍。一部《古文辞类纂》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看后还了回去，过了不几天又要看。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

毛泽东反复读书的事，在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还

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等等。60年代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有的书他读一次就在书上画个圈。现在收存的不少书上都有这个引人注目的记号，有的书封面上画了四五个圈。

反复地读书，这是毛泽东的一条学习方法。毛泽东对各种书籍的内容所以了解得那么清楚，就是他持之以恒反复学习的结果。

说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有一件事至今还在人们中传为美谈。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毛泽东正在紧张地写作，桌子上、凳子上、地上不规则地摆满了他所需要的书籍、资料。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进来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主席太忙没有时间整理，就急忙把这些书刊按照大小、种类整整齐齐地收放到一起，刚要往书架上拿，毛泽东看到后十分惋惜地说：“糟啦！糟啦！”这位同志被弄得莫明其妙，他想：“怎么会糟了呢？”事后他才知道，这是毛泽东读书写作的一种习惯。毛泽东为了看书和写作，只求便利实用，不讲整齐美观。他的书籍、资料，有的是打开的，有的是夹纸条的，有的是折叠的，有的是大小不一的几本放在一起的，乍一看好像杂乱无章，其实书放的位置，他心里是有数的，都是有他的用处的。他的这些书籍和资料就像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

四、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非常赞赏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认为这的确是一条成功的治学经验，并始终身体力行。

几十年来，毛泽东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了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有的书他反复读过多次，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上面加一次圈点、勾画，作一次批语。现存的毛主席藏书中，就有许多是他阅批过的书籍，其中许多书上都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

现存的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书籍，有青年时期的，有革命战争年代和延安时期的，还有许多是全国解放以后的。其中最早的一本是他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阅读批注的《伦理学原理》。这本书全书原文只有10万多字，而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用毛笔写的批语和提要就有12100多字。全书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都用毛笔画了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等符号。这是现存的毛泽东阅批字

数较多的一本书。所有批注文字，都是用工整的小楷书写的，最小的仅有七号铅字那么大。批注本距今虽已60多年，批注文字依然完整无损，非常清楚。从这些书写字迹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当年的学习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啊！这本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是研究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研究伦理学在我国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工作异常繁忙，但他还是争分夺秒地读书学习，阅读、批注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科学书刊。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这些著作毛泽东都反复研读，许多章节段落都作了批注和勾画。阅批较多的哲学著作就有十几种。

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毛泽东批注勾本子现存的就有三种。这三种书上的许多章节，批注的文字及画圈点等符号密密麻麻。其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阅批的也很多，现在收存的有毛泽东阅批标志的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两种版本）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政治经济学教程》、《经济学大纲》、《经济科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乡村建设理论》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

五、广收博览

毛泽东对各类书都极端爱好。他在建国后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尽可能配置他所喜爱和需要的书籍。经过长期努力，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终于建设起来了。毛泽东的藏书，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以及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等等。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极其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书，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书。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

一些书。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探讨一个问题，或者是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是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他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作进一步学习和了解。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著作。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当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时，或者读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他总是无止境地追求新知识。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意味深长地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具有宽广的战略眼光，成为杰出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渊博的学识。

当然，毛泽东在读书学习方面仍有缺憾之处。逢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对这一点作了如下评述：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六、既看有字之书 又读“无字之书”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的一条基本的学习方法。毛泽东之所以终身爱好学习和钻研书籍，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也不是无目的无计划地乱学一气，他是把看书学习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常常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上学习知识，还主张到实际生活中去读“无字之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进行游历、实地调查研究等。

据身边工作人员讲，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1938年3月15日，他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一直坚持这样做。他一生中尤其在早中期，在中国城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对中国社会最直接、最生动的实际知识。

但如同毛泽东在读有字之书方面存在缺憾一样，他在读“无字之书”方面也有不足，这就是他一生中仅仅出过两次国，而且都在苏联，但他却没有到世界其他国家作实地考察。这当然也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

第三节 读马列著作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起，就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开始确立阶级斗争观点，初步找到了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几十年一贯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并运用此书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到马列十分困难。只有在打下若干城市后，才能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时，得到一些马列著作。据彭德怀和吴黎平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

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患病时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

到了延安以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书籍。为指导中国革命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他集中精力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画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在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国家与革命》是在1946年4月下旬开始阅读和批注的。《“左派”幼稚病》是在1948年重读的。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学习此书第二章，以利于克服当时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1958年“大跃进”中，发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作了许多批注。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纠正当时的某些“左”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不仅自己学习和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建议广大干部学习这篇著作以及其他书。1958年11月9日，他在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向干部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

泽东在信中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即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逐章逐节地讨论。毛泽东在边读边议时，发表了许多谈话，总结他本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成果。

1963年，毛泽东提出了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在7月11日的一个会上，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他还提出，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

第四节 读哲学书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始终对哲学抱有极大的兴趣，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并且写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等。

这里所说的哲学，包括哲学原理、哲学史、逻辑学以及宗教哲学等。

一、读哲学原理和哲学史书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很多青年学生都爱谈论理想、志向，有的想当政治家，有的想当军事家，有的想当教育家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模仿和盲从，不能算立志。真立志，就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求得宇宙的真理，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准则，立下前进的目标，并用毕生的力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叫做立志、有志、真志。他曾这样说过：“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广泛阅读各种哲学著作。杨昌济先生教授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他反复读过多遍，并非常认真地做了笔记。杨先生介绍的其他一部分中外哲学名著，他都刻苦研读，对于谭嗣同的《仁学》等，他也曾用心钻研。

30年代初王明教条主义者曾经嘲笑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者。他们自

侍在苏联留过学，饱读马列书籍。这件事对毛泽东刺激很大。后来他说过：“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在延安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大量的研读马列著作外，读得最多的还是哲学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介绍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这个时期，毛泽东读的哲学著作主要有：《社会学大纲》、《哲学选辑》、《思想方法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简编》、《黑格尔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入门》、《辩证法唯物论辞典》、《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历史的唯物论》、《朗格唯物论史》、《机械论批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等等及诸子百家中各种的哲学著作。当时的延安，生活等条件都是很艰苦的，毛泽东的工作也是极其繁忙的，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地大量攻读。

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下列7种（8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苏联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上篇：《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日本河上肇著，李达等译）、《社会学大纲》（李达著）、《哲学选辑》（艾思奇著）。他很可能还在米丁等人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上留下批注，但这几本他读过的书迄今都没找到。

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在批注文字中，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阐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加上其他哲学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留下的哲学批注约为两万字，内容大致包括哲学基本理论、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上的问题。

在大量研读各种哲学著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毛泽

东写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按照这个提纲，曾在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受到了干部和学生的热烈欢迎，这对于推动广大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及有关的论著做了有效的准备。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建议编选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搜集和阅读唯物史观方面的书。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4天之后，毛泽东给刘少奇一封信，送去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恩格斯的《从猿到人》。信中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解放以后，毛泽东仍然挤出时间，批阅各种哲学书籍和期刊。他读了伍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并作了许多批注。60年代他阅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时，在其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写下了一条较长的批语，表达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看法。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对于哲学期刊上的文章，毛泽东也时常留意。在读了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上一篇有关孔子思想的文章后，他在文章题目的上方批下“孔门充满矛盾论”7个字。

二、读宗教哲学

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他对中国几个有代表性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其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

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

待。1961年1月23日他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伍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三、读逻辑学书

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逻辑学便是一种思维和认识工具。因此，毛泽东喜欢读这方面的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

早在1912年，青年毛泽东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穆勒名学》。1938年春，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那时，他刚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接下去，他又用三天时间，一口气读了这本学术著作。此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学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

建国初期，中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又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苏联学者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后，在苏联逻辑学界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是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此书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毛泽东读了这本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的地位的看法。但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并没有随便品评。因他自认为“无多研究”，故还“不敢有所论到”。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

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当时流行的有关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主从”说、“高低级”说进行挑战。此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立即注意到了周谷城的文章,并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1957年2月16日的一个会上,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当时许多讨论文章不同意周的观点。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1958年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此后的几年中,他一直关注着逻辑学研究的进展。

1959年,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选编逻辑学论文集及专著丛刊。这年7月28日,他在给康生的信中说:“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不久,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印出来(内部),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中央政治研究室编了一套《逻辑丛刊》,共11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丛刊包括了建国前中外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的逻辑学著作。

毛泽东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依然很浓。1965年初他看到刚出版的《近代逻辑史》后,为了便于阅读,他指示田家英安排将此书印成一万部大字本。

第五节 读 史

在毛泽东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的。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他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都广泛涉猎。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世界通史》、《古代社会》等等中外史书,他也都一读再读。由于他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史籍,所以毛泽东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并对一些历史问题有过许多的精辟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谈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

一、毛泽东最爱读的史书

毛泽东一生十分爱读、批注最多的史书，就是《二十四史》。他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读过《二十四史》。1952年，工作人员为他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套线装本共850册。后来，一直伴随在他的身边。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他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50年代，毛泽东读过这部史书，60年代，他还不断地翻阅。1969年6月，毛泽东出差到了武昌，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感到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他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那么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并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记载。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学习《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毛泽东对这部史书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有重点的、有选择地学。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部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十六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得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这些批注、圈点、勾画的笔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而是也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因此他不但对书中的内容和人物非常了解，而且对各种书的优劣也都很清楚。有一次，在谈到《前汉书》和《后汉书》的内容时，他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他说：“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他认为，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虽然是长篇大论，但是历史资料丰富，使读者兴味盎然。毛泽东对这部史书中的一些内容，不但看得多，而且还写下了许多的批注文字，不少地方都断了句，加上了标点符号。这些对学习《二十四史》，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书上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都非常注意。就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说，他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好说好，是坏说

坏，是什么问题，就说是什么问题，态度明朗，是非分明，毫不含糊。如他在读到《新唐书》（卷一百十三）《徐有功传》的时候，他觉得“命系庖厨，何足惜哉”的说法不当。他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岳飞、文天祥、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他们为民族的利益，为党的利益，都不顾个人的安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难道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对这些爱国志士惨遭杀害，是深感痛惜的。毛泽东在读到《旧唐书》中的《李义府传》、《杨再思传》、《刘幽求传》时，他就在有关的内容边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思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批示，对我们更好地学习《二十四史》是很有益处的。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密切联系实际。历史的经验总是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的值得我们今天效法，有的要引以为戒。特别是一些比较好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学习的时候，非常重视。60年代初，有一次他在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姚崇传》的时候，看到了姚崇向皇帝阐述的关于怎样治国的一段话。毛泽东对姚崇的主张非常赞赏，誉为十条政治纲领。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这十条纲领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读到《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中的“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的内容时，他认为，这种推论是不完全正确的，不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还为盗。可是这种推论，“今天也还有之”。从《二十四史》中，毛泽东吸取了许多成功的、有益的安邦治国经验，也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国情的了解。

毛泽东最爱读的另一部史书是《资治通鉴》。在他的个人藏书中，既有此书的线装本，又有50年代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对它们毛泽东都作了圈点批划。此书是编年体历史巨著，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全书共294卷。

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爱读史料丰富翔实的正史，也爱读有史料价值的各种野史、稗史以及历史小说。他说：“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

延安时期，毛泽东很喜欢读蔡东藩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936年，他曾致电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得到这部书后，毛泽东十分珍爱，撤离延安时也没舍得丢下。他不仅自己读，还推荐给别人读。

毛泽东读《东周列国志》这部历史通俗演义时评价说：“它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

在历史小说中，毛泽东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他从青少年时代就非常爱读它。毛泽东评价这部书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但毛泽东并不因作者正统的历史观而影响他重视其对人物的刻画，对战略战术的描绘，对复杂政治斗争的叙述。他说：读《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早在井冈山那样斗争环境十分严酷的日子里，在打土豪时，他还想在土豪家里能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来读。在延安时，他经常作报告，多次引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借古喻今。1936年，他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信时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藉以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在《实践论》中，他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说明判断和推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还重视地方志、村史、家史。他每到一地，首先要了解当地历史沿革等，已成习惯。1930年他到兴国后，就仔细翻阅《兴国县志》。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到达后立即索要《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有关地方史书，阅后又借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他还将《华阳国志》印发给与会同志。1964年毛泽东曾说过：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他还重视各种专业史，爱护哲学史、经济史、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等。

二、毛泽东批注的若干历史人物

张贻玖在《毛泽东读史》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毛泽东读史过程批注过的大批历史人物。如陈胜、吴广、贾谊、赵充国、陈寔等人、曹操、张宾、梁武帝、陈庆之、韦睿、曹景宗、马周、王勃、徐有功、朱敬则、姚崇、刘七、邹容等帝王将相、农民起义领袖、政治家、历史家、文学家、诗人。毛泽东肯定其所长，分析其失误，称赞其卓越政治见解、军事才能、文学成就，对其高尚品德

肃然起敬，并给予公正的评价。

读《史记·陈涉世家》时，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陈胜、吴广起义失败有二误：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就短命地夭折了。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英俊天才”。毛泽东认为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对贾谊 33 岁便英年早逝，毛泽东深表惋惜。

50 年代末，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出水后休息时，两人并肩坐在遮阳伞下谈今论古。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此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这一历史事例。毛泽东还重视赵充国的战术思想，对书中关于赵充国军事才能的描述也有很多批划。

在对西汉朱博、东汉陈寔等人事迹的批注中，毛泽东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长期被视为“旷世奸雄”。毛泽东则主张，对曹操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应当对他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结束东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另一次在北戴河，他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对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对曹操所采取的政策，毛泽东也作了很多批注。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批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还称赞曹操不称帝，是具有政治远见的表现，批注道：“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

毛泽东还非常喜颂曹操《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他生前在同子女谈话时还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还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通鉴纪事本末》中《石勒寇河朔》一节，记载了西晋时石勒依谋士张宾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决策意见，出兵灭王浚的有关情节。毛泽东读到这里时批注：“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读《南史·梁武帝纪》时，毛泽东作了许多圈划批注。毛泽东十分注意梁武帝的军事才能，同时又批评梁武帝听不得逆耳忠言等缺陷。

毛泽东非常推崇梁武帝的名将韦睿，在《南史·韦睿传》中作了二十多处批注。如“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以少击众”、“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善守”、“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将在前线”、“干部需和”等，对韦睿作了高度评价。

对唐玄宗“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姚崇，毛泽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新、旧唐书的《姚崇传》，毛泽东都读得非常认真仔细，有许多批划。如有批注：（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10条意见，问玄宗同意否，若不同意，他就不愿接受任命。毛泽东对姚崇提出的10条意见十分赞赏，批注：“如此简单明了的10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四川出了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同一时期，毛泽东和当时《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谈办报问题时又说：“你们办报的知道邹容其人吗？”“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三、读史与指导战争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掌握了极高的军事指挥艺术。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外历史上著名战例和兵法，从中吸取营养，是毛泽东成为杰出军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熟知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战例。他善于从这些战例中发现规律，以指

导当前的战争。他从许多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中得出一条规律：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部军事名著中写道：“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古老并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兵书，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久享盛名。毛泽东十分重视研读《孙子兵法》。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曾致信叶剑英、刘鼎，要他们购买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书籍，并专门叮嘱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多处引用过《孙子兵法》，如《孙子兵法》中《军争篇》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逸待劳”；《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形篇》的“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毛泽东发挥了孙子这一原则，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

60年代初，章士钊赠送毛泽东一部冯梦龙编的《智囊》，其中兵智部制胜卷中，有关孙子兵法及其运用事例有所记述，毛泽东对此有三处批注：一是有关“声东击西法”。他批注：“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二是有关“反间法”。他批注：“老守坚城之下，又不急赵救，此秦之所以失败也。”三是有关“驷马法”。他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有一次谈到唐太宗时，毛泽东曾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

毛泽东还从其他古代兵书、史书甚至古典小说中吸取营养，加以引伸和发挥。

成书于战国中期的著名兵书《司马法》，提出了“以战止战”的见解。书

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中，毛泽东则提出了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用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为永久和平而战的响亮口号，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但与《司马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制分》中认为：“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意思是说，用兵打仗，先打强大之敌，则会遇到困难，难以奏效；先打弱小之敌则会顺利。先打强敌，弱敌会变强；先打弱敌，强敌就会变弱。毛泽东曾引用这段话来说明先打王金钰、公秉藩部的好处。

《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在论兵法时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主张对于兵书上所讲的阵式，不可拘泥，要善于运用智慧和计谋，变通掌握，以收佳效。对于岳飞这一观点，毛泽东极为重视，并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他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生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势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经过毛泽东的阐发，岳飞的这一思想便得到了升华。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为阐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引述了《水浒》里林冲后发制人、棒打洪教头的故事。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乱之乱》一节，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罢黜废帝，由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形势，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此节批注：“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劭、沈攸之、黄回、吴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读《宋史·太宗本纪》时，毛泽东注意到了契丹人战略上的高明之处，同时批评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乎”。毛泽东批注说：“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毛泽东不但重视历史上的成功之作，而且重视战争史上的“败笔”。他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了宋襄公的愚蠢作法。公元前638年，宋楚之间发生了泓之战。宋襄公主张“不击半渡之师”、“不鼓不成列”，不捉年老敌兵，致使宋军失去许多好的进攻时机，被楚军大败。毛泽东认为这与“兵不厌诈”的原则

相违背，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颇有意味的是，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县立高级小学读书时，写过一篇题为《论宋襄公》的文章。由于写得好而在学校出名。但文章的内容却不得知晓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参加革命战争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战争，尽管与历史上农民战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毕竟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历代农民战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借鉴。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与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经验的借鉴，是有某种联系的。

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最初表现，是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大革命惨遭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毛泽东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历代农民战争也是十分熟悉的。因此，早在马日事变发生不久，他就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号召：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前后，瞿秋白曾经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爆发以后，部队连续打了几个败仗。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制止了不少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出历史上的山大王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山大王与农民起义军是有区别的，但农民起义往往就是在山林湖泊里发展起来的，许多农民军领袖常常就是山大王。毛泽东还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来教育启发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他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促使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主要因素，当然是他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客观分析，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历代农民战争史的熟悉，不能说没有起一定的作用。

“上山”之前，毛泽东主要借鉴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山大王、绿林好汉在山林湖泊建立根据地的成功作法；“上山”之后，他针对许多同志向往大城市，想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影响，而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思想和作

法，着重借鉴许多农民战争的缺陷和失败教训。

毛泽东、朱德领导革命军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以后，红军中的流寇意识一度流行起来，影响了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把部队中的流寇意识作为一大错误思想而大力纠正，特别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建立，王明的“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有所抬头，一部分同志不愿继续作艰苦的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作，流寇主义倾向有所加强。毛泽东仍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来告诫这部分同志。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但是，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流寇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入的教育，迅速纠正了这种思想，为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创建清除了一大心理障碍。

在深刻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教训和系统概括自身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胜利后骄傲导致失败的沉痛教训。1944年，党中央曾经把郭沫若论述李自成起义失败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建议郭沫若再写一篇总结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经验的文章。

历代农民战争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创造了很好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郭化若曾经谈到毛泽东对太平军战术的运用。他说，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大战，就采用了太平天国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法。当时的兵力部署是：前面一支兵堵住敌人，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实行迂回，断敌退路（抄尾），还有一支兵充当预备队。四面包围敌军，达到了全歼的效果。毛泽东晚年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他在谈到后一方针时提到了朱元璋和朱升。朱元璋在建立明政权之前，曾听取朱升关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从而使自己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

础。毛泽东则接过并改造了这个战略方针。

四、关心史学研究的发展

毛泽东不但博览史书，而且十分关心历史科学研究的进展，与许多著名史学家有着深厚的友谊。

长期以来，毛泽东与中外著名史学家、作家、诗人、考古学家郭沫若往来密切。对郭的著作，毛泽东十分重视。郭沫若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十批判书》、《中国史稿》等历史著作、历史剧等，毛泽东都加以阅读，并作了圈划。毛泽东对郭沫若的一些历史学观点表示赞同。如1973年毛泽东曾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

范文澜也是一位当代史学大师。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和范文澜交往密切。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分析及其马克思主义观，对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范文澜曾经主要研究古代史。有次毛泽东写信建议他重视研究近代史。范文澜欣然接受，下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他写了许多有关近现代史的著作。对于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毛泽东始终给予支持。1940年范文澜着手编写此书时，毛泽东建议用夹叙夹议的手法来写。《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毛泽东这个意见写的。此书出版后，毛泽东读后很满意，并建议以后写得再大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特地派人到范文澜家中，传话给他：“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1953年秋，史学界筹办《历史研究》刊物，毛泽东指示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范文澜坚决拥护。在创刊号上，范文澜发表了《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

毛泽东还很关怀其他史学家。1939年1月17日他曾复信给历史学家何干之，鼓励说：“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周谷城从50年代就开始搜集史料，准备编写《世界通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牛棚”。毛泽东知道后在一次会上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明史学家吴晗、写《李自成》小说的姚雪垠等，也都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点。

毛泽东十分重视古籍的整理点校工作。1954年，他提出校点《资治通鉴》。接着，他又提出校点“前四史”。他还支持校点其余“二十一史”。

1973年4月，正当“四人帮”猖獗一时的時候，毛泽东指示恢复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给予历史研究者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第六节 文学嗜好

毛泽东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这同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是分不开的。

一、博览历代诗文

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

1957年12月，毛泽东曾要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逢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多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唐诗。我们为他收集了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准备了好几本。后来又买了一部《全唐诗》。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别是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气派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除“三李”以外，毛泽东也比较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这四位诗人，特别是王勃，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写的一段批语中说道：“这个人（指王勃——引者）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

(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在宋词作家中,毛泽东崇尚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又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很确当的。辛词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苏东坡。《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的一些爱国词人(包括诗人)如陆游、张孝祥(其词集名《于湖词》)、张元幹(其词集名《归来集》)、洪皓(其诗词集名《鄱阳集》)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词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读诗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1964年12月,他读《五代史》时,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于29日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出,并将此诗的全文几乎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写下来附上。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岸青、邵华在回忆文章中谈到父亲毛泽东的诗词修养时说:

爸爸对古诗词很精通。有一次,爸爸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中谁的诗,邵华说她喜欢曹植的诗,爸爸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爸爸认为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喜欢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在同我们谈论时,还把其中一些词句写出来,加以解释。他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风。他说,《将进酒》是一篇好诗,《蜀道难》也有些意思。爸爸评论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处在于此而不在他。爸爸还喜欢王昌龄、陆游、辛弃疾的一些边塞诗,他把王昌龄的《从军行》、陆游的《夜游宫》亲笔写给我们。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1975年曾被调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讲读中国古典诗词。刚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老人家便微笑地问她说:“你大概喜欢秋天吧?”她一时不知所对。这时,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吗?”她在背这首诗时,毛泽东也同时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吟诵起来:“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

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她从1975年5月到9月这段期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学习，每当毛泽东要读书的时候她就去。曾经为之选读过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上的诗词曲赋和散文、鲁迅的文章。对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起码读了三遍以上，有的书皮都磨损了。毛泽东曾对她说：读书要三复三温的。当读到鲁迅的文章时，他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赞扬说：写得精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芦荻曾为之读过王粲的《登楼赋》，他自己经常吟诵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还用手拍着桌子，击节高吟岳飞的《满江红》和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毛泽东最喜欢唐代李白、李贺和李商隐这“三李”的诗，尤其喜欢李白的诗，曾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

在古文方面，毛泽东既喜欢六朝的骈文，也爱读唐宋八大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散文。对六朝的骈文，毛泽东虽然认为它不如初唐的新骈，但他还是喜欢读的。收入六朝骈文的《六朝文絮》和其他六朝人的各种文集，是他经常要的。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语言精美，对仗工切，有一些相当好的写景抒情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泽东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毛泽东经常称赞一些好的古文，并向别人推荐阅读。他说，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很有说服力，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等等。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二、爱读鲁迅著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读鲁迅著作了。1938年1月12日，他给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也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这套书印装别致，做工精细，色彩协调。

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事忙碌，环境简陋，但他总是忙中找闲，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3卷《鲁迅全集》，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爱读鲁迅著作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同读其他著作一样，常常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一边读，一边划，文章读完了，书上也划满了直线、曲线、圈圈、点点、三角、问号等等多种符号和标志；同时还留下一些简明的批语。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迴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898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在延安时就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后来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称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

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为大会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一则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另一则就是：“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对于那套精装别致的《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的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中南海居住之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走。在赴莫斯科的途中，他有时还读鲁迅的著作。

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利用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这时，他就拿出一本鲁迅的著作读了起来。开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他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走到他身边，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他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还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20页书看完才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毛泽东对鲁迅的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

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1934年作，1935年12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1924—1925年，1926年8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3月2日”前添加了“1930”。《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8月12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8月12日”前添加了“1931”。

到了70年代初，毛泽东年近八十高龄，精力、体力等都远远地不如以前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读鲁迅著作的兴趣未减。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毛泽东生前很爱欣赏名家字画和那些书写名人诗词、著名警句、格言、楹联等等的名人墨迹。鲁迅的这本手稿，都是在“语丝”稿纸上，用毛笔写的行书体墨迹，字迹清楚，运笔流畅自如，所以毛泽东常常翻看。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划划。

毛泽东在1971年生病以后，用放大镜看书越来越困难。工作人员建议把鲁迅著作印成大字本。他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后来，有关方面一是为了毛泽东等老同志阅读鲁迅著作的方便，二是可以馈赠外宾，三是便于长久地保存鲁迅著作，于1972年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因全书印刷的工作量大，不能一下子印出来。印好一卷，出版社就先送给毛泽东一卷。他收到一卷就看一卷。当时出版社并没有按原全集的顺序送，哪卷印好送哪卷。因为是线装本，字又较大，毛泽东看起来很方便。当时，他对这种新印的线装大字本读得很快，常常这卷看完了，下一卷出版社还没送来。就这样先后延续了几个月，全书才印装完毕。他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也差不多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 8 再阅”。

《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

整个苹果都抛掉的作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艺术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这套新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有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这套书同其他大字本书一起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路程。

毛泽东对鲁迅的小说非常熟悉。他经常谈论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阿Q。他曾说过：“《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阿Q正传》，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他还提倡写文件要像《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

毛泽东尤爱读鲁迅的杂文。鲁迅在他30多年的创作行程中，先后写了六百多篇约135万字的杂文，出版了十六本杂文集。这些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二三十年代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结晶，是中国文苑中的奇葩。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著作，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还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入地揭示出来了。

毛泽东也经常运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主张。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这个大会上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的“打落水狗”的思想来教育人们。他说：“鲁迅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

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在这次讲演中，他多次引用鲁迅杂文里的话。譬如，洋八股，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東西，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言论，针对当时文风不正的实际情形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还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批评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在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论创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门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八条，他详细地解说了四条，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10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22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入《整风文献》。

毛泽东为什么爱读鲁迅的杂文，爱运用鲁迅杂文著作中的思想和言论呢？我们知道，鲁迅的杂文，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在谈到红军到了陕北，还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鲁迅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和残害，不能直言不讳地阐明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多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并且在斗争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37年时曾说：“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

思主义的”。后来毛泽东还说过：“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他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毛泽东也爱读鲁迅的诗。鲁迅的诗和他的文一样，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它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独树一帜的。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曾用心地读过。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都画了圈。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全集共收诗四十七题五十四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遍，不少的诗他能背下来。诗集中有一首叫《湘灵歌》的诗，是1931年3月5日，鲁迅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据史书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

毛泽东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之。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最爱书写。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毛泽东等领导登台接见的時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

外国朋友来访时，毛泽东也常书写鲁迅诗句相赠。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十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等共24名日本朋友

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

三、“《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

毛泽东很喜欢读《红楼梦》，自己反复读，也劝人反复读。他多次谈过应该怎样读《红楼梦》，笔者之一有机会听到过一回。那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20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毛泽东对《红楼梦》评价极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泽东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这对于理解《红楼梦》之成为“民主文学”是很重要的。他还说过：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毛泽东曾对他的表孙女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刘少奇有一次同毛泽东谈话，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也爱读《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毛岸青、邵华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

《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60年代，他又重新阅读过。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重要情节，甚至一些典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爸爸认为《聊斋》中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他说，《聊斋》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多些就好了。

.....

爸爸不仅能背诵很多诗词，甚至对很多小说的段落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这常使我们这些文科大学生惊异得目瞪口呆。我们对他那精深的分析，独到的见解，非凡的记忆力，都深为折服。

毛泽东还读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延安时期，毛泽东读了不少延安作家们的作品，并和这些作家就其作品进行讨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这些作品的得失，给革命作家们的文艺创作以具体的指导。如丁玲的《田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反映陕甘宁边区模范合作社工作者的作品，一送到他手里，他一口气就读完，立即去信邀请2位作家面谈。当时延安的作家还创作出一批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成荫等人的《晋察冀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求雨》等剧本，他都一一阅后回信给予鼓励。此外，对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齐燕铭、杨绍萱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由李鼎铭先生推荐李建候写的小说《永昌演义》，以及郭沫若从重庆寄来的历史剧本《虎符》等，他认真看后都分别复信，或就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历史事件、分析历史人物发表了重要意见；或给予鼓励，认为这种工作是十分有益的工作。对于国外特别是苏联出版的一些有科学价值的小说，他也感到浓厚的兴趣，曾委托胡乔木把苏联作家伊林和谢加尔合著的一本描写猴子变人的小说，即《人怎样变成巨人》找来阅读。

第七节 学习英语

学英语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林克曾于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

室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至1966年。林克在此期间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对于毛泽东学习英语的生动情景，林克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作了如下叙述：

一、“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60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1954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他第一次同我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当时我的心情有些紧张。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当我谈到我的籍贯是江苏，童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才举家迁到北京时，他便谈到保定有个莲花池，原是为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花园，进而谈到曹锟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的手段收买五百多名“猪仔议员”，贿选总统的丑史。毛泽东神态安详，谈笑自若，使我紧张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我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了一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1959年1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二、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籍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我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我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我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他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考虑到他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汉英字典》（美国出版）、《英汉字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英时事用语辞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等。

为了学习英语的生活用语，毛泽东还阅读过《基础英语》和《中国建设》等。在1961年到1964年期间，他还要人把《初中英语》、《中级英语》课本、

《英语学习》杂志、外语学院编的《英语》修订本、北京大学英语系编的《英语教材》和《英语语法》等图书送给他。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第八节 学习自然科学

青少年时代,尤其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显然不如对文史哲感兴趣。但毛泽东并非始终不重视自然科学,并非始终对它不感兴趣。他在一生中仍然尽可能地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并对某些问题表现了浓厚兴趣,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列举年轻时代给他以深刻印象的西方著作时,提到一本自然科学书,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毛泽东晚年还提到过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70年,他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说的观点:旧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了。

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会见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

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 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

毛泽东钦佩达尔文的著作为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斯诺那本书的传播。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多次提到达尔文和进化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这个讲话的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节里，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毛泽东爱看《光明日报》，尤其爱看上面登载的学术讨论文章，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探讨性、争鸣性文章。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文章。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下面这封信。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励。他们原来的文章，转载在《红旗》1960年

第24期上。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语说了前面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果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用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务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1958年10月开始，到这篇文章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的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毛泽东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个杂志1956年创刊，但办到1960年年中停刊，又于1963年秋天复刊。复刊第1期是8月出版的，其中重点文章之一，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概念》（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

1963年12月16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于光远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道：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于光远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龚育之参加了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这次毛泽东又讲到这个杂志，特别讲到杂志上刊登的坂田昌一的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根据龚育之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输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

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8月24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讲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讲到细胞的起源；讲到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讲到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工具；讲到哲学就是认识论，等等。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后来游颐和园，于光远向坂田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坂田的那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因为毛泽东对坂田文章这样重视，坂田又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龚育之等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龚育之等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并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随后在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1965年第9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

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

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开了第7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作为革命领袖和国家建设领导人的毛泽东,多次强调过为了建设国家必须学习自然科学。1940年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并在成立会上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要重视学习自然科学,号召全党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

1958年初,毛泽东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毛泽东也深感自己需要学习。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段极重要的话: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第九节 读报纸杂志

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的逢先知同志，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生动地忆述了毛泽东读报纸杂志的事迹：

毛泽东有时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如此重视读报，我自己是有亲身体会的。大概是1951年，有几次因为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是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这个尖锐的批评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鞭策着我后来的工作。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热心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井冈山时期，因受敌人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读报纸则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尚泽东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焦急，苦恼。1928年，有一次他专门派出一个营去打谭延闿的家乡茶陵县的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战斗中还牺牲了一些干部和战士。1929年，下井冈山到了赣南闽西，可以看到报纸了，情况大为改善。毛泽东为此而高兴的心情，可以从当时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反映出来。报告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广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以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状。”有时毛泽东还把读到的报纸新闻及时地摘报中央。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红军占领了漳州，5月3日即将4月26日以前上海、香港、汕头等地的报纸新闻，摘要电告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摘报的内容，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从中日战事到中苏关系，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情况到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打下漳州以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的惊慌和帝国主义蠢蠢欲动的消息，共十六条，写得提纲挈领，简明扼要。

如果说,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末,在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收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40年代初期,他订阅的报刊,至少有三四十种。

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新闻,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有时读到一篇好作品,可以兴奋地一口气读到天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世界战争的全局在胸,要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阅读国内报刊的同时,还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后改名《今日新闻》),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和有关同志传阅。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毛泽东的一批珍贵的手稿,是他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间,为研究国际问题而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按十六个国家分类。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范围更宽了,不只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的、自然科学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讲琴棋书画之类的报刊文章,都在他喜爱或涉猎之列。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都在百种以上。在1956年他开始考虑适当摆脱一些政务、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后,从1958年起,我们又给他增订了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综合性的学报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报。

毛泽东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每天必读的报纸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经常看的杂志主要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文史哲》、《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刊》、《文艺报》、《诗刊》、《文物》、《科学画报》、《大众科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现代佛学》等,有时还翻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某些刊物。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

《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而对《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过意见。1964年，他说过：“《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又说：“《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后来《人民日报》加强了理论方面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毛泽东对报刊上有争论的问题尤为关注。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问题，还召集有关专家和人员共聚一堂，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交谈和讨论。

从1955年起，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1956年达到高潮，这个讨论引起毛泽东浓厚兴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面的文章已有叙述，这里不再多说。

从195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1958年6月24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1956年第2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我们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对苏联哲学界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文章，毛泽东也很注意。1958年2月1日，他要看这方面的文章，我们收集了一批送给他。当时苏联有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毛泽东，并寄来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重视。

同阅读书籍一样，毛泽东阅读报刊也常常写一些批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批给别人看。例如，1959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还注意根据报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58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认为利大于弊；有的不赞成，认为弊大于利；有的认为利弊相当。在刊物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各抒己

见。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要我们把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送给他。送去文章时我们还整理了一个简单材料附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些材料。1960年3月16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接着，3月24日他在天津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改变，说：这两年麻雀遭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科学界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把报刊作为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通过报刊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像读书一样地圈点批划。有重要内容的，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他除了看重要新闻，对《参考资料》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有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对国外情况的熟悉，常常使得一些著名外国记者为之惊讶。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毛泽东对于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认真地、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资料，是分不开的。

第十节 博览群帖

毛泽东是我国当代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终身爱好书法，对书法有很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他那热情豪放、开阔活泼，不拘古板的书法，确有云水翻腾之势，风雷激荡之姿，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毛泽东的书法技艺所以有很深的造诣，不是他生来就善于写字，而是他几十年勤钻苦学、苦练的结果。毛泽东的一生虽然经历过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对写字就很感兴趣。在湖南上学的时候，他每天都要临习碑帖，尽管当时的各种功课都很

紧张,但他还是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天天练字。这时他的书法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严紧而开拓,有较深的功力。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任务那样繁重,毛泽东仍然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后来他一直带在身边。当时延安的老百姓得知毛泽东爱写毛笔字,为了表示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敬意,他们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十分感激。可惜的是后来转移时,这方砚台丢失了。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篇篇佳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全国解放以后,他阅览的法帖更多了。1949年出国时,他还随身带着一套《三希堂法帖》。1955、1956年,他曾要把历代所有套帖全找来看。毛泽东的一生中看过大量的古今中外的碑、帖及名人墨迹。现在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存放的各种字帖、墨迹,都是毛泽东生前喜爱的并反复看过多次的。

毛泽东对“三王”(王羲之、王献之)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更是爱不释手,时常披阅。在中国留传下来的唐僧怀素的字帖:《怀素自叙帖》、《唐怀素论书帖》、《怀素苦笋帖》等毛泽东最爱看。1974年,日本已故的大平首相来访时,毛泽东特地将自己最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送给了他。大平正芳对此十分高兴。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前人的大量字帖、墨迹中,研究、吸取自己有用的东西。有的字帖,他看来看去,想了又想,反复琢磨,反复练习。从毛泽东的大量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草书和唐怀素的草书有着很大的历史渊源。但是毛泽东的行草字体,严谨隽秀,似龙飞凤舞,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毛泽东深刻懂得和纯熟运用汉字书写的艺术性。到了60年代,毛泽东的书法技艺功力精邃,用笔刚劲雄健而又流利奔腾,行款、结体奔放流畅。无论从书写的功力,还是从形体、结构等等方面来说,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毛泽东看字帖,不单看字,还很注意内容。他看的字帖中,有一种《楹联墨迹大观》,当他看到“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第四册,赵书禾行楷)的联句时,高兴地在本页字帖上画了两个大红圈。在他看到《玉红鉴真帖》中载有李长吉诗的那一册时,欣然挥笔在这册字帖封面的标签上写下了“李长吉诗”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并用红铅笔在这四个字的旁边画了一条曲线,在字的上面画了一个大圈。在他看到载有十九首古诗的一册时,又用笔在封面标签上画了两个大圈。1959年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若干册明清名人墨迹,其中的两本诗文册,毛泽东阅看时都用笔断了句,画了圈。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就是喜爱类似这样的“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字帖、墨迹。他看这样的字帖,一面可以欣赏名家的书法技艺,一面又可以欣赏名人

的诗文。他平时常说，这样又学写字又看诗文，真是一举两得！

毛泽东不但博览群帖，而且还很注意规范章草。如唐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学韵歌》等，他也都经常翻阅。

卫士长李银桥曾回忆起毛泽东一次向黄炎培借“真迹”研读的生动情景。他在《在毛泽东身边15年》书中写道：

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候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听说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领会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它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收拢起眉毛。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气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岸青和邵华，也回忆了毛泽东读帖练书法的情景。他们在《瞭望》1983

年第12期发表的文中写道：

爸爸一生除了勤奋读书之外，还十分喜欢书法。练毛笔字，也是他的一种特殊爱好。

据说，爸爸青年时代就对书法很感兴趣，坚持天天练字。那时，他的字写得很规矩、很方正，有魏碑遗风，这为他后来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延安时期，虽然领导革命的担子是那样的繁重，但他仍然抽空阅览字帖，并用毛笔写出了一篇篇著作。1956年前后，爸爸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说，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

50年代初，邵华有时随姐姐松林去中南海，看到爸爸的桌上，除了一个插满铅笔和毛笔的笔筒外，还有一个醒目的铜墨盒和一些翻开的字帖和练过字的纸。这些纸，有的是白色的宣纸，有的是带红道的信纸，上面经常写得密密麻麻的。松林常拿起这些纸来细看，发现上面写的都是一首首唐诗、宋词。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当面向爸爸请教。爸爸看到她这么喜欢唐诗、宋词，就常把自己练过字的纸送给她。松林欣喜若狂，如获珍宝。爸爸亲笔写的这些字，在她看来，那是要比唐诗、宋词本身更珍贵得多啊！

爸爸最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和怀素的草书帖，常利用饭后短暂的时间临摹、琢磨，从中研究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这样，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刻苦的练习，爸爸的书法博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们保留着爸爸在四五十年代写给岸英、岸青信的手迹，但同60年代写给我们的字相比，前后风格已大不一样。听书法家评论说，他60年代的书法功力已很精湛，用笔刚劲雄健，而又流畅奔腾，真可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自成一家了。

在60年代初的一次交谈中，爸爸同我们谈起了唐代诗人。谈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时，爸爸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20几岁的人就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就可惜死得太早了。爸爸喜欢他的《送杜少府之蜀川》，对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很欣赏。在谈话中，他发现我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很是高兴，边背诵其中佳句，边作评论。在谈兴正浓时，爸爸坐到桌前，挥动中楷羊毫，悬腕作书，为我们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名句。邵华双手接过来，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看到这一墨迹的书法家评论说：这14字分3行，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气魄磅礴，不同凡响。就全篇整体来看，结构和谐，画面很美，细看每个字，又

是谨严而有法度，笔笔不苟，没有败笔，确实是一幅十分珍贵的墨宝。

现在，每当我们看到爸爸为我们手书的这14个大字时，不由得想到，王勃这一名句确实写出了前人未曾道过的情景，意境优美，令人叫绝，而好文配上好字，才更是千古一绝。

第二章 交往活动

第一节 同学之谊

人的交往始于家庭,由家庭辐射至四邻。学校生活是现代人交往的第二阶段。在求学期间结下的同学友谊,往往是终生难忘的。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珍视的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窗5年的同学之谊。这些同学与毛泽东切磋学问、互诉理想,“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开始为研究学问、探索救国之道而团结同志。他和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张昆弟等十来人关系甚为密切。

岳麓山蔡家和城内楚怡小学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越来越感到中国形势的每况愈下,必须寻找一条出路。他们常引顾炎武的信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严肃地“以天下为己任”,通信时相互勉励,戏称自己应成为“栋梁之材”。要奔赴这样的目标,毛泽东觉得决不能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有一大帮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股力量,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认为单是团结校内和少数有志青年还远远不够;团体要结得大,有力量,还必须向校外发展。于是,他发出了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启事的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

毛泽东的征友启事发出后,由于这种创举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只征得五六个人的回信,其中就有李立三和罗章龙。据毛泽东说,李立三的应征只能算“半个回答”,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走了。罗章龙在学校号房看见这张启事后,便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愿意交朋友,随即得到复信,上面写着:“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星期天到定王台图书馆会面。

见面时没有一句应酬话，毛泽东开始就问他，最近读过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以后来往密切了，就常交换读书笔记。尽管人数不多，毛泽东仍然感到愉快和高兴。他在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唯此耳。”

毛泽东后来还回忆说：大概在1915年到1918年间，“慢慢地在我周围集聚了一群同学，这群同学后来成为新民学会的核心。他们是一群认真用头脑的人。他们认为时局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太迫切了。他们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私人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甚至日常生活琐事都一概不谈，而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的前途、各种社会问题、人类的命运和宇宙的根本。”

在茫茫黑夜、荆棘遍地的时候，这一群团聚在毛泽东周围的青年，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根植于为国家、社会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友谊，是革命者前进中最可贵的一种动力。特别当先驱者尚未投身于群众的行列和经历革命的风暴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战斗友谊，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挺身站在时代的前列，吹起革命的号角。他们之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人，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这些民族的精英，还在求学时期，就已经表现出许多非凡的特点。他们那种冲决一切罗网的勇敢精神，蔑视旧制度、旧道德和一切权贵的雄伟的革命气魄，密切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实应成为后代青年的永久楷模。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伟大的代表。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这些特点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同时，他在学校时的挚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最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除何叔衡活到60岁以外，他们短暂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初期的事业，同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都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在一师的同学中，有几位与毛泽东保持了长久的交往关系，如张国基、周世钊、萧三等。

张国基比毛泽东晚二年进入第一师范学校。他加入了新民学会。毕业后去了南洋从事华侨教育事业。1921年回国。他回忆此后与毛泽东的交往时说：

1921年2月，我因母亲去世，从新加坡请假回国。当我还未抵达家门之前，毛泽东已寄了两封信到我家里。信的内容，一是表示哀悼；二是说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不要搞任何迷信。希望把家事料理清楚，速来长沙。就是这

样，我虽万里归来，在乡下只待了两星期，就到长沙会见毛泽东。这时负责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萧某也从巴黎回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就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务发展方向，会员应走的道路，及继续向外发展等问题。还叫萧和我到一些进步单位作法国勤工俭学和东南亚各地情况汇报和介绍。每到一处，他都亲自陪伴我们，那种亲切关怀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非常的温暖和幸福。

南昌起义之后，我回到武汉，在汉阳鹦鹉洲租到一间房子。1927年8月9日，我从农讲所搬回行李的途中，遇到了毛泽东。我向他简单汇报了南昌起义情况，并向毛泽东说，现在这么紧张，你要快快离开这里。毛泽东告诉我，他当天就要离开武汉，由于街上不便多谈，我们就分手了。从这以后，直到1954年，我从印尼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才见到了毛泽东。

在会议期间，蒙毛泽东独自召见于中南海，陪我去中南海的有廖承志。一别27年了，相见倍增亲切，承殷殷垂询海外侨胞情况及个人别后经历，畅谈至深夜11时我才告辞，毛泽东远送至院外登车，依依握手而别。这种崇高殊遇，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书信频繁，互赠诗词，肝胆相照。

1913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同班学习。次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仍在同班学习，而且情谊甚笃。一直到1918年毕业，同学长达5年半。

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生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他们一直并肩战斗，亲密合作。

周世钊在第一师范毕业后，蒙王季范的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毛泽东则到北京、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1919年4月，毛泽东突然到修业小学找周世钊。周问毛住于何处？毛说未定，周便邀请毛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愿意教这几节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于是，毛泽东住入修业小学并教历史课。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壁。周世钊半夜醒来时，还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原来毛泽东还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呢。毛泽东教的历史课，每每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很受同学欢迎。

新民学会会友间通信较多，毛泽东搜集了这些信件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有一封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由北京寄往长沙，

长达2000余字。在信中，毛泽东充满感情地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同年6月28日，周世钊曾给毛泽东一信，劝其返湘。

由于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于1927年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从事教书的职业。两人一别就是23年。周世钊常常挂念自己的友人，并赋有一诗，其中有一句为“九州明月系离肠”。当毛泽东在延安、重庆时，周世钊都冒着风险致函问候。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由周世钊领衔。以后，毛泽东与周世钊先有电报来往，再有信件联系。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中说：

“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对故友称他“骏骨未凋”，感到无比鼓舞，总是乐呵呵地对人说：毛润之称我“骏骨未凋，尚有生气”。以后两人的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一位亲戚由京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邀周世钊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北京后，周世钊赠诗毛泽东《五律·过许昌》。毛泽东数年后答词《水调歌头·长江》（正式发表时将词题《长江》改为《游泳》）。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信中有《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诗》（周曾陪同毛登岳麓山到云麓宫，并即兴赋诗赠毛。）。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10月17日致函毛泽东，陈述心理，谁料只隔一周，毛泽东于25日就复函周世钊。信中说：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

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这封信给周世钊以极大的鼓舞，使他在工作上得到帮益。

1961年，毛泽东为了抒发对湖南故乡和友人的怀念与祝愿，写了一篇《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友人就是当年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解放后任湖南省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厅长，60年代初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的周世钊。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引用了“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两联以后写道：“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位友人的友谊经受着新的考验。是袖手旁观？还是火上加油？抑或直言谏劝？

1966年，周世钊看到运动的兴起，甚不理解。向毛泽东陈书，要求面见。毛泽东答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照顾”了周世钊的家。周去北京面见了毛泽东。

第二节 师生情

1902年，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读私塾，启蒙老师是邹春培，读的是《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1904年秋，他转学于韶山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至1906年夏，他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他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读《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并偷看《精忠传》、《水浒》、《三国志》、《西游记》

等。

毛泽东对这些启蒙老师十分尊敬，对邹春培等很怀念。1959年他回韶山时，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举杯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毛宇居立即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则答曰：“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塾师为毛简臣（即毛岱钟）和毛麓钟。毛泽东在其门下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6年私塾被毛泽东后来称为“6年孔夫子”，但为他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对西方“新学”教得较多。毛泽东在此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他尤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及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还从同学萧三手中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东山学校校长和教员很欣赏毛泽东的才华，并推荐他到省会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1911年春）。但他当年10月参军，当兵当年。

1912年春退出军队后，毛泽东继续求学。连考数校，后入商校就学一月，又入湖南高等中学读书半年。在高等中学校，他深得国文教员赏识，有位国文教员还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国文教员柳潜对毛泽东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极为欣赏，给此文记了100分，并称赞毛“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后，毛泽东1913年春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一师，毛来到一师继续。在一师，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继夏、王季范等。

一师当时图书丰富、校舍宽大。特别重要的是，这里有思想开明的好老师。1949年毛泽东与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在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巨大的；凡属切实认真服务于自己事业的教师，他本身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往往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与毛泽东入学的同一年，杨昌济来第一师范前后任修身、教育和伦理等课程。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人，当时在思想、治学、生活和为人处世各方面，受杨先生的影响很大。关于第一师范的教员及其影响，

毛泽东的回忆特别谈到杨昌济：“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教导他的学生们立志做一个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先生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最真挚的朋友。”

除了杨昌济外，给予毛泽东以良好影响的老师还有徐特立。从1913年到1919年，徐特立一直在一师教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修身等课，还兼教育实习主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艰苦朴素、谦虚勤奋的作风，给全校师生的印象最深。1937年1月，毛泽东在祝贺徐老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尊师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十分尊敬的另一位老师，是符定一。符定一1912年任湖南高等中学校长，正是他借给了毛泽东《御批通鉴辑览》。

1915年后，符定一居于北京，暂时和毛泽东分手了。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罗学瓚、张昆弟等人来到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这两位感情诚笃的忘年之交又相聚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来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他除了与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他们研究学问，讨论当时形势。毛泽东尤其表现出要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22年，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枪杀了湖南劳工会首领黄爱、庞人铨，激起了工人群众反抗的怒火。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000多泥木工人大罢工，并率领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被选任总干事。他还率领湖南11个工团的代表与赵恒惕辩论3天，取得了工人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但是，毛泽东却因此触怒了赵恒惕，受到赵的多次通缉。符定一这期间虽远在北京，却一直在记挂着自己的学生。他常利用回乡的机会打听毛泽东的情况。1925年，毛泽东回家养病，不料遭到赵恒惕军警的追捕。此时，符定一正好回到长沙省亲，闻知此事，便凭借自己宿儒的身分和他的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毛出险，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离开湖南去广东，他才放心。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隐居家乡新铺。次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后经乡亲们设法营救获释。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先生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他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人民群众跟毛主席、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向毛泽东辞行，先行回到北平。毛泽东托其后返北平的女儿符德芳捎上一些礼物给先生，并附信一封。信曰：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海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

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9月30日

字里行间，表现出毛泽东对老师的关怀和尊敬。

1947年，符定一在北平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叶剑英闻讯，即设法营救；北平各大学教授计80余人联名向国民党表示抗议。国民党只得将其无罪开释。1948年秋天，符定一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由北平城内化装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开始看到这位曾经要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学生的宏伟理想和事业即将变为现实，心里是多么高兴啊！符定一在此向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请符定一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作客。他对先生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后来，毛泽东要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随即补上一句说：“还要才、德、望啰。”盛情难却，符定一终于就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他先后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

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

第三节 与知识分子

毛泽东与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往很多，体现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情怀。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回忆了1955年1月毛泽东与科学家在一起的情景，他写道：

1955年1月14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坐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作点现场演示。”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1954年上半年，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

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为了加深直观印象，我把带去的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这时全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正浓，还亲自作了试验；有人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气氛十分活跃。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

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一致结论，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

毛泽东突然语气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向我提出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我随口回答。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他的问题并不离奇，要回答准确却使我作难，只好照实说：“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事有凑巧。就在同年早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62亿电子伏能量的质子轰击铜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摆有三桌饭菜，一桌六样普通的菜，多带辣味。我同毛泽东在一桌，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

席间，彭真向毛泽东提起了我的父亲：“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原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回答了彭真，然后微笑着对我说：“最近我读过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

我说。

毛泽东又说：“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遗传学家谈家桢也回忆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活动。他说：

我曾经10多次在各种场合见到过毛泽东，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曾经4次受到毛泽东的直接接见。他对发展我国遗传学的高度重视，对我们科学工作者的深切关怀，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我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是1957年3月。那时，我正光荣地出席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到会作了极其重要的长篇讲话。这篇著名的讲话，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一个伟大历史文献。

就在这次会议进行期间，一个晚上，毛泽东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一部分同志，我也荣幸地接到了通知。走进接见厅的时候，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站着，同先来的同志们握手交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同我握手。当听到别的同志介绍我的名字以后，他不住地用力摇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呵！这简短的一句话，使我激动不已。

毛泽东问我，对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那次会议按照“双百”方针，对遗传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鼓励我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泽东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彻底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负担。当时在苏联，错误地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遗传学的两派争论。他们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捏造”，是“反动的”，而把苏联人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甚至还人为地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客观规律的遗传学分为“米丘林遗

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这样，他们就以强制手段推行一种学派，压制和禁止另一种学派。这种错误思潮和办法，当时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一阵子，我们在大学里也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所谓“怕”，其根源就在于此。

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次接见，进一步解决了遗传学研究工作中的障碍。从此，我国的遗传学界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各种理论，各个学派自由探讨，畅抒己见，取长补短，大大推进了遗传学的发展。我自己也在复旦大学重新开了课。

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不久，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老人家。

1958年初，春节将一个傍晚。我在学校刚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杭州去。同行的还有周谷城、赵超构两位同志。我们猜想，可能是毛泽东叫我们去，等我们上了飞机，这猜想便得到了证实。飞机座舱里的陈设，同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完全相同。毛泽东是派了他的专机来接我们的。当时，我们的激动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到达毛泽东在杭州下榻的处所已是晚上10时以后。当我们乘坐汽车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站在门前等候我们了。他亲切地把我们迎进室内。那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主席和我们三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毛泽东十分关心遗传学的发展。他再次关切地问我：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

谈话进行到深夜，毛泽东邀我们共进晚餐。我们边吃边谈，餐后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的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两点钟，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已经两点了，你们太累，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到我们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等我们上了车才回去。

那次接见以后又过了两年多，196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这次一见我就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我说：没有什么顾虑了。当时上海市委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领导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搞起来，并且讲了当时的打算。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说：这样才好呵，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泽东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我们复旦大学把1959年成立的遗传研究室加以扩大，在1961年底建立了遗传研究所。全所设置了3个研

究室，在辐射遗传、医学遗传（包括分子病）、微生物生化遗传和进化等方面，按照国家规划开展了系统研究。到1965年的4年内，我所人员共发表了科学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种。

1974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却还记挂着我的工作。他老人家特意嘱托王震同志在路过上海的时候带来口信，关切地询问我：这几年为什么没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是正确的嘛！还鼓励我用马列主义观点指导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听到王震同志转达毛主席的关怀和勉励，我万分激动，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做出新的成绩，为发展我国遗传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与毛泽东关系甚好。他的儿子李林对毛泽东和李四光的交往作了如下回忆：

我的父亲李四光同志，一生中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的谆谆教诲，我父亲都铭记心中。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同我们谈起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心和对科研人员的鼓励。这些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我父亲。那天，我父亲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父亲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我们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我父亲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对于我父亲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我父亲。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父亲早在1932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

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认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从195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我父亲，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我父亲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我父亲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我父亲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父亲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父亲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我父亲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我和母亲等候我父亲，到深夜他才回家。原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我父亲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我父亲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父亲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我父亲对我们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了一步，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在各种场合，用

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父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力，变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父亲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一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我父亲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我父亲，马上拉着我父亲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我父亲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我父亲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那天傍晚，父亲回来了。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我父亲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便都急着问父亲。

父亲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这短短的一小时，毛泽东和父亲却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我父亲说，他很想看看我父亲写的书，希望我父亲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我父亲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我父亲问。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我父亲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

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上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父亲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和书。有一次，他指着一些大本大本的书对我说：“这些书的内容太烦琐，还有一些是错误的，怎么好一股脑儿都端给毛主席呢？”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東西，我父亲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基本上整理完了，一连写了七本书。每写完一本，父亲就让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与许多文学家、史学家在一起谈史论文。

戈宝权曾回忆了他与毛泽东的初次交往：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曾经多次见过毛泽东，但是1945年8月28日在重庆红岩村初次见到毛泽东，却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

……

记得8月28日这一天，是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日子。毛泽东在这天飞到重庆九龙坡机场之后，先在曾家岩桂园稍事休息，下午就由周总理陪同来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新华日报》的几位编委，是站在主楼旁边通往新建的礼堂的石板路上，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那天穿了一套青灰色的制服，满面红光，头上戴着一顶遮阳的盔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周恩来临上飞机时送给毛泽东戴的。我们当时站在一起的，有章汉夫、许涤新、胡绳等几位同志。当毛泽东走近时，周恩来给我们向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尽管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看来毛泽东已经很熟悉我们的名字，并且知道了我们每个人的专长，还很有风趣地给我们每个人都加上了一个“家”的头衔。他对章汉夫说：“你是国际问题专家。”对许涤新说：“你是经济学家。”对胡绳说：“你是哲学家。”最后轮到我时，毛泽东说：“你是个俄国文学家。”他还问我：“戈公振是你的什么人？是父亲、叔父，还是兄弟？”我告诉他是我的叔父。他接着说：“我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中国报学史》。”介绍完毕，我们跟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进礼堂，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见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把《新华

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

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不久，刚好碰上中秋佳节，在红岩村的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欢迎毛泽东主席的晚会。毛泽东当晚还跳了舞。那天月色皎洁，站在红岩村仰望明月，真有“山高月小”、“月白风清”之感。就在这时，我们又初次读到了毛泽东在红岩村为柳亚子书写的《沁园春·雪》，大家很快就能背诵出那些豪迈的句子。

我还记得9月1日的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来到离观音岩纯阳洞不远的中苏文化协会参加为“苏联各民族生活图片展览会”的展出举行的酒会。事实上，那次酒会成了一次为欢迎毛泽东主席而举行的盛会。当时出席的，还有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郭沫若等许多人。中苏文化协会是在一条小巷子里（现中山1路162号），楼房是木造结构，也不坚固。当参观的人知道毛泽东来了，人群愈聚愈多，把院子、小巷直到纯阳洞一带的大街，都挤得水泄不通。散会后，周恩来走在前面，一边为毛泽东开路，一边指示警卫员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当我跟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出中苏文化协会的小巷，把毛泽东送上汽车时，只听到处都是一片欢腾声和叫喊声：“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著名文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回忆了4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和他的交往活动。他写道：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从桥儿沟出发，到毛泽东那里去。

毛泽东比我1938年夏天见到的时候丰满了一些，或者说更强壮了一些。头发也比那一次梳得整齐了。大家坐下以后，毛泽东就和我们谈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们：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

毛泽东紧接着说：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毛泽东看我们几个人没有说话，就严肃地进行批评了。他说：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在这以后，毛泽东问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姚时晓说，他是浙江吴兴人。毛泽东问：你从前作什么？他说：“在上海作工人。”毛泽东又问：作过多少年工？他说：“作过10多年工。”毛说：那你是老工人了。

毛泽东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

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曹葆华说他是四川嘉定人。毛泽东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后来谈到了成都。曹葆华说，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注意地问：哪“五老”？哪“七贤”？曹葆华说一个名字，毛弯下一个指头。但弯了两三个就不动了。曹葆华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了。我去延安以前，在成都曾住过半年，我也听说过“五老七贤”这个总的名称，但却没有打听具体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毛泽东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

毛泽东招待我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他和我一起喝酒，吃饭，继续交谈。

吃完午饭，毛泽东到卧室去休息。我们仍坐在中间的窑洞里。不久，毛泽东就出来了。

严文井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谈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其中一篇题目叫作《席方平》的，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

毛泽东还讲了《聊斋志异》的其他优点。毛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我们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

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我们中间，有一个同事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笑着有风趣地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事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我们看时间不早了，就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站起来，送我们出窑洞，继续和我们一起走着。到了一片比他窑洞门前的平地高一些的地方，他才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别。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眼睛看着我们，停顿一会儿，好像把重要的革命任务交给我们，期望我们努力去完成。

1959年春季，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来，交给我们一个任务：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泽东的思想。这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到会同志。我们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序。毛泽东指示，要我写。我起草了序文，经过几次修改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1961年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我在文学研究所办公。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毛泽东办公室通知我，叫我立即到中南海去，毛主席对我起草的序文有指示。

11时许，我到颐年堂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在里面一间卧房里接见我。一张普通木框的沙发床，就像我在马列学院作国文教员时公家借给我的那种床。床头一边一个茶几，上面各放一盏景泰蓝座子的台灯，灯罩上半遮绿绸。卧床里面用两块长木板搁起来，上面放有许多书籍和文件。我想，我起草的序文的稿子，大概就曾放在木板上，跟许多等待毛泽东深夜翻阅或批阅的书籍、文件在一起……

我坐下以后，在毛泽东身边服务的同志送来一杯盛在玻璃杯里的新沏的碧绿的龙井茶来，放在我面前的矮小茶几上。

已有两位同志在座。先到的同志中，有一位在谈当时农村的“辩论会”。他

说，名字叫“辩论会”，实际成了斗争会。毛泽东说：以后叫商量和讨论的会，大家都可以讲话。

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在这以后，毛泽东就谈起别的事情来了。他谈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他对我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你没有参加。毛泽东在讲当时国内工作的问题的时候，我感到他是带有深深的忧虑的心思的。我感到他是那么关怀全国人民遭受到的困难，那么和人民的心相通。毛泽东又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刚才那位谈农村“辩论会”的同志说：“这两年有些强调一个方面，如强调不断革命论，就忽视革命阶段论。”

毛泽东说：现在要强调另一个方面，要稳定下来。毛谈到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有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统购、高使用。高指标是主要的。

后来谈到了逻辑学。毛泽东说：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

刚才插话的同志说：“欧几米德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毛泽东说：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最后，毛泽东谈到他写了两首近体诗。他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他还说：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他说的近体是指七律。这两首七律虽然没有发表，后来我们是读到了的。那是两首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诗。

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改了《不怕鬼的故事》的序，再送他审阅。1月23日下午两点半，又接到电话通知，叫我到毛泽东那里去。

毛泽东还是在那间卧室里接见我。已经有4个人在座了。毛对我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

他把加上的那一段念给大家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传到我手里，我喜出望外。在稿子最后一页多的空白处，写满了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文字。后来书出版了，序的最后一段，整整12行，都是他增加的。我又从头至尾翻看。他修改的地方还有好几处。其中有两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处是加了这样一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晶流丽，春暖花开了吗？这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是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

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接着他又对我说：虽然有些同志批评你，我对你还是有好感。

毛泽东说对我的批评，是指反右倾运动中许多同志对我的批评。

然后他又谈起序文来。他叫我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这以后，和上次一样，毛泽东谈起国家大事来。他说：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最后，毛泽东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也是上次那位插话几次的同志说：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泽东像是回答他的问题，也像是发表他思考的结果似地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这两次听毛泽东谈话，我都感到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但因为不是在正式的会议上，我都没有当场做笔记，而是准备回来追记。但毛泽东讲了这段关于美的问题的话，我却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记上了。

毛泽东继续说：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他又说：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

这次告辞时，我问：“把主席改的稿子誉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毛说：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上午，我要通信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当天就看了，退了回来。他亲笔批示说：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毛泽东又说：

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退回的稿子中，毛泽东把上一次增加的那句话：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改成这样：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的思想是多么细致、周密！这个修改的重要意义在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

吴晗是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与毛泽东曾有一段密切的交往。毛泽东曾同吴晗探讨“彭和尚”之谜，交给他几项史学任务等。

1948年11月间，吴晗来到石家庄解放区。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亲自接待了他，同他亲切地交谈。毛泽东在百忙中，还很关心吴晗的《朱元璋传》，认真阅读了原稿，还找吴晗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对书稿中关于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西系红巾军领导人彭和尚的一段描写提出了疑问。

吴晗在1948年《朱元璋传》的修改本中，对彭和尚的为人是这样写的：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吴晗还称赞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特地对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

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不久，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1月24日

解放后，吴晗重回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细翻《明实录》和其他文献，果然查出彭和尚被元朝军队在杭州擒杀的史料。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对此，吴晗在《朱元璋传》1965年版的序言中还作了自我批评。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亲自交给吴晗两项工作，要他主持改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和主持标点宋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同年10月，由吴晗出面，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召集首都部分史学家，研究如何完成毛泽东交给的这两项任务。会上决定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委员有范文澜、吴晗、黄松龄、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史事。但因为没标点，一般读者看起来很不方便。在吴晗主持下，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工作小组，成员有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贺昌群、聂崇岐、容肇祖、齐思和、张政烺、邓广铭、周一良、何兹全。第二年又成立由顾颉刚、聂崇岐、容肇祖、王崇武组成的校对小组。标点采取分工负责，先由各人自行标点，由两三人互校，然后交工作委员会审查。这项工作按时完成，在1956年2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吴晗还主持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的学者，长于历史地理的考证，所著《历代舆地图》对了解我国历代地理沿革有参考价值。因此，毛泽东建议以杨图为基础，绘制一部《中国历代舆地图》。吴

晗对历史地理虽无专门研究，但很内行，加上他的杰出的组织能力，所以，毛泽东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年春天，吴晗邀请尹达、翦伯赞、侯外庐、侯仁之、金灿然、谭其骧、张思骏、欧阳纕等人开会，组成改绘杨图委员会，决定由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持具体的改绘工作。到1965年，《中国历代舆地图》大部分绘制完毕，只剩下西北一部分及青藏还未完成。《中国历代舆地图》是以我国历代疆域政区和民族分布为主的古今对照的大型历史地图集，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和核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但由于吴晗的组织领导，谭其骧教授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吴晗对海瑞这个著名的清官很有感情，但比较集中地研究海瑞却是在1959年4月之后。

这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并向有关同志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又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一位领导同志把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便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同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之后，吴晗又写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传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

1959年9月以后，北京京剧团著名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尽管吴晗并不懂得戏，他还是答应了。《海瑞罢官》这个戏从动笔到写成，七易其稿，终于获得成功。

《海瑞罢官》一剧公演以后，毛泽东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还对他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也非常高兴。

谁也没有料到，数年之后对《海瑞罢官》的所谓批判，竟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炮制姚文元那篇所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了长期的阴谋策划。江青早在1962年就找到中宣部、文化

部的4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马，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得逞。江青气急败坏，跑到上海找张春桥组织人写。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还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一桩冤案就这样产生了。

毛泽东还与许多艺术家交往。1949年初，毛泽东曾写信给齐白石，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隔年夏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看望白石老人，第二天又把他接到中南海畅谈品茶，共进晚餐。1953年齐白石90大寿时，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令白石老人激动不已。

毛泽东与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有令人难忘的交往，听相声，关怀和鼓励倍加。

第四节 与民主人士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同许多知名民主人士保持良好关系。

一、毛泽东与开明士绅李鼎铭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与李鼎铭的交往是有口皆碑的。李鼎铭向毛泽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良策，为毛泽东治病……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战士和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30分钟的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开动脑筋，争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李鼎铭先生原是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曾在米脂创办小学，这个小学被当时复古的绅士封闭了，后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他为人正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

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鼎铭先生的心。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事前有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有怀疑，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但他看到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参加大会、小会，找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深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就大胆地提了出来。

“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果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延安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反复翻看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先生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同时，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党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去。精兵简政的实施，对于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先生在这次参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搬家来延安，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来延安不久，毛泽东就接见了。那一天刚到黄昏，毛泽东就派车接他到杨家岭，亲热地把他迎进土窑洞里，问他搬家的情况。他说，把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泽东说，

留一点吧。他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哈哈大笑着说：“你真是开明人士。”当时，人们把进步士绅称为“开明绅士”，毛泽东叫他“开明人士”，这是对他的高度赞扬。

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来杨家岭，毛泽东工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他总是恭恭敬敬、聚精会神地听着。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他，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他在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先生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来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曲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他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连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李鼎铭先生很注意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下功夫阅读《资本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更加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在几次讲演中激动地说出“中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年虽六旬，已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等肺腑之言。

在党和毛泽东的关怀下，李鼎铭先生的觉悟不断提高，他为团结抗日和边区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边区实行减租减息以后，有极少数地主借故撒佃，威胁农民；有的还用种种办法欺骗政府、抵抗减租。为了保证佃权，陕甘宁边区于1943年12月制定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李鼎铭先生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并在条例公布后不久，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全边区各界人士予以积极赞助和拥护。他还经常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如1942年7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来到延安。参观团中有不少人因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当李鼎铭接见时，要求他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先生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从共产党这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诚心实意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士绅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毛泽东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痛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看病。切脉后，他说，吃4副中药就好了。那时，中西医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不同意毛泽东用中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中西医两法治病的主张，他是相信中医的，还是坚持把4副药吃了。吃完后，果然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以后，毛泽东有病就请李鼎铭来诊治。有一次，毛泽东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

作，李鼎铭先生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给毛泽东治疗。李鼎铭说，在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毛泽东欣然同意他在院落阳光下按摩。起初一天一次，后来隔一天一次，每次看病免不了要谈些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战胜疾病的方法，有时还要讨论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毛泽东对李鼎铭说，现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学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毛泽东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同时，也学到了许多中医保健知识。

毛泽东不仅自己相信中医，还介绍李鼎铭给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他还经常谈到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西医要向中医学学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李鼎铭先生曾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推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二、毛泽东和华侨领袖陈嘉庚

从抗战开始，毛泽东与陈嘉庚结下深谊，这种友谊一直保持下去，庄明理对此作了如下忆述：

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海外广大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这样，陈嘉庚先生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热烈响应，派出代表组成慰劳团，共50余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嘉庚先生年近古稀，腰骨常疼痛，但为使慰劳团能尽南洋华侨代表之责，他不辞辛劳，毅然率团回国。

.....

慰劳团在重庆逗留期间，中共领导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嘉庚先生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嘉庚先生欣然应邀前往。在茶会上，嘉庚先生介绍了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及其任务之后说，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若发生内战，将为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会大失所望。万

望两党以救亡为前提，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会后，嘉庚先生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同志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先生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

嘉庚先生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并设晚宴招待。窑洞陈设的俭朴，领袖和同座谈话的平等融洽关系，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嘉庚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先生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嘉庚先生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嘉庚先生将此意转达蒋介石。毛泽东还表示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望，希望陈嘉庚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老一一答应。有一次，毛泽东和陈嘉庚先生共进晚餐后，又来到陪同陈先生来延安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他交谈到很晚。对此，嘉庚先生感触尤深，认为毛泽东竟与一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他还对我们说，我对延安的印象，不是只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介绍。我也同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峨嵋山的半个多月里，每每谈起延安之行，嘉庚先生总是很兴奋。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老人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为庆贺他安全脱险，在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大校友会、福建同乡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等10个团体，举行了有500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的组织工作。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到会了。毛泽东也送来了祝贺的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从大会的致电和报纸上得知大会盛况，以及公众对自己的崇高评价以后，在给庆祝大会的复电中说：“敌寇南侵，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庚避匿爪哇，未同诸侨分苦，实深抱愧。……”

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以国家、民

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嘉庚先生听说以后，担心毛泽东受害，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后来，嘉庚先生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

还政于民，谋皮于虎。

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可见他对蒋介石的为人看得入木三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毛泽东安全的焦虑。

1946年3月底、4月初，我从重庆经香港回到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介绍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以及蒋介石阴谋撕毁协定的情况。当时，看到在怡和轩陈嘉庚先生的会客大厅墙上悬挂了一张毛泽东画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泽东像啊！

.....

1949年2月间，我在槟榔屿接到陈嘉庚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回国去，邀我同行。我即于4月初至新加坡，方知原来是毛泽东于1月20日给陈嘉庚先生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

我们于4月底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继续乘船北上，于6月3日驶抵达天津。6月4日，当我们乘坐火车来到北平时，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的热诚欢迎。7日，周恩来亲自接我们到西山同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也在座。延安一别，转眼9年过去了，故人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亲切。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全中国解放在即，也许是因为时局的发展证实了自己延安之行后的预见，嘉庚先生显得很激动。相互问候饮食起居之后，嘉庚先生即对解放大军胜利过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表示祝贺，谈自己在北上途中得悉这些消息时的心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建何时能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当毛泽东答复已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前往时，嘉庚老人很高兴。在这次晤谈中，嘉庚先生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足见他对毛泽东的信赖。.....

1950年，陈老先生回国定居。他把全部财产献出来，用于建设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村。在建立集美解放纪念碑时，他写信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很快寄去了手迹。这块纪念碑，作为人民领袖同爱国侨胞亲密交往的又一见证，屹立在嘉庚先生长眠的大地上。.....

三、毛泽东与黄炎培

黄炎培是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他1945年7月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的几次交往，两人自此结下深厚情谊。两人的友谊，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上，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飞机于上午9时35分起飞，下午1时半平安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三十来人，一一握手致意。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 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邠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呈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

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 20 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画是 1943 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在 3 天中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 10 几个小时，造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在延安的 5 天当中，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还对他执弟子礼。当然，他们一行访问延安，主要是为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但对黄炎培来说，却是一次对他的晚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留学”。而毛泽东和黄炎培这两位政治家和诗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7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专诚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上的看法。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净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

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不易的至理名言。

当时，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在延安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眼界，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在那个年代，国民党造了多少谣言，天天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边区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老百姓。而黄炎培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却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那么自由、温暖和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鼎鼎大名的将领又都那么温文尔雅。这要多大的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他的讲话和文章，在大后方造成多么大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了。

……

黄炎培从和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的深情厚谊中获得了力量。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在毛主席留渝的43天中，黄炎培和毛泽东有上10次的会晤和聚宴。这是黄炎培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交往的续篇……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人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一旦脱离黑暗的樊笼，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黄炎培心潮澎湃。当第3天叶剑英（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和徐冰同志在国民大戏院为他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随后，毛泽东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即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勸勉，信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不断收到一些工商界人士的告状信，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前进。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泽东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泽东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

察之。”

……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耽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毛泽东阅信后，特地邀约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在当天（3月15日）的日记上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建国以来，黄炎培和民建会同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了历次运动，并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开展爱国守法和自我改造教育。当年的9月初，民建会北京市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事先认真地亲自写出了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他特地把讲稿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刻帮他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毛泽东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一、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

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还在信中诚恳地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读了极其感佩振奋。当晚他就给毛泽东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此后，黄炎培在党中央领导人指导之下积极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1953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付给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使命是非常光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呢，这是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

决议》，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其时，黄炎培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泽东立刻回信嘉勉他说：“从医院给我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信末，毛泽东又附笔：“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长沙》。

第五节 与国民党将领

毛泽东的非凡魅力，不仅使他交结了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而且赢得了一群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心。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张治中、傅作义、李宗仁等。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有名的“和平将军”。他在抗战胜利后，为消除内战而奔波，在重庆谈判中与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之后三到延安。1949年4月和谈失败后，终于归向我党。建国后，他被毛泽东委以要职，两人坦诚相待，肝胆相照。以下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有关毛泽东与张治中1943年至1946年间交往活动的回忆：

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来电约张将军去重庆官邸。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蒋当即写下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转交。那天正是林彪准备由重庆回延安去，张将军在桂园设晚宴为林饯行。席间，张把信交给林彪带回。不过，以后一直没有听说有回信，张将军也一直未向中共代表询问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许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坚决拒绝。国共两党在各地的冲突日见严重。张将军盱衡全局，旧事重提，建议蒋介石正式邀请毛

泽东来重庆谈判（听说吴鼎昌亦同时有同样的建议）。蒋介石同意了，接连3次去电邀请。中共方面亦同意。这时正好赫尔利（前任罗斯福总统代表，后任美驻华大使）衔美政府之命参加国共调停工作，于是蒋派张将军作他的代表偕同赫尔利于8月27日飞赴延安。第二天，他们就陪同毛泽东胜利到达重庆。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百孔千疮、精疲力尽，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加之国内外人心厌战，蒋介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他对中共，一是恨，不共戴天，非吃掉不可；二是怕，他常对心腹左右说：共产党厉害呀！你们不行。

毛泽东到重庆是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周恩来对此费尽脑筋，时刻在意。红岩会客不方便，坡陡阶多，上下不便；曾家岩50号又太狭小迫胁；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18号（桂园）。房舍和设备虽不算好，但还合用，而且距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一开口，张马上同意，表现出友好合作，自己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去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在桂园和外出时怎么办？张表示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他家乡的子弟兵。但当时重庆散兵游勇多，袍奇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周恩来、张治中研究结果，决定让宪兵担负这个任务。张治中马上找到当时的宪兵司令张镇，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蒋内心的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却十分重视。毛泽东刚到重庆（8月28日下午3时45分）征车甫歇，就在当晚8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邀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参加欢迎晚宴。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到官邸宴会。宴后，蒋介石、毛泽东作第二次直接交谈。从8月29日到9月3日，张治中等和中共代表团又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当时，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除张治中外，还有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王世杰根据9月2日双方代表交谈内容追记了一份要点——《今日商谈之结果》，包括：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民主自由问题、政党地位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受降问题等8项，都有具体内容。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11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等。中共代表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有化，结束

党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16个军48个师，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到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释放政治犯，解散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9月4日，蒋介石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态度极端傲慢：“中共代表3日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自相矛盾，不该提出。”他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的8至10师，最高不得超过12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政府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中共和各党派人士均可参加，中共如急于现在就参加中央政府，亦可考虑；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毫无诚意的，而张治中等又不得不据此与中共代表谈判。蒋介石、毛泽东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代表的谈判是在林园和“尧庐”（蒋介石的侍从室所在地，也是蒋官邸之一），双方都派人记录。合计在山洞林园、桂园、尧庐3地商谈达23次之多。

经过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的《谈判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之基础，暗示军令和政令的统一不能退让这一阴谋外，答复说：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办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统一军令政令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定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军队整编最高额为12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但双方都明白，国内外形势所迫，只能力求妥协。所以经过43天的拉锯战，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协议。10月10日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应该说，协议的达成，是中共识大体顾大局的结果。张将军在解放后写回

忆录时也说：“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自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在谈判后期，协定的主要条款已基本达成协议。当时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有人向毛泽东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定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周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们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欢迎欢送晚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及党政军各方面人士500多人参加。在当时的重庆，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会上，张将军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送词。他首先指出毛泽东到重庆来，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怀。然后介绍了双方协商的情况，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致了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将军的宴请表示感谢，同意张将军对商谈结果的估计和说明。毛泽东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0月11日，张将军乘专机亲自伴送毛泽东回延安。当晚，中共中央为张将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张将军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

张将军在重庆谈判后，又参与了整军谈判。

日本投降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的部队靠美国的海军、空军从后方运去“劫收”，共产党的部队靠两只脚去接收。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的核心问题。

国民党的四位代表中只有张将军是现役军人，因此蒋把整军谈判交给他。

此时，张将军还在新疆与伊宁、塔城、阿山3区代表进行和谈。接蒋电后，即返重庆。由于在兰州耽搁了几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张一赶到重庆，马上投入了军队整编的谈判，即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

整军会议前夕，马歇尔起草了一个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陆海空三军；二、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师由中共领导；三、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部队的官兵，最少占实力的30%；四、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部队的官兵，不少于总实力的30%。这个方案蒋当然不能接受，要求马歇尔修改。修改后的方案，中共与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1：5，海空军两项全部删去。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时间虽只有11天，双方都是寸土不让，针锋相对。

张将军认为中共本来有100多万正规军、200多万民兵，现在愿意缩减为24至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可以考虑接受。因此在向蒋汇报会议情况时，提出了这个意见。蒋大不以为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恰好蒋的侍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歇尔很惊奇，蒋愤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将军忙向皮示意，不要照译，杂以他语，遮掩过去。

协议达成后，为了郑重其事，举行了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地点是重庆尧庐。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签字并作了简短讲话。张治中说：整军方案将结束国共两党18年来的武装冲突，奠定军队国家化的基础，进入新的和平时代。使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国家建设获得保障。并郑重提出，代表签字后，保证百分之百地执行。周恩来说：整军方案、政协决议、停战协定三者是同样重大的事情，实行时是会有若干困难和阻碍的。只要两党和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任何困难都不能妨害方案的实施。凡是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是这个方案，我们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其实现。张将军对此方案的签订有很大的功劳，愿对20年来多次合作的张将军表示感谢。

整军方案签订后，为了部署方案的实施，同时也为了解决各地两党军队的冲突，周、张、马歇尔三人乘专机到各地视察，历时7天。先后到北平、济南、张家口、集宁、归绥、徐州、新乡、武汉等地，最后到达延安。延安并没有两党军队冲突问题，所以去那里，主要是马歇尔想到延安看看实际情况，并同毛泽东会面。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张治中在欢迎会上讲了话。他希望全国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

后张将军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他幽默的话语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会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者甚众。起初，这些将领往往心灰意冷，惶恐不安，不知中共会如何处置他们。但是，毛泽东展示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宽宏大度，他与国民党起义将领坦诚相待、娓娓而谈，常常一席话就使这些过去曾犯过历史性错误的人精神振作、激动万分。毛泽东对傅作义的善待就很典型。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段日子里，傅作义闷闷不乐，精神不振，不知共产党对他的历史功过将做如何评价。于是，他来到西柏坡拜见毛泽东，袒露心迹，与毛泽东进行一番感人至深的谈话。

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愉快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说：“我有罪！”

毛泽东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这几句话，使傅作义几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这就是说，对他的罪行的清算结束了，毛泽东把他当作亲戚和朋友看待了。

毛泽东、傅作义一起进了会客室。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北平和平解放得最好。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团聚。特别是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英法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把紫禁城打毁了，闻名古都都破坏了，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

听了毛泽东这番真诚的谈吐，傅作义激动地说：“我个人要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好弥补我的过错。”

毛泽东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

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你对水利感兴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将来你可当水

利部长么！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很有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等，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也是很出名的，现在都是我们最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主要是思想和立场问题……今天初次见面，我觉得我们能谈得来，能合作共事……我们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吧……”

周恩来说，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意见，想法，随时提出来商量，不要有顾虑。

傅作义连连点头说：我的后半生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4日，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李克农风趣地说：“毛主席一席谈，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1965年毅然决然回归祖国，是毛泽东与新中国巨大感召力的最有力的证明。程思远对1965年7月下旬毛泽东与李宗仁会面情景，作了一个生动的回忆：

公元1965年7月21日。

被阳光和星光分别照耀着的两半地球，都得到了那条从北京发出的消息。无线电波充满了乙太；卷筒印刷机以每小时数十万转的高速度在飞速旋转。代表着“李宗仁先生回归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意思的各种文字，各种符号，随着空气的震动和油墨的芬芳，在大气层中弥漫，一时，“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先生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这个出人意料的喜讯，使李宗仁先生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给他的礼遇，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亿万人民，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赞赏。

但是，作为一个失败了的阶级的代表，去会见一个胜利了的阶级的代表，心中免不了有些忐忑不安。

他的不安，显然是多余的。在见了毛泽东之后，一颗悬着的心立刻踏实了。

那时，中南海游泳池新落成不久，毛泽东就在游泳池边的休息室里，会见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我。

李宗仁先生一行刚走进休息室，毛泽东便热情地迎上来，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

在桌边的藤椅上坐下来之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先

生、郭德洁女士和我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表示感谢之后说：“这几天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我们为祖国的强大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我，分别谈到了海外许多人士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听了毛泽东这一番话，李宗仁先生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他觉得毛泽东主席今天在这里以礼相待一位在战场上被自己所领导的军民打败了的敌手，既不翻旧帐，也不咎既往，这本身不就是对海外人士的一个亲切有力的呼唤么！

毛泽东幽默地说：“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作‘匪’，还叫祖国大陆作‘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我坐在一旁，连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接着，谈话越来越随便。毛泽东旁征博引，用大量的古代诗词和文章，考证历史上所说的“六军将士”，如何变成现在常讲的“三军将士”。

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毛泽东邀请程思远先生和他一起下水游泳。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游得那样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我迂迴于毛泽东的左近，出入水面，挥洒自如。我游到毛泽东身边，毛赞许说：“你游得不错嘛！”我笑了笑：“跟不上主席啊。”

毛泽东在水里游了好一阵，才上岸来晒太阳。他让我坐到自己身边，询问我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我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

我茫然不知所对。

毛泽东徐徐说道：“靠总结经验。”

下午一时许，毛泽东带李宗仁一行来到丰泽园住所。他同李宗仁先生又谈了一会儿。李宗仁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毛泽东理解他的心情，说：“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毛泽东又问我：“你为什么叫程思远呢？”

我回答：“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又问：“你有别字吗？”

“没有。”

“那好，”毛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我笑着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的最大光荣。”

在座的人也都笑了。

随后，毛泽东提议照相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下午3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悄声向我提议说：“可以散了吧？”我点头赞同，侧身对李宗仁先生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毛泽东用目光盯着我说。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第六节 与末代君臣

毛泽东胸怀宽广，甚至与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有一段感人的交往，生动地体现了他不仅要改天换地，更要改造人的伟大思想。王庆祥对毛泽东和溥仪的交往作了如下的记述：

1962年1月31日，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几人在同一个早晨收到请柬，是毛泽东约他们到家中小酌。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乡，又都是清末以来的革命家或社会贤达。

章士钊等四人陆续被接到颐年堂前。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毛泽东雍容大度，出语诙谐。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颇觉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毛泽东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章士钊等人正在猜测这位“顶头上司”到底是谁，一位高个头清瘦男子已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毛泽东显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人，却

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环视应邀而来的客人，微笑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方知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坐在眼前。

毛泽东为溥仪设家宴并待之为上宾，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历来注重溥仪的改造，关心他的转变和点滴的进步。

当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监押的时候，毛泽东就很注意阅看关于溥仪改造的上报材料。当他得知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之后，便在1956年2月亲自向载涛当面建议，让他携家属前往抚顺探视溥仪。两个月后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肃反和统战问题时再次提及溥仪，他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毛泽东在1959年夏天，听取关于伪满战犯改造情况汇报后，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首次提出特赦溥仪等战争罪犯的动议。

溥仪特赦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每次谈到改造旧阶级、旧思想，总忘不了举出溥仪为例。

毛泽东的家宴没有“燕窝席”、“鱼翅席”的排场，也没有溥仪当皇帝时常常见识的“满汉全席”和无比奢华的“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有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毛泽东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和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遂又笑问：“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很好吃！很好吃！”溥仪鼻尖上已沁出汗珠。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毛泽东风趣地说完这句话，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既出，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

“你还没有结婚吧？”毛泽东知道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遂改换这个话题。

“还没有呢！”溥仪答。

“可以再结婚嘛！”毛泽东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饭后，毛泽东与邀来的客人合影留念。他还特意拉溥仪过来，让他站在自己右侧，两人拍了一幅合影。这以后无论住在独身宿舍还是有了家庭，溥仪总把这张照片摆在床头几上，像宝贝似的藏着。湘味家宴过后，设宴人与赴宴的主宾再没有面对面地交谈过，然后，设宴人从来不曾忘记这位座上客。

1963年11月15日，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访华期间会见了毛泽东。他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司法角度。

毛泽东：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切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毛泽东：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50几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切拉：听说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毛泽东：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毛泽东正视并公允评价溥仪的历史，同时也正视客观对待溥仪的未来。

10天后，毛泽东又在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张致祥陪同下，接见了古巴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作家比达·罗德里格斯。谈话中有如下内容：

张致祥：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达：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毛泽东：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

张致祥：溥仪今年57岁了。

比达：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毛泽东：他很不满意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很不自由的。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再度谈到溥仪。当然还是从“改造”、“转变”等字眼切入话题的：“……做坏事总是很少数，并且做坏事的人也可以改变，甚至跟我们打过仗的、被我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可以改造。经过改造，他们不那么反对我们了。还有一个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他现在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毛泽东这番议论得到智利客人的赞赏，见过溥仪的巴斯克斯先生这时也插嘴评论溥仪：“过去他只能看小山的景致，现在他解放了。”毛

泽东继续说：“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得人是是可以改变的……”作为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这最后一句话曾经那样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国家，它渗透在教育政策、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改造政策之中。

毛泽东还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甚至任用和关怀清代大臣载涛，使其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50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了一纸委任状，“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一天起，这位曾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得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亲贵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

载涛的哭，决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泽东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陈腐为新生。他更喜新社会好，连自己这株枯木，也能逢春，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满腹心思，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他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一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两千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泽东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

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片心意。

第七节 与外国人士

毛泽东真正与外国官方及民间人士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前后。在此之前，他曾有机会赴国外留学，但他放弃了。对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从一开始就予以大力帮助，派员莅临指导。但毛泽东并没有同哪一位国际代表建立友谊，甚至他很少与他们接触。

埃德加·斯诺，是与毛泽东最早建立友谊的外国人之一。1936年，22岁的美国新闻记者斯诺，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他和毛泽东在保安昏暗的烛光下彻夜交谈。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别人——一个外国人回忆了自己的生平。从顽童时代一直谈到长征，谈到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不久，斯诺出版了以这次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一书，并立即轰动了世界。毛泽东看到当时此书的中译本时，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此后，斯诺继续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提到斯诺时说过，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他不仅是第一个广泛报道中国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推动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两国的对话起了良好的作用。

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始终是毛泽东最好的外国朋友之一。1936年访问毛泽东之后，他又多次访华，与毛泽东亲密交谈。1960年他与毛泽东重逢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这就是他们两人间互相信任、始终保持崇高友谊的基础。

对这位异国知音，毛泽东无话不谈，甚至讲了自己连身边人员都不太讲的思虑。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同他作了非常知心知底的谈话。比如，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毫不隐晦地说：“那就早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毛泽东还

向老朋友明确表露了自己对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反感。他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斯诺还问：“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毛泽东答道：“不怎么样。”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武斗，把中国搞得大乱，一个是虐待俘虏。他还对斯诺说：“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30多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啦，还是没有变啦，总是以朋友相待啦。”最后，毛泽东又强调：“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毛泽东对待外国民间人士以诚相待，而且对西方高级政治家、军事家也不打官腔，不讲“外交辞令”。他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交往就十分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特点。

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蒙哥马利两次访华。在访华过程中，他一直想问但总觉得不便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百年之后，谁作毛的继承人？当毛泽东从当时陪同蒙哥马利元帅的熊向晖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安排再次与元帅亲自长谈，捅破这层纸。熊向晖对这一过程作了详细的回忆。他写道：

22日上午，浦寿昌打电话给我，要我在北京饭店等他。不久，他提着皮包来了。他说：“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周总理要你和我（浦寿昌）马上坐专机去武昌，让你先向主席汇报主要情况和主要问题，让我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这天下午，我和浦寿昌飞抵武昌。机场上停着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东湖毛泽东的住处。

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我先提到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然后讲了我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毛泽东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我讲完了之后，他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我说，“Successor”。毛泽东叫我在一张纸上写出来。他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作了解释。毛泽东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译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我说也许是。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毛泽东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5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

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东湖会见他，并共进晚餐。

蒙哥马利赠送给毛泽东一盒“三五牌”香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对他提出的三原则有何意见……等等。

毛泽东逐一回答。谈到9时30分，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谈话就此结束，互相道别。尽管谈话中彼此问过年龄（这年毛泽东68岁，蒙哥马利74岁），但蒙哥马利并没有问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我想，我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汇报时所作的揣测，是完全错了。

没有料到，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通知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寒暄几句后毛泽东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泽东

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谈到下午5时，毛泽东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毛泽东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并把他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礼。

70年代初，毛泽东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会谈时，同样显示了他坦率大度的个性和幽默机智的语言风格。

当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当谈美国的总统选举时，毛泽东说他必须老实告诉美国客人，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他还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欢右派”。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右派有时比较现实些。他还自嘲地说：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当尼克松说要打倒的也包括他这样的人时，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1972年同毛泽东的那次会谈时写道：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一次会晤进行了65分钟，其中翻译还占去了一半时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第八节 与身边工作人员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大致有四个系统：卫士、警卫人员、医护人员和各种秘书。毛泽东与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毛泽东对他们的工作严格要求，对他们的生活和进步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工作人员不少后来离开了毛泽东，临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令人难忘。毛泽东的卫士、医护人员、秘书，以后写了或者讲述了他们与毛泽东在一起的难忘日子。

一、与卫士

毛泽东的卫士田云玉回顾与毛泽东在一起时的情景时说：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里，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咪咪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先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平等的气氛，并且从来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发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劈面掷去，击中他脸孔，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此挨了严厉批评。这类事不少发生，江青多次说过：“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

确实，毛泽东和江青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我办错了格格一笑便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我挨批评，听声音很大，但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便露出一一种亲昵，不会让人紧张。有时，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

那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住我打量，忽然问：“小田，你今年多大了？”

“17岁了。”

“哎，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我这里，那不把你耽误了？我送你上学校好不好？”

“不好。”我摇头，“还是在您这里好。”

“没出息！”毛泽东皱起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

“我年纪大了。”

“你还小，才17岁么。”

“17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就太大了。”

“你已经小学毕业了么，可以上速成中学。”

“再等两年吧……”我含糊其辞。

“你呀，”毛泽东指点着我摇头叹气，“你就不能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有志气有出息。你就是像李银桥一样，不愿意上学！”

毛泽东关心身边人员的进步，亲自给他们布置任务、修改文章，甚至出钱为他们办业余学校。卫士长李银桥对此作了下面的回忆，并从毛泽东1955年5月14日接见警卫部队说起：

……部队的同志们都换了崭新的军装，站成队列。毛泽东走到队列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也有些没有担负过内卫任务的战士，叫不出名字，便一一询问。院子里的气氛很快便活跃起来。

毛泽东讲话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亲切、随便，喜欢启发式，习惯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复杂的道理。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的目光从前扫向后。队列里就有人回答：“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点头，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一般不爱讲空道理，特别是对工农兵，讲话只讲有具体内容的话。他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时，他抬起左手，用右手搬着指头说：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作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意义作了详细阐述。并且热切地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要研究社会，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事后毛泽东对我讲：“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成员，须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

那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战士都要写调查报告。有的战士文化程度低，错

别字连篇，毛泽东总要提笔一一改正。记得警卫战士王文礼一连写了六次才完成调查报告，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给他改错别字，而且耐心讲解每个字的用法。战士高碧岑的材料，毛泽东修改完后，说：“写的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罢，毛泽东在高碧岑的材料上写下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现在这份材料就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不久，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归来，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激动，在调查报告上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

由毛泽东出钱为战士们办了中南海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到1957年时，战士们的文化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写的调查报告质量也越来越高。

毛泽东还曾为卫士介绍过对象。卫士封耀松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回忆说：

每次睡前按摩，都是主席和我们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泽东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唉，人生易老啊。”毛泽东叹气，“你已经不是娃娃了。银桥肚皮都起来了。”

我扑哧一笑。在小水库游泳时，毛泽东拍打李银桥肚皮说：“你也有肚子了，快朝我看齐了。”为此，李银桥揉着肚皮直犯愁。

我说：“人总归是要老的么。银桥不想老，我也不高兴总当娃娃的呀。”

“你自然不高兴总当娃娃，总当娃娃便讨不了老婆了。”

我红了脸低下头。在中南海跳舞时，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谈一段恋爱，刚吹了。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曾多次关心询问。

“我的卫士不发愁，要有信心么。”毛主席轻轻拍打我的头。

我说：“不发愁么也不是什么高兴事了。”

毛泽东放低声音，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对我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我赧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

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哧又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要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口气，“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上庐山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不容我张嘴，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哄喊起来：“好啊，江西老表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眼珠朝上转着略一思索，说：“你们187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露出了补丁线袜。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我和郑义修同志谈上了。庐山会议开得紧张激烈，我们俩悄悄密密谈得轻松愉快。下山时，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

以后，每逢我陪主席散步聊天，主席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呀？”

“来了。”我把信递给主席，请他看。回信也要请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每次都要认真帮我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要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那么一封信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是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于是，以后写信我便加上了“亲爱的”。当毛泽东再问我小郑来信没来时，我的脸红了，不自然地掏出信。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我和郑义修同志结婚了。第二天傍晚，我们

去看毛泽东。他满面笑容，让我们坐他对面。毛主席望着我爱人问：“小郑，今年多大了？”

“22岁。”

“比小封小3岁。爸爸妈妈干什么？”

“退休了。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照料他们。”

“那好么。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肯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

我悄悄捅小郑，她便起身走近毛泽东，剥一块水果糖：“毛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他和我们合了一张影。

二、与医生

作为医生，王鹤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他深情地回忆了毛泽东与他最初见面及以后的几件事：

这是傅连璋第三次带我去见毛主席了，也将是我第四次要见到毛主席。这次去见毛主席与过去不同，我要在他的身边工作，见面时将是什么样的情景，见面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呢？啊！不要忘记向毛主席问好！对啦，当傅连璋同志一介绍完，我就接着说：

“主席，你好！我来做你的医生啦。”

汽车驰进了已经修葺一新的“新华门”，这是中南海的南门，它那时好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面，是人民政府的大门。汽车沿着南海西侧岸上的柏油马路缓缓地行进着。美丽的南海人工湖，在微微的秋风吹动下，荡起了层层涟漪。这清澈的南海秋水，使我联想起了延河秋水的流动，仿佛还听到那流水的潺潺之声。

“王医生，到了，下车！”傅连璋同志把我从沉思中唤醒。

从紫云轩大门进去，也是一个过厅。这过厅东西两面的山墙上相对着各开一门。王振海把我带到了东侧的门里之后，他就退走了。这里就是毛主席的起居室。

主席穿着毛巾布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翻卷的线装书正在阅读着。他见我走了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床侧，移动了一下身体，变成了半

坐姿势，面对着我斜靠在床头，用手示意我坐在床旁的靠背椅上，然后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用火柴燃点后，很有滋味地深吸了一口，然后让从肺里返回的烟雾自然地口角流出。他微笑着说道：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书记处其他的同志。”主席停顿了一下，又把烟嘴插进口角吸着，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大概他见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拘谨地、不言不语地等他继续指示下去，也许主席想要缓解一下气氛吧，于是他又接着幽默而粗犷地说：

“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后边的“啊”字，他读成“wā”音，表示“这样可以吗？”他说后失声格格地笑了起来，是他想到了自己的粗话，还是认为我拘束的表情觉得好笑呢？其实“有屁就放”，这是中国从南到北，人人皆知的俗语，但是好像是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这是毛主席用直率语言同我交谈，意思我明白了，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反而感到更亲切了。大概毛主席想用他的处世哲学来改造我吧，第二句话就来了个“突然袭击”，使我来了个措手不及。以后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无论他对哪级干部，都是喜、怒、哀、乐任其挥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的。

这样，我的工作算是正式开始了。

王医生还回忆了一次毛泽东为他盖大衣的感人场面。他写道：

初冬，刚刚吃过晚饭，夜幕就垂了下来，夜越拉越长了，毛主席在夜间工作的时间也随着拉长了。

西北风嗖嗖地吹了起来，寒冷的空气可以刺透棉衣了。菊香书屋院内靠毛主席办公室北侧的小锅炉已经升起了火，供应着暖气片的热能。

我为了想更深一步地了解毛主席的工作、生活的规律，希望能找到对他老人家有利的保健措施，我想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毛主席是如何办公的，至少看到他工作的间隙时，动员他作些体力活动，调节一下紧张的脑力劳动。主意拿定，我悄悄地走进了办公室，他老人家正在精神专注地工作着。我轻轻地抬起脚后跟越过毛主席办公桌的东侧，径直向摆在东墙山下的沙发走去，然后坐在长沙发上，面侧对着主席坐了下来，我事先并没有向他老人家透露我的想法，主席听到了动静，稍侧了侧头向我看了一下，之后，仍继续埋头在那紧张的工作中了。

我安然自若地坐在沙发里，自认为对毛主席的工作没有干扰，眼睛看着毛主席办公，如有什么空隙，好请他老人家休息一下。

室内非常寂静，只听到毛主席手下的铅笔不时地在办公纸上或文件上沙沙地作响，以及翻动纸页时发出的响声。

我静静地坐着，看着……

一段时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空隙可以缓解一下毛主席的工作紧张程度。

但是不久，睡意的波浪向我袭来，我坐在沙发上强打精神与困倦作斗争。我不能站起来走动，那样会打扰正在工作中的毛主席，我努力把两只眼睛睁大，继之用手指拧自己的大腿，想用痛觉克服睡意，振作精神。这种方法开始还起点作用，以后也不知是手指拧得劲小了，还是困劲战胜了疼痛，上眼皮沉重得拉不起来了，像重重的铁闸门，无力抬起它来。心想，怎么这样不争气呀，才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坚持不住啦，此时眼皮虽然抬不起来，但头脑意识是清楚的，还可以通过眼缝，看到毛主席办公的动作。

当第二个更高的睡浪冲来时，头感到重了，脖子软得有点支持不住它。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之前，没有考虑到睡魔的力量，所以没有想到要用什么兴奋剂，或者喝点浓茶（可惜以后才得到这种经验，浓茶一喝，起码可以精神几个钟头），因而只好不时地将头颈用力挺直一下，但这个办法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稍一松懈，那沉重的头就会突然向前下方跌落下来，怎么办？此时头脑也还清楚，那就不用双手托着下巴罢，这样头就不会垂下来啦？于是双肘支持在茶几上，两只手掌张开腕部并拢，将下颌托在双手之中，不让头垂落下来，我还清楚地想着，千万不能让头低落下来，碰响了茶几，惊动毛主席，干扰了他老人家的办公。意识有点模模糊糊地指挥着自己，清楚意识和模糊的睡意交替出现，时而通过眼缝看到毛主席仍在紧张地工作着，时而出现视而不见的场面，这大概叫做半睡眠状态吧。

第三次睡浪冲来的时候，情形如何，那只有靠以后的回忆来判断了。好像游泳时潜水一样，睡浪把我的意识淹没了，我沉浸在睡浪之中了。办公室的暖气片散出的热量，把室内的空气烘得暖暖的，我睡得很香甜，也可能发出不大的鼾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毛主席从我的头前（因为我在埋着头，颜面朝下睡着）轻轻走过，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又走过来披到我的身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睡醒了。我不安地睁开了双眼，发觉自己伏在茶几上，把头埋在了双臂之间睡着了。我感到全身很暖，背部暖而重地披着什么东西，就下意识地用手触摸了一下肩部，同时扭头看到了披在我身上的是毛主席那

件草绿色的大衣。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我站了起来，有点羞愧地，含着幸福的微笑，望着毛主席。

毛主席坐在办公椅上，大概听到了我的动静，稍侧了一下头，微笑着示意让我继续睡，而毛主席呢，他仍然精力充沛地俯在写字台上紧张地工作着，看上去他毫无倦意。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本来，我到办公室来是想关心主席的健康，不要使他老人家太劳累了，但我这不争气的瞌睡，反而给主席增加了麻烦，以致于叫他老人家来关照我了。党组织派我来是想对毛主席的健康有益，我却很不争气，反而使毛主席体贴入微地照料着我。

毛泽东不仅关心王医生的身体冷暖，还训练他的政治头脑：

在颐年堂后面的大院里散步时，毛主席对我进行了教诲性的谈话。不久的一天，我常规性地去了解主席健康情况，当我要离开时，毛主席叮嘱我说：

“王医生，我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参考消息》。你去找来看看，看过之后，再给我讲讲。”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主席的意思。

从这天之后，我就开始注意《参考消息》了。过了两天，我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则重要的国际新闻，于是在毛主席醒后，我就带着那张《参考消息》走进了紫云轩。

毛主席正侧卧在硬板床铺上看书，看样子不是马上要去办公室。于是我打断了他说：

“主席，今天《参考消息》上有一条重要的新闻，我给您读读吧。”说完，我就拉过一把椅子来，坐在他的面前，也不知主席同意不同意，就读了起来。他只好停止了阅读，听我读报了。我读完后，毛主席笑了一笑。这一笑我没有细察是满意的一笑，还是对我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呆劲和幼稚，觉得傻得好笑，而发出来的一笑。之后主席又埋头继续看起手中的那本线装书来。我呢，好像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任务，高高兴兴地走了出来，心里还美滋滋地想：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一来能让毛主席知道重要的国际新闻，同时还可以缓解一下他紧张的脑力劳动”。

过了几天，我又看到了一篇重要的国际新闻，于是我抓住机会，便在毛主席面前读了起来。他听后，带着格格格的笑声，轻轻地对我说。

“不是你这个办法。你要好好地看上它几个月，到时候，你就会对形势产

生一些看法，也就有了观点。到那个时候，你再向我报告你对时局、形势的看法。”

这时我才明白了，开始接受这一任务时，理解错了毛主席的意图。他老人家是在训练我分析事物的能力和方法，只能在充分地掌握了各方面的资料、产生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才能对主席有所帮助。

接着，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指示我：

“你可以订些香港的报纸，不管是什么观点的，拿来作参考，钱可以从我的稿酬中出。”

原来，毛主席是想训练我的政治头脑，把我的视线从具体的业务工作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从《参考消息》中，从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中，从纷繁的事物现象中，抽出决定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找出事物发展的趋势，以及预计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与秘书

50年代，毛泽东有两个机要秘书（高智和罗光禄），还有五大秘书：陈迫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毛泽东会客、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筛选文电等活动。五大秘书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大事，起草文件，不管日常工作（即机要秘书负责的那些）。生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及4名贴身卫士负责。

机要秘书高智曾经回忆了他在毛泽东身边的几件难以忘怀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对高智说：他只管两个半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和罗光禄轮替值班，一人一天。值班时，24小时守着毛泽东，安排主席的活动，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事务。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很谨慎的，一天到晚提着心，怕出事。因为给毛泽东做好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全党全国。我在他身边十多年，没看过一本小说或无关的闲书，怕分散精力耽误正事。

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和罗秘书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

有天夜里，我打了瞌睡。迷糊一觉醒来，天已光亮。心里一惊：哎呀，主席夜里会不会有事找过我？

我匆匆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糟糕，他的案头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批阅过的文件。显然，由于我的瞌睡没能帮他及时处理……

“主席，”我凑到办公桌旁，不安地说：“你，你处理这么多了……也不叫我一声么。”

毛泽东一边丝丝响着吸烟，一边掀起眼皮看我：“没有急事。”

“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

“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我们是两个人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的好。”

“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

话讲到这一步，我心里顿时热起来。毛泽东真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

我把毛泽东批阅过的文件拿去处理完，再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放了笔，准备休息。

毛泽东睡觉前，有散步聊天的习惯，这样可以放松一下脑筋，容易入睡。

“高智。”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叫了一声。我明白他要聊天了。这个时候尽可以随便些。

“咋了？”我走到他身边。

“我只管二个半人。”

“你管人多么，全国都得管。”

“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一个。”

“那咋还有半个呢？”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

“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

我笑了，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

“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

我做了汇报，说到我是组织兼宣传委员。

“宣传委员好么，我管不了的你能管。”

我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解决这种家庭纠纷。不能再用这些琐事干扰毛泽东的工作。可是江青喜欢打扑克，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跟她玩。于是，我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明道理，叫他们陪江青打好扑克，别给毛泽东找麻烦。

相处日久，我渐渐了解毛泽东，善于体察他的心思了。主席这段时间考虑什么问题？要什么文件？做什么事？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喜欢穿兜子多的制服，每个兜里都揣着些材料。毛泽东要不同的材料，我往往可以立刻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来，马上交到他手中。

毛泽东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高智呀，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高智还回忆了他最后与毛泽东分别时的动人场面。那是60年代初，毛泽东身边许多工作人员都与他告别（也许这是对当时八字方针的一种贯彻吧）。高智说：

我从江西劳动回来，住了几天，忽然听说叶子龙、李银桥这些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同志都要调离了。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得那是1962年4月19日，我正在家里休息，卫士来通知我，说主席叫我去。

我随卫士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正等着我。老人家让我坐下，问候了我的身体，下去劳动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我也问候了主席。

毛泽东在谈话中，用了一种认真的表情望住我问：“高智，你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

那一刻，我表现了沉默。从个人感情上讲，我真不想离开毛主席。但形势我是清楚的，叶子龙、李银桥以及许多贴身卫士都要走了，我就是留下也不好办了……

“我不愿离开主席，这是真心话。”讲到这里，我眼圈湿了，低下头继续说，“但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我愿意到基层去经受锻炼。”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毛泽东的声音低沉下去。我明白，他是能够留住我的，只要他说一句话。但是，我也明白其中有许多复杂事情，留下也有留下的难处。我想了又想，下了决心：“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想了想，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搞搞农业、商业、教育，增长实际工作能力。你打算去哪里？”

“我是陕北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你不是葭县人吗？可以到葭县去工作。”

“我去了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吧。”

“那也好。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再想想，我们等生了孩子以后再说。”

我并没告诉老人家我爱人要生孩子的事，他却知道了，并且这样关心我，我心里一阵热，一阵酸，泪水便淌了出来。头垂得很低。

于是，毛泽东也沉默了，轻轻叹了一口气。片刻，他用一种感伤的音调说：“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毛泽东同我谈了40多分钟。谈话后，他说：“我们一起照个相吧，留作纪念。”

合影后，老人家把我送到颐年堂门口。我的孩子来了，毛泽东又同我拉起话，谈了一会，我抱起孩子又同他合了一张影。

作为五大秘书之一的田家英，从1948年10月（26岁）到1966年5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18年。曾任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的逢先知，近来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回忆文章，叙述毛泽东与逢先知之间十几年关系，包括若干重要波折。

毛泽东选田家英做秘书，是由胡乔木介绍的。田“上任”不久，毛泽东就对他进行了一次“初试”：毛向他口授意见，要他起草一份电报，当场交卷。

逢先知说，毛泽东与田家英在长期的相处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也热爱毛泽东。在50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情。他们交谈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题目。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和文学家。田家英佩服毛泽东学识渊博，思路开阔，记忆力过人。他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成长、发展，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

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这些要求都被毛泽东拒绝了。他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田家英与毛泽东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趣和爱好。毛喜欢读中国古书，喜欢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旧诗词。田也有这方面的特殊爱好。共同的情趣，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50年代初，田家英协助毛泽东处理群众来信，并负责联系、接待和看望

来访的人民群众、毛的亲友和著名民主人士，成为党中央部门信访工作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之一。从50年5月到60年代上半期，田家英把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主要的精力，奉献给了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还协助毛泽东起草第一部新中国宪法，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代毛泽东起草了精彩的“八大”开幕词。

田家英与毛泽东关系上的第一个重要波折，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上。1959年上半年，田家英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同群众、干部以及不少高级干部交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即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他就是带着这种认识和一批调查材料上庐山的。

田家英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在会议前期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中，他把自己对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看法对别人说了，这些话很快在少数人中传开来。当整个会议转入反“右倾”，他就被人揭发，成了批评对象。田家英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得到了毛的谅解。毛泽东对他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特地让田家英参加他所领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表明他对田仍是信任的。但是，显然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1961年，田家英受毛泽东指派下去调查研究，曾向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帮助毛做了许多工作，受到毛的称赞。据逢先知回忆：“1961年这一年，从浙江调查到为中央起草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毛泽东与田家英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密切。田的出色工作得到毛的高度信任，毛的意见和决策受到田的热烈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的关系，是建立在政策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快度过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发展生产，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这是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发挥作用最大，工作最为顺利的一年。”

1962年，毛泽东与田家英的关系终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这一年春，田家英又受毛泽东之命，率领一个17人的调查组，去湖南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对此次调查寄予厚望。有了前次成功的浙江调查，他相信田领导的这次调查同样会给他以很大的帮助。田家英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上。当时，陈云以及全党各级组织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经过周密调查，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并得到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他向毛泽东陈述了自

己关于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的设想：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等。但是，毛泽东却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严厉批评包产到户，认为这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讲到这桩事对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的影响时逢先知写道：

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包产到户的建议，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又一次造成他们之间的政治裂痕，而且是一次更大的裂痕。从此，田家英逐渐失去了毛的信任。

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的。但是，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

从八届十中全会起，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的“左”倾思想日益发展，最后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也告以段落，他认为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应把重点放在工业支援农业方面，特别是放在抓阶级斗争方面。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田家英自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思想很苦闷，常说，“士为知己者死”，现在不被理解，想离开中南海。他准备下去当县委书记，做些调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也好真正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做点工作。他同夫人董边商量过，得到她的支持。董边说：“只要允许你离开，我同意你去，你做县委书记，我去当县妇联主任。”田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道下去，我表示同意。我觉得自己长期呆在中央机关，应当下去做些实际工作，接受些实际锻炼。田也曾想过搞研究工作——研究清史，并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是表示要离开中南海。毛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对他的要求未予置理。毛对田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所以一直留在身边，不愿放走。

1966年5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受到毛泽东重用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自尽的道路。

逢先知中肯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反映在他同田家英的关系上。

田勤勤恳恳地为他工作了十几年,因为提了不同意见而引起他的猜忌,并被联系到当时整个的党内斗争问题,从而对田表示冷落以至完全不信任。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但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对人说,田家英也没有什么问题。

第三章 文体活动

第一节 娱乐方式

毛泽东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公民一样，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爱好，有着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如打麻将、玩扑克、跳舞、看戏及民间曲艺等，都是他所爱好的娱乐活动。但他从不把任何娱乐性活动视为单纯的休息。他曾经说过，办公累了看书也是休息，看书看累了下棋也是休息。只要“换脑子”就是一种休息。

一、跳交谊舞

毛泽东是在延安时期学会跳舞的。当时，延安的生活极其艰苦，没有电影，舞台文艺又很简单，没有像样的乐队，也没有较大的礼堂。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大家很想松弛一下。于是，有关部门领导人就组织起周末舞会。

为了请毛泽东学跳舞，人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起初，他对跳舞毫无兴趣。人们就以锻炼身体为理由请他参加。终于，毛泽东被说服学跳舞了。据朱仲丽所说，每次请他跳舞，他都是只给邀请者片刻时间，而且是应付式的，勉强走几步就没有兴趣了。有一天，毛泽东和朱仲丽等在窑洞外面的土坪上跳舞。一张方凳摆在土坪的一角，凳子上放着从前方缴获来的胜利品——一架手摇式留声机和几张唱片。乐曲声起，人们争起教毛泽东怎样摆好脚式和手式，怎样端正腰背，一遍又一遍。开始，毛泽东心不在焉，走起舞步来，简直和士兵操练没有多大区别。舞伴们打着拍子教他，让他向前走几步，又向后退几步。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们几个都来支配我，让我向前我就得向前，让我退后我就得退后，向左就得左，向右就得右，你们好厉害呀！”

经过一番练习，毛泽东终于学会了跳交际舞的基本舞步。斯诺后来描述说：毛泽东很热爱生活。在延安的“梨园舞会”上，还可以看见“他穿着白衬

衫，黑裤子，平等地站在队伍里，准备接受姑娘的邀请”，“跳的是一种曳步舞，无论哪个姑娘请他，他都跳，而且在夯实的地面上转起来相当灵活。”

1948年，党中央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至此，中央所有机关已经汇合，为了表示对中央首长的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中央的后勤部门组织了一个舞会，大家很希望毛主席也来参加。毛泽东听说后，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舞场就选在毛泽东住处门前。

夜幕降临了，舞场里的汽灯，照着一张张笑脸和五颜六色的彩旗。乐队在轻轻地拨弄着琴弦。

朱总司令第一个走过来了。

一阵掌声，刘少奇来了。

几个心急的小青年催着去请毛泽东。

叶子龙对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自己的孩子燕燕与二娃说：“你们去把毛主席拉出来，叫他到这里来玩一玩。你们就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来，你们就拉着他，一定让他出来。”

孩子们很听指挥，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去。叶子龙在后边跟着，还没走到毛泽东住处门口，孩子们就拉着毛泽东走了出来。

见毛泽东来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抢上前跟他握手，并热情地向他问候。

坐下以后，一大群女孩子又把他围起来了。大家争着和毛泽东说话，把跳舞这件事给忘了。

周恩来也来了。大家也把他围起来了。

“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看，主席那里那么多人，少奇同志那里、朱总司令那里、任弼时同志那里，都有好些人，跳舞场里都空了。你们快请主席他们跳舞嘛。”周恩来提醒大家。

勇敢的女青年们，就一个个拉着首长，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跳起舞来。毛泽东也翩翩起舞。

这次舞会，一直跳到十点多钟才结束。

从此以后，西柏坡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就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只要工作不特别忙，毛泽东偶尔也去参加跳舞。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已经会跳好几种舞，舞步纯熟，能很好地掌握节律，就连典雅的探戈也跳得很有姿态了。

在中南海的春藕斋、怀仁堂、勤政殿的大会议室内，组织过许多次舞会，

有时有很好的大型乐队伴奏，还有舞蹈、清唱、相声等演出，毛泽东同志偶尔也来活动一会儿。他曾经说过，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场所，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不能和别人谈话了。

在文娱活动方面，江青曾对毛泽东有所帮助，特别是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但是，建国以后，在文娱活动方面他们也搞不到一起了。

毛泽东游泳或是跳舞，喜欢热闹。他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所以活动时一定要有一群青年男女，大家又说又笑，热烈喧闹才好。卫士们了解毛泽东的这种生活需要，所以游泳跳舞时都很“放肆”，敢说敢笑，敢喊敢叫，大家没大没小，一律是普通人。

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她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卫士们私下议论：“她现在身分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卫士们都跳了一身汗，卫士田云玉还结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交了朋友。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保健医生说毛泽东获得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便受到鼓励，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卫士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喝着打招呼，似乎要掀起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些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到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咕哝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地说一些“问题”，俨然是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太正规，缺少热情。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太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60年代，毛泽东舞兴不减当年。为了给中央首长提供更好的跳舞条件，有关机关经常派一些文工团演员陪毛泽东等领导人跳舞。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王学文回忆了陪领袖跳舞的情景：

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王，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声，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简直高兴晕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13名女孩子中选了5名去中南海出任务，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那时讲阶级出身，要查几代；个人表现也要查，政治思想要求可靠。

中南海的舞会一般是每星期三、六举行，地点是春藕斋。

来春藕斋跳舞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除过节过年，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舞。

小王第一次来中南海跳舞那天，最先到达春藕斋的是朱德。他依旧保持着延安时代的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

人走队列一般。

在朱德之后，第二个走进春藕斋的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刘少奇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花样，三步跳得尤其好。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泽东来了！

这个时候，朱德和刘少奇已经走了。除开节日，朱德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听说他是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规律。而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经常是十点钟以后才从办公室散步到春藕斋，跳跳舞，休息一下脑筋，12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办公。

“小王，毛主席来了。”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完全像在梦中，忽而醒来，发现自己挤在了新来的女团员中向毛泽东鼓掌，可是很快又以为是在做梦。再醒来，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椅子上了。别忘了，我才16岁啊，极度的幸福感和神秘感使我懵了，至今想起那一刻仍是朦胧缥缈。

开始跳舞了，我呆呆地望着毛泽东，目光一刻也离不开那个神秘伟大的形象。一曲终了，毛泽东坐回沙发上。我还是呆呆地望着，眼睛不敢眨，怕一眨就会梦醒，就会看不到毛泽东。事后才知道，老同志曾提醒我不要老盯住毛泽东看，说那样不礼貌。可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就是一个劲儿地盯住看，我根本不知道泪水已经把我的脸都洗湿了。

乐曲又响起来了。毛泽东起身跟我跳舞。他宽厚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时，我周身发热，确信这不是梦了。我真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脚步像历史的车轮滚动一般沉重有声。他高大魁梧，在他面前我显得那么娇小，不得不拼命踮起脚，使劲迈大步；我怕节奏错，怕踩住他脚，精神过于紧张，刚跳一圈就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发觉了，便亲切地同我聊天，以消除我的紧张。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二、爱好京剧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是京剧的热心观众之一。1943年初，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排演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不仅看了这出戏，还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给予鼓励。当时参加编排此剧的杨绍萱回忆说：

……

对我们鼓舞最大、最使我们高兴的，是当《逼上梁山》彩排那天，毛主席来看这出戏了。毛主席在看戏后的当天晚上，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彭真同志，一封给齐燕铭和我。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在观看《逼上梁山》时，毛泽东还具体指导中央党校的同志编演新的京剧节目。姚铁作了如下回忆：

毛主席自1943年兼中央党校校长以来，来党校就更多了。不仅来做报告，指示工作，也常来看戏。毛主席喜欢看京剧，延安平剧院来演戏，主席来看，党校自己排演的京剧，主席也来看。小戏，如郭靖同志演的《武家坡》、《祭江》，主席就来看过。大戏，如《逼上梁山》毛主席不仅看后写信来鼓励，在看戏过程中还建议再编演《三打祝家庄》。1944年1月9日晚，毛主席看《逼上梁山》时，是副校长彭真陪同的。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对彭真同志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彭真同志听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平剧院了。当时中央刚决定延安平剧院由联防司令部领导改归中央党校领导。平剧院就组织任桂林、李纶、魏晨旭三同志搞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编写，集体讨论，反复修改，《三打祝家庄》剧本编好了，平剧院全力以赴，用最强的演员阵容把它排出来了。

毛泽东不爱看现代电影，喜欢看古装戏，听京剧，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高庆奎的《道

遥津》，阎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53年到54年，他又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1949年4月里的一天，戏剧界组织晚会，欢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迁来北平。

“几点钟出发？”毛泽东问卫士长。

“路不好走，在路上估计需要一个小时，我们六点半出发，就可以按时到达。”

毛泽东慢慢地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看戏也是工作呵。梅兰芳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罢歌歇舞。这位艺术家的这种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兰芳的演出，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对于那些生在远离北平的农村的警卫员来说，毛泽东这番话对他们不只是一种政治觉悟上得到启发，而且也得到了文化上的熏陶。因为他们对梅兰芳一无所知，竟为“梅兰芳是男是女”进行了一场争论，而且结果是谁也没说服谁。

汽车是按计划出发的。在车上，卫士长把卫士们在临来前的争论情况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他说，过去，大家都生活在农村，不要说看不到梅兰芳的戏，就是能看到梅兰芳演戏，如果没有知情的人介绍，认为梅兰芳是女的也不奇怪。因为在舞台上，他就是男扮女装的女角戏。如今我们已经进城了，今天咱们就要看他们的演出了，再说他是女的，那就是大笑话了。

想了想，毛泽东又正面解释说，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

长安大戏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来了。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正中间的一个包厢里。现在，环境已不容许他再当普通观众了。

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是压台戏。观众们翘首以待，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梅兰芳一出场，台下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54岁的梅兰芳先生演的是虞姬，由刘连荣先生演霸王项羽。两人都是京

剧界名流，唱作俱佳，演出过程中，不断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时，梅兰芳先生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这里面也有毛泽东的掌声——他使劲地鼓掌。

“是啊，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肯定我国的戏剧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到双清别墅大院时，毛泽东说，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晚上还在长安戏院，看程砚秋先生演戏。

接着，毛泽东又把程砚秋介绍了一番：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是京剧界名流。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第二天晚饭后，又是六点半从香山乘车出发。

坐在车上，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他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到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境界、新的政治眼光、新的处事方法原则，他必须向自己的助手们提示，使他们能够理解其中的意蕴。

如果说在延安、西柏坡等处看戏主要是为休息、艺术欣赏或娱乐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领袖来说，现在看戏已超出了艺术欣赏的范围，包含有政治的效果。

这天晚上，他还是坐在二楼正中的那个包厢里。

第一出演的是《法门寺》。

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刘瑾接过状子后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

看到这里，毛泽东指着戏台上的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

程砚秋演的是《荒山泪》，放在最后作压轴戏。整个演出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高兴，他跟观众一起，经常鼓掌，看到高兴处，也笑出声来。程砚秋演出时，他还不时地夸赞。

“你们看，今天晚上演得怎么样？”在返回香山的途中，毛泽东又挑起话题。

“我看演得很好。”卫士长回答说。

毛泽东说，这都是名角，演得好这是肯定的。这几出戏的内容与现实结合得也很好。特别是《荒山泪》，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

接着，毛泽东集中评论了《法门寺》剧情。他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毛泽东本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独立思考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品性。他希望把这种品性普遍化，人人都如此。此后他还多次提到贾桂，批评现实生活中的奴才思想。

卫士长李银桥后来生动地回忆了毛泽东1958年观看《白蛇传》时的情景。他写道：

记得是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一名叫李什么菇（我记不清名字了）的演员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我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座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毛泽东就座的前排摆放的是单人沙发，套有灰布套。我照例是坐在他身边。因为值班卫士是24小时不离主席身边的。毛泽东肚子大，坐下后皮带便勒腰，所以他一坐，我便依惯例帮他松开了腰。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坐在沙发里，我帮他点燃一支香烟。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嗓子。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目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壅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

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已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地笨拙地帮他系腰带。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我为此不安，难过了很久很久。

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上走去。全场的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我松了口气，主席回到现实中了。

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楣的老和尚“法海”。

1959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

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胡乔木把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等文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传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

1959年9月以后，北京京剧团著名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尽管吴晗并不懂得戏，他还是答应了。《海瑞罢官》这个戏从动笔到写成，七易其稿，终于获得成功。《海瑞罢官》一剧公演以后，毛泽东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还对他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也非常高兴。

谁料到，数年后《海瑞罢官》竟成为所谓批判对象、“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60年代，毛泽东对京剧演现代戏也是很关心的，并提出过一些很中肯的意见，63年末64年初，沪剧《芦荡火种》由北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当时执笔重写《芦荡火种》剧本的汪曾祺，回忆了毛泽东对这个剧（后易名为《沙家浜》）的关心情况。他写道：1963年冬天，江青到上海看戏，回北京后带回两个沪剧剧本，一个《芦荡火种》，一个《革命自有后来人》，找了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去，叫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认购”了《芦荡火种》。所以选中《芦荡火种》，大概因为主角是旦角，可以让赵燕侠演。《革命自有后来人》，归了中国京剧院，后改编为《红灯记》。

我和肖甲、杨毓珉去改编，住颐和园龙王庙。天已经冷了，颐和园游人稀少，风景萧瑟。连来带去，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改好了。实际写作，只有5天。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经过短时期突击性的排练，要赶在次年元旦上演，已经登了广告。江青知道了，赶到剧场，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搞出来，不行！叫把广告撤了。

江青总结了50年代出现过的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些戏没有能站住，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不能和传统戏抗衡。江青这个“总结”是对的。后来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十年磨一戏”。一个戏磨到十年，是要把人磨死的。但是戏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是搞不出好戏的。公平地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决定重排，重写剧本。这次参加执笔的是我和薛恩厚。大概是1964年初春，住广渠门外一个招待所。我记得那几天还下了大雪，我和老薛踏雪到广渠门里一个饭馆里吃过涮羊肉。前后也就是十来天吧，剧本改出来了。二稿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经过比较细致的排练，

江青看了，认为可以请毛主席看了。

毛主席对京剧演现代戏一直是关心的，并提出过一些很中肯的意见，比如：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这是针对50年代的京剧现代戏而说的。50年代的京剧现代戏确实很少有“上板”的唱，只有一点儿散板摇板，顶多来一段流水、二六。我们在《芦荡火种》里安排了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是受了毛主席的启发，才敢这样干的。“风声紧雨意浓”大概是京剧现代戏里第一次出现的慢板。彩排的时候，吴祖光同志坐在我的旁边，说：“这个赵燕侠真能沉得住气！”“沉不住气”，是50年代搞京剧现代戏的同志普遍的创作心理。后来的现代戏，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不用散板摇板。都是上板的唱。不用散板摇板，就成了一朵一朵光秃秃的牡丹。毛主席只是说不要“老是散板摇板”，不是说不要散板摇板。

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提了几点意见（是江青向薛恩厚、肖甲等人传达的，我是间接知道的）：

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

后面要正面打进去，现在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

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戏是好戏；

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我认为毛主席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态度”也很好，并不强加于人。

有些事实需要澄清。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这都是原剧所存在的严重缺点。原剧的结尾是乘胡传奎结婚之机，新四军战士化装成厨师、吹鼓手，混进刁德一的家，开打。厨师念数板，有这样的词句：“烤全羊，烧小猪，样样咱都不含糊。要问什么最拿手，就数小葱拌豆腐！”而且是“怯口”，说山东话。吹鼓手只有让乐队的同志上场，吹了一通唢呐。这简直是起哄。改成正面打进去。就可以“走边”（“奔袭”），“跟头过城”，翻进刁宅后院，可以发挥京剧的特长。毛主席的意见只是从艺术上，从戏的完整性上考虑的，不牵涉到政治。“要突出武装斗争”，是江青的任意发挥。把郭建光提到一号人物，阿庆嫂压成二号人物，并提高到“究竟是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还是地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这样的原则高度，更是无限上纲，胡搅蛮缠。后来又说什么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斗争，更是莫须有的诬陷。

《沙家浜》这个剧名是毛主席定的，不是江青定的。最初提出《芦荡火种》剧名不妥的，是谭震林。他说那个时候，革命力量已经不是星星之火，已经是燎原之势了。谭震林是江南新四军的领导人，他的话是对的。“芦荡”和

“火种”，在字面上也矛盾。芦荡里都是水，怎么能保存火种呢？有人以为《沙家浜》是江青取的剧名，并以为《沙家浜》是江青抓出来的。《芦荡火种》和江青的关系不大。一些戏曲史家，戏曲评论家都愿意提《芦荡火种》，不愿意提《沙家浜》，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我们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意见，改了第三稿。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审查通过，并定为“样板”，“样板戏”这个叫法，是这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

1970年5月，《沙家浜》定本，在《红旗》杂志发表。

毛泽东看戏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看《打金枝》，他是从工作方法的角度去看的，说郭子仪的儿子同皇帝的女儿结亲以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这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他还说过郭子仪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当时有人告郭有谋反之心，郭听到后就把自己的门第敞开，任人参观，“门户洞开”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看《打渔杀家》，毛泽东曾经对一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讲，萧桂英一度动摇过，后来醒悟过来了，终于一起去复仇，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这一席话，使那位朋友很感动。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批评少数党员干部争地位、争薪水的不正之风时说：有个戏叫做《林冲夜奔》，那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弹几滴眼泪的。

毛泽东偶尔还唱几句京戏。60年代初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忽然放开喉咙唱开《空城计》中的两句京戏。卫士们感到，这两声京剧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

三、欣赏相声、赶庙会、打麻将

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喜爱京剧。其实，他对相声也非常喜欢。几乎在每一次听京剧折子戏的时候，都要加进几段相声节目。常常是京戏与相声合璧联演。演京剧的常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名角，表演相声的必是侯宝林无疑。全国解放初期，党中央机关刚进中南海时，侯宝林就受到毛泽东的邀请。由于战争痕迹尚未完全消除，中南海未清理完毕，毛泽东及其他领导同志观看

文艺节目常在“国统”时的美驻华使馆里。毛泽东通常坐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这里放着两把藤椅：一把是毛泽东坐的，另一把是朱德总司令坐的。朱老总那把椅子空着的时候多。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乐观、轻松、愉快。

毛泽东喜欢听相声，但难得纵情大笑。侯宝林说，他常常见毛主席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时候竟憋得脸色都发红了。侯宝林记得50年代仅有一回毛主席忘情地大笑了，而且笑得喘不过气来，一边笑一边摆手，意思是说，实在忍不住了。

这是在侯先生说到一首七拼八凑的打油诗的时候，毛泽东才这般哈哈大笑的。这是首什么“诗”呢？是这么四句，“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就这么一首，曾令毛泽东笑得直不起腰来。后来，大约在1960年的时候，侯宝林又被毛泽东邀请进中南海作过表演。记得毛泽东对当时的评剧似乎评价不高，建议听听相声。有次说到“大裤衩子”的时候，毛泽东也笑得挺开心，可以说是“前仰后合”了。

侯宝林说：60年代末至70年代，他给毛主席说相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淡忘他。他常常给毛主席送几盘录音带去。毛主席也常捎信来问：有没有什么新段子？毛主席要求的相声，除了娱乐性之外，很注重知识性，因此在选择上是非常讲究的。侯宝林说，毛主席先后听过150多个相声段子，足见其兴致之浓。1975年，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就不大好了，即使如此，他几次跟人说：“我好久没见到侯宝林了。”但在那个非常时期，侯宝林虽然死里逃生，却无法获悉毛主席想听相声的愿望，当然更无法前去献演了。侯宝林说，最令他难忘的是，在四届人大之前，毛主席听说侯宝林受到冲击，很是关心，并且亲自提名选他人大代表。“那一次主席提了10个人名，其中有我一个。”侯宝林说到这里，显得异常激动。

1992年上半年，电视小品《毛泽东与侯宝林》播出后受到观众的喜爱，对此，侯宝林谈了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的表演很不错，真实、自然，很像当年的毛泽东，并谈起了一些与之有关的旧事：

那时候能在毛主席面前做工作，不容易。是1949年吧，毛主席和中央的大首长们还住在香山，开会时进城，晚上准有演出。那演出啊，彭真是‘总提调’，张梦庚的‘小跑’，你说这容易么？甭管是歌舞晚会、戏曲晚会，准有我一段相声。戏曲晚会上，通常是梅兰芳的大轴。我的节目时前时后，位置没准儿。记得一次我们的相声排在了梅先生的后面，我一听就嘀咕了，按惯例梅先生总是大轴，他一下场人就该走了！那天我特意嘱咐检场人，京剧将完未完，

梅先生刚走向下场门时，迅即将表演相声用的桌子搬上舞台。果然梅先生唱完正下场时，桌子搬了上去，当时毛主席已经起身，胳膊上搭了风雨衣，要走。见到又搬上了桌子，毛主席便把风雨衣撂下，重新入座听相声了。

“解放初期这种演出任务是很多的。一星期总有一两次。每次去四五个人。常与我合作的是郭启儒。有些传统段子如《卖面茶》什么的是不在外面说的，也有新段子。每次有了新作，都先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表演。毛主席一般不点曲目，但他确实喜欢《关公战秦琼》。有一次少奇和王光美都来了，毛主席拉着少奇的胳膊说，哎，来，听听，就听《关公战秦琼》吧。”

侯老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大概是档案袋里塞了东西，自1962年以后他就再不能进中南海演出了。但是毛主席还是记挂着他。侯老提到了一件至今难以忘怀的小事：“文革”后期，毛泽东卧病，想听相声，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侯宝林的情况，当知道侯“没事儿”时，毛泽东很高兴，说：“让他来。”后来保健大夫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宜大喜大笑，便婉言劝他先看看录像带，等身体恢复后再让侯宝林来……最后是侯宝林为毛主席录制了10个段子，今天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戏剧杂谈》《改行》等10个侯宝林的节目，就是那时的录像，遗憾的是，那时老郭（启儒）先生已故去，与侯宝林搭档的是小郭（全宝）先生了。

毛泽东还赶过庙会，看过大戏。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1947年下半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在陕北转战。来到葭县南河底村后，毛泽东在战争空隙时间搞了农村调查。南河底村在白云山下。老乡们经常去白云山赶庙会。李银桥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看戏看民情”的情景。他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写道“一大早，大路上就热闹起来了。老乡们三人一伙，五人成群，喧嚷着去白云山赶庙会。毛泽东兴致很高，说：“走，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你们又怕不安全吧？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毛泽东已经拿起了他那根柳木棍，嘴里仍在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去行善作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和习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有很大好处。今天只留两个人看门，大家都去！”

就这样，我们又随毛泽东上了白云山。这天是正会，人最多，山上挤挤挨挨，万头攒动。庙里香烟缭绕。还摆了许多吃食挑子。山顶最高一层庙院里搭了戏台，锣鼓震天响，山西梆子开场了。毛泽东在群众后边兴致勃勃地朝台上望。他喜欢京剧；没有京剧，山西梆子他也看。后来接触久了，我发现，凡是

中国的民族文艺他都喜欢，对于外国艺术他兴趣不大。

会场忽然起了骚动，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毛主席，毛主席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传递着这句话，老乡们兴奋得连戏也不看了。有人搬来长条凳请毛泽东坐。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我一个人坐着，那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可是，连台上的演员也停下了演出，都挤出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悄声招呼群众：“看戏吧，老乡们，咱们都是来看戏的。”又朝台上招呼：“你们快演吧，我是来看你们演出的，大家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我的。”好一阵子人们才平静下来，演出继续下去。毛泽东始终站在群众中，专心致志地欣赏台上的山西梆子。

打麻将也是毛泽东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他风趣地称打麻将为“搬砖头”。别人打麻将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不把任何娱乐性活动视为单纯的休息。他把娱乐看作是休息的思维和工作。他经常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一边在脑海里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

毛泽东还借打麻将同群众密切关系，了解民情。1925年2月，毛泽东偕妻儿回到韶山后，前来探望的乡亲川流不息。时值春节，农民常三、五人聚在一起打麻将、玩骨牌。毛泽东亦参与玩乐，藉此与乡亲们交谈，了解家乡各方面情况。1936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天天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少休息。若说休息，就是出门散步。而散步，常常是未走多远，就急忙转回办公室又伏案工作。这表明他在散步中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或者有了一个重要观点。工作之余，经别人邀请，毛泽东也偶尔打打麻将。可是，有时正打到兴头上，他常常忽然站起来，向大家告退；开始，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问题。次数多了，同志们发现了秘密。原来，毛泽东打麻将，是为了换换脑筋，也为了清理一下自己思考某个问题的思路。凡是站起来不打的时候，就是他在思想上弄清了或者发现了某一个正考虑的关键问题，所以急忙起身告退，赶到办公桌前继续紧张工作。

有时候，打着麻将，他也常借题发挥，讲些引人深思的哲理。一天，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休息时打麻将。第一盘没开始，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同志们以为他随口说句笑话。没料到毛泽东一再说“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察觉到在座的同志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力气一次一次、一擦一擦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能，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一块

“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同志们听后才明白了他一再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

这次打麻将一连数盘。毛泽东越打越有兴趣，不像往常那样中途告退了。他边打边说，打麻将这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到手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就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可能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忽然站起来，向在座的同志们说了声“对不起”，迈起匆匆的脚步，向着他的办公室走去了。

毛泽东打麻将时特别健谈。他能从麻将的排列组合中找出辩证关系，进而向众人讲述马列主义的辩证法。有时他忽而把麻将同美元贬值联系起来。一次，他竟然把麻将同反对封建迷信连了起来。他说麻将和神一样，都是人做的，目的都是用，不过用处不同，人们打麻将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神则不同。人们创造神是为了征服自然，主宰世界，借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创造的龙王就是为让它上天行好事，四方呈吉祥。

第二节 体育活动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也和众多的普通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在体育运动方面，他不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而且是孜孜不倦的倡导者，宣传鼓动者。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记述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他说：“德、智所寓，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实际上，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8岁那年，他害了一场大病，人变得十分瘦弱，于是他开始锻炼。辍学在家两年多的体力劳动，使他变得壮实起来。以后，随着使命感的日益增强，他对身体的锻炼也日益重视。

据曾经和毛泽东幼年时在一起读书的老人回忆说：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在他家屋前的池塘里经常可以见到他和一群小伙伴嬉戏游玩。为此时常受到家长和教书先生的责备。有一次，教书先生因事外出，便嘱咐学生们温书自习。

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即和几个同学到校前池塘戏水。先生回校后，见此情景，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跃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先生不禁连连点头。

一、青年时期的体育实践和理论

毛泽东认为，体育锻炼有两方面的作用：一强壮身体，二磨砺意志。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曾力主“三育并重”，“身心并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既是全校最积极的体育活动的倡导者，也是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学习上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清晰的头脑，与他的刻苦顽强地锻炼身体是分不开的。在学校里，毛泽东是一个以勤奋好学、顽强锻炼而著称的学生。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以便将来担当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因此，他主张一个人应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他进行体育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他善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又习惯于把自己的各种活动与磨砺意志有机地结合起来。

1. “三浴”。学校的浴室旁边，有一眼清凉的水井，毛泽东常来这里进行冷水浴。每当清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即起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用吊桶打上井水，一桶一桶往身上淋，然后用浴巾洗擦全身，擦后又淋，淋了再擦，反复一、二十分钟，直至全身发热发红为止。然后，再作一些简单的运动。他最初试行冷水浴是在夏天，经历秋季，到了冬天，纵然是天空下雪，池水结冰，仍然坚持进行。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可以练习猛烈与不畏。严冬季节，把冰冷的水一桶一桶地向身上淋，没有勇气的人是做不到的。有几个同学曾跟着毛泽东进行冷水浴，但都没有像他那样坚持到底。他们对毛泽东说，天寒地冻，我们把冷水往身上泼，觉得很难受，你是否也感觉难受呢？毛泽东说，最初几次是难受，但下决心突破困难，就习惯成自然了。

毛泽东还利用风、雨、太阳等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夏天烈日当空，他常穿条短裤，站在室外晒太阳，游泳后，也常躺在沙滩上让阳光照射，叫做“日光浴”；冬天寒风凛冽，他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空旷处进行“风浴”；下大雨的时候，他冒雨跑步，进行“雨浴”。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的行动，他却

进行得那样认真。

毛泽东洗冷水浴的习惯保持了多年。建国后，他的年纪大了，不能正式做冷水浴，但每天洗澡时仍坚持不用热水，只用微温一点的水。他还对人说：“我觉得这样洗澡比一般洗澡的办法好得多。一般洗澡的办法只有清凉作用，我这样洗澡的办法，除有清凉作用外，还有锻炼身体的作用。”他还充满豪情地说：“一个经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人，更不会被风雪的寒威所吓倒。我过去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冻也还经得住。锻炼的确是重要的事情。”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再次提到了“三浴”这种体育锻炼方法。并对如何练“三浴”做了解释。他说：“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2. 游泳。游泳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喜欢、最擅长的体育活动项目了。他很小的时候就时常在屋前的池塘里游泳。在长沙，第一师范前面的湘江，江宽水深，是游泳的好场所。毛泽东经常邀集同学，到湘江中的桔子洲头附近和南湖港一带游泳。由于他从小就喜爱游泳，所以技术好、胆量大、坚持力强。他不但能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相距近十华里的牌楼口去。他也能在别人穿棉衣的天气，在江中游泳。有一次他和罗学瓚等几个同学，不顾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毅然去江中游泳。罗学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即桔子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不过，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将要达到对岸时，被大浪冲入木簰下，幸好被一个同学救了出来。解放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他诙谐地说：那次如果不是亏了一个同学搭救，我险些“出了洋”。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坚持锻炼。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原来一些不爱好游泳的同学，也能坚持和他一起锻炼，有时“直至隆冬，犹在江中”。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充满激情地写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后来写下的词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是当时他和三、五同学在湘江游泳时的动人场面的真实写

照。

3. 登山露宿。登山，也是毛泽东经常性的运动项目。与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山，踏满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足迹。有一次，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和蔡和森等，健步登上了山巅。不久，突然冷风四起，空气清新，他们趁机作“空气浴”，和“大风浴”。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天际灿烂的彩霞，江上往来的白帆，大自然的瑰丽风光，尽收眼底。这时，他们想起山顶云麓宫前望江亭上的一幅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顿觉胸怀开阔，旷然有凌云之概。还有一次，在一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毛泽东鼓起勇气，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遍体湿淋淋地来到了山下蔡和森的家里。蔡伯母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趣，并藉以锻炼身体和意志。

野外露宿是一种锻炼勇敢和胆量的好办法。毛泽东经常邀集朋友，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和湘江中的桔子洲头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游人散尽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高谈阔论，直至夜阑，大家都疲倦了，才各自找个地方，相隔一定的距离，露宿到天明。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毛泽东还爱好长途步行。他说，这种活动，既可以培养身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又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1917年9月16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他刚从农村调查回来不久，又和张昆弟等步行去五十华里外的湘潭县昭山。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三人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时晚，欲在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树丛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话，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

之倒立矣。和尚待于门前，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4. 体育之研究。毛泽东不仅顽强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同时也勤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他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28笔画）笔名发表的《体育之研究》，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对体育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从一个侧面较为集中而综合性地体现了他当时的文化水准和思想精华。

忽视体育锻炼，忽视体育理论研究，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严重缺陷。诚如毛泽东所言“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故有颜子短命，贾生早夭。就在当年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间有同学因埋头读书，造成身体衰弱而早逝。毛泽东的至友易咏畦就是一例。有鉴于此，毛泽东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公之于世。

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毛泽东看到当时学校里人们对体育锻炼极不重视，看到学生身体虚弱，精神萎靡不振的现状。这种不重视体育锻炼的现象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由于繁重的功课和学校体育活动开展得差，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虚弱。1917年同班傅传甲等七名同学不幸染传染病身亡，这令毛泽东非常伤心，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还特意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当时毛泽东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人类、社会等大事，这使他联想到不仅个人要心身并完，整个民族亦当“身心并完”。

文章共分八节，前面还有一个导言。

文章的导言指出：“国力衰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文章接着谈了八个方面。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这八部分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体育的内涵、地位和作用；第二，当前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三，体育运动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

毛泽东指出，自从有了人类以来，虽智识有愚暗，但人人都知道保护自己的身体，圣人制订礼制，使饮食起居都有所节制。人体的组成与动物没有本质

的差异，但动物不及人长寿，在于动物没有节度，而人有节度，到后来，便有了体育。什么是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关于体育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德育和智育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道德是用来“立群道平人己”的，诚然可贵，但“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但我国的学制却对体育一点也不重视，结果造成了对学生身体的严重摧残：“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诒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最后得出结论：“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他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并批评了朱熹主敬、陆九渊主静、老子的“无动为大”和佛教的寂静等以静为主的养生之道。

毛泽东列举了体育的作用。

体育可以强筋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使人由弱小变为强壮，“至于弱者，……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总而言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体育可以增知识。毛泽东说：“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体育可以调节感情。他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身体虚弱的人往往为感情所

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以及肢体有残缺的人多为“一偏之情”所困，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他举例说，我们在平日里遇到不快的事，受到刺激后，心神震荡，难于制止，如果加以猛烈的运动，立即便可去掉陈旧的观念，而马上可以使脑筋清明。

体育还可以增强意志，成就事业。体育的主旨在于勇武，譬如猛烈、无畏、敢为、耐久这些勇武之内容，其实都是意志之事。他举例说，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各种运动如果持之以恒，都有磨练耐久之功益，如长跑，对于练习耐久力尤其显著。“夫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这些为人所崇尚的意志和品质，其实都可从日常的体育活动中磨练而成。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毛泽东指出了我国当时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德智体三者应该并重，但我国自古以来轻视体育。古时学者“详智德而略于体”，结果则“倭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痠。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而今的学校，虽然采各国之成法，风气稍有改变，但仍重视不够，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教师发令，学生勉强应付，“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觉性。

接着他分析了人们不喜欢体育运动的原因。一是人们缺乏自觉性。“人多不知运动对于自己有如何之关系，或知其大略，亦未至于亲切严密之度，无以发其智，因无以动其情。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不倦者，以其关系于己者切也，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而运动则无此自觉。”二是积习难返。我国历来重文，动辄有“好汉不当兵”之类的话。虽然知道“运动当行之理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但旧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运动这样的新观念还在“迎拒参半之列”。三是提倡不力。现今所谓的教育家大多不懂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只听其名而从之，因此“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教体操的人大多无学识，所知惟此一技，但又不精，日日相见的，都是几个机械的动作而已。学者也以运动为羞。中国学者都以“衣裳襜褕、行止于于、瞻视舒徐”为美好之态的标志，为社会所崇尚，而运动时，张臂露足，伸肢屈体，被视为有伤大雅。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体会，指出运动应注意的事项。运动的方法贵少。体育

运动不重言谈，贵在实行，如果能实行的话，得一道半法已足。曾国藩临睡前洗脚，饭后千步，天天坚持，获益非浅，80多岁的健康老人的长寿之道在于长期坚持“不饱食”。掌握了其中的一法，其他各法都可以融会贯通。贵在坚持，“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运动宜有恒，宜用心专一。若持之以恒，则对运动的兴趣也日增，“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应日日运动不辍，最好于起床后与临睡前作两次运动，每次不必久，30分钟已足。但仅仅有恒心还不够，运动时必须用心，“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运动的时候，“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运动时宜蛮拙。“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

总之，“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最后，他将自己集各种运动之长而创造的六段运动详细地推荐给大家。

二、建国后游遍祖国的江海湖河

游泳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体育锻炼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游遍了中国的江河湖海。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者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

1. 到大海里搏击风浪。根据保健医生徐涛的建议，中央有关部门50年代初在玉泉山专门修了一个室内游泳池，供毛泽东游泳之用。但毛泽东听说后封闭了这个长不过两个人、宽不过一个人的“大澡盆”。于是，徐涛又劝毛泽东去清华大学游泳馆游。没想到，毛泽东游上兴头，一发不可收。他不高兴在那小池子里游，只想去江河湖海中游。徐涛后来回忆了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畅游大海时的情况：

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办公。中央首长来得特别多，开会也方便。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

那一年游泳，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特别深。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

一天，他游到兴头上，旧话重提，忽然朝我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

“行啊，我们比速度。”我朝他靠近。

“你聪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

“那不行，比赛都是比速度。”我知道毛泽东下了水就不愿上岸，就那么不停地游。我可不行，时间一长非抽筋不可。

“你别骗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必须有耐力，要坚持时间长，要游得远才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半小时后，我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随毛泽东遨游大海。毛泽东指指我挖苦：“他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大家都笑。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像往常那样，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经我们一再劝说才上岸。卫士们替毛泽东擦干身体。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他天天这样念，有时夜里工作疲劳，出门观海也是这样念，听多了我便记住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一天晚上，主席遥望大海又在念。我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

“写得好吗？”

“很有气魄，很美。”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

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9月天凉，仍每天下海游。

记得一天，毛泽东游得很远很远。我们跟随的人便轮番上船休息。快望不到岸了，仍劝不住主席。幸好，遇上一条渔船，打渔的老渔民全身晒得漆黑，衣服半敞，露出嶙峋的锁子骨和肋骨巴巴紫黑发亮的胸膛。他的脸孔和他的劳动的大手一样棱角分明，筋骨暴突。那一对微陷的眼睛格外亮，目光里透出纯朴、智慧和善良。我们在船上，先发现渔船和渔民，便招呼毛泽东上船。果然，毛泽东一听说有渔民，立刻痛痛快快爬上了船。不等擦干身体便迫不及待跟老渔民喊话聊天。

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千军呐喊，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要去游泳。

果然，中午刚过，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准备去游泳。

“不行，主席，今天不能去”，卫士们说。

“雨停了，为什么不能去？”

“水很凉的，会抽筋。”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这话讲得不假。我们经常冻得牙齿颤响，他却什么事也没有。他很耐寒。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

“那才好么，乘风破浪，这正是机会么。”

“那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几次，都被浪打回来了，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我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从小我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我。

“还没说完呢。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绊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甩开我，大步出门。我强烈感觉到他那与生俱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他的脸色和神气逼得我们不敢再动手动脚，只能追在他的左右劝说。偶尔拦挡到前面，一遇他灼灼的目光，便不得不闪开一边。那是下定了决心，要粉碎一切阻碍的目光，没人敢再和这种目光较量。

事已至此，再无挽回希望。我和卫士及警卫人员便紧张行动起来，抢先脱衣，要冲在毛泽东前边。

海风呼啸，透人肌肤，沁入骨髓。加上紧张，不曾下水我们已在战栗。大海上像有无数银龙在飞掠疾走，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远处翻滚出来，咆哮着扑向岸边。浪脊上的泡沫直喷溅到远远的更衣室。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万千狮虎怒吼着围逼过来，气势惊心动魄。可是，别无选择。毛泽东已经赤身向海边走去。刹那间热血涌起，我和卫士们齐拥到毛泽东身边，手挽手，身贴身，前呼后拥冲向大海。

我们刚踩上湿沙，那长列的浪潮已扑来，沿着沙坡急冲，一下子没了脚踝骨。我打个激灵，那浪潮已带着沉重的叹息往回缩。

“赶浪，我们赶浪。”毛泽东陡地加快步伐。他还笑呢，小孩子游戏一般开心。他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去冒险。我们簇拥着老人家急追那退缩的浪潮。追出四五步，耳畔轰轰响起，又一列长浪以更凶猛的势头扑上来。不好！我急忙从身后扶住毛泽东。刹那间，一人高的浪头劈头盖脑压下来。我急忙屏气，不容站稳，轰然一声巨响，脑子便懵了。清醒得很快，发现一群人都歪倒在沙滩上，竟被那浪打出四五米远。

“主席！”至少有四五个人同时喊。毛泽东已在卫士长和卫士的搀扶下站立起来，甩甩头上的咸水。他朝大海投去一瞥，那矗立的水的长城又滚滚而来，示威一般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摇撼着整个海岸。我想喊什么，舌头恰似贴在上腭动不了。毛泽东忽然笑了，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一笑：“嘿嘿，我总算找到一个好对手。”

现在重提当年情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对毛泽东的这一性格肃然起敬。他盼望挑战，他的一生不曾停止挑战应战，这是他性格的基础和核心。可是当时听了这句话，我却急坏了。须知，毛泽东若把什么认作了对手，那是永远不会服输的，那是必须一决雌雄的！

果然，毛泽东召唤我们向海浪发起连续冲击，可是每次都被浪潮打了回来。老人家吐出嘴里的苦水，稍一喘息，马上又开始冲闯，不肯回头……

我们又被浪打回沙滩上。我和不少人都胆寒了。眼前那喧然滚沸的大海起伏着多少高山和深谷？仿佛能埋葬整个大陆。耳际盈满凶恶悲怆的声音，时而隆隆，时而嘶嘶。就连海鸥也忍受不住那喧吼，哀唤着窜到高空……

可是，毛泽东犀利的目光落到我们身上，显出少有的严厉。他问卫士长：“这点浪比刘戡的四个半旅还难闯吗？”他又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觉得跟我走太危险？你们要是害怕，我可以另外组织人。”

就这么几句话，热血便在我们心中沸起。我们年轻，不乏血性。卫士长一声长呼，我们从地上爬起，迅速集合在毛泽东身边，手挽手，肩并肩，剽悍的警卫人员前冲开路，精壮的卫士左右护持，前倾了身躯向大海冲。我们横下了一条心，刹那间潮吼浪喧人呐喊，仿佛千军万马厮杀成一团。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我们一连闯过四道长浪，终于游进大海！我们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跌下浪谷；波峰上可以望见无数条耀眼的白花花的浪纹，浪谷里黑沉沉只觉一团

神秘暧昧。我们都拼尽全力向毛泽东靠拢，要升一起升，要沉一起沉。拿了救生圈的人更是随时准备应付意外。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只会被冲上岸，不会被拖进大海回不来。”毛泽东仍是一副轻松自在的安闲样子，随波起伏，一边对我们说：“你们正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以后，我多次听到看到毛泽东讲“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一类的话。就我所知，1954年在北戴河游泳是第一次讲。

此后，毛泽东更不愿意在小池子游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必然结果。他游湘江、游邕江，终于提出游中国第一大江——长江。

2. 畅游长江。从1956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并写下了壮丽诗篇《水调歌头·游泳》。

卫士封耀松回忆了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游长江曲折生动的经过：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进门就是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院子。毛泽东住一个院子，其他首长及工作人员住另一个院子。

天气闷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冲动，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李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这声吩咐不啻雷响，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游长江？这怎么行啊！出点事可不得了，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代的！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经常对我们讲，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每当毛泽东被群众包围，他总是和我们卫士一道手挽手前面开路，左右护持，将毛泽东“保”出重围。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要赢，不

赢不罢休。他发脾气了。毛泽东发起脾气，喜欢说：“你蠢！”“你知道个屁！”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察，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太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嚅：“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

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艘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艘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照顾毛泽东下水。一中队的警卫人员都已下在水中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

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1956年6月三次畅游长江之后，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水调歌头·长江》（正式发表时将词题《长江》改为《游泳》）。诗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7年9月，毛泽东第四次畅游长江后，感慨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又八次畅游长江。畅游之后，他几次向周围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6亿人口，能不能有3亿人口都来游泳呢？”他还建议运动员不要老在游泳池里游，要多到江河里去练习。“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历时1小时零5分，游程近30华里。对这次畅游长江，当时的报刊曾广为宣传。

3. 在南宁冬泳。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由杭州到长沙，看了木

偶剧花鼓戏。6日又乘飞机飞到南宁。他想冬泳。

7日，几名警卫人员和卫士到邕江边测水温，选地点。刚刚测完温度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

一名卫士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水温十七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着说：十七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会游的工作人员自然都要脱衣陪他下水。那天刮小北风，江边的风尤其冷。毛泽东确实不怕冷，皮肤光洁，面色红润，他更完衣上了船，一边活动着一边朝江水里浸试。他笑着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卫士们有护泳的责任，怎么能落后呢？争先朝江水里冲去。开始有些冷得透不过气，很快便适应了。再看毛泽东，轻松自如，没事的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一眼，说：“不过如此！”

毛泽东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对卫士们来说，时间似乎长了些，脸色都有些发青，身体抽缩着朝岸上跑，牙齿捉对打颤，咯咯作响。手忙脚乱穿衣服。

毛泽东始终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坐在船上晒太阳。一名卫士紧张活动着身体问：“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看卫士们一眼，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二十度也冷。”接着又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头：“没带。”

大家冷得不行。李银桥要用热毛巾替毛泽东擦身，偏偏这时有不少人正围在那里说毛主席不怕冷，都表现出惊讶和叹服。毛泽东在这一片赞叹声中摆摆手，示意不要李银桥擦。

可是，一名卫士注意到毛泽东身上带水，再被冷风吹个不停，皮肤已不是那么光洁。身上这里那里不时起来一些小颗粒。李银桥将热水倒入脸盆，涮一条毛巾，拧干后替他用力擦身。毛泽东笑了笑，没再吱声。李银桥让一名卫士用热毛巾将他全身上下擦个遍，直到皮肤擦红。

4. 在故乡水库游泳。卫士长李银桥1959年夏初随毛泽东回韶山。他回忆了毛泽东在故乡的小水库里向乡亲们表演游泳技艺的生动情景。他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写道：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住在韶山宾馆。他看了看故居。在门口，他站住脚环顾周围，大概是回忆幼时的生活吧，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指着门前的水塘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见过长江。”我们跟随毛泽东去看望

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的，也有比他辈数高的。有个长胡子老头，毛泽东一见面就说：“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他们坐下来聊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

毛泽东访问了几户农民，在街上转一圈，还去小水库里游了泳。岸上围了许多群众。毛泽东一边在水里自在地游泳，一边向乡亲们招呼道：“都下来游泳啊！”乡亲们有的摇摇头，有的说“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看一看我们，冲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于是，他一会儿仰游，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舒坦轻松；一会儿“坐凳子”，真像坐在竹凳上，从容自如；又点燃了烟抽……岸上的乡亲们，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上嘴。毛泽东游完，上岸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座谈会，了解家乡的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

三、其他体育活动

除了酷爱游泳之外，中晚年时的毛泽东还进行一些球类、散步等体育活动。

毛泽东工作累了，就走到院子里散步，活动四肢，作深呼吸。他喜欢摆动两臂，扭着腰走。在陕北转战期间，毛泽东一次在院子例行这种散步时，李讷和她的小朋友胜利、幸福（胡乔木的女儿）排成一溜，跟在毛泽东身后，模仿着扭，并且格格地笑成一片。于是，毛泽东越扭越起劲，头、颈、肩膀、身子和腿扭出几道弯，样子滑稽得很。小姑娘们也跟着加大动作幅度，越扭越欢，终于嘻嘻哈哈摔倒成一团，气氛是那么欢快热烈。也有的时候，毛泽东只是背着两只手踱慢步，眉头微蹙，在院子里走过一圈又一圈。这时，李讷便一声不响，也背着两只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父亲，走几步就需跑几步。过不多久，她耐不住装大人嗓音干咳几声。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一个抓人的姿势，李讷便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毛泽东说：“你和我藏猫，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讷说：“开始发现了吗？我跟了你好久呢。”毛泽东便装糊涂：“是吗？开始就跟你了？那我可没发现。”李讷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毛泽东开心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喜欢深呼吸，一呼一吸都带了长长的声响，有时胸腔里也要哼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他感觉这样舒服。

在毛泽东的住处里，安置有乒乓球桌，以备毛泽东打球用。但他不太爱进

行这项活动。与他娴熟的游泳技术相比，他的乒乓球技艺实在不能令人恭维。这项运动讲究眼疾手快步子灵巧。可他上了年纪，巧不起来，动作难以协调。他是横握拍，动作像所有初学的人一样笨拙，无论高球低球正球歪球一律是推的动作。

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赢得此项运动的世界冠军时，毛泽东大为高兴，打球的兴趣也高昂起来。卫士封耀松忆述了他同毛泽东赛球的情景，他说：毛泽东这几天心情愉快，与容国团夺回一项世界冠军不无关系。恰好国内外没什么大事，高兴了，他也玩几下“卫生球”。那天下午，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我们三个值副班的卫士打乒乓球。毛泽东看见了，便走进来参加：“我也来玩玩小球吧。”平心而论，我球艺虽然差，若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便规规矩矩把球送过主席那边。毛泽东打球可不规矩，像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我便奔跑不迭，应接不暇，流下汗来。

我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瞪大眼，虚张声势盯住我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艺，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毛泽东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一推，只轻轻一推，乒乓球便奔我的左案角落来。球速很慢，可我的重心已经右倾，急切里扭转，便失去平衡，差点滑一跤，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弹起来，朝地面坠落。毛泽东哈哈笑，吮一吮下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能使毛泽东高兴，松弛一下过度疲劳的脑筋，始终是我们卫士的心愿。

第四篇 家世与亲人

第一章 毛泽东的家族

第一节 毛泽东家族溯源

一、毛氏家族的由来

毛氏家族源远流长。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的始祖“渊源遵照老谱派接西江，自宋工部尚书让公世居三衢，生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让公就养，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至21世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其间簪笏蝉联，后先辉美，不可枚举。直削不录，存实信也。”（《卷首·凡例》）显然，此谱认为上述一些体面的先祖缺乏真凭实据。于是便奉毛太华为始祖，“太华，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以军功拨入楚省，唯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解组，侨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开种韶山铁陂、乌塘、东塘等处，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族谱》卷一）因此，毛泽东家族可以追溯到明朝建立以前。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王朝迭兴，战争灾难连年不断。韶山毛氏始祖太华于元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70年）为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省吉

水县内)迁徙云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娶了一位姓王的姑娘为妻,并先后生了8个孩子。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华因军功封官入湖南,长子清一、四子清四随父母一道来到湘乡北门外绯紫桥。10余年后,清一、清四移至湘潭七都七甲(今湘潭市韶山区韶山乡)定居。从此,毛氏宗族便在韶山一带垦荒务农,世代相传,繁衍下来。毛太华就成为韶山毛家宗族的第一代祖先。

毛太华的长子毛清一生有二子:有恭、有信。有恭生子毛震、毛瓚等。有信生子毛瑞、毛鉴等。四子毛清四生有三子:有伦、有智、有诚。有伦生子毛翔。有智生子毛深。再加上石羊一支的毛全山,就构成了谱中所谓震、瑞、鉴、深、全山(又称石羊)五大房祖。其中震房为长房,下属竹溪、彬溪、介溪三支。毛泽东即属竹溪支下。

毛氏宗族从第一代至第六代没有固定的谱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韶山毛姓第一次修族谱时,制订了自第七代开始的固定谱系,定下二十代子孙名字族谱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1881年)二修族谱,因恐谱系不够,又续订了二十个: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此后,1911年三修族谱和1941年四修族谱均未再读谱系。

毛氏家规颇严。据族谱记载,有家训十则:“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还有家戒十则,即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等等。

毛氏宗族自定居韶山后,世代务农,相传到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已足十七代传人了。毛祖人,字四端,生于1823年,死于1893年。他没有读过书,是一个勤劳忠厚的农民,主要靠种田、砍柴维持生计。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德臣,次子翼臣。祖父毛恩普是第十八代传人,是毛祖人之次子,字寅宾,号翼臣,排行四,生于1846年5月22日,死于1904年11月23日。他也是一个为人老实厚道的庄稼人,自1878年与哥哥德臣分家后,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来上屋场。他娶刘氏为妻,生一子贻昌,生二女分别嫁张家和贺家。

毛泽东祖父毛恩普的墓地虽然知道在韶山滴水冲,但是坟头究竟在何处,

墓碑在何处，多年来无人知晓，一直为国内外人士和学者所关注。1986年9月韶山辟为国家旅游区后，为使旅游者饱览滴水洞风光，修建了滴水洞别墅的游山便道。当便道修至虎歇坪大石鼓时，在一个长满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发掘出一块高三尺，宽一尺，厚约三寸的墓碑。挖出的墓碑棱角分明，完好无损。质地为祁阳石，细腻滑润，类似汉白玉，碑文字迹清晰。经考证，此碑即系毛恩普的墓碑。碑文内容如下：

中华民国元年夏月吉镌
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 东
内辛山外戍山 男贻昌 孙泽铭
淋

墓碑落款上的“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泽铭”即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烈士，“泽淋”应是毛泽东二弟毛泽覃烈士。

围绕毛泽东祖父的墓碑，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从唯心观念出发，认为共产党出了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一定是祖坟风水好。于是湖南军阀何健派来特务，自称是风水先生，暗中探听毛泽东祖父葬地，并多次派军队入韶山挖坟。据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等人的叙述，大约在1934年前后，国民党曾派一个连的士兵穿着便衣，于一个夜晚悄悄进入韶山滴水洞，要挖毛泽东的祖坟，因天黑，挖了3处均没找到。次日清晨，放牛人发现有人挖坟后，立即告之毛氏族人，当族人们愤怒地拿着锄头、木棒上山时，挖坟的国民党士兵才被迫逃去。事后，他们悄悄地在深夜，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掩埋在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并且把坟墓一起填平，在上面栽种了花草；又在旁边修了几座假坟。这样，毛泽东祖父的坟墓和石碑总算被保护下来。

毛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毛贻昌，即是毛泽东的父亲。字顺生，号良弼，行一。生于1870年10月15日，1920年1月23日去世，葬于韶山南岸楠竹墕。妻文氏，生于1867年2月12日，1919年10月5日病故。与夫同冢。文氏夫人生五子二女。长、次子早夭，三子泽东、四子泽铭、五子泽覃，二女早殇。

毛氏家族世代相传，至今约5世纪，二十二代。在第二十代孙，竟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人物——毛泽东。

附录：四修《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

（一）四修《韶山毛氏族谱》叙略

《韶山毛氏族谱》创修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二修于光绪七年（1881

年)，三修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修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修族谱共十五卷，附首一卷，毛泽钧主修、毛泽启总纂，民国三十年（1941）西河堂活字印本。全书二十二册，分装四函。卷七内封面镌：“民国辛巳四修韶山毛氏族谱，西河堂家藏”。版心上端原题：“韶山毛氏族谱”，下端原题：“西河堂”三字。有民国三十年毛泽启序、陆军中将何海清序、毛泽钧和毛泽启跋。《族谱》共印了113部，按《千字文》编号。族谱四修本，是在原来三修本的基础上，续增而成。内容包括：传赞、祠堂图记、契文、墓图、家训、家规、任事录、世系表等。主修人毛泽钧，字国翘，属深房立睽、克明、孔仁支派。光绪十年（1884）生，领陆军同上校衔，曾任云南易门县县长，有政声。总纂人，毛泽启，字先甲，号宇居，别号守一子，属震房竹溪公客卿派下伟才支。清光绪七年（1881）生，领陆军同少校衔，曾任陆军中将何海清的秘书。

四修族谱中的世系表，始于一派始祖毛太华，迄于二十二派世字辈。记录了毛氏各个支派成员的简历，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现将毛泽东一支单独录出，以便研究参考。

一派	始祖		太华	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迁云南之澜沧卫。
		妣	王氏	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以军功拨入楚省，惟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解组，侨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没葬五里牌道士山后。清一、清四二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开种韶山铁陂、乌塘、东塘等处，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
二派	华公子二	长	清一	生，没。葬向。（按：原谱空而未填，今照录，以下如是。）
		配	昌氏	生，没。葬向。子二：有恭、有信。
三派	清一子二	长	有恭	吏材，载邑乘。生，没。葬向。
		配	金氏	生，没。葬向。子三：震、铎、瓚。

续表

四派	有恭子三	长	震	生, 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木铎山墚内, 倒地木星午山子向。有碑、墓图、传。
			配 彭氏	生, 没。葬湘乡县北门外顿皮墚罗风桥边卯山西向。子三: 从文、从武、从昌。
五派	震公子三	长	从文	生, 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震公房祠后梓山墚内, 倒地木星丁山癸向。有墓。
			配 张氏	生, 没。葬韶山羊楼坪, 今名羊楼堰, 屋对门山金盆架上右边, 庚山甲向。有碑。子一: 珊。
六派	从文子一		珊	生, 没。葬本邑韶山流江冲口马鞍冲住屋后元武山墚中岷, 壬山丙向。
			配 匡氏	生, 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羊楼坪对门金盆架上 祐姑家, 庚山甲向。有墓图。丈界载禁约契据。子五: 立尧、立舜、立继、立雍、立熙。
七派	珊公子五	长	立尧	字竹溪。生, 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冲塘岷, 癸山丁向。
			配 何氏	生, 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马鞍冲屋后墚右岷, 乾山巽向。丈禁有契碑。子一: 显旻 (抚弟立舜次子为嗣)
八派	立尧子一		显旻	字栗山。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五月二十九午时生, 没葬宗祠后木梓山, 未山丑向。
			配 李氏	生, 没。葬木梓山墚, 震祖坟下, 子山午向。子四: 荣楚、荣汉、荣项、荣理。
九派	显旻子四	三	荣项	字湘泉, 生, 没。葬韶山焦山冲上窑墚山勒马山下, 辛山乙向。
			配 彭氏	生, 没。葬韶山焦家冲上窑墚山勒马山。子二: 朝岳、朝巍。

续表

十派	荣项子二	次	朝巍	字汉字。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九亥时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五月二十六辰时没。
		配	郑氏	明万历四十七己未七月初一卯时生，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初九午时没。葬房祠对门何家园，辛山乙向。有碑。子七：士翔、士翊、士翰、士翱、士翅、士翻，塹保殇。
十一派	朝巍子六	四	士翱	字客卿。顺治四年丁亥四月初五未时生，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十六丑时没。
		配	谢氏	顺治六年己丑四月初五卯时生，康熙四十四乙酉九月初五未时没。葬何家园拊姑家。子一：文邦；女二：长适张，次适周。
十二派	士翱子一		文邦	字伟才。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初二辰时生，乾隆十七年壬申六月初六亥时没。
		配	廖氏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月初七日巳时生，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六月初五未时没。葬何家园拊姑谢氏冢左，辛山乙向。有碑。子五：方淳、方潜、方沛、方洙、方溪；女三：长适周、次适赵、三适周。
十三派	文邦子五	长	方淳	字子朴。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二月初一丑时生，乾隆二十九甲申四月初六申时没。
		配	贺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七月十五日巳时生，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二月十四巳时没。葬李伯冲冬茅塘老屋后，酉山卯向。有碑。禁界上齐岷，下抵塹，左抵伟才丈界外山，右抵壕。子三：运遂，运选、运遂（出抚弟方溪承桃）；女一：适周。

续表

十四派	方淳子二	次	运选	字世儒，原名如。乾隆十二年丁卯十一月丑时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三十午时没。
		配	庞氏	乾隆十三年戊辰六月十二未时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初九辰时没。葬震公祠对门茅墮仑，今名禁山仑，辛山乙向。有碑墓。子二：际耀、际彩；女二：长适杨，次适汤。
十五派	运选子二	长	际耀	字光前，行一。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二十九酉时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三月十七戌时没。
		配	庞氏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二月初七午时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初九戌时没。子四：祥焕、祥麟、祥彦、祥珣；女二：长适何，次适周。
十六派	际耀子四	长	祥焕	字其有，行一。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月初九卯时生，道光十九年己亥三月二十四日戌时没。
		配	张氏	嘉庆七年壬戌十月二十二子时生，道光十二年壬辰七月初九巳时没。葬合夫冢右，同向。子一：祖人；女二：长适文，次适赵。
十七派	祥焕子一		祖人	字四端。清道光三年癸未九月三十申时生，光绪十九年癸巳十月初三辰时没。
		配	周氏	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月十二月卯时生，光绪二年丙子五月初十辰时没。葬韶山滴水冲铁子山穿坳，丁癸兼丑未向。有碑、墓志。子二：恩农、恩普；女一：适沈。

续表

十八派	祖人子二	次	恩普	字寅宾，号翼臣。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二十七辰时生，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十七寅时没。葬韶山滴水冲大石鼓，辛山乙向。
			配 刘氏	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八月初二未时生，光绪十年申四月二十六戌时没。葬韶山东茅塘回阴甕尖峰下瑞房坟侧，丑山未向。有碑墓。子一：贻昌；女二：长适张，次适贺。
十九派	恩普子一		贻昌	字顺生，号良弼，行一。清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一日辰时生，民国八年己未十二月初三辰时没。葬韶山南岸楠竹甕，卯山酉向。
			配 文氏	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辰时生，民国八年己未八月十二辰时没。葬合夫冢，同向。子五：长次殇，三泽东、四泽铭、五泽覃；女二，殇。
廿派	贻昌子三	长	泽东	闾中肆外，国而志家。字咏芝，行三，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元配 罗氏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没。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甕，酉山卯向。子一：远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
			继配 杨氏	随夫在外，生没候归录。子四：长远仁、次远义、三远智（与夫原配为嗣）、四远怀（出抚弟泽铭为承桃）。
			继娶 贺氏	随夫在外，生年候归录。

续表

廿派		次	泽铭	琳玠齐名。字咏莲，行四。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二十一未时生。
		娶	王氏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月二十二未时生。子四：长、次、三殇，四怀远（承抚兄泽东四子为嗣）；女三：长、次殇，三适王。
		三	泽覃	中学毕业。字咏菊，行六。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七戌时生，民国二十四年乙亥阵亡于江西瑞金。
		娶	周氏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月十一辰时生。子一：远大。
廿一派	泽东子三	长	远仁	字岸英，随父在外，生年候归录。
		次	远义	字岸青，随父在外，生年候归录。
		三	远智	字岸龙，随父在外，生年候归录。
	泽铭抚子		远怀	字式谷，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
	泽覃子一		远大	字楚雄，民国十六年丁卯八月十三未时生。
廿二派				（按：此谱止于第二十二派，因与毛泽东家属无直接关系，故从略）

综上所述，《族谱》有如下6个特点：

- (1) 实事求是，奉名不见经传，但有史可征的毛太华为始祖。
- (2) 条理清晰，叙事简明。
- (3) 详尽记录了入谱者的生卒年、月、日、时，以及墓葬处。
- (4) 夫妇并列于世系表中，双方所生子女，均列于女方名下，这在传统家谱中是很罕见的，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意识。
- (5) 对毛泽东三兄弟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毛泽东的评语是：“闾中肆外，国而志家”。对毛泽民的评语是：“琳玠齐名”。何海清在序言中也盛赞道：“毛氏族姓如咏芝昆仲辈，现正服膺主义，声名遍天下，其昌炽而光

大，正未可限量”。卷七附有《毛泽覃先生行状》，对毛泽覃烈士的生平，作了比较详尽的评介。

(6)保存了一些至今鲜为人知的有关毛泽东及其亲属的珍贵资料，可以用以订正某些传闻或成说的讹误，填补某些史料的不足和空白。

(二) 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

(1)关于毛泽东的祖父，过去一向无人知晓，就连毛泽东本人也从未谈及他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他名恩普，字寅宾，号翼臣，行四。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生，光绪三十年（1904）卒，享年58岁。他去世时，毛泽东已11岁了。

(2)关于毛泽东父亲的名字，过去统一的说法是“顺生”。其来源出自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其实他的本名叫“贻昌”，顺生是他的表字，还有一个别号叫“良弼”。

(3)毛贻昌的生卒年，过去一直无人披露，现在我们知道，他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9月21日（公历10月15日），卒于民国八年（1919）12月初三（公历1920年1月23日），享年49岁。

(4)毛泽东母亲文氏的生年过去也无人披露，卒年则大多只知其年而不知具体月日，现在可以知道，她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八（公历2月12日），卒于民国八年（1919）8月12日（公历10月5日），享年52岁。她比丈夫大3岁，一共生育了7个孩子，但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早夭了。

(5)关于毛泽东的表字，过去一向称作“润之”。其实，他原字“咏芝”。在湖南湘潭话中，“润”与“咏”的发音是一样的。大概毛泽东觉得“润之”的含义更深一些，便改称“润之”了。

(6)关于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的生平资料，更是罕为人知，人们甚至连她的姓氏都搞不清楚。毛泽东本人从未详谈过她的生平及姓氏，他只简短地讲过：“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8页）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在《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谈及此事时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这无形中更使这位不幸的女性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现在我们终于通过《族谱》知道，她姓

罗，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9月26日，卒于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二，享年仅21岁。毛泽东和罗氏“在1908年举行了婚礼。”（《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21页）当时毛泽东15岁，罗氏19岁，毛泽东自述说他当时14岁，女方20岁，不确。罗氏婚后仅两年，便去世了，死因未详。身后被允许名誉上过继杨开慧所生的毛远智（字岸立）为嗣，这是一种罕见而费解的现象，我们不知道这一决定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友联研究所1970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1893—1969）》第11页引用张大军编《中共名人典》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这位原配夫人姓李，是系以讹传讹。

（7）“毛泽民，字润莲。”这是《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的说法，也是最流行的说法。现在，我们通过《族谱》知道，他原名泽铭，字咏莲。他与原配夫人王氏共生有三儿三女，但只有一个女儿幸运地长大，并嫁给了一位姓王的男人。后来，毛泽民夫妇抚养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四个儿子——毛远怀，以弥补膝下无子的缺憾。

（8）《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说：“毛泽覃，号润菊”；而《毛主席一家六烈士》则称：“毛泽覃，又名润菊”。现在，我们同样通过《族谱》知道，毛泽覃，字咏菊。关于毛泽覃在广州工作时期的史事，诸家传略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而《毛泽覃先生行状》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十分珍贵的资料：“乙丑（1925年）经粤中当道者之召，从事政治工作。初任广州政府财务委员，钩稽精窍，款不虚靡，饷糈赖以无匱。旋任黄浦军官学校股长，治事之余，瘁心于军事学术。熊校长恒称为干部不多得之材。”《行状》还记录了一些毛泽覃的言行和轶事，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9）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后代，通常的说法是三个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岸青生于1923年，岸龙生于1927年4月4日（参见《杨开慧》一书）。

但是，《族谱》却记载毛泽东与杨开慧共生有四个儿子，而且还首次披露了他们的本名。他们是：长子毛远仁，字岸英，次子毛远义，字岸青；三子毛远智，字岸立；四子毛远怀，字式谷。远怀名下注云：“民国12年癸亥2月初2辰时生。”（即公历1923年3月18日）奇怪的是，其中并无毛岸龙。而毛远怀的生年竟与次子毛岸青相同，若用孪生子来解释，那么为何毛远怀又排行第四呢？《族谱》上说他过继给了毛泽铭，现在我们还没有其他旁证。总之，《族谱》中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后代的记载，尚须进一步核实。

(10)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曾从一位堂叔学习《纲鉴》、《史记》、《日知录》等古书，并练习作古文。这位堂叔是当时毛家唯一的一位秀才，他曾两次说服毛泽东的父亲，送毛泽东去东山新学堂读书。关于这位曾对少年毛泽东产生过积极影响的老秀才的名字，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称其为“毛钟麓”；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则称之为“毛钟楚”。究竟孰是孰非？答案是：二者皆误。据《族谱》卷十三《震房竹溪公客卿派下伟才支系表》载：“（毛）贻训，清郡庠生，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同治五年丙寅10月24日午时生，民国十年辛酉6月初八亥时没。”又据卷七《麓钟公传》载：“公讳贻训，号麓钟，学名绍芳，别号韶山小隐人”。《麓钟公传》的作者，正是《族谱》总纂毛泽启，他少年时代，也曾从毛麓钟读过书。所以，《麓钟公传》和《世系表》所提供的资料，应该是可信的。因而也就更能证明肖、李二说的错误。

(11) 纵观《族谱》，我们发现韶山毛氏一族，几乎与科举绝缘，除了第三代毛有伦熬了个岁贡外，其他就连监生都寥若晨星。但这是一个具有勤劳与勇敢传统的家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韶山一带的红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农民，其中还有不少人去从军打仗，一些幸运者还因军功而获得官职。例如，毛恩毅就曾获得清代提督军门的重要职务。这正是从先祖毛太华身上继承下来的家族传统。笔者对毛氏恩字辈、贻字辈和泽字辈三代人做了一个统计。详见下表：

三代人	总人数	有功名者	其中军官	备注
恩字辈	740	10	9	
贻字辈	814	26	17	
泽字辈	670	17	14	包括毛泽东三兄弟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毛氏一族有数的有功名的人当中，军官占了绝大多数。而像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那样当过兵，但未获得官职的人，由于《族谱》未予记载，我们也就无从统计了。总之，从军立功，是毛氏家族的传统，也是他们赖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而这些家族传统精神，对于富于斗争精神，敢冒风险而又注重实际的青年毛泽东的性格形成，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自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二、故乡韶山

湖南，位于中南地区，与湖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等省接壤，自古就有清沱之地，芙蓉之国，峰秀雁回之境，水碧沙明之称。在滔滔的长江南岸，镶嵌着我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水天一色，风月无边”。湘江南面，铺展着一块 21 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地，“湖南”因此而得名。湖南境内风景秀丽，群峰争辉，碧波荡漾。巍峨的“五岳独秀”——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竞展雄姿；令人神往的武陵源胜地，似人间仙境的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更是天降神工，千奇百怪，美不胜收。蜿蜒如画的湘、资、沅、澧四条江河从这里流过，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泪滴点点的斑竹诉说着委婉动人的神话，满山遍野的稻田、茶叶、果园展示着富饶。这是我国盛产粮食的重要地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这里居住着汉、苗、土家、侗、瑶、回、壮、维吾尔等民族。在 20 世纪初已有三千多万人口，现在达到五千多万人。境内民风勤劳、朴实、倔强，多爱吃辣椒，具有爱国、爱乡、勇于反抗的优良传统。

湖南省会长沙，位于湘江下游，有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爱晚亭、桔子洲头等名胜，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求学、会友、留连的地方。他常常约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侣，在此畅谈救国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长沙往西南，转上湘黔铁路，则到湘江流域的湘潭县。它位于湘江与涟水的汇合处，有雨湖公园、关圣寺、万寿宫等名胜。湘潭西北四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的终点——韶山冲，便是毛泽东的故乡。

韶山，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绵亘起伏。相传在远古时代，舜帝偕妃臣南巡荆州至此，被这里秀丽的风光所吸引，乃令臣僚“奏韶乐九成”，引来凤凰起舞。“音召凤至”，韶山因此得名。因为舜帝的音乐叫“韶乐”，因此他到过的山就叫“韶山”；山间潺潺的小溪叫“韶水”；山峦绵亘下的山冲叫“韶山冲”；山上陡峭的山尖叫“韶峰”。韶峰海拔五百多公尺，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潭、湘邑乘均载之，省志《广舆记》、《卧游册》咸登之。跻其巔，俯视群山，若子孙；南岳、洞庭望之如即”。韶峰又名仙女峰，有诗云：“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它山高陡峭，气势雄伟。古人曾赋七律赞美道：“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仙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韶峰山麓有著名的“韶山八景”。韶山八景亦有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在

韶峰旁边住着三位俊秀的姑娘，她们日耕夜织，辛勤劳动。一天从彩云上飞来一只金色的凤凰，三个姑娘就骑着凤凰上天，成为仙女。她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就是现在的韶山八景：“峭壁插霄间，扑压群山”的韶山耸翠；“乐奏九成期，烟幕云帷”的凤仪亭址；“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的仙女茅庵；“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的胭脂古井；“砖瓦莫为功、栋宇凌空”的石屋清风；“门户别开奇，两石为之”的顿石成门；“晴光暮色霞烘裹，玉烛摇烟”的搭岭晴霞；“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是”的石壁流泉。此外，尚有唐代至明清的“六朝松”、“飞来船”、“四方竹”和“红尘不许丝毫染，流向人间洗劫缘”的“白石泉”这样的“韶峰四绝”。（引文见1881年编印的《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

湘潭韶山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长期和贫穷、落后相伴随。鸦片战争之后，洋货打进了全国的各个角落。19世纪末叶，湖南湘潭一度成为洋货深入中国内地的中转市场。那时，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到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到国内各地。英国太古公司、日本怡和公司等，专门制造一批浅水轮，驰往湘潭、长沙等地。中国的蚕丝、茶叶运出国外，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出口。当时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繁忙，陆路肩货的工人不下10万人。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

韶山冲是个偏僻的山冲，东北距长沙180里，东南离湘潭90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若去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若去省城长沙，就要走一天半路，或走一段路再搭船。韶山冲山青水秀，冲里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以毛姓最多。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生活穷苦。人们常说：“禾镰上壁，没得饭吃。”韶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民歌：“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还有一首是：“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韶山冲起于韶山脚下，由南向北，长5公里，东西宽3.5公里，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清澈的小溪弯弯曲曲地从冲里流出，终年不断。在小溪的中上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土墙青瓦的房子，叫上屋场。这是一座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堂屋座南朝北，前面是紧紧相连的两口水塘，右塘莲荷满池，花香袭人；左塘水面宽阔，青松倒映。屋后小山上，苍松翠竹冠荫，风景十分优美。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他又在这里领导过农民运动。1929

年，毛泽东的故居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并遭到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照原貌修复了毛泽东的故居。房屋系土木结构，泥砖墙，小青瓦。进门为堂屋，左右辅以厢房，进深二间，后有天井、杂屋。毛泽东诞生的房间、书房及父母住房均陈列着一部分珍贵的原物和历史照片。

1982年12月，党中央批准了湖南省委《关于湖南省省级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和纪念馆陈列内容的调整意见的报告》，将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改称“毛泽东同志故居”，将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改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983年2月9日，湖南省委又向党中央报告，请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同志题字。邓小平同志接到省委的报告之后，于4月2日欣然挥毫，在一块宽30.6厘米，长67厘米的玉版宣纸上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横匾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牌。毛泽东同志故居和纪念馆整修一新，纪念馆经过充实和调整，增加了新征集的文物资料146件，于1983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到这里参观游览。

第二节 毛泽东一家

一、父亲毛贻昌

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是毛泽东的父亲，1870年10月15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读过2年私塾，10岁时，由父母作主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15岁完婚。16岁时，为了替父亲偿清欠款，迫不得已，外出当兵。那时军队给当兵的发饷银，他把钱积攒起来。退伍后回到韶山，还清了债务。17岁开始理家，那时家里仅有六、七亩地，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为温饱操劳。毛顺生精明能干、肯劳动、会省俭，又善于经营，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把自家省吃节余下来的稻谷加工成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有时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及手工业者；他用碾碎的米糠喂架子猪出售等，逐渐地积攒了一笔钱，赎回父亲毛翼臣典当出去的田产，共有15亩自耕地，年收60担谷。全家有父亲、妻子，泽东、泽民两个儿子，连他共5口人，每年约需口粮35担谷，有25担谷的节余，这在韶山冲一带就是相当宽裕的人家了。

毛顺生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同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大些了就要到地里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作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是少量的小规模的运送。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就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至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出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雇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不过，一家人还照常都要去干活。毛顺生还贩卖耕牛。渐渐地，他积攒的钱更多了，便于1903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22亩，每年收稻谷约84担，年余有49担，生活相当富裕。此后他虽然继续聚财，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许多田地。渐渐他的资本增加到两三千元。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铺店经常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曾自家印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周转，也使用“吉春堂”的纸票。“吉春堂”是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开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它的老板姓赵，是文七妹哥哥文玉瑞的丈人家，与毛顺生有远亲关系。为了与“吉春堂”结盟，他还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幼女先桂的婚姻。

毛顺生个子不高，很壮实，但长期艰苦的劳动，使他身体衰弱得过早。儿子毛泽东，却长得高大，8岁时，毛顺生便送他进私塾读书，这比一般山村农民高明。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岳家文氏多有读书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读书不多，在一桩柴山公案中败诉，明明自己有理说不出来，对方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有理，眼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因此，他想培养儿子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他亲自教孩子们记帐，训练他们双手打算盘，学会经商的本领。

1902年春，刚过了元宵节，父亲就把泽东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私塾，受启蒙教育。

私塾设在邹姓的公房里，邹老师50多岁，他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年小的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因为这和表哥他们学堂里的神龛子一模一样，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于是就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老先生高兴地对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毛顺生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帐，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毛顺生非常勤劳，但脾气暴躁，常打孩子。有一次，先生不在私塾，毛泽东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在课堂上，要惩戒他们。毛泽东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去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老师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一时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泽东父亲告状，火气很大地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毛顺生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老师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拣了一根楠竹丫子，向南岸私塾奔跑过来。看见儿子泽东，不问情由，便劈头盖脸地打来。泽东急忙躲避，回头就跑。父亲怎么也追赶不上他，急得跺脚骂着：“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毛泽东知道父亲的性子，这时候要回到家里，那准定要换一顿死打，连母亲都劝解不住。就决定不回家，去县城。但是，他必竟是不足10岁的孩子，在山里转了3天只离开家8里远。毛顺生托人四处寻找，最后由一个砍柴的老人遇到，送回家来。毛顺生找到儿子后，没有再打他，情形有所改善，对儿子稍微体谅了一些。

毛顺生对孩子要求很严，也很专横，当他发现孩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要求时，就用“不孝”和“懒惰”来责备。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不愿奉迎，父子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儿子“懒而无用”。毛泽东生气地跑出家门，父亲也追了出来，边骂边命令他回去。儿子跑到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父子都提出了“和谈”条件：父亲坚持要儿子道歉并磕头认错；儿子同意如果父亲不打他，可跪一只脚磕头。结果达成了“协议”，平息了这场风波。父亲的专横常常遭到儿子的反抗。有时父亲责骂儿子，儿子就引经据典反驳他。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毛泽东读了6年的私塾后，想停学务农，在家自学，便同父亲商量。毛顺生没有反对，只希望儿子能当家理财。他对儿子说：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你去考举人秀才，现在又废除了科举，再读书也没有用。田里的活忙不过来，你回来也好。自1906年至1909年，毛泽东在家务农，白天到田间劳动，晚上替父亲记帐，而后躲进卧室，点起桐油灯夜读。父亲为一个月要多花几百文的桐油钱十分不满。他要儿子读经书，反对读经书以外的书籍，认为读那些书是浪费时间，但儿子却与他相佐。毛泽东每天下田时，总是悄悄带了他的书。一遇机会，

便溜到山坡的古墓后面，躲在树下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以至于父亲怒气冲冲地站到他面前都不知道。

毛顺生的全部心思都在土地上。然而他发现田里的活计常常没干完，儿子便失了踪影。他开始注意儿子的去向。终于发现了毛泽东的秘密，并且当场逮住了他。

“你好阴凉啊，真会找地方！”毛顺生以手叉腰，在毛泽东身边放着的空粪桶上踢一脚，“你不想干活了是不是？不想干你就别吃饭。”儿子瞟了父亲一眼，嘀咕着：“不是的，爸爸，我只是歇一会儿。”“你是歇一会儿吗？整个上午没见你挑一担粪！”

毛泽东不得不放下书，皱了皱眉：“不是的，我做过了。从天亮我就开始挑……”

“挑了几趟？”

“至少五六趟。”

“半天就挑五六趟吗？五六趟是够你吃还是够你穿？”

“那么，你在半天里能挑多少趟？”

“二十趟。”

“爸爸，我看这是不确实。”

“至少十五趟！”

“从家里到田里可是够远的呢。”

“你以为我应该把房子建到田里去吗？我像你这么大年纪时又是怎么做活的？你就不想想你是干啥的！种地的看两本子破书有个屁用呀？如果你还要吃饭的话，马上给我挑粪去！”

“成了成了，整天就知道发脾气骂街！”毛泽东挑起粪桶结束这场冲突。可是父亲仍然追在身后骂他懒而无用。

这天吃过午饭，毛泽东便挑起粪桶下田。大约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忽然又失了踪影。这一次毛顺生很容易就找到了儿子，就是在上午惹他大动肝火的那棵老树下。他的儿子又坐在那里，两手捧着书，一副忘乎所以的样子。

“你的魂儿被牵走了？老子说的话你也敢不听了！”毛顺生挥舞着满是老茧的大手，“什么破书，你就不知道学好？”

“爸爸，我很注意听你的话。”毛泽东这次显得很平静，“你叫我做的我都做好了。”

“我叫你做什么？我要你作田，要你挑粪，没要你看这些不教好的坏书。”

“我是按你说的作田、挑粪，可是我也要看书。当我作完田里的活，你就没有权力不让我看书。”

“你挑了几担就溜到这鬼地方看书，啊！”

“我做完了你要我做的活。”

“你挑了多少？”

“十五担。”

“骗鬼！”

“你不信就去田里数数，然后再来说。现在请你让我安静一会儿，我要读书。”

毛顺生被呛住了。他憋口气，匆匆去田里数。他数了三遍，不多不少确实十五担。他目瞪口呆。十五担子粪半天挑完确是一件很沉重的活。他实在没有理由再去骂儿子。他用受挫而忧伤的目光朝古墓后边那棵老树望去。他何曾料到，这些书后来对他的儿子所具有的意义啊……

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孩子和妻子曾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神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了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了他，立刻掉头逃跑了。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相信没被老虎吃掉是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开始信佛。遇到处境不顺的时候，总要祷告一番。

毛泽东受母亲慷慨、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影响极深，因此，对父亲的为人处事颇为不满。他不满父亲的吝啬，在受灾的年景，穷人们“吃大户”，父亲却囤积谷子，不肯平糶，泽东认为这是为富不仁。有一次旧历年关，父亲叫儿子去收一笔卖猪的帐，他去了，帐也收了。不过，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钱都分送给了他们，惹来父亲一顿好骂。有一回，一个老阿婆，把自己的猪卖给泽东父亲，已说好价交了定钱。没过几天，毛顺生叫儿子去把猪赶回来时，猪价又涨了几元，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泽东很同情她，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钱。这使毛顺生很生气，骂他无用，不会办事。他不满父亲的自私。

有一次，正值秋收时节，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割禾。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赶快跑到自己的晒谷坪上，抢收稻谷。毛顺生也赶紧召集全家紧张地抢收稻谷，唯独不见毛泽东。雨下得很大，很急，有一些稻谷沿着水沟流走了，花了很大的工夫，终于用晒簟把稻谷盖好。不久，雨停了。毛泽东浑身水淋淋的跑回来了。原来他在帮邻居收谷子。毛顺生对此很生气，

说：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他倒帮人家去收。说罢扬手就要打儿子。毛泽东却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毛顺生听了更加冒火了，说：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毛泽东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毛泽东的母亲，心地善良，愿意接济别人。但是，毛顺生是反对施舍的。每当父亲在场时，母亲不敢把饭送给前来讨吃的穷人。为此，毛家曾发生过多 次争吵，逐渐“分裂”成两派。

毛泽东有位堂叔毛菊生，家境十分贫苦，毛泽东与母亲都很同情他。可是毛顺生却在堂弟最困难时，买下他家七亩水田，这件事母子俩都极力反对。但毛顺生认为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他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印象深刻。解放后，毛泽东曾同毛菊生儿子毛泽连谈到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后来因为毛泽东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粮谷的行为，毛顺生怕儿子惹出事来，就想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里当学徒，也可学些生意经。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到湘乡新式的学堂东山小学去读书，开阔眼界。父子之间又发生了矛盾。母亲文氏夫人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求知欲。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顺生，并请来亲朋邻居说情，他的老师毛麓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都应邀到家来劝说，毛顺生最后只好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父亲。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他将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为“誓不还”。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父亲的帐簿里，因为帐簿是父亲每天必看的。毛顺生看到这首诗后，告诉了文家，这件事就流传下来了。毛泽东父亲去世后，此诗一直由表兄文运昌珍藏着。在泽东动身启程这天，毛顺生带着一家人：妻子文氏和泽民、泽覃、泽建，把泽东送到塘岸上。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毛顺生同意儿子到长沙继续求学。1911

年春，毛泽东来到长沙，从此父子相离，书信传情。毛泽东工作后，时常寄些钱和药物给父亲，表示孝敬之心。

1919年冬，泽东母亲文氏夫人去世后，泽东便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随同到长沙的还有他的伯父及弟弟泽覃，泽东还特地和父亲及伯父、弟弟一起合影。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在其夫人文氏逝世不到半年后，因患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50岁。毛泽东此时正组织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为成立“平民通信社”，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罪行而奔波，未能回家奔丧。他只得把对父亲的哀悼和丧父的悲痛深深埋在心间。

1950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已到了划分成份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份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作了难。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把富农的成份划在一个革命领袖家，于心不安。于是，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信上廖廖数语，问道：“那成份的事，还是没讲罗？”毛寅秋说：“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岸英、岸青兄弟俩回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的嘱托：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分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300元，作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第二天一早就爬上南岸对面的一座小山上，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凭吊，还说以后还要来看他们。在参观旧居父母卧室时，深情地对身旁人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伤寒病，我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他的话讲得很轻，含着深沉的怀念。

二、母亲文七妹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于1867年生于湘乡县四都唐家坵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文家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家庭及邻里都昵称“七妹”。她没有读过书，连名字都没有，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农家妇女。从30年代至今的一些有关毛泽东母亲的资料中，都认为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其美。这个名字来源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书中记载毛泽东的话说：“我父亲叫

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其实，毛泽东的母亲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只因做姑娘时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被唤作“七妹”，故此，毛泽东说他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斯诺用英文按其音记述了这个名字，中文又按音译成了“文其美”，以至“文其美”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而“文七妹”之名却为人鲜知了。

唐家坵（后改称棠佳阁，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20余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因祖先埋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要来扫墓拜坟，为在当地找个落脚的地方，就将七妹子许给了韶山毛家。

文七妹中等身材，长得清秀端庄。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大眼睛。13岁时同毛顺生订婚，18岁嫁到韶山冲，同毛顺生成亲。婚后一段时间，嫌毛家冷清，多住在娘家。头二个儿子都在襁褓中夭折，1893年12月26日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格外疼爱。她惟恐第三个儿子再夭折，就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她吃“观音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文氏娘家唐家坵的后山，有个龙潭坵，坵内有清泉水流出，四季不竭。在坵口矗立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且在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要女儿七妹把小外孙抱到“石观音”庙叩拜神灵，并寄名为石头，取容易抚养的意思。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乳名为“石三伢子”。此外，文七妹又让泽东认七舅母为干娘，认为七舅母儿女多，让儿子拜她为干娘，意在托福，使儿子容易养活，由此可知文氏夫人的一片苦心。不久，文七妹又生了四子泽民，五子泽覃。还生了两个女儿，但都早殇。又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建。文氏夫人勤劳俭朴，聪明贤惠，性情温和，心地善良，是家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抚育孩子，操持繁重的家务，样样活都干，事事都安排得有条有理。她的治家节俭本领深为邻里及乡亲所称道。毛顺生在家业发展方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默默操劳的贤内助。

文氏夫人迷信佛教，吃斋念佛十分虔诚。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的毛泽东也很迷信。平日在家依时节祭天地、祖宗，从不间断。而父亲毛顺生不信神，母子俩担心父亲不信神，会给家里招来灾祸，就极力劝说，在1909年时，毛泽东因母亲生病，许了愿，曾到南岳去“朝山进香”。后来，父亲因为路上遇见老虎，而老虎没有伤害他就走了，认为这是冥冥中有神灵保佑，转为信神。而泽东则因知识渐开，明白科学道理，不再迷信了。毛泽东在1959年返韶山故乡时，曾指着堂屋正中曾经摆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

工作的地方。”

毛泽东的母亲，心地温厚，待人宽容恭让，性格上同丈夫毛顺生反差较大。她虽不满丈夫过于自私的处世态度，但在方式上总是以劝说化解矛盾，而且颇有效果。她贤明善良，富有同情心，怜惜穷苦人，肯予人以帮助。每逢荒年旱月，经常背着丈夫，悄悄送米送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种美德，对泽东兄妹影响很深，他们都拥护母亲的作法。而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这事常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毛泽东的母亲不但以自己的高尚品德来影响自己的子女，而且热情地支持毛泽东乐于助人的品性。

毛泽东读私塾时，虽然离家不远，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常自带午饭。一天，当他看到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同学，因家贫没有带午饭时，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这位同学吃，而且自己尽量少吃一些，让黑皮伢子吃饱。

从这以后，泽东天天和黑皮伢子一起吃午饭。泽东放学后，放下书包就到厨房去弄饭吃。母亲文七妹以为儿子午饭带得太少，第二天换个大碗给他带饭，可是，儿子放学后还是到厨房弄饭狼吞虎咽地吃。母亲很奇怪，就问毛泽东：你去上学读书，为什么反倒吃得下那么多饭？泽东这时才把事情原委告诉母亲，母亲慈爱地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该早些对我讲清楚，我好给你用大一点的篮子，每天带两份中饭，省得你们两人都吃不饱。从这天起，她天天中午给儿子带双份饭。毛泽东后来曾给许多人讲过他母亲的这种高尚品德。

毛泽东的二堂叔叫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文七妹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同情他，娘儿俩每到年关就瞒着毛顺生给这位贫苦的叔叔送米、送腊肉。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天，文七妹给儿子装好两箩筐白米，让他送到私塾当口粮的。16岁的毛泽东，挑着一担箩筐走出家门，时间不长，就空着箩筐回来了。文七妹就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快，毛泽东就把路上遇到本家毛承七夫妇吵架的事向母亲说了一遍。因为毛承七一家已断粮。毛氏宗祠里百把担积谷被族长死死卡住，不肯平糶。七嫂无奈，带着女儿到外村的大财主家里去讨米，毛承七嫌她给自己丢了脸面，十分生气，夫妻就大吵了一场。泽东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就把自己那担箩筐挑进屋，把那两斗白米，倒进了承七家的米缸。母亲听泽东说后，

赞同儿子乐于济贫的做法，随即又亲手量了两斗米，叫泽东莫让父亲看见，赶快挑到学堂里去。毛泽东对于母亲的善良和慈爱，心里十分感激。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母亲给打点的行李，告别了韶山冲，先到母亲娘家湘乡县的东山小学堂读书，后又到省城长沙学习。从此，毛泽东不再由母亲照料，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但是，母亲十六年的养育之恩，母亲的高尚品德，母亲的慈容，却深深地埋藏在了儿子的心里。

1919年春，文七妹患病，得了淋巴腺炎（俗称“痲子颈”）。这时正在长沙工作的毛泽东，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母子曾短聚一个时期。其间，毛泽东和弟弟泽民、泽覃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氏夫人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她的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欢聚。

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时候，得到了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像是晴天霹雳。马上带着小弟泽覃昼夜兼程，奔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的时候，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文氏夫人于1919年10月5日逝世，终年52岁。当二弟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还在呼喊着他们的名字时，他心如刀绞。那几天，他内心里经历着极大的悲痛，对着黯淡的油灯，一直守在灵前。1919年10月8日，他席地而坐，对着孤灯，写出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谎言，不存欺心，整饰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同时作泣母灵联两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
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
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和二弟泽民分别，带着小

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了长沙。

不久，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高度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信中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他的母亲正是这最后一种人。

毛泽东对父母的怀念和深情，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在日理万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地位，始终没有淡漠。

1921年春、1925年春夏和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探亲、开展革命工作时，总要到母亲和父亲的合葬墓前凭吊一番。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身世时，用了很多篇幅深情地谈到他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故居里，他在父母的照片前凝望着，伫立了好一阵，然后对随行的同志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他父母得的都不是难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毛泽东在自己当年的卧室里，看到了他与两个弟弟和母亲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他用道地的家乡土话问道：“咯是从那里拱出来的呀？”（这张照片是从那里找出来的？）原来这张唯一的母子合影，一直保存在外婆家，如今，照片上的老母早已作古，二弟泽民1943年牺牲在新疆，三弟泽覃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只剩下了他自己，能不感慨万端！

当时毛泽东还特意去瞻仰了父母的坟墓。那天早晨，他默默地爬上故居对面一座叫楠竹坵的小山岗。随行的罗瑞卿等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一直到了毛泽东父母的坟墓时，才知道他是来悼念父母的。警卫人员赶紧采来一束松柏交给毛泽东献上，毛泽东向合葬墓致了深深的鞠躬礼，静默良久。当时有人问他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修，他说：“不要了，保持原样就行了。”他还对随后赶来的人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回到住所后，他又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俩位。”

三、毛泽东（略）

四、毛泽民

毛泽民，字咏莲，又名润莲，是毛泽东的大弟，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由于毛泽东很早便离家外出求学，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父母持家理财。十几岁就学会了干一般农活，而且能写会算。1919年10月至1920年1月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

1921年春，毛泽东回到韶山。在哥哥的耐心开导下，毛泽民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从韶山到长沙投入革命洪流。于是来到长沙，在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为改善师生的生活，他不畏劳苦，经常到外地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还发动大家种菜、养猪，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来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往往因此而辍学。他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师生赞扬。这年秋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为党培训干部的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附设了补习学校。他转到自修大学任庶务，同时还兼任省学联的庶务。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每月400元社务经费来办自修大学的。他处处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很得当。他还参加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习，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

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担任该会秘书，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10月中旬的一天，300多笔业工人在毛泽民等人的带领下，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遭到省、县当局和资方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会乃决定罢工。他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地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这次罢工，前后坚持了40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这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他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他先在工人夜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

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防止中间盘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1923年3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民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常到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或亲自去长沙、汉口等地购货。合作社出售的物品价格，比私商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工人们从合作社买到廉价

的米和油、盐、酱、醋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非常高兴。他们深感合作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纷纷要求加入，并主动向合作社捐款，踊跃到合作社购货。

7月，合作社大整顿，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毛泽民出任总经理。在毛泽民等人的领导下，合作社搞得红红火火，工作很出色，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合作社还代售一些革命书刊，还为我党筹集了一笔活动经费，积累了开展工人运动和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

1924年深秋，毛泽民因患阑尾炎离安源到长沙住院。翌年2月，他跟随毛泽东、杨开慧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4月，党组织派他赴广州，进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毛泽民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书店规模很大，在广州、潮州、汉口、长沙、湘潭、南昌、宁波、青岛、重庆、太原、安庆、香港、海参崴和法国巴黎等地都设有分店或代售处。

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印刷、发行任务更加繁重。党中央遂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由毛泽民负责。他于1926年在上海新闻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毛泽民和工人一起干活，经常对他们进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工人们都喜欢他。1926年，他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毛泽民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次，毛泽民去店里时，四个暗探坐在对面茶馆里，书店营业员连忙向他作了个暗号，他才机智地从后门走脱了。

书店暴露后，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经党中央批准，长江书店于1927年3月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毛泽民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了汉口。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该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当他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时，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年底，毛泽民接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于是他又来到上海。印刷厂虽已停工，但没有被敌人破坏，他便利用原厂继续开业。

然而，这时的上海，环境十分险恶，反动军警和特务到处横行，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毛泽民不顾危险，坚持开展工作，使秘密印刷厂的机器终于转动起来，革命书刊和宣传品又源源不断地印刷出来。

1929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毛泽民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妥善地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毛泽民任该厂经理。华新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主义书籍。

当时的天津，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毛泽民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制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制。外人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事宜，必须先向柜房接洽，如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就掀动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暗铃，车间工人便迅速将党的文件收藏好，马上改印《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由于组织严密，一直未被敌人发觉，直到1931年毛泽民奉调离开天津，这个印刷厂的任务才告结束。

毛泽民在天津期间，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交通”，并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

1931年初，毛泽民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时，他得知嫂嫂杨开慧于前一年11月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他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烈士的亲属设法摆脱敌特监视，按他所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大哥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护送到上海。三个侄儿在他们的外婆和舅母护送下到上海后，毛泽民悲喜交集。他和钱希钧给孩子们做了新衣服，并按照党的决定，将他们送往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还时常去看望他们。

4月，在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上海党的组织处境十分危险，部分机关遭到破坏。中央考虑到顾顺章不但认识毛泽民，且熟悉他的联络暗号和地点，所以，让毛泽民等人离开

上海,到香港去开辟工作。毛泽民等人到香港不久,由于顾顺章也窜到了香港,党中央令他们立即离港,去中央根据地。

1931年7月,毛泽民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委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全部人员只有五名,即行长、记帐员、出纳员、总务和会计。

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泽民就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至1932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这是毛泽民的一大功劳。毛泽民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

此外,毛泽民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了储蓄运动。

在此期间,毛泽民还担任过闽赣省委常委、财政部长和省党团副书记。他一贯廉洁奉公。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委。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中,他一直担任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1936年初,毛泽民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下辖农牧、工矿、财务等科和一个运输队,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时值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毛泽民提出派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白区去采购布匹和棉花,以解决战士们的冬衣问题。采购人员出发前,毛泽民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并教给他们做买卖的经验与方法;采购员出发后,他又通过清涧县马花坪的红军部队,在阎锡山统治区设立了联络处,由联络处派人与敌营长打通关系。这样,采购员便在附近的中小城市里购得二万八千匹布和大量的棉花,陆续运回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接着,毛泽民又通过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发动根据地妇女为红军纺纱织布,赶做棉衣。不多久,在毛泽民和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下,几万红军都穿上了新棉衣。

毛泽民注意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在他的倡导下,兴办了一些作坊和合作社、收购店;发动男女老少纺纱、烧木炭、打铁、做木工;开展植树造林,

试种水稻，大力养猪、牛、羊等生产活动。他还亲自带领 30 多人到长城脚下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大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批物资。

1936 年秋，国际工人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毛泽民负责去取钱。次年四月，他与钱之光等四人化装去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将这笔外汇分批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皮箱的夹层里，再由几个人装扮成大商人，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西安。然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叶剑英等的亲自接送、掩护下，终于使这笔巨款安全地运到延安。

1937 年冬，毛泽民的支气管炎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 年初，毛泽民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时，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以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保证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因此，从 1937 年起，陆续派遣了一百来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还特别要求我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抵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党代表邓发（1939 年 7 月以后为陈潭秋）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那时的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物价一日数涨，“钞票一大把，只换烟一包”，买一个鸡蛋要五百两银票。加之货币不统一，除有省银票外，喀什地区又印发了喀票，市场上还有清朝铜板和洪宪银洋。盛世才不仅靠印发钞票来应付财政支出，而且还借了二千余万元的外债。毛泽民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毫不畏难，在我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进行建设。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整顿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过去，财政厅有二百人的编制，实际工作的只有几十个老弱病残。毛泽民到任后，将编制压缩为一百人，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专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均受省财政厅的统一领导。此外，毛泽民还抓了省、地、县银行的整顿，建立了各级金库。这样，就从省到县建立起一整套财政金融机构。之后，毛泽民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区、县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会议，研究和解决财政金融工作

的组织领导等问题。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办了财经学校，招收了80名青年学员，开设簿记、会计、公程式、统计、财务管理等课程，并亲自给学员讲课。1938年4月18日，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新疆财经情况和我的工作情况与计划的报告》，请求中央“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3人必须调来）”。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工作计划，并满足了他提出的请求。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毛泽民说服盛世才，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行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并确定旧省票四千两兑换新币一元，喀什票一百六十两兑换新币一元。新币正式发行前，毛泽民撰写文章，举办基金展览会，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

毛泽民对财经制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搞好财经工作的保证。他参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财经方面的规章制度，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银行、金库等方面切实可行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公务人员奖惩条例，从而堵塞了漏洞，一改过去混乱的局面，使新疆财经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防止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军阀、官僚、地主们继续横征暴敛，贪污浪费，争取尽快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毛泽民领导财政厅编制了收支总预算，制定了三年建设计划和财经制度条例。为了平衡预算，控制预算外的开支，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他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他自己更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对盛世才也不例外，使其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想要钱就到银行去拿，想要多少就拿多少了。一次，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濬让盛世才将和田街空地丈给人民群众，以这地皮收入作为市政金，给他自己建筑小别墅“明园”。毛泽民得知后，立即向盛世才提出质问，并强调政府应坚持财政统收统支，市政建设也应编制计划，和田街地皮费应上缴财政厅统一调度。使得“邱老爷”的如意算盘当时未能实现。

在整顿财政中，毛泽民还提出并实现了税制改革。在改革税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特别表现在税收上。在农牧业税方面，毛泽民提出要按羊的多寡来计税，大牧主的羊越多，税收就应越多，改变过去按户计税的不合理状况。在商业税方面，毛泽民主张对行商和坐贾都要征税，而且按资金和利润多少分等征收。盛世才不肯这样做，在召集各族头人开会时，竭力煽动他们反对。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毛泽民的办法终于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

动人民的负担。比如，林基路担任库车县县长时，取消了包税制，把税收项目从原来的20种削减到7种，受到各族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整理财政金融的同时，毛泽民还大力支持了新疆工、农、牧、文教、卫生、交通、市政等项事业的建设。他为了发展农牧业，规定省银行和各地分行每年都要给贫苦农牧民发放贷款、贷籽种、贷耕马等。例如，1938年，财政厅就给贫苦农民发放了农业贷款四十万元，贷给籽种三万石；1939年，发放农业贷款四十七万五千元，贷籽种四万一千石。这两年中，财政厅还拨专款从苏联购买了各种农机具两万多件。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毛泽民将新疆省立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以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反对高利贷剥削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疆商业银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该行理事会理事长。

在毛泽民的领导和各族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商业银行发展得很快。在业务范围方面，在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在组织方面，除迪化总行外，在伊犁、塔城、阿山等区设了15个分行，还在莎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于分行的设立，营业范围的扩大，营业额的增加，银行利润也大大增加。1940年，银行纯利润总额为七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十六元。商股获利以后，在给股东大会的贺电中说：“我们在银行入股，不但得到了很优厚的股息红利，而且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建新的工作。”根据毛泽民的建议，商业银行还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规定微利三分，当期一年，到期无力赎取，还可延期。从而抵制了旧当铺月息二十分的残酷剥削，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

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1941年，毛泽民主持发行了建设公债。为了使人民了解购买公债的意义，他除了联系在《新疆日报》开辟专栏进行宣传外，还经常表扬购买公债中的先进人物，并让报社“刊出其照片，以广宣传，藉资表扬”。同时规定：购买建设公债，完全取决于自愿，绝对不加丝毫强迫或摊派。由于毛泽民领导有方和财政厅、银行的工作人员工作出色，原计划只发行公债五百万元，不到两个月，就实际发行了六百七十余万元。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和阻力。盛世才见新疆财政有了起色，便借筹集军费为名，企图将财政厅收入攫为己有，遭到毛泽民的坚决拒绝。毛泽民严正指出：新疆的财政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有求必应，日夜开动印钞机，无限制的开支，无限制的供给，这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紧缩开支，节约使用，量入为出，重点使用，使财政力量得到恰当的发挥，这才

是一条活路。

毛泽民坚持财政制度的措施，严重地触犯了军阀盛世才等人的利益，被盛世才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把他“拔除”。1941年7月30日，盛以周彬（即毛泽民）有病，不宜担任繁重工作为借口，把毛泽民调到民政厅任厅长。毛泽民的行动受到了更为严密的监视。

尽管环境恶劣，毛泽民仍始终如一地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他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指责盛世才政府的黑暗腐朽，公开提出：“政府凡有施政，务必集思广益，绝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废除压迫人民的“农官乡约”等封建制度。他到民政厅后，制定了《新疆省区、乡制组织章程》和《区村选举法草案》，明文规定“在各村建立村代表制，每村由人民选举五至十一人任村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区村长的人选，必须是“素孚众望，办事公正”之人。他还指出：“这不仅是新政府的民主制在区村基层的具体实施，而且是根绝过去农官乡约等贪污枉法分子遗留恶习的最好方法”。为了推行这一新的民主制，毛泽民在新疆各地普遍开办区村训练班，派遣共产党员参加训练，又亲自编写了一本《区村训练班讲义》。在市政组织上，他也领导拟定了《街长选举办法》、《街长办事组织章程》，拟由群众自己选举街长。

毛泽民为了改善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主张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他在民政厅任职不到一年，就创办医药速成学校一所，为新疆的卫生保健事业造就了一批骨干。在莎车、焉耆等地设立了医院，在库车、奇台、鄯善、温泉等地开设了诊疗所，在喀什、阿勒泰等地设立了药房，又在喀什、迪化、伊犁、塔城等地医院内设立了专科门诊部，为迪化的主要医院购买了X光机等先进的医疗设备。他曾经专为医药工作题词，要求医药干部切实担负起“对全疆民众的保健使命，以期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保健事业更高的发展。”

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成绩，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却使盛世才坐立不安。他想方设法，要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国际国内形势逆转。这时候，盛世才以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不行了，于是逐渐撕下了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来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到了反共协议。这样，盛世才就公开投靠国民党，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潭秋、毛泽民等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退党

员的计划。由于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他们准备暂时撤退到苏联。在与苏联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前，毛泽民和陈潭秋一起，组织 117 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革命气节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应付突然事变。

预料中的突然事变很快发生了。1942 年 9 月 17 日下午一时，盛世才端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他派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示，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吱吱唔唔，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毛泽民知道这家伙已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

1943 年 2 月 7 日，盛世才把被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4 月 10 日起，敌人开始对毛泽民进行连续审讯。从保存下来的“刑讯记录”可以看出，毛泽民是怎样把敌人的法庭当作战场，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头一次审讯开始之后，毛泽民大义凛然，宣传了我们党的正义主张。

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什么？

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敌：你们八路军的人到新疆，中共中央给的什么指示？

毛：我们的目标是搞统一战线，帮助新疆建设。

敌：共产党在新疆的组织活动怎样？

毛：我们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没有个人利害。

在 5 月 5 日的审讯中，敌人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诬蔑共产党人在新疆搞“暴动”，毛泽民慷慨陈词，痛斥了敌人的无耻澜言。

敌：八路军由三个师偷偷摸摸扩充到五十七万人，这对吗？

毛：八路军扩充到五十七万人，对抗日有什么不好？八路军杂志上已经公布说有五十七万人，当然不是偷偷摸摸的，况且朱德是中央任命的。

敌：假定你们在新疆有阴谋暴动的事情怎么办？

毛：我们做的一切，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没有违背过的，而且完全是站

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工作。我认为你们所说有什么阴谋，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我们在新疆整理财政，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更没有违背民族利益。在新疆四、五年辛苦于抗战建新事业，事实俱在，哪有对新疆政府进行阴谋事件之理？我要求把事实拿出来！

当敌人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时，就问毛泽民：“你是不是叫毛泽民？”“你是不是毛泽东的令弟？”

毛泽民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说：“请你们问督办去。”

敌人气急败坏，逼着毛泽民说：“要你表明立场！”

毛泽民答：我是共产党员！

敌：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不行？

毛：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敌：你究竟愿不愿意脱离共产党？

毛：我不脱离共产党！

敌人无计可施，便对毛泽民用刑，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敌人继续用严刑逼供，审问内容还是老一套：逼他招认在新疆搞“暴动”，逼他脱离共产党。

敌：你脱离共产党好不好？

毛：脱离共产党是不可以的。

敌人重复问：“脱离共产党可不可以？”

毛泽民坚定不移地回答：“不能脱离！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

敌人边用刑边逼问：“假定你们有阴谋暴动呢？”

毛泽民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这回事！”

在酷刑加身的情况下，毛泽民依然镇定自若。他那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他那字字千钧的有力答辩，使得敌人张口结舌，无所措手足。

5月7日，敌人演出了“隔幕对质”的滑稽戏。他们让怕见阳光的叛徒潘柏南、刘西屏等人躲在刑讯室一角的幕布后面，作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见证人”，捏造所谓“暴动”计划和部署等谎言，并劝诱毛泽民投降。毛泽民怒不可遏，喝道：“潘柏南、刘西屏，给我滚出来！别躲在后面学人话。告诉你，盛世才可以出钱买你的灵魂，可买不了铁的事实！”敌人见绝技也不能奏效，便对毛泽民进行十数日昼夜不停的审讯，动用了“抽皮鞭”、“坐飞机”、“站岚炭”、“坐老虎凳”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酷刑摧毁了毛泽民的身体，但摧毁不了毛泽民的钢铁意志。他如天山苍松，巍然挺立！

1943年9月27日深夜，敌警务处处长李英奇与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玉廉，拿着盖有“盛世才”三字名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二监狱。他们指挥九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用汽车拉到六道弯，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3天后，盛世才又命爪牙把遗体挖出来，一个个拍照，然后把胶卷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领赏。

今天，在乌鲁木齐市的风景区——燕儿窝的山腰上，矗立着三座高大的大理石墓碑，静静地安息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的英灵。在左一侧墓碑上，董必武亲自题写了“毛泽民烈士之墓”。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五、毛泽覃

毛泽覃，字咏菊，又名润菊、泽林，是毛泽东的小弟弟，1905年9月25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六、七岁时发蒙，曾在清溪寺、瓦子坪等处读书，学习努力，成绩优良。课余时间，他常到田间做农活，爱听大人们讲“舜帝南巡”、“武王伐纣”、“赤壁之战”、“武松打虎”等古代故事。大哥毛泽东给他讲的“太平天国造反”、“长沙饥民暴动”等近世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毛泽东非常喜爱他。

1918年春，毛泽覃离开韶山跟随大哥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进入第一师范附小高14班学习，后入中学读书。前后五年间，他一直生活在大哥毛泽东的身边。在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以及毛泽东的影响教育下，他经常和进步的同学一起议论中国和世界的大事，批评国家和社会的腐败，在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秋，毛泽覃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他勤奋好问，刻苦攻读，经常去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在长沙码头创办工人夜校，到远离长沙的矿山参加罢工斗争。

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湘区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毛泽覃和另外几个补习学校的学员也曾住在这里。有一次，他们看到杨开慧有个小箱子，白天放在身边，晚上当枕头睡，视若宝贝，很想揭开它的“秘密”。一天，趁杨开慧不在之机，就悄悄地把箱子藏了起来。这个箱子是放党内文件的，杨开慧发现箱子“失踪”后，非常着急，和杨老太太到处寻找。这时，他们躲在窗外窃笑。毛泽东知道是他们开玩笑藏起来的，就停下工作喊他们进房来，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批评。

1922年11月，水口山的铅锌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湘区党委和毛泽东决定派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去接受新的考验。

1923年3月下旬，毛泽覃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到码头送行，再三嘱咐弟弟，到水口山后要好好锻炼自己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下矿井里去劳动，要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含着晶莹的泪花，向大哥挥手告别。

毛泽覃和朱舜华到水口山后，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任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毛泽覃分工负责团的工作，具体联系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他遵照大哥毛泽东的教导，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个星期天，总要下到矿井里去，和工人一道采掘矿砂，体验工人生活。他同这里的工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3年10月，毛泽覃在水口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年底，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亲信带领反动武装，突然包围了工人俱乐部，逮捕和屠杀工人。蒋光云、毛泽覃等临危不惧，迅速处理和转移文件，立即率领工人与反动军警斗争。他们很快被工人宋乔生、陈梅生等巧妙地保护和隐藏起来，没有落入敌手，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

不久，毛泽覃被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大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和兴起。他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5年春，毛泽东偕同杨开慧从上海回韶山养病，同时从事农民运动。毛泽覃亦随哥嫂回到韶山。他曾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他最喜欢以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大家，揭露时弊，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这年秋天，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他根据大哥的意见，先行去广州接洽有关工作。此后，他跟随毛泽东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相继在黄埔军官学校和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并在广东省农民协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工作过一段时期。这期间，同周文楠结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毛泽覃奉党的指示，偕爱人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到武汉。在船上碰见了二哥毛泽民。船到武汉后，他们很快就到

武昌都府堤找到了大哥毛泽东。根据毛泽覃的要求，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这时，汪精卫正在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准备公开叛变，形势愈来愈紧张。

一天，毛泽东把两个弟弟找来都府堤住处，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说，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屠戮，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毛泽覃表示要随部队到江西去。最后决定，兄弟三人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不久，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即将临产的周文楠和刚生过孩子的杨开慧返回湖南。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暴发。起义前夕，毛泽覃随第四军到达九江。因汪精卫、张发奎等密谋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党”，他根据党的指示，迅速处理完党内有关工作，化装离开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由于中途受阻未及时赶到。他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在城门遭到反动军警盘查。他神情镇定，应付自如，机智脱险，立刻南下追赶起义大军，历尽了艰险。快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发现扣押到临川，周恩来等好几位领导同志都认识他，即安排他到叶挺为军长的11军政治部工作，任25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他随一部分队伍转移至饶平，然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从三河坝撤下的部队会合。之后，跟随朱德、陈毅的部队转战于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山区。此时传来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立即派他去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

1927年初冬，毛泽覃身着国民党正规军军官的服装，带着证件，化名覃泽，顺利地通过国民党一道道关卡，来到了茶陵坑口。坑口是茶陵与宁冈的交界之地。工农红军攻占茶陵县城后，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为了保证我军前线与后方的交通联络，通过袁文才同当地某些人的关系，派出一个没有暴露工农革命军身分的连队，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驻扎在坑口。

毛泽覃首先找地方上的一些当权人物打交道。当时，住在坑口的伪团长罗克少，闻报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位长官来到此地，不敢怠慢，立即率一班土豪劣绅出来迎接，并设宴招待，摆酒接风。他机智地和敌人周旋，打听到有井冈山的一个连驻扎在这里，便找到该连的驻地。连长陈伯钧了解到这位“特殊身分”的人物与毛委员的关系及他所负的使命后，立即派人送他上井冈山。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朱德、陈毅转战达湘南的情况，随后便留在井冈山，投入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不久，毛泽东派毛泽覃到乔林开展工作，从事建党活动。他同两个部队干部，离开茅坪，毛泽东去送行，叮嘱他们，要在广大农村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培养先进的工农分子入党。毛泽覃到乔林后，访贫问苦，恢复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经过斗争实践考验的新党员，工作很有成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宁冈的最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在乔林乡建立起来。经过上级批准，由他担任支部书记。随后，他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又建立了乡工农兵政府和暴动队，使乔林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坚强堡垒。

1928年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占了遂川县城。毛泽覃参加了这次战争，并随部留在遂川，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并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继而，他又率领遂川游击大队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攻打宁冈新城的战斗。新城敌人凭借良好的武器装备拼命抵抗。毛泽东命令南北两门加强火力吸引起敌人，迅速组织力量首先从东门突进去。主攻东门的是一团一营和遂川游击大队。毛泽覃和一营长率领部分战士和游击队员，出敌不意地冲到城墙下面，一面火烧城门，一面架梯登城，首先攻破东门冲入城内。在各路红军、赤卫队、暴动队的协同作战下，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500余人，全部被歼。

2月21日，宁冈的耆市召开万人大会，公审伪县长张开阳，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毛泽覃被推举为宣传部长。

新城战斗后，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的队伍遭到敌军追击的消息，立即派毛泽覃带领一个特务连去耒阳找朱德、陈毅联系，迎接他们上井冈山。

4月底，在宁冈的耆市，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和毛泽东的队伍胜利会师。5月4日，两军在耆市召开会师大会，宣告了红四军的成立。毛泽覃担任三十一团一个营的党代表。这时，湘赣二省的敌人纠集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毛泽覃参加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在龙源口战斗中，他率三十一团一部，勇猛杀敌，出其不意地夺取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的作战。

1928年底，毛泽覃在大庾战斗中负伤，被留在地方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伤愈后，他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翌年夏天，他打听到离东固不远的水南，盘据着两个属于地方军阀的反动部队，其中何、马两个头目各有一个干儿子——大水和小水。二人

对其干爹纵兵残害百姓、烧杀淫掠的行径表示不满，有投奔红军的念头。毛泽覃决定深入虎穴，策动他们“倒戈”。一天，他化装成一个算命先生来到南水，与大水小水进行了秘密的会谈。后来，大小二水终于率领400多人、枪向红军投诚，使我地方武装得到发展。

1930年初，毛泽覃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与军长黄公略一道，率领该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他被任命为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不久，他又以特派员的身分回遂川，进行革命活动。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他主持赣西南后方办事处，负责筹集钱粮物资，领导军工生产，支援前方战斗。1930年冬，毛泽东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正押着一个青年往君田村走，后面跟着一位哭泣的老婆婆。毛泽东急忙上前扶住老婆婆，叫住红军战士问原由，当听说是毛泽覃所部在搞“扩红”时，非常生气。当晚兄弟二人争吵起来。据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当时急了，挥拳要揍弟弟。弟弟大声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次日，毛泽覃找到这位青年赔礼道歉，并把他送回家去，并向老婆婆作了检讨。

第二次反“围剿”以后，1931年6月，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后又改为中心县委），毛泽覃任书记，兼独立五师政委。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和师长肖克一道，根据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作战命令，率领该师在富田一带牵制陈诚、罗卓英的增援部队，到处袭击敌人，以配合主力红军在各地完成歼敌任务。老盘营、方石岭战斗以后，红三军在转移中，黄公略军长不幸中弹。临终前，他叮嘱毛泽覃在前委和总部未任命新的军长之前，代为指挥全军的工作。黄公略牺牲后，中华苏维埃为纪念黄公略，决定将吉安县改为公略县，由毛泽覃任公略县委书记。肖克调去湘鄂赣根据地以后，又由毛泽覃兼任独立五师师长。在此期间，毛泽覃与公略县委妇女部长贺怡结婚。

毛泽覃在担任永、吉、太苏区和红军独立五师的领导职务期间，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有时注意不够，在土地革命中分配胜利成果时，有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的地方。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他，要他注意原则和影响，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可望得到庇护，就可以不讲党性，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从此，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注意改进工作作风。

1930年冬，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在处理这一事变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毛泽东又派毛泽覃到东固调查处理。在贺怡的协助下，

他深入群众开展调查,释放了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事后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接着就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们又无理地给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人”的帽子,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反党派别”的斗争。当时邓小平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先后担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都是江西省委的主要成员。他们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

毛泽覃面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毫不畏缩动摇,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针对他们在政治上搞机会主义,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胡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覃尖锐地指出,只有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在大城市执行的是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执行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针对他们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钦差大臣满天飞,妄图打倒一大批红军和地方负责同志的行为,又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不过表明你们是“一派的领袖”,并不代表党,而只代表“派别的领袖”。谢唯俊和古柏支持毛泽覃,也发表过与他相同的意见。为此,“左”倾错误领导指责他们“进行反中央局的活动”,“形成一种秘密的结合”。当“左”倾教条主义者点了他们的名,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查”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将一些污蔑和攻击的不实之辞顶了回去。

1933年5月上旬,在宁都召开了由党中央和中央局派人直接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认为临时中央迁入苏区以后,江西党3个月的工作是落在革命战争需要之后的,没有完成“紧急动员”、“扩大红军”等任务,原因在于江西党内有一个“怪物”障碍了工作的进行。这个“怪物”就是所谓“单纯防御”的“罗明路线”,而邓、毛、谢、古四同志“就是这个怪物的代表”,“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否则立即开除出党”。会议还决定给他们组织上的处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的机关的重要职务,并在会上宣布撤销他们职务的时候,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

掩藏。”（见《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和《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载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2期）会后一段时间，他们被派遣到宁都、兴国等县农村劳动。随后又被分别安排在红军宣传部门、中央派往基层协助工作的“工作团”、政府业务部门和中央苏区北线的偏远地区等处工作。当时毛泽覃的妻子贺怡也受到谴责，并要她揭发毛泽覃。她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与此同时，毛泽东亦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职务减少了，空闲增加了。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覃有时也跟随毛泽东去搞农村调查。他在长冈乡调查中，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走门串户开调查会，还不断给乡苏维埃的工作以具体的指导。一次支部会上，有的干部提出，长冈乡已有80%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建议，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并表示自己愿意带头。在李玉英的带动下，20多天，全乡四个村有130多位妇女学会了犁耙。毛泽覃对李玉英带动妇女学犁田的事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到田间实地观察。返回瑞金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很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奖给了长冈乡两头耕牛，奖给了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这条蓝围裙上端镶着红色的条边，贴胸处有一颗红五星，里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毛泽覃向李玉英表示热烈的祝贺。会后，他又随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亲自将两头牛送到长冈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他爱人贺怡因身怀有孕，由一个同志转移到他在白区的老家，隐蔽起来。当时，红色瑞金和整个苏区落入敌手。敌人对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实行重重包围和封锁。在那缺衣少食、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坚持斗争。1934年冬，他指挥部队在谢坊伏击敌人，击毙团长一人，缴枪100多支，俘敌数十名。

1935年2月，毛泽覃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的一部前往福建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合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毛泽覃是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成员。4月上旬，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敌人包围，伤亡惨重。为了摆脱敌人，万、龙率大部队向东突围，毛泽覃率一部分队伍担任掩护，然后向西突围。他完成掩护任

务后突围达田心，不料又遭敌人伏击，队伍被打散。他迅速收集一部分被打散的战士来到长汀和瑞金边界的一片大山之中。敌人开始搜山，他们东躲西藏，饥肠咕咕，几次得到老乡们的帮助。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跃涧涉溪，来到瑞金县黄膳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因叛徒出卖，敌人包围了他们休息的纸槽小屋。毛泽覃一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担任掩护，部分战士得以突围，他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沾着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党证，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

六、毛泽建

毛泽建，又名毛达湘，是毛泽东的堂妹，1905年10月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时逢菊花盛开的金秋季节，父母亲给她取了个乳名，叫菊妹子。

菊妹子有4个弟妹。父亲毛尉生，是一个十分贫困的佃农，靠帮工为生。由于生活穷困和过度的劳累，他年轻时就得了肺病，经常咯血，39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姓陈，是一个勤劳俭朴的农家妇女，曾患“火眼病”，双目只有三、四分光。丈夫去世后，她带着年幼的孩子，辛勤劳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了帮助母亲养活全家，菊妹子从小就参加劳动，除了上山拣柴，下地挖野菜外，在寒冬季节，还经常跟着母亲沿户乞讨，养活弟妹。因家计日蹙，她九岁那年便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从东茅塘来到上屋场。

菊妹子从小就很坚强。来到上屋场没有多久，有一天突然来了强盗，当时只有她一人在家。强盗逼问她贵重东西放在哪里？打得她鼻青脸肿，她始终没有回答。

1919年，毛泽东的母亲因病去逝，第二年年初，父亲毛顺生也因病去世了。这时，毛泽东正率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在北京，一时不能回到韶山。14岁的菊妹子只好又从上屋场回到了东茅塘自己的家中。

这时，菊妹子母亲的双目几乎失明，4个弟妹大的不到10岁，小的只有一岁多，生活十分窘迫。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听从了一个姓肖的远房亲属的劝说，把她送到杨林乡肖家去当童养媳。

童养媳的生活十分痛苦。菊妹子在肖家每天要干繁重的家务劳动，尽管累得腰酸背疼，还经常受到婶娘的责骂，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一天，她在洗锅的时候，突然头昏，额头撞到锅边上划开一道很深的口子。婶娘不仅不来救护，

反压着她的头往锅上烫，她满额被灼伤，晕倒过去。从此，她的前额就留下了一块永远难忘的伤疤。

1921年春节期间，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把菊妹子接回家中，鼓励她要做一名舍家为国、舍己为人的有志青年。菊妹子也坚决表示要跟毛泽东出去读书、去革命，再不回去做童养媳了。毛泽东知道她没有正式名字，随手在一张纸盒上写了“毛泽建”3个字。从此菊妹子有了正式的名字。这年春天，毛泽东帮她解除了婚约，带着她来到长沙，先后送她到长沙城内建本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她学习刻苦，进步很快，开始跟不上班，后来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的成绩更为突出。她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到平民夜校听课，非常勤奋。有一天，毛泽东把泽覃和泽建叫了去，想当面考考他们的学习成绩。泽覃建议：先看钝钉子的吧！“钝钉子”是爱开玩笑的泽覃给泽建起得绰号。毛泽建笑道：我这颗钉子钝一点，只要下功夫，也可以钉进木头的！考完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称赞她的刻苦精神，其中两句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在长沙的两年半时间里，毛泽建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如为文化书社递送书刊，帮助工会刻印传单，张贴标语等。1921年，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夏天，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不久，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上海。毛泽建也改名毛达湘，经夏明翰介绍，前往衡阳。同年秋进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毛泽东在赴粤途中，路过衡阳，曾到三女师看望她，鼓励她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打击顽固派。

毛泽建在三女师担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她经常阅读《向导》周刊、《新青年》和鲁迅的《呐喊》等进步书刊，先后发起组织旅衡同学会、旅邵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等团体，带领同学在节假日到衡阳县东乡、北乡以及附近的工厂、矿山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她尤其注意发动妇女起来革命。她要求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主动与思想进步的同学交朋友，培养他们入党。她还组织学生同学校的顽固派作斗争。

三女师校长欧鸣皋是衡阳教育界出名的顽固派，他规定女校学生过河只能乘坐自备的划子，不准与劳苦大众同船。毛泽建发动同学，伸张“劳工神圣”的真理，批判吃人的社教、理直气壮地与劳苦大众同船过渡，并利用这个时间做宣传、调查。欧鸣皋伙同财务部门克扣和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她抓住真凭实据进行揭露和斗争，迫使欧鸣皋不得不承认错误，改善了学生的伙食。一

次欧鸣皋请来一位和尚向学生讲授佛经，她认为这是向大家灌输宗教鸦片，就质问校长：三女师是寺庙还是学校？你是不是要把大家培养成尼姑、道姑？和尚见势不妙就溜走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毛泽建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她带领同学冲进诬蔑国民革命、大肆贩卖日货的衡阳县商会会长的公馆，当众焚烧了他家的全部日货。在学运中，她结识了当时衡阳省立第三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年冬，她与陈芬结婚。婚后，陈芬前往郴县领导农民运动，她继续在三女师求学。

1926年初，衡阳县长陈祺祥，为镇压学生运动，借故逮捕了湘南学联的一个代表。消息传出后，学生极为愤慨。湘南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示威游行。毛泽建带领三女师的同学一路高呼“立即放出学联代表”的口号，率先冲进县府衙门，吓得县长不敢出来照面，最后被迫接受了学生提出的条件，释放了学联代表。这天晚上，衡阳县城响起了鞭炮声，欢迎学联代表出狱。她给陈芬写信说，革命者不应在鞭炮声中昏头昏脑，应该唤醒那些沉醉于胜利的人们和尚未觉醒的群众，向着远大的目标大呼猛进。

1926年夏天，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衡阳。毛泽建积极组织同学到街头、工厂和城郊讲演，演出文艺节目，热情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动员各界群众支援北伐。随后，她受党的派遣到集兵滩农民讲习所，讲授《共产主义浅说》的课程，辅导学员阅读《新青年》和《向导》等革命刊物，并兼授音乐课。不久，她从集兵滩回到县城，负责县委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夏秋之交，她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了女三师，参加了中共衡阳县委，任妇女运动委员，从事农民运动。她经常深入衡阳县神皇山、园山、蹬子岭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发动妇女成立女界联合会，教育妇女放脚、闹祠堂；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协助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亲自讲课。她在神皇山的工作中，善于宣传和组织群众，农民协会办得很出色，得到县农民协会的表扬，并给神皇山农民协会送了一块题有“模范农协”的金匾。送匾那天，她在神皇山召开了群众大会，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鼓舞农民协会会员的斗志，把当地最反动的几个土豪劣绅抓起来戴高帽子游乡。

1927年2月，毛泽建作为衡阳县的代表，到长沙参加省妇联召开的妇女工作代表大会。在会上，她了解到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精神，返回衡阳后，即到集兵滩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农民运动。3、4月间，她按照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在集兵滩的观音堂举办了二期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她亲自给学员讲课，还带领学员上操，学习军事常识。两期农训班共培训了400多名学员，其中还发展了20余名党员，为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毛泽建被迫拿起武器投入斗争。这年夏天，神皇山的大土豪罗清溪、劣绅罗老八等人勾结国民党军队，前往神皇山地区“围剿”革命势力。她迅即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露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几千农民自卫军，向前来袭击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伏击，使他们仓皇撤回到衡阳县城。继而，她又和衡阳县委负责人肖觉先、戴金吾，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屈森澄等，带着各方集合起来的农民武装来到岫嵎峰，组成了衡北游击师，用大刀、梭镖、鸟铳和土炮，打击当地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她率领游击师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武装斗争的道路，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处决了周德翠、周凤鸣等一批反革命分子。10月底，毛泽建和陈芬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一起奔赴衡山。11月，他俩以县委负责人的名义在距县城十里的九龙泉的后山上，主持召开了衡山县临时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改组了衡山县委，由陈芬担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毛泽建任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兼做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会后不久，陈芬化名林青、她化名“唐小姐”前往宋桥，开展恢复党和农会组织、聚集武装力量的工作。11月上旬，衡山工农游击队宣告成立，她参加了游击队的领导工作。有时她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有时又扮成朴实无华的农家女，往来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刺探敌情，部署工作。她曾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用土炸弹炸县政府，袭击挨户团，打击土豪劣绅，使敌人闻风丧胆，成了远近闻名的“女游击队长”。她给反动分子送条子，下面落款后总要画一把剑，意思是说毛泽建就是毛泽“剑”，是一把利剑，而这把剑是专杀反动派的。就在他住的对门，有个叫宾海溶的地主，因石桥团防局长“剿匪”不力，县里委派他去石桥接任。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陈芬商议，给宾海溶写了一封画有利剑的警告信，说明利害，吓得这个地主不敢去上任。

1928年初，陈芬和毛泽建率领衡山工农游击队乘新军阀白崇禧的“西征军”与何键的部队在湘南一带混战之机，主动出击，夺得衡山县境内一个团防局的步枪30余支和一些轻武器，俘敌数十名。3月，他们率领衡山游击队，同衡阳、湘潭等地的游击队一起，摧毁了南岳镇的团防局，一度攻占了南岳镇。

不久，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衡山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县委中有人当了叛徒，成了“清乡委员会”的侦缉员，她和陈芬奉命离开，化装成绅士夫妇，通过重重封锁来到耒阳县，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的队伍。她任耒阳女界联合会负责人和耒阳县妇运委员，陈芬任耒阳、郴县、永兴三县特派员。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后，她和陈芬根据斗争需要仍留在耒阳工作，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在石准、新市、东海、夏塘、遥田一带乡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地下斗争。陈芬任夏塘、敖山等地农民游击队的党代表，她任队长。这支游击队神出鬼没，摧毁了敌人许多反动据点；处决了省议员、大土豪赵水生和劣绅李善；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打败了团防局的反动武装，而且掩护了一部分红军家属和农民自卫军转移。这时，她虽已怀孕七、八个月，但仍不顾大家的劝阻，指挥游击队员冲锋陷阵。

5月初，在夏塘铺的一个荒僻的小山沟，毛泽建与耒阳挨户团长谭福堂遭遇了。这时陈芬和姐姐陈淑元以及一部分游击队战士也来到了这里。经过一场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陈芬决定与毛泽建率领游击战士分头突围。陈芬在敖山附近被捕，毛泽建和陈淑元在棉花塘被捕。5月5日，陈芬在敖山庙的贯武桥被杀害。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大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而她和陈淑元，则在26日被前来袭击耒阳县团防局和夏塘铺挨户团的一支井冈山队伍救出。可是，敌人很快又反扑过来。此时，她即将分娩，行动十分艰难，同志们要用担架抬她，准备撤退。但她主动要求留下。这样，她便和陈淑元隐藏在夏塘一个孤老婆婆的家里。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贱生（又一说艰生）。不料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挨户团，敌人很快就找上门来，她和陈淑元又一次被捕，刚出生的孩子也一道被关进了监狱。不久，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她把艰生带出，但因无奶，孩子几个月后就夭亡了。

敌人再次抓到毛泽建，如获至宝。6月，夏塘铺挨户团为向上司请功受赏，把她押解到耒阳县城。8月，国民党衡山政府又以她“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在衡山县负该党重要职责”为由，把她押解到衡山县女监狱。她前后被关押了一年多，受尽了种种酷刑。敌人软硬兼施，还曾驱使叛徒彭瓚进行劝降，但毫无结果，她宁死不屈。在一次衡山县长蔡庆煊对她的审讯中，针对蔡庆煊的审问，她发出了铮铮誓言：“我叫共产党，也叫毛达湘，毛达湘就是共产党！”至于说共产党杀了人，她指着县长说：“首先是你们欺压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我们造反是你们逼出来的。你们逼迫越凶，我们就闹得越厉害。我们

惩办的是土豪劣绅，包括你这种贪官污吏！”当蔡庆煊说到不相信共产党人不怕死，也不怕痛时，她大笑着说：“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威。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在她即将临刑前，她给陈淑元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在达湘个人方面是很愉快的了。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再增加。现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们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作这样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时，我们还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的。”写完后，她细心地把信摺好，放在同牢的老婆婆手里，请她设法送给陈淑元。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被押往衡山马王庙刑场。在刑场上，一个伪警端来一碗水酒，拿着两个包子，送给她。她接过包子，猛力地向前来监斩的县长蔡庆煊击去，顺手把一碗酒也泼了过去。蔡庆煊气急败坏地吼道：跪下！她大呼：不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出来……。随着枪响，她英勇就义，年仅24岁。她就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张贴布告，限令3天不准收尸。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几个码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士的遗体抢运出来，悄悄地安葬在湘江之畔的西溪桥头。半年后，又将烈士墓迁移到金紫峰麓的雷打石山上，并刻有石碑，上面写着：“民国十八年刊，毛达湘女士墓，原籍湘潭人氏。”

1966年11月25日，在雷打石山下，毛泽建烈士石碑和墓地被发现。衡山县人民在县城南郊的金紫峰麓修建了毛泽建烈士墓。

第二章 毛泽东的婚姻

第一节 毛泽东的妻子

一、结发妻子罗氏

毛泽东的结发妻子姓罗，没有名字，在韶山四修《毛氏族谱》中只记载了“罗氏”二字。罗氏依旧式封建婚姻，由父母包办，于1908年嫁到毛家，成为毛家的大儿媳妇，当时韶山时尚早婚，而且妻子往往比丈夫大几岁，罗氏比毛泽东大6岁。罗氏到毛家时，正值毛家人丁兴旺，家业发展顺利的时期。罗氏在毛家，尽儿媳之责，帮助婆婆文氏夫人干些针线女红。

毛泽东对于这门亲事及罗氏这个妻子，一直是不承认的。他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到：“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罗氏在韶山身体不大好，有时回娘家小住。1910年2月11日罗氏病逝，葬于韶山南岸土地冲。有人说，毛泽东与罗氏厮守10年，实属无稽之谈。

二、杨开慧

杨开慧，乳名霞，字云锦，是毛泽东的第二位妻子。她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是位著名的学者，在她2岁那年出国留学，她跟随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渡过了童年。她从小就帮助妈妈搞些家务劳动，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松毛柴、扯猪草。她很同情下层生活的劳动人民。乡里人都很喜爱她，亲切地叫她霞姑娘。

杨开慧长到7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于是她进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当时，入学年龄一般是10岁左右，她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由

于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别人问她将来打算干什么事时，她回答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她在这里只读了3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这时她已阅读了不少诗歌、小说。后来在海外留学的父亲鼓励之下，她的母亲来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求学。她也随母亲进了这所学校。这里既学文化，又学编织、缝纫和绣花。她为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而十分高兴，但也不愿像其他同学那样将来只想做些缝纫、编织的事。她曾对同学说：“我现在还搞不清将来会做什么，但是我不愿做的事，别人要我做我也不会做。事情愿不愿做，要看对救国有没有好处。”后来衡粹女校迁往长沙，她便转学到麻林桥附近的一所县立第一女子高小继续读书。

1913年春，杨开慧随归国的父亲迁居长沙城，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学。一学期后便停学在家，由父亲指导自学，前后共达4年。在父亲的培养熏陶之下，她对诗词有极浓厚的兴趣。这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到“杨寓”求教，讨论治学做人之道，探求救国救民之理。杨开慧在一旁倾听，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她对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最为倾服，并认真学习父亲和毛泽东锻炼身体的办法，常年坚持冷水浴，行深呼吸，吃硬食。她这样做的目的，在一次作文中写得很清楚：“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1918年夏，杨昌济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家来到北京。因父亲到北京后长期患病，她为陪侍父亲没有进学校读书，但仍在家坚持自学。同年秋，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经常来杨家探望老师。因此，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接触日渐增多。受毛泽东的影响，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因而大大丰富了她的思想，开阔了她的眼界，使她无论在思想上、学识上都得到提高。当时前来探望杨昌济的一位朋友，曾称赞开慧说：“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常把自己写的日记和学习笔记借给她阅读，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两人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第二年四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1920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开慧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她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的父亲帮助下，进了湘福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对学生控制甚严。这时她经过五

四运动的洗礼,已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和斗争精神。她对学校的各种反动措施感到愤慨,积极动员和启发同学进行斗争。她是学校里最早剪短发的学生,反动派说她是“过激党”,挖苦她“男不男,女不女”,她只付之一笑。她对学校规定学生必读《圣经》,做礼拜,不感兴趣。对付的办法,是每逢上课,她桌上虽摆着《圣经》,而夹带看的却是刊物。要是做礼拜,她不是请假,便是有病,没有一次到场。更令学校当局头痛的,是她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全省“驱张”的群众斗争。她还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周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由于杨开慧在校内外的一系列斗争中,表现非凡,在同学中享有相当的威信,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开慧姐”。1921年夏,湖南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提出了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男校宜速开禁”,实行“男女同校”的主张。她和周南女校的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没累、徐潜、蒋玮(丁玲)等女同学,报考岳云中学。学校当局看到她们的成绩特别优异,便新设一间女生宿舍,破例招收了这几位“开放女禁”的急先锋。她们转入岳云男子中学第十四班,成为湖南在男子中学读书的第一批女学生。这件事,在当时的长沙城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这段时期内,杨开慧同毛泽东的感情日深。驱张运动后的一天,毛泽东到福湘女校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当时,毛泽东缺少革命活动经费,她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逝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费,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文化书社成立后,她参加了书社的工作。1920年冬,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毛泽东同居结婚,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1921年春节前夕,她和毛泽东乘轿从长沙来到板仓,探望嫂子李一纯和新生的侄女杨展。并宣布他们已经结婚。清泰乡一带的亲朋戚友闻讯前来祝贺。而他们没有什么排场,招待客人只用一杯盐姜豆子芝麻茶。

有情人终成眷属,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恋爱过程却十分感人。当时,杨开慧恋着毛泽东,但不轻易向毛泽东表示这种感情;毛泽东也深深爱着杨开慧,却经常在信里明确表示这种爱慕之情。特别在写的一首《虞美人》的词中,毛泽东更是一往情深,情感跃然纸上。他写道: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

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恙，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后来杨开慧在回忆她同毛泽东的恋爱情形时说：

我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结婚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运命！

杨开慧还说，他们共经历了两年的恋爱生活，其中也曾有一点小小的波折，那是因为她常常把对毛泽东的爱藏在心底，惟恐毛泽东看见她爱他的心。然而波折过后却令杨开慧倍感欣喜。她说：“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她仍在岳云中学读书，直到1921年初冬，她才离开岳云中学，同毛泽东一道住进长沙小吴门清水塘，算是正式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小木板平房，周围都是菜园。它是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设置的。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公开的职业是湖南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杨开慧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家”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

杨开慧在湘区委员会工作期间，她为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为了保护湘区党委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她把母亲接到清水塘居

住，一同做好掩护工作。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人运动，经常出入城东小吴门，到文化书社、船山学社、望麓园织布厂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指示，收集工运动态和秘密情报。她经常接待各地来访的工人代表，热情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每当召开党的会议，她就到室外流动放哨。

1922年10月，杨开慧生了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当时，长沙正处在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毛泽东日夜奔走在外，没有时间照顾她，她把困难独自承担起来。1923年4月，党中央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临别之际，毛泽东为杨开慧作《贺新郎》词一首，表达他依依不舍的离别情愁。词中写道：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3年11月，杨开慧回到板仓，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不久，她又回到长沙工作。后来她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一栋简陋的石库门房子里。这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工作十分繁忙。杨开慧除照料孩子外，仍然帮助毛泽东做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的工作。她有时还要到小沙渡的纱厂工人夜校去讲课。她每周要抽出二个晚上去上课。起初，她讲的湖南话，上海工人听不太懂，她便耐心地一字一句慢慢讲，直到工人听懂为止；后来，她也学着讲点上海话，因而深受大家的欢迎。

1924年底，杨开慧随毛泽东离开上海，1925年2月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她按照当地习俗，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到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了做好对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她积极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创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她用生动的语言、贴切的比喻，动员农民上夜校。开慧的认真教学，不仅使农民学了知识，认了字，更主要的是认清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给劳苦大众造成的深重灾难，懂得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一段时期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批农村积极分子培养出来了，广大农民群众也有了组织起来的革命要求，紧接着，在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20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开慧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培养发展女党员，壮大党的队伍。1925年

6月，我党在农村最早和最坚强的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建立了。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及韶山土豪成胥生等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反动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在韶山人民掩护下，于8月离开韶山，秘密前往长沙，转到广州。杨开慧将毛泽东留下的工作处理完毕后，也于同年10月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她到广州后，仍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并参加市妇联工作，还到我党领导的为北伐战争培养干部的政治讲习班旁听学习。在这期间，她继续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经常往来于毛泽东和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和消息。当时她自己带着二个孩子，常常一边写字，一边用脚摇着摇篮，工作十分辛苦。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从广州经上海到武汉。杨开慧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12月17日，毛泽东应邀由武汉到长沙，“回湘指导一切”，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她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这时，她正怀孕在身，当毛泽东考察衡山等五县农运情况回到望麓园时，她不顾劳累，立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把他带回的大量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了初步整理。1927年2月又随毛泽东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住武昌都府堤41号。当时，她产期临近，身边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身体很虚弱。但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仍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对农运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在十行纸上，毛泽东禁不住夸赞她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正是由于有开慧这位“好秘书”的协助，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脱稿了，并于1927年3月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在这里，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中央指示，要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保姆孙嫂带着岸英先回板仓，而她则带着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道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就星夜送她回到板仓，第二天清早便匆匆离开，到湘赣边境领导秋收暴动去了。从此，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留在板仓，在这个地处长沙、平江、湘阴三县交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从1927年8月到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坚持斗争3年多。除参加

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外，她还注意阅读报刊，了解时事动向，有时，还动手写些文章。

关于她这段地下斗争的情况，陈玉英有如下回忆：

杨开慧“留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她十分重视学习，每天都要挤时间看书。她经常深入农民家里，进行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她的穿着同农村妇女一样，和群众很合得来，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喊她‘霞姑’、‘霞姐’。在板仓期间，开慧同志还带着我们先后到平江县石洞砖屋里的向五舅家和田边屋里钟姨妈家去住。她在这里住几个月，那里住几个月，名义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从事各方面的革命活动。”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她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

1930年7月底，红三军攻打长沙，使长沙、平江、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暴露。8月初，红军被迫撤离长沙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卷土重来，在长沙城乡滥捕滥杀，疯狂地进行“清剿”。这时，福临乡长范庆熙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诡称：“毛泽东之妻毛杨氏，三次带兵从井冈山打长沙未遂，隐居长沙东乡板仓杨公庙一带，组织苏维埃，自称主席。”何健闻讯如获至宝，立即派出侦缉队员，坐镇福临乡“铲共义勇队”队部，与范庆熙合谋，加紧搜捕。在这种险恶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开慧暂时离开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坚定地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遵循党的指示，坚定沉着，坚持斗争。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她仍然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工作。她行踪隐蔽，出没无常，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敌人几次围捕都扑了空。为了防备万一，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只锻烧有“囍”字的蓝花瓷缸内，埋在叔叔的菜园里。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杨开慧被敌人的密探发现了。当天午夜，范庆熙和何健派来的侦缉队员率兵丁将板仓下屋团团围住。当她知道自己已无法脱险后，从容地处理了手头上的文件，对冲进屋来的匪兵说：“要走就走！”敌人把杨开慧和在她身边工作的陈玉英一起逮捕起来，当时年仅8岁的岸英也被一起押走。贫苦农民听到开慧被捕的消息，立即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些农民满腔义愤，毫不畏惧地大声痛斥张牙舞爪的敌人。临行时，开慧对家里人說：

“不要怕，要跟共产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天晚上，党组织安排了20来个身强力壮的革命同志，打算武装截救杨开慧。但是，阴险狡猾的敌人改变了路线，致使这次抢救没有成功。

杨开慧被押到长沙后，先后被关在伪警备部、清乡部和陆军监狱署等处的牢狱中。在长沙，杨开慧带着小孩坐牢，在敌人严刑拷打和百般利诱下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杨开慧被捕入狱后，党组织和他父亲的生前好友曾多方设法营救，群众也多次联名要求释放她，但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妻，案情重大，终于悍然将她判处死刑。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杨开慧牺牲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敛，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曾说过：“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词赠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此词已广为人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后来，毛泽东应邵华、毛岸青的要求，把这首词写给他们的时候，又把“骄杨”写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托友人、子女为杨开慧扫墓。杨开慧母亲去世时，他又写信致哀，嘱与其“亲爱的夫人”同穴。

为了纪念杨开慧烈士，解放初期当地政府将烈士旧居所在的清泰乡改名

为开慧乡，1958年又改名为开慧公社，烈士故居板仓命名为开慧大队。同年7月1日，开慧公社党委在烈士墓后立了“光辉长照后人心”的石碑。1969年4月，经当时的省级领导机关批准，开工修建杨开慧烈士陵园，于同年9月建成。杨开慧为中国革命英勇捐躯，死的壮烈，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三、贺子珍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1909年9月出生于江西永新。她降生时，正是桂花飘香、秋月朗朗的时节，父母给她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桂圆。她有一个温暖的家。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读书人，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母亲长得秀美，而且读过书。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同她年龄相差无几，志趣最相投，下面还有弟弟贺敏仁和小妹贺先圆，年纪比她小得多。直到她记事，祖父留给他们的家产还是很可观的。然而就在她四岁那年，祸从天降，父亲被撤去县长职务回到永新县衙当了刑门师爷，因一场官司牵连被关进大牢。为营救父亲出狱，家产差不多都变卖光了，从此家道中落。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母开了一家茶馆“海天春”，全家人就住在茶馆的后面。她就在这个天地里长大，从这里开始观察和认识世界。当她开始懂事的时候，她看到的是有权有势者横行霸道，穷人受苦受难、被逼得卖儿卖女，这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让儿子学有所成，父亲请来一位老夫子在家教她哥哥读经书，但不让她和妹妹上书桌，她们就躲在门后偷听，结果认识了不少字。当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永新县里的许多女孩子都进了学校，她羡慕极了，就和妹妹一起向父母提出了入学的要求，姐俩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学。上学以后，她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后来同毛泽东结婚以后，她曾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沿用下来。

很快，贺子珍长成为一个少女。她秉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被称作“永新一枝花”。她中等身量，皮肤洁白，秀气的瓜子脸，在又长又弯的眉毛下，是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辉的大眼睛。她性格文静、言语不多。当她高兴的时候，开怀大笑，容光焕发，更是动人。少年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给她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贺子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脚下。险峻的井冈山，多少年来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子珍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

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她家有很多的书，而她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小说了，常常为此废寝忘食。那时，她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客十分崇拜，脑海里总是萦绕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不久，共产主义的学说，俄国革命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永新县。贺子珍被共产主义学说所深深地吸引，她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于不顾，主动结交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要求他们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她和伙伴们相互传阅《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共产主义 ABC》等新书刊，大开了眼界。她带领班上的学生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参加县城左派学生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捣乱分子”。1925年她加入了青年团，成为家中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这时她已转到修水女子学校学习。她把学校作为活动的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意义。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了高潮。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共党员的。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为迎接北伐军进驻永新，她带领姑娘们到大街小巷刷标语。9月，北伐军从湖南茶陵经江西莲花来到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分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这是永新县第一任的妇女部长。那一年，她才16岁。她当妇女部长的第一件事是剪辫子，作为永新县第一个剪短发的妇女，几乎轰动了全城。在她的大力提倡下，妇女留短发逐渐在永新普遍起来。当时她还兼做青年工作。开始不知道该让青年们去干什么好，就带着他们去打菩萨，后来她组织县里的男女青年搞宣传，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很受群众欢迎。北伐军协助永新成立民主政府后就离开了，保卫永新的责任就落在了永新的共产党员身上。为了完成筹集经费的任务，她与兄妹向县党部提出了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并动员自己的一个本家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革命。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她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1927年6月，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敏学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当时贺子珍已调到吉安，身兼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二职。永新县逃出来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他们成立了永新

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联络了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准备围攻永新。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子珍委托一个可靠的老俵秘密回到永新，把武装进攻永新的消息、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关在永新县监狱里的同志。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她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永新。暴动成功不久，永新即遭到了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但贺子珍本人听到这些传说时，总是笑着解释说：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

不久，永新遭到了敌人更大规模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只把她从吉安带来的一个小布书包和几本书带在身上，便默默地跟着队伍出发了。她是这支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也是唯一的女共产党员。队伍到达茅坪后，袁文才把她安排在洋桥湖一个老百姓的家里，紧靠着自己的家。袁文才一家对她十分热情，给她送来了被褥，他的妻子谢梅香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她穿，把她当作自家人。她和王佐相处得也很好，王佐把一支自己心爱的小驳壳枪送给了她。这把枪以后一直跟着她革命多年。

贺子珍跟着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后没几天，湘赣两省的敌军就追到山下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进山围剿。在井冈山上同敌人周旋的过程中，她饱尝了战斗生活的艰苦，并因患疟疾而大病一场。为了适应环境，她换上了井冈山一带农家姑娘的装束：上身穿了件土布小袄，下身是一条土布裤，头发也重新留起来。每天除了读读书、帮助谢梅香做家务活外，还常跟着袁文才的练兵教员学打枪。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也来到了井冈山下。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等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当时贺子珍疟疾还没有完全好，也一早就去迎接毛泽东。当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他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更没料到，这次会见将会成为沟通他们未来生活的引线。

毛泽东上山后不久，住到茅坪的八角楼，房子是贺敏学腾出来的。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

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1928年5月，贺子珍接受了军委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带领十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部署和有关情况。同时，还要求组织永新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一天，她同几个战士正在一个老俵家里碰头，想把了解到的敌情汇总一下，向军委作报告。突然，地主的民团包围了这所房子。几个男同志打枪冲了出去。她正准备往外冲，老俵一把将她拉住低声说：“走不得了，收藏起来！”又顺手抓了件妻子的衣服让她穿上，把她推到床上帐子的后边。老俵让妻子装病躺在床上，让5岁的儿子隔着帐子坐在贺子珍的腿上装哭，挡住帐后的贺子珍，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直到天完全黑了，估计敌人不会再来，老俵才让贺子珍出来。看到这家老俵豁出一家性命来掩护她，贺子珍感动得拉住他们夫妻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曾经想方设法找到这家老俵，把他们接到上海家中住了半年。后来她找到了劫后余生的战友，继续工作，最终完成了任务。回到井冈山，毛泽东高兴地对她说：“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小姐，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听后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红四军攻打永新的兵力部署完毕后，她随军委到了前线。攻打成功后，因敌人卷土重来，红军又第二次、第三次攻打永新。在这两次战斗中，她仍然负责永新县城附近村庄的地下工作，了解敌情，并同农民武装暴动队的总指挥部一起，发动群众，配合红军行动。

1928年6月，贺子珍按照党的指示，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贺子珍她们住的老婆婆家里。他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汇报情况，并提出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一天，外县的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面前领取重赏。这时，正在堂屋里同毛泽东一起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后大吃一惊。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庄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在她毫无主张的时刻，抬头看了看毛泽东，他却非常冷静，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实际上毛泽东头脑冷静，思绪清晰，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

冒险之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离！”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老百姓有了准备，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便走了。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许多的战役相比，这乃是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如果说见面初期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同志关系，那么这时候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年轻的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肯轻易吐露的。虽说贺子珍是反封建的斗士，但一想到自己在悄悄爱恋着一个人，胸口怦怦直跳，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

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尖上，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已的上衣的衣角。毛泽东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停了一会，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世了，不知是真是假。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合理的照料，自己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工作。毛泽东为能得到这样一个年轻姑娘的悉心关照，常常露出会心的微笑。

自从那次地主保安队袭击后，他们又在塘边村工作了一个时期。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是恭贺吧。

红军第三次打开永新县城后，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来到了九陇山一带活动，后又转移到田溪。不久，毛泽东要带一个营的兵力去接应到湖南征战的大部队。临行前，他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很快，毛泽东迎还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他惦记贺子珍，第二天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来。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楼前有条

小河，对面则是一片枫林，毛泽东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影响，不便这样做。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贺子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个性很强，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极了。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她心里不高兴，甚至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他注视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尽管仍带着一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直到1933年，她一直做这个工作。

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很不容易，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她煞费苦心。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

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经常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贺子珍生长在井冈山地区，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她经常还是毛泽东作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或核实他了解的情况。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有些闹不太准确的，就记下来，以后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井冈山的生活是艰苦的。贺子珍和毛泽东同所有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尾子，吃一样的饭。毛泽东酷爱吃辣椒，贺子珍有时为他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就是奢侈品了。那时由于蔬菜吃得太少，毛泽东大便干燥秘结，腹胀难受，贺

子珍就步行40多里，向医生借了个大便通气管回来，帮助毛泽东缓解便秘。

1929年1月，红军主力向赣南方向进发，贺子珍跟随毛泽东离开了井冈山，踏上了艰苦的征途。当时她已怀有身孕，可是无论是在饥寒交迫的时刻，还是同敌人遭遇作战，她都很英勇顽强，没有喊过一声苦。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底，毛泽东一直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他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贺子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

在这里读了一年左右，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3年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开展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受到打击和排挤，贺子珍及其家人为此也受到牵连打击。他们找借口不要她管机要文件了，这使她感到委屈，毛泽东劝她说：“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她只好当收发。这一时期，她与毛泽东共患难，给了毛泽东她所能给的全部支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中央批准贺子珍随队出发。她十分关心毛泽东，知道毛泽东身上的担子很重，因此总是尽自己的可能让他吃饱些、吃好些。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身系全军的安危，任务更加繁重。当时，贺子珍已经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她能做的一切工作。队伍一宿营，她常常抽空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

一天，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突然遭到敌机袭击。当她看到不远的路上有位伤员正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起来时，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向伤员冲过去。她正要扶起这位伤员帮她隐蔽，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接着是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贺子珍毫不迟疑地向伤员的身上扑去，头部、背部十四处受伤，昏了过去。

长征路上没有条件动手术，嵌入她头骨里和肌肉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医生只能把比较表面的弹片夹出，洗干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可是伤口仍然不断血。过了一会儿，连鼻子、嘴里也都淌出鲜血，呼吸越来越微弱，脉搏也摸不到了。连里的领导反复商量，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一家老乡，把贺子珍留在那里养伤。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

连里的处理意见。

当时正是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刻都不敢离开指挥岗位，无法分身去看贺子珍。他马上回了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他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来，帮助抬贺子珍。贺子珍负伤的第三天，毛泽东终于抽出时间，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地察看贺子珍的伤势。他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使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拉着贺子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还要让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息吧！”

可是，在那时，贺子珍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啊！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陷入了难以忍受的剧痛之中。为了不呻吟出声，她把嘴唇都咬破了。疼痛到极点时，她曾哀求身边的同志：“我拖累了大家，你们给我一枪，把我打死吧！”在战友们的精心关照下，她终于奇迹般地好起来。几个月后，她能拄着木棍自己走路了，并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中国的政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贺子珍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她不愿意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毛泽东身边做点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她同毛泽东结婚多年，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如今，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毛泽东撤离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生下了娇娇（李敏）。毛泽东对这个小生命十分喜爱，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趣。她此时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了她的愿望的实现。因此娇娇生下刚4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了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要学马列，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

还要出操。贺子珍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集体住宿。这时，贺子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不久，她因患严重的贫血症，只得退学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气。毛泽东是个博学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他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启示，获得知识，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而与妻子贺子珍的情感和思想交流，都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贺子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某些同志相比，就显得过于少了。这种状况的发生使贺子珍很苦恼。本来，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误解就可以冰释。可是贺子珍却不，她的性格过于倔强，她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在思想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多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来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她虽然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活，也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曾与她大吵过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

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如今，贺子珍又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在1937年底一个人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战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上海沦陷了，她便住在西安。毛泽东托人捎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她捎来一个装满日常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床新被，送给毛泽东，人却继续留在西安。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示：上海去不成，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没有动。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了莫斯科。她怀着乐观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谈了自己的见闻、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以及学习的决心，但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不愉快。她旅途的困顿还未消除，就匆匆忙忙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所有的弹片。医生仔细作了检查，发现深嵌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不可能也不必要取出了。这就是说，它已经成为贺子珍身体的一部分，她必须长期忍受弹片留在身上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的头上和身上。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满月以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进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开始了紧张而新鲜的学习生活。

她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仍然是请贺子珍回延安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这时，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早没有了。她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既然已经来了，学习也已经开始，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怎么也要把这期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上说，她生了一个男孩，放在婴儿室，长得完全像他。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可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诚恳的。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她的同学高高兴兴打点行李，准备回国。贺子珍万分地犹豫。按说，她出来学习，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去，更好地工作吗？但是，她已经没有家了，她将何所归呢？再说，她能够坦然地面对毛泽东另有爱人的现实吗？贺子珍终于决定留下来。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在那里读书的孩子学习中文。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所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夫城，国际儿童院也搬到了那里。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还有在皖南事变后送到苏联来的娇娇，都转到这里来了。为了抵御侵略，苏联一切转入了战争的轨道。苏联共产党要求，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同志都要支援前线。东方大学已经停办，生活费也停发了，每个人都必须用劳动所得去购买分配的食物。贺子珍接受的任务是替红军打毛衣、织袜子。后来娇娇生病，她就把孩子从儿童院接回家来自己护理。孩子刚能下地，国际儿童院女院长就要贺子珍去工作，把娇娇送回儿童院去。贺子珍看到女儿的身体还不好，没有同意，两人为此大吵起来。院长一怒之下，把一张贺子珍患精神分裂症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汽车，强行把她拉进了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这家医院把她作为精神病人来治疗，每天强迫她服用各种药物。开始，贺子珍对孩子们还牵肠挂肚地思念，情绪平静不下来。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后，她这种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变得淡漠了。她觉得自己的神经被一种什么东西抑制住，麻木了。她的脑子也变得空虚起来，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模糊，那么遥远，那么不值得为它动情。她成了一架只会吃饭、睡觉和没有思想的机器，而这一切，正是精神病院所要求病人的。

1947年，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来到苏联，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贺子珍。他们发现，贺子珍受了两年多的迫害，神智仍还清醒，就问她今后打算怎么办，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要求回国。王稼祥觉得，这件事牵涉到毛泽东的家庭，不便擅自处理，便打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的状况和要求，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回了一份电报：“同意回国。”

1947年冬，贺子珍带着女儿，在阔别祖国9年以后踏上了归程。列车到

达哈尔滨，李富春等人前来接站。她一下车就要求组织上尽快安排她工作，并为此多次跑到组织部门。她说：“我工作能力低，长期没有工作了，我自己知道做不了什么，但是我想工作，想为解放全中国出一把力，随便安排个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去做。”组织部的同志被她诚恳的心情深深感动了，把她安排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把她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不久，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告诉毛泽东她已回国，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要通过工作了解国内的情况。她在苏联的那段日子，生活比在长征时还要苦。现在她要好好工作，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感谢毛泽东对她妹妹及母亲的照顾，代她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她将终生铭记在心。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贺子珍把两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发了出去。

毛泽东没有回信，却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电报是这样写的：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大约过了一个月，毛泽东派了一个警卫员来，把娇娇和岸青接到北京西山的毛泽东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

等到两个孩子一走，贺子珍感到自己的身边是那样的冷落。在苏联的那段生活，使她害怕孤寂，她喜欢人多，喜欢热闹。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娇娇的来信。娇娇写道：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那里，让她们母女一起住一段时间。每次，毛泽东都让娇娇给她捎来许多食品。贺子珍则从女儿那里了解些毛泽东的近况。

从延安时起，许多干部就有周末跳交谊舞的风气，哈尔滨也有此风，贺子珍偶而也去光顾，婆婆起舞，风姿不减当年。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这次回到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1949年，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居石家庄。他在这里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个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毛泽东没有说，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但贺怡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承认历史上造成的这个事实。这时，

江青正在苏联养病。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站，上来两个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石家庄，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但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她们只好来到上海，住到哥哥贺敏学家里。后来贺子珍到杭州接受谭震林的安排，担任市妇联副主席的职务。

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感谢他对娇娇的照顾，谈了他们三人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信中所表达的意思，贺子珍完全领会了。她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就坐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她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第二天早上，她仍坐在那里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地听着。她见李立英来了，便问她：“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李立英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经烧坏了。从此，贺子珍病了，茶饭不思，精神恍惚。毛泽东的声音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她原来已经愈合的心灵的创伤，又重新裂开，在不断流血。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生病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又派娇娇到上海来，代他探望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对娇娇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生病的。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了，还把烟戒了。毛泽东不时地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国外的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这些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看到毛泽东捎来的东西，贺子珍情不自己给毛泽东写了第四封信，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思念，又叮嘱他要防止像王明那样的人害他。毛泽东收到这封信

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南方的青菜，像芥菜、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让李敏把南方鲜嫩的青菜捎给他。有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了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贺子珍在身体复原之后，就定居在上海。她非常渴望工作，多次去上海市委提出分配工作的请求，可每一次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她在上海生活多年，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除了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去看过她以外，从来没有市委的哪个领导人去看望过她、关心过她的生活和工作。

1959年，贺子珍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还以为是让她去那里休养呢，就随着派来接她的汽车走了。汽车开到九江，立即上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看到面带惊异之色的贺子珍走进来，毛泽东从藤椅上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他去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的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两人坐在两把藤椅上，中间隔着一个茶几。

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此时此地能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看着毛泽东，很温存地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毛泽东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吸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他是不是也在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而后悔呢？“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贺子珍禁不住又流下了眼泪。哽咽起来。两个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有意转换话题，他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到，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贺子珍仔细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他们谁也没有提到江青，连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

放心。”

“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毛泽东问。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毛泽东说，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他们举行婚礼。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的言辞，他俩只点点头，就各自回房间去了。因为明天（实际上只是几个钟头之后）他们还要相会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贺子珍正在自己的房中，等待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忽然有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为什么分手如此突然？连告别的话，互相叮咛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诉说一句？

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个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怕发生什么意外，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关于这次庐山相会，还有一种传说。说贺子珍到毛泽东住处时，听见彭德怀正和毛泽东争论；毛泽东还用庐山名菜——石鸡、石鱼、石耳——和汾酒招待了贺子珍一顿；饭后毛泽东搀扶着贺子珍在山上走了一段，而且“一双大手攥起另一双白皙的手”；临别时毛泽东还不胜依依地吟了一首古诗，当晚贺子珍就下山了。这些描写是艺术性的还是纪实性的？这要靠进一步发掘史料来解决。十几年后，在批判陈伯达时，毛泽东曾说陈伯达，庐山会议时，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这段话中，贺子珍猜想，陈伯达可能是下山去给江青打电话去了。山下有个通讯连，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就到那里去往杭州打电话，把毛泽东会见贺子珍的事告诉江青了。所以江青才突然提出上庐山。

其实，贺子珍把两次庐山会议搞混了。毛泽东说的是讨论工业七十条的那次庐山会议，那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的事。

也有材料说，是康生向江青报的信。反正这件事是一个谜！谜底的解开，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考证。

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20多年所盼望的相逢就这样结束了。大喜变成了大悲，使贺子珍的情绪出现了大起大落。她经受不住感情上的这种起落，又一次病倒了。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子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就是她长期以来悲苍心情的真实写照。“四人帮”横行时，禁止她同任何人谈话，也不准她同亲属以外的人接触，实质上把她软禁起来。她的亲属也受了迫害，有的被无理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然而他们对贺子珍的迫害远不止此。作为1926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她竟是一个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人”。无论是在中央组织部还是上海市委，没有一份有关她的档案。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无头档案也没有。他们企图把她从历史和现实中一笔勾销的恶意一目了然。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女儿娇娇和女婿孔令华怕老人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候在她的身边。可是贺子珍却表现得异常的镇静。饱经忧患的她，已经变得更刚强了。她没有流泪，只是哀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

她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榻前献上心香一瓣。

江青倒台以后，贺子珍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但她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挫折：1977年的一次中风后，得了偏瘫症，从此缠绵病榻，卧床不起。

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为政协委员的消息，并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三个人的照片。湮没了多年的贺子珍的出现，引起了万众的瞩目。几十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和电报从四面八方贺子珍飞来。人们无不为了她的复出而惊喜。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3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她在毛泽东的坐像前，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这个称号的。

1981年，贺子珍回到了上海。不幸的是1984年4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

广播了这一消息。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

从这则消息上看到，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简朴的，也是隆重的，规格很高。党中央的许多负责人都送了花圈。

在贺子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终于走完了她那一生坎坷不平的路。

四、江 青

江青，又名李淑蒙、李云鹤、蓝苹，是毛泽东的第四个妻子，1914年3月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她的祖父是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地主，到了父亲手中已经破落。她父亲叫李德文，学了木匠手艺，又渐渐上升到作坊主。开了木匠铺，雇了小徒弟，并且有了两房妻室。江青便是小妻生下的女儿。那时还不叫江青，只有乳名，叫李进孩。她上小学后，校董薛焕登为她取名李云鹤。小时，她和母亲常挨父亲的打骂，后来，母亲带她到诸城张家帮佣。张家二少爷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又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李云鹤母女很同情，照顾也不错。幼小的李云鹤对他印象很深。15年后在延安相遇，她仍然认出了他。那时张少卿已经改名康生。

1926年，12岁的李云鹤随母亲离开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是奉系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寄人篱下，她的学业也中断了。1928年，她跟母亲、姐姐一家来到济南，进入一个戏班学戏。第二年春进入山东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于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来到了。她曾这样自述：

“1929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15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说来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1930年因时局的原因实验剧院停办，她来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做职员，半工半读作旁听生。在这里她结识了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俞启威是国民党航空总署署长（后为兵器总署总监）俞大维的侄子，但他本人是中共党员，建国后，曾任中共天津市长、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31年，江青同俞启威结婚。受他影响，参加了左翼

文化团体“海滨剧社”，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进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33年2月，又加入党组织。同年7月，俞启威被捕，后由其叔父保释，被党组织调到北平工作。江青则在俞启威被捕后，化名张淑贞来到上海，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很快成为“左翼教联”的一员，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很活跃，在给孩子们教音乐之余，又参加业余剧团的演出。她喜欢穿蓝衣服，蓝布旗袍，导演便给她取个艺名：蓝平。广告上写错了，写成蓝苹——蓝色的苹果。她觉得有新意，就用了这个名字当演员。国民党警察发现蓝苹就是张淑贞，张淑贞就是李云鹤，于是在1934年10月逮捕了她。两个月后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她出狱，她来到北京同已经出狱的俞启威又重新生活在一起。1935年春夏之交，她毅然重返上海，与俞启威的婚姻关系也随之结束。她再次来到上海后，跻身话剧和电影界，因扮演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开始出名，接着又在影片《狼山喋血记》、《王老五》、话剧《大雷雨》中获得成功，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电影、话剧两栖演员。这期间，她又结识了评论家兼编剧的唐纳。1936年他们结了婚。此后，江青掀起几次情海风波，闹得唐纳死去活来，几度自杀，一时成为30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

1937年8月下旬，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是入中央党校学习。翌年10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科的教导工作。11月，与毛泽东结婚。这时江青24岁，毛泽东45岁。

婚后不久，江青调动了工作，从鲁艺转到毛泽东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他们还搬了家，由凤凰山迁到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里。很长一段时间，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国内外不少人撰文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曾对江青约法三章，不准她参与政治，笔者至今未见到有关的档案记载，也没有听到能够与闻其事的当事人的回忆，对此只能存疑。

在当时的延安，江青相貌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并唱得很好，人们把她当明星来看待。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们都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后来又教会女儿李讷唱戏，给毛泽东表演，也给战士们表演。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李讷练字，毛泽东说：“我的字不行，她妈妈的字好，让她妈妈给写字贴。”她还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她不爱打枪，喜

欢打扑克，织毛线活。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讷的衣服、裙子，都是她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转战陕北期间，江青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她负责卫士组，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动，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在紧张险恶的战斗环境中，她从来不曾与毛泽东争吵过。后来，生活相对安定了，她和毛泽东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抱怨有人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向卫士长李银桥诉苦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乎着过吧。

随着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的到来，江青变得有些娇气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对于吃，她的讲究也越来越多。她在自己变化的同时，竭力想影响毛泽东，但无论是保健医生还是江青都无法使毛泽东改变寝食习惯。后来他们夫妻俩连饭都吃不到一起了，分居多年。

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10年里，很少见江青有什么惹人瞩目的活动，她只在党内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江青挤了进去，也当了个委员。当然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于是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报上只见她以“李进”之名出现过两次。一次在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组长袁水拍，组员有李进、冯毅之等12人。又一次是在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一首七绝中，题目是《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

建国后前几届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江青都不是代表或委员。直到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所有中央常委都支持，她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

家英一起被中央任命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有了较为重要的职务。1964年底，全国第三届人大召开，山东省的代表名单中开始出现她的名字。实际上，建国后的十多年内，江青并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居要席。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便于9月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正在这时候，她听到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于是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把柯庆施找来，而柯庆施则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艺术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于是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江青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与此同时，江青大抓“样板戏”。1963年3月22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13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时间。其他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了中国京剧院。……”

1963年秋，江青又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

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来！

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革命样板戏。”

紧接着，1964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剧嘛！”于是，世人又看到了京剧《海港》。

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样板戏”总算树起来了，江青的名声也响了。

1965年初，江青和柯庆施、张春桥又在上海聚首，谈起了她久想批判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雄文”。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突然出现在上海《文汇报》上，陡然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引爆点。

1966年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如下：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样，江青作为“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随着运动的深入，1967年1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为：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了1967年8月，王、关被

捕；1968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在“文革”的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对江青是比较信任的。正因为这一点，江青得以在1969年“九大”上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夏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为争权夺利发生激烈冲突时，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支持江青。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在中共“十大”上，江青保住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但此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日益不满，同时对江青一伙能否把握好中国的政权也丧失了信心。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让他分担病重的周恩来的工作，这使江青很不自在。

1973年底以来，毛泽东已多次批评江青，对江青的不满日甚。1974年，有一次，江青要见毛泽东。通报之后，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一封信。内容是：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大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 3. 20

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这次求见未被获准。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当面批评江青说：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极不情愿地说。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

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钢铁工厂不开了，至于帽子店，江青说：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其实，江青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江青的真正用意不是批这个外国人，而是要打击周恩来。现在她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是向毛泽东告状，二是说给在座的周恩来听。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说话。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了安排。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青为了抢到组阁的权力，加紧了活动，以谋取毛泽东的支持。根据江青等的旨意，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专机到长沙告状。当晚，毛泽东接见了她。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同一天，北京的钓鱼台10号楼里，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泽东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几人的不满。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做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做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江青曾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金祖敏是青岛市的纺织女工，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她接到北京，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天以后，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

江青曾屡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

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在用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花制成的花圈上，写下“您的学生、战友”“敬献”字样。当时举国哀痛，可江青却没有流过泪。10月6日晚上，几名解放军来到她在钓鱼台的寓所，向她严肃地宣布了逮捕令。她知道情况不妙，就大喊大叫起来：“主席尸骨未寒，你们胆敢欺负我!”就这样，江青的女皇梦破灭了。

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江青。她每次上庭，总时左顾右盼，强作镇静。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或者装聋作哑，或者矢口否认，或者避开犯罪事实无理取闹，或者胡搅蛮缠，甚至撒泼耍赖，攻击谩骂法庭。在大量的确凿的事实面前，法庭依据无可辩驳的证据于1981年1月判决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84年5月4日又允许她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凌晨，她在保外就医的居住地自杀身亡，终年77岁。

第二节 毛泽东的姻亲

一、杨开慧家系

1. 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是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隐储山下的板仓冲。他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但没有做过什么官，一直在家乡附近以授徒为业。因此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书祥，字书樵。他有4个子女：长子昌运，字荣生；第二个是女儿，嫁金井郑姓；杨昌济是老三；老四杨昌恺，字瑞生。杨书祥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小吾，因无子，便将杨昌恺过继来做儿子，所以杨昌济有时称杨昌恺为“堂弟”。

杨昌济的母亲向氏是平江县石洞人。向家乃诗书世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8岁失恃，14岁失怙”。母亲、父亲相继去世，给他早年的生活留下了不少阴影。1888年，杨昌济17岁时，与舅父前妻所生的第二女儿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应试“举人”不第，便出门授徒，积累了一些教学方面的经验。1893年再次“乡试”，又不第，心情苦闷，日渐消沉。1895年至1898年这几年中，杨昌济有时在长沙居住，大部分时间则在乡里授徒。在板仓附近的巷子山陈家当过塾师。在这期间，他继续进行自学。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请教、交流。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进。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生了儿子杨开智，1901年生了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在戊戌年也考上了“秀才”，但鸦片烟瘾不断，长卧家中。杨昌济岁岁课徒，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他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了。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无主、前途无适的时候，1900年8月，又传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消息，这对他震动很大。这时，杨昌济的密友杨毓麟思想更为激进，已经暗中鼓吹和串联进行革命，并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时代思潮的感召下，在杨毓麟和其他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也离乡背井，东渡日本。临行前，他改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都，却心怀中华。

1903年春，杨昌济告别妻子和儿女，从长沙乘船赴日本。同行的湖南留学生有30多人，以他的年龄最大，当时他已32岁了。又因他学识渊博，故大家十分尊敬地称他为“怀翁”。到达日本后，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读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他学习十分刻苦，生活非常简朴，但是特别喜欢旅行。他相信古人“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说法，每当假日，便去游览日本的名山大川，丰富阅历，陶冶情趣。这一点对后来的毛泽东有极深的影响。

杨昌济在弘文学院的学习成绩优良，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结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修业期限为四年。不久，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在杨毓麟、章士钊的极力推荐下，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泥北淀大学哲学系，专

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当时章士钊亦在该校学习。

1912年夏天，杨昌济结束了在滬北淀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往德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是对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也无不留意。考察完毕后，便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被立宪派政客谭延闿所窃据。谭延闿企图多方网罗人材，他见杨昌济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曾有一定威望，便想罗致他当湖南省的教育司长。杨昌济托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闿邀请。他决心以教育为己任，便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的聘请，在学校执教。除此之外，他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高师虽是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但是却没有人系统地讲授过伦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在该校第一次开设这样的课程，不仅对于培养师范人材，而且对以后湖南的教育事业，都有良好的影响。他还先后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教课，并任过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授伦理学和国际商法。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授课时，与该校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员，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白沙等人共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师的学生一般家境贫寒，深知读书机会难得，学习刻苦用功。杨昌济感到这些好学向上的青年十分可爱，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教材，先后编写了《论语类钞》、《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及《附录》等，同时，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尊重。许多学生不仅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还成群结队地去“板仓杨”寓向他请教。杨昌济住在长沙时，寓所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5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儿，都有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寻迹而来，登门求教。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章甫、罗学瓚、张昆弟等人，杨昌济很高兴和这些青年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感到无限欣慰。曾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回国之初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这时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和毛泽东都转入了该校。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杨昌济十分欣赏。杨昌济博学多识,诲人不倦,毛泽东非常敬佩。杨昌济在浏正街李氏芋园时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蔡和森、肖三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怀中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看的书的心得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楚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指导进行自学。

杨昌济通过和这些学生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当时,毛泽东在一师学生刚刚掀起的一场驱逐校长张干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校长张干下令将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开除。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要求张干收回成命。接着,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没有在一师上课。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拉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经过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昌等进步学生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深感要使个人和社会向上,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于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固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根源,但与杨昌济的巨大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毛泽东谈到创立新民学会的缘起时,在指出其他方面的两个原因之后,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从酝酿到成立,即从1915年到1918年,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

1917年，杨昌济在英国派北淀大学的同学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章士钊向学校校长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当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1918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到北京以后，杨昌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并立即出任北大文科伦理学教授。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他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利勃斯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杨昌济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且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的。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1919年北大出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杨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歿。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之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问杜威博士欧美最新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此书初版很少，早已卖光了，现由北京大学出版部用五号字重印，一来可供一般学者的参考，二来也可以作杨先生身后的一种纪念。只可惜杨先生说的‘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的话，现在不能实践了！”

1918年夏天，当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时，新民学会许多会员也从一师等学校毕业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继续升学，但是又苦于缺钱，即使是自学也要栖身之所和生活费。正在他们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

1918年6月，新民学会集会专门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确定由肖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到达北京。但是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些青年便分别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杨昌济把肖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又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

森等人，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从而使他们得以顺利赴法。杨昌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情赞助，使广大留学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期间，继续和杨昌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他自己曾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在杨昌济的赞许下，他和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1919年1月，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陈公博、陶履恭等12人联名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通过一些讲演和报告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气氛。这一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筹建工作十分艰难。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和章士钊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留学归国后不久，又提出了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待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时，杨昌济已逝世六年了。他一生埋头教育事业，无意富贵利达，家境十分清寒。1919年这一年，他因生病住在西山疗养而不能去北大讲课了，按照惯例没有工资。蔡元培对他特别加以照顾，按月发给生活费。一些同乡好友如章士钊、杨度、李儆、方表等人，则集资供给他医药费用。12月初，他的病情转重，便由西山转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不久，毛泽东等人为驱逐军阀张敬尧来到北京，多次到医院看望杨昌济。1920年1月17日上午5时，病魔终于夺去了杨昌济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他临终前还在与友人谈话，说：“吾意正畅。”说罢，便溘然长逝。时年虚岁50。

杨昌济逝世以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0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贖助”。

25日，杨昌济在京的友人杨树达、黎锦熙、方叔章、朱剑凡、陈凤芳等数十人在法源寺设祭追悼，许多人送了挽联。蔡元培送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话：“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字虽不多，却概括了杨昌济勤奋的一生。为了解决杨昌济身后家属的生活困难，蔡元培、胡适、马寅初、陶履恭4人还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号召北大教职员及同学为之募集贖金。2月4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杨昌济教授及刘师培教授身后恤金，应根据田北湖、朱蓬仙教授先例，各赠送两月俸金。”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便在他的家属杨夫人、杨开智、杨开慧和学生毛泽东、陈绍林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杨昌济在北京逝世，也引起了长沙教育界和新闻界的震动。他逝世的第二

天，即1月18日，湖南《大公报》刊载了《杨怀中先生昌济于北京逝世》的消息，同时发表了李肖聃写的关于杨昌济生平的详细介绍。

2. 向振熙。向振熙，是杨开慧的母亲、毛泽东的岳母，1870年出生在一个诗书世家。1888年与杨昌济成亲，生有一男二女，其中大女儿杨琼不幸夭折。1903年杨昌济出国留学，她带着儿女在家艰辛度日，一别十年。1913年杨昌济回国后，举家迁到长沙城，随后她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师母。1918年6月，杨昌济举家迁往北京，她带着孩子住进了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1920年1月丈夫逝世后，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同家人扶柩南下，回到了长沙板仓故乡。

杨昌济逝世时，留下的家资不丰，向振熙靠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并供一双儿女上学。治家理财，养儿育女，可谓煞费苦心。1920年毛泽东办文化书社时，苦于经费不够而到处奔忙。于是杨开慧动员母亲拿出父亲的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费，协助毛泽东办起了文化书社。这年冬，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他们把向振熙接到清水塘同住，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后来又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儿子岸英、岸青。1930年女儿牺牲后，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她和儿媳装扮成走亲串门的模样，护送岸英、岸青、岸龙到上海。返回湖南后，与3个外孙联系中断，不知他们的生死下落。诸多不幸，给她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

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有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同湖南杨家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8月湖南长沙解放，毛泽东才从妻兄杨开智来信中得知岳母健在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立即拍电报向岳母问候和祝贺：“来函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还特别嘱咐杨开智：“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9月，当他获悉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托朱仲丽给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也替杨开慧尽了人子之心。礼物之外，还附有一封便信：

杨老太太：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1949年9月11日

1950年岳母80大寿，毛泽东嘱儿子岸英前去湖南拜寿，并带去两棵人参，让老人家滋养身体。人参是别人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认为老岳母比他更

需要进补。毛岸英的到来，使向振熙十分高兴。她对孩子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她还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次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每月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有时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过去。

1960年是杨老太太的90高寿。毛泽东听说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老家祝寿，便给她写了一信：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90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200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毛泽东

1960年4月25日

1962年春，毛泽东又派毛岸青和邵华回湖南看望杨老夫人。就在这一年，向振熙去世。毛泽东获悉后，心情十分哀痛，很快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发去电报，以表悼念。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老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也寄托了他对所有早逝的长辈亲人的一片孝心。

3. 杨开智。杨开智，字子珍，是杨开慧的哥哥、毛泽东的妻兄，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0年代初期，他曾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于1925年毕业。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和妻子李崇德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掩埋了烈士的遗体。1931年，他们辗转接到毛泽民的手书，要求把杨开慧的三个孩子送到上海。于是他的母亲和妻子几经周折，终于把三个孩子送到了毛泽民夫妇身边。

杨开智与李崇德结婚后，在1920年10月26日有了一个女儿，取名杨展。1938年，他们将爱女送到延安。不幸的是，杨展在1941年的反“扫荡”中牺牲，而他们直到长沙解放时才从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这个消息。电报说：“展儿于8年前在阜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不久，杨开智将母亲健在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回电表示祝贺。从此以后，他们经常互通信息。毛泽东非常关心岳母的生活，多次寄钱和衣物给老人，并请杨开智夫妇代尽一份孝心。

建国初，杨开智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不错，但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被毛泽东婉拒。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谋私。他用严肃但又有分寸的语气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和妻兄杨开智各写一信：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9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10月9日

1950年，湖南省委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安排他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出任过湖南省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省政协副主席。

这一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湘给外婆祝寿，毛泽东趁此机会捎去一信，热情鼓励杨开智夫妇。信中写道：

子珍
崇德 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此问

近佳！

毛泽东

1950年4月13日

毛泽东不仅请杨开智帮助处理家事，也委托他办理朋友故旧之间的事。1954年4月，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给杨开智家里寄去600元，并代写一信，告诉他：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女士，现在长沙教书，生活困难，曾有人提出希望推荐她进文史馆任馆员，但因文史馆资格颇严，不好介绍。毛主席想从自己的稿费里送她若干，作为帮助，请杨开智从侧面打听一下，征得她的同意。杨开智收到信后，立即去做这件事，然后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据此给李淑一汇钱，帮助这位开慧的好友、烈士的亲属渡过难关。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杨开智极不放心，专程赶赴北京。其时要见毛泽东已极其困难，他只好让毛泽东身边的人递进一张近照和一封慰问信。不想毛泽东看后一眼就认了出来，当即要打电话把杨开智请进来。服务人员认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宜见客，只好把杨开智的信放在一级待办柜内，准备病情好转后立即召见。不意毛泽东的身体从此再无好转，杨开智想见一见病中毛泽东的愿望，也终成遗憾。

1982年，杨开智逝世，享年84岁。

二、贺子珍家系

1. 贺焕文和杜秀。贺焕文和杜秀，是贺子珍的父亲和母亲、毛泽东的岳父、岳母，江西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便是他们的家乡。贺家祖父辈是永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山和房屋。贺焕文是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凭家中资产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杜秀是广东梅县人，人长得秀美，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贺焕文和杜秀结婚后，生有二男三女，即：贺敏学、贺桂圆（贺子珍）、贺银圆（贺怡）、贺敏仁和贺先圆。

贺焕文任安福县县长时，立志要清廉，爱说老实话，办事公道，终于被人挤了出来，撤去了县长职务。回到永新后，就在县衙里当了个刑门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贺子珍4岁那年，他因一场官司牵连进去，被县衙借机关进了大牢，杜秀为赎他出来，把家产差不多都变卖光了，从此家道中落。为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们凑了点钱，在县城南门租了个铺面，开了一家茶馆，叫“海天春”，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客房可以住客，全家人则住在茶馆的后面。

贺焕文和杜秀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的前途操心了。他们是读过书的人，自然不想让孩子守着这个茶馆过日子，希望儿子学有所成，不辱自己的书香门第。至于女儿，识两个字认得自己的姓名就行了，将来找个好人家

嫁出去。因而，笃信国学的贺焕文，不肯把儿子送进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请来一位私塾先生，在家里教儿子读经书，但不让女儿学。后来在两个女儿的坚持下，只好送她们入了县城的福音堂小学。不想孩子们并不愿意按照他们安排的路去走，整天闹学潮，搞暴动，他们终日里提心吊胆，却也无可奈何。

后来，儿女们感到，整天不归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一天，贺子珍拉着妹妹贺怡坐到父母身边，细细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来。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女儿多说？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女儿了解的多得多，自己也曾身受其害。从这点上讲，他们也是赞成革命、同情革命的。因此后来当贺敏学兄妹三人开展“募捐打粮”的工作时，他们也自动把茶馆里所存的一部分粮食和银元、首饰捐献出来，算是对儿女们事业的支持。

1927年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夺权时，贺焕文与妻子杜秀携女儿贺怡一起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后来逃到吉安清源山当和尚的一个亲戚家中，在那里当起了斋工，掩护女儿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打游击。永新家中的茶馆被敌人占领，成了军营。留下来的小儿子贺敏仁和小女儿贺先圆，已由舅母收养。后来永新暴动后，他们最小的女儿惨遭敌人的杀害。贺敏仁长大后，在红六军中当了司号兵，不幸被错杀。另外，贺怡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贺敏萱，在全家出逃后，无以为生，只得躲到庙里当了斋工。以后他入了党，以斋工身分作掩护，为党传递情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宗教地主”、“假党员”，被整得死去活来，夫妻俩双双含冤死去。

贺怡和毛泽覃结婚后，贺焕文夫妇随女儿到了东固，在东固区委做勤杂工，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后来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份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1935年毛泽覃牺牲后，贺焕文夫妇随女儿贺怡来到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中避难，后来又一起来到赣州，贺焕文在江西后方办事处当主任。1938年的元月，贺焕文病逝于赣州河西岗边排的三宝经堂。当时子女一个也没有在身边。项英和杨尚奎拿出130元，替他办了丧事。贺焕文的追悼会在三宝经堂举行，其遗体安葬在岗边排。贺焕文故去以后，杜秀孑然一身，很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着贺子珍过日子。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去了，是毛泽东照顾她的生活。后来，她病逝在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出10块银元，请老乡重新把她埋了。

东北解放后贺子珍从苏联回国，了解到父母的不幸，禁不住失声痛哭出来，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感谢了毛泽东对她母亲的关怀和照顾。

2. 贺敏学。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毛泽东的妻兄，190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儿时，父亲曾希望他学有所成，为他请了一位老夫子在家私授，但他对之乎者也毫无兴趣，经常淘气赖学。继而父亲送他进了县立中学。他虽不爱读书，但善习武，胆大勇为，曾拜师学艺。一次，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惹得他怒火冲天，一气之下，把饭碗砸了。一天，几个军阀兵痞来他家开的“海天春”茶馆闹事，他手疾眼快，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就朝兵痞的屁股上捅去，烫得他们抱头鼠窜。

贺敏学在永新乐川中学读书时，是学生领袖，带领学生闹学潮、搞斗争，终遭学校开除。后来在井冈山“落草”的袁文才与他是同学。二人曾一起趁着天黑，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井冈山时期，两人关系甚笃。

1926年，贺敏学参与发动组织学生爱国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永新县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后，他担任了商民部部长的职务。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中共临时县委时，他与两个妹妹同为县委委员。

1927年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夺了权。贺敏学在大逮捕前逃离了县城，隐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在永新监狱里，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贺敏学任支部书记。他们继续谋划武装暴动，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塞进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暴动成功后，以狱中支部为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任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兵分三路，全部秘密撤出县城，开往井冈山。

井冈山地理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非常闭塞。贺敏学等20几个永新的党员，对外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工作局面开展缓慢，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全靠自己摸索，每个月聚会一两次，交流些听到的山下情况，研究队伍今后的去向。在这段日子，他们心急火燎，如煎如熬。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拉着一支队伍来到井冈山，贺敏学赶紧把自己住在八

角楼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并经常去那里与他交换意见，共谋对策。他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

不久，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毛泽东赠给的7支枪，回永新重新组织工农赤卫队。他们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上了九陇山。曾遣散回去的自卫军战士和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又联络起来，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贺敏学的队伍，通过这些人，不断吸收新的战士，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从此，九陇山成为永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很快，永新县委迁到九陇山，毛泽东和贺子珍也来到这里。1928年夏，他担任了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党委书记。

1929年红军大部队曾一度冒进湖南，江西的敌军乘此机会，拼凑兵力，进攻永新，井冈山根据地告急。贺敏学带领自己的赤卫队，跟随毛泽东，动员了几万人投入战斗，保住了永新这块根据地。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后，贺敏学还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又带领游击队在这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在此期间内，1930年后他曾担任湘赣边红军第十四纵队司令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警卫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3年3月任赣南红二十三军参谋长。以后他又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南线作战。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王明路线的执行人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四首脑”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再往后，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奉命留在江西打游击，先后任中央军委司令部科长、独立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参谋长、湘粤赣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捕。他设法逃了出来，在一个老乡家里养好伤后，就四出寻找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探听消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忘不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曾给地主家看过鱼塘，领导渔民斗倒了地主恶霸。国共合作抗日以后，他属陈毅的部下，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同日军作战。在炮声隆隆的岁月里他与长得文静秀气的新四军女干部李立英结婚，生下女儿贺小平。在此期间，他历任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皖南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党委书记、江南人

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参谋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兼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特务团团长等职。1945年后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参谋长、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出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1948年任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副军长，率部参加淮海、渡江等战役。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时，贺敏学正在山东，同重点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是他的妻子李立英和五岁的女儿贺小平，代表他到哈尔滨去看望贺子珍。后来，毛泽东接李敏回到自己的身边，贺子珍只身从北方投奔上海，就寄宿在哥哥家中。1950年，贺敏学与妻子李立英商量，由李立英执笔，以贺子珍和他们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贺子珍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后来也写信给贺敏学，请他代为照顾贺子珍。贺子珍身体一直不好，虽然上海给她安排了单独的住处，但哥嫂俩经常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休养，以尽兄嫂之情。后来又常派自己的女儿贺小平到贺子珍身边，让她陪伴照顾这位晚年孤苦凄清的姑妈。

贺敏学调到福州后，担任过福建省副省长的职务。又经常把贺子珍接到福州去住一段。江青得志时，贺敏学曾被一伙歹徒绑架，无理关押了80多天，家也被抄了。放出来后，又被罢了“官”。贺敏学是凭着自己的生死奋斗，凭着自己的赫赫战功当上领导的。在妹妹和妹夫得志时，他没有沾过什么光；妹妹失意时，他却跟着受了不少的罪，甚至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对此，他毫无怨言，对贺子珍这个妹妹，始终是一往情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保护她。

1984年4月中旬，远在福建的贺敏学接到女儿贺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得知贺子珍病情严重，马上偕夫人李立英一起赶到上海，亲自参与护理照料。贺子珍逝世后，他又率李敏夫妇及其子女，坐专机把骨灰亲自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为命运多舛的妹妹尽了兄长的最后一份爱心。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曾历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防空军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兼中共西安市委常委、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建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二、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4月26日因病在

福州逝世。

3. 贺怡。贺怡，原名贺银圆，是毛泽覃的妻子、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的妻妹和弟媳。她在贺家排行第三，上有哥哥贺敏学、姐姐贺子珍，下有弟弟贺敏仁、妹妹贺先圆。小时在家和姐姐一样，不受重视。父亲为哥哥请来了教书先生，她们却没有权利趴上书桌，只好躲在门后偷偷听讲，倒也认识了不少字。后来基督教渗入永新县，外国人开办了一所福音堂小学，分设男、女部，招收中国学生。在姐俩的坚决要求下，父母看到女孩子入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也就同意贺怡跟着姐姐贺子珍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哥哥贺敏学也进了永新的一所官办学校。不久因为哥哥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学籍，父母一怒之下，把贺怡兄妹三人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贺怡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又从屋顶的天窗上爬了出来。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已经加入了党组织的贺怡，每天像影子一样跟着姐姐贺子珍，前前后后地忙碌，办政治夜校。天天早出晚归，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帮手。后来姐姐担任永新县党部妇女部第一任妇女部长后，她也担任了妇女部的副部长。她们与担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联名向县党部提出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动用工农赤卫队的武力强行解决。他们还初步提供了分别用这两种办法打粮的名单。

“武装打粮”的任务由县党部组织工农赤卫队去执行。“募捐打粮”的典型，县党部让她们姐妹去创造，她们两人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她们说服一个在县里颇有影响的本家，让他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其它物资来，起到了典型作用。她们的父母也把自己存的一部分粮食和银元、首饰捐献出来，支持了女儿们的行动。

永新县大革命的运动发展到最高峰，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4个支部，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怡和哥哥、姐姐一起当选为县委委员。

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怡同父母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当晚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出城，投奔到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的一个亲戚家。后来，贺怡利用父母当斋工为掩护在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1930年，红

军攻下吉安后，她参加了当时特委的工作。不久，她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很快便结了婚。

1933年初，王明等人在党内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当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组织部的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批判，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因为当时她已怀孕，中央决定贺怡同毛泽覃一起留下，坚持游击活动。毛泽东、贺子珍把儿子小毛托付给他们。他们商定，先把贺怡的父母和小毛安置在小毛的奶妈家，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红军北上后，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小毛奶妈的家乡也被敌人占领了。贺怡和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贺怡和毛泽覃留在江西开展游击斗争不久，由于项英推行“左”倾路线，硬打硬拼，中央根据地很快整个丢了。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这时，贺怡

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让她同她的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里暂避。贺怡领着两位老人来到于都时，敌人已经占领于都。原来的县委书记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贺怡挺身而出，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西安事变以后，赣南游击队的代表同国民党在赣州谈判。贺怡闻讯，立即赶到赣州，同上级党组织重新联系上了。以后，她来往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她担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兼统战部副部长，1939年调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1940年6月30日，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特务，在韶关逮捕了她，并对她施以酷刑。她为了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曾吞下金戒指准备自杀。以后周恩来同顾祝同谈判，用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把她换回来。贺怡到了延安，住进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取出。按照规定，手术前必须由她亲属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时，贺怡身边没有亲人。毛泽东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个字我来签吧！”手术后，她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80多斤，但她仍然不倦地工作。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贺怡找到哈尔滨。当她了解了姐姐的情况后，十分同情姐姐的不幸遭遇。她带上娇娇去找毛泽东。见面后，她说：“主席，我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

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笔在一张通天10行笺上匆匆写下几行字。

这是一封给贺子珍的信。信的大意是：

自珍：向您问好！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1949年的一天，贺怡在石家庄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不料车到山海关站，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告诉她们不能进石家庄，只能南下。她为姐姐据理力争，但那两个人板着面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她们只得转车去上海。

为完成前夫毛泽覃的遗愿，贺怡在刚解放时，曾四处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失落的儿子小毛。毛泽东刚进北京城不久，贺怡曾来到香山告诉毛泽东，小毛

现在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特别高兴，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说完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地点、时间、照片、岁数都不相符，不像是小毛。不久，她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小毛奔波。1949年秋末，她出差去广东，把寄放在广东的女儿贺海峰和儿子贺春峰一起找了回来，同时还接来了烈士古柏的遗孤古一明。她在广东接到江西吉安地委的电话，要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迅速赶回吉安，说是可能已打听到毛毛的下落。11月22日，她们一行从广东赶到泰和时天已大黑，按说理应当在泰和借住一宿，第二天再赶路。当时这一带土匪活动还很猖獗，他们扬言要杀掉贺怡。这个消息贺怡早在赣州时就已听到过。所以，警卫员和贺海峰兄妹的养父都劝贺怡在泰和住下，待天明时再赶路。可是为了早点找到毛毛，贺怡把个人安危放在脑后，毅然决定连夜驱车。吉普车疾驰在颠簸不平的泰和至吉安的公路上，当车子沿着下坡路俯冲的时候，对面的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火把。贺怡机警地省悟道：“有土匪！”警卫员马上命令司机刹车，在这危急的关头，驾驶员不但不刹车，反而加速，车子直冲向大桥。原来这个驾驶员是个国民党特务，他在赣州时已受国民党特务上司的指示，要暗害共产党的功臣、毛泽东的姨妹。在车子即将翻下河的千钧一发之际，贺怡当机立断，把儿子贺春峰推出车外，因而贺春峰没有一点伤害。贺海峰在警卫员的保护下，压在车下，直到第二天的早上被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婆婆发现，才将她拖了出来，而贺怡和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

贺怡的死，使无数人失声痛哭，但也有人高兴，这个人就是江青。江青对贺怡一直是既恨得要命，又怕得要死。因为毛泽东很信任贺怡，而且贺怡一解放就来找毛泽东，替她姐姐贺子珍说情，这还不算，又去找小毛。因此，贺怡一死，江青更是幸灾乐祸，喜形于色，恶语毁人。

贺子珍知道贺怡在车祸中身亡后，难过极了。她深知妹妹的死都是为了她，因而亲自担负起护理贺麓成的任务，把对妹妹的怀念和爱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生活泼辣、刚强、敢作敢为的贺怡就这样先姐姐去了。

4. 贺敏仁。贺敏仁，是贺子珍的弟弟、毛泽东的妻弟，在兄妹中排行第四。大革命失败后，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他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分而觉得高

人一等，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中央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块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有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的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1两块钱。因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1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后来重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子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